

殖民主义史  
非洲卷



郑家馨 主编

# 殖民主义史

## 非洲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15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殖民主义史:非洲卷/郑家馨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7-301-04163-2

I.殖… II.郑… III.殖民主义-历史-非洲 IV.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5473号

书 名: 殖民主义史 非洲卷

著作责任者: 郑家馨 主编

责任编辑: 何瑞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163-2/K·26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3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飞跃书刊发行公司

印 刷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22.375印张 580千字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研究项目，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集体合著的多卷本《殖民主义史》中的一卷。本书研究的重点是 1415 年以来 500 多年英、法、葡、德、意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殖民活动的轨迹，他们在各个时期所奉行的不同殖民政策和制度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关系，并深入研究殖民主义因素对南非、西非、北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非洲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对非洲殖民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如奴隶贸易、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殖民统治制度的演变、殖民主义从非洲的撤退，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后果等问题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体现了本学科领域目前新的研究成果。

## 前 言

殖民主义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些年来,即使是对外国人所撰写专著的翻译,也较少。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对落后,过去主要是西方殖民宗主国做过一些专题性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殖民(移民)史、帝国史、海外扩张史,其论点大多是为殖民主义辩护,其史料大都来自殖民者留下的文献和论著。因此,开拓这个研究领域,是我国世界史学术界的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如果以1415年葡萄牙人侵占非洲西北部的休达城作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开端,以1999年葡萄牙退出澳门,澳门回归中国作为殖民主义在地球剩下的几个角落寿终正寝的标志之一的話,那么,殖民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活动的时间竟长达584年。殖民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怪胎”,它获得世界规模的扩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然而,殖民主义制度虽然伴随世界资本主义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过程,如今,它已经从它曾经侵占过的绝大部分地方撤退了,至少它不会再以原初的形式陪伴世界资本主义走完最后的历程。

当殖民主义史还是作为进行中的历史(尽管已经历了数百年),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往往不足以说明它的全部历史本质。现在,殖民主义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其全部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sup>①</sup>,从逆向

---

①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的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页。

考察的角度来开始研究了。从这个意义上,可否说殖民主义后的、发展了的历史,为我们充分认识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钥匙。

多年来,在北京大学《世界通史》的教学科研和 Seminar (研究班)中,主讲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围绕着殖民主义史提出了许多较为深入的、促人思考的问题:

(1)近代殖民主义与古代(例如罗马帝国)殖民制度的重大差别是什么?为什么应该将近代殖民主义看作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

(2)近代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步产生”还是略先于资本主义?为什么 14 和 15 世纪地中海资本主义的萌芽或因素没有像比它晚一两个世纪的大西洋沿岸资本主义的萌芽或因素一样达到规模性的产生?关于早期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作用应如何估价?

(3)殖民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巨大负面作用,特别是它对东方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恶是早有历史定论的,那么这种殖民主义的历史负面作用是属于“殖民主义也夹杂着一些消极的东西”,还是殖民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国际的性质”<sup>①</sup>,它的生产关系都具有国际性质,而且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手稿中将“生产的国际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级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类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sup>②</sup>。既然殖民主义以暴力方式在世界各地传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本国以外传播的是一级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二级的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1 页。

② 同上书,第 46 卷上册,第 47 页。

三级的、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如果说在殖民主义早期阶段它一般传播的是二三级的、派生的、非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输出阶段，这种状况有没有变化？

(5)如果说殖民主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国际的性质，及其早期须将殖民暴力当作经济力来使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除了政治方面原因外，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变化，使它可以不再倚靠殖民主义作为超经济强制手段来推行国际等级性的劳动分工，维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建立起适合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性剥削制度？

(6)关于马克思提出的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有的学者认为理解这一提法的理论前提是接受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线论，即亚洲(东方)社会有其不同的发展机制和动力；有的学者则认为其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高度发展了生产力，使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究竟是哪一种说法较为正确？

(7)“双重使命”论所提的“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是否前者主要是消极作用，后者主要起积极作用，抑或两者均含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

(8)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的两重性是世界历史上政治价值观与经济价值观相背离的矛盾现象，那么，探讨殖民主义作用，如何防止将道德评判与历史研究相混淆。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人类历史上正义与进步完全背离的二重性现象，例如殖民主义双重作用这一著名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要充分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性，一方面又适当地肯定它的客观历史作用，及其作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的某种进步性。

(9)新殖民主义能否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如有的学者(恩克鲁玛)看成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sup>①</sup>,或如有的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新殖民主义始于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sup>②</sup>?

(10)如何理解“非殖民化”?有的学者认为“非殖民化”只是强调殖民宗主国在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的活动,而且强调它给予殖民地独立的主动能动性,因而不主张使用“非殖民化”一词,而愿意使用“殖民体系瓦解”或“殖民主义撤退”等词;有的学者认为,“非殖民化”一词内涵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包括文化、历史和心理方面。能否将“非殖民化”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的关系:非殖民化是否包括在新殖民主义之中?……。

这十个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是我们在讲授《世界通史》和科研时经常面临并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然而,要较为完满的解答这些问题(哪怕是初步的),除了需要理论上的钻研,更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史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史教研室最先倡导编写多卷本《殖民主义史》并为此作出努力的,是罗荣渠先生。1991年历史学系在制定本系“八五”科研规划时,决定将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作为世界史专业的科研重点项目之一,将编写多卷本《殖民主义史》列入计划。1992年正值“八五”《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教委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均列有《殖民主义史》课题,北大历史学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便以《殖民主义史(非洲卷)》、《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和《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分别向国家项目和教委项目申请。

---

① 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1页。

②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8页。



我们申报的多卷本《殖民主义史》课题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一部能大体反映当前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因本书部头较大,限于人力安排,不能同时上马,拟准备分卷、分阶段进行。八五期间先上《非洲卷》、《东南亚卷》和《南亚卷》。《总论卷》因尚需继续深入研究,不在八五期间安排。以后,待条件成熟时还将陆续撰写《拉丁美洲卷》、《东北亚卷》、《西亚卷》、《中亚卷》等。《殖民主义史》拟集中探索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本书把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去阐明“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的关系;

2. 重点剖析英、法等一些主要殖民国家的殖民政策,研究不同的殖民政策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关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之间的重大差别;

3. 重点剖析一些殖民地(如印度、南非、阿尔及利亚等),研究殖民主义因素对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4. 重点研究一些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及其对“非殖民化”的相应影响。

在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资助后,我们决心将殖民主义史作为一部系列著作,写成一部史料翔实、立论有据,能反映和吸收当前研究成果的书,使之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殖民主义的区域通史性著作。我们相信本书分卷陆续出版,将对高等学校的世界史、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课程的教学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历史的研究作出一项基础性的贡献。

《殖民主义史·非洲卷》于1997年底完成撰稿工作。参加本卷撰稿者,除主编郑家馨外,均为我国新一代非洲史研究者,其中绝大部分为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非洲卷是作为已于1995年出版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研究项目《非洲通史·近代史卷》的姊妹篇来写的。本卷主编是《非洲通史·近代史卷》两主编之一；本卷不少撰稿人也是该卷许多章的作者。因此，本卷的撰稿人可以避免对一些基本历史事件做重复的叙述，而匀出篇幅，从殖民主义史角度，侧重于分析、比较，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新见解。

《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在完成撰稿后获得季羨林海外教育基金的资助，使本书得以较快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是我们要深表谢意的。

参加本卷撰稿者，依次为郑家馨（北京大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李安山（北京大学，第六章），刘乃亚（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七章），沈浦娜（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第七章），赵伟（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美国Duke大学，第八章），卢凯望（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第八章），潘华琼（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比利时卢内大学，第九章、第十四章），李继东（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华南师范大学，第十一章），孙红旗（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第十二章），杨军（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湖北三峡学院，第十三章），史纪合（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河北师范大学，第十五章），李大伟（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第十六章），陈晓红（湘潭大学，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殖民主义史》项目负责人

郑家馨

# 目 录

前 言	(1)
<b>第一章 殖民主义在非洲(1415—1870)</b>	(1)
第一节 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运行轨迹	(3)
第二节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非洲殖民主义	(5)
一、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	(5)
二、本时期非洲殖民主义的特点	(9)
第三节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非洲殖民主义	(13)
一、本时期非洲殖民主义形式的多样性	(13)
二、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一型	(18)
三、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二型	(23)
四、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三型	(26)
五、本时期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在非洲的 体现	(30)
<b>第二章 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80)</b>	(34)
第一节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非洲殖民 主义	(34)
一、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争论	(34)
二、“瓜分非洲”如何提到日程	(37)
三、“最后大陆”提供的殖民主义新权益	(39)
四、瓜分非洲的结果	(51)
五、垄断资本主义与非洲	(54)
六、对殖民地主权的剥夺——间接统治和直接 统治	(62)

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殖民主义·····	(70)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非洲殖民主义·····	(77)
一、宗主国在非洲殖民地经济活动的新特点·····	(77)
二、殖民主义的撤退——合力的总结果·····	(92)
三、殖民主义撤退中的诸种手法·····	(107)
四、殖民主义撤退后留下的祸患·····	(114)
第三节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在非洲的体现·····	(121)
一、关于殖民主义在非洲功过评价的争论·····	(121)
二、殖民政权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123)
三、“破坏性使命”在热带非洲完成的限度·····	(124)
四、关于“建设性使命”在热带非洲完成的情况·····	(127)
<b>第三章 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早期殖民活动·····</b>	<b>(134)</b>
第一节 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崛起·····	(134)
一、黄金的驱动·····	(134)
二、葡萄牙人得风气之先·····	(137)
第二节 近代殖民主义的第一幕——葡萄牙人占领休达·····	(139)
第三节 葡萄牙人沿大西洋岸南下的殖民探险·····	(141)
一、殖民探险目标的转换与扩大·····	(141)
二、殖民探险与商业性经营·····	(151)
第四节 葡人在非洲建立殖民——贸易制度的试验·····	(155)
一、黑奴贸易的始作俑者·····	(155)

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端 .....	(157)
<b>第五节 葡占东非——葡萄牙“贸易帝国”的</b>	
<b>中途站</b> .....	(164)
一、印度洋西岸的贸易霸权 .....	(164)
二、莫桑比克的殖民开拓 .....	(168)
三、普拉佐制的失败 .....	(172)
<b>第四章 大西洋奴隶贸易和非洲</b> .....	(177)
<b>第一节 荷兰人执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牛耳</b> .....	(177)
一、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 .....	(177)
二、荷兰人成功开拓奴隶种植园 .....	(179)
<b>第二节 英国奴隶贸易的勃兴</b> .....	(181)
一、欧洲对原糖的需求刺激了奴隶贸易 .....	(181)
二、英国成立独占性贩奴公司 .....	(184)
<b>第三节 英国把奴隶贸易纳入殖民主义体系</b> .....	(185)
一、“三角贸易”使非洲变成猎获黑人的	
商业性饲养场 .....	(185)
二、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殖民霸权 .....	(188)
三、从政府行为到向私商开放 .....	(189)
<b>第四节 大西洋奴隶贸易给 18 世纪热带非洲</b>	
<b>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记</b> .....	(192)
一、为什么奴隶贸易没有迅速导致大规模	
殖民占领 .....	(192)
二、“代理人制度”及其种下的恶果 .....	(194)
<b>第五节 奴隶贸易对 16—19 世纪非洲的影响</b> .....	(201)
一、对几种“理论”的辩驳 .....	(201)
二、非洲人经济、政治和心理方面所受的	
影响 .....	(202)
<b>第五章 南非开普(好望角)殖民地——非洲殖民地的</b>	

<b>一个特例</b> .....	(208)
<b>第一节 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殖民机构</b> .....	(208)
一、两洋航线的中继站 .....	(208)
二、殖民权力的强化——矛盾尖锐化的 结果 .....	(211)
<b>第二节 荷兰殖民者对科伊人牧业经济的摧残</b> .....	(214)
一、科伊人性畜对两洋航线的贡献 .....	(214)
二、市场掠夺与“掠牲战争”双管齐下 .....	(215)
<b>第三节 开普殖民地扩张原因的新解释和         科伊桑人的灭绝</b> .....	(217)
一、一种现象引起的思考 .....	(217)
二、奇怪的“蝴蝶效应” .....	(218)
三、布尔殖民者的粗放型经济结构 .....	(220)
四、布尔人殖民经济与当地非洲人经济的 对立 .....	(223)
五、科伊人部落结构的消失 .....	(224)
六、桑人在非洲被灭绝 .....	(225)
七、科萨黑人未被布尔人“殖民化”的原因 分析 .....	(228)
<b>第四节 南非殖民政权的更迭和英国殖民者侵吞         科萨人土地</b> .....	(230)
一、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 .....	(230)
二、科萨人遭遇资本主义的新对手 .....	(233)
<b>第五节 英国的殖民改革和殖民土地制度</b> .....	(236)
一、文明改革的背后 .....	(236)
二、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三型在南非是如何 实现的 .....	(238)
三、南非土著保留地制度的滥觞 .....	(240)

第六节 布尔人的殖民远征和布尔共和国	
的建立·····	(242)
一、布尔殖民者不满的实质·····	(242)
二、侵占土地战争的残酷性·····	(244)
第七节 英国殖民土地政策与布尔人殖民土地	
政策的比较·····	(248)
<b>第六章 禁止奴隶贸易与英法在非洲的殖民活动·····</b>	<b>(255)</b>
第一节 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	(256)
一、关于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关系的几种	
观点·····	(256)
二、禁止奴隶贸易和废奴的原因·····	(258)
第二节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建立·····	(261)
一、塞拉利昂殖民地的建立·····	(261)
二、美国废奴运动与利比里亚的建立·····	(265)
第三节 合法贸易的扩大·····	(268)
一、合法贸易与奴隶贸易的关系·····	(268)
二、向非洲输入火器·····	(276)
第四节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279)
一、塞内冈比亚地区·····	(279)
二、阿散蒂地区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	(281)
三、东非沿海和岛屿地区·····	(285)
第五节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288)
一、几内亚湾与塞内加尔沿海内陆地区·····	(288)
二、东非和马达加斯加岛·····	(292)
<b>第七章 法国建立马格里布(北非)殖民地·····</b>	<b>(296)</b>
第一节 法国殖民征服战争的残酷性·····	(297)
一、对阿尔及尔的占领·····	(297)
二、血腥的征服过程·····	(299)

第二节	移民活动和殖民土地政策·····	(301)
一、	移民与土地掠夺同时并举·····	(301)
二、	移民势头不减的原因分析·····	(303)
三、	掠夺性和“个体化”的土地政策·····	(306)
第三节	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	(307)
一、	殖民占领下社会结构的变动·····	(307)
二、	非洲大陆最系统的殖民统治制度·····	(310)
第四节	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殖民渗透·····	(312)
一、	对突尼斯的殖民占领·····	(312)
二、	在摩洛哥角逐中法国占了上风·····	(314)
<b>第八章</b>	<b>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力量对埃及“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和埃及殖民化·····</b>	<b>(318)</b>
第一节	拿破仑入侵埃及·····	(319)
一、	法、英争夺中东殖民霸权·····	(319)
二、	殖民使命的扭曲·····	(323)
第二节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列强干预下的失败·····	(325)
一、	在殖民渗透下的改革·····	(325)
二、	殖民干预导致改革失败·····	(327)
第三节	阿巴斯和赛义德时期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330)
一、	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330)
二、	苏伊士运河与殖民羁轭·····	(331)
第四节	伊斯梅尔和杜菲克时期埃及的殖民地化·····	(335)
一、	欧洲金融资本的控制·····	(335)
二、	英国的军事占领·····	(338)



第五节	一战后埃及对殖民化的反抗与英国的政策·····	(341)
一、	埃及人民反抗“殖民化”·····	(341)
二、	英国的干涉主义政策·····	(344)
第六节	非殖民化和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	(346)
<b>第九章</b>	<b>柏林会议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b>	<b>(348)</b>
第一节	柏林会议的召开及其作用·····	(349)
一、	柏林会议召开的背景·····	(349)
二、	柏林会议实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351)
三、	柏林会议对瓜分非洲起什么作用·····	(353)
第二节	围绕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问题的争论·····	(355)
第三节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和“绥靖”·····	(365)
一、	瓜分的三种形式·····	(365)
二、	北部非洲：埃及、苏丹和马格里布·····	(367)
三、	东部非洲：东赤道非洲、非洲之角和 马达加斯加岛·····	(370)
四、	南部非洲：南纬10度以南的非洲大陆·····	(372)
五、	西部非洲·····	(376)
六、	中部非洲·····	(379)
<b>第十章</b>	<b>南部非洲的殖民化和种族主义统治?·····</b>	<b>(383)</b>
第一节	现实和潜在的原料资源在殖民扩张中的作用·····	(384)
一、	奇迹的发生——金矿的发现·····	(384)
二、	兰德金矿改写了南非的历史·····	(385)
第二节	争夺南非殖民权益的英布战争·····	(387)
一、	布尔人的殖民者身份·····	(387)
二、	英国对南非政策的嬗变·····	(393)
第三节	殖民主义开始以种族主义为活动的主要	

形式·····	(398)
一、种族主义政策成为英、布妥协的基础·····	(398)
二、以种族主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	(402)
第四节 逆历史潮流的新殖民主义计划·····	(411)
一、“黑人家园计划”·····	(411)
二、“星座计划”·····	(413)
第五节 白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南非经济地位的 变化·····	(414)
一、南非白人移民的特殊性质·····	(414)
二、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变化·····	(415)
第六节 国内外形势迫使南非白人废除 种族隔离制度·····	(418)
<b>第十一章 间接统治制度的演变和英属殖民地经济的     殖民化·····</b>	<b>(422)</b>
第一节 间接统治制度的建立和推广·····	(422)
一、间接统治制度实施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422)
二、间接统治内容和体系·····	(424)
三、间接统治制度的推广和调整·····	(426)
四、间接统治制度实施的后果和影响·····	(428)
第二节 英属西非殖民经济政策·····	(429)
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	(429)
二、保留原有土地制度·····	(430)
三、推广单一种植制·····	(431)
第三节 英属西非依附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影响·····	(434)
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434)
二、依附性的加强·····	(441)
第四节 英属殖民地的白人移民经济·····	(444)
一、殖民政策与白人种植园经济的形成·····	(444)

二、英属殖民地白人种植园经济概貌 .....	(449)
三、白人种植园经济的历史影响 .....	(452)
第五节 “宪政改革”和民族自治运动的兴起? .....	(455)
<b>第十二章 法属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b>	
<b>演变</b> .....	(462)
第一节 法国的“治理圈”和直接统治制度 .....	(465)
一、对传统酋长的处理 .....	(465)
二、法国统治策略的微调 .....	(472)
第二节 “联合”政策的演变:突尼斯、摩洛哥	
保护国制 .....	(475)
一、突尼斯的保护国制 .....	(475)
二、总督对摩洛哥素丹的控制 .....	(477)
第三节 法属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变化 .....	(479)
一、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经济活动 .....	(479)
二、对殖民地工业的严酷扼制 .....	(489)
三、法属殖民地的社会变化 .....	(492)
第四节 法属殖民地的同化政策与民族运动 .....	(494)
一、法兰西的同化政策 .....	(494)
二、同化政策、精英阶层与民族运动 .....	(498)
第五节 法属非洲的土著兵制度 .....	(501)
一、土著兵制度发展的三阶段 .....	(501)
二、土著兵制度对法兰西帝国的作用 .....	(507)
<b>第十三章 建立于强迫劳动制之上的葡属非洲殖</b>	
<b>民地</b> .....	(509)
第一节 殖民地基本经济政策及特点 .....	(510)
一、殖民地基本经济政策:强迫劳动制 .....	(510)
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征及状况 .....	(515)
第二节 殖民政治统治及特点 .....	(518)

一、控制严密、统治强化·····	(518)
二、拉拢土著上层人物·····	(520)
第三节 “有选择的”同化政策·····	(522)
一、荒谬的“文明人”与“非文明人”的划分·····	(522)
二、同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524)
第四节 对殖民地民族独立风暴的防范措施·····	(527)
一、葡萄牙延续殖民统治寿命的伎俩·····	(527)
二、最后撤退的“最早殖民者”·····	(529)
<b>第十四章 比属殖民地的演变·····</b>	<b>(531)</b>
第一节 刚果自由邦和“利奥波德制度”·····	(531)
一、殖民主义史上别具一格的“刚果自由邦”·····	(531)
二、直接榨取制和租让制·····	(534)
三、“利奥波德制度”的曝光·····	(535)
第二节 比属刚果的改革和比利时对卢旺达—乌隆迪的统治·····	(537)
一、《殖民地宪章》·····	(537)
二、路易·弗朗克的改革·····	(540)
三、比利时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统治·····	(542)
第三节 比属刚果的经济“开发”和“殖民福利制度”·····	(544)
一、在国家、公司、教会三结合政权下的“开发”·····	(544)
二、三结合“开发”的成果·····	(549)
第四节 “绿洲”中滞后了的民族运动·····	(552)
一、“开化人”和良民证·····	(552)
二、“家长式”统治的崩溃·····	(556)
<b>第十五章 仿效“罗马帝国”的意属非洲殖民体系·····</b>	<b>(560)</b>

第一节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560)
第二节	意大利殖民政策演变史的标本—— 意属索马里·····	(563)
一、	“大国形象”与殖民占领·····	(563)
二、	“务实的”殖民政策·····	(564)
第三节	在埃塞俄比亚营建意属非洲殖民帝国·····	(567)
一、	殖民活动一波三折·····	(567)
二、	耗资大收益小的殖民地·····	(570)
第四节	意大利的殖民样板——利比亚·····	(572)
一、	瓜分留下的残羹·····	(572)
二、	“第四海岸”的开发·····	(574)
<b>第十六章</b>	<b>德国和英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b>	<b>(577)</b>
第一节	德国对坦噶尼喀的军事征服·····	(578)
一、	德英在东非的殖民争夺·····	(578)
二、	普鲁士精神在殖民征服中的体现·····	(581)
第二节	德国殖民统治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	(585)
一、	阿基达制和莱瓦利制·····	(585)
二、	德国人的大规模开拓·····	(589)
第三节	英国“间接统治”在坦噶尼喀的建立·····	(593)
一、	卢加德衣钵在东非的体现·····	(593)
二、	卡梅伦对卢加德理论的发展·····	(597)
第四节	殖民统治对坦噶尼喀社会的影响·····	(601)
一、	德、英殖民统治的不同影响·····	(601)
二、	深刻的社会变化·····	(607)
<b>第十七章</b>	<b>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非洲</b>	
殖民地	的变化·····	(611)
第一节	非洲在战争中的作用·····	(612)
一、	在北非战场的作用·····	(612)

二、非洲兵源优势 .....	(613)
第二节 战争对非洲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	(616)
一、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原因 .....	(616)
二、子虚乌有的“战时工业化” .....	(619)
三、战时经济的深刻变化 .....	(622)
第三节 殖民制度的调整 .....	(623)
一、英国对殖民政策的调整 .....	(623)
二、法国对殖民制度的改革 .....	(627)
三、英法两国政策调整的比较 .....	(631)
第十八章 殖民主义从非洲的撤退 .....	(634)
第一节 战后 20 年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的 变化 .....	(634)
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	(634)
二、新因素促进了殖民主义格局的变化 .....	(639)
第二节 “托管”的新伎俩和“托管地”的独立 .....	(643)
一、托管制是委任统治制度的翻版 .....	(643)
二、从托管到独立——不依殖民主义意志为 转移 .....	(646)
第三节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宪政改革和“政治 撤退” .....	(649)
一、英属西非的宪政改革 .....	(649)
二、在中非、东非玩弄的手法 .....	(653)
三、英国加速“政治撤退” .....	(657)
第四节 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政策——从 《根本法》实施到“共同体”建立 .....	(661)
一、殖民主义思维的惯性作用 .....	(661)
二、《根本法》是“同化”与“联合”的折衷 产物 .....	(663)

三、“共同体”能保住法兰西帝国吗? .....	(666)
第五节 比属和葡属殖民地的风暴 .....	(671)
一、“安全绿洲”起风暴 .....	(671)
二、武装斗争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撤退 .....	(675)
第六节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统治的 终结.....	(680)
一、委任统治掩盖下的殖民扩张 .....	(680)
二、撤退的最后一幕 .....	(682)
<b>西文主要参考书目 .....</b>	<b>(686)</b>

## 第一章 殖民主义在非洲 (1415—1870)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sup>①</sup> 卢森堡这一论断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她所说的其他经济形态有国内的和国外的，而国外的经济形态主要指殖民地。根据对世界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离不开殖民主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完全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孪生物。因为实际上最早期的殖民活动(包括 1415 年葡萄牙人占领北非休达城和 15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沿西北非和西非海岸南下寻找黄金产地的航行)，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同样，上面说法也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将伴随着资本主义走完其最后一段历史行程，同进墓穴。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实际上也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跑过其大半历史路程。

殖民制度虽然古已有之，但资本主义的殖民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殖民制度。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殖民剥削方式和殖民扩张范围上，更重要的在于殖民制度的作用和殖民地的性质上。

正如卢森堡所说，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资本主义如果

---

<sup>①</sup>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95 年，第 376 页。



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特性使它形成了世界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宗主国构成了“中心”,而由它所开发、扩张或滋生的场所,也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构成了“外围”。这种中心—外围的结构不仅仅是军事征服(超经济强制所需要的)的结果。它们之间自始至终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首先是由国际性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有简要的提示,<sup>①</sup>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国际的性质”,<sup>②</sup>并将生产的“国际关系”<sup>③</sup>分为一类是一级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类是“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sup>④</sup>殖民主义本身就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种体现,然而受世界资本主义诸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它具有很强的超经济强制的机制,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原生的”到“派生的”转移,对中心—外围结构的构成和维持都起过极重要的作用。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最后阶段之前,在“外围”的社会基本结构还不完全适应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任务之前,殖民主义的作用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取代的。同样道理,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如信息文明时代)，“外围”的社会基本结构已适应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任务,直接的政治统治(超经济强制)对于维持和发展各种殖民主义榨取方式已经没有必要了;而且资本主义列强间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允许采取“重商主义式”地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势力范围实行垄断性的榨取;特别是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已

---

① 在《资本论》研究中,马克思舍弃掉了“生产的国际关系”。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③④ 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47页。

经发展到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倘若继续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统治就将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宗主国(中心)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利益时,殖民主义的丧钟就将敲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世界资本主义在其最后阶段有可能放弃直接的政治统治,从殖民地逐渐撤退,继续通过世界市场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和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多种方式榨取广大的“外围”国家和地区,而不损害其基本的经济利益。这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变化和国际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巨变,决定了殖民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早地走完它的历史过程,结束其“暂时的历史必然性”,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 第一节 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运行轨迹

近代殖民主义在五百多年历史中在非洲大陆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最早窜入非洲大陆(1415年),几乎最晚退出这块大陆。然而在15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四百多年时间中,殖民列强除了占据非洲沿岸据点和个别地区(南非)外,没有在非洲大陆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sup>①</sup>在这期间,是以奴隶贸易作为殖民活动的主要形式直至1807年,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运了至少1600万黑奴到美洲,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奴隶贩子。从1876年起殖民列强又将眼光专注于非洲,在36年(1876—1912)间完全瓜分了这块“最后大陆”的二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建立了面积从200万平方公里至1000万平方公里的六个大殖民帝国(英属、法属、德属、意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帝国),无论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在殖民主义史都是空前的。殖民主义在非洲前四百年以掠夺人口为主,只占领318万平方公里领土,后一百年则以掠夺领土

---

<sup>①</sup> 至1876年,只占领非洲大陆(3020万平方公里)10.6%面积。

和资源为主,占领了 2569 万平方公里领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不协调的对比?从研究中,我们发现,非洲这块曾以尼罗河文明而闻名于人类文明史的大陆,它的人民在资本主义西欧孕育和发展成熟以后,就一直在强迫性的国际分工中充当生产初级产品的劳动力,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成长供应乳汁和血液。在几百年中,一千六百万以上的黑人劳动力不是在非洲本土进行生产劳动,而是当作一种“人类血肉”商品<sup>①</sup> 贩运到大西洋彼岸,在美洲当作奴隶劳动力进行生产,因而它并没有在被挖走劳动力的非洲地区引起即使是从属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主义使非洲遭受的损失比任何一洲都要严重。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殖民主义史上有四百多年时间,非洲大陆(除南非开普殖民地一小块地区)既没有成为垦殖型殖民地,也没有成为大规模的榨取型殖民地或商业型殖民地,只是到了 19 世纪末当“所有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的时候,非洲才被六个殖民主义列强国家在 36 年时间内瓜分净尽。从此,非洲大陆 56 个国家和地区,除埃塞俄比亚(面积 122 万平方公里)和利比里亚(面积为 11 万平方公里)沦为半殖民地外,都成为受殖民主义列强直接政治统治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把非洲拖入战争泥潭,非洲不仅成为帝国主义两大集团在海外殖民地作战的主要战场,而且成为人力资源和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地。非洲所提供的人力物资是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瓜分后初期,欧洲的一些财团不愿为表面上显得贫瘠的非洲更多地投资,大战使非洲的重要性突显出来。1920—1945 年殖民主义列强极度加强对非洲的统治和掠夺,卢加德创立的“间接统治制度”就是在此时广泛推广到英属殖民地。世界殖民主义似乎要从对非洲的依赖中获得重生。由于在欧洲战场频频失败,同盟国越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12 卷,第 545 页。

来越依靠非洲大陆提供的资源和人力,特别是非洲人对战争的支持。宗主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一般均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约束。非洲各殖民地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国殖民制度均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世界市场的商品、投资和金融方面的有效控制,使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殖民地可以在放弃政治统治条件下,采取一种崭新的经济剥削和掠夺的方式。殖民主义已经滑行到了轨道的尽头了。

为什么在非洲殖民主义的不同阶段上会出现这些特别现象?这只有紧密联系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不同的新需要、非洲大陆本身的特殊地理环境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 第二节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 非洲殖民主义

### 一、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

16—18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除了它在美洲和亚洲所表现的共同性以外,还有一些特殊性。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除了北部非洲基本上属于奥斯曼帝国范围,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暂时还进不去;除南非南部沿海地区的地中海型气候适合欧洲移民居住以外,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带非洲,由于19世纪以前的科学技术尚未能提供有效的医药卫生和交通手段,连探险队都无法进入离沿海地带稍远的内陆地区,而非洲沿岸地区的湿热气候和疟疾肆虐,成了“白人坟墓”。因此尽管在新大陆发现以前,葡萄牙人已沿西非沿岸南下到安哥拉地区(南纬21°)并知道刚果和安哥拉内陆有辽阔的腹地,却并没有把15世

纪末已在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岛上试验成功的奴隶制甘蔗种植园，推行到非洲大陆。简言之，当时热带非洲不具有开拓为榨取型殖民地的价值。其次，奴隶贸易价值取代了黄金。在西非沿海搜寻奴隶约半个世纪以后，1492年新大陆被发现了，西班牙占领了美洲广大领土，葡萄牙也占据了巴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sup>①</sup>只有美洲有一些天然的黄金矿，然而产量很少。<sup>②</sup>16世纪上半叶，驻扎在荷兰的西班牙军队要求以黄金发饷并以强力手段达到了要求。当时西班牙从新大陆获得的黄金不足以满足荷兰驻军的需求，只好用新大陆的白银通过意大利北部的银行，换取主要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内陆的黄金。而葡萄牙人此时经过一百年对西非沿岸黄金产地的搜寻，已经放弃了占据想像中的西非大金矿的计划，而满足于小批量的金沙交易。葡人将生财之道转向非洲的奴隶贸易。然而，欧洲和大西洋诸岛对黑奴的需求量不大。15世纪和16世纪从非洲大陆运走的奴隶仅90万人（包括输往欧洲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巨大需求，大规模奴隶贸易就发展不起来。

可见，原始积累时期非洲殖民主义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早在中世纪时期，欧洲资本主义产业萌芽就逐渐发展起来，但一直是“蜗牛爬行式的进度”。到了16世纪，首先是殖民制度“像温室般地，助长封建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并缩短其中的推移”。<sup>③</sup>其中，16—17世纪由于美洲新大陆殖民地的商业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

---

①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4页。

② 哥伦布及早期西班牙殖民者所获取的黄金更多的是从印第安人手中抢来的，而只有少量是从金矿中开采的。

③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卷，第49页。

一切都离不开对非洲的殖民掠夺。

黄金梦是促使哥伦布一行首批到达美洲的殖民者的“第一推动力”。16世纪初,西班牙人从美洲获得的巨额黄金、白银,主要是掠夺印第安人几千年积累的金银财富。自然金银矿的开采需要大批劳动力。经过短期的贵金属矿的开采,大批死于矿坑的印第安人已证明,光靠土著居民不可能为金银矿的长期大规模开采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在整个16世纪,除了金银外美洲殖民地给于欧洲的产品很少,运往西班牙的美洲产品不过是瓦哈卡出产的洋红颜料和圣萨尔瓦多的靛蓝之类。而当时欧洲产品(主要是西班牙产品)输往美洲,较有市场的也只是葡萄酒、橄榄油等。美洲的移民人口很少,到1600年,西班牙人仅25万人,葡萄牙人仅3万人,<sup>①</sup>稀少的人口对欧洲产品没有大的需求。如果美洲新大陆在金银窖藏被洗劫一空之后,继续处于劳动力极端耗竭的状态,那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前往美洲的欧洲白人移民不但不会增加,原有的移民还会倒流回到欧洲,美洲大陆在以后几个世纪将会成为空旷、荒凉的大陆,美国将会“从世界地图上抹去”,<sup>②</sup>新大陆将彻底衰落。

转机发生在16、17世纪之交,英国和法国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走了加勒比海诸岛。他们建立的白人殖民地因劳动力匮乏,经济上处于破产境地。此时,葡萄牙人在非洲的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上首创的使用黑人奴隶劳动力的甘蔗种植园模式,从经济上挽救了美洲。首先由荷兰人从他们占领的巴西沿海地区,学习到葡萄牙人从非洲移植到巴西的黑奴制甘蔗种植园生产方式,接着荷兰人将它推广到加勒比海荷属殖民地。面临破产困境的英国人和

---

① 麦克伊韦迪:《世界人口地图集》,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331页。

②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4页。

法国人如获至宝,从荷兰人手中引进了奴隶制种植园。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数量直线上升:16世纪不足90万人,17世纪增至275万人,18世纪上升为700万人。<sup>①</sup>有了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奴隶种植园便在加勒比海诸岛、巴西、美国南部各洲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同时,开采金、银的矿山也引进了黑人奴隶制。黑奴为美洲提供了大量“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贵金属、热带产品的品种和产量成十倍地增长。每年由美洲运往欧洲的主要由黑人劳动力生产的白银有50万磅,黄金1万磅。<sup>②</sup>蔗糖、棉花、烟叶、咖啡、木材等黑奴种植园生产的热带产品大量运往欧洲。1789年仅一个拥有45万名黑奴的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即海地)运往欧洲的产品总值,就相当于拥有1450万人口的西班牙美洲帝国运往欧洲产品的总值。<sup>③</sup>可见非洲奴隶种植园商品生产率之高。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黑奴和白人种植园主及其家属所消费的纺织品、谷物、罗姆(Rum)酒、生活用品乃至种植园的机器(榨蔗机等)几乎全部需要由欧洲手工工场和传统作坊供应。西欧诸国几百艘远洋帆船为运送这些货物穿梭往来于大西洋。以非洲黑人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的美洲种植园、矿山所生产的热带产品和贵金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使美洲殖民地有了价值,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产品以及它们所换回的欧洲产品,造成了人类史上迄今未有的世界贸易。众所周知,正是世界贸易为19世纪的大机器工业创立了不可少的条件。换句话说,因非洲黑人奴隶制而获得价值的美洲殖民地使西欧的“中心”区的工业资本萌芽获得了三个不可少的经济要素:一、货币资本,二、最廉价的、终生使用的劳动

---

① 据柯廷研究,16—19世纪到达美洲的非洲黑人奴隶仅9298000人。参阅Curtin, p.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大西洋奴隶贸易》), Wisconsin, 1975。

②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上册,第139页。

③ Bethell, 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剑桥拉丁美洲史》), 1984, vol. 1, p. 426。

力,三、欧洲生产的出口工业品的原料(甘蔗、棉花、烟叶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表明,虽然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早在14—15世纪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陷入了困境,发展不起来,因为地中海周围世界未能给资本主义提供不断扩展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5世纪末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虽拥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但要使它成为具有价值的殖民地和形成世界性的贸易,在资本主义尚不具备机器生产力以前,必须有大批廉价的、稳定的、异地输入的奴隶劳动力。16—18世纪只有热带非洲的社会条件、人口素质和早期殖民开发,能够提供赤裸裸的奴隶制下的劳动力。

## 二、本时期非洲殖民主义的特点

于是,16—18世纪的非洲殖民主义形成如下特点:第一,热带非洲的殖民主义是以贩卖奴隶作为活动的主要形式,这一主流形式反倒掩盖了1652年开始的欧洲白人移民在南非开普殖民地开辟的垦殖型和放牧型的殖民活动。后者在北美洲是主流形式而在非洲成了非主流形式。第二,殖民主义具有最明显的跨洲性质、“生产的国际关系”性质,即资本主义在西欧“中心”区(英、法、荷等国)属于一级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外围”的美洲和非洲所建立的“西印度公司”(荷兰,1624年)、“皇家开发非洲公司”(英国,1660年)、“皇家非洲公司”(英国,1672年)、“法属西印度公司”(法国,1664年),则属于第二级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从事商业性黑人掠夺;而在美洲建立的数以千计的种植园和矿山则属于第三级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

这种类型种植园有三种不同寻常的特点。其一,它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商品性的种植园经济,<sup>①</sup>欧洲资本家把自己的经济

---

<sup>①</sup>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39—340页。



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其二，受殖民主义奴役的上千万黑人不是在非洲本土，而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从事商品性生产。这种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第三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对美洲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然而，对劳动力的来源地——非洲，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非洲上千万青壮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几乎全部被美洲种植园主攫取，甚至作为税收（包括出口税）的那一部分也被美洲所吸收。这些资本的积累丝毫未回归非洲。废除奴隶制后，非洲奴隶及其后裔作为自由无产阶级，被编入了美洲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内，与非洲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也无关。其三，一般种植园和农场的雇工的工资（可变资本）在本地消费的部分形成了一定的购买力，而欧洲奴隶商几个世纪在非洲沿岸付出的一次性购买上千万奴隶的款项也没有为非洲“积累资本”。因为第一，欧洲奴隶商在非洲沿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带去的货物一部分是消费品如玻璃饰品、铜项练、铜手镯、粗劣纺织品、罗姆酒以及一些高档奢侈品，这些货物在非洲内地迅速被消耗掉；第二，用枪和弹药来换取奴隶，一支枪换一个奴隶，仅英国伯明翰每年输入非洲的枪达 15 万支。枪支主要用来猎捕其他部落人卖为奴隶。这些用非洲的“血肉”换来各色货物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消耗在热带丛林中。

在非洲内陆许多地区，战俘、劫掠其他部落的人口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因此，部落酋长、土王可以以邻为壑，获取奴隶，而不使本部落、本国受损害。他们往往同欧洲的奴隶商结盟。而进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在本阶段甚至无须运用殖民政策同非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斗争。

由此可见，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掠夺——一种“人类血肉”的掠夺，比起其他各洲更具有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如此看来，这一时期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作用是否具有二重性？我们认为，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

析。15—18世纪,殖民主义在热带非洲是把上千万非洲人作为奴隶贩卖到美洲作为其主要活动形式。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其初级阶段就出现了“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sup>①</sup>这种依存状况。这里出现的不是用欧洲先进的生产方式去“破坏”非洲的和美洲的落后的社会结构,而是从外部引进更落后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和贩卖奴隶的贸易形式,这是历史的倒退。使用大量奴隶去生产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采取的是一种摧残人类劳动力的最野蛮的制度。大西洋奴隶制种植园因拥有了大量的廉价的非洲黑人奴隶,商业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可以不必顾及劳动力的恢复,即不必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他们采用一种利润率最高、“最有效果的”经济方法,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有形动产”(chattel)上榨取最大量的劳力,直至青壮年黑奴衰竭而死。加勒比海种植园“每隔20年就死光一整批共有5万人的健壮奴隶”。

有的历史学家强调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破坏、移植、重建是同步进行的,因为他们是为了增殖资本,而不是为了单纯去占领被破坏的废墟。但是,正由于大西洋奴隶贸易对于热带非洲人是一种“强迫性移民”。所以欧洲奴隶商全神贯注的是如何在非洲哪一个口岸能够一次就购足装满一船(一般为几百人)的廉价奴隶。至于该口岸对应的腹地因残酷的猎奴战争而毁为废墟,对于欧洲奴隶商来说,只是下一趟奴隶船来非洲时换一个口岸而已。而对于非洲内地遭受奴隶贩子劫掠的村社和部落来说,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并不表现为“社会的结构性破坏”或破坏后的重建,而是庐舍为墟,村庄及其人口的毁灭性的消失。至于对当时非洲内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持久性影响是,由于奴隶数量的骤增特别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

是供应过剩,西非一些地区“再版”了当地早已衰朽的奴隶制;而在19世纪的东非,则刺激了当地种植丁香的奴隶种植园繁盛一时,成为美洲奴隶制种植园遥远的回响。<sup>①</sup>

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来看,殖民主义在热带非洲的殖民活动,是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并不引起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可以说并无任何进步性可言。然而,它在南部非洲一隅开拓的开普殖民地,尽管也引进了奴隶制,却成为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航线上不可缺少的补给站,上千艘远洋帆船绕过好望角或经由好望角港口,来往于欧洲和亚洲。仅葡萄牙航船1498—1612年开往亚洲的就有806艘。荷兰船和英国船仅1621—1622年,1626—1627年四年,驶入亚洲的就有270艘和92艘。1700—1799年(缺1795年)欧洲商船经好望角港口驶入亚洲的约有9616艘。<sup>②</sup>这些欧洲商船在返程时将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大批货物运往欧洲。仅1635年一年中国生丝运往欧洲的就达6000担,价值48万两银。<sup>③</sup>1602—1657年运往荷兰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以上。<sup>④</sup>1637年一年运往荷兰的中国砂糖达110万磅。<sup>⑤</sup>印度输往欧洲的货物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织品。17、18世纪之交,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仅在孟加拉一地购货(主要是棉布)年均约91万英镑,约占孟加拉出口额的一半。这些经由好望角运往欧洲的商品对印度手工

---

① 参阅罗建国《近代非洲种植园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

②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1652—1836*, (《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1652—1836》), Stanford, 1957, p. 51.

③ 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④ 弗尔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1602—1682》,莱登,1954年版,第59页,转引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⑤ 曹永和:《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转引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业发展起了相当重要作用。<sup>①</sup> 以好望角为补给站的沟通亚欧的两洋航线,在 16—18 世纪对于突破世界的闭塞性,促使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卷入世界贸易,最终形成世界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 第三节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 非洲殖民主义

#### 一、本时期非洲殖民主义形式的多样性

16—18 世纪英国从美洲、印度等殖民地和奴隶贸易中吸取了巨额的货币资本,英国出口工业的商品已有 37%—44% 是依赖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市场。1769—1771 年英国出口总额 13 394 000 英镑中,有 5 932 000 英镑即 44% 是输往上述地区即外围地区的。<sup>②</sup> 这是英国的货币资本能迅速转化为产业资本并使英国成为“资本的母国”的重要因素。英国首先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对外围地区的依赖更加强,产业资本要求曾为商业资本服务的国际分工必须改造成为产业资本服务的国际分工,即外围地区成为农业区,中心地区成为工业区,前者要成为后者的原料、食品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只有这样,工业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和发展。

在世界资本主义新时代,非洲大陆能否适应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 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进入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有不同的需求,而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只能适应不同的需求。这种状况造成本时期非洲大陆殖民主义形式的多样性。

---

① 安东诺娃等:《印度近代史》,三联,1978年,上册,第69页。

② 贺力平:《英国历史上出口增长对其经济起飞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1988年第1期。

西部非洲曾是英国向美洲运送几百万非洲黑人奴隶的地区，英国的利物浦、布列斯托尔等港口城市完全是靠奴隶贸易繁荣兴旺起来。然而资本主义新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使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种植园逐渐衰落，蔗糖成本增加，糖价上涨。到18世纪末，英国已在世界贸易占有极大优势，可以轻而易举进入美洲和亚洲许多市场，英商既可以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出售其工业产品和一些食品，例如它计划向全世界提供服装，向全世界的茶和咖啡提供白糖；又有可能以比英属西印度群岛低得多的价格买到糖浆、棉花和工厂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原料。英国工厂主要把生产工业品的成本降到最低程度，然而在重商主义的垄断制下，英国不仅只能购买英属西印度昂贵的蔗糖，而且还须为维持西印度的奴隶种植园付出巨额补贴。西印度的浪费性经济的生产提高了英国一些工业品的成本并造成不利的竞争条件。英国越来越强烈感到它需要放弃西印度的浪费性经济的生产，改变重商主义的垄断方针，扶植和实行自由贸易。为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和北美十三州提供廉价劳动力的非洲奴隶贸易，对英国来说，已成为完全不必要的了（特别是1783年美国独立后）。英国便把禁止奴隶贸易，摧毁西印度奴隶制作为摧毁西印度垄断制实行自由贸易的第一步。

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法案。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政府禁止英商并以军舰巡逻阻止他国奴隶船从西非运出奴隶。英国力图以适合制造肥皂、润滑油的棕榈油的贸易来代替奴隶贸易。然而，棕榈油贸易只限于西非沿岸地区，而奴隶来源地却全在内陆。内陆地区一直隐藏在沿海奴隶贸易的屏障后面，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仍是欧洲人进不去或有去无回的完全不了解的地区。1805年殖民部派蒙戈·帕克率39人探险队从冈比亚河口进入内陆，调查研究内地除奴隶外，还能向欧洲提供什么商品，英国与尼日尔河流域居民发展贸易的可能性。探险队在尼日尔河上的巴马科附近患热病死30人，后帕

克与幸存者 4 人又在险滩地区失踪,全军覆没。这次悲剧以及其后的多次探险悲剧揭示:在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到能够使欧洲人有效防治疟疾等热带病之前,广袤的非洲内陆地区既不适合欧洲人殖民,也不可能开发为欧洲工业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过去有一种流行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从 19 世纪初开始,英国便“力图控制(非洲大陆)大片领土及其居民”,<sup>①</sup>“保持廉价的非洲人力就地供应”,以便“进行有计划的殖民剥削”。<sup>②</sup>应当指出,这一论断并不完全符合 19 世纪上半叶的非洲实际状况。

要正确评价英国 19 世纪对非洲的政策,不能脱离当时英国的全球殖民政策和英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第一,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揭示了 19 世纪将是英国的霸权世纪。1800 年英国进出口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7%。<sup>③</sup>全世界商船有 1/3 以上悬挂英国旗,英国的注册商船多达 24 418 艘。英国海军拥有舰船 1 168 艘,其中战列舰 240 艘,远远超过世界任何一国的海军实力。第二,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政策追求的是战略利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首先是商业利益。英国的制成品出口额已占世界制成品出口贸易总额的 40%。英国工业对世界各国的依赖程度很大:进口贸易中原料约占 70%,食品占 30%。第三,1783 年美国独立后,印度成为英国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在 19 世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的移民殖民地一直被英国视为大英帝国的核心。由此,应当注意到在英国拥有军事和商业的“双重优势”的条件下,19 世纪的大部分年代,英国实际上执行的是“如果可能就以无形的控制进行贸易,必要时则以统治进行贸易”的两种形式的帝国政策:“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和“有形帝国”。

① ② 西克:《黑非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1 卷,下册,第 383—384 页。

③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 卷,第 61 页。

在西非,英国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进出口贸易很难扩大,被认为最有希望的出口产品——棕榈油,尽管欧洲需求量很大,但受沿岸地带狭小的限制,19世纪40年代对英出口值仅100万英镑,20年后,60年代增至150万英镑,仅分别占40年代和60年代英国年均进口总额8779万英镑和26094英镑的1.1%和0.57%,<sup>①</sup>在英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实在太小了。从战略地位来看,西非是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重点地区,英国的西非海军分遣队需要在几内亚湾建立若干海军据点,这是英国需要在原来贩奴口岸的殖民据点基础上建立联成一片的小块殖民地的原因之一。此外,英国要为缉捕的走私奴隶船上被释放的黑人奴隶找一块安置的地方。这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殖民地和类似的利比里亚殖民地建立的原因。<sup>②</sup>至于英国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今加纳)两块小殖民地的撤并问题上的反反复复、犹豫不决的态度,最足以说明本时期英国对热带非洲的殖民政策的真貌。这是两块人口不足4000人的小殖民地,其经济价值即商业税收却远抵不上行政开销(约2.4万英镑)和军事费用。国内几次主张尽量缩小殖民地规模或完全放弃,但英国商人则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护。1924年黄金海岸总督麦卡锡因肆行扩张而在与阿散蒂人作战中身亡,1828年英国决定从黄金海岸撤军撤点。后来英国政府出于多方面考虑,又于1843年恢复对黄金海岸堡垒的直接控制,1850年又另设一名总督驻蹕。此后,受到阿散蒂人多次袭击,英国陷于进退两难境地。1865年英国议会派出的调查委员会认为,英国在西非所承担的义务已大大超过英国商业利益所需要承担的程度,建议放弃除

---

① 根据英国历年外贸进口总额测算。进口数字见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4卷,下册,第346—347页。

② 弗里敦兼作英国海军基地。利比里亚则为美国释放黑奴的试验地。还可以提一下法国人在加蓬建立的利伯维尔,它未像前二者那样发展起来,因法国海军禁止奴隶贸易不甚有力。

塞拉利昂以外所有的西非殖民地。但帝国政府对这两块“鸡肋”，仍从非洲的殖民霸权考虑，予以加强。

直至 1854 年黄金海岸对英进出口贸易分别为 134 885 英镑和 71 253 英镑，冈比亚为 75 307 英镑和 28 002 英镑。当年整个西部非洲对英的进出口贸易分别为 1 238 113 英镑和 1 907 912 英镑，总计为 3 146 025 英镑，<sup>①</sup>仅占同年英国进出口总额 249 200 000 英镑的 1.2%。<sup>②</sup> 英国在西部非洲的商业利益很小而且进展颇慢。所以英国政府一直推行的是“无形帝国”的政策。然而，它打起的反对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卫道士的旗帜，却又使它多方对西非进行干预；而商人的贪得无厌和传教士的活动也促使它承担起更多的殖民责任；尤其是满脑子殖民主义扩张思想的英国领事们更依靠英国海军分遣队的威力来扩大英国的影响，例如，1851 和 1861 年领事们策划占领和吞并了拉各斯，不断扩大对尼日尔三角洲诸国的无形管辖权。因此，尽管本时期英国在西非没有占领较大的殖民领土，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它所建立的英国“至上权”（paramountcy）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敢于挑战的。在“至上权”的威力笼罩下，英国尽得西非自由贸易的一切利益。

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势力曾受挫于拿破仑战争的失败，但它并未撤退，只是敛迹多年而已。在法国的殖民生机复苏以后，它主要在非洲大陆两个地区集中使用其有限的力量：在阿尔及利亚显示法兰西帝国的伟大；在塞内加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塞内加尔这块后来为法兰西帝国出了大力的殖民地，法国在殖民主义方式上有两项“创新”，一项继承。其一是，1854—1865 年法国有计划地征服了塞内加尔谷地，在被征服的非洲人中推广单一种植制，大量种植花生成功，为法国提供一种宝贵的油料作物。其二是，法国

---

①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经济与帝国》), London, 1973, p.131.

②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 4 卷，下册，第 347 页。



以花生农场为前进基地，充分利用奎宁治疟疾的医学成果，沿塞内加尔河向内地推进，创造了后来欧洲殖民势力普遍采用的“领土推进”——“有效占领”的模式。这一模式证明比英国的“沿海地区渗透”模式更为有效，而被后起的殖民列强广为仿效。一项继承是，法国继承了葡萄牙人的土著雇佣军制度的衣钵，并有所创新。法国殖民者系统地、正规地训练受招募的塞内加尔黑人，组成“塞内加尔步兵”，成为后来法兰西帝国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

## 二、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一型

本时期非洲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控制方式：

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一型：

在西非上几内亚以外的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奴隶贸易实际上是禁而不止。本来非洲奴隶贸易就是非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如上所述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首先影响到英属西印度奴隶制经济的衰弱，从而导致西非几内亚地区的奴隶贸易逐渐呈下降趋势。然而，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园和古巴、巴西的奴隶种植园经济正方兴未艾。因为中心区的资本主义仍需要接种于奴隶制上的第三级的商业性的剥削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为工业资本提供廉价的原料（棉花等）。只要资本主义有这种需求，即尚需以奴隶制作为基础，非洲的奴隶贸易是不可能中止的。1810年前后，即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已颁布3—4年后，每年运抵美洲的奴隶人数却超过18世纪的最高额；又过了20年，1830年输入美洲的黑奴年均仍达到12.5万人。19世纪40年代奴隶贸易达到了最高峰，年均输入美洲高达13.5万名奴隶。安哥拉、莫桑比克、刚果、下几内亚沿岸和东非成为非洲输出奴隶最多的地区。1821—1822年不到一年时间从博尼、卡拉巴尔驶往美洲奴隶船达352艘，运出7万名奴隶。1823—1824年仅运到巴

西里约热内卢的,就有从非洲西海岸运出的 32 085 名非洲奴隶,从东非运出的 12 048 名非洲奴隶。<sup>①</sup> 尽管如此,1841 年英、奥、俄、普、法签订了“五国条约”,从形式上对奴隶贸易加以严格限制,但非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发展对奴隶劳动力的极大需求仍使非洲输出奴隶的数量在 19 世纪 40 年代达到了顶峰。据巴克斯顿统计,每年从东南海岸输出 1.5 万,安哥拉输出 2.9 万,从埃尔米纳以北地带输出 3 万,从贝宁湾和比夫拉湾输出 14 万,共 21.4 万非洲奴隶,加上阿拉伯商人输入 5 万,每年从非洲输出奴隶总数仍不少于 20 万人。<sup>②</sup> 这项数字统计可能偏高些,1844 年英国外相帕默斯顿断言每年仍有 12—16 万非洲人被运到美洲。关于运往美国的非洲奴隶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相距甚远,仅 19 世纪 50 年代就有三种不同统计:年均约为 0.6 万名、0.7 万名和 1.1 万名。美国民主党领袖斯蒂文·道格拉斯 1859 年 8 月 20 日在美国参议院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1858 年)输入的奴隶数目已达 15 000 入。<sup>③</sup> 大概可以肯定,1808—1860 年从非洲和古巴等地区转运到美国的非洲奴隶约在 30—50 万人之间。<sup>④</sup> 因为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可图的。美国向英国棉纺织业提供的廉价棉花逐年增加,1846 年为 401 949 393 磅,1860 年 1 125 890 608 磅,每年增加 12%。美国输英棉花数量大大超过英国殖民地印度

---

①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95—196 页。

② Buxt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its Remedy*(《非洲奴隶贸易及其补救办法》), London, 1967, pp. 59 - 70. 转引自阿勃拉莫娃前引书。

③ 马克思:《北美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51—352 页。

④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12—213 页。柯廷显然低估了这一时期输美黑奴数目,他认为 1808—1861 年仅 5.4 万名,见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大西洋奴隶贸易》), Madison, 1969。

1846年输英棉花。印度1846年和1860年输英棉花分别为34 540 143磅和204 141 168磅。<sup>①</sup>美国棉花种植园靠非洲黑奴劳动力生产出大批廉价棉花供应英国棉纺织工业,是曼彻斯特纺织业能够勃兴并雄踞世界首位几十年的重要因素。美国南部蓄奴州的棉花年产值与使用非洲奴隶的数量成正比上升,见下表:<sup>②</sup>

年代	棉花产值(单位:百万美元)	使用黑奴数量
1800	5.2	893 041
1810	15.1	1 191 364
1820	26.3	1 543 688
1830	34.1	2 009 053
1840	74.6	2 487 255
1850	101.8	3 179 509
1851	137.3	3 200 000

由此可见,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非洲大批劳动力仍以奴隶形式被强迫移植到美洲种植园,是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分不开的。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英国棉纺织工业来说,没有美国南部诸州的棉花是不可能发展的,然而,没有几百万非洲黑人奴隶同样是不可能发展的。有些学者估计19世纪从非洲运走了400万奴隶。<sup>③</sup>这些资料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以非洲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美洲奴隶制种植园仍然是世界性商品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这就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495页。

② 西蒙士:《美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载《新时代》杂志、附刊,第7号,第39页,转引自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7页。

③ 杜波依斯曾认为19世纪运走了400万非洲人。杨人梗认为,杜波依斯这一数字可能出自邓巴。隆西矣估计1798—1848年运走非洲人为500万人。参阅让·徐雷·卡纳尔:《黑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47页。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1807年后非洲奴隶贸易几十年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只是到了1863年美国废除了黑奴制,19世纪90年代古巴和巴西废除了奴隶制,奴隶贸易才真正被禁止。

尽管19世纪禁止奴隶贸易成效不佳。但英国及稍后的法国禁止奴隶贸易花样翻新的行动却形成了19世纪非洲殖民主义若干显著的特点,对后来非洲被瓜分有重要影响。

第一,英国打着查禁奴隶贸易的旗号,它的海军分遣队可以随时进入非洲任何海岸和港口。19世纪中叶,英国以有效查禁必须捣毁奴隶贸易商站为名,海军士兵开始采取登陆的军事行动(捣毁),这就给予英国“暂时占领”非洲任何沿海地带的机会。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海军称霸于非洲海面,几乎没有任何对手。禁止从非洲输出奴隶的斗争遂成为19世纪国际殖民主义史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英国以禁止奴隶贸易为名迫使非洲沿岸酋长、土王签订了无数条约,除规定禁止奴隶贸易外,还有附加内容,如允许英国在各酋长、土王领地自由经商,有的还写进承认英国至上权(paramountcy),甚至规定了保护关系。英国实际上在某些地区建立了势力范围。英商拥有比任何他国竞争者更为有利的条件。英国几乎在所有进得去的非洲地区已充分享受“无形帝国”的一切好处,因而在没有出现有力的对手前,它没有必要去建立大片殖民地,去建立由英国直接控制的有明确边界的领地。<sup>①</sup>

第三,19世纪中叶殖民力量得到复苏的法国,仿效英国也以查禁奴隶贸易为名派遣舰队进入达荷美和加蓬等地区。法国自从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失去了美洲和亚洲的广大殖民地后,

---

<sup>①</sup> 关于英国“殖民地”的名称,历史上曾历经数次变更。1956年,英国将已使用数百年之久的、含有屈服意味的“殖民地”更名为“附属领土”;1998年又将“附属领土”更名为“更加现代化”的“英国海外领土”。

非洲便成为最能为法国商业和殖民提供机会的地区。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给予殖民事业以很大的推动。法国看准几内亚湾沿岸仍有不少英商未予占领的“空隙”，开始积极谋求建立保护地。法国在塞内加尔地区的扩张引起英国的警觉。英法在西非争夺殖民优势的斗争逐渐加剧。

第四，英国通过 200 年的奴隶贸易和 1807 年后的禁止奴隶贸易已对热带非洲沿海地区了如指掌。从 19 世纪初起，英国和法国多次派遣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陆进行勘察。从 1791—1850 年共有 24 个探险队进入非洲，其中最重要的几次是英法派遣的。1851—1870 年探险次数猛增，20 年内探险队数目达 56 个，为前 60 年的 1.3 倍。英法等国的逐渐揭开了非洲内陆神秘的面纱。在奴隶贸易年代英国先是同当地酋长、土王建立了伙伴和同盟的关系，后又在禁止奴隶贸易中缔结了双方的条约关系。英国海军分遣队常年巡弋在近岸海面。陆军驻屯在沿岸堡垒基地上。这一切造成了英国随时可以占领非洲沿岸并向内陆挺进的态势。黄金海岸就是突出的一例。1874 年英沃尔斯利少将率 2 500 名英军侵入黄金海岸内陆，直抵离海岸数百公里的库马西。此时英国迪斯累利政府已经抛弃早年的“殖民地是挂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的理论，而采取“必要就兼并”的政策。1874 年 7 月决定“被保护国家”应予合并，组成新的直辖殖民地。法国 50 年代在塞内加尔种植花生获得成功，1854 年已输出 4 820 吨花生，1865 年输出 2 万吨。<sup>①</sup> 1854 年被任命为塞内加尔总督的费尔德布在 1857 年占领达喀尔后便以花生种植区为基地，沿塞内加尔河向东扩张，首先征服塞内加尔下游地区，再打通西苏丹的贸易通道。虽然法国的东扩遭到奥马尔率领的穆斯林军队的阻遏，而且法国在普法战争的惨败也延缓了法国在西非扩张的势头，但英国已经感觉到法国在西非内陆自西向东

---

<sup>①</sup> 让·雷·卡纳尔：《黑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第 168 页。

扩张势头的隐隐威胁。更为重要的是,70年代以前英法在沿海和内陆的扩张已经为瓜分非洲铸造出可以遵循的模式了,现在只需世界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所提供的触媒因素了。

### 三、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二型

本时期在非洲大陆的两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开普殖民地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它们分别地处北纬35°以北和南纬30°以南,均属亚热带和温带地区,沿海都有属地中海型气候的地区,适宜白色人种居住。

南非开普殖民地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由荷兰正式交给已在该殖民地连续统治11年的英国。英国从1820年开始首批移民5000人,其后1844—1847年4300名,1857—1862年12000名移民进入开普殖民地。<sup>①</sup>随着机器工业在英国的兴起,一种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牧、矿业生产的地区(外围),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制造业的生产地区(中心)。南非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本身成为英国大工业的产物。机器毛纺织业直接引起羊毛原料需求的增加,南非羊毛的输出量迅速超过了供应远洋帆船的活畜和鲜肉的输出量。从开普殖民地向英国输出的羊毛增长速度如下表:

1846年	2 958 457磅
1860年	16 574 345磅
1865年	29 920 623磅

19年内增加了10倍。但比起70年代钻石出口量的猛长,羊毛输

---

<sup>①</sup> Ki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南非社会经济史》), Oxford, 1964, pp. 70 - 71.

出又迅速落到了次要地位。1867年奥兰治河边发现了淤积层的金刚石,1870年在瓦尔地区南部杜多伊斯潘发现了原生金刚石矿层。<sup>①</sup>南非的金刚石多属装饰用的金刚石,其货币价值远远超过工业用的金刚石。钻石的惊人财富吸引了几千个挖矿人拥进后来命名为金伯利的地区,到年底已有4千人在矿洞周围安营扎寨。到1872年,从南非各地和境外拥入的移民已达45000人。这块矿区原属当地混血种人格里夸人所有。英国与布尔人都力图占领矿区,双方争夺相持不下。英国人在殖民大臣金伯利策划下,施用诡计,与格里夸人签订协议,1871年由格里夸人酋长“割让”给英国。英国在矿区建金伯利城,划归开普殖民地。到1882年,开采金刚石的年均价值已达2600万英镑,<sup>②</sup>超过开普殖民地1826—1861年的35年出口总值。1882年开普殖民地仅金刚石出口值就达到400万英镑,超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其他所有地区出口的总和。采矿者(俗称“挖宝客”)中只有极少数人发了财。1880年成立的“德比尔矿业公司”(1888年联合另一家公司后改名为“德比尔统一矿业公司”)成为金刚石垄断组织。公司从非洲各地招雇黑人流动劳工,远至大湖区域的各地黑人都受雇到矿区劳动。数万黑人劳工集中生活于与世隔绝的“矿工院”(compound)中。他们不是奴隶,但过着类似奴隶的生活,在做工期间失去人身自由,工余不许走出“矿工院”。英国人以管理囚犯劳工或西印度奴隶种植园的方式控制他们。在他们被允许离开“矿工院”之前,被剥得一丝不挂并受严格全身检查。<sup>③</sup>黑人劳工工资被压得极低,矿主利润率极高。黑人劳工一律过单身生活,资方不负担任何劳动力

---

① 一般均把未经加工的称金刚石,经加工雕琢的称钻石。

② 到1914年该矿被挖净封闭时,已开采出价值5000万英镑金刚石。

③ James Bryce, *Impressions of South Africa*(《南非印象记》), London, 1897, p.242, 转引自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7—288页。

本身再生产的费用。流动劳工在从事极其劳累的矿井下劳动6—12个月后,就被送回原来农村的村社,换一批新劳工下矿。许多回乡劳工将微薄工资用作娶妻的“彩礼”。

英国人于80年代在非洲创造的“矿工院”制度正好与美洲赤裸裸的奴隶制的最后终结相衔接,在殖民主义史上有重大意义。它说明: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到了成熟阶段更加需要使用“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和原料,尤其是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力和原料,因为从构成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角度看,它们都是最廉价的,因而利润率可能是最高的。第二,60年代末发现的金伯利金刚石矿床是非洲矿藏原料的第一重大发现,它意味着这块人类最后进行勘察的黑色大陆有可能是蕴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欧洲资本认识到,把黑人留在非洲生产和开发各种原料,而不将他们运往美洲,既能解决开发非洲的劳动力问题,又可以为欧洲工业品开辟广大销售市场,这已为实践所证明。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以来,英国资本历经几十年寻找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终于在南非金伯利地区获得了成功的体现。到20世纪,由金伯利发轫的流动劳工制度推广到热带非洲几乎所有地区。第三,19世纪资本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地球上绝大部分的资源 and 劳动力还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范围内。在非洲村社原始的社会关系中,欧洲中心区的资本为了获取超额利润需要采取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和无情的措施。南非的金伯利矿区和稍后发现的兰德金矿区便是如此。殖民主义史证明,当外围地区的社会基本结构还不完全适应其在强迫性的国际分工中的任务时,资本只有统治这些领土和控制其社会组织,才能获得超额利润。<sup>①</sup>这就迟早会导致资本的扩张和在非洲的殖民扩张。1872年英国在殖民大臣金伯利策划下兼并和占领金伯利地区,便是瓜分非洲新

---

① 按卢森堡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积累”。



时期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

#### 四、殖民主义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三型

1830年以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所面对的是非洲大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殖民形势：既不同于英国在南非，也不同于英国在印度。法国七月王朝1830年以三年前的“拂蝇拍事件”为借口发动侵占阿尔及尔的战争主要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sup>①</sup>但在进行连绵不断征服战争的同时和战后实施移民和兼并土地的过程则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或经济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占居主导地位。此外，政治方面考虑本身也发生变化，从法国国内政治的需要逐渐转到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本身的需要。从经济过程来看，它表现出法国资本主义既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又越来越具有驱逐其他经济形态的倾向。<sup>②</sup>这些特征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三百年后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土地制度仍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土耳其封建制度下，广大土地以一种“土地国有”形式，被土耳其和阿拉伯的统治阶级所掠夺。但在除荒漠外可使用的土地中至少有一半仍属于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部落的财产，它以一种仍具生命力的公社—氏族土地占有制存在着。法国殖民者当局起初不承认氏族土地所有权，在征服过程中，肆意掠夺大片部落—氏族的土地。直到1863年法国参议院才承认此项所有权，以便以土地私有制取而代之。

2. 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目的之一是要将这块古代罗马帝国的“谷仓”变成法国人经营的农业基地。法国在军事征服过程中开

---

① 见第6章。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95年，第376页。

始大批向阿尔及利亚移民。移民过程延续时间颇长,法国殖民政府一方面让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经营商品性农场;一方面让欧洲移民分散于战略要地,采取“掺沙子战略”以巩固法国的殖民统治,削弱和防范阿尔及利亚人的抗法起义。法国在这方面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有所不同:英国人除派来大批殖民官吏、商人及其家属外,基本上不向印度移民;法国则在最初三十年就向阿尔及利亚移民 22 万人(至 1866 年),到 1876 年移民增至 34.4 万人。<sup>①</sup> 阿尔及利亚是古代地中海文明国家迦太基繁衍之地,又受到阿拉伯文明千年的哺育,沿海地带商业发达,人丁兴旺。1830 年法国占领开始时,阿尔及利亚存在着较发达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沿海地区国有领地(哈布)	150 万公顷
国有荒地(哈布和伯利克)	300 万公顷
私人地产(莫尔克)	300 万公顷
阿拉伯氏族共同占有地(阿尔克)	约 500 万公顷
撒哈拉绿洲土地	约 300 万公顷
撒哈拉不毛沙漠	2 300 万公顷

法国人采取兼并和窃取国有领地和氏族土地等方式,到 1863 年已占有 40 万公顷肥沃土地(其中 12 万公顷归两家法国公司)。从事农业的 8.7 万欧洲移民平均每人占地 3.2 公顷。<sup>②</sup> 然而殖民者拥有的土地仍“不够分配”,1863—1871 年殖民者买卖土地所剩余额平均每年不超过 2 170 公顷,<sup>③</sup> 难以满足每年从欧洲蜂拥而来的移民。1863 年法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手段:一、通过制订法律

① 马赛尔·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第 57、63 页。到 1954 年移民已增至 98.4 万人。

② ③ 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9 页注(34),164 页,161 页和 169 页注(27)。

将公有地产和部分集体地产兼并为法国的国有土地,再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欧洲殖民者;二、1873年实行“土地私有制”,将氏族、公社的集体土地变成个人所有土地,即可以买卖的商品,再用强制的、行政的办法迫使当地人出卖或由法国以契约形式收购土地。法律手段颇有成效,1870年殖民者土地猛增至76.5万公顷,7年内增加了91%土地。<sup>①</sup>

3. 法国历史上是小农制国家,从来没有足够的人口去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因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兼并土地从一开始就同掠夺当地劳动力联系在一起。它兼并土地和实行私有化造成阿尔及利亚社会的两极分化,使60—70万户阿拉伯农民失去土地或出卖份地,不断游离出来,加入分成制佃农(哈姆麦斯)和雇农队伍。<sup>②</sup>阿尔及利亚殖民前就已存在的按二八分成的“哈姆麦萨特分成租佃制”获得了广泛推广。许多法国租让公司充分利用了阿尔及利亚的分成租佃制,如1853年成立的“日内瓦公司”将它从政府得到的2万公顷土地中的一半按每户20公顷分给法国移民,而将12000公顷土地按分成制办法租给阿拉伯农民。后来发展到有3700户阿拉伯分成制农民生活在公司土地上。另一家“阿尔及利亚公司”也将其占有的6.6万公顷土地中的5.5万公顷土地租给阿拉伯分成制佃农,而由欧洲富裕移民承包的1万多公顷土地,也采用分成制来经营。<sup>③</sup>由此可见,在19世纪的阿尔及利亚,派生的、第二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殖民土地公司)所采取的最普遍的形式,是把资本主义关系接种在封建制上而。阿尔及利亚的封建地租剥削率是极高的,分成制佃农须将收获物的80%卖给外国地主。与英属

---

① 艾格列多(Egretaud):《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68页。1900年增至168万公顷。

② 到20世纪40年代,约有12.3万户分成制佃农,45万户雇农。

③ 波斯别洛娃:《阿尔及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5页。

印度不同的是,印度出租土地的是印度土生土长的柴明达尔地主,而阿尔及利亚则是法国租让公司和欧洲富裕移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法国移民经营的农场<sup>①</sup>主要种植葡萄树和酿造葡萄酒。阿尔及利亚农业的专业化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沿海地带土壤最肥沃的特尔地区,谷物播种地已被葡萄园、菜园和烟叶农场所取代。阿尔及利亚人的谷物播种则被排挤到康斯坦丁高原。到20世纪,葡萄酒出口量占阿尔及利亚总出口量的50%。仅葡萄酒农场使用劳动力就多达40—50万人。法国殖民政策使大量阿尔及利亚农民失去土地或破产。失去生计的阿拉伯农民提供了极廉价的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成为扎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使用的劳动力;一部分流入法国。在宗主国本土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是法国最早大规模采用的,成为剥削殖民地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心和外围的这两种劳动力制度构成法国的极具特色的掠夺劳动力制度。

法国定居于阿尔及利亚的几十万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制度产生很大的影响。与南非荷裔殖民者不同,法国移民与地中海北岸的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几十万法国殖民者占据着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和报酬最优厚的工作,而当地大部分穆斯林居民却越来越贫穷。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需要有强有力的殖民统治制度来维护殖民者的安全和社会稳定。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创造了欧洲殖民列强在非洲大陆最早(19世纪30年代起)、最系统的殖民统治制度,比起葡萄牙人早期殖民制度,其影响更广更深。它带有鲜明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特点:一、在长达40多年的军事征服、绥靖和清理(refoulement)之后,法国驻扎10万大军维持殖民秩序(而奥斯曼帝国时期只驻1.5万军队)。在内地,军政

---

① 平均占地87—392公顷的大中农场占有殖民者土地90%,平均占地6—30公顷的小农场则占10%。

府统治延续到 1879 年。法国在 28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了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严格集中制,半个世纪后这一模式为 1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法属非洲殖民地所仿效。二、以“法兰西文明优越论”为种族主义理论的基础,实行“同化政策”,反对移民“归化所在地”。法兰西帝国野心勃勃,企图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领土的延续”,因此理论上它要把所有阿尔及利亚居民变成法国人,而在实践上则将阿尔及利亚居民分成两部分:一是同宗主国法国人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的“法国公民”;一是承担一切义务而几乎毫无权利的所谓“法国臣民”。前者对加入法国籍加以严格限制:须奉行与伊斯兰教义抵触的一夫一妻制、能读会写、拥有产业、曾参加保卫法兰西的战争等。这些规定将绝大多数居民排除在外,只能当“臣民”。<sup>①</sup> 三、分区而治,北阿尔及利亚三省归法国民政当局管理,南阿尔及利亚四大区在 1947 年前一直受法国总统任命的军事司令管辖。穆斯林居民在仅起咨询作用的地区议会中只占有 1/4—1/3 的席位。这一套政治统治制度后来在法属非洲普遍推广。

### 五、本时期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在非洲的体现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明确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社会结构;另一个是建设性使命,即为资本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sup>②</sup> 对于殖民主义史上这一重大命题,必须根据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注意到:同样是英国商品和英国政权,它们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印度发挥出巨大的、神奇

---

<sup>①</sup> 直到 1936 年,在 600 万穆斯林居民中,只有 7 817 人入法国籍成为“法国公民”,参见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 57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7 页。

的破坏力,而对英属西非的社会经济结构却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因此需要探讨殖民主义对“旧社会结构”的破坏力大小和破坏程度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从非洲情况看,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年均输入各地区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一是殖民政权对当地土地制度采取什么政策。

一般地讲,宗主国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向殖民地的销售量同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被破坏的程度成正比。1854年英国向西非出口商品总额为123万英镑,进口商品总额为190万英镑,都不及同年英国向印度出口1599万英镑的1/10,进口2077万英镑的1/9。<sup>①</sup>而且,英国商品在非洲主要限于沿海地区。所以,英国“廉价商品重炮”的威力在19世纪的热带非洲显著衰减,其破坏性作用相当微弱,而在广袤的热带非洲内陆地区还几乎觉察不出来,因此英国商品对非洲农村经济的侵蚀过程十分缓慢。在不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广大内地的农村,缺乏货币,无力购买进口商品甚至本地商品,仍然保存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旧的社会结构”没有受到结构性的震动。

输入热带非洲商品量少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小的原因何在?显然是由于19世纪中叶热带非洲的商业利润低和非洲尚无力提供更多的世界市场所需要的商品,非洲对欧洲商人的吸引力比起其他各洲殖民地更小得多。商业利润低的重要原因在于多雨的热带非洲极难通行而交往工具又极不发达,铁路很少,没有一条伸入内陆的铁路,因而运输费用很高,造成商品和原材料成本高昂。如尼日利亚未修铁路前,<sup>②</sup>1吨货物运输1英里距离要花3先令,从港

---

<sup>①</sup>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经济与帝国》), London, 1973, p. 131. R. Dut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经济史》), London, 1956, p. 160.

<sup>②</sup> 英国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尼日利亚,125英里的拉各斯铁路1895年才开始修建。

口码头把价值 30 英镑的商品运往不超出 200 英里的内地,人力运费(一般用头顶着货物)需 30 英镑,因而使离海岸 200 英里以外的内地无法开发,而一列火车就能抵得上 13 000 个搬运工的工作量,其费用只及人力运输的 1/12。在不通铁路的内陆地区罕见欧洲商品,一般也不生产欧洲所需要的原料。

除“廉价商品重炮”的作用外,应充分注意殖民政权的土地政策对“旧社会结构”的破坏性作用。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尤为明显。整个 19 世纪,法国从阿尔及利亚主要输出阿拉伯人种植的谷物和法国移民种植的经济作物,法国进口的商品主要供应数十万欧洲移民,对阿尔及利亚的“旧社会结构”的冲击不大。阿尔及利亚人自然经济结构解体过程比较缓慢。1863—1873 年法国殖民政权开始制订土地私有化政策情况才开始剧变。1873 年法国议会制定土地法律,将 700 个阿拉伯氏族的全部领地予以分散,短期内强制建立私有财产制,将氏族—公社的集体占有地,作为份地分给每一成员,份地可以出卖和典押。于是,阿尔及利亚“旧社会结构”的支柱——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便在狂热的土地投机浪潮,繁盛的高利贷活动和阿拉伯农民典押与出卖份地的热潮中土崩瓦解了。

如上所述,阿尔及利亚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并没有给阿尔及利亚人带来农业耕作方式的改进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因为用行政法律手段建立的土地私有制不会立即产生促进耕作方式改良的级差地租,也不可能的人口相对稀少、土地面积较大的地区一下子建立起集约耕种制,而只是持久地促进阿尔及利亚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为法国提供大批廉价劳动力,并压低了法国工资水平。

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作用”与宗主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息息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本身工业发展还比较缓慢,对殖民地原料需求尚少,对阿尔及利亚的采矿业和原料初加工的投资是

很晚才开始的,而且数额很少。法国不同于英国。英国对印度的生产资本输出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50 年代初已在印度修建铁路 445 公里,1853 年就规划在印度修建六条大铁路。而法国资本家并不感到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造成新的生产力,他们感兴趣的是高利贷资本的输出。19 世纪法国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经济谈得上有某种“建设性作用”的,大概就是葡萄种植业本身变成了一种工业生产。1879 年法国葡萄园受到葡萄根瘤蚜病的严重破坏,许多酿酒业主迁居阿尔及利亚。从此,越来越多的阿尔及利亚农场专门为葡萄酒酿造业而生产。农场和酿酒厂需要大批劳动力,许多分成制佃农被吸引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酒厂充当雇工或工人。葡萄种植业在阿尔及利亚逐渐达到“工业的”规模。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经济中最重要的酿酒业就是这样奠定基础的。



## 第二章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80)

### 第一节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 非洲殖民主义

#### 一、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争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一方面,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混合生长,产生了金融资本。另一方面,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造成了经济关系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1873年开始的、延长到8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发展过程。既是银行资本也是工业资本的金融资本的资本形态代替了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体系的中心。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取而代之。第二,英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渐被几个帝国的互相竞争所代替。第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作为商业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作用——提供垄断利润。由此,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起,欧美7个国家(英、法、德、意、比、美、俄)加亚洲的日本8国开始走上狂热的殖民扩张的道路。1876年,7国(除俄国)中只有英、法两国占有海外殖民地,共2340万平方公里土地(英国为2250万平方公里,法国为90万平方公里),其它5国均无寸土殖民地。然而38年后的1914年,情况大变,7国已占有殖民地5225万平方公里,增加123%,其中英国为3350

万平方公里,法国为1060万平方公里,原来无寸土殖民地的德国占有殖民地290万平方公里,美国和日本各为30万平方公里,比利时为40万平方公里,意大利为225万平方公里。<sup>①</sup>

在30多年时间里,列强侵占的殖民地面积竟增加了2885万平方公里,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是空前的。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英国学者R.罗宾逊、加拉赫和菲尔德豪斯多次撰文不赞成关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观点,他们认为19世纪末叶的殖民帝国的扩张,只不过是19世纪初叶和中叶殖民帝国扩张的延续,并无质的差别,<sup>②</sup>只是维多利亚初、中期(19世纪中叶)英国扩张多采取“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形式,而维多利亚晚期(19世纪末)则更多采取“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形式而已。<sup>③</sup>菲尔德豪斯则进一步将帝国主义现象归因于“把殖民地视为大国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种只能用社会歇斯底里才能予以适当说明的社会现象”。<sup>④</sup>总之,上面提到的这几位英国学者反对从经济来解释19世纪末以后的帝国主义,不同意“帝国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的说法。

19世纪末殖民主义领土扩张的主要战场在非洲,全世界新增的殖民地面积共288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在非洲。过去,有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殖民地的原因是因为国内资本过剩,需要有资本输出的地方,按此逻辑,非洲是新占殖民地

---

① 统计数据据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3页;占柏尔:《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读书出版社,1947年,第三册,第174—175页,其中意属利比亚面积按175万平方公里计算。

②③ 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 1953.

④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帝国主义”:一个历史的修正》),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4, No. 2, 1961.

面积最大的地区,似乎也就应该是帝国主义国家输出资本最多的地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菲尔德豪斯抓住了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的某些疏漏。霍布森在该书第53页中斷言:“英国对外政策主要是争夺有利的投资市场,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sup>①</sup>他在统计1893年英国对外投资的地域分配时,仅粗略地分成“外国”、“殖民地”、“美国”、“其它”4类地域。菲氏主观地认为霍布森列表中的“外国”是指被兼并前的地区,“殖民地”则指兼并后的地区,二者均指“新殖民地”。<sup>②</sup>霍氏认为它们在英国的海外投资中占有高比例,即在1893年英国对外总投资总额16.98亿英镑中,“外国”和“殖民地”的投资为8.9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52.4%。菲尔德豪斯引用霍氏去世后1953年出版的卡尔克罗斯的《国内和国外投资:1870—1893》一书的统计数字,<sup>③</sup>认为英国大部分输出资本是投在“新”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尤其是南非。菲氏指出,霍布森却假定英国大部分投资是投在1870年以后占领的地区——非洲和亚洲,因而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1870年前,非洲除南非、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有少量欧洲投资外,其它地区基本上尚无外来投资,可以说基点是很低的。1870—1913的43年间,外来投资激增,总额达8.45亿英镑,<sup>④</sup>其中英属非洲为6.9亿英镑,法属黑非洲为0.25亿英镑

---

① 霍布森:《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页。

② 霍布森是否真如菲氏所认为的均指“新殖民地”,尚有待商榷。

③ Cairncross,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 (《国内和国外投资:1870—1913》), Cambridge, 1953, pp.188—189.

④ Frankel,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在非洲的资本投资》), London, 1938, pp.149—159. Paish, *Great Britain Capital Investment in Other Lands* (《英国在帝国外的投资》), RSSJ, LXXI, London, 1909, pp.465—480.

Paish, *Great Britain Capital Investment in Individual Colonial and Foreign Country* (《英国在殖民地和外国的投资》), RSSJ, LXXIV, London, 1909—1910, pp.167—187. 见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19年,第286页。

(此数只计参加股票交易的公司,可能低估了 1/3),德属非洲为 0.85 亿英镑,比属刚果和乌隆迪为 0.4 亿英镑。另外一种统计数字表明:1914 年对非洲资本输出总额为 40.5 亿美元(8.28 亿英镑)。其中英国投资为 24.5 亿美元,法国为 9 亿美元,德国为 5 亿美元,其它国家为 2 亿美元。<sup>①</sup>对非洲的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应该说增长是飞速的。众所周知,资本投资的增长与贸易的增长有所不同,因涉及到投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如道路、港口等设施,一般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1870 年以后尤其是 19 世纪末以后,非洲投资的增长是相当迅速的。霍布森根据的是当时“最有能力的经济学家”缪尔赫尔(Mulhall)为《政治经济学辞典》所作的调查数字,但在为投资地区分类时只粗略地分为“外国”、“殖民地”、“美国”、“其它”,因而分不清楚哪些是刚占领的新殖民地及其投资数额,这是一个疏漏。菲氏采取“攻其一点”的战术,宣称由此,“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的整个理论的基础坍塌了”。<sup>②</sup>

## 二、“瓜分非洲”如何提到日程

那么,欧洲列强对非洲大陆的瓜分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新阶段是如何到来的?看来,有必要按历史发展的原貌和顺序来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

从 1415 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城,就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蚕食过程。经过 460 年到 1876 年,欧洲国家已占有全部非洲领土的 10.6%,约 320 万平方公里领土。兼并一直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在进行,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兼

---

①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 4 卷下册,第 281 页。

②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帝国主义”:一个历史的修正》),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4, No. 2, 1961, p. 199.

并。“不想兼并并不证明不愿意控制”。<sup>①</sup>的确,当英国基本上控制着非洲大陆,并拥有“至上权”时,暂时不兼并,实行“无形统治”的有效控制,对英国来说是最为有利的。问题在于,英国能够维持这种对它最为有利的局面到什么时候?英国一国独霸的平衡局面是否终将会被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所打破?

1873—1878年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一场长期的、巨大的危机,影响深远,其后萧条又持续了6年之久。在危机中,许多欧洲工业国家一方面加强对本国市场的控制,70年代末以后相继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德国首先于1879年制订高额关税,1902年再次修订,美国则在1857年就领先调整关税,法国于1892,1907,1910年三次调整关税;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别国关闭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夺海外市场。英国曼彻斯特商会主席在报告中忧心忡忡地说,他发现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市场正在对英国关闭。市场问题逐渐引起英国人重视。寇松勋爵呼吁:“丢掉市场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取得市场对于国家强盛是极好的收获”。<sup>②</sup>争夺市场的严酷斗争使英国普通资本家都感觉到世界经济正在出现新情况:英国不再是世界市场的霸主了。正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英国对殖民地的看法发生变化。1873—1886年经济危机和萧条期间,正是对殖民地的增加出口缓和了英国工业不景气的状况。舆论开始转向:只有殖民地市场才是能避开他国竞争而听任本国垄断市场。英国保守党政府从70年代起对殖民政策作了重新调整。1852年曾提出“殖民地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的迪斯累里,改变了对殖民地的看法,他对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保护英国市

---

① 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 1953年, p. 3.

② Curz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波斯和波斯问题》), London, 1892, vol. 2, p. 604.

场的作用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1872年作为下台首相,在水晶宫演说中他明确地声称,他是“帝国思想”的拥护者,是全面巩固和扩大大英帝国主张的捍卫者。1874年他再次组阁时,便提出“巩固和扩大”(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扩张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为取得补偿,它的殖民政策的改变比英国更为急遽。

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资本家开始寻找有保障的市场,领先走上夺取新殖民地的道路。英国的殖民政策从惬意于“无形帝国”到热衷于建立“有形帝国”的转变,首先表现在非洲大陆。1885年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说:“十年前,我们实际上是非洲的主人……没有必要在那里建立保护制度或某种类似的制度”。<sup>①</sup>他为英国在非洲的霸权受到严重挑战而感到震惊。二三百年来在非洲的不间断的殖民活动,已为英国夺取新殖民地、实行“有形统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对于英国来说,转轨是轻而易举的。随着英国的转轨,英法在过去历史岁月中的明争暗斗也逐渐表面化了。正在崛起的欧洲经济强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一方面窥伺着英法斗争,一方面按捺不住,急于加入争夺“最后大陆”非洲的斗争。

### 三、“最后大陆”提供的殖民主义新权益

欧洲列强对非洲大陆越来越重视和深感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扩大欧洲各国在非洲的经济领土:深受1873—1878年经济危机困扰的欧洲资本家对非洲巨大的潜在市场寄予极大的、不切实际的希望。1871—1880年10年中,争先恐后进入非洲大陆

---

<sup>①</sup>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生平》), London, 1932, vol. 4, p. 225.

的49个探险队陆续从非洲回来,带回了这块一直让欧洲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大陆的最新消息。1878年刚横贯非洲大陆从刚果回来的斯坦利向欧洲商会发表演说,他极富渲染力地描绘富饶、瑰丽、人口众多的刚果河流域,说那里的居民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他们的衣着习惯,曼彻斯特纺织机器昼夜开动也将供应不上。正受市场问题困扰的欧洲资本家对刚果市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879年主持“国际非洲协会”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迅即抓住时机,将斯坦利派回非洲。斯坦利进入刚果盆地活动,以“国际刚果协会”名义,采取卑劣的欺骗手段,与当地土王、酋长签订450多个“保护”条约,建立20—40个据点,把大片土地转让给“国际刚果协会”。于是,在非洲扩大市场的活动竟向“让与领土”的攫夺行为转变。操纵此类活动的已不是分散的、个体的资本家,而是如利奥波德这样的拥有1500万法郎巨资的金融集团巨头。

与此同时,1879年法国派遣布拉柴率队由今加蓬进入刚果河,于1880年9月10日同巴帖克国国王签订“保护条约”。马科科国王承认法国对其国土包括刚果河和Pool(普尔)两岸土地的保护权。布拉柴在普尔右岸设兵站(即今布拉柴维尔)。1882年11月法国政府批准布拉柴所兼并和占有的土地。

葡萄牙宣布对刚果河口享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权利。认为1482年迪奥戈·卡奥已发现该河河口并命名为扎伊尔河,此后曾多次勘探河口附近地区。英国积极插手,利用英葡传统同盟关系,1884年2月26日与葡订立条约,承认葡对刚果河口及从河口至恩戈瓦浅滩的北部海岸的权利,英国在该区享有同葡一样的商业和航运权利。法国立即宣布不承认英葡条约。国际刚果协会也反对该约。德国想遏制英国的扩张,建议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部非洲经济领土的边界问题。对于扩大经济领土,英国的殖民大臣约·张伯伦总结说:“如果我们总是消极被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就会被我们的商业对手所占领。通过我们的殖民政策,我们

一旦获得或扩大了一片领土就会为增长世界贸易,作为文明的代理人来发展这片领土”。<sup>①</sup>

(二)争夺和控制“最有希望的”原料产地:19世纪中叶以前,非洲为欧洲工业国提供的原料仅有羊毛(南非)、棕榈油(西非)、葡萄、水果、蔬菜(阿尔及利亚)、棉花(埃及)等。数量都不大,相对数量较多的南非开普殖民地的羊毛,1865年输出英国13 357吨,只及同年澳大利亚输英羊毛48 988吨的27%。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对英棉花供应中断,曼彻斯特棉纺织厂面临关闭威胁。促使英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作用重作估计:需要有若干个英国能控制的原料产地,以保证英国关键工业(纺织工业)的正常运转。通过赫迪夫<sup>②</sup>赛义德,埃及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输英棉花从50年代年均2.2万吨激增至1863—1865年年均11.2万吨,<sup>③</sup>埃及成为超过印度的棉花基地。此后,埃及棉花供应量逐年增长,1897年输出28.7万吨,<sup>④</sup>占英国进口原棉18%。尼罗河流域包括苏丹,被英国纺织业巨头视为最优良的棉花原料供应地。

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非洲作为当前和未来原料的来源地的重要性越来越引人注目。70年代南非金伯利金刚石矿的发现震动了欧洲。80年代,南非威特沃德斯兰德(简称兰德)金矿的开采震撼了世界。1884年在原非洲人废弃的矿井下面发现了巨大的矿脉,1886年从碾碎的砾岩中洗出了第一批黄金。丰富的矿脉埋于几百米以下的地层深处,品位较低,金与矿渣之比为1:35 000。在不具备先进的矿井机器、技术要求很高的氰化法和巨额资金以前,巨大的兰德矿脉一直在比勒陀利亚贫瘠的荒原下

---

①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79—180页。

② Khedive 赫迪夫,源于波斯语,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1867—1914)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③④ 巴拉维和乌列士:《近代埃及经济发展》,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147页。棉花衡制均折算为公吨。



静静地躺卧着。地质学家毛赫发现这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藏之后仅两年，以罗德斯为首的英国金融资本家便投入了大量资本，1889年一年就投入1200万英镑。兰德金矿开采成功。1887年生产黄金1200公斤，此后8年产量陡增51倍，1895年已达62700公斤，1898年产量便占当年世界产金总量的27.55%<sup>①</sup>。兰德金矿的发现和开采给欧洲列强政府和各国金融资本家一个明确的信号：不仅已经发现的非洲原料来源，而且可能发现的非洲原料来源，都具有重大意义。非洲大陆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几乎都还没有经过科学的勘探。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看来无用的荒漠、沼泽地，如果明天发明了新方法或投入大量的资本就会变成聚宝盆。将会有“第二个兰德”，“第三个兰德”……出现在广袤的非洲土地上。于是从80年代开始，欧洲列强政府通过金融资本财团派遣的探险队、殖民官员、传教士在争夺非洲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的斗争中，总是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哪怕是在沙漠、沼泽、无人区。德国在1884年几个月时间抢占了多哥、喀麦隆和西南非洲就是典型事例。英国南非公司在赞比亚西河以北广袤的外赞比亚地区无限地扩张土地，竟歪打正着把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地带的赞比亚西部荒凉地区也囊括在内。

(三)控制非洲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被欧洲列强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头等大事。1869年后，突尼斯处于连接欧洲列强和东方广阔殖民地的主要航道上。魂牵梦萦“罗马帝国”光荣的意大利把控制与西西里岛形成犄角之势的突尼斯，视为维护其在中部地中海优势，并可随时切断法国与近东和苏伊士运河联系的关键。法国同样把控制突尼斯视为它在北非建立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乃至整个中东优势的不可缺少的一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地中海重新获得它自1498年以后失去的通往东方最便捷航道

---

<sup>①</sup> Warwick, *The South African War*(《南非战争》), London, 1980, p.19.

的战略重要性。英国从战略上考虑需要绝对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1875年英国通过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的44%，在经济上控制了运河。它的下一步谋划是，不能让法国在埃及和东地中海获得政治霸权。1876年迪斯累里政府想通过埃及的财政危机使埃及赫迪夫完全依附于英国，结果却造成英法财政上共管埃及。以阿拉比为首的祖国党领导埃及人民掀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给英国提供了军事占领的借口。1882年英舰炮轰亚历山大港，由于法国议会不批准法出兵埃及，英国如获至宝，单独出兵，一国军事占领埃及全境。

法国在突尼斯抢先一步。法国金融资本力量特别强大，突尼斯的1.25亿法郎债券，有80%即1亿法郎掌握在法国金融资本手中。<sup>①</sup>法国对突尼斯志在必夺。1881年法国买通突尼斯赫鲁米尔酋长，让他向阿尔及利亚发动袭击，给驻阿法军提供出击借口。4月，袭击发生了，2.4万法军从三面向突尼斯进攻。攻陷比塞大后，5月12日法军迫使突尼斯贝伊签订巴尔杜条约，成为法国的保护国。突尼斯人民奋起抵抗，法国5万援军占领突尼斯全国。

意大利争夺突尼斯失败后迅将扩张重点转向东北非。自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红海战略地位骤升，意大利在红海口占领阿萨布，不断向四周扩张。1885年占领马萨瓦，终于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全部领土。其目标是要占领整个埃塞俄比亚高原直至索马里沿岸。法国自80年代初在越南北部湾和马达加斯加岛进行殖民战争，日益重视它对红海奥博克港的占领，以保证法国船队的加煤上水，无须依靠英占的亚丁港。英国自1839年占领亚丁，它在红海、亚丁湾海域控制通向印度航线的地位已卓具优势。法、意殖民势力伸入红海沿岸，打破了英国在红海一统天下的局面。英国在1884年

---

<sup>①</sup> 达什克维奇：《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以前,一直利用它所操纵的埃及赫迪夫政府,打着奥斯曼帝国旗号,有效地控制着从萨瓦金、马萨瓦到瓜达弗伊角的沿岸地带。1884年埃及政府受苏丹马赫迪起义的打击,被迫从厄立特里亚沿海的几个据点撤军。英国遂直接出面占领了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亚丁对岸的索马里海岸(柏培拉、泽拉、布勒哈尔)。法国乘机扩大对奥博克—吉布提的占领区。英国在这种形势下,同意意大利占领厄立特里亚,以对抗更危险的对手——法国。法国从此一直被限制于奥博克—吉布提为中心的两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19世纪最后30年,英、法、意为争夺“非洲之角”展开激烈斗争,主要出于战略考虑:为了保护更具重要性的东方殖民帝国(印度帝国、印度支那帝国)和两洋、两海贸易航线,<sup>①</sup> 尽管英国最初长期占领索马里一段海岸仅仅是为了保证向对岸亚丁据点供应穆斯林牧民生产的牛羊肉。

(四)为保证计划中铁路的修筑引起大片领土的瓜分。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东西、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铁路建成,通车几年便带来了巨大效益,开发了美国西部和太平洋东岸。这条中西大铁路的修通给正在瓜分非洲的欧洲列强带来启示:非洲大陆广袤地区的开发和投资也可以通过修建铁路来带动,而当前则需要以规划铁路的修筑来带动瓜分。70年代法国人首先提出规划,拟从阿尔及利亚修建一条穿越撒哈拉沙漠到塞内加尔的铁路,将西非内陆地区同地中海连接起来,以开发内陆贸易并将它牢牢掌握在法国手中。其后,法国进一步规划,拟将这条计划中的铁路从塞内加尔向东延伸到尼日尔河流域。1879年向法国议会提出正式报告。英国对这条尚在纸上的铁路颇感担忧,担心这条铁路将把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贸易大批吸走,也提出要在非洲赶修几条铁路干道的计划。80年代末,英国金融巨头罗得斯提出一项更大

---

<sup>①</sup> 即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红海的航线。

规模的计划,拟修建纵贯非洲大陆的、从开普(Cape)至开罗(Cairo)的《二C计划》。由此,掀起了在非洲大陆投资兴修铁路的热潮。1865年欧洲人在非洲投资修建的铁路只有760公里,主要在北部非洲地中海沿岸。20年后,1885年非洲铁路长度已达7030公里,增加8.3倍。又过18年,到1913年非洲铁路里程达到44309公里,比1885年再增加5.3倍。铁路的修建成为欧洲诸国向非洲输出资本的最重要项目之一。至1913年,各国在非洲修建铁路总里程列表如下:

英国	27 364 公里
法国	9 600 公里
德国	4 176 公里
意大利	155 公里
葡萄牙	1 624 公里
比利时	1 390 公里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1885—1913年期间,英国的生铁产量和资本积累的增长,均远远不如德国,而英国在非洲投资修建的铁路里程却比德国多5.5倍。按每1万公里铁路投资约需20多亿马克计算,英国在非洲大约投资54亿马克,而德国仅大约为8亿马克。<sup>②</sup>

如上所述,1885年后,欧洲列强为了便于抢先夺得非洲领土、镇压非洲人反抗和开发内陆,开始在非洲各地区大规模修建铁路。正在修建和已修成的铁路证明,修建铁路具有战略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修建铁路所需器材为欧洲各国钢铁厂提供利润丰厚的定货;铁路有效地把非洲各个地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流通范围,便于输出非洲向世界市场提供的各种原料。此外,铁路修建权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载《列宁全集》第39卷,第540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7—88页。

常与签订其它租让条约有联带关系,往往带出一系列租让权。罗得斯在向英国各投资公司招揽“二 C 铁路”的投资时说,开普—开罗铁路决不只是为了便于人们旅行,其“目的在于从(非洲)中心贯通非洲,这条铁路将掌握整个沿线的贸易。将来铁路支线与东西海岸联接后,这些铁路联接线就是这条通过非洲中心干线沿途商品的出路”。<sup>①</sup>按罗得斯的庞大计划,这条纵贯非洲大陆的铁路将从开普殖民地修起,向北推进,沿铁路两旁的领土均应纳入大英帝国范围,形成所谓“一片红”。<sup>②</sup>

所有构成此铁路修建的障碍均应排除。在罗得斯心目中,第一道障碍是,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它为兼并茨瓦纳(今博茨瓦纳)部落土地而纵容两个布尔人小“共和国”向西扩张,即将封闭“北进之路”(亦称传教士之路),这是未来铁路通往林波波河以北的必经之路。罗得斯吁请英国政府干预。伦敦派遣沃伦率 4000 名英军“把(布尔)掠夺者从贝专纳驱赶出去了”。<sup>③</sup>南博茨瓦纳从此被英国吞并。

罗得斯计划中的第二道障碍是,洛本古拉的马塔贝莱王国屹立于马绍纳兰(今津巴布韦)。“北进之路”(罗得斯为蛊惑人心已将它改称为南部“苏伊士运河”)要通过他梦寐以求的大北方走廊只有占领马塔贝莱王国。这块宝地是传闻中“所罗门王宝藏”所在地,可能发现“第二个兰德金矿”,被罗德斯一批金融资本家认定是势所必夺之地。1888 年罗德斯使用诡计从洛本古拉国王手中取得这块地区的采矿权,并擅自扩大为主权,据此向英国政府申请组织“英国南非公司”。英国政府迅即予以批准。索尔兹伯里首相认

---

①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帝国与非洲商业》), 1919, p. 182.

② 在英国出版的地图,凡是大英帝国领土均绘成红色。

③ Stevens, *Lesotho, Botswana, Swaziland*(《莱索托,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 London, 1967, p. 119.

为,由拥有巨资的南非公司去兼并马绍纳兰土地一举两得,既能收到“英国控制的实惠,同时又能免除兼并的恶名和花费”。<sup>①</sup>于是英国政府批准罗得斯手下干将詹姆逊率武装队伍以女王名义占领马绍纳兰(1890年)。

第三障碍在于从莫桑比克向西扩张的葡萄牙人。早在南非公司获特许状当天(1889年10月29日),罗得斯就与开普殖民政府签约,将铁路从金伯利沿“北进之路”延长到马弗京。1891年又开始修建从马弗京延长到布拉瓦约(在今津巴布韦境内)的铁路,1897年铁路修到布拉瓦约后,又向北和西北延伸到索尔兹伯里和万盖。为修建向北延伸的铁路线,必须占领北马绍纳兰,罗得斯同葡萄牙展开了激烈争夺。英国政府全力支持罗得斯及其南非公司,阻止葡萄牙从莫桑比克向西扩张,以防止葡截断通往赞比西河谷的“二C铁路”预定线。英国政府甚至表示不惜为此与其“老盟国”葡萄牙开战。索尔兹伯里还扬言要派遣炮舰到莫桑比克沿海。葡萄牙退缩了。这样,葡属东非的第三障碍也被罗得斯为首的金融资本家破除了。实际上,当时还消除了一个潜在障碍。由于英国南非公司吞并了后来称为北罗得西亚地区(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从而截断了德国企图从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的“蚯蚓地带”向东北延伸与德属东非联接的斜断非洲计划。

第四道障碍是“二C铁路”须经过比属刚果和德属东非的交界地区。1894年5月英国与维多利亚女王表弟利奥波德二世做成交易,刚果自由邦把爱德华湖南岸到坦噶尼喀湖北端一块宽25公里的长条地带租给英国,以保证英国将英属尼罗河上游地区同英属南部非洲联接起来,在这块“租借地”上修建“二C铁路”的一个区段。

---

<sup>①</sup> Mason, *The Birth of a Dilemma* (《一个进退维谷局面的产生》), Oxford, 1958, p. 128.

最后一道障碍是尼罗河谷地。自从 1885 年苏丹马赫迪起义军斩断了英国控制的埃及与尼罗河上游地区的联系后,英国纵断非洲大陆的最重要环节就中断了。1896 年英国决定恢复对马赫迪国进攻,进军栋哥拉。克其纳率军一边修铁路,一边往南推进。1898 年 9 月 2 日英埃军队占领恩图曼。4 天后,英军一支舰队由克其纳司令率领溯尼罗河而上,9 月 18 日到达已被从加蓬出发横越大半个大陆的法人占领的尼罗河谷地小镇法索达。占领法索达是法国横断非洲大陆计划的一部分,法国计划修建一条从塞内加尔往东,经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谷地横断非洲大陆抵索马里奥博克的铁路(有的史学家称之为“二 S 铁路”)。英国政府认为,占领尼罗河谷地涉及到英国在非洲大陆两端领地之间能否建立领土联系的严重问题,即能否修通开罗—开普铁路的纵断非洲的问题。英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政府指出,法国占领法索达“将会切断我们在北非和南非之间的交通线,而建立这条交通线……则是我们政策的目的”。<sup>①</sup> 在英国以战争相威胁的强大压力下,法国撤离法索达,索尔兹伯里在谈判中没有答应给予法国从中非通往尼罗河的孔道。显然,这种“孔道”将在某一区段截断“二 C 铁路”。英国要求法国无条件放弃整个尼罗河流域。在 1899 年 3 月 21 日签订的英法协定中,法国完全被撵出了尼罗河流域,但它获得了苏丹达尔富尔省以西的一大片地块,使法属北非、法属西非的殖民地联成一片,但横断非洲的计划却永远成为泡影。至于英国,到了 20 世纪初,它明知由于德属东非已扩张到坦噶尼喀湖,与比属刚果有一千公里的(南纬 1°至 8°)交界线,“二 C 铁路”不可能修通,却仍要坚持这项计划,以扩大和稳固它在非洲已经和可能攫得的领土。可见,在 19 世纪末铁路的拟建和修建,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

---

<sup>①</sup>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 2 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 年,第 565 页。

斗争中,既起了“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的作用,<sup>①</sup>又起了巩固既得殖民地和引发再瓜分非洲的作用。

(五)各国金融资本在瓜分非洲中起了重大作用。各国金融资本家在非洲任何地区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包括战略利益)越大,其本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就越大,以至不惜为此出兵打仗。由于英、法、德、比、意的垄断资本主义各有特色,他们在非洲的扩张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宜笼统而论。有些史学家囿于史识和立场,对金融资本在非洲的活动和作用讳莫如深或持基本抹杀的观点,是并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详见第8、9章)。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金刚石矿和金矿相继在南非发现以后,英国金融资本积极投资两矿,短期内获得极丰厚的利润,使南非从一个在欧洲各国政府心目中出了名的贫困地区变成一个列强垂涎欲滴的聚宝盆。尤其是兰德金矿年年增产的黄金源源运进英格兰国家银行的地下金库,使英镑作为实际上的国际货币更加坚挺,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凭借的黄金库存实力更加雄厚。英国政府对南非金融资本寄予维持大英帝国雄风的厚望,对于已从牛津大学学成返回南非的罗得斯更视为帝国扩张事业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兰德金矿引人瞩目的巨大增产,南非事态的发展并不全在伦敦控制之下,兰德金矿和约翰内斯堡地区的主权和治权都掌握在德兰士瓦共和国阿非利卡人手中。在金矿的利润分配、铁路货运定价、关税率和廉价黑人劳工的募集乃至北向扩张等问题上,布尔人都以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执拗态度,采取“布尔利益第一”的政策,致使英国的帝国利益和金矿公司资本利益备受减损。英国政府为了降低德兰士瓦金矿在南部非洲政治天平中的份量,一度全力支持英国南非公司向林波波河以北的马塔贝莱兰扩张,希望在这里迅速找到“第二个兰德金矿”,以“获得非洲的力量

---

<sup>①</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6页。



均衡”；并在洛本古拉王国里建立南部非洲北部的坚强殖民地，抵消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崛起。但是，进入 90 年代后这些如意计划渐成泡影：“第二个兰德”并未发现，南非公司股票暴跌，而兰德公司股票却节节上升；德兰士瓦的克鲁格总统在铁路和关税之战中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至此，英国政府认为推翻克鲁格的阿非利卡人政府已是势在必行了。张伯伦默许罗得斯策划的“詹姆森袭击”计划。1896 年 1 月，詹姆森袭击以惨败告终。罗得斯的“帝国主义面目”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迫辞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罗得斯，感到他的“特洛伊木马”作用不仅在德兰士瓦的阿非利卡人中失效，而且在开普殖民地的阿非利卡人中也完全失效了。尽管 1896—1898 年索尔兹伯里内阁仍企图通过外界压力和利诱手段（如把斯威士兰让给布尔人作殖民地）双管齐下，迫使克鲁格政府就范，罗得斯对于实现以“二 C 铁路”为主轴的大帝国计划的信念却毫不动摇，但他把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道义劝服”重点转到武器批判上。罗得斯孜孜不倦地将政府的大臣们网罗到他的计划之中。

英国金融资本担心，如果听任德兰士瓦共和国在德国和荷兰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壮大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那么，在经济上，不仅德拉戈阿—约翰内斯堡铁路沿线的贸易将落到德国人手中，德国货将取代英国货；而且也将给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的商业和财政带来致命打击；兰德金矿这只金鹅将“琵琶别抱”，金伯利的钻石垄断地位也将逐渐丧失，其后果将是大大增强敌视英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不仅大帝国（官方语言为“自治领”）的计划将成泡影，而德兰士瓦的“南非合众国”将吞没南非的另外两个英属殖民地。如果要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或实现英国官方所说的自治领计划），帝国政府必须亲自出面干涉。英国金融资本家已一再表明，尽管为修建德拉戈阿铁路，1892 年他们曾通过贷款使因缺乏资金而面临停修的铁路得以在 1895 年完工，而且他们已

故意把葡萄牙搞到破产地步,但能对德兰士瓦当局政策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收买葡属德拉戈阿湾。按照 1898 年 8 月 30 日签订的英德协定,当葡人以殖民地为抵押而还不起借款时,若英国获得德拉戈阿湾,则要将北莫桑比克分给德国,而英德协定本来是英国为了拉拢德国不支持德兰士瓦布尔人而答应的贿金。英国签约后又帮助葡人不必以殖民地为担保便在巴黎借到款,实际上英国自己堵塞了获取德拉戈阿湾的道路。这就只剩下战争一条路了。<sup>①</sup>

更为重要的是,金矿开采十几年来,大英帝国在南部非洲的存在和影响,已经同罗得斯一批金融资本家所建立的“矿业帝国”的成功分不开了;也同他在德兰士瓦所培植的“外地人”(Uitlanders)忠诚于帝国的政治势力分不开了。英国政府只能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德兰士瓦问题,以维持和扩大英国在南部非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帝国政府“成为罗得斯的南非联盟和约翰内斯堡(外地人)改革运动的俘虏”。<sup>②</sup>“依附于罗得斯和南非矿业利益并不符合索尔兹伯里内阁的口味”,<sup>③</sup>但这个保守党政府仍然在英国企业于南非获得高额利润、并极其成功地开发南非资源的时候,以发动英布战争来实现罗得斯、罗思柴尔德家族等一批英国金融资本家在非洲的“大帝国”计划,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19 世纪末世界殖民主义史确实进入一个新阶段吗?

#### 四、瓜分非洲的结果

从 1876 年讨论刚果问题的国际会议到 1912 年法占摩洛哥,意占利比亚,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基本告一段落。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和地区均被征服并被吞并为欧洲国家在非洲的 40 多

---

① 前引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 2 卷,上册,第 483—487 页。

②③ Robinson and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人》), London, 1961, p. 459.

个殖民地和保护国,仅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国勉强维持表面的独立。欧洲列强占有非洲殖民地面积和人口见下表<sup>④</sup>:

	面积(万平方公里)	占非洲总面积(%)	人口(万)
英属殖民地	880	29	5 441
法属殖民地	1 090	35.9	3 361
德属殖民地	250	8.2	约 800
比属殖民地	230	7.5	800
意属殖民地	225	7.4	约 130
葡属殖民地	208	6.8	约 50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在非洲殖民地陆续被英、法、南非等国占领:1914年8月英、法军队分别占领多哥的西部和东部,1915年7月英属南非联邦军队占领西南非洲,1916年英、法军队占领喀麦隆,同时英、比军队进占卢旺达、布隆迪。英军占领坦噶尼喀,填补了“开普—开罗计划”的缺口,由此从南至北纵断了非洲大陆。至此,重新瓜分非洲方告完毕。

欧洲列强在30多年间里占领了非洲约2 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近1亿人口。德国在不到10年时间里,竟从一个寸土皆无的非殖民国家成为拥有2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殖民列强,其占有的殖民地比起德国本土面积大6倍。欧洲国家如何统治和开发这块比整个欧洲面积还大1.7倍的广袤土地?

许多地区非洲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欧洲国家在征服和绥靖(pacification)过程中派遣大批欧洲军队或土著军队,以血腥的暴力才建立起殖民统治。西非地区的萨摩里、阿赫马杜、贝汉津,乍得湖地区的拉毕赫和苏丹的马赫迪以及马塔贝莱王国的洛本古拉等,都领导本国或本族人民进行了浴血抗战,成为抵抗殖民侵略的

---

④ 人口统计据麦克伊韦迪和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243—316页,其中西非人口统计据1925年资料。

民族英雄。这些地区在抵抗失败以后,如同19世纪中期的阿尔及利亚一样都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军事统治时期。各地区规模不一、延续时间或长或短的抵抗运动,并非如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是“无理性的挣扎”,它们常常从革故鼎新的思想中吸取力量,因而对历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非洲人丧失主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经过抵抗的。可贵的是,有些非洲人在抵抗殖民侵略中已表现出这样的主权思想:非洲人需要现代化但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sup>①</sup>有些西方学者把非洲人的反抗,说成是“原始的和无理性的”反应,并认为抵抗运动不是一种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说法遭到新近研究成果的驳斥。最近几十年对非洲人民抵抗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从许多含糊不清的事件中辨认出意义重大的抵抗。即使在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无国家的社会(氏族、村社、部落)同样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游击战争。可以说“在欧洲人人侵的每一个地区,实际上都存在抵抗”。<sup>②</sup>

在许多被瓜分的非洲地区,从签约割让到派进殖民官吏,其间往往要相隔很长的时间。初建的殖民政权力量一般弱小,常要派遣远征军予以支持。1894年在马达加斯加岛,1896年和1900年在阿散蒂地区,1897年在乌干达,1888年和1905年在德属东非,1904年在西南非洲,殖民列强都曾火速派出远征军前往镇压。在一些地区修建铁路、公路后,殖民政权统治力量才有所加强。欧洲国家政府不愿派出更多的殖民行政官吏到新占领地区,着眼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因为大部分暂不具备开发条件的非洲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给宗主国提供多少经济利益。宗主国议会经常不批

---

① 莫桑比克的 Makombe Hanga 首长的话的大意引自 Isaacman, *Anti-Colonial in the Zambezi Valley, 1850—1921* (《1850—1921年赞比西河谷的反殖民的能动性》), Berkeley, 1976, pp. 128-129.

② 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38页。

准为非洲殖民地调拨更多的行政款项。1914年以前,即使最富有的英属非洲,往往也要靠英国国库拨款来维持殖民地行政费用预算的平衡。为此,欧洲殖民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于如此广袤的非洲地区应建立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举棋未定,往往走一步看一步。直到卢加德总结出来的“间接统治方式”得到广泛推广为止。南非的黑人地区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地区的殖民占领和征服时间虽比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早得多,但真正的殖民统治制度也是晚到19世纪末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在占领非洲初期(直至1914年)无不怀着极度贪婪的心理,希望自己抢到手的非洲殖民地都能像南非沃特瓦特斯兰德地区一样,“平地挖出个金元宝”,出现第二、第三个“兰德金矿”,迅速成为财源滚滚而来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但是,除极个别殖民地外,并没有出现“兰德金矿”式的资源,因而占领初期许多殖民地的军费、行政费用一般都成为宗主国政府的沉重负担,成为反对党攻击的新目标。

## 五、垄断资本主义与非洲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殖民地主要是由于它需要垄断利润,而殖民地的新作用正是提供垄断利润。垄断利润主要来自非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因为殖民地的“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sup>①</sup>并且能以垄断低价收购原料,垄断高价出售工业品,因而容易获得超额利润;更重要的是由于垄断的关系,不必参加宗主国的利润平均化,因而能为投资的企业提供垄断利润。但应该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非洲的各种垄断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发展到足以放弃直接控制的成熟阶段,因而剥夺主权、超经济强制仍是获得垄断利润的保证手

---

<sup>①</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56页。

段。正是这一反映本质的特点决定了其后 50 年非洲的殖民剥削制度和政治统治制度的基本面貌。

欧洲列强在尽可能最大范围地占领非洲领土后,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从这片基本尚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殖民地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进入非洲的资本不多。用来吸引非洲劳动力并赢得利润的,不是依靠资本作为惟一手段,而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种强制的手段。因此,殖民国家大多采取以下几种带有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掠夺形式:

(一)成立各种租让公司,将大片土地承包给公司。欧洲资本通过殖民实践认识到,在原始的社会关系中,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强制力量征集非洲人劳动力并以残酷无情的措施来驱使和压榨这些劳动力,获得垄断性超额利润,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在刚果自由邦和法属刚果发生的。以残酷暴力征收橡胶、象牙实物税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样发生的,执行武力征税的都是大租让公司。其中一家比利时公司资本只有 4.5 万美元,在 6 年中,竟获得垄断利润 300 多万美元。<sup>①</sup>法国也将法属赤道非洲 665 540 平方公里土地租给 40 个租让公司。这些垄断租让权的公司都以征收实物税获取暴利,有 6 家公司获利 265 万法郎,出口贸易也因而增加 1 倍。<sup>②</sup>刚果地区由于实行这种“利奥波德制度”,人口从入侵到 1919 年减少了 1/2。<sup>③</sup>租让权公司的暴政,由于列强间矛盾

---

① 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 New York, 1947, p. 87.

② Bu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vol. 2, p. 235. 当时欧洲正风行充气的自行车轮胎和汽车轮胎,橡胶需求量激增。约翰·根室在《非洲内幕》中说 1900 年刚果有 2000 万人口,利奥波德统治葬送了 500 万—800 万人口,见下册第 757 页。

③ 见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48 页。关于比属刚果人口的增减有不同说法,据前引《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比属刚果人口从 1900 年 800 万人增加到 1925 年 900 万人,见该书第 296 页。

经媒体暴露颇受谴责。应该指出,租让权公司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方式,反映的是某些国家垄断资本的疯狂的短期行为,是不可能持久的,也未成为主流。

(二)较为普遍的超经济强制表现在使用政权力量强制征发非洲劳动力。它通过多种渠道:1.由效忠殖民政府的首长向各部落、村寨征募黑人劳动力。法属刚果强制征用了 127 250 名强壮的成年劳动力,调去修建刚果一大西洋铁路,因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死亡 14 100 人,平均一根枕木一具尸骨。意属索马里的劳役制主要是给白人雇主分配当地人劳动力,“发展到远远不如奴隶制的地步”,因土著人劳累死了,“雇主只需要求政府再给一个,用不着破费”。<sup>①</sup> 2.由法律规定,非洲人必须服多达几十天的劳役。3.私人资本也靠强制行动,公司采取警察行动,以“合同工”为幌子,强制执行。这些超经济强制手段虽然短期内为殖民当局提供大量无偿的或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但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劳动力供应,而且遭到非洲人越来越强烈的抵制。非洲土地资源丰富,非洲人容易拥有生存的手段。用强制方法迫使非洲人外出做工或服劳役,虽为早期殖民经济奠定基础,但有一定限度,这已为各殖民地早期阶段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财政非常困难所证明。德属东非的强制性做法还引起了 1905 年的“马及马及起义”,震动了非洲。

(三)殖民主义者在最早殖民化的南非找到了用经济手段的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是,1894 年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开始对成年男子征收现金税 10 先令。其后各殖民地纷纷效法,或以茅屋税或以人头税为名,税额 10—28 先令不等。欠税人常被当作刑事犯,罚作劳役;非洲人单方面中止合同也被当作“开小差”,以刑事犯罪处理。于是现金税项目又增加了许多“服劳役犯人”。这种现金税

---

<sup>①</sup> 塞拉扎洛蒂:《关于我们在索马里活动的考察报告》,转引自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114 页。

制既获得行政费用收入,又获得长期劳动力。它首先满足了矿业公司和铁路工地对非洲劳动力的需求。比属刚果的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靠这类现金税征收,每年从农村拉来1万名劳动力,占公司总劳力96%。第二种办法是南非因推行种族歧视制度,一直坚持主要招募流动劳工,招工范围甚至扩大到东非大湖区域。从南非发源的流动劳工制度风行于撒哈拉沙漠以南整个非洲,形成一股巨大的流动的劳工巨流。从此,数以千百万计的非洲流动劳工在大陆上流离迁徙数十年。戴维逊认为,它对殖民前的非洲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破坏作用可能超过殖民统治其它形式的总和。在西非,种植可可、花生、咖啡和其它经济作物的“出口生产区”,吸引了大批内陆地区的流动劳工(他们因多在雨季到来之时出外打工故被称为“雨季工”)。每到农忙季节,非洲人的生产出口作物小农场需要大批短工。数十万流动劳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非洲大陆大规模地流动。流动劳工确实解决了种植园、矿山的劳动力问题,但也产生严重副作用,内陆地区更加贫困化,每况愈下;传染病(肺结核、梅毒等)流行;导致村社、传统文化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旧的结构坍塌了,却没有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因而非洲人社会陷于特别悲惨的境地。

(四)第三种使用经济手段的解决办法是剥夺非洲人土地,以保证白人获得廉价的非洲人劳动力。这也是在南非率先实行。南非荷裔和英裔白人占领非洲人土地,把非洲人限制在狭小的“土著保留地”或“特居地”。南非白人夺走了大部分土地,只给非洲人留下全部土地的8.5%—13%。贫瘠、狭小的保留地养活不了众多日益繁殖的黑人人口,迫使非洲人外出到矿山、白人农场做工或充当对分制佃农、带份地的雇农。尤其在荷裔白人农场主(阿非利卡人)占优势地区,出现了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非洲无产阶级,形成南非一支庞大的流动劳工队伍。1913年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土著土地法》颁布后,非洲人要求收回土地、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形成



了一股巨大的令白人震慑的革命力量。

同样情况,只是程度不同,出现在南、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等英属非洲殖民地,白人移民占据当地大片最好的土地,开辟经济作物种植园,尽管他们占领的是最肥沃土地,但要与非洲人小农业争夺劳动力,仍须依靠殖民政府强制手段的帮助,否则将招不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从其经历中发现农民的生产一般都比(白人)种植园生产更合算……而只需进行小规模试验就足以说服那些想到那里开办可可种植园的(白)人不如避免同土著种植者去竞争”。<sup>①</sup> 尽管这样,肯尼亚因有大批白人移民,当局禁止非洲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以便为白人种植园主提供依赖工资为生的农业工人。<sup>②</sup>南罗得西亚也是如此。

本时期,法国继续在阿尔及利亚侵占非洲人土地。1882年法国政府建立了197个新的移民垦殖区,约有4000户法国移民经营34.7万公顷土地。欧洲移民总数已达30万人以上。非政府组织的移民垦殖区也在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法国已有1/3农业人口移居阿尔及利亚。1903年,葡萄种植面积已扩至16.7万公顷,葡萄酒产量达500万公升。阿尔及利亚被称为法国的“谷仓”和“果园”。

(五)英国总结其在南非和东非的多年经验,在西非的生产领域积极推广非洲人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小农业经济,而在流通领域则严格实行一种由英国垄断公司进行压价收购农产品和高价出售工业消费品的垄断性商业。这种受控制的小农经济一方面既能保证英国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殖民政府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因较受非洲人欢迎,从而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英国枢密院(Privy Council)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剥夺当地人民会激起人

---

<sup>①</sup> 汉考克:《英联邦事务概论》第2卷,转引自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130页。

<sup>②</sup> 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肯尼亚的不发达状况》), London, 1975, p.31.

民的反抗,外国统治者就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经过殖民当局多年的扶持,西非商品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自给性经济”比例越来越小,终于成为占优势的殖民经济,西非成为“小农场主的王国”,他们将自己的小型农业越来越密切地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对于宗主国垄断资本来说,重要的是要将殖民地原料的生产销售完全纳入“出口生产区”的模式,其剪刀差的价格完全由受他们控制的世界市场来决定。这就形成了非洲殖民地经济体系最有影响的一种结构性特征。<sup>①</sup>

(六)大约从 1911 年起,非洲殖民地的银行、商行、公司合并成数目越来越少的垄断组织。它们既控制出口贸易也控制进口贸易,决定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没有任何法令规定这些数额大得惊人的超额利润必须部分投资于当地。英国垄断组织对非洲殖民地经济的控制颇具代表性,也反映了当时法、比等宗主国垄断资本在非洲活动的一般特征。他们都深谙,垄断对于殖民地事业至关重要。在贸易上首先垄断航运:1886 年成立的皇家尼日尔公司和 1895 年成立的西非航运集团开始联营。再垄断商业,由利弗(Lever)兄弟于 1902 年买下尼日尔公司,其后将 37 家公司合并成“联合非洲公司”,完全把持了西非的贸易。而为数众多的非洲中间商(掮客)则完全为他们服务并受其控制。当地已有上百年发展历史的非洲人商业家族如布鲁(Brew)、约翰逊(Johnson)等行商都遭受排挤、摧残,无法生存下去,其后代只好去充当外资的雇员。

法属殖民地情况基本相同。新崛起的“三大公司”——法国西非公司、西非商业公司和尼日尔公司,以塞内加尔银行等为后盾,凶狠地消灭了 500 家非洲人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小公司和 300 个当地法国人组成的贸易商行。这些在塞内加尔本地兴起的非洲人商业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末以前是被允许发展的,他们的存在有利

<sup>①</sup> 前引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131 页。

于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法国政策发生大转弯,上述商号便全被宗主国的公司所取代。<sup>①</sup>它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从此非洲人无法加强旧的商业联系,更难以发展有利于非洲人的新的经济联系。摩洛哥有许多具有几个世纪商业经营史的精明的商人家族,潜力很大,本来在 20 世纪马格里布开放的条件下有很大发展的可能,却敌不过拥有殖民特权的法国金融资本,只能在宗主国殖民经济边缘苟延残喘。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实行垄断一切的政策,对刚果当地斯瓦希里商人则以“结束奴隶贸易”为幌子,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进出口贸易完全掌握在宗主国垄断资本公司手中。

(七)垄断资本公司通过收购政策迫使许多殖民地只种植一种至多两三种经济作物,如黄金海岸只产可可,塞内加尔、冈比亚只种花生,苏丹只种棉花,坦噶尼喀只产咖啡和西沙尔麻等。通过单一种植制把各殖民地纳入国际经济轨道。种植单一作物,一般都不生产粮食,须以高价购买进口粮食。单一种植和经济上过分依赖宗主国使非洲许多殖民地在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遭到灾难性打击或遭受严重损失。研究者普遍的看法是,它“破坏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状况”。<sup>②</sup>如塞拉利昂“经济完全崩溃”。<sup>③</sup>埃及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sup>④</sup>由于许多殖民地只种植一种或两种经济作物,完全用于出口,经济危机中这些出口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暴跌,棉花、西沙尔麻下跌了 67.9%,可可、咖

---

① 阿明:《1820—1900 年法国殖民当局对塞内加尔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见 Meilla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Oxford, 1971, p. 362.

② 科凯丽—维德罗维奇:《黑非洲的依附状态:1800—1970 年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见前引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142 页。

③④ 考克斯—乔治:《西非的财政与发展:塞拉利昂的经验》,法蒂基奥特斯:《埃及现代史》,均前引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143 页。

啡下跌 70.9%，而殖民地又没有别的产品可以出口，因而进出口贸易额剧减，见下表：<sup>④</sup>

	1929 年进出口 贸易额	1931 年进出口 贸易额	降低百分比
4 个英属西非殖民地	5 600 万英镑	2 900 万英镑	49%
6 个英属东非殖民地	4 000 万英镑	2 100 万英镑	48%
12 个法属西非和赤道 非洲殖民地(包括多 哥、喀麦隆)	3 000 万英镑	1 800 万英镑	40%
埃及	10 769 万英镑	5 554 万英镑(1933 年)	49%

宗主国普遍采取损人利己的措施，以牺牲殖民地经济来减轻母国的损失，因而殖民地原料价格下跌要比宗主国出口的工业品价格跌落程度大得多。转嫁危机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并更加拧紧控制非洲殖民地经济的螺钉。英国工党政治家贝文(E. O. Bevin)1930 年提出责问：“难道不应该适当控制坦噶尼喀煤矿发展吗？”英国人普遍认为如果殖民地不能为母国而牺牲自己，那还要殖民地干什么呢？

随着经济危机时间拖长，宗主国资本家和殖民政府对非洲殖民地采取越来越厉害的转嫁危机的手法：对农作物杀价收购，一再提高口粮售价，裁减工人，降低工资，抬高工业品售价，部分地区恢复强制手段，停止基建项目等等。结果，农民收入锐减，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大批非洲小商破产，雇佣工人减少一半，许多流动劳工被迫返回农村，瘐死于保留地。30 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的强制性国际分工对非洲殖民地的严重祸害。

另一方面，国际资本从经济危机暴露的严重问题中看到，拥有

<sup>④</sup> 资料来源：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143—144 页；巴拉维和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236 页。

3000 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非洲经济的脆弱性；非洲殖民地能够帮助宗主国减轻危机所造成的损害的能力同它所拥有的资源潜力和廉价劳动力是很不相称的；这块庞大殖民地远远不能适应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能适应宗主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对非洲作为巨大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需求。非洲太穷，购买力太低，市场容量太小。这种状况本来是宗主国对非洲施行的金融政策的自然结果。因为依照这种金融政策，非洲殖民地外汇收入须存入宗主国首都，从而把殖民地的资产冻结在宗主国而不能兑现，不能用来投资殖民地。金融资本开设在殖民地的银行都把非洲人的储蓄存款汇回宗主国，而在贷款方面又对非洲人实行歧视政策。这就造成极不合理的状况：非洲人的钱不能充分用来投资非洲事业。经过这场危机，情况稍有些松动。还在危机期间就出现新苗头：殖民主义列强的垄断资本一方面全力增加非洲生产，一方面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因而在危机结束后，逐渐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电话等的资本投入和实施初步的技术引进，开始形成资本向加工业和轻工业制造部门转移的局面。例如英国在 1939 年开始拟定《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每年向殖民地提供 500 万英镑。非洲大部分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是在 30 年代及其后完成和修建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趋向，它促进了货物运输、经济交流和人员流动，也削弱了一些地区的狭隘地方主义和部族主义。但其中一些措施如建立加工业和轻工业（塞内加尔的榨油加工业、坦噶尼喀的制绳业）受到宗主国一些制造商的强烈反对，经历了异常曲折的道路，使非洲殖民经济迟迟未能进入一个新阶段。

## 六、对殖民地主权的剥夺——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

殖民统治最本质的问题是对殖民地国家主权的剥夺。无论是间接统治制度或是直接统治制度，主权剥夺都是必然的、无一例外

的。不论从非洲国家身上剥夺主权和从国王、酋长身上转移治权，是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剥夺主权都是殖民统治建立的前提。主权剥夺意味着被剥夺的国家从此不再具有单独的国家资格或主权，不能派遣或接受外交使节，不能与其它主权国缔结条约。主权剥夺在殖民化过程中是最早发生的，一旦缔结从属条约或军事征服完成，殖民地的主权便被完全剥夺。在非洲，治权的转移和演变经历了若干阶段，并且具有多种形式。

(一)在占领初期，治权一般掌握在租借公司手中，如南、北罗得西亚的英国南非公司、北尼日利亚的皇家尼日尔公司，刚果的加丹加公司等。因此，非洲殖民政权(治权的行使)一开始就是为特权公司的经济掠夺服务的。殖民政治制度的建立具有明显的特色。卢加德在《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一书中曾披露一个值得注意的中心思想：“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制度的基础”。<sup>①</sup>税收促使殖民政权的建立，税收制度促进殖民官僚政权的发展。非洲殖民地税收的第一种形式——劳役税(包括采集税、养路税等)，是欧洲垄断特权公司为强征非洲人劳力而采取的一种超经济强制手段，也是刚具雏形的殖民政权在非洲人面前赤裸裸地显露出的狰狞面目。从利奥波德二世手中获得承包权的比利时特权公司，征募非洲人当兵，竟以砍手为惩罚手段，向当地人征实物税(橡胶、象牙)。德国人在东非使用操斯瓦希里语的原当地官吏akidas(阿基达)来征税和征募劳力也以残暴闻名。葡萄牙人使用传统的“庞贝罗”(混血种人)充当爪牙十分凶恶。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在北尼日利亚其权力所及的地区，则巧妙地利用穆斯林酋长和当地人组成的军警来征税和治理一切。早期的特权公司掌握治权一般都弄得声名狼藉，遭到非洲人强烈的反抗。横征暴敛的结

---

<sup>①</sup>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 London, 1929, p. 201.

果,当地税收很快就不仅足够维持由非洲人组成的军队和警察,甚至足够负担由欧洲派来的行政人员。由此,列强政府陆续从特权公司手中接管治权,建立起正式的殖民统治制度。1900年英国政府从尼日尔皇家公司手中接管了北尼日利亚。1908年比利时政府从利奥波德二世私人手中接管了刚果。

(二)接管特权公司治权后,有的殖民国家采取间接统治方式,有的采取直接统治方式。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形式?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过去有几种关于施行间接统治的流行解释:1. 殖民地存在着较完整的传统的行政、司法制度,而土著统治阶级又愿意同殖民当局合作;2. 宗主国在这些殖民地不存在重大经济利益,无须实行严密统治;3. 在征服、占领时期非洲人进行过激烈的反抗,间接统治可避免初期殖民地的严重混乱局面;4. 可以节省行政开支,省钱。至于二者的主要差别方面则往往强调两种制度对待酋长、土王的不同态度。应该承认,这些说法是有部分道理的,就某些地区而言,可能某一方面的道理更充分些。然而不足之处是,在对列强殖民统治政策的研究中,忽视了其中的文化政策和种族政策对这两种统治方式的重大作用。

为什么英国在非洲殖民地较多采取间接统治方式?还需要从另外两方面深入研究。其一,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间接统治方式是比较接近英国19世纪大半个世纪所实行的“无形帝国”政策(*informal empire*)的。19世纪末英国失去作为“世界工场”的头等强国的优势,被迫停止“世界自由贸易”政策,转而执行其它列强奉行的帝国主义垄断政策。为此,持现实主义态度的英国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在“大英帝国”拥有的这个仍属世界最大的势力范围内,如何为英国获取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而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历史经验来看,间接统治方式便于同英国以往的政策和利益相衔接。鉴于宗主国对间接统治的殖民地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比以往的 *paramountcy* 更进一步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因而可以

确保无虞地保证英国公司、企业在英属殖民地的垄断利益。其二，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是英国的传统做法。英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在英属殖民地对非白人种族实行“同化”政策。英国要实现的是，把所有的殖民地牢牢地捆绑在“大英帝国”战车上，以获取英国的最大利益。英国与法国不同，从来没有设想通过“同化”政策将非洲人“同化”为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比起其他欧洲殖民列强，英国对英属非洲殖民地的“英语教育”是不关心的，而对教学上和行政上使用“土著语言”倒是持较为宽容态度，如在北尼日利亚使用豪萨语，在东非使用斯瓦希里语。英国认为它通过英语教学所需要培养的，只是少数能为英国忠实服务的亲英派和行政人员或一批有效率的中间商。1920年以后，间接统治制度推广到南尼日利亚、黄金海岸（阿散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在所有英属殖民地，有一批顺服的酋长和可靠的头人建立了“非洲人政府”。它使英国在有4000万居民的尼日利亚，只需派驻386名英国政务官员和1663名行政人员。其它英属西非殖民地，英国派驻官员比例也很小。“非洲人政府”一般是在埃米尔国、素丹国或酋长国，都设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预算制度（全部税收约50%上缴殖民地的英国中央政府）。下级官吏均由埃米尔、素丹在自己亲属或亲信中任命，如查利亚埃米尔国，206名行政人员中有120名是埃米尔的亲属。<sup>①</sup>这一制度在稳固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带来极端保守、坚持封建制度、阻碍改革的倾向，使得这种制度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越来越格格不入。

（三）英国政府在有白人移民定居的非洲殖民地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不管白人殖民者仅在殖民地居民中占很小比例，英国在

---

<sup>①</sup> M.G. 史密斯：《查利亚省豪萨族村社的经济状况。对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见普里贝特科夫斯基：《尼日利亚为独立而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20页。



这些地区包括西非一些沿海地带,都实行直接统治。凡是白人移民极少或没有移民的地方,英国在理论上可以让受过欧洲教育的非洲人担任某些高级行政职务,如黄金海岸的海岸角市,但非洲人与英国人之间保持 28:481 的悬殊比例。根深蒂固的“非洲人天生低白人一等”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确保英国人居于最高统治地位,长期阻碍着非洲人比例的提高。凡是白人移民较多的地区如南非、南罗得西亚、肯尼亚,<sup>①</sup> 英国的政策是让白人取得或逐步取得最高权力的地位,而不给非洲人任何权力。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荷裔白人)在 1909 年炮制的《南非联邦宪法》满足了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的要求,基本剥夺了几百万非洲人的选举权利。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羡慕并效法南非白人,极力夺取定居国的最高权力地位。白人移民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当他们听到关于坦噶尼喀委任统治地的非洲人最终应获得一些政治权力的建议时都暴跳如雷,<sup>②</sup> 坚持主张“肯尼亚的非洲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享有任何政治权利”。<sup>③</sup> 在白人移民定居区,设有由白人男人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和内阁。开普殖民地 1931 年开始允许白人妇女享有投票权。完全掌握政权的(南非)和部分掌握政权的(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利用其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和巩固他们在非洲的土地、矿产资源和畜群以及其它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1935 年这股约有 360 万定居非洲的白人移民,有殖民主义政权为后盾,其能量要比他们在非洲居民的比

---

① 1921 年欧洲人口数目,南非联邦为 142 万人,南罗得西亚为 3.4 万人,肯尼亚为 1 万人。

② 从国际法上看,前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在一战后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只是国联交给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③ 卡梅伦:《我在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的工作》,转引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96 页。

例(约占 2.5%)<sup>①</sup> 大得多。他们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对非洲殖民主义史的影响都极大,构成非洲现代历史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因素。英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60 年代抛出东非联邦的政治蓝图和成立中非联邦,其政治意图就是要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永远保持白人移民在英属非洲的最高权力地位。

(四)法国在非洲实行直接统治制度是受它的以“同化”为中心的殖民理论指导的。这种理论打着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牌子,把种族主义巧妙地掩盖起来,声称凡殖民地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法兰西民族,或法兰西社会的成员。法国在非洲殖民地各级学校中坚持法语教育,认为法语是通向法兰西文明的惟一途径。1935 年法属西非,学法语的小学生人数达到 6.3 万人。按“同化”理论,非洲社会的传统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均在摒弃之列。法国殖民当局并非(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不使用“土著酋长”。相反,它大批地任命酋长,把他们作为法国的官员来使用,把他们镶嵌在严密有序的法国殖民行政系统中。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法属西非,法国只任命 118 名法国人当行政区长官,通过 2 206 名法国区长或部落酋长,48 049 名非洲人村长来治理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不言而喻,法属殖民地最高权力和次一级权力都集中在由法国人或拥有法国籍的人担任的各级总督和行政长官手中。但在理论上,法国强调这种统治方式执行的是一种联合政策,“间接治理”;而实际上只有在摩洛哥一个殖民地,法国才推行同卢加德的间接统治方式十分相似的统治方式。至于在热带非洲摧毁传统政治制度后保存下来的酋长,正如法属西非总督沃朗奥旺所说:他们“并无自己的权力,只有‘治理区’的(法国)司令才能统帅一切……,土著酋长仅是一种工具,一

---

<sup>①</sup> 20 世纪 30 年代全非洲居民人口按 1.4 亿计算。

种辅助物”。<sup>①</sup> 法国开办各种学校,使用法语,训练酋长和酋长子弟,让他们学习法国文化和熟悉法国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从小受法国文化的熏陶,成为忠于法国的基层官员。法国殖民理论与英国不同,其实践的目标是,所有法国殖民地最终只能成为法国的行政区(或海外省),而不是自治领。在实施“同化”过程中,法国不容许任何自治思想存在,并排除任何脱离法兰西帝国独立发展成国家的可能性。

然而,“同化”在法属非洲殖民地只是一种幻想。法国在塞内加尔沿海设立的四个“同化”样板区,从 19 世纪上半叶起经过近百年的“同化”,到 1926 年,塞内加尔 135.8 万人口中只有 48 973 人获得法国公民权,仅占人口的 3%,这是所有法国殖民地中“同化”比例最高的“样板”;在法属西非 1349.9 万总人口中,只有 97 707 人获得法国公民权,仅占人口的 0.7%;在法属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同化”的比例更小得多。

在“同化”政策光环之下,法国人和欧洲移民几乎可以不加任何限制地定居于法属非洲、葡属非洲和比属非洲各殖民地,白人移民人数在 20 世纪上半叶增长甚快,见下表<sup>②</sup>:

	1921 年	1935—1936 年	1946 年	50 年代中期
阿尔及利亚	791 000	946 000	1 040 000	1 200 000
摩洛哥	81 000	203 000	293 000	400 000
突尼斯	156 000	213 000	239 000	250 000
法属西非	8 000	25 000	32 000	82 000
马达加斯加	17 000	25 000	28 000	60 000
比属刚果	7 000	20 000	50 000(1948 年)	93 000
安哥拉			44 000(1940 年)	110 000
莫桑比克			31 000(1945 年)	68 000

① 前引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 7 卷,第 262 页。

② 韩顿:《非洲的命运》,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第 20 页。

老殖民主义葡萄牙也搞“同化”政策。葡萄牙的“同化”政策与法国基本一样，将葡属殖民地当作“海外省”，被“同化”的非洲人占人口均不到1%，而99%以上的非洲人遭到最粗暴的歧视。<sup>①</sup>比利时政府统治的刚果由于是从被国际舆论谴责为“恐怖统治”的利奥波德二世手中接管政权，因而不敢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给予比利时移民以政治特权地位，但它对非洲人实行最严厉的家长式统治。德国人对非洲人采取“普鲁士式”的集权主义统治，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它在还不真正了解非洲殖民地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短暂的殖民统治。意大利向往“罗马帝国式殖民”，它在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都力图建立有意大利人定居的殖民地，而且坚持移民住地必须飘扬意大利的国旗。

实行“同化”政策的非洲殖民地，由白人移民独掌政权或与殖民政府分享政权的非洲殖民地，均有一共同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顽固地坚持抗拒“非殖民化”的建议。这些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实现要比一般非洲殖民地更加艰难、曲折，往往要通过当地非洲人的武器批判。这正是由非洲殖民地化过程中形成的定居白人移民“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

(五)殖民统治无论采取间接、直接形式或“同化”形式，都造成表面稳定下各殖民地部族矛盾的深化。

1. 欧洲殖民列强按瓜分非洲时的力量对比和列强外交的“交易”，任意划分殖民地边界，使非洲不少部落联盟、雏形国家、酋长国、王国被完全打散，回归到氏族部落状态。这种一盘散沙状态进一步阻碍了非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进程，实际上使居住在这些区域的黑人重新部落化。

2. 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在征服黑非洲过程中，往往

---

① 参阅戴维逊：《非洲的觉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02—220页。

使用不同部族的黑人雇佣军去征服非洲各地区。当不同部族的黑面孔士兵冲进一个被征服的地区，“部族感情”的阴影就长期地停留在这个地区。这种“非洲人打非洲人”的策略极度恶化了部族间关系，后患无穷。到了“绥靖”时期，殖民征服者又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来驾驭和控制各个部族，如给予某个部族一些特权，挑唆其敌视或反对另一个对殖民政权不驯服的部族，以迫使所有部族都屈服于宗主国。殖民当局玩弄和利用部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冲淡白人和黑人间的种族矛盾，转移被统治者反抗的视线和目标。

3. 各国殖民当局为了统治的稳定，在利用部族矛盾和玩弄平衡把戏中，总是小心翼翼地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不令其发展成为部落战争；一旦发生了战争总是迅速动用殖民军队予以扑灭。殖民统治者的这些举措，虽然暂时掩盖了部族矛盾，但并未根本改变部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冲突。在整个殖民时期共同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一时转移了部族冲突的视线。然而，在这一时期被深化了的部族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积蓄了矛盾伺机爆发的力量。殖民政权执行的“亲一派压一派”的策略，提拔一些部族成员或酋长作为殖民政权机构的基层行政官员，去“管理”另一些部族群众的做法（在直接统治的法属地区和间接统治的英属地区如伊博人居住区都有类似现象），从政治阵线上分裂了非洲人，人为地制造众多部族对“亲西方部族”的隔阂和敌视，埋下了独立后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 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殖民主义

非洲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起的作用和所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交战双方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包括前宗主国）都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遭受 30 年代初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世界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复原，就而面临着 1939 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局面。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发

生的深刻变化表明,非洲大陆的生产体系帮助了殖民大国摆脱困境,而非洲新形成的生产力则继续促进了殖民大国经济的康复。如何准确估价非洲经济在促使世界资本主义逐步恢复生机中的作用,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二战期间由于欧洲许多富含矿藏的国家被德国占领,东南亚盛产原料的国家被日本占领,非洲的矿业和农业原料对反法西斯盟国更显重要。英国从欧洲大陆进口矿石基本中断。1944—1945年英国工业所需的进口原料按以下比例全靠非洲供应:铁矿 54.5%、锰矿 96.8%、铬 94%、铜 72.7%、锡 54.5%、铅 90.8%。非洲矿业原料对英国战时工业起了极大的作用。法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原料大部分也运往英国。非洲农业原料成为英国食品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进口的农业原料按以下比例均靠非洲供应:棕榈仁 100%、咖啡 90.7%、可可 98%、花生 48.4%、棉花 40%。其它原料如西沙尔麻、橡胶、木材、羊毛等亦大批靠非洲供应。

美国军事工业的战略原料相当大部分靠非洲供应,特别是核原料主要靠非洲供应。在进口原料中,铀铁矿 100%、钽矿 85.6%、锰矿 43.8%、铬矿 55%、金刚石矿 95.1%、铜矿 21.9%均由非洲提供。1940年从比属刚果运走 1 071 吨铀砂,1943年为 8 287吨铀砂,1945年为 9 967 吨铀砂。刚果铀矿占了世界所需铀的绝大部分。美国不是非洲的殖民国家,在非洲没有寸土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利用比利时、英国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对自己的依赖,获取了从比属刚果向美国输出所产铀砂和其它稀有金属的权利。依据 1942 年签订、1944 年批准的协定,美国有权按极优惠条件采购比属刚果所产铀砂 75%,其余由英国采购,但协定一生效英国就被迫将自己份额让给美国。后来比利时政府要求有与美国人共同参加管理自己殖民地的铀矿并把一部分铀从刚果输往比利时的权利,美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类似例子说明,美国依靠其经济实力和逐渐发达的跨国公司系统,已经在非洲发展了多种新

的榨取形式,使直接的政治统治成为没有多大必要了。美国据此制定其对非政策。而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对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直接的政治统治对维持和发展各种经济榨取形式,将越来越显得没有必要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成为战后美国同英法等国家在对待非洲的殖民主义问题上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非洲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详见第 17 章),然而非洲经济并未改变其畸形的殖民主义性质,没有改变“中心—外围”的从属、依附的结构。战时欧洲宗主国更进一步以超经济力量使非洲经济从属于宗主国的各种需求。原来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非洲采矿业,由于战争需求而突飞猛进地发展。<sup>①</sup>殖民地化以来一直得不到发展,甚至禁止发展的制造业如轻工业,由于欧洲商品供应的中断和战争需求而得到一些发展,纺织业、缝纫业、靴鞋业、制造业和各种食品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尼日利亚新建几十家制糖厂,南非、埃及的工厂供应军队大批布匹、罐头。个别重工业也因军事需要有所发展,1944 年全非煤产量达 2 600 万吨,比 1938 年增加 50%,发电量据南非、比属刚果、阿尔及利亚等 16 个地区统计,由 1938 年的 68.36 亿度增至 1945 年的 98.47 亿度。南非钢产量从 1938 年 30 万吨增至 1944 年 53.6 万吨。由于这些工业品产量的增长,在一些著作中出现了非洲“工业化”的夸张说法。除南非外,这种论述是没有根据的。战时非洲工业发展十分有限,“工业化”无从谈起。只需指出一点:非洲几乎没有任何机器制造业,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农业比例远远大于工业。马克思所讲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中的“建设性使命”,在非洲还只能说初露

---

① B. Dumett, *Africa's Strategic Mineral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矿产》),载 *Journal History of Africa*, J. H. A. ((《非洲历史杂志》)vol. 26. 1985.

端倪。

战时和战后初期非洲工矿业、农业和商业的较明显发展引起了非洲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性特征的变化对战后殖民主义制度的演变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原是工业极端落后的比属刚果、法属西非、肯尼亚、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坦噶尼喀和埃及 7 个地区雇佣工人人数从 1937 年的 231 万人增至 1947 年 352 万人,增加了 52%。<sup>①</sup> 南非仅工业中的黑人工人增至 30 万人,尼日利亚工人增至 25 万人。全非洲固定工人增长,流动工人相对减少。技术工人、半熟练工人明显增加。工会数量相应增加,工人联合程度显著提高。战争期间,不仅定居非洲的欧裔资产阶级地位加强,他们同宗主国的联系削弱,而且非洲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破土而出,表现在商业资产阶级(尤其在西非)和农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人数明显增加,资本积累增多。因战争的特殊环境,一些宗主国政府允许非洲人小工业企业有所发展,因而产生了不少小型的手工业主和使用简陋机器的小工厂主,特别是在食品工业。到 1954 年,比属刚果的非洲人小企业已有 1778 个。<sup>②</sup> 1945 年尼日利亚有 162 个小糖厂,都是非洲人创办的。尼日利亚还建立了几家民族资本的银行和贸易公司,有的资本在 100 万英镑以上。到 1941 年法属塞内加尔也建立十几个小型榨油厂,加工本地出产的花生。

在这期间,许多非洲殖民地中、小学校数量增加较多。1935 年法属非洲小学生人数为 6.3 万人,到 1945 年超过 9.4 万人。1948 年非洲人中学生为 1938 年的 4 倍。战后 10 年(1946—1956)法属西非学生人数增加 300%,同英属西非不相上下。高校学生人数增长更引人注目。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院 1948 年升格

---

① 施皮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② 马尔丁诺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68页。



为综合性大学,当年190名非洲学生获得学士学位。1950年北非五国(马格里布、埃及、利比亚等)高校学生人数达40468人,10年后增至122570人。热带非洲高校学生同一时期增长5倍,由2270人增至此3620人。赴欧留学的非洲学生增长更快,1939年留英非洲学生仅400人,到1955年增至3000人,另有400人以上留美。到1961—1962年热带非洲留学生猛增到12863人,北非5国留学生增至11017人。在非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绝大多数是反对殖民主义制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非洲人的思想和心态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把几千万非洲人拖进了世界历史,有的投入战场,有的被运送到欧洲和亚洲,有的到了邻国,但更大部分人拥入了城市。非洲人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对宗主国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大多数非洲人相信欧洲人拥有先进的经济和军事技术,高人一等,宗主国是不可战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殖民主义的种种神话。非洲最大的殖民强国法国和最小的殖民列强比利时都在战场上溃败,屈膝投降;意大利殖民帝国不复存在。法属殖民地非洲人看到宗主国一分为二:自由法国与维希法国在他们面前互相攻讦、内战不休,使白人殖民者的威望在非洲人眼里扫地以尽。近百万英国驻非部队同当地非洲人频繁交往。这些英国普通士兵与下级军官不是作为殖民军队来到非洲,他们对待非洲人的态度同英国殖民官员、商人迥然不同,而非洲士兵作为盟军一员在宗主国的欧洲同白人交往,也同他们在殖民地故乡的遭遇迥然不同。津巴布韦民族运动领袖西索尔在《非洲民族主义》一书中说了一段颇能反映战时非洲人心态的话:“与非洲士兵外出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姑娘,对维护白人的神话没有什么帮助。非洲士兵发现自己在前线只有一个目的:击毙每一个他们所能遇到的白人敌兵。非洲士兵看到成千上万白人士兵受伤呻吟,垂死挣扎,最终死去。炮弹在黑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同它在白人身上

一样。在战场耗了4年时间杀戮白人敌兵后,非洲人再不把白人当作神了”。<sup>①</sup>从贩卖黑人奴隶时代开始给非洲人加上的心理负担开始松动了,这对于非洲人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心态影响。白人殖民者永远是非洲主人的神话出现裂隙了。非洲士兵在部队时生活于较开放的环境中,接触了欧洲人、亚洲人,见到了主权完整国家的自由状况,产生了政治自主和民族独立的意识。一位尼日利亚士兵1945年从独立情绪激昂的印度写信回国,反映了100万以上参战非洲士兵的愿望,他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所求”。<sup>②</sup>这一信号准确地反映出非洲人的愿望。

统治非洲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殖民政策与非洲人的独立愿望无异天悬地隔。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宣告:“将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总的主权和自治有横遭剥夺者,两国欲设法予以恢复”。<sup>③</sup>非洲各殖民地人民从字面上将这个庄严允诺理解为在他们支持并为之流血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们的国家将取得独立,恢复被“横遭剥夺”的主权,战后的非洲将展示“一个美好未来局面”。因此,《大西洋宪章》在非洲各殖民地激起了极大的热情,被认为是一篇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宣言。非洲知识分子更加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造成一种新的世界局势,使非洲人争取自治和独立的努力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希望。

非洲殖民地人民对战后将获得自治和独立的憧憬,很快就遭

---

① Sithole, *African Nationalism* (《非洲民族主义》), London, 1968, pp. 157-159.

② 前引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226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第337—338页。

到英国首相兜头一盆凉水。1942年他在回答英国殖民地提出的独立要求时宣称：“请让我解释一下……我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消亡而担任英王陛下的首相的”。<sup>①</sup>法国同样露骨地表示，法兰西打算在非洲保持其殖民政权，惟一不同的是将非洲各殖民地的“臣民”变为“公民”。1944年在非洲召开的布拉柴维尔殖民地会议上，戴高乐政府的殖民部长针对一种“这场战争必定会以称之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而告结束”的说法，明确地宣称：“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更大的法国内部，没有待解放的民族，只有自认为是法国人的居民”。会议宣告：“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权的可能性，甚至在很远的将来建立，也是必须予以否认的”。<sup>②</sup>根本不承认法属非洲殖民地存在着独立的问题，黑民族存在着解放的问题。葡、比等殖民国家也依此定调，宣称只存在所谓“海外省”，企图把“殖民地独立问题”一笔勾销。在这样的殖民政策指导下，战时欧洲各宗主国在非洲原封不动地维持殖民主义制度，不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由此可见，在二次大战中欧洲各殖民地宗主国的殖民政策和殖民地当局对待非洲人的态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实质上 and 主观上都是将非洲大陆当作理所当然应为宗主国的战争服务的殖民地来对待，基本上仍然是“中心”对待“外围”式的严加控制、剥削掠夺和无耻利用。与和平时期不同的，只是将非洲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在战争时期行使无限主权的“后方基地”而已。在对待非洲各殖民地的基本态度上，欧洲宗主国——英国、自由法国、维希法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德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没有本质不同。只是依其在战争时期的地位，力量对比的不同而在实用主义表现

---

① The Times(《泰晤士报》)1942年11月11日。

② 《非洲会议。布拉柴维尔(1944年1月30日至2月8日)》(La Conférence Africaine Brazaville)，转引自斯科罗夫：《法帝国主义在西非》，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53页。

方面各有特色。维希法国仿效法西斯德国在北非和西非大肆宣扬种族主义。自由法国在本土沦陷后则“低姿态”地在法属非洲各殖民地甜言蜜语地进行拉拢。比利时亡国之后则把刚果暂时“卖给”英国和美国，大慷他人(刚果人)之慨。英国手段老到，变换各种手法，将战时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作为战后殖民地待遇的惟一标准，迫使或诱使非洲殖民地人民倾己国之所有来支持宗主国。美国作为一个新来者，充分享受各宗主国的待遇，发展了许多新的经济榨取形式，在政治方面另有新招，准备填补真空。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非洲殖民地还产生另一深远的影响，就是大战末期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新体系——雅尔塔体系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旧殖民主义体系将要寿终正寝。由此，国际政治中长期盛行的剥夺殖民地国家独立的露骨的殖民主义，逐渐蜕变为形式复杂多样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不同于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允许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主权独立的地位，却实行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强权政治。应该指出，殖民主义落花流水，霸权主义主宰世界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新发展及其特点在政治方面的一种体现。那么，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它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场所”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呢？让我们首先从战后宗主国和发达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经济活动的新特点来审视这一问题。

##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 非洲殖民主义

### 一、宗主国在非洲殖民地经济活动的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乎所有在非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

宗主国都打算在非洲大干一场。六年的战争补给生产使欧美列强确信非洲资源丰富,特别是拥有像铀这样头等重要的资源。东欧已脱离资本主义阵营。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西欧资本主义更需要非洲助其恢复生机。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腥风血雨的洗礼,非洲人的觉醒在各方面都显现出来了,欧洲殖民主义需要为自己丑恶的躯体披上新的外衣。新上台的英国工党首先在其纲领中宣告:“大英帝国与所属的殖民地已结成伙伴关系”。“援助一发展”的口号高唱入云。法国也需要非洲殖民地在重建“伟大法兰西”中发挥作用。1946年法国建立了用来满足殖民地需要的投资基金,为法属西非筹措了2700亿法郎。美国从非洲的铀矿开采开始,对非洲未来的设想要比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深远而现实得多。一项又一项计划,包括福特基金、“第四点”计划及类似计划接连抛出,大批资金以各种形式投到非洲。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如果说战前对非洲殖民地的投资是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为主,那么,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便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投资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欧洲一些殖民主义国家政府拥有巨额资产。战后法国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0%,国家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0%。英国的国有企业在采煤、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电讯7个部门占100%,在钢铁业、航空业占75%。国有成份在金融信贷领域中所占比例更大。国家的支持成为私人垄断资本对外经济扩张不可缺少的条件。国家常和私人垄断资本密切结合,向殖民地投资,进行经济扩张。

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

(一)英、法等欧洲宗主国大力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英、法两国在二战中从非洲得到巨大的利益。战争期间在非洲大

力组织的经济农作物和矿产资源的大规模生产,给英、法提供了极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出口美国,也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利益。战后,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英法两国都希望通过非洲的开发,渡过难关:增加帝国的经济收入,开辟非洲殖民地巨大市场,弥补国际收入的逆差。特别是非洲拥有美国所严重缺乏的一些矿产资源,可大批出口美国,换取美元。1948年英国商务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在下院宣称,他赞同议员们这样的主张:“开发非洲和其它落后地区是改善(英国)国际收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sup>①</sup> 1945年英国提出《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计划10年内投入1.2亿英镑用于殖民地的发展。<sup>②</sup>重点放在非洲,10年中5465万英镑将分配到非洲各殖民地。<sup>③</sup>非洲被认为是继美洲和印度之后的“英国的第三帝国”。法属非洲战后发展计划大部是法国的国家资本,在大约相同时间内用在发展上的经费达2.77亿英镑(11.08亿美元)。这些项目均属国家垄断资本。英国成立了拥有巨额国家垄断资本的“殖民地开发公司”(资本1.78亿英镑)和“海外食品公司”(资本5500万英镑)。为了开发原料生产,殖民政府在非洲殖民地修建了一些基础设施:港口、码头、道路、桥梁等;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设立非洲学生到欧洲学习的留学生基金。应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后殖民地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英属殖民地矿业、制造业和农业的产值及出口贸易增长最为显著。50年代初英属尼日利亚的棕榈油产量比战前增加15倍,花生增加9倍,可可增加5倍,棉花增加4倍,煤产量增加37倍。出口贸易额从1939年的870万英镑增至1953年的1.253亿英镑,增加了13

---

①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198页。

②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 8, 1984, p. 25.

③ 李安山:《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政策与殖民撤退》,载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倍。黄金海岸的黄金出口总值4年内增加55%。南罗得西亚制造业战后7年增加1倍。<sup>①</sup>非洲几座著名水电站：金贾、卡里巴、阿卡松、弗里亚、金波均建于此时，为北罗得西亚的炼铜工业，黄金海岸和几内亚的炼铝工业提供了电力。当然，应该看到，英国银行存有大笔英属殖民地的英镑结存，“冻结”在伦敦未予支付。1952年，这笔结存总数高达10亿多英镑，仅黄金海岸结存就达2.13亿英镑，实际上等于殖民地被迫向英国支付的巨额“贷款”。比起这笔巨额“贷款”，英国的“开发和福利基金”实在微乎其微，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殖民政府可以从结存中按比例提取存款，资助发展计划。

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国家借贷资本输出形式，不仅在实现全球战略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而且在控制重点地区、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方面也卓有成效。这给陷于殖民体系危机中的欧洲国家以重要启示：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政治控制，宗主国仍可以在前殖民地保持和取得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二)跨国公司不仅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而且在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中都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二战前宗主国金融资本通过垄断地占有殖民地而控制殖民地的生产过程；二战后（至少在战前一、二十年内）除继续保有这种控制方式外，又增加了同样有力的新途径：宗主国通过跨国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支配殖民地的全部再生产过程。并形成了与跨国公司有关的三种关系网：产业资本从属关系网，借贷资本从属关系网和国际贸易网。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资本输出，在非洲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全股权

---

<sup>①</sup>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或部分股权的子公司。它们直接在非洲设厂、建立银行,获利极大:第一,就地剥削非洲廉价劳动力;第二,可将机器设备、技术投资作价入股,向非洲推销陈旧、过剩的机器设备,或过时的低技术;第三,子公司可用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非洲工业原料和农产品或初级加工产品;第四,母公司往往能通过多种办法取得对它在非洲设立的仅占少数股权的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第五,“宗主国的垄断基础……正在转移到技术上”,也就是说,“支配地位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基础,即技术”<sup>①</sup>;第六,跨国银行建立国际货币集团,组成包括39个自治领殖民地的“英镑区”和包括塞内加尔、喀麦隆、刚果等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法郎区”及“美元区”,各殖民地和各国(包括独立后)的货币分别对英镑、法郎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以不同方式各自依赖于大国的货币,大国则通过货币发行和汇率变动来左右有关国家的经济,加强剥削和加重其债务负担。跨国银行由此可向债务国提出苛刻条件甚至干涉内政。

各宗主国都竞相向跨国公司提供条件优惠的财政支持,鼓励其向非洲殖民地投资设厂,建立银行,对利润课税也给予减免待遇。美国首先以跨国公司作为实现其关于非洲未来设想的工具。美国在非洲有三方面利益:战略利益,重点控制某些地区的利益和经济利益。为实现这三方面利益,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对美国是最有利的。美国以它在非洲没有任何殖民领土作为“王牌”,要求欧洲帝国主义削减其在非洲殖民势力,以发展跨国公司来反对西欧一直在非洲实行的至高无上的垄断形式。美国将许多对非投资和贸易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而把子公司遍布于非洲许多地区。大公司打着所在国的招牌进行活动,为其下属子公司的工业和商业活动开拓地盘。战后美国对非洲的投资总额虽比不上英法,但发展迅速。美国

---

<sup>①</sup> 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欠发达》,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8页。



在非洲的总公司约占其在第三世界子公司总数的 8.3%。

英国在非洲设立的子公司最多。战后初期,仅在南非设立的英美公司(又称奥本海默公司 Oppenheimer)就有 200 多个子公司,其中包括:控制南非煤产量 40% 的公司,非洲炸药和化学工业公司(英国拥有一半资本),开采金刚石的罗得西亚英美公司,开采铜矿的北罗得西亚公司等等。多国合资的尤尼莱佛公司(Unilever)拥有 500 多家子公司,主要经营使用非洲原料(棕榈油等)生产的肥皂、人造黄油、化妆品等业务,在非洲建有巨大的油棕种植园,并经销通用汽车公司等的产品。60 年代英国分布在第三世界的子公司约 2248 个,其中有 40% 设在非洲。<sup>①</sup> 英国对非洲的投资独占鳌头约 20 亿美元,其中长期私人投资为 3.9 亿英镑(1956 年)。美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约 8.07 亿美元(1957 年)。<sup>②</sup>

二战后,法国私人资本对非洲殖民地的投资仍然很少,而且除北非因有磷酸盐矿而对采矿工业投资稍多外,大部分私人资本都投到商业部门,例如,据统计 1950 年在法属西非洲经营业务的 200 家主要法国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中的价值,商业部门独据鳌头,总值为 180 亿法郎,比农业(40 亿)、采矿工业(50 亿)、加工工业(20 亿)、其它(40 亿)的总和(150 亿)还要多,而且几乎全被“三巨头”——西非法国公司、西非商业公司和尤尼莱佛公司所垄断。这些大公司是在“相当于奴隶制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采取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盘剥手段。因此一般法国公司依赖殖民主义政治权力的程度,要比英国公司更深,总是恋恋不舍其超经济强制手段。这一特点对战后 15 年法国殖民政权迟迟不愿撤出非洲殖

---

① Perspective (《前途》杂志) 1952. 5. 10., p 3, 转引自斯科罗夫:《法帝国主义在西非》,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第 37 页。

②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统计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年,第 652 页,656—657 页。

民地有一定影响。法国设在非洲的跨国公司数目逐年增长,总数仍比英国要少,但比例最高。据60年代数字统计,法国分布在第三世界的子公司约有1347个,其中有66.6%设在非洲。<sup>①</sup>

(三)战后随着欧洲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非洲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经济上的重要性相应地有所下降。<sup>②</sup> 这一点应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由此,我们需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英法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由殖民地向欧洲本土转移。这一变化如何促进欧洲宗主国逐步从殖民地撤退。第二,需要对欧洲本身的变化以及欧洲各个宗主国与非洲殖民地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关系的变化予以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解释欧洲殖民主义为什么会和如何被迫从非洲殖民地陆续撤退。

在战后初期欧洲宗主国经济恢复过程中,非洲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仍起了很大作用。1948年非洲提供的8种重要矿产品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矿产品产量的比例:白银为99%,金刚石为98.4%,钴为80.1%,黄金为58.9%,铬为30.8%,锰为29.4%,钒为19.4%,铜为18.2%。进入50年代和60年代后,受惠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西欧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5%,生产力进入更高的水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有所扩大。经济繁荣持续了约23年。突出的变化(与本题论述有关的)表现在四个方面:

1. 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启动。1951年欧洲6国(法、西德、意、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建立欧洲煤钢联营,鼓励煤铁钢工

---

①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年》,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63页。

② 据统计,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向欧共体的出口额比例逐年下降。1975年占7%,1984年降至5.5%,参见杨光等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非加太公约》,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第180页。

业发展,取消关税和其它各种限制,建立内部劳务市场。英国坚持“帝国特惠制”,不愿参加,仍坚持以高关税保护英国在殖民地不受外国竞争。法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要比英国为小,欧洲煤铁钢联合经营对缺煤的法国十分有利,而法属非洲殖民地未能给法国提供有利可图的煤炭供应,因此,法国率先加入,获利甚大。

2. 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大量涌现,欧洲许多殖民主义宗主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共同体国家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很大一部分靠共同体内部消化解决。1955年欧洲6国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逐步建立了自由贸易、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拥有共同金融政策的经济联盟(共同市场)。法国加入共同市场后,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4%。英国仍不加入共同市场。英国一方面继续依靠殖民地为其输血恢复元气,倚靠大笔的投资收益和商业利润加上英镑结存来改善英国的国际收支,它将殖民地(黄金海岸、马来亚等)的英镑外汇结存于伦敦,数额高达10亿英镑;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多年以来一直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在经济上结合成为有机的生产体系;英国向殖民地输出铁路车辆、钢轨、机器、棉毛织品,从殖民地输入棉花、羊毛、有色金属等原料和大量食品,战后英国同英联邦诸国之间的贸易仍占英国进出口总值的40%左右。<sup>①</sup>1950—1954年间占英国进口贸易总额为49%,出口贸易总额为54%。英国仍然不愿放弃与它的贸易、金融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因而再次失去加入共同市场的机会。英国只是采取一些修补方式:降低优惠率,减少享有特惠待遇的商品种类,将英镑集团变为英镑区,但仍把它作为动员殖民地外汇的储备力量,以与美元相抗衡,便于英国向英镑区成员国实行经济控制和渗透。总之,直到60年代英国宁肯减

---

<sup>①</sup>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少同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联系,也不愿放弃它在英联邦范围的经济利益。可见,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英国在坚持殖民帝国根深蒂固的利益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法国在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将其殖民地(主要是非洲殖民地)作为“联系国”一起“带进”了共同市场,因而出现了“集体殖民主义”的说法。

3. 50、60年代已经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加入共同市场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国家比较注意以高科技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和畜牧,以致有的国家如法国的农业迅速自给有余;采用新技术和新生产方法以节约工业原料;努力建立以合成原料代替从殖民地进口的天然原料的新工业部门,因而进口倾向(进口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逐年降低,对殖民地的食品、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依赖程度也逐步下降。留在共同市场外面的英国情况则大不一样:(1)农业衰落程度进一步加剧、食品自给率益趋下降。战后英国继续奉行将殖民地作为农业生产基地的政策,除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困境和其后本身农业衰落供应不上以及历史的惯性等原因以外,也是为了从经济体系上维持大英帝国,因为只有殖民地拥有可输入英国销售的商品,它才有可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稳定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可靠场所,从而避免因殖民地经济不稳定而导致政治上的动乱。(2)继续不断向英联邦成员国输出资本和转移资本,对英国经济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多年来与资本输出有关的对殖民地的商品输出,主要是“传统”工业部门生产的铁路机车车辆、钢轨、加工机械、常备武器等;这些老产品源源输出使英国本土的“传统”工业部门保持着十分兴旺的状态,资金和贷款都向它倾斜。与此同时,美国、共同市场六国和日本的资本和技术却已转向生产高精尖产品的新工业部门了。(3)向英联邦的自治领尤其是殖民地的投资,利润很高(不少地区仍能获得垄断利润),使英国本土因利润较低而备受忽视的生产部门,如农业、采掘工业等都转移到自治领和殖民地,如南、北罗得西亚、南非、尼日利亚等殖民地。这样的资本

流动既转走了英国本土的大批资本(不少还成为不回归的转移资本),又支撑和巩固了英联邦内部远比共同市场落后的“区域分工”体制。(4)这些落后的“传统”的旧“区域分工”体制不仅严重阻碍了在英国本土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而且转移到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生产同一产品的“传统”工业,往往反过来成为英国不易战胜的商业对手,因其工资低廉,就地取材的原料成本低下,严重威胁了英国的传统国际市场,如印度纺织品就成为兰开夏的劲敌,而兰开夏本身一时未能建立起能获得更高利润和更大市场的新工业部门。(5)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也使英国经济陷于困境。1949年和1967年英国两次被迫让英镑贬值。造成国际收入不利的状况,除资本大批外流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第一,从殖民地进口的食品和工业原料越来越多造成外贸逆差;第二,海外支出大量增长,为“安抚”殖民地,由国库(国家垄断资本)拨给殖民地作为“发展”、“福利”之用的各种基金和财政补助,1945—1960年共计30亿英镑;<sup>①</sup>第三,驻军费用耗费巨大,直到1971年英国才恋恋不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为了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和肯尼亚“茅茅起义”以及1956年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花费了大笔军费。二战后,英国军费负担一直大于西欧诸国,1955—1963年间英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为6.6%,而共同市场诸国平均为3.0%。殖民主义扩张造成国际收支的不利状况,使英国背上了难以甩掉的沉重包袱。(6)尽管如此,作为欧洲一个国家,英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使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越来越密切起来。底蕴深厚的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英国一些新工业部门在英国出口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中一些昂贵的科技产品只有在欧洲六国中才能找到市场,而六国愈益扩大的市场容

---

<sup>①</sup> Cohen, A., *British Policy in Changing Africa*(《英国在变动中的非洲政策》), London, 1959, pp. 31 - 32.

量,使英国在殖民地和英联邦中找不到市场的高精尖产品找到了利润丰厚的理想市场,而共同市场六国的某些高技术也是英国在“帝国范围”内购买不到的。从1955—1965年10年间,英镑区国家在英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由约50%下降到1/3,虽然绝对数量仍有所增长,而同期西欧和美国在英国出口贸易中比重由约1/3上升到50%。<sup>①</sup>其中欧共体六国和爱尔兰、丹麦所占比重节节上升,从20%(1954年)升到30%(1971年),再升至40%以上(1979年)。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英国海外投资比重也发生显著变化。1958—1964年英镑区所占比重从60%降到47%,非英镑区从40%升至53%。<sup>②</sup>这使英国“经济重心的航船”自然转舵多佛尔海峡。

4. 欧洲三个殖民宗主国(法、荷、比)和两个前宗主国(西德、意)加上卢森堡,于1957年建立共同市场。逐步实现的经济一体化使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也给它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第一,6个成员国从共同体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它们可能从殖民地获得的利益。(1)原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一些经济作用可由共同体内部成员国或与成员国有联系的国家来提供。如某些工农业产品可以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到成本较低的贸易对象国去生产,而共同体内的消费者可从贸易对象国购到廉价的商品。即不需要殖民地也能购买所需的廉价商品。(2)由于共同体内部取消了相互间关税和贸易限额,成员国间贸易一般要比与第三国(包括与殖民地)贸易,既方便又能获得优惠,因而共同体成员国相互出口额增长很快,年增长率达19%。22年内增长了48.5倍。(3)共同体内各成员国经济均具备高水平,有利于实行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内的水平分工与技术合作,并且鼓励相互投资,因而使共同体内生产布局比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生产布局远为合理,大大促进了共

---

<sup>①</sup> 参见王振华:《英联邦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表5。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8页表6。

同体生产力水平提高。(4)由于共同体内资源可以得到较为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减少流通费用,降低成本,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5)共同体对非成员国实行关税壁垒,这既能保证成员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也保护了共同体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共同体农业一体化取得很大成就,到50年代后期,法国谷物、肉类已自给有余。法国和意大利的农业,荷兰畜牧业都受共同体规定的“差价税”和“闸门价”的有力保护,有了很大发展,大大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过程;高科技使粮食等农产品成为资本有机构成很高部门的产品;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20%降到8.5%。欧共体本身农产品有丰富的剩余,为它的现代化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1970年共同体农业生产增长88%,速度超过同期美国,从而排挤了美国的低价农产品倾销。对比共同体农业一体化的成就,尚未加入共同市场的英国继续从殖民地进口低价农产品而造成宗主国的农业衰落,欧共体的一体化显然技高一筹。

第二,欧共体继续从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取得经济利益。根据1957年制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共同体中的殖民宗主国并没有放弃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是规定共同体可以将殖民地(主要是非洲殖民地)纳入联系范围,称为“联系国”。(1)共同体各成员国对来自联系国的进口产品和联系国对来自共同体成员国的进口商品,逐步取消关税和限额。由此开始了法、比、荷三个殖民国家向共同体其它成员国(主要是前宗主国)西德、意、卢开放其殖民地的过程。(2)共同体任何成员国在联系国(殖民地)中均享有与宗主国同样的投资、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权利。(3)共同体设立由成员国按比例分担的“欧洲开发基金”,作为对联系国经济开发的援助。欧共体各国的国家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向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提供开发基金,(应视为后来《洛美协定》的先导)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欧共体的“联系国制度”可看成是二战后殖民帝国的一种变形。这种形式对维护欧洲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经济权益具有很大的弹性,因而它

既容易导向放弃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也比较容易在放弃政治统治后保持其在殖民地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以共同体控制的形式来获取“开发”基金。虽是一种萌芽形式,但反映了对 21 世纪将有更重大意义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形式后来为 1973 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英国、葡萄牙所接受。

(四)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展,二战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颇多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政策,对宗主国经济不仅无损而且有益。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的产品、生产过程污染环境严重的工业部门被转移到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宗主国和发达国家则进口由这些国家生产的大量极其廉价的工业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儿童玩具、五金用品等)。

50 年代以后欧共体国家在出口结构方面渐向美国看齐。由六国(后来扩展到 13 国)利用一体化有利条件开展和承担过去一国无法承担的科研项目。由各国国家垄断资本联合出资进行高科技研究(如研制“空中客车”、“阿丽亚娜火箭”等)。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新科技产品成果累累,并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由于资金充足入材济济,从研究到投产期限大大缩短,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资本和高技术有充分保证的条件下,共同体国家逐渐过渡到主要生产高精尖产品。这些产品的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价格高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按垄断价格出售。共同体用这些高精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同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产品和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品相交换,占有极大的经济优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的情况下,殖民地即使主权获得独立,有的学者认为也不可能真正的彻底终结殖民主义。

如前所述,二战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跨国垄断组织双管齐下,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殖民国家、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



内部经济结构都相应发生了变化,国际分工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二战中和战后时期发明的新技术,使新的生产部门纷纷产生,其特点是高、精、尖。新的生产部门其资本有机构成极高,所需原材料极少(对殖民地的原料依靠程度降低),所需知识极高。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出口导向战略。所生产的耗费大量非熟练劳动和低工资的产品进口到宗主国和发达国家,使后者的非熟练劳动力得以脱离出来转到高精尖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这就是战后国际分工发生新变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宗主国和发达国家要获得垄断利润和使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地位,便都对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实行严格的垄断高科技的政策。首先,它们制定《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公约》,在法律上确保其对高科技的垄断,并于1949年组成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和阻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直到1984年巴黎统筹会还将电子用硅片、印刷线路版及其技术、半导体中使用的陶瓷、某些机器人技术都列入新管制清单。其次,它们发挥跨国公司垄断高技术的作用。跨国公司只将一些先进技术转让给它在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而不出售给当地企业,对技术转让加以极严格的控制,使后者不能掌握先进技术。即使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转让已扩散的技术,<sup>①</sup>也要索取高额转让费,而且总是拒绝转让制造产品的关键技术。通过垄断,阻碍落后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使之永远在技术上处于从属地位,经济上处于受剥削地位。<sup>②</sup>由此可见,第一,到了国家

---

① 一般都是发达国家的已过时的技术。例如,当美国已研制出每秒运算2.5万亿次的计算机,它才以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20亿—120亿次/秒的计算机。

② 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垄断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垄断高科技和垄断生产高科技产品已经成为获取垄断利润和维持不平等交换的最重要方式。可以说,如果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农业部门实行技术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在工业部门进行技术革命,培养自己创新能力,运用最新技术成果,逐步掌握高科技并生产高科技产品,那么殖民主义是不可能最后终结的。因为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在经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从而在文化领域仍有游刃有余的活动余地。垄断利润既能维持其生命,又将提供新的动力。第二,只要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不论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家就要寻求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一般均来自非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它的“导体和滋生场所”。从这个意义上看,殖民主义的终结只是在政治方面,而在经济方面的终结则有待于所谓发达国家在垄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上的“真正的终结”。这就是第一章一开头我们提到的卢森堡给予我们的启示。然而,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由前殖民宗主国组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总要凭借其对高科技的垄断,占据信息技术的制高点。由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包括日本)的强大的经济存在,由于国际垄断信息工业巨头的控制,随着空间技术的高度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的巨大扩展,由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一方而在掌握和发展高科技方面将继续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重重阻碍;另一方面它们的传统的“主权”、“领土”、“领空”等概念也将受到新的严重的挑战。<sup>①</sup>

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将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造,由此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为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放弃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归还主权,逐渐从殖民地撤退同时又能保证经济利益奠定了基础。

---

<sup>①</sup> 参阅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71—772页。

## 二、殖民主义的撤退——合力的总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撤退”，<sup>①</sup>指的是殖民主义国家放弃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归还主权，结束殖民政权的行动。这里不包含“经济上撤退”或“经济非殖民化”的含义，因为客观现实不存在这类行动。

关于二战后殖民主义国家为什么先后从殖民地实行(政治)撤退，其原因何在，是各个学派撰写的殖民主义史聚讼纷纭的一个论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曾任最大殖民主义国家首相六年的麦克米伦对英国从殖民地撤退的原因作过一番解释：“说什么英国人民在一阵急躁或轻举妄动的情绪冲动之下，以一连串历史上空前的姿态放弃了他们的帝国，这是一种既粗鄙又不符合事实的无稽之谈。他们并没有丧失统治的意志，甚至也没有丧失统治的力量。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永远统治下去。他们的责任毋宁是把他们在漫长的几百年间所获得的长处传播给其它国家”。<sup>②</sup> 麦克米伦以其典型的殖民主义者思维明确表明：(1)英国是有能力继续统治殖民地的；(2)英国是自愿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3)英国有责任把“几百年间所获得长处传播给其它国家”。麦克米伦这一官方理论影响甚深，特别是对英国的“帝国学派”的学者：有些学者甚至拐弯抹角地提到19世纪麦考莱提出在殖民地实施英语教育时，英国就已包含了传播“英制文明”的良苦用心。另一些英国学者不这么露骨宣扬“文明传播论”，他们联系英国在二战中的“崇高使命”来阐发“英国的崇高愿望”。据说因为英、法两国认为自己在二次大战中进行的是一场

---

① 国内有些学者使用的“非殖民化”概念的涵义在政治方面与此类似，但涵盖更广，涉及经济和文化方面。

② 《麦克米伦回忆录》第5卷：《指明方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1页。

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战争,因此就不能不影响它们对殖民地的想法,“开始感到负有积极义务为它们的殖民地人民造福”。<sup>①</sup>也有学者十分强调战后英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使其采取主动行动导致帝国走向终结。<sup>②</sup>美国一些学者热衷于强调《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成立的作用,宣扬“四大自由”对殖民地人民所起的鼓舞作用。而标榜美国以其“强烈的反殖民传统”参加战后的反殖民斗争。多年来,特别冷战结束后,不少学者强调冷战对“非殖民化”的作用,认为由于冷战的战略需要,使有形帝国统治须向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控制转化,有必要给予殖民地人民独立,以避免被社会主义阵营拉过去。还有一种论点,片面强调殖民主义国家本身的衰弱,“缺乏用武力维护远处领土的决心”,<sup>③</sup>使得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势如决堤,一溃千里。

应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巨变使西方世界不少有识之士看出“变革之风”正在横扫世界,到50年代末,已吹遍非洲大陆。这一看法本来是西方世界对战后形势观点的较接近实际的一种概括,但对于这一脍炙人口的“变革之风”,却依各人的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立场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梅德利科特认为“简单的事实是,变化了的不是力量,而主要是美国使用力量的意愿起了变化”。<sup>④</sup>而克劳德(Crowder)和格特塞尔(Gertzel)等学者在《剑桥非洲史》中讨论到变革之因时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释出了新力量”,或二次大战“刺激了已在起作用的力量并给予这种力量以活动的领域”。<sup>⑤</sup>至于“变革的全部含意”,许多西方政治家并不完全了解。

---

①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8页。

② Strachey, *The End of Empire* (《帝国的终结》), London, 1959.

③ 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92页。

④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11页。

⑤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 8, p. 2.

其实,“变革之风”所反映的客观的真实内容是诸种历史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战后殖民地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的不断壮大;(2)国际反对殖民主义力量的空前强大;(3)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力量的严重削弱;(4)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所形成的“最后动力”。正是这四种互相影响的力量变化及其共同作用,促使殖民主义制度发生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变,终于导致殖民主义势力从殖民地先后撤退和几个欧洲殖民帝国走向终结。

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个因素作为殖民主义撤退的唯一原因或主因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符合当时历史的实际状况,而且,这种强调单一因素论往往导致对种种因素(力量)之间的关系作出简单化的解释。我们认为,用恩格斯所阐明的合力论来解释战后殖民主义的撤退,符合历史实际状况,因而是可取的。以下分别分析三种力量(经济力量已在前一节作了分析)及其相互关系和共同的作用。

1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时间要比亚洲晚十几年,它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个浪潮。二战结束后它还需要积蓄力量的时间。这一时期非洲民族运动积蓄力量的突出标志之一是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雨后春笋般成立。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成立14个,1947年和1948年各成立6个,1949年成立2个,1950年成立1个,5年时间成立近30个政党。50年代又有一大批政党成立。总之,二战后10年,共有140多个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活跃于非洲反对殖民主义战线上。<sup>①</sup>其中的非洲民主同盟(1948年拥有100万成员)和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等都发展成为地区性和全国规模的政党。这些政党开始注意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工

---

<sup>①</sup> 参考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113—120页。

作,力量增强,对殖民主义统治展开了有力的斗争。1955年亚非会议后,又有大批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成立,一向“沉寂”的殖民地如比属刚果等也建立了民族主义政党。1960年,非洲已有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157个,除48个建于1955年前,约109个建于1955年以后。<sup>①</sup>至此,民族主义政党活动已遍及非洲所有殖民地和国家。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政党提出争取独立作为奋斗目标,并领导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

非洲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群众进行争取独立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采取非暴力发动群众斗争的手段占绝大多数。斗争的经济内容:包括提高工资、改善非洲人的经济地位、反对强迫劳役、反对苛捐杂税等。非洲工人罢工在非暴力斗争中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如1945年尼日利亚17个工会举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联合大罢工。表现出工会的顽强斗争性,对伦敦震动很大。政治内容:包括扩大非洲人政治权利,增加非洲人在立法议会和行政会议中的席位,要求实行半自治、完全自治,乃至实现独立。这些不同层次的目标多数是在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才获得实现的,其区域主要限于英属和法属殖民地。非暴力斗争并非不流血。1948年2月英国镇压黄金海岸退伍军人示威请愿斗争,打死打伤260多非洲人。1951年3月法国镇压摩洛哥独立运动,屠杀1000多人。类似的血腥惨案不胜列举。

(2)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向国际社会提出实现独立的强烈要求,最终通过联合国内的斗争,实现了独立。这种形式多半实行于联合国的托管地,包括前国联的委任统治地。1951年12月利比亚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独立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

<sup>①</sup> 参考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3)采取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形式,有的发展为全国性的武装斗争,如阿尔及利亚坚持7年半的武装斗争,给予法国殖民统治极沉重的打击,终于迫使其撤退。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大多发生在白人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和优势统治地位的殖民地,或坚持实行“白人统治”、“同化”、“海外省”等顽固不化政策的殖民地,如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西南非洲、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茅茅武装起义”)等殖民地。

不论是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非暴力斗争或是武装斗争,都是非洲人民觉醒的表现,都给予殖民统治以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及利亚坚持7年半的民族解放斗争,牵制了法国近百万军警武装力量,消灭了10万以上殖民军,消耗了法国近百亿美元的财力,极大的削弱了法国对法属非洲广大殖民地的控制力量和镇压武力,震撼了“法兰西联邦”的根基。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阶段。它使非洲民族主义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加速了非洲独立运动的进展。

2. 国际力量对结束非洲殖民主义统治的作用也应给予符合实际的估量。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雅尔达体系的确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受到严重削弱;第三世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战后经过5年恢复,1950年美、苏、英、法等大国的综合国力(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 Capita GNP,各项数额均以1964年美元价格计算)和每年支出的军费和军事人员总数的比较,见下表<sup>①</sup>

---

<sup>①</sup> Kennedy,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大国兴衰》), New York, 1987, p. 369.

国名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军费开支	军事人员
美国	3810 亿	2536	145 亿	138 万人
苏联	126 亿	699	155 亿	430 万人
英国	71 亿	1393(1951 年)	23 亿	68 万人
法国	50 亿	1172	14 亿	59 万人
西德	48 亿	1001	尚未重新武装	
日本	32 亿	382	尚未重新武装	
意大利	29 亿	626(1951 年)	5 亿	23 万人

1951 年因朝鲜战争爆发,英、法、意军费激增,但三国军费总和仍不及美国(333 亿美元)的 1/5,苏联(201 亿美元)的 1/3。三国军事人员总数不及美国 1/2,苏联的 1/3。可见,无论从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上看,欧洲殖民国家和前殖民国家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比较,已形成很大的力量差距。

1955 年召开的有 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倡导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的关系的“万隆精神”,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推动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促使第三世界迅速兴起。第三世界主要是民族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它们的政治倾向对国际力量天平倾向何方,有重大作用。第三世界力量的配置对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决策起很大作用。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指出“20 世纪后半叶的重要问题在于,未结盟的亚洲和非洲人民究竟是倒向东方还是倒向西方。他们是否会被吸引到共产主义阵营里去呢?”<sup>①</sup>麦克米伦对此忧心忡忡。

1956 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勾结以色列对埃及发动

<sup>①</sup> Macmillan, Speech to the House of Assembly in Cape Tow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在开普敦南非联邦众议院中的演说》), 1960, p.3.



武装入侵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亚非19个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呼吁立即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中国对埃及的正义行动给予坚决的支持。苏联政府宣称准备使用武力来粉碎英、法侵略。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立即停火并撤军的提案并获通过。英、法、以三国被迫停火并将军队撤出埃及。英、法殖民侵略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英国全面评估和调整其帝国政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转折点。此后,英国开始执行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应该看到,二战后美、苏对殖民地问题的直接干预,对英、法、比等国殖民地位的削弱是起了作用的。美国插手非洲事务,力图将非洲大陆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用英国首相艾登的话来说就是“经常挖我们墙脚的作法”。<sup>①</sup>此外也应该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研究者在逆向考察战后历史时,对冷战中美国在殖民主义从非洲撤退中的作用作了夸大的估计。他们总是强调美国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夸大了美国与英、法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矛盾,认为美国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给了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非殖民化以强有力的推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美与英法之间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矛盾只是美国的“冷战”战略同英国的帝国战略和法国的“法兰西联邦”战略之间矛盾的表现,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建立它对全球的霸权,插手非洲事务,谈不上对非洲人民独立和解放的关心。有的学者(W. R. 路易斯)在对美国三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在处理印度、利比亚和苏伊士运河三个地区非殖民化的个案分析后,得出了新结论,认为美国对英帝国解体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但肯定是很小的。<sup>②</sup>通过对苏伊士运河事件整个过程中美国前后态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同意路易斯对美国在殖民主义撤退中的作用是“有影响,

---

① Eden, *Memoirs, Full Circle* (《艾登回忆录》), London, 1960, p. 503.

② 详见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73页。

但很小”的判断。

3. 受到严重削弱的英法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撤退”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实质涉及的不仅仅是殖民国家本身力量的强弱变化,而是在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英、法是主动放弃殖民统治还是由于力量限制而被迫放弃的。

下面主要以英国为例,对二战后殖民主义撤退究竟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还是被迫的、原先并无意归还政权(主权和治权)<sup>①</sup>加以分析。尽管联合国文件中已使用“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概念,但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而我们所认为的“殖民主义撤退”则主要指政治上撤退,因此我们愿意使用后一概念。

英国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从不曾考虑过从非洲殖民地全面撤退,也不存在英国历史学家弗林特所说的“有计划的非殖民化”。如前所述,英国对非洲殖民政策的制定和改变除了受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首先受英国和英帝国本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制约。从历史上看,除个别例外,英国在这方而是较少失误的。(2)受民族独立运动力量越来越大的影响。(3)受国际力量和国际事件的牵制(包括英联邦成员的影响)。(4)受英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各派政治势力相互作用的影响。

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个比较能思考,而又较能持现实和实用态度的阶级。它根据现实的力量和自身利益行事。因而能及时调整政策,执行一种颇具灵活性和可塑性的殖民政策。然而英吉利民族又是一个称霸世界百多年统治过或正在统治数以百计殖民地的地道的压迫民族,它在尚能固守殖民地之时绝不会轻言撤退。英国人又自以为负有传播文明给落后民族的使命,自

---

① 李安山在前引论文中,对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作了详尽分析,本节多所引述。

谓“文明使者”。尽管英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同其真实本质相距极远,但这种看法往往成为某些英国人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非洲的看法也是这样,对非洲人怀有极大的偏见,却把偏见当作真理性的认识。一位英国内务大臣(Morison)在反驳美国人批评时竟说,给予殖民地完全自治是“无知的、危险的谬论”,“这无异于如同把前门钥匙、银行账号和滑膛枪给 10 岁的孩子”。<sup>①</sup>

在二战前夕和二战结束后初期,尽管英国已被迫从亚洲的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撤退,英国并不认为有将此经验施行于非洲之必要,所以它完全不可能自动在非洲启动弗林特所说的“有计划的非殖民化”过程。1943 年由英国殖民部官员威廉斯主持制定一份非洲殖民地改革备忘录,主张西非宪制发展需经五个阶段,而后以总督统治下的殖民地议会制逐渐取代英国的、由卢加德炮制的“得意之作”——间接统治制度。威廉斯对独立问题略而不提,只把毫无具体内容的自治推向遥远的未来。

二战后,英属亚洲殖民地印度、锡兰分别于 1947 年取得独立。1947 年 2 月英国工党政府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向非洲各殖民地总督发出关于非洲殖民政策改革的训令,提出殖民统治不能固守卢加德的“间接统治”的教条而应进行改革,强调殖民政府必须做到“有效率、民主化和本地化”。<sup>②</sup> 伦敦西非学生联合会认为工党对殖民地问题极为了解和同情,曾请“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克里奇·琼斯作讲演。恩克鲁玛回忆说,学生们经过与他接触,寄予工党的希望完全破灭,看不到工党的殖民政策同保守党有什么不同。<sup>③</sup> 这时,工党政府任命负责非洲事务官员安德鲁·科恩拟定殖民地改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43 年 1 月 11 日。转引自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② 殖民部档案 847/35/47234/1(47),第 41 号通告。转引自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第 62 页。

革计划。科恩的改革计划在非洲殖民地自治问题上比威廉斯计划前进一步。科恩计划分四个阶段,他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自治的政府比出色的殖民政府更好”。<sup>①</sup> 工党政府在计划中仍然安排很长的过渡到自治的阶段;等待非洲殖民地政治成熟后由英国政府将“自治”恩赐给殖民地。科恩计划不仅未提独立问题,连“非殖民化”字眼亦未涉及。按科恩自己的说法,其计划的重要出发点是要将非洲民族主义者拉过来以免被“共产主义”拉过去:“同民族主义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是我们在非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大保证”。<sup>②</sup>1948年2月黄金海岸发生了曾在缅甸、印度等地为英国卖命的退伍军人和和平示威遭枪击的流血事件,此事震动了伦敦。科恩计划的总体执行被中止。但在黄金海岸这一计划所规定的远景目标却被民族主义运动提前实现了。派往黄金海岸调查的沃森(Watson)带回了一份报告,他提出迫切需要在黄金海岸继续宪政改革的意见。<sup>③</sup> 英国在黄金海岸刚修宪两年,就不得不提出新宪法。新宪法(《库西宪法》)规定立法议会的非洲议员从18名(总数为30名)增加到75名(总数为84名);政府中非洲人成员增至8名(总数为11名)。但殖民政府中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四个部仍由英国人担任。1950年1月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发动总罢工和抵制英货,殖民当局将恩克鲁玛逮捕下狱,但在1951年2月选举中,非洲人以最高票数选举关在狱中的恩克鲁玛为立法议员,向殖民主义示威,强大的民族运动迫使英国不得不释放恩克鲁玛,并任命他为政府事务领导人,但实际权力仍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充其量这只是“半自治”的政府。

---

① 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页。

② Cohen, A. *British Policy in Changing Africa* (《英国在变化中非洲的政策》), London, 1959, p. 61.

③ 《沃森调查团报告书》见英殖民部档案第231号。

尽管科恩计划在许多方面都极力维护帝国的权力,只打算在遥远未来使非洲殖民地成为帝国自治领,但在1947年11月的殖民地总督会议上,这一计划仍受到各地总督的严厉抨击,根本无法执行。只有黄金海岸的“自治”被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推动着,略有进展。

由此可见,直到50年代中期英国历届政府没有制定过“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sup>①</sup>只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下,为了维持对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制定了殖民改革计划。显然,殖民改革计划同“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完全是两回事。就各个殖民地而言,改革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往往是为了平息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情绪,遏制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势头。英国政府并没有主动撤离殖民地的计划,它一直在执行殖民大臣麦克唐纳关于非洲殖民地政治发展的计划:“大英帝国部分臣民获得自治,可能需要几代或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最落后的非洲人来说,我们政策的主要部分是教会他们更多的自立”。<sup>②</sup>40年代末黄金海岸民族主义运动首先发难要求自治。对自治问题英国采取坚决顶住态度,只允许半自治,而紧紧抓住国防、外交、财政、司法四大权力不放。英国政府非洲政策顾问黑利勋爵认为,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要牢牢掌握权力,控制住局势。<sup>③</sup>然而几个殖民地爆发了武装起义使英国在帝国一部分地区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952年,肯尼亚爆发“茅茅起义”。1954年,亚洲英属殖民地马来亚的武装斗争烈火越烧越旺。法属印度支那又发生了震动整个殖民世界的奠边府战役。北非阿尔及利亚也燃起武装斗争的新战火。形势遽变。这年,英国一个由内

---

①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5页。

②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剑桥非洲史第八卷》), 1984, p. 4.

③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英属热带非洲的土著行政和政治发展》), Kraus, 1979, pp. 54-62.

阁大臣负责、有殖民部次官参加的“英联邦成员资格委员会”起草一份机密报告，将英属殖民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中非(联邦)、马来亚等。报告认为这些殖民地将在未来10—20年内独立。第二类为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认为，这些地区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三类为政治发展前途不确定、不明朗的地区，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四个殖民地。<sup>①</sup> 英国殖民部战略家的估计在两年后就被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迅猛发展所完全打破。

法国在布拉柴维尔会议后，对殖民政策作了调整：(1)建立包括所有海外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联邦”，以代替法兰西帝国；(2)黑非洲在法国制宪会议的席位由1席增至9席；(3)非洲殖民地增设领地会议。有的学者把布拉柴维尔会议看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这一论点是站不住的。1946年颁布第四共和国宪法，放宽了非洲殖民地“原居民”申请为法国公民的限制，正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和权益，根本无意放弃殖民地统治权。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武装斗争，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对法国最重要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极力缓和与其它法属非洲殖民地的关系，在保护法国殖民权益的前提下，1956年开始给予殖民地半自治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当时英国在西非作出让步的程度。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给予英法两国极沉重打击。英国首先改变政策。前面提到，1947年殖民部官员科恩提出的充其量不过让非洲殖民地成为英联邦自治领的改革计划遭到总督会议的一

---

<sup>①</sup> 内阁会议档案134/786，《英联邦成员国的未来》(机密)，官方委员会报告，1954年1月21日。转引自前引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论文，第185页。

致反对,后者认为“殖民部已走火入魔,陷入乌托邦梦想”,遂使该项计划嘎然而止。事隔不到10年,世界形势完全不同了。苏伊士事件表明英、法国力量急速下降。最大的两个殖民国家英法被迫从苏伊士撤兵,这一世界殖民主义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把英法帝国衰弱的真相完全揭示出来,英国统治集团深切感到“前而的危险和风暴”,<sup>①</sup> 意识到英国不再拥有在世界扮演帝国角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它阻止不住汹涌澎湃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这就迫使英国政府对帝国殖民政策进行全盘评估和调整。首先对帝国的防务作重大调整:放弃英国的全球防御体系,建立英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将英国防务逐渐从苏伊士以东撤退(1971年大致完成)。其次,相应减轻帝国和英联邦在英国的大国外交中的作用,“三环外交”(美国、欧洲、帝国英联邦)基本解体。第三,承认经济重心转移的现实,开始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从帝国和英联邦向欧洲(共同体)转移(详见第70页)。第四,英国政府决定不仅从亚洲殖民地而且准备从非洲殖民地全面撤退。<sup>②</sup> 从50年代末起,英国加速从非洲殖民地撤退。1957年加纳独立,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1961年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独立,1962年乌干达独立,1963年肯尼亚、桑给巴尔独立,1964年赞比亚、尼亚萨兰独立、1965年冈比亚独立、1966年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独立、1967年斯威士兰独立。1980年南罗得西亚独立(改国名为津巴布韦)。

从四种力量的作用看,(1)殖民地人民反对宗主国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促使殖民主义政治力量从殖民地撤退的主要的直接动力。(2)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国际力量也是一种直接动力,它不一定都表现为暴力——武装干涉,而主要表现为国际各种力量配置的

---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第5卷:《指明方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4页。

② 参阅王振华:《战后英国殖民撤退的原因和背景》,见前引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7—47页。

变化。例如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期,英联邦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站在英国一边,而亚洲英联邦国家则完全站在英国的对立面,英国已无法把英联邦作为英国推行大国外交的工具或筹码。实际上亚非英联邦国家已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组成了“亚非集团”或不结盟国家,成为国际上一种新兴力量,由殖民主义的“偏师”变成了批判殖民主义的力量。(3)殖民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逐渐削弱的力量,它在撤退过程中明显地分成两股力量。实际撤退的只是殖民主义的政治权力,它承受着民族运动对殖民主义的主要打击,而在从固守转为“边战边退”的战略撤退中,它全力掩护和维持的主要是殖民主义的经济利益方面。换言之,殖民主义政治权力撤退的方式、速度和撤退的彻底程度往往是依据殖民主义经济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持而定的。它们之间的相依关系对殖民主义撤退的影响大致有五种情况:1. 凡民族独立运动采取武装斗争方式(尽管这种暴力形式往往是殖民主义政治权力的严酷镇压和顽固坚持“决不撤退”的态度激起的),而殖民宗主国面临经济权益可能遭受极大损失的殖民地,殖民国家机器总是动员其全部力量对民族独立运动予以镇压、扑灭,并固守不撤(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2. 凡民族运动被置于冷战格局中间,宗主国或美国的镇压或武装干涉力量往往百倍疯狂(如美国在越南南方);3. 凡民族运动力量强大,又采取非暴力形式,允许宗主国在给予内部自治后仍拥有很大控制权,一时并不威胁殖民经济利益,如资产、外贸结存仍留在宗主国,而领导人又善于斗争的殖民地,宪政改革发展的速度较快,半自治、自治的进展一般都比较快(如英属黄金海岸、尼日利亚)。4. 凡民族运动采取温和斗争形式,“亲西方力量”对宗主国的政治、经济依附较深、有望建立“融洽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殖民地,半自治、自治甚至独立,往往采取“恩赐”宪制的方式较快地实现(如英国迅速退出苏丹)。5. 凡白人移民人数较多,占有大量土地,拥有根深蒂固的殖民经济利益,而非洲民族力量相对较弱的殖民地,民族力量与殖民力量的较量一般



都演化成严酷的暴力较量,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如南罗得西亚等)。从这五种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当殖民地的民族力量和国际力量通过斗争、较量的方式或其它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同殖民主义力量形成对立关系,如果宗主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保存其殖民经济利益,便容易出现三股分力的合力在同一方向上(自治、独立)共同起作用的过程,而且实现自治、独立的过程一般较短。反之,如果宗主国认为它们的殖民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如没收资产、严格限制、国有化等),这几股分力可能在不同方向上或相反方向上起作用,互相抵消力量,那么合力的共同作用仍将导向自治、独立的目标,只是过程一般较为曲折、漫长。在这几股力量中,上一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提到的,由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蓬勃兴起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三者形成的经济运动,虽是最原始的却是更强有力得多的一股力量,也是最有决定性的。因为这一经济运动(由高科技组成的生产力为基础)使殖民主义的直接政治统治(通常表现为超经济强制)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无数经济事实表明,直接政治统治对于维持和发展各种殖民主义榨取方式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由此可见,战后的殖民主义撤退这一历史事变,就是在互相交错的几股主要力量(分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出的一个总的结果。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包括几股主要力量在内的无数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后面的无数个人意志都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自己的愿望,但都没有达到,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形成最终的结果(殖民主义的撤退)。可以看出,每一种力量(甚至每一个意志)都对这一合力起了或大或小的作用,对最终的结果——殖民主义撤退有不同程度的贡献。<sup>①</sup>

---

<sup>①</sup> 参阅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462页。

### 三、殖民主义撤退中的诸种手法

1956年苏伊士事件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形势日益明朗。《泰晤士报》提出警告:坐在壶盖上不让水沸腾的政策是毫无希望的。<sup>①</sup>英、法面对无可挽回的严峻形势,在被迫撤退过程中,采取的政策受到几方面因素的牵制和影响。1956年后,一般面言,英、法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倾向于在能够控制殖民地局势并保有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条件下,撤退的速度可控制在若干年内仍可继续实行控制的范围内。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和部分的殖民地总督及官员等殖民主义势力的死硬派(如阿尔及利亚、南罗得西亚)则坚决主张不撤或缓撤。葡、比等国对其从非洲殖民地撤退毫无思想准备。直至1955年,非官方曾预测刚果应到1985年才能独立,比利时大部分舆论界对此斥之为“大胆的狂言”,完全是“空想”。

从总体看,在非洲,殖民主义节节后退绝不是一枪不发的,所有被迫撤退的殖民国家都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阵地和最大利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 以“冷战”划线,对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武装斗争,坚决镇压,全力扑灭。绝对不容许把政权转移到他们手中。千方百计物色可以取代的“温和派”。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等均一度发生过类似情况。

2. 英国面对间接统治制度“已过时”的现实状况,积极策划以宪制改革作为诱使民族主义者选择和平方式道路的一种手段。从策略上讲,也是对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反应。其步骤大略是:以逐渐增加立法会议中非洲人名额作为一种让步,同时,以制宪改革本身需要有严格程序,轻敲慢打,不急不忙,作为

---

<sup>①</sup> Times(《泰晤士报》), 1960.5.5.

缓兵之计,尽量延宕独立进程。后期,当民族运动力量日益壮大,独立已成势不可挡的潮流。此时宗主国首要考虑权力交给谁,何种方式交权对维护帝国利益和保持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最有利。在这些问题上,英国坚持一条原则:主动权要始终牢牢掌握在英国手中。在降旗前,殖民地总督的权力是决定性的,他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有否决权;即使成立“本地人政府”次要部门已由非洲人担任,但防卫、外交、警察、司法四大权力仍须控制于总督手中。独立前,国王和英国议会 有权修改或废除殖民地宪法另立新法。英国必须始终掌握制宪改革和移交权力的主动权,决定权力移交的对象和方式。只要可能,英国总是挑选“温和派”、“亲英派”作为权力移交对象;在配置权力时,总是给予封建王公、土王、酋长更多权力,以箝制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也通过“宪政改革”来维护“法兰西联邦”的帝国利益。法国跟英国通过英联邦来维系自治领的做法不同,它最初以“海外省”,后来又以“共同体”和“联系国”来维护“法兰西联邦”,但均未完全成功。法国曾以降低“法国公民”的获准条件来拉拢殖民地的“中产阶级”,培植亲法势力的社会基础,因此,联邦一级和领地一级的议会有一半席位是由“Citoyens de plein excierse”(拥有完全选举权的公民)选举出来的;<sup>①</sup>另一方面,法国明确表示它对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条件和时间,拥有规定权。在1958年前,法国对选择独立的殖民地都曾采取过严酷的暴力镇压手段(如对马格里布诸国)。1957年生效的《海外领地根本法》(Loi Cardre)允许非洲殖民地在法兰西联邦内成立“自治共和国”,这一规定曾被广为宣传为“非殖民化的创举”,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殖民统治方式,法国仍控制外交、防务和规划全面经济的大

---

①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说法语的许多非洲“精英”都被法国引导去关注文化事业,在他们创作大量法语诗歌的同时,说英语的民族主义者却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制定了数十个宪法。

权,让小型殖民地取得部分自治权。法国企图通过《根本法》达到以下四个目的:(1)保护法国在殖民地的权益。(2)缓和与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紧张关系。(3)集中全力解决阿尔及利亚的棘手问题。(4)使法属非洲分裂成小而弱的国家,加大对法国的依附性。但这四个目的除最后一个目的外,基本上均未达到:非洲一些殖民地要求立即独立。1958年戴高乐再次复出后,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要保住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大部分权益必须做出大的让步。鉴于殖民地十分不满把它们在法兰西联邦中与法国的关系视为从属关系,戴高乐通过《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正式宣布,成立代替法兰西联邦的“法兰西共同体”,改变以往的从属关系为联盟关系。允许非洲各殖民地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或者加入共同体取得自治共和国地位,或者脱离法国取得独立。但在这貌似“宽厚”的外表下面有一条使绝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上望而却步的严酷规定,“割断与法国的一切联系”;即经济制裁。1958年9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付诸实施。通过公民投票,几内亚人民选择独立。法国立即停止一切经济援助,撤回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几内亚陷入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独立的几内亚在国际力量帮助下渡过了难关,并提高了国际地位。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受到几内亚榜样的激励,也要求独立。戴高乐政府看到独立潮流已不可阻挡,被迫再次修改宪法,同意共同体内各自治共和国取得独立地位。此后多年,法国通过派遣顾问控制原殖民地,这一手段在以后许多年内相当有效,有些新独立国家的总理、部长大事都不敢作主,甚至事无巨细都须请示法国顾问;法国利用非洲新国家在经济、文化、历史上同法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控制它们,经济上一如既往剥削它们。

3. 同法国比较单一的手法相比,英国的手法既多种多样又时常翻新,法国一味镇压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独立运动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也给英国提供了教训。所以英国并不总是挥舞屠

刀以武装镇压来阻止独立运动。英国的原则是：当武装镇压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而所付出的代价远低于此种巨大利益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就会坚定地采取镇压行动（如镇压肯尼亚“茅茅起义”）。当殖民地的反抗斗争难以用武力收平，换句话说，镇压行动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镇压所能获取的利益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就会改弦更张，变换手法，或者作出一些让步。与英国殖民主义斗争多年的恩克鲁玛在黄金海岸（加纳）独立8年之后，总结非洲英属殖民地经历过的风雨历程，写下一段颇有历史见地的话语：“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使直接的殖民主义寿终正寝的那些方法。没有一个帝国国家会自动给予殖民地以独立，除非是迫不得已。在许多情况下，独立只是经过了解放战争才取得的。但是，另外也有许多没有经过这种战争就取得了独立的例子。只要殖民地内部争取独立的力量组织起来，就足以使帝国国家相信抗拒独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继续保持殖民地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抵消不了一场殖民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sup>①</sup>应当说，英国比法、葡等国更早看到殖民战争得不偿失。50年代法国陷于战争泥沼，英国更坚信其判断。但如何既能尽量延长殖民统治时间以维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又能避免陷于殖民战争。英国采取最多又颇有效果的方式是分而治之。英国认为这是维持宗主国经济、政治利益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第一，它力图通过“制宪改革”将大块殖民地分割成小至难以生存的小国，使之失去独立发展能力，在经济、财政、国防乃至国内安全都须依赖原先宗主国。独立国家幅员划得越小对宗主国的依附性就越大。第二，分而治之作为一种手段，有利于分化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各种力量，维持英国的控制。英国从尼日利亚撤退时，充分使用这一扩大分歧，分化瓦解，渔人得利的计策。1945年英国制定《理查兹宪法》，实行分治，通过设立三个区议会，人为地

<sup>①</sup> 前引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第265页。

扩大北区、西区和东区的分歧,煽动地方分立主义,防止其联合对英斗争。1951年又抛出推行进一步分裂的《麦克费逊宪法》,实行地区分治,在选举名额、设酋长院等方面都明显有利于亲英的北区封建势力。1954年生效的《李特尔顿宪法》将分治局面固定下来,极大地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地位。区政府竟有权决定尼日利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有权颁布本区选举法。区政府首脑称总理。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三区分治计划已陆续实现,形势十分严峻,尼日利亚随时可能分裂成为三个“独立国家”。民族主义者接受10年前南亚次大陆印巴分治的教训,在最后关头,战胜英国殖民主义的诡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团结一致态度,坚决反对分立运动。1960年1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视察尼日利亚。三区领导人要求1960年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独立。麦克米伦“仔细考察”了尼日利亚未来的执政者。“考察”结果认为,他们对英国和英联邦“确实怀有真挚的感情”,<sup>①</sup>有保持“夥伴关系”的意愿,英国统治集团可以放心地不仅对封建上层而且对尼日利亚资产阶级作出让步。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一白二绿的国旗在首都拉各斯冉冉升起。

英国对“中非联邦”前后的不同态度,貌似相反、实则一致的策略,雄辩地说明一切都是以英国殖民利益为依归。1953年英国以白人势力强大的南罗得西亚为中心,将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拉入,强行组成“中非联邦”,目的是通过“中非联邦”这一链条把三个殖民地牢牢地拴在大英帝国的“母体”上。英国的策略计划是,组成“中非联邦”在政治上既可利用南罗得西亚约30万白人移民的强大力量,扼制非洲人独立运动,阻止黄金海岸独立思想涌向赞比西流域;又可阻止“茅茅运动”向南蔓延。在经济上可以动用北罗得西亚铜矿收入弥补南罗得西亚年均4000万英镑的贸易逆差,并

<sup>①</sup> 前引《麦克米伦回忆录》第5卷:《指明方向》,第158页。

让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带动欧洲移民大批迁入北罗得西亚铜矿地带和尼亚萨兰肥沃地带,为英国的“第三帝国”整体经济力量做出新贡献。然而,联邦成立未能如英国所期望的抑制住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在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大好形势鼓舞下,要求“解散中非联邦”的呼声日益高昂,成为民族运动万众一心的口号,形成动员广大非洲人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推动力。在这种英国未曾预料的形势下,英国政府看到,将中非联邦政府控制权交给只占全部人口不到2%的少数白人手中不再是实际可行的政策;更为可忧的是,越发难以控制的白人移民计划将“中非联邦”变成自治领地并与南非白人合并的意图跃然纸上。联邦总理哈金斯发出不祥的威胁:“我只是希望我们不必像(1776年)北美殖民地那样不得不使用国防军这一力量”。英国政府越发感到对局势心中无数。如果继续维持中非联邦,可能使自己陷于鸡飞蛋打的两难困境。1962年南非联邦宣布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南罗得西亚白人发出威胁,如果英国不同意中非联邦(片面)独立,他们就将与南非联合。1963年5月白人移民首领韦伦斯基意含威胁地出发到南非去同维沃尔德总理一起“钓鱼”。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英国“合而治之”策略完全失败,苦果难尝,便又回到“分而治之”策略上。打算以对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做出较大政治让步,换取帝国经济利益的保存,特别是铜矿地带巨额投资利润的实现。英国开始部署撤退。1963年先后给予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以退出中非联邦和实行自治的权利。1964年7月尼亚萨兰宣布独立改名马拉维;10月北罗得西亚宣布独立,改名赞比亚。“中非联邦”寿终正寝。

4.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黎明静悄悄。大英帝国迫于形势节节后退。如上所述,英国既不是一枪不发也不是痛痛快快撤退。即使是“退”也要以退为进,在退的道路上为新殖民主义打进楔子。法国的撤退从表面上看似乎比英国干脆,1960年呼拉一下子,16

个法属非洲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但同样明显的是法国在政治上撤退的同时,立即将前法属殖民地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严格地保护“后院”,不让其它国家染指。很长一段时间,不仅英国插不进去,连美国也难插足。为此,法国宁愿每年为在非洲驻军付出巨大的财政开支。

不论是英国的“以退为进”,还是法国的坚守势力范围,它们在允许非洲殖民地独立之前往往以签订各种协定为条件。通过各种协定继续维护宗主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例如英国允许非洲殖民地独立,按照签订的协定原“英镑结存”仍须存于伦敦,每年提取款额不得超过一定限额。1951年10月英国欠东非和西非的英镑债务为4.55亿英镑;欠埃及为2.42亿英镑;欠苏丹为0.63亿英镑。结存不许在独立时全部提取,等于为英国提供长期的7—8亿英镑贷款。<sup>①</sup>1936年英国迫使埃及签订“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国政治撤退后英军还将继续长期驻军苏伊士运河,并驻扎亚历山大港8年。1964年英国与肯尼亚签订秘密军事协议,规定英国提供军事人员对肯尼亚军队进行训练和管理,并可根据相应级别指挥肯尼亚相应军事成员。1967年又通过双方换文。<sup>②</sup>通过这些协定、换文,英国对肯尼亚军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确保英国在东非的利益,1964年这支英国驻军就帮助肯尼亚平息了一起“兵变”。

宗主国在撤退过程中,通过多种手段如签订协定和条约,经济制裁或报复措施,扶植亲西方政治人物上台,发动军事政变的威胁,以此限制或禁止即将独立和已独立的国家采取某些可能会损

---

① David ed. *British Document on the End of Empire*(《英国关于帝国终结的文献》), Volume Thre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 edited by David Goldsworthy, HMSO, 1994. No. 363. 转引自前引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第176—177页。

② *Command Papers* 3581. 3582号(《英国政府敕颁文件第3581、3582号》)转引自前引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第172—173页。



害宗主国利益的经济措施(国有化、提高关税、改变货币政策等)。应当指出,这些手段对扼制前殖民地国家施行争取经济独立,和减轻对宗主国依附性的措施上起了很大的阻挠作用。塞拉利昂1961年独立时宣布不搞国有化,10年内均未采取行动。尼日利亚10年内也都未触动宗主国企业,直至1972年才通过《本地化法令》。许多法属殖民地在宣布独立时就公开或秘密承担要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如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喀麦隆等,或奉行非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的发展方针。因此,欧洲宗主国基本上没有因前殖民地实行国有化而受到什么经济损失,即使实行部分国有化,而给予的经济补偿也是优惠而足够的。

#### 四、殖民主义撤退后留下的祸患

殖民主义撤退手法和近百年殖民统治给非洲殖民地人民留下深重的灾难。

1. 经济上的灾难:由于法国在非洲撤退前已经是“欧共体”的积极成员和主导力量,因此,在撤退过程中,法国利用它同法属殖民地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种种条约、协定,将“联系国”(殖民地)全部纳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经济轨道,而英属殖民地则全部都加入英联邦和英镑区,因而使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不平等贸易关系都保存下来。首先,“殖民地经济模式”历经数十年而少有变化,形成殖民经济体系的连续性。独立后虽然超经济强制失去殖民政权的庇护,但近百年来在强制干预下形成的经济资源配置,如单一种植制等仍在未变的殖民经济轨道上延续下来;而且依附性经济的强大体制力量,包括历史惯性力量,使得新独立国家政权为了保持外汇收入,增加国内积累资金,不仅在一定时期内无法改变单一种植制而且还需要扩大种植而积以增加出口。因此,非洲经济仍以生产原料为主并继续以向原宗主国英、法市场出口作为外贸的主要方向,只是由于欧共体的出现,出口市场扩大到欧共体的其它

主要国家西德、荷兰等。70年代以后在35个非洲新独立国家中，有27个非洲国家都是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共体”为主要贸易夥伴的。其次，主要出口货物仍是以农业原料和矿业原料及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只有毛里求斯一国的主要出口货物中包括工业产品（服装）。依然存在不平等交换关系。前宗主国仍以高价的工业品换取前殖民地的低价原料和初级加工产品。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殖民主义撤退后在非洲殖民地留下了极不成熟、极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外市场联系密切，而在国内却长期未能形成统一市场，只形成区域性市场。殖民主义撤退时已把非洲市场经济为宗主国生产的依附性生产格局固定化了，而非洲经济自身发展中所形成的内部需求已被扼杀殆尽，包括粮食和服装等基本需求都需要靠进口来满足。这样一种扭曲的、畸形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新形式殖民主义控制的基础。

下表揭示在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15个非洲殖民地独立时（1961年）和独立以后14—18年（1975年）出口贸易和贸易去向的变化：

1961年和1975年非洲14国输出的构成和去向<sup>①</sup>

国名	贸易构成		贸易去向			
	产品	1961(%)	1975(%)	贸易伙伴	1961(%)	1975(%)
冈比亚	花生			英国	50	50
	食品	93	95	意大利	—	—
	石油、肉类			荷兰	—	21
		—	—		—	—
	总额	93	95		50	71
加纳	可可	60	64	英国	29	15
	木材	13	11	美国	23	11

<sup>①</sup> 前引科林·勒古姆：《八十年代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148—152页。

国名	贸易构成		贸易去向			
	产品	1961(%)	1975(%)	贸易伙伴	1961(%)	1975(%)
几内亚		—	—	荷兰	12	10
	总额	73	75		—	—
	铅	72		法国	64	36
	菠萝		10	喀麦隆	18	
	咖啡		6	苏联	11	
			—		9	
尼日尔	总额		88		—	38
	花生	67	15	法国	78	22
	铀	—	43	西德	—	66
		—	—	尼日利亚	16	15
	总额	67	58		—	—
尼日利亚	原油	7	93	英国	44	13
	可可豆	19	4	美国	11	26
	棕榈油	11	—	荷兰	13	10
		—	—		—	—
	总额	37	97		68	49
多哥	磷酸盐	3	79	法国	58	39
	可可豆	28	12	荷兰	10	32
	咖啡	27	4	西德	—	10
		—	—		—	—
	总额	58	92(原文如此)		68	81
布隆迪	咖啡	87	88	美国	45	
	棉花	6	—	西德	22	
	茶叶	—	3		—	—
		—	—		—	—
刚果	总额	93	91		67	
	石油	—	62	法国	26	22

国 名	贸易构成		贸易去向			
	产品	1961(%)	1975(%)	贸易伙伴	1961(%)	1975(%)
加 蓬	木材	61	19	西 德	31	—
		—	—	意大利	—	15
	总 额	61	81		57	37
	石油	16	81	法 国	56	20
	木材	49	—	西 德	16	—
扎伊尔	铀	11	—	美 国	—	18
		—	—		—	—
	总 额	76	81		72	38
	铜	64	63	比利时	47	39
	咖啡	10	4	美 国	13	—
马拉维	棕榈油	22	—	意大利	7	14
		—	—		—	—
	总 额	96	67		67	53
	烟草	34	48	英 国	35	—
	茶叶	27	20	美 国	7	—
毛里求斯	糖	—	12	荷 兰	6	—
		—	—		—	—
	总 额	61	80		48	—
	糖	92	84	英 国	81	77
	服装	—	6	法 国	—	6
乌干达		—	—	美 国	1	6
	总 额	92	90		—	—
	咖啡	29	75		82	89
	棉花	35	11	英 国	16	20
	茶叶	3	6	美 国	14	20
	—	—	日 本	—	8	
	—	—		—	—	
	总 额	77(原文如此)	92		30	48

国名	贸易构成		贸易去向			
	产品	1961(%)	1975(%)	贸易伙伴	1961(%)	1975(%)
赞比亚	铜	88	90	美国	32	15
	锌	—	4	日本	11	17
				西德	—	14
		—	—		—	—
	总额	88	94		43	46

分析上表可以看出,在保持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控制的条件下,殖民主义的政治撤退并没有为非洲新独立国家改变不合理经济结构和不平等交换关系创造有利条件:(1)经过独立后十几年发展,绝大部分国家仍保持畸形的单一经济,很大部分耕地仍用来种植专供出口的一种或几种经济作物(咖啡、可可、棉花、棕榈产品),大部分工业能力用来生产一种或几种矿产品(铜、铀、钻石)或初级加工产品(如精炼铜)。采矿业因原宗主国和欧共体的需要,1960—1965年年增长率达18.5%。(2)外国垄断资本仍然控制许多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投资,进一步扩大了对石油、铬、铀、金刚石等新矿业开采的控制,并继续控制某些制造业和金融、交通事业。(3)非洲生产力发展仍然十分缓慢。1960—1975年,非洲制造业产值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从0.7%增至0.8%。(4)外贸构成和方向基本未变:有15个非洲国家单一原料出口仍占出口总值的79%。有16个国家50%以上出口值集中于2—3个发达国家(多为前宗主国)。对前宗主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程度没有减轻,与独立前不同的只是现在不仅依赖原宗主国,而且经济依赖扩大到欧美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

尽管如此,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仍然是非洲经济比较顺利的时期,英、法、欧共体和美国对非洲农业原料和矿产原料都有很大需求,对非洲的资本输出也较多。非洲大陆对欧美发达国家仍起着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作用。1960—1965年非洲

农业年增长率为 1.4%，加工工业年增长率为 8.5%，采矿业年增长率为 18.5%，农业原料和矿业原料大批出口到欧洲，对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显著放慢以及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西欧和北美对非洲经济的需求逐渐降低：首先，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减少了对非洲传统原料的需求量。塑料、化纤、光导纤维等的大量应用，减少了棉花、麻和某些金属的消耗量，非洲原料价格和产量大跌。其次，欧共体内部对资金需求激增，吸引了大量投资，80 年代后对非洲资本输出剧减。1986 年非洲资金外流净值据估计超过 300 亿美元。再次，世界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抬头，使非洲出口受到越来越大限制。非洲前殖民地在原宗主国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下降。非洲的出口在欧共体的总进口额的比例不断下降，欧共体向非洲出售的剩余农产品不断增加。欧共体对非洲前殖民地的投资也不断下降，因为世界其它地区有更高的利润回报率，尽管按几个《洛美协定》，欧共体每向非洲等地区投资一个欧洲货币单位就可通过不同的机构赚回 10 个。<sup>①</sup> 1981—1982 年采矿业的年增长率下降为负增长 -13.2%，1982—1983 年更跌落到 -24.6%。1982—1983 年农业增长率下降到 0.4%。非洲商品价格跌落到近 50 年来最低点。1986 年商品输出总额为 4500 万美元，比 1985 年的 6400 万美元下降 29%。非洲债务总额 1974—1985 年增加 6 倍多，超过 1750 亿美元。非洲陷于深刻危机之中。

2. 社会动乱：在殖民撤退时期，宗主国为了在独立后能保持其对殖民地的控制，预先规定了殖民地实行“自治”或“独立”的前提必须实行多党制。这一策略包含的祸心是让亲宗主国的党派在“多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以保证其在“竞选”胜利后掌权。在非

---

<sup>①</sup> 前引《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非加太公约》，第 181 页，贝阿纳·卡赛《第三个洛美公约的签订》载《非洲月刊》1985 年，第 231—232 期。

洲现代民族和政治民主远未成熟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多党政治实际上就是部族主义政治。“一个部族一个党”,党派不是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成为部族的政治组织。宗主国并不希望殖民地出现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政党,因为这种政党也往往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真正民族主义政党。宗主国在漫长的统治时期中千方百计保持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如英国在尼日利亚北部),压抑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加上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社会阶级分化很不明显,撒哈拉以南非洲相当部分地区基本上仍维持着血缘纽带相当牢固、传统性浓厚的部族社会。在独立前,宗主国以多党制为实现“自治”和“独立”的前提规定,纯系出于自私目的,实际操作上是互相矛盾的。其结果,在独立前夕,部族便成为一些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的政党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部族与“政党”竟连成生死存亡的关系。在不少殖民地,独立前夕“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权力再分配的工具或筹码。在殖民当局摆布下,政党充当部族代言人,在本部族群众中拉票贿选,已经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例如黄金海岸(加纳)、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在制宪改革和立法议会选举中,政党之争往往引起部族间争斗,竞相利用“部族情结”煽动文盲群众为部族掌权而战斗,酿成多起流血惨案。这些特制的“部族政党”在独立后成为长期社会动乱的根源。由于殖民主义撤退时制造矛盾、分而治之,埋下祸根,导致独立后非洲国家发生由政变而导致政权更迭的有80多次,未遂政变有300次之多,遍及非洲半数以上国家。<sup>①</sup> 建立过军人政权(多为原殖民军的大小头领)的占非洲国家半数以上。政变频仍,内战不断(比夫拉战争、苏丹内战、乍得内战、布隆迪和卢旺达内乱……)使独立后非洲陷于极不稳定的社会动乱之中。

---

<sup>①</sup> 据新华社通讯等统计。

### 第三节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 在非洲的体现

#### 一、关于殖民主义在非洲功过评价的争论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于1853年在一篇研究印度的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他50年代对印度的研究作出了总结性理论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sup>①</sup>又说“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②</sup>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所有的殖民地。

有些学者主要从功过的角度来评价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或说殖民主义在非洲功大于过；或说过大于功；或说功过难分；或说功过相当。有人认为，在非洲的殖民主义一无是处，带给非洲殖民地的只有血泪和灾难。有的学者明确表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sup>③</sup>也有人认为，殖民主义开启了非洲殖民地社会的现代化。有人认为，对非洲的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评价应有不同：在原始积累时期贩卖奴隶只有过；在自由资本时期禁止非洲奴隶贸易是功大于过；在私人垄断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③ 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1992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第三版。



本主义时期是过大于功；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二大战争期间到战后是功过相当。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非洲殖民主义的“功过”问题有如下看法：菲尔德豪斯将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看成是祸福相当，功过难分。他认为，“对殖民主义不应像往常那样的赞扬或责备，如果说它没做什么来克服殖民地的贫困状态，那也不能说是它首先使殖民地陷于贫困。殖民帝国有很深远的经济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sup>①</sup>罗德尼等认为，“殖民主义只有一面——它是吃角子老虎”，<sup>②</sup>殖民主义对非洲纯粹是一场灾难，除了不发达和落后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甘恩和杜伊格南则认为，算起账来，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sup>③</sup>“我们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划等号。……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动力”。<sup>④</sup>

有些学者则从“双重使命”的角度来认识殖民主义在非洲的作用。本章作者认为，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中都是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要把两种使命作为一个整体，看作一个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步骤。在过程的开端，“建设性作用”就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而在整个过程的进展中，破坏性作用同样也寓于“建设性作用”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中两个并存面又矛盾着的方面，是一个非常深刻、辩证的悖论。历史学家对于殖民主义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历史现象，只能自觉地依据马克思所教导的辩

---

① 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殖民主义：1870—1945》), London, 1983, p. 105.

② W.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欧洲是怎样使非洲成为不发达的?》) Dares Salaam, 1972, p. 223.

③ L. H. Gann and P.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帝国的负担》) London, 1967, p. 382.

④ L. H. Gann and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Cambridge, 1969, vol. 1, pp. 22 - 23.

证分析法,一方面充分地、无情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性,一方面承认它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适当地肯定它客观上的历史进步作用。只有用这样的观点来撰写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我们才能不仅批判殖民主义罪恶,而且能够有说服力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各种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能够从容地对付殖民主义及其遗留的种种历史影响。

许多学者都指出,“双重使命”在不同的殖民地完成的情况悬殊很大。例如,“双重使命”在非洲完成情况同在印度完成情况就有很大差别。同样在非洲,英属西非同葡属非洲也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1)宗主国的经济、政治情况不同,“双重使命”在执行和完成程度上将大相径庭。2)各个殖民地区的历史情况、殖民剥削对象、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因而它们所受的影响在量和质上都会有很大的差别。白人移民多的殖民地如南非、阿尔及利亚,同白人移民少的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就极不相同。3)殖民前期与后期殖民地所受的宗主国影响亦大不相同。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 二、殖民政权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殖民政权在非洲蓄意保存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不乏其例。英国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数十计的埃米尔国、苏丹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悉心保护,几十年中未动分毫,直到二战末期制宪改革启步才稍加触动。殖民主义并不不要摧毁非洲的落后生产方式,只需要将它们移植到殖民基础上。殖民主义主要目的是,同各地区现存的生产关系相结合,获取垄断利润。在对待非洲传统社会结构上,无论是英国的“间接统治”,法国的直接统治或是葡萄牙、比利时的小国统治方式,都是一切服从于宗主国的利益。这是所有殖民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客观后果是不自觉的。在非洲,宗主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殖民地的传

统制度(封建制的、奴隶制的、半原始制的)之间存在着“并存”和“双向互动”的关系是很普遍的。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虽具有破坏传统制度的能力,但在非洲许多地区它并不主动地动用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予以干预或摧毁。葡萄牙本身则缺乏这样的破坏能力。广袤内陆地区因交通不便,十分闭塞,提供不了多少殖民利益,各宗主国对大部分地区旧的传统社会结构,都一仍前制,让其完整地保存着。所以,殖民主义一般并不存在主观上要摧毁非洲的传统结构的动机。

但应当注意到,主要在非洲沿海和沿河地区和铁路沿线由于引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某些矿区的大规模开采,出现了土地商品化和货币经济及拥有货币财富的社会阶层。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使这些地区的非洲传统社会受到了结构性的震撼。殖民主义在这些地区无疑对传统社会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关于受到这种影响的地区范围和社会居民人数有多大,研究者的估计悬殊较大。W. 罗德尼认为,到 20 世纪 20 年代,非洲社会的每一部分包括以保守闻名的牧民都已纳入了货币经济。<sup>①</sup> 霍普金斯在《西非经济史》中甚至认为,货币的引进、银行活动和非洲与欧洲贸易量的巨大增长,完成了“将西非纳入了工业化世界的进程”。<sup>②</sup>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范围有限。

### 三、“破坏性使命”在热带非洲完成的限度

有的研究者指出“破坏性使命”在热带非洲的完成有一定限度。<sup>③</sup> 他们认为殖民主义对热带非洲许多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的

---

① 见前引联合国教科文的《非洲通史》第 7 卷,第 279 页。

②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 235.

③ 郑家馨,《具体分析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 期。

瓦解作用,并没有像它在印度发挥出那么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殖民主义对这类经济结构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殖民地每年输出和输入的商品量。直到20世纪20年代,全部英属非洲,不包括南非,面积为2 320 534平方英里,进口商品总额仅为3 300万英镑,不及同期面积为1 805 332平方英里的印度进口商品总额2.35亿英镑的1/7。<sup>①</sup>英国“廉价商品重炮”的威力在热带非洲大大衰减,其破坏作用较小,在广袤非洲内陆地区几乎觉察不出来,因而英国商品对非洲农村经济结构的侵蚀过程异常缓慢。

法属非洲情况与此相似。法属西非仅1/12耕地生产了其出口经济作物的80%—90%,而9/10耕地基本上不生产出口经济作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85%的物质财富是由仅占面积5%的土地生产出来的。<sup>②</sup>不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广袤内地农村,缺乏货币,无力购买进口商品,甚至很少购买本地商品,仍然保存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原封未动或变化很少。直至独立前夕,非洲许多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的80%或90%依靠当地的经济供应。<sup>③</sup>菲尔德豪斯也指出:到1945年,绝大部分非洲殖民地都远未解决改造(旧)社会结构问题。<sup>④</sup>然而,菲氏和甘恩、杜伊格南都认为这是因为“殖民时期作为社会达到成熟的历史过程”,对非洲许多国家来说“都太短了”。<sup>⑤</sup>“可以用来促进市场体制,提供基础设施、发展人力资源和输入技术及资本的时间

---

① 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619页。

② Gann and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at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 Cambridge, 1969, vol. 4, p. 693.

③ Ibid, p. 692.

④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p. 49.

⑤ Ibid, p. 49.

太有限了”。<sup>①</sup>一言以蔽之，殖民主义呆在非洲的时间太短了。实际上，主要不在于时间太短（也有 70—80 年），而是因为“私利”（垄断利润）这根撬动“双重使命”的杠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在热带非洲要比在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小得多。英国输入热带非洲商品量少和进出口贸易总量小的原因在于商业利润相对较低，许多部门未能获得垄断性企业所企求的超额利润。因而它对英国的商人和投资企业家的吸引力要比印度的吸引力小得多。商业利润低的重要原因在于交往工具极不发达，非洲的公路、铁路特别是内陆铁路太少，运输费用极高，使商品和原材料的成本高昂。在不通铁路的地方罕见英国商品，一般也不生产英国所需的原料。另一原因是世界市场对热带产品的需求量出现递减趋向；高技术的发展，使用新材料替代了对非洲原料和金属的使用量和消耗量。这也是在战后经济中，非洲作为殖民地的作用下降的原因。

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社会结构“破坏性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当地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特点、发展程度和殖民政权实施的“土著政策”。热带非洲社会结构，除了“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同印度和中国一样的内部坚固性外，还具有一些特点：血缘纽带十分强韧，氏族部落制度牢固存在，部族意识强烈，土地公有制有强大生命力。英、法、葡、比等殖民政权从宗主国利益出发，都力图保存并利用最基层一级的村社结构及其村长老、酋长等传统力量，使之成为殖民统治服务。因此，在殖民统治 80 年时间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很有限的，各个部族 (Tribe) 自然同化并聚合成现代民族的过程受到重重的阻碍。直至殖民统治结束时，非洲只有少数族体形成了现代民族，而为数极多的族体仍处于部族或正向民族过渡的形式。据估计，非洲有 1000 个部族，仅比属刚果就有 6095 个部落单位 (1918 年统计)，苏丹有 2000 多个部落单位。部落尽管已是次

---

<sup>①</sup> Gann and Duingan, *op. cit.* vol. 4, p. 693.

生(secondary)形态,但大多有村社结构为其基础,靠强韧的血缘纽带维系,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殖民主义的政策(如比利时禁止各部族来往)起了凝固村社一部族结构的作用,甚至没有打破各部族之间互相隔绝的状态。<sup>①</sup>在独立以后时期,根植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部族势力仍然颇具力量,对政党关系和军队关系影响很大。“非部族化”的措施举步维艰。以部族为主体的政变层出不穷。这些“历史痼疾”说明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一般并没有在热带非洲造成一场如同19世纪中叶印度那样规模和深度的“社会革命”。这种迥异状况使我们思索马克思1872年在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中一句经他作了修改的名言:“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up>②</sup>可见,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作用”未必充当得了尚未达到“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菲尔德豪斯等未能看到,西方殖民政权(超经济机制)对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正是要阻碍殖民地经济发展沿着民族资本主义方向走,而极力推动它沿着“外围”从属于(依附于)“中心”的另一种方向走。殖民主义无论是彻底破坏了殖民地的旧社会结构(如印度),或未曾完全破坏旧社会结构(如热带非洲),都是要迫使殖民地经济结构适应于为宗主国服务,充当被强迫安排的国际分工中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的角色。

#### 四、关于“建设性使命”在热带非洲完成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所论述的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作用”,总的来说,越是到

---

① 参阅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1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13页。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未修改的原文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垄断资本阶段则越大,因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和加速被输入资本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在热带非洲这方面也有它的特点。热带非洲在世界各大洲殖民地中属于殖民地完成“建设性使命”最差的地区。其原因如下:

第一,宗主国向热带非洲输出资本,与亚洲、美洲、大洋洲比较是时间上最晚和数额上最少的。到1911年,英国向海外投资总额为27.7亿英镑,其中投向热带非洲的最少,从1870年到1913年43年间仅投入0.373亿英镑。<sup>①</sup>法国同一时期投资热带非洲为0.25亿英镑,比利时为0.4亿英镑,德国为0.85亿英镑,共1.873亿英镑,只及英国一国在印度投资3.789亿英镑(1914年)的49%。1914—1936年间,各国主要为英国向英属非洲投资5.81亿英镑,绝大部分投向南非,向法属非洲投资为0.295亿英镑,葡属殖民地为0.667亿英镑,比属殖民地为0.944亿英镑,<sup>②</sup>投资项目主要投向铁路和采矿业。1951—1959年平均对撒哈拉以南(不包括南非)的长期投资(包括私人投资和国家资本、银行投资和官方赠款)也只有20多亿美元,只占投资于不发达国家总额61亿美元的32%。<sup>③</sup>这样少的投资额撒到20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非洲,人均数不过10英镑左右。因此,殖民主义为热带非洲提供的基础设施是很不充分,也不实用的。

尽管如此,应该看到,殖民主义对非洲所起的深远的积极作用,首先就是提供了铁路、公路、电讯、电话和港口设施,个别地区还有机场等基础设施。1852年至1899年在非洲修建铁路2万多公里,1900—1940年修建铁路5万多公里。各种公路约130万公

---

① Fieldhouse, *Economic and Empire*, p. 55. 但同期英国投资南非为3.7亿英镑。

②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原法属、比属和葡属地区的殖民经济,1914—1935年》,载联合国教科文主编:《非洲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7卷,第286页。

③ Gann and Duignan: *Colonialism at Africa*, vol. 4, p. 678.

里(绝大部分为简易土路,柏油路仅占 1/10,多在南非)。殖民时期修的海港大部分为驳运港和激浪港,二大战后在 11 个殖民地和 11 个国家中修建了 13 个海港,港口设施开始设置现代化装备。航空线多为殖民地与宗主国间的直接连接线,主要用于邮政运输,机场很少,设备简陋。然而,这些基础设施毕竟改变了热带非洲陆上运输全靠人力、头顶载货,水上运输为独木舟和小帆船的极端落后状况,它既促进了各种货物、经济作物、矿产品的运输,也促进了人员的流动。二战后的 20 年中,英、法在非洲殖民地推行有关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比战前 50 年建设了更多的道路、港口、桥梁、水库、电站等基础设施,对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比较而言,这批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殖民主义为非洲提供了最有意义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撤退”以后跨国公司对非洲的私人投资呈激增趋势:1976 年法国在非洲直接投资为 50 亿美元,占当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 119 亿美元的 1/3 以上。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 1979 年为 56.26 亿美元,比 1960 年 9.25 亿美元增长了 5 倍。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的。

第二,无论怎样,非洲的商品—货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它主要限于在沿海、沿河和沿湖地区及种植出口经济作物地带。但货币已经渗入农村,甚至影响了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即使在农村,人的地位也不再只是以千年以来的传统观念,即以出身、妻子和子女多寡来衡量,而是以他们所拥有的货币及其土地出产的经济作物的产量来衡量。尽管存在着单一种植制和经济片面、畸形发展的种种弊病,但越来越多非洲人家庭日益密切地与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转移。非洲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930—1940 年为 20 个,1940—1950 年增加到 40 个,1960 年为 70—80 个,1970 年为 110 个。尤以热带非洲增加最多。30 年代时只有 4 个,到 70 年代增至 60 多个。非洲 50 万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二大战前



只有 2 个,70 年代已发展到 25 个,其中 100 万人口以上大城市有 8 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25% 以上的国家,1965 年为 8 个,1970 年猛增到 15 个。涌现了许多成为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矿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新城市,如由于修建乌干达铁路的中转站而兴起了肯尼亚的内罗毕城,1940 年人口已达 25 万人。由于修建铁路南罗得西亚兴起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城。作为新兴矿业中心而闻名于世界的城市有南非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城,还有北罗得西亚的“铜都”卢萨卡和比属刚果的路路阿堡。随着新港口的修建而兴起的城市有黄金海岸的塔科拉迪,尼日利亚的哈尔科特港。内陆的村庄因修通了铁路而成为大城市的,有法属苏丹的巴马科和尼日利亚的埃努古等。许多地处热带雨林和高原荒漠的地方,上个世纪还是狮豹蟒蛇出没,人迹罕到,到 20 世纪已变成车船辐辏的繁荣商业中心和矿业中心。城镇的兴起和城市化的迅速进展,为非洲的不发达、不成熟的商品—市场经济走向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奠定了有意义的基础。也就是为整个非洲大陆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发挥真正的市场机制作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城市化、市场经济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殖民主义作为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不管它是仅仅把非洲带到这个市场经济领域的起点,或者只是起了促进非洲人从自己已经到达的起点向终点前进的作用(历史学家对此观点不一<sup>①</sup>),都是在客观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三,热带非洲在殖民前基本上是无文字社会。虽然中古时期伊斯兰文明曾给西非北部地区(北尼日利亚)和东非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地区)带来了阿拉伯文字,但在近千年时间中进展甚慢。殖民主义将欧洲的拼音文字输入热带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改变

<sup>①</sup> 霍普金斯(A. G. Hopkins),佩勒姆(M. Perham)和博亨(A. A. Boahen)在这一观点上不一致。参阅前引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Perham, *The Colonial Reckoning*; Boahen, *Topic in West Africa History*.

了撒哈拉以南地区语言的无文字性,提供了一种作为交往手段的通用语(英语或法语),这对于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和促进地区间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二战后宗主国随着推行《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在教育方面投资有所增加,并在大部分地区建立技校和大专院校(虽然一国只有一所大学)。几乎所有地区都建立了小学。这就增加了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人数,培养了一些中等技术人才。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建设性使命”中所提到的“政治统一”、电报通讯系统、作为改造旧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的自由报刊、“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sup>①</sup>等都在非洲大陆普遍出现了。殖民主义给非洲上层建筑也带来了许多新因素。

第四,“建设性使命”在非洲的另一面也不能忽视。应当指出,殖民主义在世界所有殖民地中对热带非洲的工业、商业的发展所施加的限制是最严厉的。它把热带非洲纳入国际经济轨道,使之处于极端不利的受剥削地位,不许它有任何改变。坦噶尼喀从德国殖民地转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后,1932年西沙尔麻种植园资本家要在本地建立一座制绳厂立即遭到伦敦制绳商的强烈反对。二战前在热带非洲甚至连生产火柴、蜡烛、香烟、食油、石灰、桔子汁一类简易的产品的工厂都不许建立,全要从宗主国进口。菲尔德豪斯指出,在1945年前没有一个非洲殖民地政府建立过“工业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刺激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上几乎没做什么”。<sup>②</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6年报告中,对殖民主义全面忽视热带非洲“工业化”做出准确的报导:在非洲“任何一种具有动力机械和相当数目劳动力进行生产的工业都是最近才有的,并且只限于一些很分散的中心点……,绝大多数的工业制成品仍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248页。

② Fieldhouse, Colonialism, p. 68, p. 102.

是由海外进口,当地的活动大部分依然局限于进口工业品的装配、修理和出口”。<sup>①</sup>殖民主义有意识地全面忽视热带非洲“工业化”,甚至不准农产品加工业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非洲怎能为自己的“工业化社会”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评价,我们借助逆向考察法,“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sup>②</sup>我们发现,殖民主义的潜在的历史性质正在逐步地充分展现出来,原来被掩盖的假象也渐露真容。在已经摆脱殖民统治 20—45 年的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历史发展过程中,殖民主义历史中的消极成份和罪恶对其社会发展的破坏和阻碍作用逐渐暴露得更加充分,如在殖民主义强制造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国际性强迫分工所形成的极不合理的现实国际经济秩序,正继续严重阻碍着非洲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分而治之”原则造成的部族社会的割裂和对立状态,在独立后给非洲社会不断地酿造苦果;层出不穷的具有浓厚部族色彩的政变和部族间的血腥屠杀……,仅是已浮现出来的殖民统治严重后果的一部分。同样,殖民时代历史的某些积极作用即“建设性作用”也正逐步地表现出来,非洲一些国家拥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努力着手本国的“现代化启动”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和逐渐成熟……,正是殖民主义完成“建设性使命”中所“奠定的物质基础”。<sup>③</sup>

90 年代,在评价殖民主义历史作用时,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极右论调的干扰。阴魂不散的殖民主义思想冒出了“把非洲重新殖

---

① UNESCO, *Social Implication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 1956, p. 11.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7 页。

民化”的鼓噪。这种鼓噪的特点是全面歪曲历史,把殖民主义的“积极作用”(按他们的随意解释)夸大到荒诞的地步,胡说非洲今日灾难的“祸根”是“60年代独立的悲剧”,与“殖民主义……无关”。这种思潮的真实本质是冷战结束后萌发的一种“新帝国思想”。当然,这些历史发展中的小小回潮所漾起的鼓噪声浪与科学研究毫不相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我们史学研究的基础。

### 第三章 近代殖民主义的 兴起——葡萄牙 人在非洲的早期 殖民活动

推动葡萄牙人进行殖民冒险的动因是寻求黄金。葡人在资本主义萌发时期对世界的贡献在于打通了绕好望角去印度的航道。他们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一些殖民据点,贩卖黑奴,培植奴隶种植园经济,试验了以后的各种殖民统治形式,实践一种最落后的殖民形式。葡萄牙人在普林西比和圣多美等岛屿建立了早期奴隶种植园制,是后来繁衍于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奴隶种植园的雏形,影响至深。

#### 第一节 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崛起

##### 一、黄金的驱动

1453年5月29日,当土耳其骑兵冲进君士坦丁堡城门,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在城门口被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整个地中海世界震惊了。土耳其军队继续挥戈南下,东地中海成了土耳其人的囊中物。威尼斯商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对土耳其人恨之入骨。偏安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的高加索血统统治者面对咄咄逼人的土耳其军事力量,寝食不安。“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的逻辑,促使威尼斯人同马木路克结成同盟。威尼斯商人慷慨解囊给予财政困难的马木路克大笔货币贷款。马木路

克则给予威尼斯商人贩运东方香料的贸易独占权。这样,精明的威尼斯商人总算在东地中海一隅打开了与东方传统贸易的一个小小缺口。

盛产于爪哇、印度、锡兰的芬芳香料,是15世纪当时国际贸易价值最高、需求量最大、利润最丰厚的畅销商品。香料以及仅次于香料的丝绸、瓷器等东方传统商品,由阿拉伯麒麟巨舶或中小型三角帆船,从东方产地经印度洋运抵红海北部港口,转为陆运,由骆驼商队运到亚历山大港。早在13—14世纪埃及专营香料的卡列米特商人团体的经济力量就已十分雄厚,约有二百个富商以经营香料等东方贸易发了大财,拥资超过一百万第纳尔,他们在红海和印度洋拥有的商船队数以百计。<sup>①</sup>15世纪上半叶突厥人兴起,陆路的“蒙古商道”屡被破坏。如今(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威尼斯商船队被迫从黑海撤回东地中海的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马木路克君主慨允威尼斯人在以上两港转贩香料。威尼斯商人喜出望外。他们贩运香料数量颇巨,仅伦巴第各城市通过威尼斯进口的胡椒,价值就达30万杜卡特。15世纪威尼斯从东方进口的货物总重量约10 000公吨,<sup>②</sup>大部分是分量较轻而价值昂贵的货物,如香料、丝绸、宝石等。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欧洲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威尼斯商人所能供应的货物数量虽巨,仍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地处亚平宁半岛西北的热那亚人在同威尼斯人的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既被排挤出东地中海,而北非贸易亦被威尼斯人首着先鞭。满怀妒意而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的热那亚人纷纷转首西向,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阿拉贡和卡斯蒂寻找新的机会。威尼斯商人从东方贸易中获取超常丰厚的利润也引起大西洋沿岸西欧诸国的

<sup>①</sup>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 vol. 3, p. 50.

<sup>②</sup>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卷,第250页。

嫉妒。

但是,自从霍尔木兹—黑海的商道被关闭以后,欧洲人几乎完全依靠亚历山大港供应东方香料和其它货物。当时只有少数品种的欧洲货物是埃及和利凡特所需要的,因此欧洲必须用金银支付大部分东方货物。15世纪欧洲蓬勃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愈益增多。欧洲封建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从事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需要越来越多的黄金和白银。自1252年佛罗伦萨首铸金币后,各国接踵铸造各自金币。西欧历来贵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并不发达,产量有限的贵金属矿主要出自东欧,而白银大多从铜矿和铅矿中开采,品位较低。虽然1470年以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促使银和铜的矿产量大幅增长,1500年全欧白银生产达到最高水平,年产量也不过65 000公斤。<sup>①</sup>但黄金仍亟感匮乏。

从8世纪起,欧洲的黄金主要来自西苏丹。<sup>②</sup>14—15世纪西苏丹黄金大量输入欧洲,黄金流通较为充足。早先(10世纪以后)欧洲市场上只流行拜占廷的贝森特和阿拉伯的第纳尔两种金币,如今热那亚也铸造热那维诺金币,佛罗伦萨(1252年)和威尼斯(1284年)也分别拥有杜卡特、弗洛林金币。甚至黄金尤为匮乏的葡萄牙也在1383年自铸金币。发行金币国家增多,但黄金来源并未扩大,因而数量有限的金币流通仍然满足不了迅速扩展的商业的需求,更无法保证以金币作为主币和本位货币来稳定币值和物价。15世纪的欧洲一直经受着货币供应不足之苦的煎熬。最使欧洲金融家忧心忡忡的是,所有较大的黄金产地都不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黄金产地稳操于阿拉伯人之手。

---

① 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6页。

② 卡·M·奇波拉:《地中海世界的货币、物价和文明》(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纽约,1967年,第5页。

最大的黄金产地是位于几千公里之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苏丹地带,它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甚至阿拉伯中间商也不知其确切地点。欧洲人仅知阿拉伯商人在马里市场上用各种商品换取金块(或金沙),由骆驼商队跋涉沙漠运到摩洛哥。令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324—1326年马里国王曼萨·穆萨前往麦加朝圣,8000名随从中的500名奴隶竞各执一根约4斤重的金杖,100匹骆驼各驮300磅黄金。<sup>①</sup>马里君主挥金如土,仅馈赠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纳西尔素丹就有5.5万金第纳尔。他一路布施和花费的黄金充斥开罗市场,使埃及金价跌落12%,此后12年未能恢复原价。这个消息在欧洲引起轰动。1339年欧洲犹太人制图家绘制的地图上,出现的马里国王被称为“金矿之王”。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本描述东方(中国、日本、印度)“遍地都是黄金”的《游记》,在15世纪下半叶重新掀起阅读热潮(出版各国文字译本)之前,欧洲人对黄金的贪婪目光一直注视着热带非洲的某些宝地。

## 二、葡萄牙人得风气之先

在欧洲人搜寻黄金的热潮中,葡萄牙人得风气之先。葡萄牙自从12世纪收复失地,摆脱阿拉伯人统治,建立独立国以后,充分利用大西洋沿岸的地缘关系,发展自己的优势,首先大力发展航海业。葡萄牙王室为鼓励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制定了多项政策和法令:免除船主多种捐税;鼓励种植桅材林,准许其在王室森林伐木造船;引进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招募热那亚的造船工匠、熟练海员到葡萄牙工作或定居;对优秀造船官员、技师和工人赏赐武士特权;建立国家商船队和船舶保险公司(保证国家商船队数目不因海损而减少)。聘请犹太籍的地图绘制家到葡工作。葡萄牙造船和航海技术,迅速跃居欧洲首列。约在13世纪,中国的

---

<sup>①</sup>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p. 381.



船尾舵装置技术已传进欧洲,代替了自古以来使用的侧面浆,保证了远洋船的方向装置不致被风浪损毁。葡人又将阿拉伯的三角帆与欧洲的横帆相结合,建造二桅和三桅帆船(卡拉维尔帆船),使远洋帆船既能顺风行驶,也能逆风行驶,加上使用中国人的罗盘,从而保证了远航帆船能顺利返航。这些技术使水手敢于驶向从未接触过的遥远海域。15世纪30年代葡人开始使用轻巧的多桅帆船在大西洋中航行,在欧洲各国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恩格斯曾指出,葡萄牙人由于“航海业的发达,为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sup>①</sup>其次,大力发展同法国、英国等国的海上贸易,商品货币经济得到显著发展,租税改用货币交纳,商人力量的影响大大增强。北部和南部崛起几个工商业中心城市:里斯本、波尔图。大西洋沿岸的贸易和航行既富了葡萄牙商人,也锻炼了水手。这支队伍的形成成为探索未来新航路的起点。葡萄牙出现一批新兴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主要由商人、船主和手工业工匠师傅等组成。中产阶级是王权的拥护者和向海外扩展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更关心自己资本的增值而不太理会议会是否按期召开。阿维斯王朝依靠中产阶级、天主教教士和土地贵族(菲达尔戈)的支持,削弱了地方大封建主势力,建立专制王权。它同商业资本在海外扩张利益上紧密结合。早在葡萄牙王国羽毛未丰年代,国王迪尼斯(Diniz 1279—1325)曾初试锋芒,任命热那亚航海家埃曼努尔·佩萨格诺(Pessagno)为首任海军上将,其家族为世袭海军司令,显示出葡王室对航海的极端重视。这位异族海军司令动用王室船舶远航大西洋,首次发现了亚速尔群岛。<sup>②</sup>其后,在阿方索四世(1325—1357)时期,又派遣另一位热那亚人,指挥探险队南下到达加那利群岛。葡萄牙人就是这样首开近代探险海洋风气之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7页。

② 或者说重新发现了亚速尔群岛。

## 第二节 近代殖民主义的第一幕—— 葡萄牙人占领休达

1415年葡萄牙出兵占领摩洛哥北部濒临直布罗陀海峡的休达城,一般被认为是近代殖民主义史上西方国家第一次占领殖民地。关于葡萄牙占领休达的动机,历史上颇有争论。法国人亨利·康崩在《摩洛哥史》一书中认为,葡萄牙人进入摩洛哥是为了防备摩洛哥的萨累海盗的侵袭。<sup>①</sup>照此说法,葡萄牙揭开殖民主义史第一页的行动竟是出于反击摩洛哥海盗的需要。事实并非如此。

葡萄牙在欧洲近代殖民史上迈出第一步不是历史的偶然。葡萄牙于12世纪在欧洲大陆成为最早完成民族统一的国家,基本上不受欧洲政治动乱和经济不景气影响。1385年阿尔儒巴罗塔战役,葡萄牙步兵大败西班牙(卡斯蒂)骑兵,使葡萄牙东部和北部边界获得安全保障。9万多平方公里狭长的领土处在大国包围之中,没有从陆地向东扩张的活动空间。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航海业的发达,促使精力充沛的、放眼大西洋的葡萄牙人向海外扩展。在15世纪初,地球上只有两个国家准备好了地理发现和缔造海外帝国的条件,东方的是大明帝国,西方的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土耳其海军囿于地中海范围,不具有远航能力。但是中国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种种原因,1433年以后自愿开始海上大撤退,因此,葡萄牙在15世纪40年代便成了向海外开拓的一花独秀的国家。

葡萄牙攻占休达是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布署。若昂一世为此召开御前会议,几经讨论和辩论之后计划才确定下来。会议决定:1.葡萄牙向外扩展的目标一律不针对欧洲基督教国家,以维持欧洲

---

<sup>①</sup> 亨利·康崩:《摩洛哥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上册,第56页。

的稳定。2. 只占领穆斯林和其它异教徒的土地。在可能被攻占的摩洛哥沿海诸城中, 权衡利弊, 会议认为, 占领休达好处最多: 第一, 休达位于地中海西口, 在军事、商业上均居重要地位; 第二, 休达城富庶闻名遐尔, 是撒哈拉驼运商路的终点站, 也是西苏丹黄金流入欧洲的转运站, 攻占该城, 可以攫取无数财富; 第三, 休达又是贵重商品的市場, 与东印度群岛(印尼)有商业联系, 控制该城可分沾东方商业利益, 并获得窥视香料贸易的窗口; 第四, 攻占休达将是对穆斯林的打击, 打着基督教旗帜, 标榜为十字军行动的继续, 可获得基督教世界的广泛拥护。占领休达的动机就是如此。所谓“反击海盗”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欧洲的海盗船与商船合二为一, 极难区分, 商人和海盗(“来时商人, 离时海盗”)通常是一身二任。横行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盗有穆斯林, 也有基督教徒。所谓讨伐异教徒的海盗, 只是一种旗号, 在它下面隐藏着葡萄牙统治者的真正目的: 黄金。

攻占休达的军事准备工作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值得注意的是, 若昂国王个人承担了军费。据说若向议会商议筹集军费, 将会泄露机密。由若昂的三个王子佩德罗、亨利和巴塞洛斯分头负责, 在全国广泛征兵, 亨利亲王负责督造一支舰队。远征军分别从里斯本和波尔图登船出发。除几个决策者以外, 所有官兵均不知出征目的地。1415年6月23日舰队驶离里斯本。8月20日穿过直布罗陀海峡, 24日在休达登陆。摩洛哥当局在葡军登陆前不久方获悉葡舰的目标所向, 来不及从各地集结兵力, 故葡军登陆未受到有效抵抗。未来航海家亨利王子与首批先遣军一起冲入城内, 并在城头升起军旗。亨利立了头功, 晋升骑士。从伊比利亚半岛贫穷山区征募来的士兵面对劫掠来的豪华奢侈的战利品乐疯了。<sup>①</sup>

---

① Oliveira Martins, *The Golden Age of Henry the Navigator*(《航海者亨利的黄金时代》) London, 1914, pp.30 - 60.

亨利面对他第一次看到的非洲无数财宝,眼花缭乱。军费是国王个人承担,掠夺所得和新辟财富便完全落入王室腰包。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葡萄牙侵占休达的意义是,它是近代欧洲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从此开始了欧洲向外殖民扩张运动。

### 第三节 葡萄牙人沿大西洋岸 南下的殖民探险

#### 一、殖民探险目标的转换与扩大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占领休达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它为葡萄牙在北非建立了一个殖民据点,而在于它决定了几百年葡萄牙殖民扩张的海上取向。占领休达没有完全实现葡萄牙人控制非洲黄金流向和分享东方香料贸易利益的目的。休达原有 24000 家商店,销售香料、丝绸、金银制品,商业繁盛,商贾辐辏。葡军占领该城,把穆斯林商入吓跑,他们避开休达而集中到西边濒临大西洋的丹吉尔港。葡萄牙占领的只是一座无利可图的死城。亨利亲王被任命为休达总督。在任期间他着手调查非洲产金地的真正位置,了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状况。他从穆斯林战俘口中听说运到摩洛哥的黄金产于沙漠以南地区某条大河的河畔,当地人称之为“金河”。<sup>①</sup>亨利又获悉当时到达产金区传统路线。金块或金砂是从马里王国南部地区(冈比亚的坎托)往北运,集中于廷巴克图(或瓦拉塔)。阿拉伯商人用各种制成品和盐换得黄金,再用骆驼或大蓬车运往摩洛哥境内马拉喀什、非斯等地。因此,要控制这条陆路,就必须占领除休达以外更多的摩洛哥领土,这势必要引起摩尔人的激烈反抗。

---

<sup>①</sup> 实际位置是在北纬 13°以南班在克、布列、阿肯等地即塞内加尔河上游和今日马里、加纳境内。

由此,亨利策划经由海路探寻南路产金区。从1418年起他就开始筹划海上路线。由他主持的从海上南下非洲的计划,从制定到逐一实施,前后经历数十年。这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由一个国家制定的目标明确的殖民探险计划。这项历时近百年的殖民探险活动,按其目标的逐渐扩大,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419—1434年:

1418年亨利挫败了摩洛哥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稳定了休达形势。翌年(1419年),亨利晋封公爵,改任葡萄牙南端阿尔加维省总督,在萨格里什建立其小朝廷。先后建立了防守工事、观测所、造船厂和航海学校。吸收和网罗一批海员、制造船舶与仪器的工匠、测绘人员和天文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犹太人地图绘制家杰胡达·克雷克斯和威尼斯经验丰富的海员阿维塞·卡达莫斯托。萨格里什制造出最新的航海仪器,如确定纬度的四分仪、简便的十字仪,新的数学图表以及其它新型仪器,并引进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亨利在设计制造新型船舶时,坚定贯彻其殖民探险意图,即新船必须便于操作,便于浅水靠岸和便于返航。拉古什船厂造出了轻帆船,载重量约为50吨,长21.32公尺,备有2—3张三角帆,能容纳20名水手。此种新型船的逆风行驶能力(即返航能力)超过有史以来任何船只(当船倾侧到 $55^{\circ}$ 仍能逆风行驶),<sup>①</sup>吃水较浅便于勘探近岸水域。第一阶段的殖民探险活动,目的明确,重点不在发现新岛屿,而是驰抵那些在14世纪或更早以前已被发现的大西洋诸岛,<sup>②</sup>宣布葡萄牙领有权。促使他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

---

① 与威尼斯方桅大船比较,当抢风调向时,前者需要调向5次,新船只需3次,可节省1/3时间和距离,缩短数周航程。

② 首次到加那利群岛探险并试图占领该岛的,大概是兰塞洛托·马洛塞洛。1312—1330年该岛以他的名字命名。1339年的平面球形图已标有该岛。参阅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1卷第257页。此书为“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印刷发行。

是,1404年卡斯蒂的恩里克三世曾使用武力将葡萄牙人在14世纪发现的加那利群岛夺走,葡占休达后,卡斯蒂又从最靠近非洲西海岸的这批群岛,覬覦摩洛哥的沿海领土,与葡萄牙展开争夺。亨利南下殖民目标昭然若揭,但他对外打的旗号仍是南下寻找过去两个多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一直在寻觅的东方基督教国王约翰。然而亨利有意将“约翰王”说成可能就是当时欧洲人心目中模模糊糊的马里国王。这个堂而皇之的旗号给亨利带来诸多方便和利益,他作为葡基督教修道会的最高首领,可以从该会财库中名正言顺地取得大笔拨款用于殖民探险的投资。

1418年亨利派遣若奥·贡萨尔维斯·扎乐科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两个船长沿非洲海岸南下。风暴将帆船刮到西边(西经 $16^{\circ}20'$ ,北纬 $33^{\circ}04'$ )一个覆盖森林的小岛(圣港岛)。在听取他们回国汇报后,亨利认定此岛可能就是14世纪中叶为葡效劳的意大利海员所发现的林亚米岛(“森林之岛”)。次年(1419年),亨利再派他们出航。果然在圣港岛西南50公里又发现一个大岛(700平方公里)。岛上森林密布,荒无人烟。亨利遂将该岛命名为马德拉岛(葡语“森林”之意),并作为领地封给其发现者。受封者见到该岛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便招募一批移民携带牲畜到群岛安家落户。首批移民先在圣港岛定居。由于1418年无意带到岛上的兔子无限繁殖,啃光农作物。殖民便移居马德拉本岛。在该岛建立了近代殖民史上第一个种殖园。葡萄牙移民首先从砍伐优质木材获利,而后烧荒种地,大火延烧七年,岛上原始森林几乎全部烧毁。移民在富含钾碱土地上种植甘蔗和白葡萄(克里特岛的马尔姆西名种),大获丰收,生产出大批蔗糖和后来驰名世界的马德拉甜葡萄酒,并大量输出。不久马德拉移民地便开始向政府缴纳大笔赋税。葡萄牙第一块垦殖型殖民地(Colony of Plantation)就是这样在远离非洲西岸的大西洋群岛上建立起来了。

整个20年代的时间,亨利都用来主持开拓马德拉岛(所有船

只均用于群岛的运输),并积累地理资料,以备远航。著名制图家克雷斯克斯受聘到葡萄牙,带来了已搜集到的、几乎所有已知的地理资料,并着手汇总葡萄牙历年海上探险所获地理资料。1428年亨利之兄佩德罗王子漫游欧洲10年后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关于东方遍地黄金的夸大记载使亨利萌生了南下非洲寻找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念头。从此,亨利手头一直珍藏着一本手抄的马可波罗游记。1431年亨利又派遣船长贡萨洛·维利乌·卡布拉尔出航,去寻找亚速尔群岛。当年发现了最东边的福尔米加岛 Formagas(东经 25° 北纬 37°),次年(1432年)发现了南边的圣玛利亚岛。亨利下令立即在该岛繁殖牲畜,准备迎接新移民。亚速尔诸岛孤悬于浩瀚的大西洋中,离非洲海岸一千多公里。此后30年又继续发现亚速尔群岛的其它岛屿。亚速尔群岛成为葡萄牙第二个垦殖型殖民地和航船停泊所。亨利下令继续南下,但是,南下非洲的船队却在北纬 26.7° 的博哈多尔角受阻。此地(今西撒哈拉)暗礁密布,水流诡谲,岸上岩石峥嵘,一片洪荒景象,迷信的水手认定这是世界尽头,不肯继续往前航行。1424—1434年十年间亨利派出15次探险船竟无一通过。

## 第二阶段 1434—1460年

1434年亨利为寻找新航路再派埃亚内斯船长去冲击博哈多尔角。这次终以远离近海向西航行再转而向南的航线,突破了那个“航海极限”。亨利殖民探险事业在经济上也由此获得转机。葡萄牙新王杜亚尔特将马德拉岛王室税金 1/5 拨给亨利充作航海费用。南下航程以每年百公里的速度向南延伸。1435年在博哈多尔角以南 241 公里的陆地上发现有人和骆驼的足迹。亨利令他们下次航行时要“抓几个土著回来”,但 1436 年航行并没有抓到人,只发现了海豹,水手们捕杀了许多海豹,带回海豹皮,这是殖民探险以来第一次获得可供出售的商品。亨利手下这批“黄金迷”将所见到的宽阔大港湾认定是大河(金河)的出海口,命名为金海湾(里

奥德欧罗 Rio de Oro), 以博口彩。1437 年为打通陆上南下通路, 亨利及其弟费尔南多率军南下, 进攻丹吉尔。葡军扎营内地, 遭到摩洛哥军队包围。停泊海岸的葡舰无法支援, 葡军被围困 37 天后投降。根据和约: 葡军须从摩洛哥撤出, 并交还休达。为保证和约履行, 葡必须将费尔南多王子留下作为人质。陆路进攻的严重挫败, 基本上结束了葡萄牙从陆地殖民扩张的所谓“东征军”计划, 阿维斯王室围绕是否放弃休达进行激烈辩论。丹吉尔战役惨败后, 亨利更加坚持从海上寻找进入西非产金区的路线。1441 年, 因摩洛哥战争耗尽亨利资金而中断 5 年(1436—1441)的航海活动重新恢复。继续向南航行, 在布朗角附近, 安唐·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唐两名船长抓获 12 名泽纳加黑人牧民并带回葡萄牙。亨利亲王对此大加赞赏。“因为殿下除了通过他们获得知识外, 还可以从其效劳或赎金中获利”。<sup>①</sup>其中两名黑人声称愿出巨额赎金, 被随船放回非洲, 其余 10 名在里斯本高价售出。这是葡萄牙人贩卖西非黑人奴隶的罪恶的肇端。亨利开始获得罪恶的商业性收入。佩德罗(亨利二哥)任阿方索五世(1438—1481)新王的摄政后, 鼎力支持殖民探险事业, 给予亨利垄断博哈多尔角以南航海和商业并免税的特权。

### 第三阶段 1443—1460 年

1443 年, 绕过布朗角到达阿尔巾岛。此处有丰富渔场并可从穆斯林居民手中购买黄金。黄金来自当地商人同马里的贸易。特里斯唐袭击 50 只独木舟上渔民, 抓走 29 人, 在里斯本卖作奴隶。1445 年贡萨尔维斯指挥 26 艘轻快帆船组成的舰队阿尔巾岛登陆, 该岛被选作沿海贸易的基地。葡萄牙人企图以此向内地发展, 截断摩洛哥与马里之间的驼商路线, 也以此地作为奴隶贸易的中

---

<sup>①</sup> Azurara, G. E. The Chronicle of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á, (《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的编年史》), p. 46.



间站。亨利亲王获得黄金和奴隶贸易所提供的资金,暂时缓解了航海活动的债务问题,使他得以加速南下殖民探险的步伐,此后一年向南竟延伸 800 公里,等于过去七年向前推进的距离。1445 年驶抵塞内加尔河口,当时被认为是“西尼罗河”。迪尼斯·费尔南德斯船长发现了佛得角(北纬 14.5°)。当船只驰近时,水手们看见海岬上飒飒作响的棕榈,遍地是草木葱茏的芬芳植物,便将当时地点定名为“绿角”(Cape Verde,音译佛得角),并竖立界石柱。至此,葡萄牙人越过了撒哈拉沙漠西缘(北纬 16°),进入黑人居住的青葱的肥沃地带。亨利亲王主持的殖民探险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单纯寻求黄金为主,转入黄金与黑奴并重的时期。

1443 年,罗马教皇欧根尼四世批准了摄政佩德罗给予亨利的博哈多尔角以南贸易的独自经营权。有利可图的事业导致 1444 年西非贸易公司的成立。同年,南下西非的 6 艘挂着基督十字章旗的轻快帆船驶抵阿尔巾岛。兰萨罗特(Lanearote)一次就运回 235 个奴隶。8 月 8 日在亨利主持下在拉古什首次公开出售奴隶。一位编年史家佐拉拉描述黑奴交易的惨景:“母亲把她们的婴儿紧紧搂在怀里,扑在地上用身体掩护孩子,不顾自身所受的伤害,只求与她们的孩子不要分离”。<sup>①</sup>应当指出,从欧洲国家大批贩卖黑人奴隶的第一天起,贩奴就构成西方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殖民主义在非洲存在的事实不取决于西方是否已在它的大片土地上建立直接的政治统治。有些学者以此为标准将西欧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史的开端推迟了几个世纪。这是不正确的。有的编年史家为亨利亲王辩护,说他“再三命令他的派出的船长对遇到的土人要‘和睦相处’”。<sup>②</sup>还有人坚持说,抓回黑人是为了让他

---

① Azurara, G. E. *The Chronicle of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á*(《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的编年史》), p. 46.

② 诺埃尔:《葡萄牙史》(C. E. Nowell, *A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1952, pp. 30-31)。

们皈依基督教,享受基督教文明以拯救其灵魂。但明显的事实是,正是亨利嘱咐船长们到非洲去要带上猎狗,以便追捕黑人;他给予抓回黑人最多的船长以高额奖赏并晋封骑士;当他走下为黑人施洗礼的圣坛,刚刚接受洗礼的黑人便被带出贩卖为奴。葡萄牙公众对亨利的舆论骤变,过去人们责骂造船航海是挥霍钱财,于国无利,如今看到一船又一船“人货”进港,转眼变为财富,都大声赞扬亨利,捧他为英雄。贵族、大臣、商人都想下海掠奴,从“几内亚贸易”中捞一份利益。

黑奴在欧洲市场畅销,既成为输往西班牙、意大利的紧俏商品,又给劳动力紧缺的葡萄牙南部人口稀少地区提供了从事家务和农业的劳动力。不久,葡萄牙商人又为黑奴找到供不应求的市场。首先在大西洋诸岛的甘蔗种植园中使用黑奴。甘蔗自从由阿拉伯人引种欧洲后因其损耗地力太大,一直未能广为种植。马德拉等大西洋群岛发现后,肥沃土壤适种甘蔗,蔗糖业迅速发展起来,只是缺乏强壮劳动力,限制了大面积种植。亨利亲王首先在马德拉岛和亚速尔岛使用黑奴,取得成功,便从葡萄牙再出口黑奴到各岛。从此,对奴隶的需求急速增加:1442—1448年从非洲运往欧洲的黑人奴隶为927人,<sup>①</sup>几年后(1455年)每年运往葡萄牙的奴隶就达700—800人。<sup>②</sup>此后,与年俱增,15—16世纪黑人在里斯本人口中占相当大比重,黑人填补了葡萄牙因移民和外出经商而愈益减少的人口。至今从里斯本一些居民肤色上仍能看出黑人血统。甘蔗种植园普遍使用非洲黑人奴隶,对近代世界经济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鉴于塞内加尔—冈比亚河口地带人烟稠密,奴隶资源丰富,葡

---

① 祖拉拉(Azurara)前引书第280页。

② Dona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1, p.3.

葡萄牙船队逗留此地，集中力量捕捉黑人，南下航行探险速度显著放慢。塞内加尔河沿岸黑人体魄健壮，市场价格比“摩尔人”高得多。贩奴所得利润比贩卖欧洲商品换取金砂、香料的利润竟高好几倍。捕奴的“探险”成了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亨利亲王手下人员精神抖擞，劲头倍增。捕奴船队蜂涌南下，仅1446年就有51艘轻快帆船驶往西非海岸。亨利亲王从每艘船所得利润中抽取四分之一份额；对他所组织的或贷款的船队则抽取二分之一收益。1450—1458年每年有10—12艘船驶往产金海岸，运走价值200万美元以上的金砂。<sup>①</sup>丰厚利润使亨利迷恋塞内加尔附近海域，在晚年时期竟不再坚持前往印度的航行。在1460年亨利亲王去世以前，他的船队最远仅到达塞拉利昂。他最后派出的船长是戈麦斯和威尼斯人卡达莫斯托。他们于1456年、1460年先后发现了佛得角群岛。<sup>②</sup>几年后葡萄牙移民开始移居该岛。阿方索五世将该岛封给其弟费迪南亲王。1466年葡王授予该岛领主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地区贩卖奴隶的垄断权。随着奴隶贸易发展，佛得角群岛日益富裕，为后来成为大西洋奴隶集散地奠定基础。捕奴太多，在河口和沿岸捕捉黑人愈来愈困难。葡萄牙船只开始驶进河道，进入内陆地区搜寻奴隶和黄金。与此同时，欧洲盛传已久的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王国（一说是埃塞俄比亚王国），于1452年派使节到达里斯本。于是伊比利亚半岛掀起从塞内加尔河到冈比亚河（所谓“西尼罗河”）上溯进入这个基督教王国的热潮。亨利亲王得心应手地接过这杆圣教旗帜，号召人们（从西非海岸）东进。从50年代起亨利将殖民探险实行战略转移，从南下西非沿岸转入向东深入非洲内陆。1456年亨利招募的热那亚人马雷首次进入冈比亚河

---

① 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00页。

② 离陆地佛得角的距离为595—660公里。

口,溯河而上,遭到非洲人抵抗,在毒箭射击下退出河口。同年5月,卡达莫斯托上溯冈比亚河100公里,身染疟疾退回。1457年戈麦斯率三艘轻快帆船驶进冈比亚河,上溯昆陶尔,直至为河中巴罗昆达巨大险滩所阻。1460年亨利亲王逝世。

在亨利亲王45年的殖民探险生涯中,动机是复杂的,但“营利”是主要动机。然而这个理所当然的目标却不是他任何时候都挂在嘴边上的。他所组织的航海活动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营利”目的,特别是初期,赔钱的情况居多。困扰其航海活动并屡遭中断的主要是债务问题,起干扰作用的则是摩洛哥战争,而反对他进行旷日持久航海活动的力量则是来自王室内外的反对派。他的唯一竞争对手则是卡斯蒂王国(西班牙前身)。

从1415年占领休达至1497年达伽马扬帆出航的82年时间里,航海活动曾中断或沉寂过6次,共计时间为49年,其中因债务和资金问题有3次;因摩洛哥战争而中断的也有3次;因与卡斯蒂战争有2次(其中有的原因是重叠的)。摩洛哥战争纯系葡萄牙陆上殖民扩张引起的,摩洛哥是葡萄牙陆上殖民扩张的主要受害者,当然其中也不乏葡害怕摩洛哥成为非洲西北部海上强国的因素在内。阿维斯王朝“陆派”(主张陆上扩张)的力量不可低估。执政43年之久的阿方索五世是坚定的“陆派”人物,他对其二叔佩德罗摄政王大力支持三叔亨利航海活动很不以为然,亲政后就收回部分支持。为了对付这个热衷骑士武功的侄儿,亨利特别需要取得教皇和教会的支持。他的王牌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旗,并随时祭出寻找东方祭司王约翰王国的符咒,以获得教皇和教会的支持。所以亨利口中念念不忘基督教的责任,是他的精明所在,也是能够立身的倚靠(他是葡萄牙修道会的首领)。1452年埃塞俄比亚使节团已经到了里斯本,祭司王约翰已不具有以前的重要性。但此时阿方索五世正热衷于筹划1458年远征摩洛哥。历次摩洛哥战争一般均须中断西非海岸的殖民探险活动,将所有轻快帆船集中以

应军需。1457年亨利派达卡达莫斯特从下几内亚海岸驶进冈比亚河，仍打着寻找真正祭司王约翰的旗号，使航海活动得以赓续。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布圣谕，批准“自博哈多尔角至几内亚海岸以及整个东方，今后将永远归国王阿方索及其继承者享有主权。”15世纪5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加强了亨利亲王航海活动的经济因素的比重。宗教狂热在亨利亲王的航海活动中无疑起了作用的，宗教影响是葡萄牙王室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许多场合，宗教的旗帜和口号又是一种精明的考虑。亨利的航海活动和葡萄牙对西非沿岸地区的占有，并非如同菲尔德豪斯所说仅是1415年攻占休达城而开始的反伊斯兰十字军行动的副产品。<sup>①</sup>如上所述，黄金继而奴隶是亨利亲王的殖民探险中越来越重要的追逐目标，而这两项物质性的东西的获取，也并非仅仅为了维持航海活动的继续进行。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它是愈来愈朝着寻找通往黄金和香料终极来源地的新航路这一战略目标靠拢的。因而“赢利”在历次航行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尽管它往往仍被宗教和探险的狂热掩盖着。为什么在殖民史的最早时期，地理发现和殖民扩张这一历史活动的动机呈现如此多样性？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主体所决定的。15世纪上半叶生产力的低下水平，葡萄牙国力、财力的限制、地理知识的相对贫乏和不确定性、表现在追求目标上的犹豫摇摆的特点，使各种动机（表现为目标）的比例在不同阶段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历史学家受现象迷惑，对亨利亲王追求的目标作出了不同的判断，致使最早期的航海活动更显得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让我们逐渐看清这一历史事件本质的是，经济力量在亨利亲王的活动中越来越占居支配地位。

---

<sup>①</sup>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殖民帝国》), London, 1982, p.5.

## 二、殖民探险与商业性经营

1460年亨利亲王去世后葡萄牙航海活动停顿了9年时间。主要原因是阿方索五世为首的“陆派”主张占了上风。1464年阿方索再一次发兵去攻打丹吉尔。摩洛哥战争和卡斯蒂战争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对航海活动不再在意。然而，50年代的发现、已建立的商站和获利前景吸引了许多葡萄牙商船继续南下，形成了一股推动力。许多商人对继续南下的航行跃跃欲试并憧憬着巨大的利润。阿方索既不能拒绝又不想投进巨资，遂采取一种最简单办法，他将南下几内亚湾的探险承包给里斯本商人戈麦斯，条件是以塞拉利昂为起点，5年内必须向前探险500里格，<sup>①</sup>每年向国王交纳20万里亚尔。戈麦斯完全以商业精神指导其探险活动。五年内，他的几支探险船队“发现”象牙海岸（1470年）、黄金海岸（1471年）、奴隶海岸（1471—1472年，今尼日利亚沿海地带），并在沿岸近海地区“发现”了斐南多波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1472年越过赤道，望见了喀麦隆火山，最远到达南纬1°50′的圣·卡塔林纳岛。五年共完成2400多公里航程的探险，相当于此前亨利亲王30年时间完成的探险里程。是什么动力推动葡萄牙西非海岸探险速度大大加快？是这一期间商业利润的急速增加。不仅在上几内亚湾增加了象牙、胡椒等大批商品，黄金数量也有令人瞩目的增加。仅黄金海岸艾尔米纳堡一地出口的黄金就超过以前发现的所有据点的出口量。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人从新发现的几内亚湾海岸获得了大量奴隶。1460年以前发现的大部分海岸，本来人口就不多，由于沿海黑人居民害怕葡萄牙捕奴队，多离岸逃亡内地，使猎奴工作陷于停顿。葡商对南方人口稠密的绿色海岸寄予厚望，宁愿舍弃旧地，开辟新岸。巨额投资促使探险队不断向新岸挺

---

<sup>①</sup> 1里格=3.18海里=5.89公里。

进。捕获奴隶数量节节上升。1455年以前葡萄牙的奴隶数量年均均为700—800人。1455—1500年年均增至3000人，增加近4倍。<sup>①</sup>戈麦斯获得的巨利，引起其它私商眼红。欧洲大陆商人乘机渗入。王室成员觊觎贩奴巨额利润，加上私商集团垄断数千公里海岸的贸易活动弊端丛生。1474年合同期满时，阿方索国王不许续约，将几内亚湾租让权转给费尔南多王子。1475年葡萄牙与卡斯蒂战争又起，阿方索迭遭失败，1477年回葡后从此不问政事。费尔南多王子掌握朝政，国内危机四伏，无暇顾及西非商务和南下探险事务。葡萄牙船队停止在南纬2°以北沿海地带约10年。

1481年阿方索五世去世。费尔南多王子正式即位，即著名的若昂二世(1481—1495)。为镇压国内贵族叛乱，他花费了几年时间。早在王储时期他就对海路扩张表现了极大兴趣，即位后立即重颁维护国王利益的严峻的航海法，对外方侵犯者采取严厉手段。1481年12月他派出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到黄金海岸艾尔米纳建立堡垒，<sup>②</sup>以巩固几内亚湾商业地位，发展贸易。稍深入内地，却不意发现了较大金矿。为采金需要大批劳动力，遂又派船南下寻觅捕奴新区。几内亚湾的胡椒、象牙、黄金和黑奴源源运回葡萄牙，大大充实了国库。若昂二世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拥有比亨利亲王更为优越的经济条件。在以后两三年中，当时尚为葡服务的哥伦布也曾两次从葡萄牙航行到黄金海岸。1482年葡王派迪奥科·卡奥率船队继续南下探险。卡奥绕过圣·卡塔林纳角后，沿岸南下700公里，发现了刚果河(扎伊尔河)，他在河口南岸树立一石质标柱(此柱残体已于1959年发现)。1484年卡奥第二次率船队，继续南下约2000公里在安哥拉海岸(南纬13°5′)和克罗斯角(南纬

---

① 联合国教科文：《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第125页。

② 塞埃·莫里森：《哥伦布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上卷，第90页。

22°)各树立一标柱。1486年(或1487年)卡奥船队返回葡萄牙。<sup>①</sup>若昂二世根据航行报告,断定从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转向东北前去印度的航程可能要比原来设想遥远得多。考虑到路途遥远,他决定除继续沿海路探寻外,拟另辟蹊径,从陆路探寻,适值此时又传来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王国位于非洲东端的新消息。1487年若昂二世派其身边警卫佩罗·达·考维拉(Pero de Covilha)从陆路前往印度。考维拉到达印度果阿后,返回开罗,派人回葡报告,自己又进入埃塞俄比亚,却不意在此定居下来。同年,若昂二世派迪亚斯从海路探寻新航路。迪亚斯于8月出发,南下赤道越过南回归线,沿今日纳米比亚海岸航行。在南纬33°地带遇风暴,为避撞岸边礁石,驶向大海后才掉掉南下,与大风斗了13天。1488年1月,船连续东驶数天竟不见海岸,熟谙航海的迪亚斯估计已绕过大陆南端,毅然转向北行驶,几天后,1488年2月3日望见从西向东绵延的山脉。迪亚斯在今莫瑟湾上岸遇科伊(霍屯督人)骑牛牧人。船队继续沿海岸东驶,过今阿尔戈阿湾后,海岸线缓缓转向东北。由于疲惫不堪的海员拒绝继续航行,加上粮食将罄,已驶入印度洋的迪亚斯功亏一篑,从大鱼河口折返。在回程中经过好望角。他于1488年12月回到葡萄牙,带回了在当时算是极精确的2500公里海岸线海图。

若昂二世知悉:既已发现非洲大陆南岬好望角,绕过非洲南端的航路已稳操胜券了。然而,为什么下一次达伽马的航行竟推迟到9年以后的1497年才付诸实行?历史学家有诸多解释,一种说法是迪亚斯提出印度洋风浪大应建造船身较大而圆的新船。为造新船(迪亚斯负责监造),花费了几年时间。另一种说法是1493年得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据他报告西行到印度已近在咫尺,这一发

---

<sup>①</sup> 关于卡奥在第二次航行后是否活着回到葡萄牙,现尚无法断定,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死在南下安哥拉途中。



现有可能动摇了若昂二世开辟南绕非洲新航路的信心。实际上，另一原因是，若昂二世患水肿病，并于1495年10月去世。又过了两年，新王曼努埃尔才选拔瓦斯科·达伽马代替启航前去世的其父老伽马率领远征队。这时(1497年)离开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已经5年，哥仑布第三次西航已经动身(1497年5月30日)。此时，曼努埃尔坚信西班牙到达的只是一个荒凉的西海岸，而繁华的东方将出现在绕行非洲的新航路的前头。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让达伽马率领4艘船满载欧洲货物(铜料、毛织品、水银、珊瑚等)去换取东方印度的香料。1497年7月8日达伽马船队基本上循着迪亚斯的航线南下非洲向东方进发。积累了80多年航行非洲西岸的丰富经验，达伽马船队过了刚果河口就大胆地离开海岸向大洋驶去，在茫茫大海上向南行驶97天才在今日南非圣赫勒拿湾见到了陆地。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后，12月25日到达纳塔尔，此后就向北迳向东非海岸驶去。1498年3月2日驶入莫桑比克岛港口，在这里才看到正在卸货的阿拉伯商人。4月7日驶进蒙巴萨港，4月11日在马林迪海湾停泊。在这些东非城邦国家，达伽马发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如果不比葡萄牙优越也可与之媲美”。<sup>①</sup>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在阿曼引水员马吉德(Majid)指点下，横渡印度洋，于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古里)。后又到坎纳诺尔和柯钦，在这里船舶装满了香料。10月初，船队从印度返航，1499年1月2日抵东非摩加迪沙。达伽马于9月初返抵葡萄牙。他带回的香料出售后获利为出航成本的60倍。<sup>②</sup>达伽马回葡后不到6个月时间，1500年3月9日曼努埃尔就组织了第二支由13艘船，1200人组成的远征船队向东非和印度进发。

---

① J. Duffy, *Portugese Africa* (《葡属非洲》), Oxford 1959, p. 26.

② F. C. Danvers, *The Portugese in India* (《葡萄牙人在印度》), London 1894, vol. I, pp. 63 - 64.

## 第四节 葡人在非洲建立殖民—— 贸易制度的试验

### 一、黑奴贸易的始作俑者

葡萄牙人在南下西非沿岸的过程中发现捕捉当地非洲人充当奴隶运到欧洲贩卖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从1444年亨利亲王在葡萄牙公开出售首批奴隶开始，欧洲市场对非洲奴隶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势。需要奴隶的买主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葡萄牙国内的家务劳动和南方农业需要非洲奴隶补充日趋紧张的劳动力，而且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非洲奴隶的需求也在上涨。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占据的大西洋岛屿使用黑奴种植甘蔗大获成功，需要大批奴隶劳动力。拉古什奴隶拍卖场上黑奴供不应求状况，使葡萄牙船主认识到买卖黑奴是新的生财之道。然而，奴隶来源仅靠从海滩上绑架非洲人已远不敷需求。葡人便开始采取“贸易手段”，从伊斯兰商人手中获取奴隶。伊斯兰商人早就拥有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北非、中东小规模贩卖奴隶的商业系统。葡人早在15世纪初已从休达城获取这一商业信息。1455年葡人在阿尔中岛设立商站，目的之一就是为收购伊斯兰商人从内陆贩来的奴隶。葡人由此开创了坐地(设站)收购奴隶的制度，一个世纪后发展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基本体制，盛行二、三百年之久。以阿尔中岛为中心的收购站，加上沿岸见机下手绑架、虏掠所获的奴隶，每年运往葡萄牙本土的数目增至700—800人。在里斯本设立“奴隶事务部”专门处理奴隶贸易事务。据葡海关统计，1486—1493年7年中直接输入3598名奴隶(不包括从南方拉古什运到首都的奴隶)。据C. R博克塞在《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国》一书中统计，1450—1500年50年时间里，葡萄牙人在非洲捕获和收购的奴隶总数为15

万人。<sup>①</sup>

有的学者认为,1455年阿尔中堡的建站,标志着葡萄牙奴隶贸易的转折点:绑架、强夺奴隶的暴力方式被“和平贸易”方式所取代。<sup>②</sup>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确切的。与英、荷、法等比较,葡萄牙人从事奴隶贸易的特点之一是,葡人亲自动手绑架或自己深入内地捕捉奴隶,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持续时间最长。葡人为了获得更多数量的奴隶和更高贩奴利润,是不择手段的:绑架、直接捕捉与贸易同时并举。葡萄牙拥有一批捕人的专业队伍。葡人在圣多美、普林斯比等岛屿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同当地妇女非婚同居现象十分普遍,留下大批混血种人。这批被称为“庞贝罗”的葡萄牙人,被社会环境培养成生性残暴,热衷于深入内陆猎奴的打手。绑架、捕捉、诱骗各种手段无所不用;或充当经纪人(中间商)利用母系方面的关系,到内地收购奴隶。葡萄牙人也是最早利用非洲当地人来捕捉或收购非洲人的始作俑者。葡人一项“发明”是,让那些早期捕捉的沿岸黑人到葡本地接受洗礼,训练成“通译”,而后用小快艇运回故地,从同族同胞那里获取奴隶,并卑劣地规定只要能“带回”4个奴隶,他本身就可获得自由人身份。这些“通译”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并与部落头人建立联系,由他们架起沿岸与内地的“以货易人”的奴隶贸易桥梁。这些“通译”和庞贝罗构成了替葡萄牙服务的奴隶贩子的主力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葡萄牙的奴隶贸易特权是与航海探险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最初均掌握在国王和王室手中。由于

---

① Boxer C. 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国》), 1415--1825. London, 1965.

② 亚梅·科尔泰索的观点,见平托和卡雷拉论文《葡萄牙人参加奴隶贸易:葡萄牙社会内部的对立势力和思想倾向以及奴隶贸易对葡萄牙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载《15至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联合国教科文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22—149页。

葡萄牙资本主义因素不发达,不谙股份公司的经营形式,国王和王室既想从奴隶贸易中获得巨利,又不愿承担任何风险,于是便创造“承包制”。如上所述,1469年阿方索五世曾将第一个五年承包合同批给戈麦斯,由他垄断几内亚湾的勘探和贸易业务(主要是奴隶贸易)。由于承包人获利极大,在延长合同期3年之后,葡萄牙国王就不愿续约,而将此项承包合同批给其子若昂。

当葡萄牙人于15世纪80年代“发现”人口稠密的刚果和安哥拉时,并没有立即导致奴隶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因为此时赤道以北非洲所提供的奴隶数量足够供应地中海地区和南大西洋诸岛对奴隶的需求。再者,此后不久(1498年以后)葡萄牙人就被垄断印度洋的香料贸易的巨大利润所吸引。直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贸易重点和真正兴趣仍放在印度洋。这时期在刚果和安哥拉,葡萄牙人还在以虔诚的宗教热情掩盖其对奴隶的有限需求。1491年,葡使团成功地为刚果王、王后、王子(后来的阿方索一世)施洗礼。1512年葡王曼努埃尔仍煞有介事地指示葡驻刚果大使奉行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政策。刚果多姆·阿方索王室同葡萄牙频繁往来,传教士接踵不绝。

## 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端

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以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它不仅影响葡萄牙的奴隶贸易,而且形成了一个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一种中世纪时期只有富贵人家才吃得起的食品——不起眼的蔗糖大量生产引起了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甚至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糖业革命”。<sup>①</sup> 1493年哥伦布将非洲加那利群岛的甘蔗(克里奥

<sup>①</sup> 布罗代尔对此持有疑义。他认为“不能轻易断言糖业引起了一场食物革命……直到19世纪初,糖的发展仍未达到革命的规模。”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第1卷,第265页。

尔种甘蔗 creole)带到多米尼加(当时称伊斯帕尼奥拉岛)。适合热带土壤的甘蔗在 16 世纪上半叶逐渐扩展到加勒比海的牙买加、波多黎各、古巴诸岛和美洲大陆的墨西哥、巴西。由于普遍建立水力制糖厂,蔗糖产量迅速增加,从 1560 年起向西班牙出口。白糖进入平常百姓家,欧洲平民食糖开始走向普及化,需求量日增,似乎永无止境。

葡属巴西的甘蔗种植业发展最早,最快。1534 年葡王把伯南布哥封地授予曾在非洲任要职的柯埃略。柯埃略在同年就到达封地,开辟甘蔗种植园,办起第一家糖坊。甘蔗种植在巴西沿海地带迅速扩展,1585 年已建立 110 个糖坊,其中伯南布哥有 66 个,巴伊亚 36 个。蔗糖在产量和出口价值上均超过了以往大宗出口品巴西木、烟叶、棉花、靛青等经济作物,它给王室、商人、蔗糖作坊主带来巨额利润。16 世纪末年产量可能已超过 200 万阿罗巴(约 3 万吨),为 15 世纪末葡在马德拉、佛德角等群岛糖产量的 20 倍。<sup>①</sup>巴西蔗糖收入逐渐超过了葡萄牙在印度洋贸易的收入,成为王室和商人首屈一指的高额收入。全国各阶层的注意力都转向巴西,希望从这一聚宝盆敛取更多钱财。然而,由于印第安人劳动力锐减,巴西的劳动力缺乏问题日趋严重。葡萄牙应付的办法,先是早在 16 世纪初就将葡本土的非洲奴隶输往巴西以应急需。1537 年里斯本奴隶市场待运的奴隶多达万名以上;又允许制糖坊主自带非洲奴隶赴巴西。接着便以圣多美岛作为输出奴隶的中心,奴隶船顺洋流和风向直驶美洲。于是,黑奴纷纷从这里被运往巴西。1585 年巴西已有 14 000 多名黑人奴隶,占总人口 1/4。随着种植园的扩展,对黑人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葡萄牙商人虽从非洲大陆直接贩运奴隶到巴西,但几内亚湾奴隶来源仍不敷需求,

---

<sup>①</sup> R. Keith, *Hacienda and Plantation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拉美史上的庄园种植园》) New York, 1977, p. 67.

这便促使葡萄牙人去占领安哥拉。人口稠密的刚果和安哥拉地区逐渐成为主要供应地。

葡萄牙首先利用当地的传统制度获取奴隶,发展奴隶贸易:与非洲其它地区一样,刚果的战俘和负债者均可卖为奴隶。刚果国王急切想获得欧洲技术、火器和商品,使本国摆脱落后孤立状态,但当时他提供不出足够的本地商品来换取欧洲的商品和技术,葡人便诱使他提供欧洲人最喜欢要的奴隶来交换。葡萄牙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教士,不久便将奴隶当作“活人商品”。起初国王只允许提供数量有限的奴隶(其它部落的战俘、罪犯),但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受制于奴隶贸易的供求规律。奴隶的高价及其无限的需求,刺激了刚果地区的部落战争,于是掠奴战争便频繁发生了。这种混乱状况迅即向安哥拉地区蔓延。

葡萄牙人牢牢掌握奴隶贸易的垄断权,在1580—1640年与西班牙合并期间亦不放松。它用承包制来体现和维护其垄断权,承包制是葡萄牙国王建立的三项奴隶贸易制度之一。承包者获得国王授权,向奴隶商发放贸易执照(Asiento 阿森托),收缴间接税,他们一般住在里斯本。只有“贸易执照”持有者才是真正从事奴隶贸易的商人。第二项制度是定额制,由国王直接发放执照,持照商人在非洲购买定额奴隶,按人头交税。第三项制度是葡国王自己通过代理人直接经营奴隶贸易,但此项制度较少实行。国王专门成立王家几内亚事务部(以后改称“印度事务部”),签发承包合同或许可执照。一般持有“贸易执照”的商人也被允许经营以奴隶换取的进口货。1486—1642年间实行的承包制,其承包期限从7年至10年不等,最长不超过10年;承包地区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多集中于几内亚湾,以后发展到安哥拉、刚果等地。由国王直接发放的“贸易执照”的数量似乎不如承包人发放的执照数量多,仅安哥拉地区承包人在1604—1608年4年间就发放执照17 000份。葡制与后来的西(班牙)制不同,持执照者可以将奴隶自由输入巴

西,不受特许供应制的限制(王家垄断未扩及巴西),只需交纳每个奴隶3 000里亚尔的出口税。根据罗安达商站的案卷记录,1575—1591年仅从这一地区运往巴西或西属印度群岛的成人奴隶为79 052人,另外还有成人奴隶847 848人从其它地点运往上述地区,总数达到926 900人,<sup>①</sup>平均每年达到54 528人。

如上所述,葡萄牙的承包商和奴隶商在非洲主要利用带有葡血统的混血种人(通称庞贝罗)搜罗奴隶。最初,葡人利用对葡友善的刚果王(阿方索一世),迫使刚果国家机器围绕葡萄牙奴隶贸易运转,通过国王获得奴隶。皈依天主教的刚果王愿意向葡人提供一定数量的奴隶(战俘、罪犯等),以换取欧洲的火器等商品。然而葡萄牙国王却成立专营奴隶贸易的垄断公司同刚果王打交道。几十年后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对奴隶的大量需求,便突破了官方所限定的范围。刚果国王屡次抗议葡人肆无忌惮地无限扩大奴隶贸易,都被置若罔闻。奴隶贸易的巨大利润几乎将所有住在刚果的葡萄牙人都吸引到这项活人贸易中,“传教士身旁就站着奴隶贩子”。所有在圣多美岛和佛得角岛从事圣职的神父们“从来不认为这种贸易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和巴西的神父们都毫不犹豫地购买这些奴隶为我们服役”。<sup>②</sup>在安哥拉被纳人殖民体系后,有组织的葡萄牙奴隶贸易体系便开始运转了。葡人逐渐撇开作为中间人的刚果国王,自己单干。奴隶商率领武装队伍(多由庞贝罗组成)携带换奴商品,深入刚果、安哥拉内地丛林,同当地酋长直接做买卖。“庞贝罗体制”是葡人创造的贩卖黑人奴隶的一种制度。<sup>③</sup>庞贝罗原是指充当大商业中心常驻代表的葡萄牙人,后来则由有葡

---

① 安东尼奥·卡雷拉:《葡萄牙有关奴隶贸易的研究情况》,载上引 UNESCO《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254页。

② Donnan, E.,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 I, p. 123.

③ 庞贝罗一词来源,有说是普姆鲍(地名)的讹音。

血统的混血种人充当。庞贝罗最早的集中居住地设在圣多美岛，他们的母系多是埃尔米纳的女奴。葡殖民者对庞贝罗进行了关于贩奴手段和押运奴隶商队的专门训练。这些土生土长混血种人熟悉内地情况，与酋长有广泛联系，搜罗奴隶的手法灵活多样，早在1514年就开始深入腹地。1540年刚果王阿方索一世禁止从国王本土，包括奴贸中心的姆潘达港（年出口量约5000）出口奴隶。刚果王国因受奴隶贸易摧残日渐衰落，奴隶贸易中心逐渐转到广土众民的安哥拉。此后在安哥拉形成了几条获利甚丰的贩奴商道。主要干道是从安哥拉首府罗安达到刚果首府萨尔瓦多，再经姆巴塔省到普姆鲍地区。奴隶们头顶内地的产品象牙或手工制品，跋涉长途，被押运到沿海港口。后来又开辟一条新贩奴道，有一部分奴隶从加丹加东部押运到罗安达港上船，运往巴西。全程陆路需步行2000多公里，倒毙者不计其数。圣多美岛自从1595年发生一场奴隶大暴动后逐渐衰敝，失去奴隶转运站的地位。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逐渐改道，不再通过该岛，而更多地集中于安哥拉的罗安达岛。派驻罗岛的葡萄牙总督主要任务是搜罗奴隶，1602年起每年向西属美洲提供4250名奴隶。补充奴隶来源的地区进一步向安哥拉内地扩展，伸进了开赛、隆达人地区。17世纪初又开辟了南纬12°以南的本格拉港作为输出奴隶的新港。1580年葡西合并，并执行共同的对外政策，对葡萄牙的殖民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葡属巴西若干重要据点、葡属安哥拉和圣多美及葡属刚果部分地区都一度落入西班牙的宿敌荷兰人手中。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仍主要由葡萄牙人输入。小国寡民的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相对较短时期迅速增加贩奴数量，开辟新的奴隶来源地区以供应西属美洲的大量需求，是由于葡萄牙人采取了所谓“独创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后来17—18世纪英、荷、法等国较少采取的。

(1)葡萄牙人，后期主要是庞贝罗，交替采取两种方式：或亲自带领武装队伍去搜捕奴隶，凭借其火器优势和战斗技能，对非洲人



村寨发动突然袭击围捕和平居民, 捕获甚多。或者由庞贝罗进入内地向当地酋长购买奴隶。靠庞贝罗深入腹地是 16—18 世纪葡人渗透内陆的主要方式。这些庞贝罗作为代理人有的常驻在内陆, 往往一去经年而后给主人(葡商)带回数百奴隶; 或由葡商再向内陆发送其它货物继续换取奴隶。奴隶买卖就按这样程序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

(2) 搜罗一些“强悍部落”的非洲人加入葡人队伍去捕捉其它部落居民当奴隶, 如雇用查加人去捕捉刚果人当奴隶。

(3) 利用当地非洲人“习惯法”使之适应奴隶贩子的需求。早在 16 世纪下半叶葡人就买通酋长将部落中判处死刑的成员, 改判为奴隶卖给葡人。随着对奴隶需求的增加, 便不断扩大“习惯法”所规定的“罪名”, 并采取“连坐”法, 除犯罪个人外, 连同罪犯全家亦被卖为奴隶。另外, 篡改非洲人传统习惯, 迫令战败部落以大量奴隶作为贡品缴纳, 或以纳贡名义迫使臣服的部落缴纳奴隶。葡萄牙人采取的多种多样伤天害理的获奴方式, 使它向美洲出口奴隶的数目不断增加。据葡萄牙史学家 R. 戴鲁盖多(Delgado)依据葡萄牙文件估计, 仅从 1486—1641 年间从安哥拉地区(包括历史上的刚果王国)运出的奴隶约有 1 389 000 人, 每年平均约 9000 人。据雅丁神父估计, 到 18 世纪每年增至 2.5 万人, 19 世纪初高达每年 3 万人。<sup>①</sup> 这些不择手段获取奴隶的方式以及奴隶出口数量的激增, 在刚果河流域衍化成为一种社会瘟疫, 使许多部落和民族都染上奴隶贸易的“热病”, 严重削弱了刚果王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混乱, 社会生活遭到无情破坏, 王国人口锐减。葡萄牙人和庞贝罗经常撇开国王, 直接从各省执政者或地方酋长手中搜罗奴隶, 后者受到奴隶贸易巨利的刺激, 往往采取

---

<sup>①</sup> R. Delgado, *Historia de Angola*(《安哥拉史》), Robeto, 1953, vol. 3, p. 445 转引自拜·戴维逊《非洲的觉醒》,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5 年, 第 51, 265 页。

垄断专行的贸易行动,拒不服从国王支配。垄断贸易本来是刚果国王的权力和威望的主要支柱之一。国王对全国的控制一再受到削弱,靠奴隶贸易滋养的地方经济力量畸形壮大,政治上无视中央的擅自行动,终于使刚果王国分崩离析。先是各个省陆续分裂出去,后来南部的最富裕的恩东戈省也分裂出去,形成安哥拉。刚果王国一旦被拖入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它就无法摆脱此种贸易体系的自身发展逻辑。刚果历代诸王都需要输入葡人的火器,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王位,需要欧洲商品(烈酒、织品、金属器皿等)以满足其已被煽起的“奢侈的”享受欲望。在地方各省,沿海地酋长强大后需要购买欧洲火器来维护其权力。内陆酋长受奴隶贸易体系的限制,无法同欧洲人发生直接联系,属下的部落民只有两种出路:或者被掳卖给欧洲奴隶商,或者沆瀣一气也干起贩卖奴隶的勾当。沿海和内陆的酋长们绝大部分未能顶住奴隶贸易的诱惑,几乎全都向贩奴制度屈服了。

构成16—17世纪热带非洲殖民主义制度主要内容的奴隶贸易,尽管也向葡属非洲殖民地及其内陆腹地输入了相当数量的欧洲商品,却没有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有些提高和发展。相反,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榨干了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破坏了当地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了葡属地区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由葡萄牙人始作俑者,在16世纪初就形成雏形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制度”,绵延了三个多世纪,在世界资本主义没有迈进工业革命阶段以前是不可能被废除的。因为:(1)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美洲的种植园、矿山不断需要大量的奴隶(将在第四章详加分析)。(2)热带非洲的土王和酋长们一心要垄断欧洲商品,特别是力图垄断能维持和扩大其权势的火器的销售和使用。在刚果—安哥拉地区已经形成一套内部组织严密、权利独享、庞贝罗起内结外联作用的独占体系。内地奴隶只能卖给当地奴隶贩子或由庞贝罗运往沿海,不得直接卖给欧商。欧

商必须同土王或酋长指定的经纪人(多是庞贝罗)接洽,才能同非洲奴隶商洽谈生意。葡萄牙模式的奴隶贸易形成封闭的掠夺体系,它绝对排斥其它欧洲商人,首先是荷兰商人参与,也不让非洲内地同欧洲发生任何联系。这一体系既阻碍了任何欧洲新技术的传入,也使非洲人陷入不可自拔的闭锁体系之中。对欧洲商人来说,它是一部庞大的、不断运转的贸易机器,每一机件的运转都是为了向沿海口岸输送尽可能多的奴隶。在这套体系或机器持续300年运转中,约500万刚果—安哥拉地区的黑人劳动力被运出国门卖到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这套体系给留在非洲地区的非洲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和心理伤害;中西非洲广大内陆的非洲人部落陷入了朝不保夕的极不安全的状态中,并造成心理的反常;不危害他人和其它部落就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葡萄牙人在19世纪末之前的四百年中,没有将殖民统治机器植人安哥拉广大内陆地区,但殖民主义通过奴隶贸易却已给非洲人留下极其残酷悲惨的印象,这种印象影响了18世纪以后非洲大陆的历史。

## 第五节 葡占东非——葡萄牙“贸易帝国”的中途站

### 一、印度洋西岸的贸易霸权

1498年达伽马发现新航路后,雄心勃勃的曼努埃尔一世企图在印度洋建立贸易帝国,由葡萄牙垄断东方对欧洲的全部贸易。但是印度洋最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从14世纪以来一直掌握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手中。阿拉伯商人拥有多方面优势:熟谙经商之道,理财娴熟老到,资金充沛,贸易网点密如蛛网,三角帆船快捷灵巧,商业信息灵通因而是极强的贸易对手。葡萄牙人在经济上无甚优势:手中只有单调的、质次价高的欧洲商品,经商本领亦非阿

拉伯商人的对手。葡萄牙人的唯一优势在于殖民暴力。他们乘坐的帆船已不是一叶风帆的单桅运输船,而是改进成为挂满多叶风帆的较大型船舶,竖有3—4根桅杆,船首装有斜帆,可逆风行驶,特别是船载大炮火力猛烈,远胜当时阿拉伯人的火器。1500年继达伽马首航之后来到印度的卡布拉尔在卡利卡特使用武力,在战斗中夺走了10艘穆斯林船。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来东方,率领25艘船。<sup>①</sup>舰队中有5艘战船指定用来拦截往来于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船只。1510年在印度果阿建立了舰队基地后,便开始以军事基地和设防港口来控制印度洋的航海运输线。浩瀚的印度洋航线漫长,葡船因好望角一带风浪大,一般不停泊,绕过好望角后必须在东非海岸设立锚定点。当时,东非斯瓦希里沿海地带是印度洋西岸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辐辏之地,贸易网密布。葡人进入印度洋后,便将控制东非视为建立印度洋“贸易帝国”的不可缺少的战略布署,一开始就抓住东非沿岸不放,要在这里建立印度洋的中转站。当时东非海岸从拉木到索法拉的几千公里海岸线上的37个海港的繁茂贸易,以及盛产的黄金(其实是出口内地所产黄金),自然也是葡萄牙人垂涎的对象。葡人在东非的活动是同它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殖民活动密不可分的。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初来时,东非海岸最繁荣的国家和城邦是蒙巴萨、马林迪和莫桑比克。其时,基尔瓦已失去对黄金出口港索法拉的控制,极盛时代正在消逝。然而,斯瓦希里文化方兴未艾,正在含苞待放,即将成为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伊斯兰文化在东非沿海的地区盛开的一朵鲜花。葡萄牙船上那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船员和商人见到这些沿海和岛屿城市的高度物质文明都惊羨不

---

① 达伽马率领的先行出发的船队为20艘船,其后由其从兄弟埃斯特沃(Estevo de Gama)率领前来会合又有5艘。

已。<sup>①</sup> 葡萄牙人在东非的活动一开始就使用武力。达伽马首次进入莫桑比克,就对城镇炮轰三个小时,给东非穆斯林城邦留下极坏印象。在他回程经过摩加迪沙时,又不进行任何接触就发炮猛轰城镇。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远航东非时,舰队进入基尔瓦,竟要求基尔瓦的谢赫(穆斯林首领)让葡人在南部索法拉建立一个贸易站,以便插手内地黄金交易。谢赫不愿意让葡人插手他们所垄断的黄金贸易,不同意合作。葡舰队遂驶进基尔瓦港,以毁城相威胁,迫使谢赫屈服,答应年年纳贡(进贡黄金约合890英镑)。达伽马舰队离航时带走了当地200名妇女。1505年,葡将阿尔美达又以港口未升葡国旗为借口,对基尔瓦发动进攻,废黜原谢赫,以亲葡的长老安戈尼(Ankoni)为统治者,并由基尔瓦出钱在斯瓦希里海岸建立葡萄牙第一座设防要塞圣·詹姆斯堡。在索法拉,阿尔美达竟将港内阿拉伯商船全部洗劫一空,把当地积存的黄金、白银、龙涎香全部掠走;干涉内政,对争夺王位的两兄弟,杀一个,扶另一个当傀儡,从而控制了基尔瓦,打开了由索法拉进入黄金宝地的大门。对他认为怀有敌意的蒙巴萨,阿尔美达决定予以严惩。葡远征军冲进谢赫王宫,劫掠一空,放火焚城,并大肆屠杀,杀死居民1513人,掳走1000人。蒙巴萨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牺牲惨重。葡人取胜后也不敢留驻军队。蒙巴萨的谢赫致信马林迪谢赫说,葡萄牙人“以武力恐怖对我们的城镇肆虐,不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只有出逃,才能避其暴怒。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尸横遍野,恶臭逼人,使我不敢进城。”<sup>②</sup>1528年葡人再次攻占蒙巴萨4个月,撤出前竟将全城夷为平地。显然,葡人的意图是用“三光”手段来消灭其商业上的竞争

---

① 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178—180页。

② J.S. 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东非的葡萄牙时代》), Nairobi, 1968, p. 73.

者,以彻底毁灭蒙巴萨,使它在东非贸易圈中不再起作用。近来,有些学者喜欢用“文明冲突”来解释历史上的冲突,认为西方已同伊斯兰教进行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冲突,至今未接近尾声。<sup>①</sup>关于葡萄牙在东非残暴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是,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无情地打击一切穆斯林。宗教上的偏执自然是葡人在东非的残暴行为及其后来衰败的一个原因。但是,葡萄牙的宗教的偏激只解释部分现象。在执行“分而治之”策略时,葡人并非对所有穆斯林都一律加以打击的。实际上葡萄牙人在异国他乡很善于利用东非城邦之间的派系斗争,它利用马林迪同蒙巴萨的世代恩怨,取得了马林迪城谢赫的支持,并将这种“与穆斯林的同盟关系”维持到16世纪末。干预各国穆斯林统治者内部纷争,也是葡萄牙人惯于玩弄的手段。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替葡萄牙拢络了盟友甚至制造傀儡。葡人这些做法的长远后果往往适得其反。1512年,由它操纵的基尔瓦城谢赫安戈尼死后发生内讧,结果受创于这把双刃剑,葡人不得不撤出基尔瓦要塞,移师印度。到它发现这种手法弊大于利时,葡萄牙人已从鲁伍马河以北地区被赶走了。接过罗马人的“分而治之”策略衣钵的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实践这项策略凡三百年,有得有失。这付衣钵后来又由英国殖民者接过手。英国人建立了比葡萄牙的“贸易帝国”大几十倍的殖民帝国。英国在印度把“分而治之”手法发展到了极致地步。葡萄牙人在东非地区能够建立的仅是“贸易帝国”,葡无力开拓“领土帝国”,因而它在东非追求的殖民目标主要是:1. 垄断印度洋贸易,控制当地所有航道商道,为此需要建立据点或占领某些岛屿国家;2. 掠取当地统治者积累的财富,勒索贡物;3. 夺取并垄断黄金的集中出口地(索法拉和基瓦尔);4. 建立锚碇地和少量移民居住地。大致来说,在鲁伍马河

---

<sup>①</sup> S.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诸文明的冲突》),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以北地区主要实现第 1、2 项目的,在河以南地区则主要实现第 3、4 项目的。

16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远征军曾两次奔袭葡萄牙人占领的斯瓦希里海岸地带,葡萄牙为此加强了防守力量,并利用内陆津巴人力量彻底摧毁了蒙巴萨的设拉子王朝。1593—1594 年葡在蒙巴萨岛上修筑耶稣堡,并驻屯 100 名葡军。葡萄牙人在蒙巴萨驻军力量的加强,有利于它向斯瓦希里海岸各城邦索取贡物。

但葡萄牙人主要目标一直是力图控制沿岸和内陆的贸易网。因此,驻马林迪的葡萄牙长官的权责,除派遣小舰巡察沿岸外,还包括给来往船只发放 Carataze(通行证),并在马林迪经营葡萄牙商站(factory)。这些商站从印度运进棉花、纺织品、珠子等货物,用来换取当地货物如树脂、龙涎香、象牙和椰壳纤维等。葡驻马林迪长官“亦官亦商”,对基尔瓦商业贸易起举足轻重作用,他也在马菲亚岛派住一个代理商,收购树脂和椰壳纤维。

## 二、莫桑比克的殖民开拓

葡人在东非最贪求的仍是黄金,为垄断索法拉黄金贸易,费尽心机。早在 1505 年,葡长官德尼亚就在索法拉岛驻军,修筑土木堡垒,以切断黄金流向基尔瓦等城的通道。驻军死于热带病 40 名。初期,葡人仍主要依靠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循赞比西河和布齐河进入马尼卡,收购内地黄金,而用斑图人喜爱的印度棉布和珠子作为交换物。从遗留于索法拉的贸易账册获知,1508—1509 年 20 个月中葡从内陆获得 1900 盎司黄金和 1 万磅象牙,同期索法拉进口了 1 万多码布匹、8600 多磅珠子。<sup>①</sup>这些进口品除用来换取黄金、象牙外,也用来购买驻军口粮。

索法拉贸易额长期不稳,且呈下降趋势,因阿拉伯商人仍在内

---

① P. E. N. Tindall, A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中非史》) London, 1970, Ch. 3.

陆控制通往金矿的道路。为此葡萄牙计划在内地少量移民，控制要道。在莫桑比克岛上修建圣加布里埃堡，驻蹕总督，并派人进入内陆勘察。1509—1515年熟谙当地语言的费尔南德斯进入内陆，1514年他证实了传闻中的莫诺莫塔帕(姆韦尼·马塔帕)王国的存在。他所见到的“划着独木舟渡过赞比西河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的莫巴拉人可能就是现今考古上已得到确认的伊贡比—伊莱代人。<sup>①</sup>以后60年中，又有多起葡人进入腹地勘探。葡人的目的仍在于控制黄金贸易和若干金矿。因此，从16世纪初开始，葡人就开始居住在赞比西河沿岸地带和克里姆巴岛上。葡商同内地非洲人统治者达成协议，葡人被允许从索法拉进入西北方向的乌特维和马尼卡，再往北进入赞比西地区。为了攫取对黄金贸易及其商路的控制，葡人经常与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的商人发生齟齬，乃至使用暴力驱赶后者。1531年葡军占领了距河口515公里的太特，并修建石堡，实施少量移民计划。到16世纪末，这些城镇各有40—50名葡人，包括充军的罪犯。移民清除林地，建立种植园。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接踵而来，挖空心思向土著传教。1560年耶稣会教士西尔维拉向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在位国王诺戈莫·莫潘扎格托传教，暂时获得成功，并对国王、王后、宫廷扈从和村民300人实行洗礼。不久，1561年3月西尔维拉以“巫术”罪名被杀。1568年登基的葡王塞巴斯蒂昂在东非首开了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发兵征服的先例。1569年他派果阿总督巴雷托率兵1000名进抵莫桑比克，1571年溯赞比西河进入塞纳，乘机屠杀商业上竞争对手阿拉伯商人，但葡军被酷热气候和疫病夺去800人生命，巴雷托亦患热病死去，残部退回沿海地带。1574年由澳门率领的第二支400人远征军再次从索法拉进入内陆马尼卡，企图控制金矿，但发现金

<sup>①</sup> B. M. 费根：《赞比西河流域和林波波河流域》，载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1992年中文版第7卷，第449页。



矿产量甚少并受到非洲人袭击,失望而归。17世纪初葡萄牙介入莫诺莫塔帕王国内战,攫取王国境内所有金、铜、铁矿以及部分银矿的开采权。为了将白银全部运到港口,1616年博卡罗开辟一条从太特经陆路到基尔瓦的行程53天的商路。由于葡萄牙主要目的是探寻金银矿,当有开采价值的矿藏久寻未见耗资费工,菲利普二世遂于1622年下令放弃勘探。此后葡对东非内陆的勘探工作基本停顿,直至19世纪。

17世纪葡力图加强其对鲁伍马河以北东非沿岸各城邦的控制。然而事与愿违,它不仅要对付各城邦的起义力量,还要对付来自海外势力(荷、英、奥斯曼帝国)的挑战。葡萄牙是个蕞尔小国,人口仅125万,实际上它在印度洋行动的规模是较小的。从葡萄牙的档案获知,从1498—1612年,从葡本土开往印度的船舶共806只,平均每年只有6—7只船。<sup>①</sup>对付来自两方面的敌对力量,经常感到捉襟见肘。葡舰队需要在东方如此漫长的交通线上驻兵防守,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蒙巴萨的局势陡变,统治者改换为葡一手扶植的马林迪王朝,也并没有减轻葡萄牙的军事负担。尽管它所扶植的素丹优素福已“皈依”基督教,但葡萄牙统治的专横残暴终于迫使优素福发动起义。163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优素福突袭耶稣堡,杀死全部葡军。此后几年直到1637年,优素福在海岸地区又策动多次反葡起义。与此同时,拉木、帕特、曼达等城邦也频频起义。1636—1637年葡军陷于不断的征讨行动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1580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帝国,从此荷兰人以不受前宗主国(西班牙)的约束为理由,独自窜入葡属东方。16世纪末荷兰商船在印度洋上已成为葡的强有力对手。1607年荷兰舰队竟至封锁莫桑比克港数月之久。英国船只也接踵而至,1608年,英船在

<sup>①</sup> 波尔什涅夫,《新编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卷,第571页。

奔巴岛登陆。葡萄牙已无力抗拒进入印度洋的荷、英海上力量。葡垄断东非—印度洋贸易一百年的时代结束了。其实，荷、英的主要目标仍在东印度洋，并不打算长期占领东非沿岸地区和取代葡萄牙，然而荷、英舰队的不时袭扰，严重消耗了葡萄牙力量。最后给予葡在东非北部沿岸地区力量沉重打击的却是来自波斯湾的阿曼人冲击波。

英国首先在东印度洋打破了葡萄牙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葡的印度财源蒙受损失，葡被迫西撤到阿曼海岸的马斯喀特，企图稳住它在波斯湾的阵脚。不久，葡在波斯湾又败在英国人手里，阿拉伯人乘机驱逐葡人，首先将他们赶出马斯喀特，而后正在崛起的阿曼亚鲁比王朝又将葡人赶出阿曼全境。亚鲁比王朝建立了一支拥有400艘船只的舰队。1652年阿曼人利用东非城邦奔巴、帕特等对葡人控制的不满，出动远征军，攻击葡军在桑给巴尔的阵地。于是开始了长期的沿岸斗争。阿曼首先与拉木、帕特联合，葡人则利用发扎城邦攻击帕特。1696年3月，阿曼舰队运载3000士兵占领蒙巴萨，包围耶稣堡，围困两年半。1698年12月耶稣堡投降。1728—1729年葡利用阿曼人与各城邦阿拉伯统治者的矛盾，又重回蒙巴萨。葡殖民统治者故态复萌，对城邦的榨取掠夺变本加厉，于是6个月后，1729年3月重新激起各地起义。蒙巴萨葡军再次被困，1729年11月饿得奄奄一息的葡军投降，被允许乘船撤往莫桑比克。其它各城邦也纷纷赶走葡军。1730年果阿基地已派不出任何军队前来救援。不久，阿曼军队进驻各城邦并稳定地掌握了局势。自此，盘据在鲁伍马以北东非地区230年的葡萄牙势力完全被清除。葡人在东非北部地区占领了二百多年，它的笨拙的商业政策有着明显的掠夺性质，葡萄牙的行政部门腐败无能，官吏贪得无厌，大饱私囊，开创了一种极坏的殖民掠夺制度的腐败作风。它利用沿海各城邦的派系对立，上下其手为己谋利，然而这种派系斗争也往往成为对准葡萄牙自己的双刃剑。后来，英国在印

度和非洲各地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吸取了葡萄牙的教训，避免了双刃剑的效果。例如它重视和吸收了葡对马林迪的笼络政策的有效经验，避免了“帕特式”的出尔反尔政策。

葡在鲁伍马河以南的莫桑比克地区实施的殖民政策略有差别。葡萄牙特别重视索法拉的黄金贸易，用索法拉黄金支付印度的香料贸易，不惜付出基尔瓦城贸易的衰落作为代价。然而，莫桑比克对葡萄牙印度洋贸易帝国的持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只下金蛋的鹅，还在于它是葡船往返于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的中转港（补给站）。当时葡萄牙帆船驶往印度需乘4—8个月的西南季风，而莫桑比克正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交汇点。如果帆船错过了季风则须在莫桑比克港停泊候风，因此，莫桑比克在葡属东方帝国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在17世纪末失去东非大部分地区后，葡萄牙更集中力量经营莫桑比克地区。1752年葡将莫桑比克的行政隶属关系脱离果阿而独立，另派总督驻蹕。1782年葡又在洛伦索—马贵斯港修建兵营，并扩为要塞。17世纪葡人继续在内地马尼卡兰和马绍纳兰扩张。从近来考古遗址发掘得知，葡人贸易站在宗博以西的琼奎河和卡富埃河汇入赞比西河的交汇点一带（东经29°）均有分布。从内陆勘察的文字记载可知，葡人在贸易集市上以布匹、珠子等换取非洲人装在小管内的金粉或金块。这种贸易利润很大，有些葡商就定居在这些集市地区。

### 三、普拉佐制的失败

在这片内陆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葡萄牙的普拉佐（Prazo）制度。<sup>①</sup>这种殖民制度是葡萄牙在非洲进行费力最多的一种试验，前后经历二百多年。它既不同于葡属巴西的殖民制度却又是后者的渊藪，对于研究世界近代早期殖民制度颇有意义。16世纪晚期，

---

<sup>①</sup> J. Duffy, *Portugese Africa*(《葡属非洲》) Oxford, 1959, pp. 82-90.

深入到赞比西流域腹地的葡萄牙人意外地发现,当地最强大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在社会结构方面同葡萄牙的半封建社会竟然颇有相似之处,即该王国国王土地和高级首长的土地均分封给下一级酋长并由其控制,条件是效忠、纳贡和提供军事支持。葡萄牙的一些士兵和商人因帮助该国同邻邦或叛乱部落作战,而攫得了高级酋长境内的封地及其统治权。在这块受封土地上他们娶当地妇女为妻,熟谙土著语言,建立私人武装,兼并邻里土地,扩大自己封地。他们效忠对象不一,均效忠土地的封赐者。到17世纪,本土力量日衰的葡萄牙政府为了加强其对莫桑比克的控制力,极力扩展它在内地的司法权。当时葡扩展宗主权的最方便的做法是正式承认内地这些殖民者(移民)业已获得的特权。葡政府对定居该地的,已能提供服务的葡人,则授予行政长官权位和普拉佐领地或王家让与权,有的给与世袭权,有的只允荫袭2—3代。普拉佐领地面积一般为3平方里格。最初授予条件是,被授予者需住在当地并与当地欧洲人结婚,在领地上从事种植和殖民。葡于1534—1536年期间曾在巴西实行多那塔略(donatario)分封制取得成功。它期望在莫桑比克实行普拉佐制也能获得同样成功,但普拉佐领地极少保持原有规模而是不断地扩展,直至扩展到极大规模,以致既无法种植,也不适宜居住,而且封地往往落到不为皇家服务的葡人或投机商手中。许多普拉佐领主亦不住在领地,而成为“遥领领主”。普拉佐领地的非洲居民(Colonos)也逃离该区。几乎没有一个普拉佐按原来的规定实施。普拉佐领主都成为领地的绝对君主,任意加重贡赋和人头税。领地内小酋长无力以象牙缴纳增额人头税,便以奴隶代税。普拉佐领主深沟筑垒,宅院豪华,生活奢侈,炫耀财富,俨然独立的王侯。

人口较少的葡萄牙向外移民主要移往巴西,能在莫桑比克定居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少,尤其妇女人数更少,因而葡人多与非洲妇女结婚或同居,混血种(mulatos)人数越来越多。里斯本曾拟定一

项计划,采取两项措施:一、允许普拉佐继承权亦可由领主的长女继承,条件是招赘夫婿须是葡本土出生的葡萄牙人;二、政府将新普拉佐作为葡萄牙孤女的嫁妆,招赘夫婿。这些措施只取得有限成功。<sup>①</sup>直到17世纪末普拉佐领地数目仅维持100左右,<sup>②</sup>仍完全由葡萄牙和混血种的男人控制。

在整个18世纪,普拉佐领地的恶劣状况被视为葡萄牙殖民地的一种痼疾,一直未有起色,每况愈下。19世纪初,塞纳总督 Vil-lao Boas Truao 在巡视报告中指出,整个腹地尽管土地肥沃却处于停滞状态,人烟稀少。他认为原因在于,普拉佐面积太大,行政管理效率太低,领主既不住在领地,也不作任何投资,被奴役的非洲人大部分逃亡,非洲人农田中几乎没有种植任何作物。19世纪初葡政府官员提出了改革措施,但未取得任何良好结果。1832年葡政府决定废除普拉佐制,但政府的权力在内地已削弱到欲废亦不能的地步。政府若派军队强制执行,普拉佐领主辄带领手下人丁逃入丛林。1880年,葡萄牙宣布所有普拉佐领地均属皇家财产,但仍未能对普拉佐的封建性质(当地上著须为领主劳动,并缴纳人头税等)实行基本的改革。

普拉佐制度在葡属早期殖民地完全失败,与葡属巴西早期的多那塔略制比较,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莫桑比克普拉佐领地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拿到世界市场去交换的商品,只能收集一些自然产品象牙和珍贵动物毛皮,而巴西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地区的开拓成功则得益于发展了甘蔗种植,蔗糖在欧洲市场销路极广,使领地逐渐变成生产经济作物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庄园(fazenda)。第二,莫桑比克一直是为印度洋的贸易而开拓的,主要作为中继站而

---

① 握有土地权、征税权、招兵权的“赞比西主妇”(Donas da Zambezia)就是由此产生的。

② J. Duffy, *Portugese Africa* (《葡属非洲》)Oxford, 1959, p. 84.

存在,已被巴西吸收了巨大人力的葡萄牙宗主国无力投入更多的入力,而莫桑比克殖民管理水平低下,普拉佐经济效益极差,不但吸引不住葡萄牙和欧洲大陆的移民,连原来已定居的移民也逐渐移居他方(主要迁往巴西)。移民主要靠服刑的囚犯来补充,越来越降低移民素质;而巴西种植园的经济作物(如烟叶、甘蔗等)获利甚丰,18世纪初又发现了金矿和金刚石矿再次吸引大批欧洲移民前往巴西。第三,普拉佐制下的非洲农民一直受到农奴式的超经济强制,不但未能逐渐上升为佃农或雇佣工人,当普拉佐破产时甚至被当作奴隶贩卖到海外。因而,普拉佐领地的非洲人没有起码的安全感,绝大部分逃亡。而巴西则从17世纪开始就注意采取措施将当地印第安人从奴隶状态下解脱出来,到18世纪庞巴尔首相改革时期则坚决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此外,巴西种植园的劳动力一直未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以上诸原因,甚至英国的殖民主义理论家卢加德也认为,普拉佐制度非败不可。他说,在普拉佐这样压榨下,土著“得不到任何种类的等价物。他们既不能受到保护,免除敌方的侵害,他们的国家也不可能因为有了道路、桥梁、铁路和任何其它工程而向外开放。”<sup>①</sup>普拉佐制在殖民主义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它所“首创”人头税,土著为业主劳动的绝对规定,领地内的商业垄断,这些超经济强制的压迫性措施,当19世纪末非洲被瓜分后,在生产水平低下的类似情况下,均被在非洲的其它殖民列强所效仿和采用。

普拉佐制度苟延残喘到19世纪末,由于这一制度的失败,葡萄牙殖民者未能在内地扎下根来,虽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葡人多次完成从太特到安哥拉和从安哥拉到太特的横贯大陆的探险旅行,但都没有在内地设立什么据点。普拉佐制没有能

---

<sup>①</sup> F. D. Lugard, *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n Empire* (《我们东非帝国的兴起》), Edinburgh, 1893, vol. pp. 29 - 30.

为葡占领从莫桑比克到安哥拉之间的土地奠定殖民基础。葡萄牙在 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上对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之间的土地提出主权要求,没有得到承认。柏林会议遵从“强者逻辑”,以葡人对上述地区并未“有效占领”和确保交通安全为由,拒绝了葡萄牙的要求。这就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侵占中南部非洲这片地区敞开了大门。

## 第四章 大西洋奴隶贸易和非洲

黑奴贸易是非洲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里指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16—19世纪)中具有特殊含意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长达四个世纪的劫人越货的罪行,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殖民主义是随着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早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表现形式主要采取以人类血肉为特殊商品的贸易。这种贸易是与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的。黑奴贸易对非洲大陆造成的灾难是深重、长远的。对非洲各国所发生的深远影响,需要具体分析。

### 第一节 荷兰人执大西洋 奴隶贸易的牛耳

#### 一、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

葡萄牙人无疑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但在15—16世纪最初100年中它只能从非洲向美洲输出约20万黑奴,<sup>①</sup>它受到16世纪以前西属美洲和葡属巴西的雏形种植园的规模和数量的限制,方兴未艾的种植园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毕竟有限。再者,葡萄牙本身运输能力也有限度,它的大部分运输力量仍然置于大西洋—印度洋的东方航线上,1498—1612年葡萄牙开往印度的船舶共806艘,其中285艘留在印度海面使用,96艘在海难中沉

---

<sup>①</sup> 据博克塞统计,1450—1500年葡人在非洲捕获的奴隶总数为15万人。



没,可以航行于大西洋两岸的船舶相当有限。<sup>①</sup>

尼德兰革命后的荷兰、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和专制制度形成时期的法国,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相当快,先后登上海外殖民扩张的舞台。但他们慑于当时的两大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威力及教皇的分割敕令,在1580年以前,面对西葡两霸的霸权都不敢轻举妄动。1580年西葡合并,西班牙国王兼挑葡萄牙,成为欧洲在海外全部殖民帝国的君主,这便给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荷兰)一个攻击帝国最弱部分的良机,荷兰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香料运输船,向西班牙帝国公然挑战,潜入西非沿岸和加勒比海,建立若干殖民据点。1621年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主要采取海盗船袭击方式,先后劫掠了500艘西班牙船,不到10年就摧毁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制海权。<sup>②</sup>葡属巴西的大部分殖民据点,由于失去西班牙海军保护而全落到荷兰手中。荷兰大展其扩张宏图,以其“温和的商业”方式来经营和发展巴西种植园,它首先需要充分满足种植园主对黑奴劳动力的需求,为此,西印度公司将其业务扩展到西非沿岸。1637年,新任荷属巴西总督的莫里斯,以生意人的精明眼光,一下子抓住荷属巴西萎靡不振的原因:没有黑奴,巴西不存。当年即发兵西非,攻下圣乔治达米纳堡(即埃尔米纳堡)。随后,荷兰舰队又将葡萄牙在西非的主要贩奴据点阿尔巾、戈雷、圣多美、罗安达和黄金海岸等40个据点和堡垒全部占领。荷兰人经营商业比英法更有本事。它仿效葡萄牙人做法,抓住奴隶贸易的关键,即在岸上建立永久居留地和强固据点,驻军368人。它所建立的“factory”

① 波尔什涅夫:《新编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一卷第571页。

② 17世纪荷兰拥有15000艘商船。另一种说法,除去单桅小船,船舶总数可达6000艘,以每艘100吨,船员8名计算,总吨数达60万吨,船员48000名。在当时(1669年)这是极大数目。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第3卷,第203—204页。

(商馆),除了从事一般贸易外,主要从事奴隶贸易。荷兰以其占世界商船总吨数 3/4 的充足运输力量,向巴西以及法国刚占领不久的马提尼克群岛、瓜德罗普岛,英国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供应大批黑奴。这种贩奴势头使尚未承认荷兰独立的西班牙也不得不向荷兰奴隶商购买黑奴。1640 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重新独立后,收回了巴西和安哥拉沿岸据点,但黄金海岸和上几内亚湾的几乎所有据点却永远地丧失了。荷兰据有这些最大最坚固的据点,以荷属西印度群岛(主要是库拉索岛)作为转运和分配中心,继续向美洲供应奴隶。荷兰人做生意特别精明,他们不受皇家特权的掣肘,完全无视西班牙的“阿西恩托”的供货合同制,<sup>①</sup>肆无忌惮地进行大量走私输入。西印度公司生财有道,生意兴隆,成为美洲黑奴供应的主要来源。到 17 世纪 70 年代,荷兰人奴隶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仅 17 世纪下半期,它从非洲输出奴隶在 10 万人以上。荷兰从事奴隶贸易时间之长,仅次于葡萄牙,它贩卖奴隶的总数在两个多世纪中一直居第二位。

## 二、荷兰人成功开拓奴隶种植园

17 世纪初,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因受到英、法、荷三国海盗船的不断袭击,加上岛上印第安人死亡殆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在西班牙逐个放弃的岛屿上,逐渐地形成了英、法等国的殖民地。1614—1635 年间,英国占领了圣·克里斯托夫岛、尼维斯岛、安提瓜岛,1624 年占领巴巴多斯岛,1665 年又占领牙买加岛。1667 年荷兰人占领苏利南岛。法国人占领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关于在这些岛上采取移植欧洲农民种植热

---

① 1528 年西班牙国王颁发贩卖奴隶特许状阿西恩托(Assiento)。见 Donn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 1, p. 17, note 77.

带作物,还是学习荷兰人开辟种植园使用黑奴的办法,是经历了一段竞争过程。1645年巴巴多斯岛原有白人小农业者11000人,种植烟叶的黑奴仅有5680人。但其他岛屿使用大批黑奴廉价劳动力生产蔗糖、烟叶和棉花均能获得高额利润,于是奴隶种植园便迅速取代了白人小农业。1667年巴巴多斯岛已有大种植园主745人,黑奴82023人。符合征兵条件的白人只剩8300人,不及原来18300人的45%。白人小农业纷纷被挤垮。<sup>①</sup> 奴隶种植园生产规模越大越赚钱,只需投入更多的奴隶劳动力,炼制10大桶粗褐糖与炼制100大桶粗褐糖所需费用基本相等,黑奴制终于成为美洲殖民地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加勒比海诸岛上普速开辟了使用黑奴的种植园,生产甘蔗、咖啡和可可。黑奴主要由荷兰人供应,岛上日用商品也主要由荷兰商船供应,热带商品也由荷兰商人收购。实际上,荷兰人对英法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实行了贸易独占。欧洲国家所需要热带商品均需付出宝贵的黄金或白银来购买。荷兰商业资产阶级占世界首位的巨大商业利润至少有10%来自殖民地的贸易。而殖民地贸易主要由从政府获得特许权的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独占经营。公司利润和劫掠到的财物,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用作王朝战争战费,而是大部分落入私人股东手中,特别是商人贵族集团如特里普等家族手中,<sup>②</sup> 化作资本的原始积累。17世纪下半叶,阿西恩托制在西班牙人手中已成为强弩之末,几度兴废。1685—1689年又试行几年后不得不将此制度交给“宿敌”荷兰人去经营。荷兰科的伊曼斯公司成了一个大利益集团的掩护机构,阿西恩托制在它手中几年,从库拉索岛出发的贩奴船,暗渡陈仓装载了许多违禁货物进入西属殖民地,开始了美洲走私的新时代。

<sup>①</sup>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师大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sup>②</sup>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41—449页。

荷兰人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从事奴隶贸易获得巨大利润作为原始积累,引起英法商业资产阶级的忌恨。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下,英法两国进行反击,从1650年开始制订一系列对付荷兰人的新政策和新法令。1651年颁布《航海法令》,规定殖民地贸易和货物应完全由本国商人和船只来经营和运载。过去历史学家对英国《航海法令》的研究多半集中于英荷关系,或将它作为1651年英荷战争的导火线来研究,而忽视了它对非洲的重要的间接影响。如果我们从整个殖民主义体系,从大西洋贸易的角度来观察,便会发现《航海法令》实际上是英国从事大规模奴隶贸易的契机。

## 第二节 英国奴隶贸易的勃兴

### 一、欧洲对原糖的需求刺激了奴隶贸易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欧洲人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原属贵族富豪之家享有的奢侈品逐渐进入平常百姓家。饮茶和咖啡逐渐成为欧洲人的习惯,糖开始成为欧洲平民人家餐桌上食品,白糖需求量大增。此项热带产品当时主要产于美洲的甘蔗种植园。市场上食糖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欧洲精制食糖的糖厂大量增加,对美洲原糖的需求成倍增长,这便刺激了美洲首先是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和数目的猛增。英国以及其他大陆国家如法国运用关税政策,鼓励从美洲进口粗褐糖(原糖),而将糖制糖的进口税提高到原糖的4倍。在欧洲将原糖精炼成食糖或酿成萨姆甜酒再运往世界各地或返销美洲。载运原糖和精制糖、萨姆酒以及其他日用品的船只穿梭于大西洋。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660—1689年间英国船舶的数量和吨位迅猛增加,许多远洋帆船代替了近海小船。英国前往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船舶数量和吨位的增长引人注目,1663—1689年间翻了一番。英国的贸易重点从欧洲大

陆转向美洲和东方。至此,大西洋贸易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欧洲与美洲殖民地间的大西洋纽带已经不仅仅是由早期殖民扩张来维系,而逐渐转由垄断性重商主义特别是以奴隶贸易为中心的三角贸易来维系,这条粗大的大西洋纽带(连同更加遥远的印度洋纽带)使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从而为18世纪末产业资本的脱颖而出准备了深厚的基础。

美洲甘蔗种植园种植甘蔗和榨取原糖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16—17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甘蔗种植园使用大批黑奴,既解决了劳动力大量缺乏问题又获得高额利润。17世纪下半叶加勒比海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种植园主从荷兰人(间接从葡萄牙人)手中学会了使用黑奴的方式,并将这种方式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整套颇具效率、创获厚利的制度。经营这些种植园的欧洲资本家采用的生产方式虽然不是从奴隶制中产生的,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种植园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如蔗糖、烟叶、棉花等是全部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之中,是为外销市场而生产的,因而对剩余劳动有着无餍的追求。17世纪以后的欧洲市场对热带产品求大于供的行情,不断地刺激美洲种植园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劳动力需求。广袤的非洲大陆似乎能无限地提供美洲各种种植园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奴隶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园的奴隶主从生意经出发,可以不必顾及劳动力的恢复,即不必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在他们看来,最有效果的经济方法是,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从有体动产(Chattel即奴隶)上榨取最大量的劳力,即最大限度地压榨黑奴劳动力直至其衰竭而死。采用这种残酷的剥削方式,青壮年黑人奴隶一般在5—6年时间内筋骨便被榨干至死,或成为残废,差不多“每隔20年就要死光一批共约五万名的健壮奴隶”,<sup>①</sup>因此每隔几年种植园就需要更新一批劳动

---

① Basil Davidson, *Black Mother*, London, 1961, p. 71.

力,乃至全部补充奴隶。被掠夺到美洲种植园的黑奴(女奴)在非人生活条件下,一般都拒绝生殖,奴隶的自然增殖率很低,绝大部分的奴隶补充需要从外部(非洲)运进。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只要奴隶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就不如他们活着时对生产率那样重要了。黑奴的生命被视同草芥。凯尔恩斯指出:“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sup>①</sup>

美洲种植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量极大。种植园的第一代作物是烟叶。烟叶种植园占地一般不小于2400亩,较大的则在12000亩以上。17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改种甘蔗后,劳动力需求倍增。甘蔗种植园需要的劳动力和畜力为其他作物同面积种植园的3倍,一般12亩土地需要一个奴隶劳动力,而广种薄收的玉米地每240亩才需要一个奴隶劳动力。面积为10991平方公里的牙买加岛,开拓680个种植园,共有耕地180万亩,需要黑奴105000人。

从17世纪下半期起,大西洋上满载黑奴的帆船一年比一年增加。欧洲殖民商人一般均以从非洲运出黑奴数量来衡量他们同非洲的贸易额,他们在非洲大陆的全部活动似乎都从属于奴隶贸易的利益。更多的欧洲国家对奴隶贸易趋之若鹜,瑞典人、丹麦人、勃兰登堡德国商人纷纷加入经常性的黑奴贸易,仿效荷兰人,甚至吸收荷兰资本,他们占据加勒比海一些极小岛屿作为从西非运来的黑奴集散地,趸卖给拥有大批种植园的欧洲国家,从中获取暴利。

---

<sup>①</sup> Cairnes, J. E.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and Probable Designs*(《奴隶劳动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 London, 1862, pp. 110 - 111,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6页。

## 二、英国成立独占性贩奴公司

《航海法令》和英荷战争迫使荷兰人不能再参加英法两国的殖民地贸易,不能再向他们的加勒比种植园供应大部分奴隶。然而,英国和法国虽已经营数十年却一直是小规模奴隶贸易,远未能满足各自殖民地对奴隶的需求。英国人开始拦劫驶往英属岛屿的荷兰走私贩奴船。<sup>①</sup>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若要取代荷兰人并同其在奴隶来源地的西非进行竞争,必须效法荷兰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织以供给西印度种植园所需奴隶为主要目的的大型独占性公司。1660年英国政府批准成立皇家冒险者开发非洲贸易公司(Company of the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Africa),颁给特许状,规定公司每年应向西印度群岛运送3000名奴隶。英国开始了经常性的奴隶贸易。1663年公司向西非派出40艘贩奴船,<sup>②</sup>至1664年11月向巴巴多斯运送3075名黑奴,1672年英国又给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颁发特许状取代了前者,囊括地区从三尖角到好望角。与此同时,1664年法国批准成立法属西印度公司。出口“活人牲口”奴隶贸易的高额利润使输往非洲其他商品贸易的利润黯然失色。在非洲口岸花几英镑甚至几码布的价格收购的奴隶,运到巴巴多斯岛可以卖14英镑,或五倍于一匹马的价格。皇家非洲公司在1673—1711年派出500多艘奴隶船向英属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运去90768名奴隶,加上横渡大西洋航行中的死亡率(据英国议会17世纪80年代估计为27.33%),估计该公司从非洲运走的奴隶约为11.6万人。另一位史学家爱德华兹估计1680—1700年该公司从非洲运出14

---

① Donn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 1, pp. 153 - 154.

② Ibid, p. 164.

万黑奴，而私商运出 16 万人。<sup>①</sup>

英国私商从事奴隶贸易往往比垄断大公司更有效率。他们为英国原始积累提供更多由利润转化的资本。到 17 世纪末，私商走私贩奴已泛滥成灾。1698 年英国议会作出决议，向所有英国臣民开放非洲的奴隶贸易：凡缴纳关税为船货价值 10% 的商人均可从事奴隶贸易。<sup>②</sup>从此，奴隶贸易被确认为所有英国人天经地义的权利。英国奴隶贸易获得空前大发展。此前，1680 年皇家非洲公司每年平均贩运 5000 名奴隶。开放后的 1698—1707 年，头 9 年仅布里斯托尔一港就运去 160 950 黑奴，年均均为 17 883 名。1771 年运奴船舶达 190 艘，运载黑奴 47 000 人。<sup>③</sup>

### 第三节 英国把奴隶贸易纳入 殖民主义体系

#### 一、“三角贸易”使非洲变成猎获 黑人的商业性饲养场

17 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从事经常性的奴隶贸易时，它的工场手工业还没有为这项“以物易物”的交易准备足够的、适销对路的商品。非洲人不喜欢欧洲尤其是英国生产的布匹，因其质量欠佳且易褪色。英国每年要从印度进口价值 2 万英镑的布匹。非洲某些奴隶市场，如尼日尔河口卡拉巴尔的奴隶价格是以矩形铁块和铜手镯来计算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便从瑞典和德国购进铁和铜。西非海岸喜欢一种质地柔软坚实的荷兰床单，公司在 24 年里将

---

① Davies K, *Royal African Company* (《皇家非洲公司》), London, 1957, p. 363.

② Donn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 1, pp. 421—429.

③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师大出版社，1982 年，第 31 页。



50万条荷兰床单运进西非。用火器换奴隶开始成为时尚的交易方式时,皇家公司船舶满载着从荷兰购进的枪支弹药开往非洲,引起英国军火商向议会提出抗议。从意大利进口的威尼斯项链到了非洲成了抢手货,甚至连酒类在英属西印度群岛能酿出价廉物美的罗姆酒之前,也是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可以说直至17世纪下半期,英国用来交换奴隶的商品还有很多是依赖外国生产的,皇家非洲公司出口的150万镑商品有一半是外国产品。英国重商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主张提供黑奴来源地的非洲应该同样具有殖民地的价值,必须为本国的输出商品提供保护性市场。为此,英国首先自己就需要能生产奴隶贸易所必需的商品。英国是如何改变其制造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些研究者对奴隶贸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

我们认为,英国是以三角贸易为枢机,构建其早期殖民主义经济体系的:以英国建造的船只运载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到非洲口岸,用这些工业品换取黑奴(先赚得一份利润),再把黑奴运到美洲种植园,换取殖民地的热带产品(赚第二份利润);而后满载殖民地热带产品的船舶返回英国或欧洲港口(再赚第三份利润)。重商主义者是舆论的鼓吹者和实际商业行为的监督者。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波斯尔思威特把大西洋奴隶贸易看成是“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sup>①</sup>

英国以《航海法令》为后盾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活动中坚持三条原则及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

1. 英国载运殖民地进出口货物,包括运送黑奴的运输工具必须是英国船舶。这项规定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船舶制造业和航运业。1707—1787年英国经营外贸船舶增加4倍,驶往非洲从事贩奴的船舶增加12倍,吨位增加11倍。由此,利物浦等城的造船业

<sup>①</sup>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8页。

获得空前的巨大发展,并带动一系列制造业的发展。

2. 运往殖民地或运往非洲换取黑奴的工业制造品必须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生产的。首先不得从荷兰购买火器再转卖给非洲。18世纪初伯明翰厂商一方面起来反对皇家非洲公司对出口枪支弹药的垄断权,一方面加紧生产供应非洲的滑膛枪。1673—1704年受伦敦制造商支持的皇家非洲公司共出口枪支约6万支,火药11 095桶。<sup>①</sup> 伯明翰迅速将其出口数量增加到10—15万支。从1750年到19世纪初,英国每年输往西非的枪支达283 000—394 000支。另外每年还向刚果河以北的罗安果沿岸输出5万支枪。1750—1807年间英国还向非洲输出2.2万吨火药,年均达38.4万公斤,铅粒年均9.1万公斤。<sup>②</sup> 伯明翰工厂在提供冷兵器商品名单上也是名列前茅,1690—1701年向皇家非洲公司提供了40万把刀和7000把剑。<sup>③</sup> 在纺织品方面,英国第一步先是以殖民地印度的纺织品占领非洲市场,排挤欧洲纺织品。印度的纺织品布罗士外罩、卡坦呢、横条花布衣等在非洲市场都有极好销路。第二步是曼彻斯特工厂仿造印度的产品,如“巴夫特”廉价棉织品,是奴隶船上必备的奴隶穿戴的条纹缠腰布,实现由英国货占领非洲市场。到1763年英国纺织品出口总值达30.2万英镑,据1788年估计,仅曼彻斯特每年向非洲出口商品价值20万英镑,其中售给黑人商品为18万英镑,向西印度出口工业品为30多万英镑。此外,铁器铜器大量输往殖民地,皇家非洲公司仅1682年就向非洲出口

---

① J. E. Inikori, *The Import of Firearms into West Africa, 1750—1807: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1750—1807年输入西非的火器) in “J. A. H” 1977, 18:3.

② P.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奴隶制的变形》),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6.

③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6页。

10 000 条铁棒。<sup>①</sup>1729 年英国出口铁器有 1/4 输往西印度。<sup>②</sup>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国却将其工业能力集中于生产供应贵族的奢华的化妆品。

3. 殖民地产品必须以原料而非制成品形式运往宗主国。西印度奴隶种植园生产的蔗糖应以原糖(粗褐糖)形式运往英国,对精制糖进口课以高出原糖 4 倍的关税。英国甜酒工业用西印度的原糖酿造兰姆酒(Rum),再将黑人喜欢喝的甜酒输往非洲。兰姆酒也是贩奴船上不可缺少的必备货物,“出色的海员”离不开它,以麻痹自己的神经。在屯集大批黑奴的漫长的非洲海岸上,大兴饮酒之风,绝对有利于欧洲奴隶商的腰包。

英国人在三角贸易和其它海外贸易中严格执行这三条原则,在不到 100 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确立了商业霸权。

## 二、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殖民霸权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争夺战中,已为自己奠定物质基础的英国还需要为其建立殖民霸权。这项战略性目标是通过 18 世纪三次血腥的商业战争(1702—1713 年,1740—1748 年,1756—1763 年)实现的。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它占领了直布罗陀,在梅诺卡岛上设防,控制了西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狭窄出口。在乌德勒支条约中有关供应非洲黑奴的协定规定,西班牙给予英国为西属殖民地供应非洲奴隶的 30 年特权,即阿西恩托(Assiento)供货合同的特权。虽然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允许英属巴巴多斯岛和牙买加岛向西班牙殖民地种植园供应黑奴,但 1713 年的供货合同所给予特权却使英商向所有西属殖民地贩运黑奴合法化。按合同规定,英国每年获准贩运的黑奴数目为 4800

<sup>①</sup> Donnon, *op. cit.*, vol. 1, p. 283.

<sup>②</sup>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79 页。

人,但英国此时已有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用于在西非大批交换黑奴,所以实际上英国每年贩奴数目高达 15 000 人,为原定限额的 3.1 倍。<sup>①</sup> 西班牙用硬幣墨西哥鷹洋支付黑奴购价,英国国库金银储备骤增。根据赫斯科维茨教授在《黑人社会史》一书中的统计,1666—1776 年英国奴隶商向英、法、西三国殖民地输入的奴隶为 300 万人(不包括在海运途中死去的 25 万人),在整个 18 世纪英商为法、西种植园输送 50 万黑奴。1680—1786 年输入英属美洲殖民地为 213 万人,仅牙买加一地就输入 61 万人。<sup>②</sup> 1776—1800 年奴隶贸易高潮期间,各国奴隶商年平均输入额:英国人为 38 000 人,法国人为 20 000 人,葡人为 10 000 人,荷兰人为 4000 人,丹麦人为 2000 人,平均每年输入总额 74 000 人,25 年中共输入 185 万人,英国占 52%。<sup>③</sup> 据统计,1770 年从非洲经大西洋运到美洲的黑奴有一半以上是经由 200 艘英国船运载的。1785 年由西非运走的 64 000 名黑奴,有 38 000 人即 59% 是由英船贩运的。1789 年从尼日尔河口运走的 14 000 名黑奴,其中 11 000 人即 78% 由英船运走。1783—1793 年 10 年中仅利物浦英商就运走 303 737 名黑奴。英商贩运的黑奴不仅供应英属殖民地,其中 2/3 是供应其他国家殖民地的种植园。

### 三、从政府行为到向私商开放

有人以为英国人从事奴隶贸易是私人行为与政府无干。事实

- 
- ① Donn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vol. II, 第 XI, XII VI 页。
- ② 振唐南《奴隶贸易文献》,1702—1775 年的 73 年间运到牙买加高的黑奴为 479736 人,1726 年一年高达 11708 人。见 Donn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奴隶贸易文献》), Washington, 1930, p XI, XII VI。
- ③ Herskovits, M. J. Social History of Negro(《黑人社会史》)Clark University, 1935, 转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编《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第 98 页。

恰恰相反,英国政府将奴隶贸易向私商完全开放,是在较晚时候(1750年)。在此之前一百多年主要是由受政府支持的垄断公司进行的。如上所述,奴隶贸易长期全部由皇家非洲公司所垄断,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即使在1698年该公司独占权被取消后,该公司在西非所设立的堡垒,仍由政府每年给予1—2万英镑的津贴。这些公司的股东不仅有商人,入股的还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王室成员和大臣,英王查理二世便是皇家冒险家公司的大股东。英国政府称赞皇家非洲公司是英商公司中赢利最多的公司。英国最大两家奴隶贸易公司都冠以“皇家”的名称,表明得到皇家的支持和皇室的投资。从伊丽莎白女王、乔治三世到威廉四世都是维护黑奴制度的。后来,奴隶贸易向私商开放,英国政府仍然始终一贯地鼓励奴隶贸易,支持从事奴隶贸易的私商,至少直到1783年以前都是如此。1708年英国政府贸易部作出决议:“奴隶贸易是不可少的,它使王国如此受益,必须最大限度地进行下去”。18世纪末进行禁止奴隶贸易辩论时,一位律师指出,英国“历届政府和各个政党,对待奴隶贸易政策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我国(英国)历史各个时期,在各种政治气候中,每个党派和各个政党人物都相继表示赞同这一贸易,投票支持发展这一贸易,并认为它对英国十分有利”。<sup>①</sup>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叙述。英国教会也是支持奴隶贸易的。这就是说,几个世纪来,国王、政府、教会都支持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在向私商开放后,进一步得到一般公众舆论的支持。英国社会各个阶级(除一些影响不大的反对者外)在奴隶贸易问题上采取如此完全一致的态度,是颇令后世接触这一时期史料的人感到惊讶的。那么,英国社会各阶级在哪一些基本利益上构造了他们的结合点?奴隶贸易所驱动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极其有利

<sup>①</sup>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奴隶贸易使当时西欧各国奉为圭臬的重商主义原则得到完美的贯彻。而奴隶贸易在一定时期所带来的好处,掩盖了它实际存在的缺陷和罪行。

首先,奴隶贸易不仅建立了英国本土的工业,还建立了英属热带殖民地的农业。奴隶贸易为英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据估计,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白人领 10 个黑奴干活,所生产的商品,以及他们吃穿和开销所需求的商品,在英国国内可以为 4 个英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奴隶贸易使数以千计的主要生产奴隶贸易商品的手工工场生意兴旺,增加雇工。三角贸易增加了数以万计的海员和造船工人。据估计,西印度群岛增加一户白人移民(相应地就有种植园主及其下面的若干名黑奴)就能让 5 个海员就业。18 世纪英国人口增加,殖民地和奴隶贸易安置了大批新增人口的就业。

奴隶贸易增加了英国国家财富并增强其综合国力。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增加了英国 7000 万英镑财富,每年为英国提供 400 万英镑收入,而其他地方只有 100 万英镑。<sup>①</sup> 在那里的英国人平均每年为英国提供 10 英镑利润相当于国内英国人的 20 倍(0.5 镑),根据威廉·伍德计算,英国人每年只要提供 7 先令利润就足以使英国富强起来。17 世纪末西印度种植园进出口贸易利润 72 万镑占英国进出口贸易总利润 200 万英镑的 36%,超过东印度贸易利润 68 万英镑(34%);到 18 世纪(1773 年)西印度种植园对英出口和进口分别占英国人口和出口总额的 24.8% 和 8.6%,占英国进出口总额的 15.5%,位居第一。这些明显的利益使许多英国人感到他们从中受益。而且,奴隶贸易的特殊形式使英国政府在非洲海岸花费甚少,基本上不付出驻军费和行政费,只是付给皇家非洲公

---

① 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威廉·皮特和战争》), London, 1911, p. 370. 转引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49 页。

司每年 1—2 万英镑的堡垒补助费。

奴隶贸易向私商开放后,高利润吸引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资这项“冒险生意”。例如,利物浦虽然大部分奴隶贸易为 10 家大商行所把持,但该市的律师、布商、杂货商、甚至理发师和裁缝对奴隶贸易也趋之若鹜,合股购(租)船参加奴隶贩卖。贩奴生意成了抢手生意,一些小市民以拥有 1/8 股、1/15 股、1/32 股为侥幸,“几乎每个利物浦市民都成了商人。他们中拿不出一大捆货物者就拿出一小箱……,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对几内亚买卖怀有浓厚兴趣,形成一股浪潮,难怪利物浦开往非洲小船多如牛毛。”<sup>①</sup> 利物浦水手有一半参加奴隶贸易。该港每年从奴隶贸易获得利润高达 30 万英镑。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而变成了国际贸易的重要中心,人口从 1700 年的 5000 人上升到 1773 年的 3.4 万人。“三万市民三万商”,真有“全民”搞奴隶贸易的势头。当时社会有个脍炙人口的说法:“利物浦的主要街道是用非洲奴隶的锁链开辟出来的,楼房的墙壁是用非洲黑奴的鲜血粉刷的,海关大楼的红砖是以黑人的头颅为纹章的。”迄今仍为英国第二大商埠的利物浦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血腥利润中崛起的,这不能不给 17—18 世纪英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史上留下难以磨掉的印记。

#### 第四节 大西洋奴隶贸易给 18 世纪热带 非洲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记

##### 一、为什么奴隶贸易没有迅速导致大规模殖民占领

16—18 世纪非洲殖民主义制度的特点同美洲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分不开。美洲蔗糖业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16 世纪

<sup>①</sup> 文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6 页(译文略有改动)。

中叶开始向西班牙出口,进入世界市场。西班牙人起先靠葡萄牙人输入几内亚黑奴解决种植园劳动力问题(详见第3章)。后来倚靠荷兰人,所以几个世纪来西班牙无需为自己在非洲建立任何收购或劫掠黑奴的制度。英、法则大不相同。重商主义原则的操作、与荷兰人的激烈竞争促使他们亲自动手在非洲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奴隶贸易制度。

与荷兰人部分地承袭葡萄牙人奴隶贸易的现成制度略有不同,英法奴隶商从一开始就是组织独占的大公司,并且主要向从内陆贩奴的非洲商人购买奴隶的。由于从内陆押送来的黑奴不可能按规定时间和数量到达海岸,而远渡大西洋的、从事三角贸易的贩奴船也不是按一定时间表抵港。因而大公司需要在沿海修建一些配备有警卫力量的堡垒,作为贮存奴隶的仓库,并防备其他敌对公司武装力量的袭击。从塞内冈比亚河口沿几内亚湾,南迄刚果河口和安哥拉的4800公里的海岸上(除尼日尔河口附近以外)星罗棋布地布满了欧洲奴隶商的堡垒。堡垒一般均建在海边,囚奴地牢面海有门,有的可直接泊靠小船,通过牢门即可把关押的奴隶直接押上船(加纳等地迄今留有奴隶堡垒的遗址)。在不曾建堡的海岸(多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一带),则在沿岸修建临时安置奴隶的非设防“屯舍”(barracoon)。不论是建堡或不建堡,在奴隶贸易盛行的二三百期间,欧洲国家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建立殖民统治关系,而主要是与非洲各地的当权者建立一种合伙关系。这种持久合伙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所采用的形式对19世纪以后的殖民制度均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不研究这种合伙关系就难以理解后来的殖民制度的发展过程。

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非洲通过三角贸易成为大西洋贸易网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非洲在印度洋贸易网中原来炙手可热的香料,黄金贸易的比例却不断地衰减,渐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在近三百年时间中,西欧国家在非洲的最大利益不在于领土



和资源的占有(还有自然气候等原因),而是造成一种商业机制迫使非洲充分地成为美洲殖民地种植园供应奴隶。欧洲商人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包括金钱和生命)获得非洲奴隶的最充分的供应。

早期葡萄牙人和英国人都曾经赤膊上阵,亲自登岸或深入内陆掳掠、绑架非洲人,虽然辄有所获,但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大,经常受到非洲人的反击,死伤狼藉,得不偿失。后来欧洲人(最早是荷兰人)采取商业的方式,运来非洲头人喜爱的商品,换取部落战争中的战俘,或者进一步同非洲内陆某些部落酋长、土王结盟去攻打其对手,将对方的俘虏由欧商收购,运往欧洲当奴隶。这些新手段虽然所获较多,有的一次能捕抓几百名俘虏,但防御者的含毒箭矢和标枪仍使欧洲人有所伤亡。<sup>①</sup>另外,采取这两种方式获得奴隶,欧洲人都必须在非洲河面、岸上或内地逗留较长时间,很多人容易染上无法防备的疟疾、黄热病、昏睡病等,死亡率很高。1651年,英属几内亚公司一条贩奴船的船长心有余悸地说:“自从我们驶入这条河(冈比亚河)后,活该倒霉,我们中间许多人生病,结果死了23人。我的大副、二副和掌帆长就是其中的三位,还有我的两位炮术军士和一位掌帆军士,一位代理商道布斯先生。其余死的人都是我们船上最强壮的人”。<sup>②</sup>因此,欧洲奴隶船上的水手流行一首歌谣:当心哪当心/当心贝宁湾/进去四十个/一人能生还。西非沿岸遂有“白人的坟墓”之称。

## 二、“代理人制度”及其种下的恶果

欧洲奴隶商长期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一直在寻找一条既能充

① Williamson, J. A. Sir John Hawkins(《约翰·霍金斯爵士》)载 B. Davidson, *The African Past*(《非洲史料选编》)Longmans, 1964, p.199.

② Basil Davidson, *Black Mother, The Year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 Boston, Toronto, 1961, p.84.

分满足美洲种植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又能减少欧洲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贩奴途径。从长期贩奴操作中,欧洲商人逐渐摸清几条贩奴规律:一、从运往美洲的奴隶的肤色、体征、语言和风俗习惯看,大部分奴隶来自非洲广袤的内陆,只有极少数奴隶来自沿海地区。内陆特别是森林地区无疑是黑奴取之不尽的来源地。二、凡是内陆发生动乱,战争迭起,战俘越多,则运往沿海的奴隶就越多且多是大批供应,价格也趋于下降。三、用来换取奴隶的欧洲商品中,滑膛枪和子弹——火器渐成为销路持久的走俏商品。而滑膛枪等输入的数量与内陆的动乱成正比:即枪支输入越多的地区,其内陆形势越动荡,部落战争、小王国间的战争越频繁,战俘(奴隶)也就越多。四、欧洲商人对非洲中人(中间商,多来自沿海)的控制程度越大,对内陆的首长、土王的奴隶生意就越好做;而与非洲人的合伙贸易关系理得越顺,奴隶出口的数量就越多,利润也就随着提高。

英国、法国和北欧的奴隶商从葡萄牙人、荷兰人的长期贩奴实践经验中看到,与美洲种植园对奴隶的需求相联系的奴隶贸易只有恰当地利用非洲现有的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才可能持续地大规模地进行。在几内亚湾沿海地带,从三尖角到尼日尔河三角洲居住着一些很有商业才能的民族,13—16世纪时期,他们在与苏丹草原诸帝国通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后,他们以熟谙商情业务逐渐成为欧洲奴隶商的中人(middlemen),其中有伊博人,贝宁人,埃菲克人,芳族人等,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在家族范围内使用奴隶充当独木船的舵手和船员,运送作为商品出售的奴隶。欧洲人曾见到河畔镇的埃约土王的家族“拥有数千奴隶和400艘独木船。每艘船配备一个舵手和一些船员。”<sup>①</sup>他们严密控制通往内陆的一切通道,所有从内陆来的奴隶

---

<sup>①</sup> B. Davidson, *Black Mother*, op. cit., p. 188.

都由他们押运或经过他们的手出售。他们严密封闭了欧洲商人同内陆(奴隶来源地)接触的任何孔道,以维持其向欧洲商人贩卖奴隶的垄断性经营。欧洲商人为了避免深入内陆遭受热病折磨和内地部落的袭击,出于利益考虑,乐于同沿海地带的中人打交道,制造出更多的“共谋者”。这样在沿海地带逐渐就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人(中间商)集团。

沿海的非洲中人带着各种欧洲商品进入内陆,通过多种渠道搜购奴隶。内陆的部落头人和土王用各种方式(债务、罪犯、宗教习俗等)去搜罗尽可能多的奴隶或将部落战争中的俘虏卖给欧洲奴隶商,来换取他们喜好的欧洲商品(不少是亚洲产品),特别是火器(滑膛枪和弹药)。这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和平贸易”的模式。这套贸易模式一直存在到奴隶贸易结束,它对19—20世纪非洲的殖民制度影响至深。

欧洲商人充分利用当地头面人物和现有制度,以厚利诱使他们卷入奴隶贸易罗网。自从马里王国和桑海王国解体以后,在森林地带和草原,热带非洲再没有出现任何真正的大国。蕞尔小国林立,部落分散如同一盘散沙,互相攘夺资源和地盘,争战不已。过去买卖奴隶从来未成为部落酋长或土王的经常性行为,更没有形成规模性的贸易商品。随着酋长等有势力人物对欧洲商品(大部分是相对意义的奢侈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谋求欧洲商品成为非洲上层人物出售奴隶的动力。通过贸易利润、关税和礼品,非洲头面人物积累了大批财富。约翰·巴波特在17世纪末就注意到,在非洲如同在欧洲一样,“奴隶买卖是国王、富人和大商人的买卖,而不是下层黑人的勾当,”<sup>①</sup>奴隶买卖所积累的财富,特别是火器的输入使那些原来酋长只拥有空泛、有名无实权力的酋长真正掌握

---

① J. Barbot,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North and South Guinea*(《几内亚南北海岸记游》),载 B. Davidson's *The African Past*(《非洲史料选编》), p. 211.

了实权,在原来已存在酋长和土王权力的地方(大多是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200 年的诺克铁器文化的继承者),财富和火器使权力强化成专制独裁的权力,奥约、贝宁、阿丹西、邓克伊拉、阿散蒂等国家都是在这个浪潮中崛起的。这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酋长和土王为适应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需求,采取几项有力措施:一、效法欧洲奴隶商,在沿海地带建立屯舍存放大批奴隶,以备贩奴船一抵岸就能如数将奴隶运走,从而大大加快周转速度。二、效法欧洲大公司,垄断一定地区奴隶收购的做法,想方设法独占内陆地区的奴隶买卖,不让欧商渗入内陆。三、与沿海地带已形成的强有力的中人(中间人)集团紧密配合,绝对隔离欧商与奴隶来源地的接触,封锁消息。四、建立强大的拥有火器装备的武装队伍,发动掠奴战争或部落战争,向内地邻国索取俘虏。

欧洲商人与非洲统治者的合伙关系关键在于武器的提供。以武器为纽带而结成的欧洲奴隶商与非洲上层的合伙关系,对于以后形成非洲殖民主义制度特点的影响最为深刻。

以枪换奴隶(通俗说法:一支枪一个奴隶)的贸易形式对非洲社会的破坏性最大。一旦陷人以枪换奴隶的罗网,任何非洲酋长和土王都不可自拔。从事贩卖奴隶的一部分非洲统治者曾设法限制、禁止或废除奴隶出口以摆脱奴隶贸易的恶性循环,但都没有达到目标。上一章提到的刚果王阿方索一世不是惟一企图摆脱奴隶贸易而一败涂地的非洲国王。18 世纪 80 年代塞内加尔地区一个国王颁布法律不准任何奴隶经其国土出口。停泊在塞内加尔河的奴隶船上法国商人转而向其他非洲统治者购买,后者用法国商人提供的武器对这个塞内加尔国王进行突然袭击,他高尚的禁奴计划成了泡影。

这样的下场比比皆是,成为规律。有的更为悲惨:欧洲入向禁奴国的邻国收购奴隶而供应大批枪支,使其骤然强大,转而向禁奴国进攻,掳其部众卖为奴隶,禁奴国社会瓦解,部众星散,成为任人

宰割的俎上肉。“以枪购奴，以奴换枪”成了市场交易的普遍原则。随着掠奴地区如同墨渍渗透，向内陆深处扩展，任何国家和部落必须在二者之中作出选择：或者奴役和劫掠别国索取俘虏，以便不断地购买（换取）火器，或者洁身自好，束手待毙，甘冒本族遭受奴役的风险。欧洲奴隶商坐镇非洲沿海，稳坐钓鱼船，运筹帷幄，只要手中握有大批火器心中不慌，自有熟练的中人（中间商）按时、按量、按品种（青壮男奴、女奴、童奴）送货上门，将停泊在海面的远洋奴隶帆船逐艘装满，扬帆而去。欧洲商业资本构建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机制，已经成熟到自行运转的程度。它设置一种类似生物学上的动力，使热带非洲的国家或部落都希冀成为强者。以奴役他人而避免本国受奴役，成为各国和各部落“争相”同欧洲发展奴隶买卖关系的内在动力。它促使阿散蒂、达荷美、奥约、贝宁、阿丹西、邓克伊拉等数以百计的国家和部落全力以赴地投入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制度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要求非资本主义社会向它提供大量奴隶制劳力而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赤裸裸的易货形式、明显的暴力、超经济强制。因而它（表现为世界范围的贸易）往往使非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之中。在非洲奴隶贸易所形成的因果循环系统中，奴隶贸易的受害区基本上形成三类国家：一类是拥有大批枪支的靠近沿海的内陆国家，如达荷美、阿散蒂，奉行穷兵黩武政策，向内陆广大地区掳掠人口，卖为奴隶。第二类是沿海国家（在其领地上往往设置了欧洲国家一些堡垒）充当欧洲奴隶商的中人，拥有垄断性权利，以枪支或其他商品向近海内陆国换取奴隶，如芳族、伊博族人等。第三类是远离海岸的内陆国或部落，数量不少，大多是武装羸劣、任人宰割，间或也去袭击比自己更小的弱者。

欧洲商人主要是同第二类或第一类的国家和部落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黄金海岸（今加纳）以西的沿岸地区（包含上几内亚），欧洲商人在各自政府支持下，沿袭葡人的多年做法，大多建立

石头或砖砌堡垒，驻扎少量武装力量；在以东的几内亚湾地区，如上所述当地非洲国王和酋长为防止欧洲公司和商人控制贸易和沿海地带，不允许欧洲商人在岸上建立石砌或砖砌堡垒，只许他们在离岸几英里地带建立泥质建筑物，以防止他们得到欧船炮火的掩护。在奴隶海岸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由于河道纵横和当地土王的防范措施，大公司反而不便行动而个体私商却如鱼得水大有活动余地，后者一般只用旧船作为屯集奴隶的栈船，并以送礼、缴纳贸易税，取得当地非洲统治者的青睐。中人（代理人）制度得到很大发展。中人对于他们自己和本国人的行动，依法向当地非洲统治者负责。

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喜欢强调本时期欧洲国家（政府或公司）同非洲当地统治者的“平等关系”。实际上，这只是奴隶贸易双方——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对等的易货关系，它并不反映实质平等的关系，因为非洲输出的是对非洲社会破坏极大的“活人商品”。因此，实际上双方的深层次关系要远比这种简单化的概括复杂得多，而且其影响极其深远。这里，根本谈不上国际法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对别国领土主权的尊重。欧洲殖民国家在本时期从自身利益出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热病威胁）侵占热带非洲大片领土。然而，即使在奴隶贸易最繁盛时期，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只要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有必要，便会毫不犹豫地占领非洲某些领土，肆意侵犯主权，建立直辖殖民地。1764年，英国在上几内亚建立塞内-冈比亚直辖殖民地，就是出于当时大英帝国利益的考虑。只是实际情况很快表明，这块非洲殖民地对英国的商业利益很不利（迫使英国后来予以放弃）。这些罕有的小块殖民地的情况证实了英国统治集团中占优势的主张：扩大英国在非洲的商业利益（当时几乎就是奴隶贸易）并不需要在非洲扩张领土，建立直辖殖民地。许多商人（包括利物浦商人）有更现实的利益考虑，他们哪怕已在沿岸建立了堡垒，也不愿（或不敢）将直接权力扩张到堡

垒的大炮射程以外的地方。他们更关心的是商业利润而不是行政管理费用,而贩奴的商业利润,只要控制好中人这一环节,便有了基本保证,其他都属多此一举。

英国、法国着重发展同非洲上层的关系。发展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关键手段和筹码是火器。葡萄牙在非洲沿岸经营多年,积累了许多老练经验,其一就是不向非洲人出售火器,以免增强其实力。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在西海岸承接葡人之后,互相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多做生意,不自觉地冲破这个延续二三个世纪的戒律。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手法比葡萄牙人更含有阴鸷老到的一面。他们蓄意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利益上与英国趋于一致的“共谋者”,这便不能不向愿意定时向欧洲人提供大批黑奴的内陆国家出售大量火器,表面上是为了达成“商业上有利的谅解”,实际上却是为了增强那些掠奴国的实力,向内地劫掠奴隶。结果,促使海岸后而内陆的一批强国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强国的崛起不是由于引进了欧洲的先进生产方式加强了国力,而是因为它们输出了最多的“活人商品”,换得了最多的滑膛枪。所以这些国家的利益、安危及其强大地位的维持,全靠滑膛枪的数量。<sup>①</sup>英国奴隶商只要掌握着火器的供给(伯明翰是最大的供应者),既可以从容地迫使非洲统治者就范,如数供应非洲种植园所需求的奴隶,又可以诱使它们心甘情愿地继续扮演合作的贸易伙伴角色。例如,到18世纪上半期,欧洲奴隶商甚至可以事先同某些掠奴强国达成协议,提出他们的定单:需要多少多大岁数的男奴隶,男女的比例各多少,要不要儿童或多大年龄的儿童。掠奴国派出武装队伍,按协议对内陆的部落或村寨进行袭击,“用眼估量一下”,把符合协议规定

---

<sup>①</sup> 当时操作火器的非洲人不讲究瞄准技术,乱放一气,而更重视密集的枪声,因而其杀伤力更需依靠枪支子弹的数量。

的人全部劫走。<sup>①</sup> 他们一般都能按时、按量把协议上规定的奴隶交给欧洲商人。欧洲商人不必亲自动手、不必冒热病、丧失生命的危险进入内陆,他们已有一批得到充分信任的可靠的非洲中入,向内陆购买奴隶的具体事务都通过他们进行。于是,基本上形成这样格局:欧洲商人维持着海上的奴隶贸易垄断权(在欧洲人长期争夺中,英国人取得优势);非洲统治者维持着陆上的奴隶贩运垄断权(在非洲人的长期争夺中,阿散蒂国、达荷美国等取得优势)。欧洲商人情愿接受非洲统治者对他们以趸船或陆上堡垒进行奴隶贸易所施加的一些限制,让非洲人维持对沿海一些地区和内陆领土的主权行使。非洲统治者则接受“以枪支换奴隶”的交换原则,保证对欧洲人的充分供应,以维持自己在本地区优势地位。这种以奴隶买卖为基础的均势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

## 第五节 奴隶贸易对 16—19 世纪 非洲的影响

### 一、对几种“理论”的辩驳

1807 年英国议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决议,欧美许多国家先后通过相应的决议,从此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贩运奴隶成为非法。奴隶贸易虽然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仍在非法地进行,总的趋势渐成为强弩之末(关于禁止奴隶贸易的原因和过程将在第 6 章详加分析)。但它对 16—19 世纪非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继之而来的殖民征服、殖民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四百年的奴隶贸易总共从非洲运走多少奴隶,人口减少对生产力造成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深入研究。

---

<sup>①</sup>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97 页。



关于大西洋贸易从非洲运走多少奴隶由于有关档案资料的不充分,估计方法的不同,各种估计数字均是近似数难成定论。<sup>①</sup> 无论如何,把一个地区的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强行劫走是对非洲有生资源的掠夺,对当地生产力造成破坏是客观事实。它表现在奴隶贸易吮吸了非洲的宝贵血液,农业劳动力被大批抓走,大片土地抛荒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造成传统手工业(如贝宁的铜器塑造技术)的彻底衰弱等。

西方有一种论点认为,奴隶贸易防止了非洲人口爆炸,因而起过积极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奴隶贸易对18世纪非洲人口增长的抑制,20世纪西非某些地区人口压力就会更加厉害和普遍。人类文明史已经反复表明,历史上任何地区人口的非正常的严重削减,总是对当地生产力造成破坏,阻碍社会进步。15世纪前非洲(尤其是西非)经济曾出现过具有非洲特色的发展,奴隶贸易使非洲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被运走,他们不仅不能在本国生产财富,而且在海外生产的巨额财富没有一丝一毫能返回国内或增加购买力。这种劳动力的空前损失,必然破坏并最后终止了非洲经济发展,由此,整个非洲社会变得缺乏经济活力甚至停滞不前。

## 二、非洲人经济、政治和心理方面所受的影响

有人说非洲中人和酋长、土王因贩卖奴隶获得大笔报酬,对非洲也有益处。问题是这种报酬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消费品和大批武器,既不可能如同欧洲一样成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更不可能在市场中心城镇促成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而非洲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却因而崩溃了,成千上万手工业者本人被当作商品卖为奴隶。只要手中有奴隶便可以得到各种必需的商品,这种非正常状况使一

---

<sup>①</sup> 联合国教科文主编:《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213页,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304页。

些手工业制成品如非洲土布也被用来换取奴隶的欧洲廉价的纺织品挤垮了。著名的贝宁、达荷美纺织品手工业几乎全垮了。在猎奴恐怖威胁下,居民胆战心惊过日子,只求安全和平,甚至躲进深山野林避难,对农业生产只要求能苟延生命,而对扩大再生产毫无兴趣,从而形成一种对生产发展极不利的“反经济的心理状态”。即使在未受猎奴直接威胁的地区(如沿海),生产速度和产量也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和减少。当紧随其后的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领土时,他们面对的是遭受奴隶贸易蹂躏的、残败而衰弱不堪的非洲。

奴隶贸易中形成的庞大的中间商,在1807年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获得发展为商业资本家的合适土壤,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靠分享奴隶贸易的利润(尽管只是其中极小部分)而成长起来的,形成了一种适应从而依附于殖民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在奴隶贸易废除后发展起来的合法贸易(如棕榈油、棕榈仁的贸易)和更往后的单一种植制下的进出口贸易中,这些能干的非洲商人也只能满足于出售非洲原料,买进欧洲生产的消费品,仍然是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因奴隶贸易而同欧洲发生的交往并没有将非洲引进新的社会变革之中。

在政治方面,在共同从事奴隶贸易基础上,非洲上层(酋长、土王、大中间商)同欧洲奴隶商和政府结成同盟和合伙关系。这种结盟关系随着双方利益的变动而不时发生变化,但在奴隶贸易时期,总的来说是一种合作的、权利平等(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关系。到了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以后,废奴造成的危机不断冲击这种结盟关系。工业革命后欧洲商人及其政府的利益逐渐转移到合法贸易方面和随之而来的殖民领土扩张的利益上,而内陆的、由欧洲奴隶贸易一手造成的贩奴国家(如阿散蒂等一批国家)的利益并没有发生任何转移。于是同盟关系发生破裂。欧洲国家以禁止奴隶贸易为名,与沿海容易驯服的小国结成新的同盟,对内陆国家进行政治

干涉,其结果一般地都导致殖民入侵和占领非洲领地,甚至建立沿海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沿海的老合伙关系为殖民制度铺平了道路,奴隶贸易招来了(beckoned)殖民制度。合伙关系演变成了殖民统治关系。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对非洲政府形式影响至大。几百年来欧洲政府通过奴隶贸易同非洲上层的交往和结盟关系,使他们看到这种共同利益的支点是有可能转移的。新的支点可以转移到殖民统治上面,特别是对于实行封建制度的非洲上层人物,只要欧洲国家继续实行保护其基本利益的政策,这种转移将会是和平的、顺利的。英国对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数以百计的土王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估计基础上并获得成功的范例。所谓“成功范例”实际上是保护土王的特权地位得以永久地维持下去,而不受任何社会变革的触动。所以可以说,奴隶贸易所建立的与非洲上层的交往关系一再地巩固了非洲封建制度上层人物的地位,同时也使得非洲当地政治制度僵死于愈益死板的传统形式中。<sup>①</sup>

奴隶贸易对意识形态影响之巨大和深刻,是迄今仍然研究不足的。最显著影响表现在:欧洲人产生白人种族优越感和黑人被灌输形成的自卑感。由于奴隶贸易而形成的这两种文化心态是对历史事实颠倒的结果。在奴隶贸易盛行的18世纪,曾臆造出一种非洲黑人比白人低劣的理论,说什么“非洲人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被劫掠为俘虏和被卖为奴隶,而是因为他们只配当奴隶。”一些伪科学的人种学说提出解剖学上的“证据”,以“颜面角”来证实黑人人种的低劣,替奴隶贸易的合法性制造理论。1807年开始实施的禁止奴隶贸易法案本来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促成的,

---

① 到正式瓜分非洲,英国建立起卢加德式的“间接统治”。间接统治制度使传统制度开始接近现代标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制度愈是接近现代标准就愈难产生现代政体,到英国统治后期就不得不改变间接统治制度。

正如奴隶贸易勃兴最初也是由它的初期发展所催生的一样。然而，殖民主义者控制、掌握的传媒工具大肆宣传，奴隶贸易不是他们所策划的，却是由他们所制止的，而非洲人似乎成了坚持继续进行奴隶贸易，奴役自己同胞的罪魁祸首。历史的真实情况全然不是这样的。正如第三章所指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其后奴隶贸易的猖獗是几个世纪来欧洲多国殖民主义者处心积虑一味强迫实行的结果。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创始者正是欧洲殖民主义者而不是非洲人。非洲人上层（酋长、土王等）成为“共谋者”也是欧洲殖民者精心策划，重利诱惑，特别以“以枪换奴隶”造成恶性循环迫使非洲人就范的结果。至于“有些种族奴役自己人”的问题，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任何阶级社会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不是某些种族的特有行为，更不是某些种族的特有劣根性所致。<sup>①</sup> 奴隶贸易时代几千万黑奴被运到大洋彼岸，给非洲人造成了自卑感，而把掠奴行为完全诿过于非洲人的连篇累牍的宣传，也造成了一些非洲人的“犯罪感”，使非洲黑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实际上是一种可鄙的精神奴役。非洲人的这种萎靡沮丧的精神状态十分有利于 19 世纪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领土扩张。“非洲人不行，管理不了自己”、“只有欧洲人才能制止奴隶贸易，恢复非洲的正常秩序”，类似舆论喧嚣一时。这是历史上异族征服者的惯伎，欲征服、奴役别的民族，必先控制和奴役其精神状态，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在这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形成的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到 18 世纪末

---

<sup>①</sup> 实际上在 20 世纪以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非洲大陆绝大部分黑人尚未形成现代民族，因而既未产生民族意识，也没有同一种族的认同感，更无“大陆整体感”。因而不存在“奴役自己人”的心态，对于部落民来说，部落外的人都是“外人”。

和 19 世纪发展成种族主义理论。这是适应殖民主义者对非洲领土的占领和瓜分的需求,用以证明非洲人管理不了自己,必须有外力起支配作用。

当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需要非洲成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阶段,需要以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的时候,占领非洲沿海大片地区和深入非洲的内陆地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为必要的了。这时,殖民主义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了反对奴隶贸易的斗争。因为几百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在非洲各贩奴区培养了一大批以贩卖奴隶取得巨大利益的土王、酋长和中间商,当欧洲资本的利益取向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些非洲人集团尚未获得新的利益源泉,仍坚持从奴隶贩卖中获取利润,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对禁止奴隶贸易并继续进行奴隶贩卖的势力。反对这股本由西方商人培养起来的势力,现在成为欧洲殖民主义人侵非洲的时髦的方便借口。另一方面,这股与欧洲利益有密切联系的势力中一部分人,也容易在新形势下逐渐放弃奴隶贩卖,改行搜购欧洲商人新的需求商品——棕榈油、棕榈仁等,继续作为代理商(而一部分土王、酋长中也有类似变化,但时间较晚),为欧洲殖民者服务。这样,欧洲殖民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人,又可以利用这两部分人的矛盾,而与后者结成新的联盟进攻前者,例如同沿海小国(芳族人)结盟,对内地国家(阿散蒂)进行干涉,从而在殖民扩张中培养一批亲英派。这大概是非洲史上首批亲西方派(除南非)。

总之,奴隶贸易制度是近代殖民主义制度一项极其特殊的形式。表面上,非洲大陆的沿海地带和广大内陆地区遭受殖民占领的时间推到很晚时期(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非洲 84% 的领土才被占领),但殖民主义的奴隶贸易制度却在基本上不侵占大片领土的情况下,在非洲肆虐几百年,而且奴隶贸易制度终于招来了殖民(占领)制度。如果从殖民主义者(起初主要是奴隶商)同非洲人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一角度来考察,人们将发现,奴隶贸易在非洲发

展的几个阶段相互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殖民主义者同非洲某些上层(包括中间商)因争夺经济利益而造成的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关系早已在奴隶交易时期作过充分的演习。因此,当殖民占领时期到来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迅速而熟稔地制订出几套卓有成效的“间接统治制度”和“直接统治制度”,使整套殖民统治制度异乎寻常地迅速走向成熟阶段,其中奥秘之一需要到奴隶贸易时期去寻找。

## 第五章 南非开普(好望角)殖民地 ——非洲殖民地的一个特例

17世纪以后,当西部非洲已成为欧洲殖民者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时,南非却成为欧洲人在非洲大陆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从18世纪初起,在远离好望角的南非广大内地,开始了猛烈的、大规模的、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土地扩张。本章拟深入分析影响殖民土地扩张的主要因素。殖民者对待当地居民(土著)的三种不同方式(后形成政策),取决于后者对殖民土地扩张的不同反应和反应程度。英国取代荷兰在南非的殖民统治权后实行的诸项改革,是基于世界资本主义新发展形势下南非殖民地作用的考虑。布尔人持续的大规模的占有土地,并在占有土地上建立劳役佃农制,继续维护农奴制和奴隶制,是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协调的音符。

### 第一节 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殖民机构

#### 一、两洋航线的中继站

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到1652年后发展成为世界殖民主义史上第一个拥有全权统治殖民地的私人股份商业公司,从而开始了殖民统治机构变化的新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西班牙由国家组成的“公司”不同,其主动权不受政府掌握,而是操纵在私人股东手中,但后者亦非一般商人,而属于商人贵族集团的商业寡头,如荷兰的特里普家族等,尽管该

公司总投资(650万盾)中最初的股份分配是由共同协定决定的。公司利用特许权和独占经营获得高额利润,其中一部分作为新的再投资,促进了荷兰经济的发展。居于公司领导地位的委员会(董事会)由“17位Lords(老爷)”组成,其中8人来自阿姆斯特丹,2人来自泽兰省,7人来自其他各省商会。17人控制了整个公司的实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作为后到的竞争者挤进新航路所开辟的商业地区。它先向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挑战,展开拼斗,继而又企图将比它更晚到的英国势力赶出这些地盘。考虑到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公司董事会一直在筹划于荷兰通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漫长航线上,牢固地建立一个补给中继站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利润。开普(Cape好望角)位于大西洋—印度洋两洋航线的适中位置上,是十分合适的入选对象。而好望角的发现者葡萄牙人一心只注意莫桑比克据点的经营,完全忽视了好望角,这就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652年由范·里贝克率领的三艘三桅帆船占领了好望角。第一批不足200名的荷兰人便在桌湾沿岸(后来证明是南非殖民活动最好的训练基地)居住下来。

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好望角的目的十分有限(只作补给站)以及公司一心只想赚钱,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荷属南非早期殖民史的发展进程。公司的主要利益在于垄断印度尼西亚诸岛(亦称东印度)的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因而它只要求为往返于欧洲和东印度诸岛的荷兰船舶提供服务的开普补给站能不中断地供应充足的、低价的新鲜食品;而在战时则作为舰队基地,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援。基于这些目的,1657年公司允许首批9名原公司员工作为“自由公民(burgher)”定居于好望角,并分配给里斯贝克河畔45公顷土地,经营农牧业。为了同样目的,公司对人口缓慢增多的“自由公民”施加严格的控制:1. 所产农产品应按公司规定的价格,由公司垄断收购;2. 同土著的牲畜贸易收购价不得高于公司的定价;3. 为公司提供劳役、畜役和兵投;4. 不得越过公司规定的殖民



地边界；5.不得私自向外船销售农牧产品。后来荷属东印度公司官员在视察开普站时，亲自颁发了“公民契约”，并对此项节省公司大批经费的措施表示赞赏，指示范·里贝克将公司雇员继续缩减到70人(包括50名士兵)。“自由公民”制度从此确定下来。

荷兰东印度公司具有17世纪商业资本家典型的贪婪本性。它一心只想赚钱，对移民和当地土著的产品，它利用垄断地位以极低价买进以极高价卖出。为了减少公司开支，使用奴隶劳动。1657年便开始一次购进过往船舶上的170多名几内亚奴隶，以代替公司雇工去耕种土地。在开普极佳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使用奴隶开销极少，只需供给奴隶一点廉价大米饭和沿岸到处都能捕获的海豹肉、企鹅肉。开普地区靠近大西洋奴隶贸易网的航道，荷兰人对奴隶买卖驾轻就熟，奴隶价廉(1个奴隶仅卖50-100盾)、养活奴隶的开销又少，也吸引自由公民使用奴隶。从此，一批又一批黑人奴隶和马来奴隶运进开普。丰富的奴隶劳动力立竿见影，产生两个后果：1.提供了种植大面积土地的可能，蕴积着殖民地向外扩张的动力；2.自由公民本身很快脱离体力劳动，没有尝试开拓殖民地的劳动艰辛，逐渐养成好逸恶劳、鄙视劳动的恶习。黑人和马来人的奴隶制构成了白人社会的财富基础。

开普殖民地建立不到10年，南非社会三种矛盾便开始激化：(1)自由公民与公司的矛盾。自由公民经营的农业产值第二年便超过了公司的农业产值，既增加了收入，又增长了自信。1659年14名自由公民代表向公司的司令官提出废除专卖制度，制定合理收购价格的要求，并以要求若不被接受就停业相威胁。(2)公司和自由公民同当地土著的矛盾。公司既需要与土著科伊人“和睦相处”，又不断夺取他们的土地，并压价收购甚至强迫收购他们的畜产品，遂激化了双方矛盾。1659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科伊人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使范·里贝克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陷人穷于应付的狼狈境地。(3)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奴隶数目短时间内

便超过了自由公民的数目。奴隶能否驯顺地服从主人意志,成了挂在自由公民头上的德摩克利特剑。这三方面矛盾的存在和部分矛盾的激化都加速着殖民国家机器的出现。

## 二、殖民权力的强化——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机构的设立,首先就是为了处理这些矛盾。殖民国家机器带有荷兰这个“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的特征,在它统治南非150年中“展示出一幅残杀、背信弃义、贿赂、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sup>②</sup>它建立的是欧洲式专制的殖民制度,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任何民主权利。另外,公司“利润第一”的原则决定其殖民统治的规范和方式是一种少数殖民寡头统治的模式。

公司对开普殖民地实行“双重领导”。殖民地的司令官或总督(1672年改称总督)由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董事会任命。总督受制于“17人董事会”和设于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总督对上级任何请示报告,均须一式两份递送两地。公司一直试图对开普殖民地严格控制和管理,但距离遥远,鞭长莫及。它通常采取的控制方式是派遣“巡回使”(也译“专员”)到开普等地视察,传达“双重领导”的指令,指导工作并向公司汇报。但公司为了省钱,往往并不专门派遣巡回使,面由公司派往亚洲任职“路过”开普的官员担任。这些“钦差大臣”不谙当地情况,下车伊始,胡乱发布指示,往往与董事会或巴达维亚的指令相抵牾,造成混乱,引起开普当局不满。到18世纪,这一派遣制度形存实亡。90多年中仅派遣6名。<sup>③</sup>

开普殖民地日常工作是由政策会议(The Council of policy)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页。

② 同上。

③ Wilson &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牛津南非史》), 1969, vol. 1, p. 214.

理。实际上,政策会议就是殖民地的政府,由总督主持,主要任务是保护公司的一切利益。它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制定法令的立法机关,也是审理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机构,一身而三任。会议成员由公司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组成,在开普港停泊的荷兰船舶的船长亦可参加政策会议的扩大会议。政策会议所制定的政策,设施对象主要是公司雇员、自由公民和奴隶,后来也施法于当地非洲人(科伊人)。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亦官亦商的机构:既向移民征税,也替移民出售的产品作价。初期,自由公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既无权出席政策会议,更不能进入司法系统。自由公民的子弟(后裔)长期未能逾越跨人官员集团的门槛。据 1779 年统计,开普敦 94 名行政官员,有 48 名是在开普出生,但全是东印度公司官员的子弟,无一出于自由公民门庭。充当官员的世胄家族几代定居于开普,他们植根于公司,而不愿降格跻身于市民行列,高级官员尤为如此。因而在殖民地社会形成公司官员与自由公民泾渭分明的现象,后者属于无权阶层。有的史学家认为,公司对自由公民的刻薄寡恩种下了后来布尔人对荷兰母国感情纽带薄弱的原因。

地方法庭经历了一段演变过程,成为后来侵入内地的殖民政权的滥觞。初始,在开普沿海设立的地方法庭,只有政策会议成员才能参与审判,以后逐渐允许自由公民和下级官员参加。随着自由公民向内地持续迁移,居民住地离沿海政权机构所在地越来越远,在斯泰伦博希和斯韦伦丹等内地的调解法庭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法庭,公司不得不将民事审判案件划归当地的地方委员审理。后来,荷兰派遣的巡阅使范里德(Van Rhee-de)巡视内地时,规定了地方委员的权限,使之一身而二任:既充当法官,又担负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为理顺他们与公司的隶属关系并保持其合法地位,1682 年首次任命内地的区长,作为地方委员的首长。从此,区长制长期存在于内地,直到 1902 年。在漫长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无论各地区长的权限有大有小,对当地的控制力或强或弱,边区的幅

员有所增减,但在广阔的内地,区长始终是殖民政权的象征。

开普殖民地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军事力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公司的正规军,用来防备其他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国)的侵犯,装备较好,由公司提供。一是民团,其任务有二:第一,用于驱赶和剿灭当地的土著民族,17世纪主要对付桑人(布须曼人)和科伊人(霍屯督人),18世纪及其后主要是征讨恩戈尼黑人(南非图人)以及镇压奴隶和科伊农奴的反抗;第二,防止边民哗变和越境扩张。民团起初是官助民办,由东印度公司提供武器弹药。18世纪以后随着殖民深入内地愈迁愈远,公司政府愈难控制,以致连武器弹药都由移民自己购买。民团愈益成为殖民地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后来实际上取代了正规军作用,成为布尔人主要军事力量。因此,布尔人军队长期保持非正规形式,这既成为其特点,又构成其优点和弱点(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①民团军官由士兵推选产生。战士,有战事招之即来,战争结束回归农场,自己经营农、牧业。因而,这支队伍游击习气甚浓,但骑术射击颇精,为夺取土地或保卫自己农场、家园利益,作战勇敢,剽悍善战。与只拥有冷兵器的非洲人相比,民团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在于拥有火器、马匹和犍牛拉挽的牛车,以及欧洲的军事技术,善于设置牛车阵,能防善攻,常以很少的伤亡取胜。直至19世纪80年代,布尔人在南非维持殖民统治二百三十年主要倚靠军事优势这一殖民暴力。至于牧业生产力和牧放畜养的技术,布尔人的水平并不比恩戈尼黑人高出多少,许多方面(如牧场单位面积载畜量)不相上下。可以说,布尔殖民者越是在生产力方面不具有优势,他们越是需要依靠殖民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也成为一种经济力。

---

① 优点是机动灵活,寓兵于农(场);缺点是自由散漫,组织性、纪律性差。

## 第二节 荷兰殖民者对科伊人 牧业经济的摧残

### 一、科伊人性畜对两洋航线的贡献

实际上,两洋航线上的过往海船需要在开普港补充的最大量的食物是鲜肉和活羊,而不是新鲜农产品,因谷物和酒类一般可以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而新鲜水果蔬菜在热带洋面上极易腐烂不能多带。开普港一般要为每艘商船平均提供 112 只羊(包括带走的养在船上的 15 只羊)<sup>①</sup>以及大量的新腌牛肉;而每艘战舰肉用量更大得多。到 18 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泊港商船有 77 艘,仅牛羊一项每年就需供应商船(不包括战舰)8600 多只。此外,住在开普的公司人员、上岸休养的海员和居民也消费大量肉类。

供应开普市场的大批牛羊是从哪里来的?最初是由毗邻地区经营牧业的土著民族提供的。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居住在南非次大陆的有三个土著民族:桑人(布须曼人)过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居住在大卡鲁的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人口不超过四、五万人,他们是猎人,提供不了牲畜。科伊人(霍顿督人)多分布在南非西南近海地带和内陆,经营单纯游牧经济,人口约 20 万人(这两个原始民族都不是黑人,肤色棕黄)。黑人属南班图人恩戈尼一支,<sup>②</sup>居住在加姆图斯河以东和以北直至林波波河的广大地区,经营牧农混合经济。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欧洲人接触的主要是南恩戈尼人,更多的是其中的科萨人。他们是牲畜的主要供应者。科萨人有 10 万之众。

<sup>①</sup> S.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California, 1957, p. 49.

<sup>②</sup> 南班图人另一语支苏陀——茨瓦纳人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同白人移民接触。

17 世纪下半叶, 向开普东印度公司供应牲畜的主要是科伊人。在开普殖民地建立之前, 几百年来开普半岛及附近沿海地区的地中海型气候, 已为生活在这膏涸地带的科伊牧人所饲养的牛羊提供了丰茂的牧草。有些独占地利的科伊部落拥有数量庞大的畜群。科乔夸部落仅有 250 人, 拥有 1600 多头牛, 平均每人 6 头, 以及数量更多的羊群。<sup>①</sup>牲畜构成科伊人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衡量家庭财富的标准。科伊人的商品交换观念很弱, 十分惜畜, 除祭祀用牲外, 一般不多宰食, 也不过多出售。他们将少量牲畜同荷兰人交换, 仅是为了满足生活上某些方面的需要, 对荷兰商人向他们销售的饰物、日用品等方面的需求量十分有限。而荷兰人却把他们与科伊人的牲畜交易看成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贱买贵卖, 牟取厚利, 收购一头牛只付给一磅烟叶, 约值 4 盾, 转手把牛卖给外国船, 售价 25 盾, 净赚 500% 的利润。东印度公司为垄断牲畜贸易, 曾三令五申严禁私人与土著交换牲畜。荷兰移民贪图厚利, 置若罔闻, 不惜铤而走险, 争相经营。

## 二、市场掠夺与“掠牲战争”双管齐下

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南非牲畜贸易, 比起荷兰人在北美殖民地同印第安人进行的毛皮贸易, 更典型地显露出荷兰商业资本“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sup>②</sup> 开普牲畜贸易的超额利润大部分来自欺诈和掠夺。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为了厚利采取一切卑鄙手段, 最大限度地掠夺科伊人牲口, 他们以摧残人的身体和灵魂的烈酒和烟叶, 引诱科伊人烟酒成瘾, 使之成为成年人大量消耗的奢侈品。荷

---

① D. Moodie ed,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有关南非土著部落情况和待遇的官方文件档案》), p. 18 (以下引用均简称《南非档案文件》或 Moodie, *op. cit.*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第 369—370 页。

兰人通过这些“交换手段”，从科伊人手中攫得越来越多的牲畜。有时，一次就从一个部落拉走 447 头牛和 1292 只羊。<sup>①</sup>在这样竭泽而渔的掠夺下，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科伊部落，牲畜锐减，接近枯竭。到 17 世纪末，公司为供应不断增多的泊港航船，需要成倍增加牛羊数量。“交换贸易”变成公司的权力机构对科伊部落的强行索贡。穷于应付的科伊部落极力躲避与公司的牲口交易。土著向导故意引错路，酋长一见白人到来就把牲口藏匿。荷兰人为获得牲畜不择手段采取暴力掠夺。经营走私的商贩多是殖民地社会的渣滓组成。“经商”与劫掠行径无异。装备着火器的“牲畜贸易远征队”一进入内地，就变成杀人越货的匪帮，烧村寨、抢牲口，无所不为。公司发动的有组织的掠牲战争的规模又比私商大得多。

每当从印尼诸岛回程的荷兰船队停泊于开普港，公司远征队便窜入内地抢夺牲口，供应船舶。在 1673—1674 年的掠夺战争中，仅科乔夸部落就被抢走 1600 多头牛和 4900 头羊。<sup>②</sup>1702 年“牲畜贸易远征队”侵入内地劫掠英夸部落，一次掠走 2000 头牛和 2500 只羊，并杀害多名英夸人。公司和私商把邻近地区的土著部落的牲畜资源榨干后便转向更远处的部落。1663 年，“牲畜贸易远征队”已越出霍顿督荷兰山一带，到达离开普 100 公里的卡利登地区查因诺夸等部落去搜索牲畜，后又继续往东深入到阿塔夸部落地区。到 1699 年，开普半岛方圆 100 公里范围内的科伊人部落已丧失了几乎全部牲畜，同时也失去对大片牧地的控制权。

在半个多世纪中，东印度公司的竭泽而渔的贸易手段，加上公司和私商的武力劫掠，双管齐下，抽干了科伊人的牲畜资源。科伊人日益贫穷，牲畜资源枯竭，以致经常不可能把一部分牲畜（包括

---

① Wilson &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牛津南非史》), 1969, vol. 1, p. 65.

② R. Elphick, *Kraal and Castle Khoek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p. 171.

种畜)作为必要的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从而使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牲畜是科伊人维系部落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畜群的逐渐消失使科伊人诸部落组织濒于瓦解。一些丧失畜群的科伊家族无以为生,逐渐从部落中游离出来,被吸引到开普殖民地社会的劳动力行列中去,或被迫退入山林荒漠,改营狩猎采集生活。白人商人大量销售的烈酒和烟草,使许多科伊人染上严重的酒精和尼古丁中毒,失去劳动能力,坐以待毙。荷兰人对科伊人牧业经济的摧残,极典型地反映资本原始积累对殖民地原始民族经济和当地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如同美洲许多被灭绝的印第安人部落一样,沿海地带科伊人在荷兰殖民者摧残之下首先从世界民族之林中逐渐消失。

### 第三节 开普殖民地扩张原因的新解释 和科伊桑人的灭绝

#### 一、一种现象引起的思考

从1657年到18世纪头几年的半个世纪时间,荷兰移民和法国移民(胡格诺教徒)中的种植谷物和葡萄的农场主缓慢地扩大耕地,从开普平地扩展到斯泰伦波斯,仍处在地中海型气候地区内。他们构成西开普自由公民的主体。但从18世纪初开始,另一部分荷兰移民(此后称为布尔人)<sup>①</sup>猛烈加快了土地扩张的速度。他们沿布里厄河谷地向东向北扩张,建立斯韦仑丹区。布尔人翻过朗厄山后往东进入小卡鲁地带(东经21°);往北进抵罗赫费尔德山东北坡;在沿海地带则东向越过莫瑟尔湾,1743年在大布拉克河(东经22°)划界。在约40年时间内,布尔人深入内地300公里,侵占科伊桑人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使用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

<sup>①</sup> 荷兰语 Boer 意为农民。此后多用以指荷裔南非白人。



把科伊人的黑塞夸、高里夸和阿塔夸诸部落的土地尽行吞并。<sup>①</sup>

为什么从18世纪初开始一部分荷兰殖民者在土地扩张上……改其17世纪下半叶扎根于好望角的沿海地带的做法,而开始向南非内地进行猛烈持久的扩张?18世纪并没有出现荷兰人向南非大规模移民的浪潮。众所周知,荷兰国内原始积累过程并不具有英国圈地那样剧烈的性质,其特点是附着于自己小块土地上的农民长期贫困化,因而没有产生出需要迁移到殖民地去的大批农业移民。事实上荷兰外出移民的数量也不多。到18世纪初,开普殖民地移民仅有1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法国移民);<sup>②</sup>直至18世纪中叶也仅有5000多人。<sup>③</sup>因此,土地猛烈扩张的原因,不能如同解释北美殖民地一样,仅用宗主国荷兰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开普人口的自然增殖来解释。那么,动力来自何方?

## 二、奇怪的“蝴蝶效应”

我们从纽马克《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一书所系统整理的18世纪开普港泊船数字的统计资料中,看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只要一段时期绕行好望角的两洋(大西洋—印度洋)航线上的船舶显著增多,随之而来便出现殖民者向南非内地扩张的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的现象。对这种奇妙的“蝴蝶效应”经缜密分析,发现其内在联系是:船舶增多,市场对鲜肉和活畜的需求激增,肉价和畜价便急速上涨,刺激殖民者更多地向内陆占地养羊或更多地向科伊人掠夺牲畜。看来推动开普内地土地扩张的一个动力,不是来自殖民地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世界,是由于那一条与世界市

---

①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California, 1957, p. 52.

② 1707年“自由公民”人数为1623人,见A. Walker, *A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史》) London, 1964, p. 66.

③ Marais,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开普有色人》), Johannesburg, 1957, p. 2.

场紧密联系、绕行好望角的两洋航线对牲畜的需求越来越大的缘故。这一事实提供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探讨 18 世纪南非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必须考察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开普殖民地在国际航运中愈益重要的作用。正如影响非洲命运的几个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主要不应从非洲本身奴隶制发展来研究，而应研究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美洲市场）一样，研究非洲殖民主义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也只有紧密联系国际经济关系方能深入到本质的层面。或许这正是研究非洲殖民主义史应予注意的一个关键点：某些重大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从（或主要不能从）它们所发生的地区的本身经济生活规律来说明，而必须考察国际经济关系，才可深刻地说明这些现象。

18 世纪欧洲各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商业战争是世界殖民史的重大事件，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每一次商业战争都明显地提高了开普港在世界航运和战略的作用。这清楚地反映在经过和停泊开普港的船舶数量的增长上：

1700—1749 年每年抵达开普港船舶的平均数（不包括战舰）<sup>①</sup>

年 代	荷兰船	外国船	总数
1700—1704	48	22	70
1705—1709	44	22	66
1710—1714	48	21	69
1715—1719	61	22	83
1720—1724	72	23	95
1725—1729	72	10	82
1730—1734	65	12	77
1735—1739	70	11	81
1740—1744	52	18	70
1745—1749	53	21	74

<sup>①</sup>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California, 1957, p. 51.

1713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其东方殖民商务,此后10年荷兰船驶往东方增加一半,停泊开普船舶从年均48艘增至72艘,开普市场对牛羊的需求显著增加。在内地,布尔人农场主沿着布里厄河向山南、山西扩展土地。18世纪40年代爆发第二次大规模商业战争——“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4年,英舰不断进驻开普。自1725年以来因禁止向外船销售肉类而减少泊港的外船数目猛增1倍,市场牲畜供不应求,开普肉价猛涨,殖民地经济生活由衰敝转向繁荣。在这40年中,科伊人性畜资源已全被榨干,牲畜主要靠科萨人和布尔农场主供应。因为饲养牲畜比种植谷物和葡萄的利润大得多,牲畜市场又是卖方市场,比谷物市场稳定可靠,高利润驱使布尔农场主纷纷兼营牧业,迁入内地,占地养羊,大部分斯韦伦丹农场主都离开原居住区,迁入小卡鲁地带建立牧场,于是出现了非洲殖民史上第一次土地扩张高潮。

### 三、布尔殖民者的粗放型经济结构

第二,进入内地的移民人口绝对数量毕竟较少(整个殖民地白人人口一直不多),为什么非洲殖民史上第一次土地扩张高潮的范围如此广阔,持续时间长达几十年?当深入探究布尔殖民者社会经济和文化时,便会发现这个现象与殖民者经济结构特点有密切关系。布尔殖民者的经济是一种以牧为主的粗放型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经济。有诸多因素促使这种落后经济与土地扩张密不可分:

1. 移居开普殖民地的荷兰“移民”,绝大部分不是国内贫无立锥之地的破产农民,如前所述,最早一批“移民”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及其家属。后来陆续来的欧洲大陆移民不少是受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徒。他们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情况有所不同,在开普“补给站”建立不到6年,1658年就引进大批奴隶,从此黑奴和马

来奴源源不断运进,不仅农场劳动由黑奴负担,甚至高度熟练的手工业技艺也由马来奴隶操作,到18世纪末奴隶人数已达25000人以上,超过白人。<sup>①</sup>白人移民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厌恶和鄙视劳动的恶劣传统,不参加开拓殖民地的劳动。移民后裔从小养成根深蒂固厌恶体力劳动的恶习,排斥体力劳动的工作,以皮肤白皙自傲,除骑马狩猎外,几乎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在开普城镇无以为生的人,大都进入内地,侵占土地,使用农奴或奴隶经营牧场,迅速成为不劳而获的农场奴隶(农奴)主。1747年到过开普的一个荷兰官员写道:由于奴隶大量输入,这里的每个欧洲人都将成为统治者。他要别人为他劳动,而不愿意自己劳动。“这里大部分农场主都不是真正的农场主,许多农场主把亲手劳动看为羞耻”。<sup>②</sup>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决定布尔农场主只能让奴隶使用最粗笨工具,实行粗放经营。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多商品畜,总是让牧奴放牧尽可能多的牲畜。他们把过多的牛羊赶进同一块牧地,使牧草被牲口啃吃过度,不能繁茂生长,而牲口厌吃的犀属灌木得以扎根蔓延,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牧地生态恶化,载畜量不断下降,平均1英亩牧场只能养一只羊,5英亩养1头牛。破坏严重的草场须多年才能恢复,因而布尔农场主需要经常更新牧场,扩大土地占有。这就推动他们不断迁徙,占领新土地。

2. 进入内地的殖民者既缺乏资金和生产技术又缺少劳力,而南非高原土地无限广阔。粗放经营的大牧场成为布尔农场主利用最大面积土地的最有利可图的生产方式。1714年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制定“租地农场制度”,规定农场主只需交纳名义“租金”便

---

① 纽马克前引书第10页所引1795年奴隶数目为18000人,本书此处的奴隶数目系采用R. Gra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4, London, 1975, p. 448.

② Wilson and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牛津南非史》), 1969, vol 2, p 110.

可在内地无限“租地”(实际上是占地)。这一制度颇适应殖民地中厌恶劳动、缺乏资金的殖民者的需求。他们进入内地,只要携带的火器足以把科伊人或桑人吓走或消灭,就可以把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变成实际上的私产。一般农场面积均在6—7千英亩以上,有的大到2—3万英亩。布尔殖民者跑马圈地,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农场相互间距离通常必须大到站在家门口望不见邻居的炊烟。布尔人的牧业经济较之科伊人尤其是黑人的牧业经济,其特点和优势均非表现于牧业技术的先进、载畜量高和资本的集中(集约经营)上,而是表现在资本以粗放形式投放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因而不具有生产力水平高的优势。布尔人不管是为了向开普市场出售更多的商品畜而扩大再生产规模,或是为了农场主自身的再生产(种的繁衍)而扩大生产规模,都必须依靠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场主每一个儿子——身强力壮的布尔农场主夫妇一般多子——的“成家立业”都意味着需要新增加6000英亩以上土地)。这样就形成一种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的恶性循环。扩地成为布尔人农场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命根子。扩大土地面积最有效和最省钱的途径是继续向内地进军——侵占非洲人土地。布尔人整个家族的迁徙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形式的殖民土地扩张。不断侵占当地非洲人土地,这就必然恶化了布尔人与土著民族的关系。兵戎相见往往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

3. 南非特殊的地理环境状况也促使布尔农场主实行以牧为主的粗放经营。布尔人超出开普“冬雨”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塔里巴赫至布里厄河谷地一线以东,就进入干旱的卡鲁地带。地旷人稀的大卡鲁和小卡鲁地带雨量稀少,水源不足,交通闭塞,干旱和酸性土壤在缺乏水利灌溉条件下,不宜农耕只适于养羊。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布尔农场主的牧农混合经济,其中农业(种植业)所占比例益趋减少,一般仅生产少量自给粮食,牧业却占更大比重。气候条件使经营牧业需要同时拥有三、四个后备牧场,以适

应变换莫测的气候和避荒的需要。例如,当冬季斯尼乌山(南纬31°)牧场覆盖着白雪时,农场主便把畜群赶到卡鲁地带牧场过冬。这样,布尔人占地面积要比通常大得多。

由此可见,布尔殖民者使用牧奴劳动的、粗放的牧农经济结构,在南非条件下,由于这种落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作用,其土地扩张具有恶性膨胀的性质。

#### 四、布尔人殖民经济与当地非洲人经济的对立

布尔人牧业经济的强烈殖民性质和部分商品生产性质,造成了布尔人经济同当地非洲人牧业经济的根本对立;即布尔殖民者生产规模获得任何扩大,均以牺牲非洲人为前提——以侵占非洲人土地来扩大布尔人牧场,奴役更多被剥夺了土地的非洲人充当牧奴。18世纪当布尔人翻过朗厄山深入内地后,影响南非的国际经济关系便形成如下逻辑:开普市场对牲畜的需求量越大,白人殖民者和非洲人的两种经济的对立便越尖锐。18世纪中叶以前,布尔农场主土地和劳动力都需要取之于科伊人,于是便把科伊人保持充足的牧地和完整的部落组织的状态,看作是殖民者扩大再生产规模的障碍。因此,在扩张道路上,布尔人对内陆科伊人的独立牧业经济便全力予以摧毁。

显然,布尔农场主摧毁科伊人畜牧经济并不是依靠商品经济规律——廉价畜产品的竞争力,而主要是依靠赤裸裸的殖民暴力的剥夺。火器、马匹和牛车这三件从欧洲带来的主要先进的器具使殖民者拥有军事上压倒的优势。<sup>①</sup>布尔人在市场上买不到足够

---

① 枪使布尔人拥有科伊人难以抵挡的火器;马使他们在速度上超过善于奔跑的非洲人;牛车使他们能够运载全部辎重翻过峭壁陡坡进入内陆,并迅速由迁徙转入定居。见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南非社会经济史》), Oxford, 1950, p. 25.

的牲畜，便窜入村寨鸣枪强行拉走牲畜。1707年黑塞夸部落酋长抱怨：“他们粗暴地拉走所有牲口；母牛和小母牛，而把烟叶和珠子抛洒一地。”<sup>①</sup>

科伊人对侵占开普土地的荷兰殖民者曾进行过顽强的抵抗。1659—1660年和1673—1677年，科伊人在部落酋长领导下进行过两次“科伊—荷兰战争”虽给予殖民很大困扰，但自己丧失了大量牲畜。如上所述，由于牲畜贸易和殖民者带来的不良影响，科伊人染上酒精中毒，体质下降，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严重侵蚀，部落趋于瓦解，无法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零星分散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8世纪50年代，终未能扭转部落瓦解的颓势。<sup>②</sup>

### 五、科伊人部落结构的消失

失去土地、牲畜和部落的科伊人到处流浪，给布尔人提供大批无偿劳动力。布尔农场主把失去生计、无所依靠的科伊人沦为牧奴。虽然科伊牧奴在法律上不属于奴隶（不能随便买卖），但布尔人对待他们甚至还不如马来奴隶和黑人奴隶，因为购买奴隶还付过钱。科伊牧奴常被虐待致死，在所有奴隶中命运最为悲惨。到18世纪，残存的科伊人部落的衰蔽经济和日渐凋零的人口，又遭到白人移民带来的两大灾祸。1713年从欧洲船舶上传来天花，袭击了毫无防治此病经验的科伊人，<sup>③</sup>人口死亡殆半，许多部落名称从此湮没无闻。1755年牛瘟又夺走了残余的牛群。赤贫的科伊人四处流浪逃荒：1. 一部分科伊人逃往东部与居住在科萨人邻区的格里夸混血部落融合。2. 一部分科伊人渡过奥兰治河，迁往

---

① R. Elphick, *Kraal and Castle Khoek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p.231.

② Shula Marks,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7—18世纪科伊桑人对荷兰人的抵抗》)载《非洲历史杂志》1972年第1期。

③ 当时牛痘疫苗尚未发明，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亦尚未传入南非。

北岸地区。3. 在西开普幸存的科伊人, 其部落组织已荡然无存, 逐渐混血化, 全部生活于开普城镇和白人农场中。到 1805 年南非境内科伊人只剩下 20 006 人, 已不成为民族, 只在有色人种中留有他们的后裔。白人殖民者强迫科伊妇女非偶同居, 科伊牧奴、仆役同黑人奴隶和白人主人大批混血, 形成后来南非庞大的有色人混血集团的渊藪。南非西部最大的人种集团科萨人就这样在其故土消失了。对于一个已被殖民主义扩张基本上消灭的种族是谈不上殖民主义“建设性使命”作用的体现的。

## 六、桑人在非洲被灭绝

随着科伊人民族在南非境内逐渐消失, 厄运也降到桑人和科萨人头上。第三次商业战争——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 年) 英法在印度展开激战。1758 年法国舰队驶进开普港, 搜求牲畜供应, 开普市场全部库存肉类售罄。大批牛羊和鲜肉以高于定价 4 倍价格售给外船。70 年代停泊于开普港的船舶猛增, 见下表:

1765—1799 年抵达开普港的船舶年均数(不包括军舰)<sup>①</sup>

年代	荷兰船	外国船	总数
1765—1769 年	51	22	73
1770—1774 年	53	53	106
1775—1779 年	52	65	117
1780—1784 年	31	98	129
1785—1789 年	68	100	168
1790—1793 年	58	97	155
1796—1799 年	—	185	185

到 70 年代, 外船数目已显著超过荷兰船数目。80 年代年均泊港船

<sup>①</sup> N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California, 1957, p.51.



达 168 艘,每年仅供应外船的肉羊就需要 20 000 多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舰队在开普港驻扎两年(1781—1783 年),消耗大量牛羊肉。牲畜贸易再次成为最赚钱生意。布尔农场主的牲畜供不应求,此时科伊人的牲畜早被榨干。18 世纪中叶荷兰商人深入大鱼河的科萨黑人住地,搜购牲畜,东印度公司也派官员到加姆图斯河科萨人住地采购牲畜。商队不断带回信息: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带是南非水源最好、牧草最丰茂的土地。于是,跟随着商队东去的足迹,不愿过份受制于东印度公司的布尔农场主纷纷涌向加姆图斯流域及其以东地区。1770—1795 年在非洲大陆南部掀起殖民土地扩张第三个高潮。每年向东印度公司政府申请到“新区”建立新农场和“迁居”内地的农场数目都在 100 户以上。<sup>①</sup>未经批准擅自建场的数目远超此数。布尔人农场已散布到从莫瑟斯湾到奥特尼夸山,从朗克拉尔到斯尼乌山一带。但他们仍贪婪地觊觎着东边最肥沃的大鱼河谷地,企图囊括直抵印度洋西岸的全部土地。

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频繁地通过延伸和“改划”边界等手段,不断扩大殖民地范围,在 16 年中竟五易“边界”。1770 年公司把边界从大布拉克河(东经 22°)东扩到加姆图斯河(东经 25°);5 年后,1775 年又把边界擅移到布须曼河(南界)和大鱼河上游(北界,东经 26°)。接着又吞并布须曼河和大鱼河之间土地,擅自宣布布须曼河与大鱼河下游之间土地为公司所有,企图把世代在该地放牧的科萨人赶到大鱼河对岸,制造了著名的“楚尔费尔德地区争端”。1880 年公司又悍然把南界移至大鱼河下游(东经 27°),1785 年设立了格拉夫里内特“新区”。1786 年又把北界东移到塔卡河。至此,布尔殖民者已深深楔入了桑人和科萨人世代游猎、放牧、居

---

① Moodie,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有关南非土著部落情况和待遇的官方文件档案》), III, p. 73.

住的土地。

布尔殖民者将其侵占的土地一律宣布为“无人空地”，划归东印度公司政府所有，殖民者再从政府手中取得实际的“所有权”。事实上这些所谓“空地”或是桑人千百年游猎、采集的土地，或是科萨黑人世代轮牧的牧场。这些牧草丰茂的土地大都是兽类资源丰富的地区，布尔人强把桑人狩猎地盘占为牧场，不许他们进入，这就断绝了猎人生计。桑族猎人向来把猎区土地看作是氏族公社的集体财产，只是因游猎生产方式而未能将这种土地财产固定下来。当他们依习惯法将某地区认作本族狩猎地盘，就用强力保护它免受他人侵犯。桑人的弓箭等原始武器在军事力量上与侵占猎场的拥有火器的布尔农场主对比，相差悬殊，便采取一种特殊的对抗形式——从布尔人牧场（即他们从前的猎场）上劫走牲口（当作狩猎的羚羊），作为逼走白人殖民者的一种非常手段。斯泰伦博斯地方官员报告说，桑人明白告诉布尔人译员，他们劫牲的目的是“要把荷兰人赶出我们的土地……”。<sup>①</sup>“劫畜”事件层出不穷，迫使布尔人放弃斯尼乌山和纽沃尔德山及塔卡河一带农场，关闭朗河河谷一带“牲畜收购站”。桑人的抵抗延缓了布尔人向北部地区扩张达30年之久。18世纪70年代以后，牲畜市场紧俏，布尔农场主力图永远霸占猎区土地，便对桑人采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手段，以消灭整个桑族。布尔人民团利用骑兵和火器的优势，把桑人当作“兽类”追捕，屠杀。仅在1774年斯尼乌山一次“追剿”中，就残杀503名桑人，而民团只死一人。1786—1795年仅格拉夫里内特区，桑人被杀2500多人，被俘儿童669人。<sup>②</sup>布尔民团不成文法律规定，

---

① S.Marks,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7—18世纪科伊桑人对荷兰人的抵抗))载《非洲历史杂志》1972年第1期，第71页。

② Marais,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开普有色人))Johnesburg, 1957, p.2.

凡遇桑族成年人不分男女一律杀死，只把儿童抓回农场当童奴。“征剿”归来的布尔民团有时竟运回了装满十辆牛车的桑族儿童。这些被掠的桑族儿童被运到布尔人农场当童奴，尽管后来变更名称为“学徒”实际上是一种奴隶。布尔民团采取“梳篦法”消灭桑人，逐条山脉“清剿”，逐个山洞搜索，把桑人从世代栖居的德拉肯斯泰因山，罗赫费尔德山，纽沃费尔德山，斯尼乌山全部消灭掉。这一过程持续到19世纪，仅有一小部分桑人退出南非，撤到博茨瓦纳的卡拉哈迪沙漠残存下来。1957年南非全境仅剩20名桑人。桑人的历史命运比北美印第安人更加悲惨。这就是欧洲白人在南非早期殖民的真相。

### 七、科萨黑人未被布尔人“殖民化”的原因分析

布尔殖民者在科萨黑人土地上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窜进东部大鱼河谷地的布尔农场主和牲口商人觊觎科萨人的大批畜群和丰茂牧场，但在班图黑人地区，布尔人半个多世纪前用烈酒诱购科伊人性畜的卑劣伎俩，在科萨人身上无法施展。<sup>①</sup>酒精攻势无效，布尔人便倚仗火器优势以武力夺取牲畜，强占牧场。1775年布尔首开衅端，擅将边界南段移到布须曼河，随后又企图把科萨人从布须曼河和大鱼河之间的最肥沃的楚尔费尔德地区赶走。

18世纪下半叶，科萨人奋起自卫，同布尔人打了三次所谓“卡弗尔战争”。在第一、二次战争中（1779—1781年和1789—1793年），科萨人大批牲畜被布尔人掠去，受到较大损失。但1799年开始的战争给予布尔农场主沉重的打击。实际上这是一次科萨人和科伊人联合进行的解放战争。当时东部边区布尔农场主奴役10 000多名科伊牧奴，这些奴隶揭竿而起。大批科伊牧奴携带枪

---

① 如果科萨人酗酒染上酒精中毒，也许开普东部边区的历史将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参阅恩格斯《论日尔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90页。

械骑马离开牧场,加入科萨人战斗队伍。他们对农场内情了如指掌,带领科萨人冲进农场,焚毁房舍,牵走牲口。布尔民团的火器在他们自己训练出来的优秀射手面前失去了优势。<sup>①</sup> 120年来殖民剥夺者遭到被剥夺者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报复。有500多户布尔农场主遭到打击。起义波及范围很广。布尔人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多年未能恢复。大多数农场主没有货物可以输往开普市场。这场对布尔殖民农场主打击极为沉重的解放战争成为南非布尔人殖民扩张方向的转折点,在非洲殖民主义扩张史上也具有意义。布尔人向东的土地扩张受到科萨人的有力阻遏,奔向印度洋西岸的美梦被粉碎了,此后数十年未能越过大鱼河,终于被迫改变殖民扩张的方向,由东向转为北上,朝北部奥兰治河方向扩张。这就是后来布尔人大迁徙的出发点。科萨人的英勇抵抗使荷兰殖民者在开普东区的土地扩张,未能像他们在开普西区“扫清”科伊桑人那样<sup>②</sup>“扫清”科萨人。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记叙的事件。

科萨人在南非殖民史早期(18世纪末前)未被荷兰人“殖民化”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科萨人舍生忘死的战斗,特别是在楚尔费尔德地区的科萨人恩得兰比部落尤其能战斗。该地区科萨人家长制家庭公社正在萌发个体家庭经济的幼芽,家庭开始拥有长期使用牧草繁茂的土地的权利,为保卫自己的牧地和家庭畜群,科萨人奋不顾身同布尔人展开血战。其次,双方力量大抵相等。科萨人在人口数量上占较大优势,拥有10万以上部众,而布尔人在东部格拉夫里内特边区的人口不过数千人(不包括奴隶)。但布尔人的武器优势部分地弥补了其人口的劣势。科萨人牧农混合经济较为稳定,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亦不比布尔人落

---

① Shula Marks and Anthony Atmore, *Firearms in Southern Africa: A survey*(《南部非洲火器问题概述》),载《非洲历史杂志》1971年第4期。

② 人类学上常按语言分类,将科伊人和桑人合称“科伊桑人”。

后,单位面积载畜量与布尔人不相上下。每个家庭拥有大批畜群是科萨人雄厚力量的基础。科萨人部落的内部组织较严密,由家庭组成的公社因迁徙需要按军事方式组织,是变相的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颇有战斗力。布尔人纪律松懈的民团过去曾对组织涣散的科伊人、桑人形成严重威胁,但用来攻击内部组织严密的科萨人便相形见绌了。第三,科萨人最大弱点——部落之间的分裂和纷争,布尔人却未能加以利用,因为在团结问题严重性上彼此不分轩輊,荷兰移民此时自己内部不和,开普东部地区移民同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之间的严重矛盾终于酿成1795年“格拉夫里内特共和国”的叛乱事件,荷兰人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布尔人、科萨人双方的不利条件互相抵消。

#### 第四节 南非殖民政权的更迭和英国 殖民者侵吞科萨人土地

##### 一、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

18世纪,英国一直将荷属开普殖民地视为它通往印度的两洋航线中惟一的致命弱点。攫取好望角,是英国东方殖民战略的重点,英国为此等待了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给英国以机会,让这个熟透的苹果掉在它怀里。1795年9月英国第一次占领开普。宣告财政破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开普殖民地的统治正式结束。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后,英国暂时将开普“交还”荷兰政府。1806年1月,英国第二次占领开普。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迫使荷兰政府正式把开普殖民地移交英国。

初期,英国政府与荷兰一样主要把开普作为海上基地和通往印度的航船补给站。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开普殖民地是英国从大西洋通向印度洋航线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英国在开普

驻扎重兵和舰队,拱卫两洋航线的两翼。在统治开普殖民地初期,英国的殖民政策基本上与荷兰相同。对两洋航线船舶的鲜货供应一直维持着开普市场的繁荣。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在开普的驻军始终维持 4000 人以上规模。英国舰队频繁进出开普港,消费大量食物。开普市场对内地牲畜的需求有增无已。1815 年欧洲战争结束,驻军规模虽渐趋缩小,但在 1815 年至 1821 年离开普最近的圣赫勒拿岛成为囚禁拿破仑的场所,为防止 1815 年“厄尔巴岛逃逸事件”重演,该岛驻屯相当规模的军队和船舰。这些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拿破仑身边一大帮人所消费的大量肉类全靠开普市场供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东方殖民地越来越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航行于两洋航线而停泊于开普港的船舶数目直线上升。满载纺织品驶往印度、中国的船舶,以及从印度、中国回航欧洲的满载生丝、棉花、茶叶的货船,都在开普港停泊,补充给养。船港船舶,舳舻蔽水,云帆遮天。

1829 年停泊开普港和伊丽莎白港的船舶增至 301 艘,以英船居多,仅供应活羊每年就需要 34 000 多只。1835 年船舶继续增加到 569 艘,需要供应活羊 64 000 多只。<sup>①</sup>开普市场牲畜贸易连获厚利,历久不衰,加上绵羊供应羊毛原料,再辟新径,持续地推动着内地的土地扩张。从 20 年代起,开普殖民地饲养牲畜头数增长飞快,1821 年绵羊总数为 185 万多只,1828 年增至 218 万只,1833 年再增至 294 万只。<sup>②</sup>山羊数量也大量增加,1834 年达 162 万多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中机器毛纺织业的发展,开普殖民地市场出现新现象:对羊肉的供求关系逐渐趋缓,对羊毛需求量显著增长。英国毛纺织业需要殖民地供应大量优质羊毛。开普殖民地畜牧业

---

① S.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南非边区的经济影响》), California, 1957, p. 49.

② *Ibid.*, p. 191.

重点开始转向生产羊毛。改进饲养技术的结果证明西班牙美利奴羊颇能适应南非环境。1810年后南非美利奴羊毛输出逐渐增加；1822年向英国出口羊毛2万磅，1838年增至49万磅，1851年再增至544万磅。29年间增加272倍。<sup>①</sup>总之，在1869年南非发现金刚石矿前，供应过往船舶肉类和生产羊毛的畜牧业出口量一直超过种植业出口量，是南非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也构成殖民地扩张的基本特征：在单位面积载畜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为扩展畜牧业而掀起的土地扩张运动方兴未艾。

1820年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在开普殖民地增加一股抗衡布尔人社会、效忠英国的力量，同时也有助于缓和国内失业问题，从国内移民5000人到南非。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土地最肥沃的楚尔费尔德地区。生活在南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英国新移民（除部分流入城镇外）如同其前辈荷兰和法国的移民一样，也很快变成经营粗放牧业的农场主。他们如法炮制布尔农场主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是土地的扩大”这种无限扩张土地的做法。在土地扩张和剥削非洲人劳动力上，英国人和布尔人有着相似利益。但英国移民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掐断与英伦诸岛的联系脐带，因而同英国国内市场联系密切。由于羊毛的商品生产性质更强，投入劳动力更多，英国移民需要采取与布尔人不同的剥削非洲劳动力的新方法——雇佣劳动。加上19世纪上半叶国际经济关系主流已渐受自由资本主义的支配。1807年英国议会决定禁止奴隶贸易，1834年后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因此，英国移民的殖民活动除了有与布尔人相同的方面外，又有新特点。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特点愈益突出。尤其是反映在对待非洲人的态度和政策上，既有与布尔殖民者一致方面，又存在矛盾和分歧。虽然在初期，一致方面是主要的。

---

<sup>①</sup> Kiewei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58.

## 二、科萨人遭遇资本主义的新对手

英国农场主与布尔人一样贪婪地侵占非洲人土地。但英国人实行武装的“有组织的移民”。自英国第二次占领(1806年)后,开普东区殖民化向深入发展。在1806年后的五次“卡弗尔战争”(英国—科萨人战争1811—1879年)中,英国殖民军屡次打败科萨人,吞并大片土地,形成南非开普地区的第四次土地扩张高潮。1812年英国出动正规军把科萨人赶出了40年来布尔人始终未能占领的楚尔费尔德地区。这块最肥沃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后来被英国移民占有。1819年英国迫使战败的科萨人割让大鱼河与凯斯卡马河之间的土地。1835年又夺走了大鱼河与卡特河之间的土地,划为阿德莱德省。1847年英国悍然兼并了大鱼河与凯河之间整块地区,划为英属卡弗腊里亚,1853年把边界进一步推进到姆巴谢河,又兼并了600平方英里土地。科萨人在凯河以西的其余土地也被并入开普殖民地,只剩下最贫瘠的牧地和耕地归科萨人使用。英国将吞并的土地改名卡弗腊里亚,向这块南非东南地区最肥沃土地上大批移民。1855年把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德国军团”复员军人安置在凯河和凯斯卡马河之间土地上,凯河以西大部分土地遂被白人农场主侵占。<sup>①</sup>从此,这块地区成为南非人口最拥挤、生态平衡破坏最厉害,非洲人遭受贫困折磨最严重的地区,也是英国一手安排的德裔殖民者与黑人矛盾尖锐的地区。

自从1806年英国殖民军出现在大鱼河谷地,科萨人就面对着一个比布尔人强大得多的殖民者集团,也是19世纪末前非洲人所抗击的最强大的殖民军队。<sup>②</sup>力量的对比变得绝对有利于欧洲殖民者。仍处于南下迁徙过程中的科萨人各部落在奥兰治河以南地

<sup>①</sup> 一部分由英国人所扶植的混血种人实行军屯。

<sup>②</sup> 除1798年埃及人所抗拒的3万余法军以外。



区未能像北方地区的祖鲁各族人民一样形成一个黑人国家。这就使得南恩戈尼黑人诸部落在被迫同英国殖民者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从凯河流域到大鱼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零散地分布着南恩戈尼人(包括科萨人、太姆布人、庞多人、芬果人等)诸部落。他们内部分裂,互相斗争,甚至未能形成南恩戈尼人的部落联盟。因争夺牧场,常开衅端,互相攻讦,部落战争频频发生。科萨人虽有类似“部落联盟”组织,最高酋长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未能起仲裁和消除争端的作用。两个最强大的部落首领:恩得兰比酋长与他的侄子盖卡酋长势不两立,互相敌视,争夺“最高酋长”权威,抢占大鱼河谷地最肥沃的牧区。英国建立的开普殖民政府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政府,也不同于英国在印度的机构,是由英国政府直接派遣总督和各级殖民官员进行治理的。这些受过严格的殖民统治训练的英国官员熟谙“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利用南恩戈尼人特别是科萨人内部分裂的弱点,蓄意挑起科萨人与太姆布人、庞多人和芬果人之间的争端,加深科萨人诸敌对部落之间的仇恨,拉笼收买一部分酋长,培植“亲英势力”,威胁打击另一部分酋长。英国殖民军侵占楚尔费尔德地区,把恩得兰比部落赶到大鱼河左岸,加剧了盖卡部落居住的左岸地区人口拥挤和土地紧张状况,给本已尖锐的牧场争端火上加油,使两部落的对立关系更趋恶化。英国在挑起两部落鬩墙之战以后,又支持盖卡打败恩得兰比,越发加深双方的裂痕,经历多年未能愈合。1853年科萨人最有才干的酋长马可摩(盖卡之子)团结各部落,逐渐缓和和化解了部落间敌意,终于将所有科萨人联合起来,组成抗英联盟。英国殖民当局又唆使太姆布人和庞多人反对科萨人,让南恩戈尼人自我消耗力量,终使马可摩的联合抗英事业功败垂成。1857年已故的最高酋长欣察之子萨里利再次谋求建立科萨人反英联盟,再遭英国人破坏,亦未成功。

为什么科萨人为保卫土地组建巩固的部落联盟反抗英国殖民

侵略的斗争屡遭失败？其原因何在？如上所述，英国在南非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又富有殖民政治经验，分而治之策略十分奏效，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从内因看，与北部地区的北恩戈尼人（祖鲁人）相比，南恩戈尼人缺少祖鲁人那样强有力的核心，各部落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分裂势力坐大。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南部地区许多酋长未能独占牲畜贸易以壮大自己经济力量，以及酋长的“嫡子继承制度”本身包含分裂因素有密切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正在南下西迁的南恩戈尼诸部落仍处于游牧生活向半定居农业生活过渡之中，牧农混合经济中的农业比重尚小，不利于定居。加姆图斯河（东经 25°）以西肥沃辽阔的土地，吸引着渡过凯河的科萨人各部落和家族公社过早地分散于广大新迁徙地区，而在水源特别肥美、抗旱条件较好的一些地区，如楚尔费尔德地区，人口又过于集中，从而酿成黑人内部争夺最佳牧场的部落战争。许多部落过于频繁迁徙，漂泊不定，又造成部落间联系纽带的松弛；而南方各部落力量的相对平衡，又使得没有任何一个部落能有足够的力量成为统一的核心。在南非所有班图语族的黑人中，科萨人最早因内部分裂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创巨痛深，历史辩证法使这个人丁繁衍的部族在与自然环境和殖民主义的严酷斗争中最先觉醒，人才辈出，涌现出许多先知先觉的人物。<sup>①</sup>

当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惨痛教训的后果也是首先由科萨人来承担的。由于科萨人多次联合抗英未能成功，军事频遭失败，失去大片沃土和无数畜群，疆土日蹙，生计维艰，部落生活中的蒙昧主义力量抬头。科萨人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于天上的冥冥力量（超自然力量）。1857年，部落“祭司”预言：如果科萨人宰光自己牲口，已经逝世的部落英雄将借万能之风复活，把所有白人

---

<sup>①</sup> 半个世纪后，南非许多杰出的黑人领袖都是出自科萨人，如贾巴武、曼德拉、坦博、哈尼等。

赶进大海，从西边升起的太阳将给科萨人带来肥羊和丰盛的粮食。屡遭白人殖民者欺凌而又屡战屡败的科萨人，在绝望心态下轻信了“祭司”的预言，宰牲之风迅速蔓延，几天之内杀了 70 000 多头牲畜。科萨人历来以牧为主，粮食储存有限，宰杀后腐烂的牲畜只剩一张张毛皮，遂陷人大饥荒，饿死了 2/3 人口，幸存者圈空窖罄，赤贫如洗。科萨人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数以千计的科萨人陆续被饥饿赶进白人农场充当雇工。<sup>①</sup>科萨人成为非洲黑人中最早遭受白人(英国)农场主剥削的雇工。半个世纪来开普东部地区因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土地缺乏的紧张状态，竟然通过非洲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暂时缓和下来，它使英国殖民当局得以推行“土著保留地制度”。

## 第五节 英国的殖民改革 和殖民土地制度

### 一、文明改革的背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凯歌前进。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扩大海外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取得更多的原料产地。南非开普殖民地作为英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所起的作用很小。1830—1834 年英国从海外进口羊毛为 3520 万磅，其中从开普殖民地进口的羊毛仅 49 万磅，只占 1.3%。从经济需求来看，英国政府本来并不急于在开普殖民地进行旨在开拓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改革。在这方面，英国传教会倒先走了一步。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求，英国已经在帝国范围内撬动了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两块巨石，两党制的议会选举都把“废奴”作为捞取选

<sup>①</sup> Flin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 1975, vol. 5, p. 384.

票的手段,任何一党都不可能随意在哪一个殖民地已把在斜坡上滚动的石块止住。1819年伦敦会(LMS)派遣约翰·菲利普到南非向异教徒地区和“未开化民族”传教。在布尔人扼制下,科伊人和有色人<sup>①</sup>所处的奴隶、农奴或半农奴的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伦敦会传教工作的进展。1828年,菲利普发表《南非调查》一书揭露开普殖民地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有害于有色人种的权利和利益,并强调指出科伊人和有色人的不平等地位,不仅影响伦敦会的传教工作,而且影响英国移民自由雇佣科伊人和有色人劳动力。此书发表后,下议院为之大哗,接连通过几个法令。1828年的《关于改善霍屯督人以及开普其他自由的有色人种的处境》(简称50号法令),给予科伊人、有色人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合法化)。英国殖民政府顺水推舟,在开普殖民地推行几项改革。

30年代初,英国政府根据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sup>②</sup>力图以提高地价,实现密集移民来增加雇佣工人,在开普殖民地土地政策上作出了新规定:拟将传统的租地农场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世袭所有权。此规定实施后,凡取得土地均需付款“购买”并纳税。1832年英国宣布开普殖民地内“皇家土地”(实际上是夺自非洲人的土地)今后不再随便分发,停止发给“自由土地”,一律改为公开拍卖。这项政策的意图是将开普土地由任何白人不分贫富均能以“租借”形式占有的“公共财产”,变成私有财产,使迁到殖民地的白人下层移民在挣到足够的买地钱成为独立农场主以前,必须从事较长一段时间的雇佣劳动,而政府则将这笔出售土地的款项作为专用基金从欧洲输入穷苦白人充当雇佣劳动力。

---

① 有色人多为科伊人妇女同白人非婚子女的后代。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资本论》第1卷),第25章。

## 二、掠夺劳动力制度第三型在南非是如何实现的

然而事与愿违,南非殖民地与北美殖民地甚至澳大利亚殖民地情况基本不同。在19世纪70—80年代发现金刚石矿和金矿以前,迁入南非的欧洲移民一直很少。1820—1860年每年平均不到750人。<sup>①</sup>南非面积为美国的1/7,而白人移民仅及美国的1/77。<sup>②</sup>英国在其他殖民地可以采取提高地价的办法,迫使大部分移民成为雇工,但在南非此办法行不通。这不仅因为“对土地所有权的热爱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威克菲尔德语),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实在太少。英国提高地价的政策并未奏效。殖民地政府于1812—1840年间出让(grant)给移民的土地为3100万英亩,而移民缴付的地价总共只有4.6万镑,平均每3000英亩土地的地价才收5镑,每年纳税也只有1.3镑。由于地价极其低廉,所有移民都付得起3000英亩的几镑地价,因而几乎任何白人都可以跻身农场主行列。因此开普殖民地始终未能从欧洲移民中沉淀下“过剩”的雇佣工人。那么,欧洲殖民者怎样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在1834年即将于帝国范围内全部废除奴隶制的前景下,殖民政府看到,剥夺和最大限度限制黑人的土地是殖民者获得劳动力的基本手段。在黑人还拥有足够土地和畜群条件下,除了为获取现金收入,他们一般不会背井离乡,受雇于白人充当雇佣劳动力。英国人从本国几个世纪圈地运动的经验中总结出—条:只有殖民者拥有大量过剩土地,而当地土著(班图黑人)土地严重不足,使他们无法在拥挤的土地上维持全部人口的生存,才有可能迫使黑人外出谋生,出卖劳动力。“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sup>③</sup>在

①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6.

②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vol. 1, p. 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9页。

南非同样如此。因此,欧洲殖民者无论在开普或其后在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他们兼并、侵占的土地,总是大大超过其所经营的农场(或矿场)实际用地的需要。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数不及当地居民 1/10 的欧洲殖民者在开普东部的大鱼河、凯河流域持续不断地进行土地扩张,直至占领整个开普地区土地的 90%,<sup>①</sup>只允许占人口 8/10 的当地黑人拥有不到 10% 的土地。

生计断绝和饥饿迫使越来越多的科萨人到白人农场或矿场打工,凯河以东人口最拥挤、土地最缺的卡弗腊里亚地区,到 19 世纪中叶已有 33 000 多科萨人充当白人的雇工。

除了经济手段之外,为了获得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欧洲殖民者特别是布尔殖民者,热衷于运用“政治权力”等超经济手段,建立黑人、科伊人和混血种人劳动力对欧洲农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包括人身依附的从属关系在南非殖民地延续时间最长,19 世纪末叶以后又以种族歧视形式变本加厉地复活于白人和黑人的劳动关系中,成为南非殖民史极具特色的特点。这种从属关系在土地制度上大致体现于三种形式:(1)分成租佃制 白人农场主将夺自非洲人的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黑人,黑人佃户需将收成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农场主(地主)。(2)带份地的雇农制(亦称劳役佃农) 雇农从白人农场主得到一小块土地(份地)自己耕种,并取得在农场主的牧地上放牧少量牲畜的权利。条件是一年需为农场主做工 90—180 天,农忙期间须全家出动为农场主干活。农场主除给予份地外一般不给其他报酬。它与劳役地租制无甚差别。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的份地制成为稳定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后来法律进一步规定,雇农若不随身携带农场主发给的通行证擅离农场,当局可予以逮捕。布尔农场主采用以上这两种形式最多,形式也最为严酷。(3)农业雇工 大多是不带家属、不享有份地的季节工

---

<sup>①</sup>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vol. 1, p. 74.

——流动劳工,农忙季节到农场做工。起初,以“食物工资”为主,后来才普遍发展为货币工资,对雇主的从属关系亦逐渐淡化。但约束所有非白人的“通行证制”却不断强化。英国农场多采取此种农场雇佣形式。此外,还有教会土地的租佃制,类似于后来普遍发展起来的垦户制(见后述)。

### 三、南非土著保留地制度的滥觞

南非保留地制度是英国殖民者首创的,在整个非洲大陆也属“始作俑者”,是非洲殖民史应着重研究的问题之一。早在18世纪末,科伊人在加姆图斯河以西的土地均已被布尔殖民者占领。1829年,英国出于自私目的,将刚从科萨人手中夺来的马可摩(Magoma)部落土地以“军屯”形式分给科伊人和混血种人居住,目的是把这块“凯河居留地”作为开普殖民地与科萨人住地之间的缓冲,并招募科伊人当兵和当警察,“屯垦”边区,必要时为殖民当局同科萨人作战。这就是南非保留地(resevers)的滥觞。此后,随着白人殖民者土地扩张,在吞并黑人土地时,往往留下一块质量较差的土地供土著居住。19世纪初此类土地大多设在远离白人居住区的半干旱地区,如在北部设“格里夸兰”、“纳马夸兰”等保留地以保证白人的“安全”。19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白人越来越需要黑人劳动力,往往在大片“欧洲人土地”中间设置若干小块“土著保留地”(俗称黑点 black spot),以便就近为白人农场主提供劳动力,英国总督格雷建议“在殖民地内应建立若干特居地(Locations)。选择特居地位置时,应在各特居地之间留下足够的间隔地段,以供白人居住地的扩展。这样,白人移民便能有效加以控制,从附近特居地获取劳动力。”<sup>①</sup>另一方面又将非洲人部落严格控制在保留地内,不许擅自迁徙到白人占领区。

<sup>①</sup>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vol. 1, p. 72.

到 19 世纪末，“土著保留地”大致有三种类型：(1)非洲人土地被征服后，殖民当局授权军事长官拨出部分土地赠予“忠诚”的首长或“行为表现良好”的黑人，此类保留地面积较小亦较零散。如大鱼河与凯河之间土地(西斯凯)被割裂成大小不等的 19 块土地，总面积仅 5300 平方公里，不及原土地面积的一半，其中凯斯卡马胡克保留地存在着“人口过度稠密，牲畜过分集中，贫穷，大批人外出，效率极低的农业经营，牧场和耕地的毁坏”的弊病，成为黑人农村极端贫困的典型。<sup>①</sup>(2)原来的非洲人居住区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其中部分地区被斗志旺盛、不甘屈服的黑人保护下来，如凯河以北直至乌姆齐姆库卢河之间的特兰斯凯，约 41 440 平方公里，成为南非面积最大的保留地。但到 19 世纪末仍被英国分割成三块英属保留地——芬果兰、坦布兰和庞多兰。(3)1843 年英国从布尔人手中接管纳塔尔后(见下述)，一次划出若干较大地段作为黑人特居地和教会保留地。此类保留地因面积较大，后来受白人殖民者蚕食、侵蚀最为严重。

英国在一部分保留地如 1894 年在特兰斯凯曾试行个人土地所有制(“格兰格雷制”Glen Grey)。当局将保留地的 70% 分给非洲人，每人 4 公顷作为份地。其余 30% 作为公共牧场共同使用，规定份地领有者应交纳地稅，份地世袭不得分割，不经区长许可不得出卖。由于留给非洲人作为保留地的土地太少(白人占地 90%，非洲人占地 10%)，加上黑人人口自然增殖较高的结果，不到 20 年保留地中就有 20% 农民没有份地，不得不外出做工。留在保留地内的黑人长期遭受饥荒、干旱、贫困、病疫的煎熬，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

<sup>①</sup> Keiskammahock Rural Survey (《凯斯卡马胡克农村调查》)p. 190, 转引自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1962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28 页。



## 第六节 布尔人的殖民远征和 布尔共和国的建立

### 一、布尔殖民者不满的实质

英国在南非的温和改革在布尔农场主中引起极大不满。实质上,这是先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南非高原的撞击。两个世纪来受到奴隶制和商业资本垄断制充分滋润、已经成长的英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如今要来摧毁奴隶制和农奴制了。本来在南非广阔的、偏僻的荒原上还能苟延残喘的奴隶制,现在受到了限期(到1834年为止)废除的毁灭性打击。落后的、极端保守的布尔农场主既要依靠不断扩张土地来维持其牧农混合经济结构的再生产,又要倚靠前资本主义的落后、野蛮的生产方式来获取无偿劳动力;而在精神领域却又要以奴隶制和农奴制所形成的、被加尔文教义强化的,关于白人同有色人“生来就不可能平等”的顽强意识来维持其生活于荒寂高原的心态平衡。

英国在帝国范围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以英国本土的工业革命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为基础,这种新生产力在南非开普这样经济极其落后的殖民地远未发展起来,因而也得不到回应。僻处内地的布尔殖民者将这些改革视为洪水猛兽,是对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因此,在无法抗拒改革的情况下,他们破釜沉舟,远走高飞,离开开普殖民地,越过边界,向奥兰治河以北地区挺进,力图脱离英国政权的管辖,建立自己的国家。

然而,布尔人对北部土地的占领,是以浮皮潦草的“勘察”所作出的北部存在大片“无主土地”的错误结论,作为其法理基础。一旦遇到下述情况:土著对其入侵进行反抗,或土地的真正主人曾因轮牧或部落战争一度离开土地,现今又重返故土,布尔人的“无主土

地”的法理基础便遽然崩溃，他们便只有依靠军事暴力实现对土地的占领，并对非洲人采取三种手段：或予以驱赶，或加以消灭，或如恩格斯所指出，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当地居民中建立“农奴制和依附关系”。<sup>①</sup>可见，布尔人这种“大迁徙”与北美的“西进运动”性质有所不同。前者发展成为近代殖民主义史上一种典型的殖民军事远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治家 19 世纪上半叶在抨击和反对奴隶制时曾带着“很热烈的感情”，正如同在 17、18 世纪他们维护和从事奴隶贸易时充满感情一样，都依据“很高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其实，他们所维护和反对的同一事物，都可以用英镑或黄金来衡量，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却往往把真实利益掩盖在漂亮的义正词严之中。因此，在南非布尔与英国两个殖民集团的斗争中，从较浅层次上看，似乎是有教养的资本主义文明传播者与粗俗的前资本主义捍卫者之间的斗争。从更深层次看，却是代表两个时代的殖民者为争夺对非洲黑人劳动力和地面、地下资源的最高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

一个半世纪以来，布尔殖民者以奴隶制和牧奴制为基础的农牧混合经济曾为两洋的殖民航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食品，发挥过有力的作用。他们建立在旧时代利益基础上的观念，如“黑人天生低劣”、“哈姆(Ham 指黑人)注定要沦为奴隶”、“黑人绝不能拥有同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等，在旧利益已经或正在消失以后，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其意识之中，起着比先前更坏的作用。英国执行 50 号法令和废除奴隶制，本意是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以“自由雇佣”劳动力的方式，将非白人的廉价劳动力从布尔人手中转到英国农场主手中，而布尔人所掌握的落后生产力和意识上的陈旧观念，促使他们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和农奴制，并坚持绝不让有色人和黑人“分享平等权利”的主张。

还应该注意，尽管布尔人殖民地生产十分落后，但他们与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31 页。

代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的古代殖民国家仍有很大区别：布尔人农场主是以近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他们需要“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sup>①</sup>如武器弹药、修造牛车的铜铁构件、衣服、茶糖、咖啡等。其中有些是布尔农场主不可缺少的，如武器、弹药是布尔人对非洲人实现殖民暴力的决定性手段，构成了他们占地、奴役土著的军事实力基础，也是弥补其人口少的重要平衡手段。按照市场交换的铁的原则，布尔农场主惟有以他们饲养的牲畜，或出售牲畜所得的现金，才能购到武器弹药和其他必需品。可见仅仅由于他们必须经常使用现金才能得到昂贵的武器、弹药或其他必需品这一事实，就足以促使布尔农场主去建立交换经济，主动保持同市场的联系。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不能摆脱与市场联系的纽带。大量事实证明这点：1824年一批布尔人由海路抵达纳塔尔，勘探港口。1834年布尔人厄伊斯率30人先遣队从陆路再度进入纳塔尔踏勘土地，选址垦殖，目标总是盯住港湾。布尔人将纳塔尔看作是他们的“希望之乡”，希望通过这个港区可以从世界市场获得所必需的衣服、茶、糖、咖啡、铁器、车具等日用品，特别是火药和铅粒的供应，并从“自己港口”输出牲畜和各种畜产品。有了自己的出海口，便可以直接与荷商或非英籍商人交易，从而摆脱英国所掌握的开普商业网的控制。1834年富裕农场主特里卡特率领一帮布尔人，离大鱼河向远北的葡属德拉戈阿湾迁徙，也是抱着类似目的。

## 二、侵占土地战争的残酷性

怀着占领新土地，摆脱英国统治和维持奴隶制——农奴制这三个目的的布尔迁徙者，在选择迁徙路线、定居地和处理同当地非洲人关系上，都遵循着既定的标准。1834年至1837年，陆续出发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55页。

的布尔人迁徙队伍涉渡奥兰治河以后，分成三股：一支迳直向北进发，渡瓦尔河进入德兰士瓦；主力的一支翻越德拉肯斯山隘口进入纳塔尔，朝沿海地带挺进；另一支集聚在奥兰治的塔巴恩丘地区。30年代中期正是北方祖鲁王国兴起，统一战争引起众多部落土地的大调整，出现一些暂时“无人居住”地带。正从事军事兼并的祖鲁武装力量，警惕地注视着蜂涌北上的布尔迁徙队伍，对擅自侵占、兼并土地的殖民者给以坚决的武力抵抗。这就造成布尔人初期的土地兼并无不以军事占领的形式出现。实质上“大迁徙”成为非洲黑人和白人殖民者为了保卫和占领土地而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世界殖民史上像南非黑人这样为保卫家园土地进行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罕见的。

这种保卫和占领土地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非洲人主力是祖鲁人，为保卫和收回土地而战斗，十分英勇顽强，然而他们武器落后，基本上是投枪、刺矛等冷兵器，战术也未针对欧洲人的火力优势而作灵活的调整，固守传统形式。布尔人拥有欧洲制造的射程较远、火力猛烈的火器，并配有马匹和牛车等辎重，以及较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思想，拥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都成为对非洲人的“大屠杀”。例如1836年10月16日姆齐利卡齐的部将凯利皮率恩德贝莱战士围攻布尔人入在维格科普的牛车阵，遭布尔人的火器重创，死亡数百人，而布尔人仅死两人。1838年丁刚率数千祖鲁战士围攻侵入纳塔尔在恩康姆河畔布置牛车阵的布尔人，布尔民团指挥官比勒陀利乌斯在河套上摆下环形牛车阵，把近百辆牛车首尾相连，利用深达数米的河水掩护己方的背面和侧翼，以牛车为掩体，发挥燧发枪和小炮的威力，使大部分持冷兵器的祖鲁战士无法迫近，而到追击时则以骑兵突破，从马上射击砍杀。燧发枪的有效射程至少高出祖鲁人投枪的两倍。尽管祖鲁人有惊人的臂力，密集冲锋队形有巨大的冲击力，但在齐射的燧发枪火力而前成片倒下。1838年12月16日凌晨，血战持续

两小时,祖鲁战士轮番持矛冲锋,前赴后继,但始终冲不破防守严密的牛车阵,伤亡惨重。丁刚下令撤退,布尔人跃马狂追大肆砍杀。被击溃的祖鲁军伤亡 3000 人,而布尔人竟无一死亡。这是近代殖民战争史上,因武器和军事技术过份悬殊而造成侵略和被侵略双方伤亡不成比例的一个突出事例。

挟持军事胜利的雄威,布尔人宣布他们拥有征服者对“被征服土地”的一切权力。击败恩得贝莱人的北路布尔人领袖波特吉特宣布,恩得贝莱人已被他们赶过林波波河,由此瓦尔河以北至林波波河的土地均为布尔人所有。1840 年 2 月 18 日再次击败祖鲁人丁刚部队的东路布尔人领袖比勒陀尼乌斯宣布,图盖拉河至白乌姆福洛齐之间的大片土地均归征服者所有。6000 名布尔人随之迁入并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争先恐后抢占或圈占属于非洲人的土地。到 1842 年前,各布尔人公社已占领了水牛河—图盖拉河和姆齐姆库卢河之间所有土地。在军事胜利面前,布尔人自恃强大,以为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可以为所欲为了,竟恣意规定在图盖拉河以南地区,凡在 1838 年 12 月以前进入纳塔尔的布尔农场主,均可得到两个面积各为 3000 摩尔根土地的农场(约 15 480 英亩);其后进入者可得到一个同样面积的农场。凡年满 18 岁的布尔青年只需缴纳 12 元登记费,便可领有土地。此后,布尔人全力以赴跑马圈地,划分地界,给地界的自然标志(小溪、山丘等)命名。人民议会发给布尔人土地所有权证明书。仅纳塔利亚共和国成立头两年(1840—1842 年),就有 250 万英亩土地由 254 名布尔人登记领有。<sup>①</sup>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因姆法肯战乱而暂离故土的非洲人的土地。当非洲人由避难地返回

---

① Henry Slater,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n Rural Natal 1838—1914* (《1838—1914 年纳塔尔农村地区经济关系中变化的模式》),载 S. Marks & A. Atmor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工业化前的南非经济和社会》), Longman, 1980, p. 152.

故土时,发现家园土地已被白人占领,无地耕牧。有的学者估计1838年战乱时期,黑人逃难、离散甚多,纳塔尔南部地区仅剩5000—11 000名非洲人。到1843年,大批非洲难民已返回故土,非洲人骤增至8—10万人。对于这批原土地主人,布尔政权规定,除按每6000英亩农场允留5户黑人家庭充作劳动力外,其余(估计包括祖鲁人近10万人)予以驱逐。1841年布尔人民议会作出决定:“为了布尔共同体的安全起见,完全有必要将仍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卡弗尔人(指非洲黑人)安置到边远地方”,“必须强行押送到指定地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sup>①</sup> 这些非洲人被驱离故土,被赶到乌姆齐库卢河以南的庞多兰。

除了役使非洲人农奴外,布尔农场主更愿意役使非洲童奴。劫掠非洲黑人儿童当“学徒”的勾当在布尔农场主中普遍施行。一个进入纳塔尔的布尔农场主承认“许多农场主简直把正在进行的反对祖鲁人的战争看成是一种虏掠远征,猎获的价值很大。人们都把它视为好运气的开始。使用暴力从卡弗尔人家庭带走三四个年幼的卡弗尔男孩和女孩,以便更好地掩饰奴隶制真相,难道是不被允许的吗?”<sup>②</sup>

可以看到,侵占纳塔尔基本上解决了布尔农场主的土地、劳动力和出海口三大问题。因此,最初几年大迁徙的布尔人将纳塔利亚共和国的首都选在彼得马里茨堡,最高立法议会也设于此。但是,另一大问题:摆脱英国统治、不受英国改革诸原则的法律效力的限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英国政府宣布,纳塔尔主权“早已”属于它。事实是,英国商人早在20年代就怂恿英国兼并纳塔尔。英国政府几经考虑,因当地无利可图,布尔人亦未北上,曾予以拒

① 亨·耶内克《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② M. Wilson & L. Theomson ed.,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o 1870(《迄1870年的南非史》),Oxford, 1982, p. 78.

绝。40年代初纳塔利亚共和国控制了沿海,荷兰和美国船只先后到达纳塔尔海岸。新形势引起英国担心不列颠海军可能丧失对南非海岸从而丧失对印度洋西岸的控制。欧洲其他殖民列强楔入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这是大英帝国不能容忍的。1842年5月,英国借口布尔人将纳塔尔非洲人强行遣送到开普地区东北部的庞多兰,引起布尔人与当地酋长冲突,影响开普地区的稳定,悍然出兵干涉。1843年英国正式宣布兼并纳塔尔,在该地区实施英国法律。近6000名布尔人不愿重新接受英国统治,承受英国废奴等法律的约束,陆续离开纳塔尔,翻越德拉肯斯山西去,与德兰士瓦高原地带的布尔人会合。几经合并,最后建成德兰士瓦共和国(正式名称为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两个布尔人共和国。英国人鉴于奥兰治河以北地区属荒漠高原,贫瘠、干旱,无甚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为节省殖民行政和军费开支,于1852年和1854年先后承认两布尔共和国独立。

## 第七节 英国殖民土地政策与布尔人 殖民土地政策的比较

布尔人大批离开纳塔尔,英国人接踵而至。英国政府派熟谙非洲土著事务的谢普斯通来规划治理纳塔尔。英国人总结开普东区与科萨人争夺土地而耗资巨大的经验教训,开始在纳塔尔系统地施行土著保留地制度。纳塔尔位于德拉肯斯山以东,雨量丰沛,彼德马里茨堡附近地区降水量达940毫米左右,土壤肥沃,适于种植棉花、烟叶、甘蔗等经济作物。英国殖民者计划在这片地区发展经济作物。但棉花种植失败,甘蔗种植获得成功。人数甚少的英国殖民者同样而临土地和劳动力的问题。1846年英国驻纳塔尔总督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制定土著保留地制度和政策,以解决这

两个问题。纳塔尔土著保留地制度是在总结东开普和布尔人在纳塔尔的五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稳定局势有利殖民开发的原则建立的:(1)英国殖民者鉴于剥夺非洲人土地是白人获得劳动力的基本手段,保留地面积既要使非洲人无法维持整个部落人口的生计,以迫使部分人外出谋生,出卖劳力;又要让非洲人部落扎根本土,不再发生大批人口到处迁徙“流窜”;(2)保留地位置既要使非洲人小农庄同欧洲人大农场在地域上隔开,又要让一些小保留地隔一定距离分布于白人农场周围,以便欧洲人就近获得劳动力;(3)一般不给予保留地固定的土地所有权。到1849年已初步划定7个保留地,陆续分给非洲人。到1864年,纳塔尔已有42个保留地,共200万英亩土地,21个教会保留地共17.5万英亩土地。图盖河以南保留地大多是贫瘠缺水的土地。每个非洲人平均分到20英亩土地。英国计划将8—10万非洲人迁入保留地。<sup>①</sup>5000名英国移民进入纳塔尔,基本上占领了布尔迁徙者于1848年以前撤出的土地。然而这些英国移民真正长期定居于纳塔尔土地上甚少,加上初期种植棉花不成功,他们占有的土地一部分出售于投机商。英国人在兼并纳塔尔初期更大的兴趣在于土地投机。因此,初期英国殖民者对非洲人劳动力的需求远不如布尔人那么大,但是英国人也颇热衷于“学徒制”。所以英国对纳塔尔土著保留地的划分,稍显“宽容”,划给非洲人的面积比布尔人后来在德兰士瓦、奥兰治划分给非洲人的保留地(特居地)要大得多。

然而,随着在纳塔尔种植甘蔗获得巨大成功,英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可是,原始积累在纳塔尔非洲人中所进行的程度远未达到可以迅速从土著保留地分流出足够的流动劳工。为此,英国人采取几项特殊措施解决劳动力问题。其一是,通过英印

---

<sup>①</sup> P. Maylam,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of South Africa* (《南非人民史》), New York, 1986, p. 84.



殖民政府从印度招募“契约劳工”进入纳塔尔。从1860年11月起,10万印度“契约劳工”陆续流入纳塔尔。<sup>①</sup>这项世界殖民史上颇显特殊的移民措施给20世纪南非社会的种族问题增添了异乎寻常的复杂因素。

其二是,使用“经济手段”向纳塔尔非洲人征收茅屋税。从1849年起每座茅屋征税7先令,以货币税迫使黑人为获得现金缴税而去为白人做工。但这种办法在纳塔尔仅起到部分作用。因为非洲人在白人土地上可以“租佃”殖民者、教会和土地公司的土地,到1874年经由非洲人占有使用的土地达500万英亩,这些黑人佃农只交一些地租给“在外地主”,自己独立经营,形成了著名的所谓黑点(black spots),并渐成星罗棋布之势。这些非洲小农勤劳、积极进取,颇善经营商品作物。1849年就开始把玉米大量输出到开普殖民地。短时间内,纳塔尔一些地区(如德班)消费的谷物,竟有一半以上是由非洲人生产的。<sup>②</sup>许多非洲人用这些商品作物换来的货币交纳茅屋税,不必去当英国人的雇工。

第三,采取直接的政治权力手段。纳塔尔勤劳、聪明的黑人农民仿效白人农场主也种植起甘蔗和棉花,渐成规模。白人经常抱怨他们竞争不过非洲小农。因为黑人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成本低,并不断吸收本来将会流动到白人农场去的黑人劳动力。姆法肯<sup>③</sup>以后在纳塔尔定居的赫卢比人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们在从事和适应商品性农业经济的经营上所表现的杰出能力,引起白人农场主的忌妒。纳塔尔非洲人经济的明显发展,证明了南非非洲人并非不擅长于商品经济。这样,英国殖民当局在使用经济力

---

① 1904年达10万人,1911年增至14.2万,超过白人居民数目(欧洲人为11万人)。M. Palmer,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s in Natal*(《纳塔尔印度人史》)Oxford, 1957, p. 28.

② Henry Slater, *Op. cit.*, p. 156, p. 166 note 26.

③ 指18世纪20—30年代南非北部的部落兼并战争。

量以外,便采用直接的政治权力。1873年殖民当局强令收缴赫卢比人的枪支,兰加利巴累酋长拒绝听命。结果,拥有更先进武器的英军摧毁了赫卢比酋长国。土地被白人移民占领,牲畜也被没收拍卖。赫卢比人富有竞争力的、方兴未艾的商品经济被人为地垮垮了。从此他们成了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虽说出动军队导致一个酋长国商品经济垮台只是少数事例,然而其他地区非洲农民的商品性农业,在种族歧视的背景下,也往往因受到白人殖民者各种超经济强制而趑趄不前。

布尔迁徙者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扩张土地采取特别凶狠无情的形式。其特点是:(1)他们在击败并赶走姆齐利卡齐部队后,便于1839年10月宣布他们对于原由姆齐利卡齐“统治”的土地拥有通过征服取得的土地所有权。这种专横的做法推行到奥兰治河北广大地区,危害极大。(2)为了避免重蹈“纳塔利亚共和国”覆辙,在高原地带布尔人长驱北上,远远超过南纬25°的英国管辖线,逼近林波波河畔,在他们的大篷牛车能够到达和燧发枪能击败非洲人的地方,大面积地武装圈占土地。(3)布尔人坚持中世纪的落后生产方式,仍然摆脱不了征服者总要“占有人”的规律:“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征服者紧接着要做的总是把人也占有”,<sup>①</sup>只要力量对比有利于白人,布尔农场主总是以强化农奴制和变相奴隶制——“学徒制”,来解决劳动力问题。在武装占领大片土地前提下,一部分非洲人很快成为布尔人家庭农场的附庸,被并入白人共同体。每一个布尔农场主按“规定”可让若干户非洲人家庭住在白人农场土地上,全家为农场主干农活和各种杂役,实际上处于农奴——劳役佃农之间的地位。据利文斯敦报导,非洲人脖子上被挂上牌子,正面刻上本人姓名,背面刻写主人姓名。他们不得擅离农场,凡未得主人允许而擅离农场超过马行两小时的距离,即被视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逃亡,可加速捕。大部分非洲人被安置于“特居地”(Locations)内,特居地成为白人农场征调劳动力的储备库,由当地酋长安排,向布尔农场主提供一年所需的劳动力,报酬极低,一般仅给一头牦牛。战事频繁时,他们往往还被征调去充当民团的辅助兵种或伙为布尔人作战服务。19世纪中叶利文斯敦深入林波波河以南地区调查,对此类征调劳力做了具体的描述:“那些表面上独立的部落必须替布尔人从事所有田间劳动:耕耘土地,修堤开渠,同时还要自谋生计。我目睹布尔人来到一个非洲人村子,像往常一样,强迫二三十名妇女到他家菜园子除草。布尔人丝毫不掩饰其强迫实行无偿劳动的卑劣行径。他们说‘允许他们呆在我们国家,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报酬’”。<sup>①</sup>这种赤裸裸的鸠占鹊巢的强盗逻辑,反映出中世纪式的征服者的逻辑。

随着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布尔人农场的农奴——“学徒”制逐渐向半封建的租佃制发展。这种中世纪式租佃制的各种变相形式及其所伴随的残余,由于受到“直接的政治权力”的保护,一直残存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类文明史一大耻辱。这种租佃制大致有以下形式:(1)徭役佃农制:黑人佃户租佃布尔地主一块土地,必须为地主服一定日期的劳役,农忙季节甚至全家都要出动为主人干活,其严酷性超过开普地区的同样制度。(2)分成制:黑人佃户使用布尔地主一块土地,条件是将收获物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农场主,主要流行于奥兰治。(3)垦户(Squatter)制:黑人被允许居住在“白人土地”上,使用其一块土地,多少可由其挑选,拥有自由经营权,向白人地主提供货币地租,一般为每年10—12英镑;另外也提供部分劳役服务,多由垦户子女承担。垦户制多流行于德兰士瓦,除私人农场外,国有土地和教会土地上亦

---

<sup>①</sup>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探险》), London, 1858, p.39.

多垦户。

显然,在布尔人统治地区这些形式的土地所有者(白人)同劳动力所有者(黑人)的关系,在主要方面不能不是一种强制关系——超经济强制关系,因为没有各种形式的强制,就不可能实现对黑人和有色人的剩余劳动的更大程度的占有。至于这种强制是否采取野蛮的形式取决于黑人或有色人社会组织自保能力和反抗的程度。一般来讲,大鱼河—凯河一带的科萨人和纳塔尔地区的祖鲁人社会组织程度较高,反抗也激烈,布尔农场主的“野蛮手段”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而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地区,由于姆齐利卡齐失败后引兵北渡林波波河,一去不回,当地居民反抗相对较弱,布尔殖民者为所欲为,“野蛮手段”层出不穷。

显然,在高原地带,殖民者从被剥夺了土地的黑人身上榨取无报酬剩余劳动的特殊经济形式,决定了白人和黑人间的统治和从属的严酷关系。在金刚石和黄金富矿发现前,布尔人两共和国经济共同体的全部面貌及其独特的政治结构,均是建立于此种经济形式上的。面存在一个半世纪的布尔共和国的社会结构、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以至国家形式,都可以从白人地主(又是作为殖民者)同黑人劳动者的直接关系中,找到隐蔽的基础。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在布尔人共和国,压迫当地黑人的种族主义深深楔入土地所有权的法权范畴,“种族特权被神圣化,”<sup>①</sup>造成南非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不仅表现为一种“阶级特权”而且首先表现为一种“种族特权”,因此在奥兰治河以北它对南非非洲人的土地剥夺具有特别的残酷性和彻底性。随着白人同黑人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黑人,其严酷性继续发展,到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见第10章)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在世界殖民史中是仅见的。

布尔人出于巩固和扩大自己殖民利益的目的,迅速将其占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页。

南非绝大部分土地的现状以法律形式加以神圣化,从而使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的固定的形式。此外,为了剥夺所有非洲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权,德兰士瓦共和国首先创立极恶劣的先例,于1954年宪法第9条中悍然规定“不允许有色人种同白人居民之间的平等,不论是在教会内或国家内。”这项剥夺非洲人选举权和公民权的规定后来虽经改头换面,但原则不动,一直施行了140年,至1994年4月才在根本上和实际上予以废除。20世纪以前,英国人在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剥夺非洲人的选举权,后来(20世纪30年代后),则与布尔人沆瀣一气,基本上剥夺了非洲人的选举权和公民权。由此可见,英国人在南非实行的促使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同布尔人实行的维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经济制度,是两种不同的压迫非洲人的制度。然而,这两种制度都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布尔人公开宣布种族主义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正式信条,而英国人则从中揉进其统治阶级性格中特有的伪善,加以粉饰。

在20世纪以前,与荷兰母国甚少联系的布尔人在引进欧洲的进步生产力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甚至玉米种植的引进南非,也不是布尔人的“善举”,而是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那里引人的。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布尔两共和国大概属于世界殖民主义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殖民地模式。由于自然劳动生产率很低,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劳动,让人口众多的非洲人为布尔殖民者从事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只有通过现实的强制。然而,在基本上属封闭型的经济体制下,这种极具种族色彩的机制所能形成的非洲劳动者的消费需要是很微小的;作为剥削者的白人农场主的人数及其剩余产品也是十分微小的。这就是几十年中布尔人及其附属的非洲人生产力停步不前的原因。这种状况只有靠商品—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才能打破。

## 第六章 禁止奴隶贸易与英法 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本章选择 1776 年和 1876 年这两个年份作为界标。1776 年是英国殖民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北美 13 个殖民地宣布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亚当·斯密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876 年的重要意义是布鲁塞尔国际地理会议的召开及其成立“国际刚果协会”的决定，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不啻一篇向非洲进军的宣言书：“打开地球上惟一文明尚未进入的地区，冲破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大胆地说，这是一次与这个进步的世纪相称的十字军远征。”<sup>①</sup>

在这大规模殖民瓜分发生前的 100 年中，非洲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与本章关系最密切的则是奴隶贸易的废除和合法贸易在非洲大陆的扩大。

奴隶贸易给非洲大陆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非洲被迫为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但其本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并未因此而产生根本性变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是欧洲，从奴隶贸易到合法贸易这一转变的主动者也只能是欧洲。正是这一转变将非洲正式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关于这一过程，圭亚那著名非洲史学家罗德尼指出：“历史地看，主动性来自欧洲。”<sup>②</sup>

① 罗贝尔·科万纳：《刚果（金）历史》，商务出版社，1974 年，上册，第 179 页。

② W. Rodney,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上几内亚海岸地区史 1545—1800 年》), Oxford, 1970, p. 199.

非洲史学界对 19 世纪的研究特别重视,因为它是介于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经济体系之间的一个分界期。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非洲经济调整、延续和改革的时期,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时期充满了动荡、危机和革命。A·G·霍普金斯通过对西非经济史的考察,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禁止奴隶贸易和合法贸易的发展(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殖民统治的建立)标志着非洲历史的转折。他认为,合法贸易带来了市场增长的新阶段,因而标志着西非现代经济的开端。<sup>①</sup>确实,合法贸易将生活必需品引入了市场。对世界市场而言,棕榈油、花生、橡胶等产品从非洲输出;对非洲而言,以前输入的奢侈品逐渐为日常商品所替代。非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非洲劳动力的重构和货币经济与权力的结合。从经济史的角度看,19 世纪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 第一节 禁止奴隶贸易 和废除奴隶制

### 一、关于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关系的几种观点

关于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国际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自特立尼达—多巴哥学者艾里克·威廉斯于 1944 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一书后,史学界对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关系这一主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主要有四种观点。慈善运动论或人道主义论在 19 世纪甚为流行,目前有回升的趋势。这种观点认为废除奴隶制应归功于英国的废奴主义者。第二种可称为三次革命论,即认为废除奴隶制主要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的影响。这种观点更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废奴

<sup>①</sup> A.G.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124.

是一场奴隶的自身解放运动,即持续了 200 年的奴隶反抗使奴隶制的运作日益艰难,从而导致了它的崩溃。最后一种是艾里克·威廉斯的经济因素论。<sup>①</sup>

平心而论,威廉斯在重视经济因素的同时,从未否定过其他因索的作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用了整整一章叙述英国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他同时认为,经济上的变化,垄断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者的宣传,议会里的长篇辩论以及奴隶们自己争取自由的决心,这一切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sup>②</sup>

主要有关国家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间表<sup>③</sup>

	宣布废除奴隶贸易	法律生效日期	宣布废除奴隶制	法律生效日期
英国	1807	1808.1.1	1833	1834.8.1
法国	1792;1818	1818	1848	1859 <sup>④</sup>
美国	1808		1865	
葡萄牙	1836 <sup>⑤</sup>	1858 <sup>⑥</sup> ,1869	1878 <sup>⑦</sup>	
西班牙	1820 <sup>⑤</sup>		1878	
丹麦	1792	1803		
荷兰	1814			
瑞典	1813			

① 参见李安山:《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50 年西方史学论争述评》,《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第 76—84 页。

②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1982 年,第 172—189 页,第 201 页。

③ 主要资料来自 P.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奴隶制的转变:非洲奴隶制度史》),Cambridge, 1983, 附录:“反对奴隶制诸措施年表”, pp. 283—287。

④ 法国废除契约劳工制。

⑤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63、240 页。

⑥ 同上书,第 245 页。

⑦ 同上书,第 254 页。



早在17世纪80年代即有人提出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但直至18世纪中叶废奴仅仅是个别人的慈善要求。一般欧洲人对奴隶制的认识是模糊的和矛盾的,即使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不例外。一方面,他们承认“因为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奴隶制对我们是无益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如果产糖植物的种植不用奴隶的话,糖便要太贵了”,“我们天天听人说,要是我们有奴隶,多好啊!”<sup>①</sup> 1754年,新泽西一位贵格会教徒约翰·伍尔曼发表了一本谴责奴隶制的小册子。随后,费城贵格会和伦敦贵格会分别于1758年和1761年对持有奴隶的教友持否定态度。<sup>②</sup>这是教会机构有组织地抵制奴隶制的开始。

1772年,曼斯菲尔勋爵在逃奴詹姆斯·萨默塞特案件中宣告奴隶制违反英国法律。从此,凡非洲奴隶一登上英国国土,便成为自由人。1783年,废奴主义者第一次向议会递交了一份禁止奴隶贸易的请愿书;1785年后成为废奴运动领袖的托马斯·克拉克森用拉丁文撰写的关于奴隶贸易的学位论文在剑桥大学获奖。两年后,根据克拉克森的提议,在英国成立了“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协会”(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在格兰维尔·夏普和威尔伯福斯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从1788年起,英国议会几乎每年都要就禁止奴隶贸易问题展开激烈辩论。<sup>③</sup>

## 二、禁止奴隶贸易和废奴的原因

1775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1789年,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圣多明各爆发了奴隶起义(史称海地革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上),第247、245、248页。

② P. Manning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 Occidental, 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 (奴隶制度与非洲生活)*, Cambridge, 1990, p. 15.

③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第151—152页。

命)。无可否认,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海地革命具有思想上的启蒙和指导意义,但奴隶的悲惨境遇和反抗意识则是这场惟一取得成功的奴隶起义爆发的原动力。这场有50万黑人参加并经过12年奋战的革命于1804年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这是继美利坚合众国之后的美洲第二个独立国家。<sup>①</sup>海地革命的影响是双重的。对殖民宗主国而言,这不啻是一场灾难,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殖民地奴隶制的破产。对美洲的黑人奴隶而言,这是一场极大的鼓舞,并预示着他们的未来的前途。无怪乎这三次革命,特别是海地革命被看作是最终废除奴隶制的强大推动力。<sup>②</sup>

从种植园的建立开始,奴隶就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着不懈的反抗。1815—1832年,受海地革命胜利的影响,奴隶起义明显增多。据统计,1638—1837年间,共发生了75次暴动起义。<sup>③</sup>实际上,奴隶反抗并不限于有组织的起义和暴动,如日常的消极的抵制运动(如咒骂、抱怨、破坏工具和消极怠工),不成功的谋反与起义和成功的暴动与革命,均属反抗之列。贝科斯通过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反抗的研究,提出了“200年战争”这一概念,认为1638—1838年的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具有革命性意义。作为一位西印度群岛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提出一个理性且敏感的问题:为什么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往往被看作是边缘的斗争?他认为,200年战争即奴隶反抗是废奴运动中奴隶自我解放的具体

---

① C.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黑人雅各宾派》), London, 1938.

② David Geggus, *Resistance to Slaver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The Modern Caribbean*(《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反抗》),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9, pp. 21—50.

③ M. Craton, *Testing the Chains*(《检验锁链》), University of Cornell, 1982, pp. 335—339.

体现,有效地影响了宗主国的废奴政策。<sup>①</sup>

1776年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理性上给奴隶制以中肯的评价:“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的生活费用,但彻底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以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是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sup>②</sup>这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奴隶制的弊病。其一,奴隶劳动的代价最高;其二,奴隶劳动的效率最低;其三,奴隶制须用暴力维持。这实际上为废奴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艾里克·威廉斯正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关系。1789年后,英属西印度群岛因地力耗失,加之北美殖民地独立,致使其生产成本增加,进出口阻塞,使其无法与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以及毛里求斯、巴西和古巴等后来居上的蔗糖生产者竞争。更有甚者,其生产又超过了英国市场的需求,这使西印度群岛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它对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了”。因而英国工业家成功地实施了三项改革: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废除奴隶制和1846年取消蔗糖的优惠关税。这三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奴隶制度中发家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反转来要消灭奴隶制度。”简言之:1807年的蔗糖生产过剩要求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的生产过剩则要求解放奴隶。<sup>③</sup>

卡宁顿关于美国革命对西印度群岛之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威廉斯的论点。西印度群岛在18世纪中期已十分依赖北美殖

---

① H. M. 贝科斯:“加勒比地区反对奴隶制:被奴役黑人的自我解放的精神气质”载于《加勒比历史杂志》(Journal of Caribbean History), 22: 1-2(1988), pp. 1-19.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上),第352页。

③ 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第104-120, 131, 147页。

民地了。它不仅从北美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还在输出糖浆和船舶运输上严重依附北美。美国独立战争使西印度群岛在各方面受到严重伤害:从北美进口食物大幅度下降和价格的高扬;失去了北美这一出口糖酒的重要市场;船舶运输的锐减使出口受到损失。概言之,美国独立战争给西印度群岛以极大打击,是种植园经济衰退的开始。<sup>①</sup>

综上所述,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度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欧洲工业资本的触角很快又伸向非洲大陆。从殖民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非洲引发了三个直接后果:释奴殖民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利伯维尔和弗里敦)的建立,合法贸易的扩大和英法在沿海地区殖民活动的加强。

## 第二节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建立

### 一、塞拉利昂殖民地的建立

1772年的詹姆斯·萨默塞特案件判决之后,住在英国的数万名非洲奴隶获得了自由。美国独立战争后,一些曾参与对北美殖民地作战的黑人士兵和渴望自由的黑人奴隶也来到伦敦。这些无依无靠,流浪街头的黑人成了伦敦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sup>②</sup>

1786年2月,一位曾到过西非塞拉利昂沿海巴纳纳群岛的英

---

① S. C. Carrington,《美国革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交叉历史杂志),17:4(1987),pp. 823-850;还可参见他的专著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时期的英属西印度群岛》),Holland, Chp7.

② 这一节的资料主要依据克里司托弗·法伊夫:《塞拉勒窝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上)第1-4章;理查德·韦斯特:《回到非洲去:塞拉勒窝内史和利比里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部分。

国人亨利·斯密斯曼提出在塞拉利昂河附近建立一块移民地,将伦敦的黑人移居此地。他计划在此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园,将这些黑人移民作为种植园的契约劳工。斯密斯曼的计划是以商业利润为原则的,然而这一计划看起来颇具吸引力:建立移民地既可解决英国“贫穷黑人”这一困扰已久的社会问题,又可开辟新的商业渠道和就业机会,还可以为英国增加财富。移民地计划受到英国废奴主义者的极度重视。受到格兰维尔·夏普支持的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立即向英国财政部提出报告。英国政府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决定给予援助。斯密斯曼于7月去世。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负责组织移民工作。

1787年4月,载有411名移民的船队从英国起航。5月10日,船队驶入塞拉利昂河。历时一个月的艰苦航行夺去了34人的性命,仅377名移民安全抵达。<sup>①</sup>经过与当地泰姆奈人酋长托姆王谈判后,移民们用滑膛枪、火药、子弹、剑、棉织品、珠子、铁条、烟酒等价值59磅1先令5便士的商品换取了沿海长9-10英里,纵深宽20英里的地段作为居留地,移民在居留地竖立起了英国国旗,并将居留地命名为格兰维尔镇,以对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表示敬意。同时,移民推选理查德·韦弗为总督。由于抵达时间正值雨季,垦荒条件极为艰苦,到1787年底时,居留地只剩下130名移民,其余的不是病死就是投奔了泰姆奈人社区。1789年,泰姆奈人首领吉米王以他未在条约上签字为由废除了1787年协议,并于年底将居留地提毁,到1791年,居留地仅有的48人坚持下来。<sup>②</sup>

与此同时,伦敦的废奴主义者在托马斯·克拉克森和格兰维尔·夏普的领导下,以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协会为中心不断地向英国议会提出议案。1788年5月,废奴问题在英国下议院被正式提

---

① J. F. A. Ajayi. & M.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西非史》), Longman, 1987, p. 59.

② *Ibid.*, p. 59.

出。夏普建议创办圣乔治海湾公司,以在塞拉利昂建立移民区,专门负责安置已获自由的黑人。1790年2月举行了公司第一次筹备会议,共有22人出席并认股。<sup>①</sup>经过一番周折,倡议者于1791年正式向议会申请组织公司并在各地发行股票。4月,一项申请组织圣乔治海湾公司的议案在下议院提出。尽管有一些人反对议案,但大多数议员赞成向非洲发展贸易。法案以87票对9票通过,自1791年6月6日起成为法令。由于这份申请在议会宣读时改成了“塞拉利昂移民地”的申请书,因此,法令(乔治三世第31号命令第55款)批准组织“塞拉利昂公司”。<sup>②</sup>

法令授权公司具有皇家原先赐予的土地和可能获得的任何土地,将塞拉利昂移民地的管理权委托给13名由股东选出的董事,并允许公司自行制定有关法律。董事们选举下院议员亨利·桑顿为董事会主席。一个由远在伦敦的董事会控制的殖民地就这样诞生了。然而,桑顿并非一名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他在1791年底写给亨利·克拉克森的一封信中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声称,他宁愿引进“灵光和常识”,而不是铲除奴隶贸易这一“特殊的邪恶”。当时亨利·克拉克森正准备启程去北美将自由黑人运往塞拉利昂。桑顿告诫他不要让自己的废奴热情冒犯了当地的非洲酋长和商人,因为塞拉利昂殖民地的运作和稳定有求于他们的帮助。<sup>③</sup>

亨利·克拉克森去接送的正是塞拉利昂创建时期最关键的第二批移民——新斯科舍人。当时,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住着大约6000名黑人。他们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英国而被许诺将获得自由和土地。1783年他们被送至新斯科舍,随后的境遇使他们的梦想破灭。经过与塞拉利昂公司联系后,1196名黑人由托马

---

① 法伊夫:《塞拉利昂内史》,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D.B. Davis,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奴隶制度与人类进步》), Oxford, 1984, p. 160.

斯·彼特斯和大卫·乔治率领登上了开往西非的航船。他们于1792年4月抵达塞拉利昂, 正值雨季, 他们的境遇与第一批移民一样。由于组织工作较好, 人数较多, 他们很快在格兰维尔镇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居留地, 并重新命名为弗里敦。

移民们很快与公司及其代表发生冲突, 这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宗教自由。新斯科舍人多为新教教徒, 他们对公司干预其教事及强迫他们参加英格兰教会的活动甚为不满。其次是总督在殖民地牧师的协助下, 力图使新移民接受基督教婚姻仪式, 这与他们中盛行的多妻制格格不入。第三是自治问题。最初, 移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殖民地议事会。由于这些代表多次拒绝通过侵犯移民利益的行政法令, 移民们很快失去了选举代表这一权利。最重要的是税收。克拉克森曾许诺移民可免费得到土地。后来, 公司规定殖民地土地须收取每年1英亩1先令的代役税。当公司试图强行征税, 遭到移民们的激烈反抗。1800年9月3日爆发了武装起义。移民宣布脱离公司独立。<sup>①</sup>这一起义正值第三批移民马隆人<sup>②</sup>到来之时。在马隆人的协助下, 殖民政府很快镇压了新斯科舍人的反抗。1800年11月, 塞拉利昂总督接到英国政府的特许状。这份特许状从法律上确定了塞拉利昂的地位, 并对其行政司法权作了规定。1807年, 英国政府正式接管塞拉利昂。

---

① 韦斯特:《回到非洲去:塞拉利昂内史和利比里亚史》,第100页;阿贾伊与克劳德: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p. 62.

② “马隆人”,意为“逃奴”。马隆人曾在英属牙买加的内地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1795年,马隆人在不被遣送外地的条件下向殖民地政府投降,后被放逐至新斯科舍。英国政府后来同意将他们送至塞拉利昂。马维尔·坎贝尔指出,“新世界马隆人社会的历史是游击战争的历史。”参见 M. C. Campbell, The Maroons of Jamaica 1655—1796(《牙买加的马隆人 1655—1796年》), New Jersey, 1990, pp. 1—13.

## 二、美国废奴运动与利比里亚的建立

利比里亚的建立是美国废奴运动的结果。18世纪初,美国种族主义盛行。自由黑人的工作和生活由于种族歧视而无法得到保障,从而构成了困扰美国社会的“黑人污点”问题。1811年,美国新贝德福德的一位黑人企业家保罗·库菲访问了塞拉利昂。随后,他于1815年自费将38名黑人自愿者带到塞拉利昂定居。库菲回美国后,大肆在黑人社会奔走呼吁。一些有名望的黑人牧师和社团领袖对库菲的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sup>①</sup>一些白人也认识到这种移居可能将解决“黑人污点”问题,新泽西州的福音派牧师罗伯特·芬利即为其中之一。他积极策划,很快与库菲取得联系并得到后者支持。

1816年12月,芬利等人发起成立美国殖民协会,<sup>②</sup>由布什罗德·华盛顿任协会主席。协会的目的并不是纯粹利他主义的,其种族偏见是十分明显的。这从协会开幕式主持人亨利·克莱的讲话中即可看出。根据当时的《通讯》报道,他指出,美国自由黑人的处境十分特殊,“他们既享受不到自由人的特权,也不受奴隶无权地位的支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而有之。”从他们的情况和由于其肤色而产生的难以克服的偏见来看,“他们永远不能同这个国家的自由白人融合在一起。”因此,“既为他们着想,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居民着想,就值得考虑把他们统统送出去。”很明显,协会为塞拉利昂殖民地的经验所鼓舞,“塞拉利昂殖民地获得的成功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个殖民地的基本居民是独立战争时期南方各州逃亡的奴隶。”协会相信,有早期移民的先行经验,将

<sup>①</sup> William Lloyd Garrison,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 (《关于非洲殖民的想法》), New York, 1969, (原版1832年), 威廉·洛伦·卡茨撰写的序言, pp. 3-16.

<sup>②</sup> 韦斯特:《回到非洲去:塞拉利昂内史和利比里亚史》,第142—145页。



这些“即使不算危险的，至少也是有害无益的居民”移居西非定会成功。<sup>①</sup>

然而，这一移民计划在黑人民众中似乎并未引起好感。这从1817年1月25日费城黑人领袖詹姆斯·福尔顿写给库菲的信中即可看出。在一个3000人的大会上，没有一个人赞成到非洲去。与会者认为“奴隶主想摆脱他们从而使自己的财产要安全一些。”<sup>②</sup>1818年美国殖民协会派出米尔斯和伯吉斯去西非考察未来移民地的地址。与此同时，美国殖民协会全力鼓吹移民计划，并力争国会支持。最后，门罗总统决定将国会西非设立由美军舰截获的获释奴隶监管区的计划与殖民协会建立自由黑人移民区的计划合二为一。1820年1月31日，3名白人代监官塞缪尔·培根、约翰·班克森和克罗泽医生与89名自由黑人乘上“伊丽莎白号”驶离纽约。当“伊丽莎白号”抵达塞拉利昂时，殖民地总督怀疑美国移民计划的真实目的，因而以无空地安置为由拒绝接受移民。移民们只好向南驶向歇尔布罗岛。几个星期以后，一场疾病夺去了3名白人及22名黑人的性命，剩下的黑人移民在丹尼尔·科克尔的领导下只好作为难民寄居在塞拉利昂。<sup>③</sup>

1821年底，美国政府又派出4名白人代监官和33名自由黑人去建立另一个西非殖民地。第二批移民决定在离开塞拉利昂东南250英里的梅苏拉多购买一块土地。12月15日，白人代监官艾尔斯和斯托克顿借助武力用价值不到300美元的枪、镜子和烟酒从当地酋长彼得王手上购得梅苏拉多角。殖民协会将这一殖民地取名为利比里亚(Liberia，意为自由之邦)，将未来的首都依照美

---

① 韦斯特：同上书，第143—144页；Harry Johnson, *Liberia* (《利比里亚》), London, 1906, Chapter 9.

② William Lloyd Garrison,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 p. 13.

③ Ajayi &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p. 76.

国总统门罗(Monroe)之名命名为蒙罗维亚(Monrovia)。1822年4月,第二批移民与暂居塞拉利昂的第一批移民搬到梅苏拉多角正式定居。一个美国殖民地就这样诞生了,并随着一批批美国移民的到来而逐渐扩大。

利比里亚的早期移民(1820年—1828年)

1820年	89人
1821年	33人
1822年	53人
1825年	66人
1826年	182人
1827年	222人
1828年	163人

\* 白人代监官未包括在内。

19世纪3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和其它组织对利比里亚失去兴趣,美国殖民协会独自操作利比里亚殖民地事务。到1832年,协会已将1857人运往非洲。这段时期是利比里亚在沿海地区的扩张时期。1834年2月马里兰殖民协会建立了哈珀殖民地(也称利比里亚的马里兰);1834年12月纽约和费城的殖民协会建了巴萨湾殖民地;1838年密西西比殖民协会在锡诺河畔建立了格林维尔(也称非洲的密西西比)。1839年所有的殖民地(哈珀除外)合并为“利比里亚联邦”,由一名总督负责。为便于管理,联邦又分出蒙特塞拉多、大巴萨和锡诺三个县。1845年1月,利比里亚议会要求与美国殖民协会脱离关系,1846年美国殖民协会回信承认利比里亚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建议利比里亚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声明。1847年7月,利比里亚各地代表开会正式宣布利比里亚联邦独立。

1848年,法国宣布解放殖民地的所有奴隶。1849年,法国依照塞拉利昂的榜样在加蓬建立了利伯维尔(Libreville,“自由之邦”

之意),作为释奴的定居地。同年,第一批 55 名被法国禁奴军舰在达喀尔稽查的奴隶移居至此。<sup>①</sup>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传教士在东非沿岸又建立了一些释奴定居地,以弗里敦较为突出。<sup>②</sup>

### 第三节 合法贸易的扩大

#### 一、合法贸易与奴隶贸易的关系

沃勒斯坦将 1730—1840 年这一阶段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次大扩张的时代”。<sup>③</sup>确实,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将非洲(主要是西非)纳入了自己的轨道。这主要是通过扩大合法贸易来进行的。这里的“合法贸易”,是指在奴隶贸易宣布为非法后在非洲大陆进行的除奴隶以外的其他商品贸易。必须强调的是,合法贸易与奴隶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非奴隶的商品贸易不仅早于奴隶贸易,同时在整个奴隶贸易期间一直存在。以皇家非洲公司为例,在对非洲实行垄断贸易的 40 年(1672—1712 年)中,它从西非输入的商品除奴隶而外,还有黄金、象牙、蜡和红杉。1673—1713 年它用这种输入的黄金生产的金币共达 548 327 畿尼;输入象牙 17 113 英担;蜡 6 662 英担,32 年中输入红杉 2 313 英担。<sup>④</sup>正如沃尔特·罗德尼所指出的:

---

① Ajayi &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p. 74.

② Roland Oliver & Gervase Mathew, *History of East Africa* (《东非史》), Oxford, 1966, vol. 1, p. 245, J. F. A. Ajayi,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非洲通史》), Unesco, 1989, p. 286.

③ 参见: 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现代世界体系》), Academic Press, 1989, vol. 3, pp. 127 - 189.

④ K. G. Davies, *Royal African Company* (《皇家非洲公司》), New York, 1975, pp. 358 - 360.

“奴隶绝非西非的惟一出口商品。”<sup>①</sup>当然，合法贸易将出口商品从奢侈品转到了生活必需品上。

第二，欧洲特许公司在奴隶贸易期间在非洲沿岸地区建立了一些商站，用来交换奴隶的商品已有较固定的流向。仍以皇家非洲公司为例。1680—1704年之间输入非洲的商品主要流向7个地区：一区为冈比亚、塞拉利昂和歇尔布罗；二区为向风海岸；三区为黄金海岸；四区为阿尔德拉和维达；五区为贝宁与新、旧卡拉巴尔；六区为安哥拉；七区为其他地区。<sup>②</sup>其他一些欧洲公司也有自己确定的势力范围。这些商站、贸易点和势力范围为合法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在一些地区，奴隶贸易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这除了上面提到的欧洲商品流向相对固定的地区外，还包括较固定的奴隶供应者和非洲经纪人。<sup>③</sup>而在另一些并未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内陆地区，合法贸易（其商品多为盐、布、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一如既往，并未受禁止奴隶贸易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很多合法贸易的商品是由奴隶种植和运输的，网者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第四，合法贸易期间，除了奴隶贸易仍在进行外，奴隶劳动力的贸易仍以合法方式进行，尤以法国和葡萄牙最为显著。他们将这种劳动力称为“契约劳工”，或“自由移民”。这些人在服役期间如同奴隶，服役一定年限后可获得自由。法国这种“合法的”奴隶贸易集中在两条路线：西非地区（塞内加尔和加蓬）到西印度群岛；东南非洲到贝岛、科摩罗和留尼汪，契约劳工制主要集中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一地区的种植园得益于19世纪50年代的咖啡热

---

① Rodney: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p. 152.

② K. G. Davies, Royal African Company, p. 233.

③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pp. 88—107. 沃尔特·罗德尼：“西非和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洲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24—35页。

和后来的可可生产。契约劳工服役年限从5年到10年不等。<sup>①</sup>

第五,禁止奴隶贸易使沿海地区已成规模的奴隶销售网的流通受到阻碍,而合法贸易致使欧洲人对非洲原料产品(如棕榈油、棕榈仁、花生、橡胶等)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两个因素刺激了非洲内陆奴隶制的发展。西非的伊斯兰圣战扩大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从而使奴隶和原料的贸易从西非沿岸北移。同时,禁止奴隶贸易使奴价下跌,从而为非洲奴隶种植园提供了便利,这在索科托王国和桑给巴尔很明显。<sup>②</sup>马哈迪与伊尼科里对19世纪卡诺的研究和法洛拉对19世纪约鲁巴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sup>③</sup>正如奴隶贸易专家马丁·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和北非奴隶市场的逐渐关闭并未结束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反而导致非洲奴役现象的急剧增加……。”<sup>④</sup>

“禁止奴隶贸易”的口号使一些欧商深入到靠近沿海的内陆地区。他们要求政府资助,提出合法贸易是“从内地摧毁奴隶贸易的

---

① Lovejoy, op. cit., p. 146 - 147.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奴隶制的转变:非洲奴隶制度史》);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第200—204页。

② 关于索科托的奴隶种植园,参见洛夫乔伊:“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奴隶制”,洛夫乔伊主编:《非洲奴隶制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lavery in Africa),贝弗利西尔斯,1981年,第201—244页。关于桑给巴尔奴隶种植园,参见F. Cooper, Plantation Slavery on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非洲东海岸种植园奴隶制》),1977;J. Glassman, Feasts and Riots Revelry, 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 1856—1888, Portsmouth, 1995, pp. 85 - 106;国内的研究可参见:罗建国:“近代非洲种植园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74—84页。

③ A. 马哈迪、J. E. 伊尼科里:“前殖民时期西非的人口与资本主义发展”,D. 科德尔、J. W. 格雷戈里主编:《非洲人口与资本主义》(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威斯康辛,1994年,第64—73页;法洛拉:“19世纪约鲁巴经济中的奴隶制与人质典当”;洛夫乔伊、N. 罗杰斯主编:《大西洋世界发展中的非自由劳工》(Unfree Labo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lantic World),弗兰凯斯,1994年,第221—245页。

④ 马丁·克莱因:“19世纪西苏丹的奴隶贸易”,载于《奴隶制度及其废除》(Slavery and Abolition), 13:1 (1992), 第39—60页;还可参见霍普金斯: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p. 112 - 166.

最有效的方法”。<sup>①</sup>这一阶段,贸易的重点已由香料、象牙和黄金转到了工业原料资源。非洲的棕榈油、橡胶、木材、花生为欧商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而非洲又成为他们倾销国内剩余产品的市场。以进入冈比亚河的高船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欧商的活跃程度:<sup>②</sup>

年代	高船(只)	吨位(吨)	进口(镑)	出口(镑)
1840	255	14 009	105 441	124 587
1845	241	21 132	119 187	154 801
1851	239	25 491	107 011	186 404
1855	211	32 619	126 454	215 803

这时,一些欧洲公司已有确定的势力范围,如福斯特-史密斯公司、斯万兹公司和哈顿公司控制了黄金海岸一带的贸易,托宾-霍斯华尔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则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享有特权。据专门研究19世纪西非的贸易纽伯利估计,19世纪50年代前期西非合法的海外贸易商品每年平均达350万英镑<sup>③</sup>,当时有几位有代表性的欧洲商人。英国商人莱尔德于1832年就参加了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商业探险活动。1849年他建立了非洲轮船公司,与英政府签订契约,在西非和英国之间定期航行。1857—1859年间,他在阿博、奥尼查和洛科贾建立了一批商站,成为沿尼日尔河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从而为英国在尼日尔河谷建立殖民统治

① 英外交部文件 97/434, 转引自 C. W. Newbury,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ed Documents 1786—1874* (《英国对西非的政策: 文件选集 1786—1874年》), Oxford, 1965, p. 123.

② 纽伯利;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ed Documents 1786—1874* (《英国对西非的政策: 文件选集 1786—1874年》), Oxford, 1965, p. 117. 《殖民报告 1856年》, 伦敦 1858年版。

③ 转引自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 127.

奠定了基础。<sup>①</sup>他曾写道,“大不列颠的影响和贸易会顺着这条航道渗透到该地区最遥远的角落。1亿人会被引来同文明世界直接接触。我们的工业会获得广大的新市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大陆会把自己的财富展示在我们的商人面前。”<sup>②</sup>

马赛商人韦克曼是法国在西非地区的典型代表。1844年他才17岁就到了西非。1879年他开始收买几内亚湾诸河流对手们的全部产权。同时他将自己的航船改为汽船,在弗里敦与达喀尔和马赛之间开设航船,并在马赛办了一些油厂。1881年,他将产权转到“塞内加尔与法属西非海岸公司”。1882年,他开始在尼日尔河下游经商并以大量提供贷款的办法诱使塞拉利昂商人合作。<sup>③</sup>另一个法国商人雷吉斯从1833年起在西非近40年。他先后在象牙海岸、加蓬、安哥拉、刚果等地经商,重点则在黄金海岸与尼日尔河三角洲之间。1841年,他在维达建一商行,以法国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与达荷美官方打交道。1863年,他设法使波多诺夫成为法国殖民地,以保证他经手的大量进口酒能免税自由进入约鲁巴地区。<sup>④</sup>

德国虽然从40年代就开始在西非和东非海岸活动,但由于其商品质量低劣(被蔑称为“德国废品”),商品要贴上英法商标才能打开出路。<sup>⑤</sup>汉堡商人盖塞尔自1869年起开始在西非活动,主要是从事棕榈油贸易。他的公司是第一批在西非使用现款进行贸易

---

① K. O.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 1830—1885年》), Oxford, 1954, pp. 61, 117.

②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 1800—1918年》,上海,1977年,第205—206页。

③ John. D. Hargreaves, *West Africa Partitioned* (《被瓜分的西非》), London, 1974, vol. 1, p. 18.

④ John. D. Hargreaves,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关于非洲瓜分的历史》),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1(1960), p. 102.

⑤ J. S. Keltie,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对非洲的瓜分》), London, 1895, p. 171.

的。德国在西非的企业家代表是阿道尔·沃尔曼。父亲死后，他接管了在利比里亚、加蓬和喀麦隆的轮船公司和商行代理处。他积极活动，扩张势力，对后来德国占领喀麦隆起了很大作用。<sup>①</sup>

尽管欧洲商人的势力在非洲有一些进展，但绝非一帆风顺。他们有自己的困难和苦恼。他们苦于不能对付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具有无上的权力的非洲当地酋长、从中转手渔利的中间商人和无时不在疯狂竞争的欧洲对手。

从踏上非洲大陆的第一天起，欧商的活动就受到本地酋长的掣肘。他们必须向酋长交纳过境税、关税或见面礼。1817年，一艘400吨以下的船在贝宁王的领土内进行贸易之前要交纳礼金2英镑；直到1880年，输出的棕榈油还得交税，每吨从1先令6便士到2先令6便士不等。<sup>②</sup>有些酋长预感到白人带来的灾难，因而禁止白人建立商站，禁止汽船开进自己的管辖区。有些甚至袭击欧洲人的商站。直至1882年，国民非洲公司在尼日尔河口及其沿线的商站仍遭到非洲人的袭击。莱尔德曾经抱怨，最大的麻烦是三角洲各部落的敌对情绪，他们有枪有炮，受酋长指示，不许欧洲人的轮船通过。<sup>③</sup>还有的酋长在碰到麻烦时，或是提出抗议，或是联合行动对欧商进行贸易抵制。

第二种阻力来自非洲的中间商人。这些中间商有些是酋长，有些是本地小商人。他们将非洲产品从内陆运出，又把欧洲商品运进去，从中渔利。1841年，一份关于尼日利亚地区商站的调查报告是这样描述博尼人经纪人的：“博尼人不许内地土著把棕榈油运到海边。他们有很多武装小船，有许多小船都在船头上架起短

---

① Hargreaves, *op. cit.*, pp. 18 - 19.

② 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6—97页。

③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年》），Oxford, 1954, p. 17.



炮或铜制旋转炮。他们的船逆河而上,远达埃博埃去运油,他们向当地乡下人收购棕榈油时,所付的价钱极少,事实上,少到不足抵偿卖主采果和榨油所耗的劳力和费用……”<sup>①</sup>。如果不排除中间商,欧商的利润要受到严重影响。70年代,尼日尔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新词“搭线”(tapping),指欧洲商船越过中间商直接和三角洲地区的非洲人做生意。到1876年,“搭线”已成为三角洲地区的普遍现象。<sup>②</sup>

反过来,内地的非洲人对欧商的中介盘剥也很反感。一些非洲酋长力图避开欧商,直接将货物运往欧洲。如博尼酋长将棕榈油直接运往利物浦,这样可以多得50%的利润。奥约国王不仅利用班轮直接将油运往英格兰,甚至包下整条油船。<sup>③</sup>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奥博波国王贾贾。他曾公开宣称:“这个国家属于我,我不欢迎白种人。”尽管他出身寒微,但他的聪明才智却使他在油河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名声鹊起。他控制着自己所辖范围内的棕榈油贸易。欧商为了打破他的垄断,联合压价,想迫使他就范。他的回击更干脆:禁止臣民将油卖给欧洲人,直接将油运往英国。这一举动引起欧商的恐慌,他们强烈要求殖民政府介入。最后,英国领事用欺骗手法将贾贾逮捕流放。<sup>④</sup>在超额利润支配一切的时期,强权即真理。对这一点,曾先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供认不讳:“我们用不着讨论什么原则不原则……原则只有一个,当商人同当地酋长对各自的权利争执不下时,当地酋长就应该

---

① 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8页。

②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年》), Oxford, 1954, p. 206.

③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年》), Oxford, 1954, p. 122.

④ Dike, *op. cit.*, p. 182 - 202; 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2—229页。

被放逐。”<sup>①</sup>

当时这些商人的心腹之患却是自己的欧洲对手。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自由贸易的信条逐渐被抛弃,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公然选择了“为完成帝国主义政策所必要的保护贸易主义”(霍布森语)。19世纪70年代,法国和德国先后实行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也日益遭到怀疑,英国商人要求“公平贸易”。<sup>②</sup>这种争夺商品市场的关税战同样在非洲大陆上进行着。

在英属西非殖民地,自由贸易意味着对从马赛进口的烟酒实行高额关税,而对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实行低税。法国官员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不仅关系到我国的非洲属地财源,也可以说关系到我国和殖民地的经济效率的问题”。<sup>③</sup>英国殖民部官员还多次对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关税政策表示过分的关心,认为只有英商和法商享有“同样的贸易自由”,英国才不会有意见,并表示,“运用一切法律手段支持在非洲海岸和河流地区的合法贸易是这个国家的国策”。<sup>④</sup>当法国殖民政府占领了梅拉科里地区并对商品征收4%的税收时,英国西非总督表示强烈的关注。<sup>⑤</sup>

法国在关税战中采取了同等的措施。1877年,为了削弱英国棉织品的竞争力,以保护里昂制造商为非洲贸易生产的一种印度本地治里布匹,法国殖民政府在塞内加尔实行不同关税。商业利

---

①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37页。

② 详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卷,第317—323页。

③ C. W. Newbury, *Victorians, Republicans, and the Partition of West Africa*(《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共和主义者与西非瓜分》), *J. A. H.*, 1962, 3:3, p. 493.

④ 英殖民部文件 267、299、267、285,转引自纽伯利,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ed Documents 1786—1874*(《英国对西非的政策文件选集 1786—1874年》), Oxford, 1965, p. 130, 127.

⑤ *Ibid.*, p. 128.

益使列强的角逐日益加剧。法国海军殖民部部长在 1883 年一封信中提到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地区时说：“在研究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和商业情况之后，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有政治利益要保证；同时，从商业的利益考虑，应在英国人的地盘扩大我们的影响。”<sup>①</sup>当时，有人在参观了内地以后这样评价，“这些互相争斗的商站之间的持续斗争简直无法形容……举例说，在尼日尔河边的一个镇上就有 5 家公司建立了商站。”<sup>②</sup>1868 年，一位法国领事估计英法与西非的贸易总额占欧洲与西非贸易的 4/5。西非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地位也日渐突出。1863—1872 年拉各斯进口额为 383 255 英镑，出口额为 545 433 英镑；黄金海岸同期进口额为 223 578 英镑，出口额为 297 910 英镑。<sup>③</sup>

非洲酋长、中间商人和欧洲对手这三个障碍使欧洲人认识到，要排除障碍，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政治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国家决策机构，力促以直接占领殖民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从合法贸易到殖民瓜分似乎是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sup>④</sup>

## 二、向非洲输入火器

谈到合法贸易的扩大，不能忽略另一个因素，即火器的输入。在奴隶贸易期间，欧洲向非洲出口的商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为

---

① Stengers,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19 世纪末的殖民帝国主义：神话抑或现实》), J. A. H., 3:3(1962), p. 478.

② Dike, *op. cit.*, p. 209.

③ T. R. 格里哥利：“外国投资与技术传播：英国殖民非洲的例证”，载于 A. J. Koncza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ropical Africa* (《热带非洲经济史》), London, 1977, vol. 2, pp. 245—247.

④ 可参见李安山：《浅谈 19 世纪欧洲商业资本在非洲的活动及其对瓜分的影响》，《史学月刊》，1986 年，第 1 期，第 99—104 页；李安山：《资本主义瓜分非洲的内在因素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1 期，第 20—25 页。

商品等价物,如银币、贝壳、铁条、铜线和一些纺织品。第二类为奢侈品,第三类即为军事用品,其中包括大量火器。在奴隶贸易初期,葡萄牙、荷兰等国均有不许将火器输入非洲的禁令,但这一禁令很快被激烈的奴隶贸易市场规律所打破。随着军事贵族的兴起和火器的输入,战争的目的以不仅是为了扩张领土,而且成了获取奴隶的重要途径。

在1730年2月7日荷兰的泽兰商会董事会的会议上,西印度公司一位官员在关于黄金海岸的报告中提到:“大量不断由欧洲人带到这里的枪支火药在这些土地上的国王、王子和酋长中间引起了可怕的战争。这些人将战俘变为奴隶。这些奴隶立即被欧洲人以持续上升的价格买走……”。<sup>①</sup>

在17—18世纪的西非沿海地区,火器已成为大宗商品。以皇家非洲公司为例,在1673—1704年间,公司共出口火器59 596件,火药11 095桶。<sup>②</sup>到1730年为止,输入西非的枪支每年已达18万枝。从1750年到19世纪初,仅英国出口到西非的枪支每年为283 000枝到394 000枝之间。另外,每年约5万枝运到扎伊尔河口以北的卢安果海岸。据统计,其他欧洲国家运进安哥拉的枪支多达2 000万枝。<sup>③</sup>根据伊尼科里的计算,在1750—1807年间,英国向西非出口49 130 368磅火药,每年多达847 075磅。<sup>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在奴隶贸易时期输入非洲的火器并未从

---

① 泽兰商会董事会会议记录附件,1730年2月7日。转引自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第5卷,第107页。

② K. G. 戴维斯, Royal African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 纽约, 1975年, 第356页, 根据图表算出, 其中缺1677—1679, 1686—1687, 1699—1700年的数字。一说火器有66 000件, 参见R. W. July,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74, p. 207.

③ Lovejoy, op. cit., p. 106.

④ 伊尼科里:“进口西非的火器, 1750—1807年: 计量分析”, 《非洲历史杂志》非洲火器的论文专辑。但伊尼科里的这篇论文影响最大。

根本上改变非洲传统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尼日利亚著名史学家阿贾伊在分析奥约帝国的军事力量时指出,当时占据沿海地区的达荷美虽然拥有从欧洲进口的滑膛枪,但这并没有使其摆脱变使用传统武器的奥约帝国的统治。其主要原因是奥约的骑兵可保持在步枪的射程以外,当步枪手上子弹时,骑兵即可发起冲锋,以毒箭射杀对方。<sup>①</sup>

禁止奴隶贸易以后,火器的输入更为频繁,甚至基督教会也参加了引进军火的活动。1846年,基督教传教团进入阿贝奥库塔,随即向该地引进了火器。1851年,在传教团的坚决要求下,英国给予埃格巴6门野战炮,并派了一个海军军官教授使用方法。<sup>②</sup>火器也逐渐成为欧洲殖民者用来达到自己目的和控制当地政治局势的手段。

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初期,英国为了诱使非洲地方统治者废除奴隶贸易,曾多次以提供火器为条件。1817年英国与马达加斯加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即为一例。1816年12月21日,英国驻毛里求斯总督法夸尔派遣的由塞奇率领的外交使团访问马达加斯加。双方签订的条约中未提禁止奴隶贸易,法夸尔很不满意。他又派遣里斯蒂率团访马。当达拉马一世拒绝废除奴隶贸易时,里斯蒂开出了英方愿支付的补偿清单,其中包括每年交给马达加斯加100桶火药和100支英式滑膛枪。<sup>③</sup>双方于1817年10月23日签约。1841年英国特使哈里斯带着送给皇帝的火器来到埃塞俄比亚,双方签订友好通商条约。<sup>④</sup>

火器也成为殖民政府控制当地局势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

① Ajayi & Crowder, *op. cit.*, p. 183. Ajayi, *ed. op. cit.*, p. 779 - 780.

② Ajayi & Crowder, *op. cit.*, p. 204, 195.

③ *Ibid.*, p. 418 - 419.

④ 阿贾伊,《非洲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第6卷,第382页。

19 世纪上半期时,阿散蒂曾与英国驻黄金海岸的殖民政府多次发生冲突。为了削弱阿散蒂的军事力量,殖民政府曾多次禁止向阿散蒂输出火器。1863 年 2 月,阿散蒂国王克瓦库·德瓦与英国总督本杰明·佩因就遣返逃犯一事发生冲突。佩因预感到可能遭到阿散蒂入侵,立即命令英国各方面停止向阿散蒂输出军火,并要求当地荷兰总督协助禁止荷兰公司输出火器。荷兰总督以荷兰与阿散蒂有结盟关系为由,予以拒绝,但许诺保持中立。<sup>①</sup>

1870 年以后,各种高质量的火器如后膛枪、连发枪、机关枪和火炮都陆续引进非洲。这些先进武器比以往引进的火器威力更大。一些非洲王国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开始通过商业、外交和其它途径引进这些先进武器。

#### 第四节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sup>②</sup>

##### 一、塞内冈比亚地区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里,英国在非洲的政策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商人的影响。如前所述,欧商在非洲扩大业务时遇到了三方面的阻力,他们强烈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以确定对自己有利的疆界。二是英国纳税人的呼声。他们不愿看到政府将自己的钱花在远离本土并显得毫无关联的非洲殖民地,这使英国政府极力将殖民地的支出降至最低程度。三是政府的考虑。1807 年以后,禁止奴隶贸易已成为国策,英国力图争得其他国家的配合。这样,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始终受到上述三种因素的

---

① I. Wilks,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19 世纪的阿散蒂》), Cambridge, 1975, pp. 219 - 220.

② 主要局限于西非和东非、南非有另章叙述(见第 4 章)。

制约。

这一时期,英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塞内冈比亚、阿散蒂地区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1808年,英国政府接管塞拉利昂。为了禁止奴隶贸易,英国一方面在弗里敦修建海军基地,使之成为禁奴巡航军舰的港口,另一方面在塞拉利昂设立法庭审理被扣留的贩奴船只。由于获释的非洲人留驻塞拉利昂,殖民地人口至1822年已达22 000人左右。1816年查尔斯·麦卡锡被正式任命为总督。他的殖民扩张政策很快遭到批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行政费用大大超过了岁入,从而引起英国纳税人的不满。1821年,英国通过法令,撤消英国非洲公司,将此领地交给政府。这些领地,连同北纬20度与南纬20度之间的西非英国属地一起,都成了塞拉利昂管辖下的属地,麦卡锡成为英属西非的大总督。

早在1815年,英国殖民部派遣亚力山大·格兰特上尉率一支非洲军团分遣队前往塞内冈比亚沿海地区视察情况。格兰特于1816年4月23日与当地酋长签约,以每年偿付103根铁条(约值25英镑)的代价取得了班珠尔岛,并更名为圣玛丽岛。麦卡锡随之在岛上建镇,并以巴瑟斯特勋爵的名字命名。为了给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英商提供保护,英国决定在冈比亚河上游建立军事据点。1823年4月14日,英国以每年110枚西班牙银元的代价从累迈恩岛(后改名为麦卡锡岛)的酋长手中得到对该岛的统治权和征收关税权。<sup>①</sup>

1826年6月,塞拉利昂代理总督肯尼思·麦考利与冈比亚地区巴拉王布龙签订协定,巴拉王决定“将自古以来对冈比亚河及其全部支流、小河、小湾及河水所享有的绝对权、无限的权利、主权、称号和所有权”全部让与英国。1827年,英着手在巴拉角建造堡

---

<sup>①</sup> 小哈里·A·盖利,《冈比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1—116页。

垒,引起巴拉新王警惕。新王决定取消1826年协定。反抗英国占领的战争持续到1831年,史称“巴拉战争”。1826年协定曾将从西部的季纳克河起到东部的贾卡杜河止的沿岸地区的首段部分割让给英国。1832年经与巴拉新王商定,这一割让地区扩大到沿岸全部地区。<sup>①</sup>

1827年5月,格兰特又与布里卡马王签订协定,布里卡马王将全部领土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并保证不干涉英国直接管辖的地区。格兰特还取得布里卡马王统治区内酋长选举的批准权。后来,英方又与伍利王签约,以价值200枚西班牙银元的代价取得了法塔顿港。<sup>②</sup>英国殖民当局又于1850年和1853年与巴拉王和康博王分别签约,取得了阿尔布雷达附近地区和康博地区直接毗连圣玛丽角的一部分领土。由于这些协定涉及的领土有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导致了英法1857年协定的签订。这些协定确定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死后的两位继任总督(特纳尔与坎贝尔)与他一样致力于西非沿岸地区的领土扩张,而这些活动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首肯。

## 二、阿散蒂地区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

麦卡锡总督于1824年在与阿散蒂军队作战时被击毙。阿散蒂从17世纪末开始扩张,到19世纪初已成为西非强大的联邦帝国,控制着黄金海岸的全部内陆。联邦版图由宗主国阿散蒂、附庸国和保护国三部分组成。<sup>③</sup>1817年,仅宗主国阿散蒂的男子人口

① 小哈里·A·盖利:《冈比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117—118页,第131—132页。

③ Wilks, *op. cit.*, Cambridge, 1975, p. 43—49. 李安山:《阿散蒂王权的形成、演变及其特点》,施治生、刘欣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185页。



已达 36.2 万,根据推算全部人口为 100 万。<sup>①</sup>英国人以海岸角为基地、与芳蒂族联盟,逐步向沿海内地渗透,但遭到阿散蒂人的抵抗。1805 年,芳蒂族因收留了阿散蒂联邦的叛逃者而遭到阿散蒂军队的报复。入侵的阿散蒂军队与阿诺马博堡的英国人直接对垒。英国史学家费奇称“第一次有一个非洲大国向一个欧洲贸易大国挑战,争夺对双方都有重大关系的贸易边境上的优势。”<sup>②</sup>

直到 1826 年,英国人一直未能动摇阿散蒂的地位。芳蒂人虽然得到英国公司的援助,但无力抵抗阿散蒂人,英国、丹麦和荷兰人的堡垒更不可能与阿散蒂军队抗衡。惟一的办法是妥协。1817 年 4 月,英国商人公司派团访问阿散蒂首府库马西。双方于 9 月 7 日签订条约。条约规定阿散蒂与英国保持和平关系;阿散蒂人与英国公司及黄金海岸定居点管辖下的各非洲民族和平共处;一旦阿散蒂受到英国保护下的土著民族的侵略时,在英国总督调停前不得开战;英国任命一名驻库马西的使官。<sup>③</sup>

英国人一方面承认阿散蒂对沿海地区的主权,一方面鼓励芳蒂人与阿散蒂人为敌。阿散蒂人在签约后曾屡次遭芳蒂人挑衅。在多次向英总督抱怨无效之后,阿散蒂派出使团要求英总督和海岸角分别赔款。1820 年 2 月,英政府代表约瑟夫·杜波伊斯访问库马西,并于 3 月 23 日签订了新条约。条约规定阿散蒂国王及其酋长宣誓臣服并效忠英王;芳蒂族地区为阿散蒂统治范围。阿散蒂撤消对英国总督的赔偿要求,但坚持要海岸角赔款。<sup>④</sup>但这一条约未得到英总督和海岸角议事会的批准。双方关系丝毫未得到缓和。

---

① Wilks, op. cit, p. 87 - 88. 威尔克斯的推算方法根据 T. H. Hollingdworth, *Historical Demography* (《历史人口学》), Issca, 1969, pp. 227 - 321.

② J. D.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16 页。

③ G. E. Metcalfe,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英国与加纳:加纳历史文件 1807—1957 年》), London, 1964, pp. 46 - 47.

④ Metcalfe, op. cit, p. 58 - 60.

麦卡锡成为英属西非殖民地大总督后,于1822年3月27日来到黄金海岸。他决定与丹麦人和芳蒂人联盟共同对付阿散蒂人,这一计划并未奏效。冲突再起,在1824年1月的恩沙曼战役中,阿散蒂大败英军并击毙麦卡锡。1826年英军击退阿散蒂的再次进犯。当时英国政府在非洲的政策是尽量少卷入地区冲突。1827年,伦敦指示坎贝尔总督:英国在西非的属地不应扩张,不应与非洲民族结盟,以免被卷入当地纠纷,并命令他从黄金海岸堡垒撤回官员和驻军。<sup>①</sup>这样,1828—1843年期间,这一地区的管辖权交由黄金海岸商人理事会处理。

商人理事会在主席麦克里恩的主持下,继续推行领土扩张政策。1831年4月27日,麦克里恩与阿散蒂再次签约,芳蒂及其他沿海各地酋长分别作为缔约人或见证人签字。条约规定阿散蒂交纳600盎司黄金押金和两名王室青年作为人质,这些担保交由海岸角管理,期限为6年;各方准许自由贸易;登基拉等附庸国国王一律解除对阿散蒂国王的臣属义务。<sup>②</sup>阿散蒂虽被承认独立,但被迫放弃对沿海地区的统治。英国人以仲裁者和沿海地区保护者的身份将这一地区置于非正式的保护之下。1843年,英国政府恢复黄金海岸的统治。第二年,根据新颁布的英国国外管辖权法令,英国总督与沿海地区各总督签署“约章”(Bond)。约章并未授权英国干涉其内政,仅允许其参与司法工作。<sup>③</sup>1844年约章将麦克里恩所建立的保护关系以条约的形式正规化。从1844年到1874

---

①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1—262页。关于阿散蒂抗英斗争,可参见罗建国:《阿散蒂人民八次抗英武装斗争》;李显荣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重庆,1985年,第705—719页。M. Crowder, *West Africa Resistance: The Military response to Colonial Occupation*, London, 1971, pp. 19—52.

② Metcalfe, *op. cit.*, pp. 133—134.

③ 约章全文见威·恩·弗·瓦德:《加纳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6页。

年,凡签署约章的国家被称为英国的保护国。<sup>①</sup>

1850年1月,黄金海岸脱离塞拉利昂,组成单一的殖民政府。3月,丹麦人退出黄金海岸,英国以1万英镑购得其所属碉堡。1867年英荷互相交换领地,重新划分了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1871—1872年,荷兰将黄金海岸属地全部转让给英国。这样,沿海地区全部成为英国的保护地,为其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经过充分的准备,英殖民政府于1874年1月向阿散蒂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并于2月5日占领库马西。阿散蒂人被迫签订了赔款丧权的福梅纳条约,<sup>②</sup>至此,英国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征服。

英国向西非扩张的第三个目标是尼日尔河三角洲。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一地区在奴隶贸易时期相当活跃,因而成了禁止奴隶贸易的重点。其二,这里盛产棕榈油,因而成为欧商的争夺重点,拉各斯岛位于这一地区的要冲,成了英国人觊觎的目标。1827年,英国派一支海军分队驻扎在费尔南多波(今比奥科岛),专门负责追捕几内亚湾和贝宁湾的贩奴船。1849年英国任命比克罗夫特为驻贝宁湾和比夫拉湾领事。他不仅指挥对沿海河流的勘察,还伺机干涉三角洲地区的政治。

1851年12月,英国利用拉各斯岛的继承权之争派军舰干涉。拉各斯人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1852年1月1日,被英国人扶上王位的阿基托耶与英方代表签约。条约规定禁止从拉各斯向外国输出奴隶;英国有权使用武力在拉各斯及其辖地制止

---

① 关于约章的定义可参见J. B. 丹夸:“1844年约章的历史意义”,《加纳历史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3:1(1957),第3—29页。

② Metcalfe, op. cit. pp. 355—357. 条约共7款,主要为阿散蒂赔款5万盎司黄金,放弃附庸国的从属关系,放弃对埃尔米纳的统治权以及英国殖民政府关于碉堡的一切付款。

奴隶贸易；允许自由贸易；废除活人祭及其它陋习；准许自由传教。<sup>①</sup> 拉各斯人民并未屈服，并于 1853 年、1855 年和 1856 年先后举行起义。1861 年 6 月，英外交大臣指示拉各斯领事设法“把这个变相的保护国变为公然占领”。8 月 6 日，英殖民官员麦科斯科里和贝丁菲尔德与拉各斯王签署条约，将该岛“转让”给英国，作为英国持有主权的领地。<sup>②</sup> 吞并拉各斯是英向尼日尔河三角洲大肆扩张的开始。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领事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日益重要，这主要是通过领事调解条约达到的。废除奴隶贸易和合法贸易的扩大使这一地区的各种矛盾激化，各王国之间相互争斗。英国领事尽力使交恶各方接受自己为调解人，并促成交战双方签订和平条约，这种领事调解条约在博尼与新卡拉巴尔（1871 年，1879 年），奥博波与博尼（1873 年），新卡拉巴尔（1871 年）之间先后签订。<sup>③</sup> 英国领事通过这些调解条约逐步使这一地区成为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向内地渗透的通道。

### 三、东非沿海和岛屿地区

东非一直是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在东非统治的一个主要消极后果是破坏了原有的阿拉伯贸易网络，使东非沿岸变得十分萧条。直至 18 世纪，英国人对东非相当陌生。1792 年，利物浦商人指责东印度公司对开辟东非海岸货运方面毫无作为。直至 1799 年，一支英国舰队才第一次访问了桑给巴尔。桑给巴尔阿曼国君在赛义德素丹在位期间（1806—1856 年）逐渐

---

① 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附录三，第 474—476 页（条约全文）。

② 伯恩斯：前引书，附录四（条约全文），第 477—478 页。

③ 阿贾伊：《非洲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 年，第 6 卷，第 733—734 页。

繁荣并成为印度洋西部地区海运贸易的中心。

1822年英国派莫尔斯比访问赛义德索丹,以劝说他限制奴隶贸易,制止桑给巴尔向英属印度和英属毛里求斯输出奴隶。同年9月22日,双方签署了著名“莫尔斯比条约”。赛义德同意禁止向任何基督教国家出售奴隶,也不许他的贩奴船活动于德尔加多角以南和从第乌岬到索科特拉岛附近的航线以东海域。作为交换,英国承认他在东非的霸主地位。<sup>①</sup>这是赛义德与英国签订的第一个关于奴隶贸易的条约。条约须靠英国海军巡逻来强制执行。条约还允许英国任命一名代表驻桑给巴尔或东非地区以监督条约的执行。

赛义德在东非地区政治中的地位由于这一条约而增强,这引起他的长期对手蒙巴萨的马兹鲁伊家族的不安。1824年,马兹鲁伊家族与英国海军军官欧文联系,后者即宣布蒙巴萨为英国保护国,想以此作为禁止奴隶贸易的基地。这一举动由于与英国政府依靠赛义德的作法明显不合,保护国仅存在了两年。赛义德在阿曼的统治需要英国的帮助,英国乘机干预桑给巴尔的事务。1839年5月31日,英国代表科根与赛义德签订了第二个重要条约。除了双方赞成自由贸易、互派领事和确认莫尔斯比条约外,英国获得两项重要权利。英国人可在桑买卖和租借土地房屋;桑对英商品仅征5%的关税以代替其它税款;如非洲人和英国人发生争执,英国领事需决定(如果被告是英国人)或参与(如果被告是当地人)判决。<sup>②</sup>

1841年英国政府任命哈默顿为领事。他进一步对赛义德施加压力,从而促成了1845年条约(即“哈默顿条约”)的签订。这项

---

<sup>①</sup> R. 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东非及其入侵者》), Oxford, 1938. pp. 214-216.

<sup>②</sup> *Ibid.*, pp. 481-482.

条约禁止在桑给巴尔和素丹管辖的阿曼领土之间进行奴隶贸易。这实际上已将奴隶贸易局限在桑给巴尔和东非海岸之间,<sup>①</sup>然而,走私贸易仍然猖獗。<sup>②</sup> 赛义德去世后,其子马吉德在英国人支持下继位。当王位继承受到挑战时,英国出兵直接干涉,并于1861年使东非沿海地区脱离阿曼,成为独立的桑给巴尔素丹国。1870年巴加什继任素丹。1873年由前任孟买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率使团访问桑给巴尔,要求素丹禁止桑给巴尔地区的奴隶贸易,巴加什素丹断然拒绝。英国随之以诉诸武力相威胁,巴加什被迫于6月5日签订条约,在桑给巴尔禁止奴隶贸易。<sup>③</sup>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在这一地区已确立了控制。

英国还在非洲之角有所动作。它先后通过与塔朱拉和泽拉签约加强了在索马里沿海的地位。1841年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后,英国加强了渗透。60年代,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周围地区的外交活动引起埃皇帝的警惕,特别是英国人与埃塞俄比亚的对手苏丹的交往引起提奥德罗斯(也译为狄奥多尔)二世的强烈不满。他于1864年扣押了英国领事卡麦伦以示抗议。1868年英国派出由12 000名士兵装备着尚未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后膛枪来到埃塞俄比亚。提奥德罗斯二世兵败自杀身亡。英军撤退前,将12门重炮和752支滑膛枪及火药留给提格雷的卡萨(即后来登上王位的约翰尼斯四世皇帝),使后者在权力争夺中得胜。<sup>④</sup>

① Coupland, *op. cit.*, pp. 514—516.

② 贝思韦尔·奥戈特:“东非、非洲三角和邻近国家之间的人口变迁”;于贝尔·热尔波:“印度洋的奴隶贸易: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及如何进行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北京,1984年,第178—210页。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2—202页。艾周昌、郑家馨:《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91—513页;舒运国:《阿拉伯人与东非贸易》载于《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第99—106页。

③ Oliver & Mathew, *History of East Africa*(《东非史》), Oxford, 1966, vol. 1, p. 239.

④ 阿贾伊:《非洲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第6卷,第398—402页。

## 第五节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 一、几内亚湾与塞内加尔沿海内陆地区

法国有长期的殖民经验。早在18世纪,它曾建立起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帝国。后来,它将印度和加拿大的领地输给了英国,路易斯安那输给了美国,海地革命又使它失去了圣多明各。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才重新恢复在西非的活动。当时,英国正在西非海岸竭力禁止奴隶贸易,但拿破仑于1802年又恢复了殖民地的奴隶制。1815年2月,维也纳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黑奴贩卖的宣言;同年11月20日,英法巴黎条约再次阐明同一立场。<sup>①</sup>法国商人对此难以赞同。他们认为这是“英国私人利益和贸易天才两者结合”的表现,是英国人独出心裁用以摧毁法国殖民地的举措。<sup>②</sup>如前所述,法国奴隶贸易仍以“契约劳工”、“自由移民”的名日照旧进行。

这一时期法国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非(另章叙述)、西非和东非。法国对西非的染指可追溯到17世纪。1659年,法国诺曼底公司代理人建立了圣路易。1677年,法国海军将荷兰人赶出了戈雷岛。与此同时,法国塞内加尔公司与沿岸一些酋长签约后占领卢菲斯克和约尔等地,后来英法在此地多有冲突,直至1783年,双方签订第一个瓜分西非海岸势力范围的条约,英国给予法国“对塞内加尔河及其附近地区以完全的和无条件的占有权,包括圣路易、波多尔、戈雷、阿尔京和波滕迪克等堡垒”,以及冈比亚河的占有权。<sup>③</sup>拿

① 《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330、332—338页。

② 伊万·德巴什:《诗歌与贩卖:法国人对19世纪初黑人贸易的看法》,《法兰西海外史评论》,(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48:3—4(1961) pp.311—352。

③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7页。

破仑战争后,英国于1817年再次将戈雷和圣路易还给法国。

由于这些地区在法国大革命前已属法国管辖,法国革命的精神不可能对其毫无影响。1794年废奴法令宣告“所有居住在法国殖民地的人不论肤色都是法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1833年通过的法令又规定“法国殖民地的任何生而自由或法律上取得自由的人享有(1)公民权;(2)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1848年法国革命以后生于圣路易、戈雷、达喀尔和卢菲斯克的居民开始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投票权。<sup>①</sup>这可以说是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同化政策的滥觞。

这一时期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集中在两个地区:几内亚湾沿海与塞内加尔沿海内陆地区。1817年法国在圣路易和戈雷重建殖民地后,又于1826年、1830年和1832年分别与达喀尔地区酋长签订条约,获得了一些新领土和免税权。此后,塞内加尔总督普罗泰曾两次企图重新签约,未能如愿,法国在几内亚湾沿海地区的殖民活动主要是由布埃—维约迈(1843年任塞内加尔总督)等人以签约的方式进行的。

1838年,布埃—维约迈乘军舰在西非沿岸地区调查在塞内加尔与加蓬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他在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一带上岸后,与当地酋长签订了多种条约。这些条约允许他在今利比里亚的帕尔马角附近的加腊韦和卡瓦利河口以及阿西尼建立带有防御工事的常设商站。1839年初,他抵达加蓬,与当地国王昂舒韦·科韦·拉蓬雄博(习称“德尼斯国王”)签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加蓬湾南岸建立基地。<sup>②</sup>但这一地区范围狭窄,又是半岛。布埃—维约迈于1842年又一次来到加蓬。在德尼斯国王的协助

①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1928, vol. 1, pp. 947 - 948.

② 比尔;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1928, vol. 2, p. 224; 安德烈·拉蓬达·瓦尔克尔:《加蓬史略》,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41—46页。



下,他于3月18日与路易·昂吉莱·多韦国王签约,获得了加蓬湾北部的土地。1846年,布埃-维约迈再次来到加蓬。他与5位加蓬地方首领签约,签约人将所有土地全权租让给法国,由法国政府每年支付适当报酬。<sup>①</sup>

1848年2月革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对非洲殖民地有三重影响。第一,法国宣布所有殖民地的奴隶获得解放。第二,圣路易、戈雷等地的居民被授予公民权。第三,殖民扩张的势头暂时得到减缓,但仍未停止。英国这时也在几内亚湾地区积极活动。1849年约翰·比克罗夫特被任命为英王陛下驻贝宁湾和比夫拉湾基地以及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领事后立即拜会了阿波美(即达荷美)国王盖佐,就完全停止奴隶贸易进行交涉。法国商人雷吉斯的代理人在此也十分活跃。1851年7月1日,布埃-维约迈与达荷美国王签订通商友好条约。条约就法国船只的停泊税、减税权、法国遇难船只的处理、新兴的棕榈油工业的保护措施等做了具体规定。条约还对法国炮台所属领土的完整和法国传教士的自由活动作出保证。<sup>②</sup>1868年,法国驻维达领事又与达荷美签订条约,确认达荷美国王将科托努领地割让给法国。法国历史学家科纳万认为此条约是法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sup>③</sup>

法国对塞内加尔沿海内地的扩张发生在费德尔布总督任期(1854—1861,1863—1865)内。费德尔布先用4年时间征服了北部的特拉扎人,随后对辛-萨卢姆地区进行征服。早在1849年3月,辛布尔(Bur,意为“国王”)与法国人签定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应交纳年金和关税,布尔则为法商提供保护。条约并未给法国人

---

① 比尔:《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1928, vol. 2, p. 214; 瓦尔克尔:《加蓬史略》,山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92页。(条约全文)。

② 罗贝尔·科纳万:《达荷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75—478页。

③ 同上书,第489—491页。

贸易垄断权,布尔还拒绝了法国人建碉堡的要求。<sup>①</sup>费德尔布基本平定了北部后,于1859年5月对辛—萨卢姆地区发动突然袭击。法军在辛地区遭到阻击,但费德尔布烧毁了法蒂克村,伤亡150名辛战士。萨卢姆因国王新丧,无力抵抗,双方只好接受法国人的条件:让法国人垄断贸易;法国人有权购买土地;法国商人仅缴纳3%的出口税,他们只在法国人的法庭接受审判。<sup>②</sup>

法国人的渗透引起了辛布尔和萨卢姆布尔的不满和抱怨。1860年7月,辛布尔致信戈雷的行政官,要求保持其传统权力。1861年2月28日,法军再次出兵。先进攻萨卢姆,俘虏450人,劫掠了两个村庄,随后向辛进发。辛和萨卢姆只好与法国人签定条约。1856年的条约得到确认,辛和萨卢姆分别赔偿200头牛和500头牛。辛布尔给予法国人在法蒂克建立军事据点的权利,萨卢姆布尔将考拉克方圆600米的土地让予法国。<sup>③</sup>1871年辛布尔遇刺身亡。新任布尔萨努蒙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的。为了自身安全,他于1877年4月写信要求法国人提供保护。塞内加尔行政官康纳德乘机要求签订新约。<sup>④</sup>

在这一时期,卡约尔也受到法国势力的渗透。1859年卡约尔达梅尔(Damel,意为“国王”)与法签约,同意法修建联接圣路易与达喀尔之间的电报线,但遭到其继任者的反对。1861年法国总督率兵强行推举马卓卓酋长为卡约尔达梅尔。反抗力量于次年推举拉特—迪奥尔为卡约尔的统治者。双方相持不下。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由于国内危机和财政等因素,法国的殖民扩张再次受到遏制。法国被迫放弃象牙海岸的一些据点(如大巴萨姆、

---

① Martin Klein,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74—1914*(《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和帝国主义:辛—萨卢姆 1874—1914年》), Stanford, 1968, pp. 43—44.

② *Ibid.*, pp. 55—57.

③ *Ibid.*, pp. 58—59.

④ *Ibid.*, pp. 106—109.

阿西尼)。拉特—迪奥尔不失时机自立为达梅尔。1871年1月12日,法国总督瓦利埃尔与他签约。卡约尔成为法保护国。<sup>①</sup>

自1866年3月开始,法、英曾就冈比亚的领土交换问题进行了长达19年的谈判。法国先拟以大巴萨姆和阿西尼,后又提出以加蓬交换冈比亚。双方因各有打算,加之内部意见不统一,这一交换计划于1876年3月20日宣布停止。

## 二、东非和马达加斯加岛

法国在18世纪后期已成为东非奴隶贸易的参与者。法兰西岛(即毛里求斯)上的法国商人莫里斯于1775—1779年期间在基尔瓦基西瓦尼从事奴隶贸易。1776年9月14日他与基尔瓦素丹签订条约。条约准许他垄断该地的奴隶贸易,条件是向素丹上交收入的10%;素丹则许诺每年向他提供1000名奴隶。<sup>②</sup>1790年已有7艘贩奴船往来于法兰西岛与基尔瓦之间。<sup>③</sup>1777年,莫里斯曾向法国有关当局正式提出以基尔瓦为贩奴基地的建议。虽然留尼汪、毛里求斯不时从东非海岸进口奴隶,但莫里斯的建议似乎未被采纳。直到1817年,法兰西岛与赛义德统治下的东非恢复关系。1822年,双方签约,对奴隶贸易进行规范化。<sup>④</sup>

1844年法国在桑给巴尔设立领事。由于桑给巴尔素丹配合英国实施废除奴隶贸易的措施,法国人很不满意。他们此时醉心于在“自由移民”的幌子下进行奴隶贸易,向留尼汪种植园提供劳

---

① D. Forde & P. M. Kaberry, *We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世纪的西非王国》), Oxford, 1967, pp. 260 - 281; 比尔: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1928, 第1卷, 第911—912页; 阿贾伊: 《非洲通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9年, 第6卷, 第640页。

② Coupland, *op. cit.*, p. 76 - 78.

③ Oliver & Mathew, *op. cit.*, vol. 1, p. 155.

④ Coupland, *op. cit.*, p. 421.

动力。他们还向葡萄牙在东南非的殖民地提供奴隶。利文斯顿在赞比西河地区进行探险活动时,曾目睹了这种贸易活动:“法国拿破仑三世陛下想用从非洲招募自由移民的方法来弥补波旁岛劳动力的不足……这项政策导致了应受诅咒的奴隶贸易……我们看到……一艘又一艘独木舟,装满了戴着锁链的‘自由移民’从明甘德日地区沿河顺流而下。太特堡垒(葡萄牙人的堡垒)的司令员曾以讽刺的口气说道:‘如今,我们有法国国旗的掩护,你们再也不能来干涉我们的事务了。’”<sup>①</sup>

1844年11月9日,三艘法国军舰由罗曼·德斯弗赛率领抵达桑给巴尔。11月17日,法国与桑给巴尔素丹赛义德签订商贸条约。条约的绝大部分与1839年桑英条约相同,但有三款新内容。第4款规定法国对为其服务的阿曼素丹的臣民提供保护;第16款规定任何被其他人扣留并带到素丹领地的法国船只必须归还给法国领事;第17款授予法国人在素丹领地建立仓库的权利。<sup>②</sup>这实际上是对桑给巴尔司法权的干涉,并为法国进行奴隶贸易留下了漏洞。法国与英国在东非海岸的竞争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1862年3月13日,英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对新独立的桑给巴尔素丹国表示尊重。

19世纪初,法、英对马达加斯加的渗透加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不仅吞并了马达加斯加周围的留尼汪、毛里求斯和塞舌尔诸岛,而且占领了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所有领地。巴黎和约使法国重新获得马达加斯加的领地。英国曾在1817年两次与马达加斯加签约,并向马提供火器以对付法国和与法国结盟的部落。

---

①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来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1—202页,法国人在这一地区的非法奴隶贸易活动,还可参见奥立弗、马修:前引书,第227—229页。

② Coupland, *op. cit.* pp. 422—423. Oliver & Mathew, *op. cit.*, vol. 1, p. 223.

拉达马去世后，继位的拉纳瓦洛娜一世废除了与英国人签订的条约，并将英国传教士驱逐出境，1829年，法国人出兵远征马达加斯加东海岸，被彻底击败。1845年英法联军进攻塔马塔夫，又一次被击退。

为了达到兼并马达加斯加的目的，已取得马达加斯加王室信任的法国人拉博德和朗贝尔于1857年支持王子腊科托策动政变。政变阴谋败露，俩人就被驱逐出境。拉纳瓦洛娜一世女王于1861年去世。腊科托王子继位称拉达马二世，法国人又一次赢得他的信任。1862年9月12日双方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法国人获得种种特权。<sup>①</sup>朗贝尔在1855年从腊科托王子手上获取的开发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矿业和农业资源的特许状也获批准。此外，法国代表迪普雷还诱骗拉达马二世于9月28日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承认法国对马达加斯加某些领土的权利。<sup>②</sup>

拉达马二世丧权辱国的行径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国王于1863年5月12日被起义者杀死。其妻继位，称为拉索赫里娜女王。马达加斯加宣布废除1862年马法条约和朗贝尔特许状。法国人要求马达加斯加支付120万法郎作为赔偿费。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马达加斯加政府于1866年1月1日支付了全部赔款。法国只好于1868年与马达加斯加签订新约，宣布尊重马达加斯加的独立，并承认拉索赫里娜女王对全岛的主权。<sup>③</sup>

在1776—1876年间，欧洲最先进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处于全盛时期。欧洲在非洲殖民扩张的领土虽微不足道，但英法以禁止奴隶贸易或扩大合法贸易为旗号进行的殖民尝试却频频发生。

---

① 赖芒德·腊伯马南扎腊：《马达加斯加：马尔加什民族史》，三联，1958年，文件，第183—187页。（条约全文）关于这一时期马达加斯加的情况，可参见艾周昌、郑家馨：《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大，1995年，第514—533页。

② Ajayi, *op. cit.*, vol.6, pp.431-432.

③ *Ibid.*, pp.433-435.

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对非洲内陆领土的实际占领几乎没有进展,但各种传教活动和勘探活动(参见本书第8章)正在积极进行。第二,英法殖民者借反对奴隶贸易或保护自由贸易为名,在沿海建立了一些殖民据点,并试图深入靠近沿海的内陆国家,有时甚至直接诉诸武力。第三,殖民者与当地非洲首领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大致包括四项内容:禁止或限制奴隶贸易;允许传教自由或贸易自由;废除活人祭等传统习俗;接受欧洲国家保护或租借条件。第四,这些保护或租借条约多是欧洲军舰的展示或威迫下签订的。这种炮舰外交为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非洲开了恶劣的先例。

如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我们不要夸大19世纪初欧洲人在非洲的力量和1850年以前欧洲人取得非洲领地及向内地渗透的速度。<sup>①</sup>然而,我们决不可以忽略这一时期列强在沿海地区建立的殖民据点和保护国的意义,它们成为英法向内陆进行殖民扩张的基地,并为19世纪后期的殖民瓜分打下了基础。

---

<sup>①</sup> Ajayi, *op. cit.*, vol. 6, p. 7.

## 第七章 法国建立马格里布 (北非)殖民地

当时序跨进 19 世纪之时,欧洲现代生产力的兴起及其在广度上的迅猛扩张,日益形成了全球性的贸易交往,这种交往改换了世界性产业和劳动分工的格局: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的大经济—文化圈,一方面又用经济纽带把区域性文明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夺取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这一时期殖民主义列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维也纳会议后,法国逐渐恢复其海外殖民扩张势头,矛头首先指向阿尔及利亚;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法国资本主义文明,以其资源配置合理、经济效益较高,而在同阿尔及利亚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的较量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在侵占阿尔及利亚以后,法国的殖民掠夺方式,一方面取决于其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殖民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状况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殖民当局大量夺占当地人的土地,开办葡萄农场和各式种植园,或以法律形式使土地所有制个体化,其目的是“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

## 第一节 法国殖民征服战争的残酷性

### 一、对阿尔及尔的占领

“19世纪初,欧洲投下了威胁整个马格里布的阴影”。<sup>①</sup>同欧洲近在咫尺的马格里布国家不仅是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工业原料产地,而且其战略地位也日形重要,直接控制着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和邻近正在筹划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来说,“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sup>②</sup>为此,列强利用土耳其人的衰败,以“扑灭海盗”为借口,采取联合行动,旨在彻底消灭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格里布国家的海上防御力量,以便长驱直入。事实上,在19世纪初,马格里布海盗活动已是强弩之末,相反,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海盗活动却依然如故。一位法国商人甚至声称:“就算柏柏尔海盗都被消灭了,他们也会被捏造出来”。<sup>③</sup>1815年,美国海军打败了地中海上的阿尔及利亚海军。翌年,欧洲列强通过了“消灭海盗”计划,英荷联合舰队炮轰阿尔及尔城,并焚毁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军舰只。1819年英法照会突尼斯马哈茂德贝伊,声称:“如果两个摄政国(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对任何和平贸易采取对抗方式,那么它们将不可避免地招致欧洲列强的联合反对”。<sup>④</sup>1827年,随着突尼斯海军参加土耳其舰队镇压希腊民族独立运动,在纳瓦

---

① Miegé: Ahmed Bey du Tunis(《突尼斯的艾哈迈德贝伊》), 1976 Paris, p. 34.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2页。

③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vol. 6, p. 456.

④ Mustapha Kraïm, La Tunisie Précoloniale(《殖民地以前的突尼斯》)Tunis, 1973, p. 27.



里诺战役中覆灭，马格里布国家的国门终于被列强强行敲开。

在西方列强中，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野心尤为强烈。1798—1801年拿破仑侵占埃及时期，阿尔及利亚德伊政府曾向法国军队供应价值一百万利弗尔的小麦。从此，这块地中海型气候的百里沃土越发引起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觊觎。1807年拿破仑与沙皇讨论瓜分土耳其帝国时，双方就确定了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次年，拿破仑特派一名将军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海陆侦察，绘制军用地图，并拟定了行动计划，后因拿破仑出征西班牙失败，侵略阿尔及利亚的计划才告搁置。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欠阿尔及利亚的购粮债款至1815年已累计达1380万法郎。<sup>①</sup>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复辟王朝政府不但继续拖欠债款，还利用阿尔及利亚舰队被消灭之机，于1819年要求德伊承认它对拉卡尔附近部落的宗主权，并力图利用债务问题所引起的纠纷，伺机对阿尔及利亚发动侵略战争。当时正进行工业革命的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由于遭受1826年的经济危机，也渴望恢复法国近几十年在海外失去的殖民地和市场。

1827年4月间发生的“德伊用拂蝇拍击打法国领事”事件，<sup>②</sup>无疑加速了法国的侵略步伐。法国认为，“拂蝇拍事件”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随即命令海军上将科莱率领舰队前往阿尔及利亚，要求侯赛因道歉，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在其要求遭到拒绝后，法国断绝了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并开始封锁阿尔及利亚港口。

---

①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5页。

② 又称“德瓦尔事件”。1827年4月29日，阿尔及利亚德伊在气急情况下以拂蝇拍敲击赖账的法国领事，并拒绝为此事道歉（参见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2页）；另有一说，是用扇子击打了法国领事（参见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页）。

由于查理十世政府当时正穷于应付国内政治上的困境,而且为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又使法国舰队羁留远方,无法采取入侵行动。1829年8月3日,法国“普罗旺斯”号军舰遭到阿尔及尔炮台的轰击,使两国间业已严重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到1830年初,法国国内局势日趋紧张,查理十世决计通过发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以战争的胜利拯救复辟王朝。

1830年5月25日,法国舰队从土伦港出发,这支由645艘各种舰只和37600多名士兵组成的联合舰队由陆军中将希尔蒙和海军中将迪佩雷率领,于6月14日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费鲁希港登陆。侵略军遇到了德伊军队的顽强抵抗。6月19日斯塔乌埃利一战,阿尔及利亚军民以10000人的伤亡代价给予入侵法军以重创,法军伤亡近500人。6月29日,法军开始进攻首都阿尔及尔,并于7月4日攻占了皇家城堡,侯赛因被迫于次日签订投降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尔蒙曾保证“伊斯兰教仍得以自由活动,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信仰、财产和工商业不得予以任何损害,对他们的妻子应予尊重”,<sup>①</sup>但事实证明这些保证是极其虚伪的。法军占领阿尔及尔后,抢劫了皇宫,劫走黄金15000磅,白银22万磅,加上其它物品,价值总计达5500万法郎。<sup>②</sup>7月27日,侯赛因被流放,1838年死于埃及。

## 二、血腥的征服过程

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挽救复辟王朝灭亡的命运。其后建立的七月王朝继续推行征服、“保有阿尔及利亚”的既定政策。1830年11月,热拉尔内阁明确表示要把阿尔及利亚建

---

① 马尔塞·佩鲁东:《马格里布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0页。

②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成“一个重要的殖民地”。<sup>①</sup> 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法国军队在侵占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到处烧杀掳掠。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扬言：“应该容忍更进一步压迫和屠杀土著居民，蹂躏、放火、摧毁庄稼也许是巩固地建立我们统治的惟一方法”。<sup>②</sup> 曾经历过这场战争的陆军中尉圣阿尔诺在描述法军的进展时写道：“我们沿途焚烧了一切村落、一切乡村、一切农舍”。<sup>③</sup> 侵略者们割去被俘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耳朵，把掳获的妇女和儿童拿去公开拍卖，或者交换马匹。仅在1832年4月6日这一天里，侵略者便屠杀了12000名阿尔及利亚居民。<sup>④</sup> 克里斯吉安在《法属非洲》一书中对这场屠杀作了这样的描述：“遵照罗维戈总司令的训令，一个团的法军于1832年4月6日夜间接开了阿尔及尔城，黎明时分突然袭击了帐篷中酣睡的乌菲阿斯部落人民，屠杀了所有这些不幸的乌菲阿斯人，而他们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自卫。在这次可耻的出征归来时，我们的骑士把人头挂在长枪的一端，真可怕，有些女人带的镯子还戴在被砍掉下来的手腕上，耳环还挂在一块块的肉上”。<sup>⑤</sup> 恩格斯在1857年指出：“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sup>⑥</sup> 以这场屠杀为标志，法国殖民军队对阿尔及利亚由有限占领，开始转向全面征服，并着手建立直接的殖民统治。

---

①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页。

② 翟象乾：《法国侵略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③ 古柏尔：《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上卷第二册，新中华书局，第112页。

④ 翟象乾：《法国侵略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⑤ 马塞多·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45页。

⑥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04—107页。

## 第二节 移民活动和殖民土地政策

### 一、移民与土地掠夺同时并举

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整个过程中,移民活动和殖民土地政策是贯穿始终且相互关联的二个重要方面。在法军登陆后的第二天,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宣称:“这次军事征服阿尔及利亚基于迫切要求之上,这与维持法国,甚至欧洲公共秩序有重要和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我们的过剩人口,以及推销我们工厂的产品来交换由于我们的土壤和气候关系以致我们所没有的其它产品,为此必须开辟一个广泛的出口市场。”<sup>①</sup> 席拉尔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法国出兵阿尔及利亚的真实目的,即通过军事强力征服、吞并阿尔及利亚领土;通过实施大规模移民,发展各式种植园经济,把阿尔及利亚变为其农业基地和工业产品销售地,以此壮大法兰西民族,日后争霸世界。

为达成上述目的,大规模掠夺土地及向阿尔及利亚移民,便成为占领时期法国殖民政策的主要宗旨。在 1830—1873 年的 43 年里,法国殖民当局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国王敕令和议会法案,它们构成了殖民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点:(1)凡曾抵抗法国或“通敌”的阿拉伯人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2)过去属于德伊和贝伊的地产,以及原属于寺院的哈布地产,<sup>②</sup> 正式变为法国的国有财产;(3)凡在 1830 年 7 月 1 日以前无法以文件证明其所有权的无主地,均予以没收;部落未使用的轮休地,如果没有证明文件,也

<sup>①</sup> 《国际问题译丛》,1955 年,第 5 期。

<sup>②</sup> 哈布地产(Habous),即寺院所属地产,又称教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由于政府轻率地没收土地,加上捐税等重负,常常迫使私人占有者把自己的产业权转给宗教慈善机关,建立教田。

在没收之列；(4)氏族部落的土地应在每个家庭成员之间分配；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出让土地。通过以上种种手段，法国殖民当局掠夺了大量的土地。据统计，1850年殖民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15万公顷；1860年为36.5万公顷；1870年达到了76.5万公顷。<sup>①</sup>

殖民当局在大肆掠夺土地的同时，还向阿尔及利亚大量移民，以此作为其推行同化政策的重要手段。与同一时期英国向南部非洲移民形成对照的是，法国向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速度上，都远较前者为多，且更为迅捷。这主要是因为在地域上，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仅一海之隔，更为接近，而且没有其他列强的对抗性移民。法国大规模移民的目的是要在北非“再造一个海外国”，有学者甚至称之为“精确的复制”。<sup>②</sup>法国向阿尔及利亚的规模性移民计划因有其历史性通盘战略考虑，而直接受制于巴黎，殖民定居点也因此成为法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占领初期，移民计划因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而严重受挫，进展十分缓慢。殖民定居点主要集中于水源丰沛、土地平坦的沿海地区。毕诺元帅在1840年出任总督后，实行军事移民政策，使这一时期的移民计划走出了困境。这一政策的主要之点是强迫或诱使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期满的法国士兵留下来安家落户，并向他们提供土地。虽然毕诺的军事殖民计划也曾一度遭到过挫折，国内甚至有人将该计划讥讽为“愚蠢的农民兵计划”，但是这种战时能战、平时能耕，类似“军屯”<sup>③</sup>的军事移民政策，对于稳定占领初期的殖民统治

---

① 杨人鞭：《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② H. A. Wieschhoff: *Colonial Policies in Africa* (《非洲的殖民政策》), Philadelphia, 1944, p. 92.

③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为了防止暴动，除常备民兵外，土耳其人建立了被称为“茨马拉”(Zmala)的军屯区。军屯区经常得到阿拉伯和卡比里亚骑士的补充。移民从政府那里获得种子、马匹和枪支。豁免其土地税收，但是必须在该地区内服终生军役。他们通常在农村地区负责维护治安，并担任其他警察职责。

秩序,其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毕诺执政期间(1841—1847年),欧洲移民人口由3.7万人增至10.9万人。<sup>①</sup>到19世纪60年代,尽管移民人口的死亡率仍继续超过出生率,但法国始终没有考虑放弃移民计划。在政府的主持下,移民活动仍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到70年代,军事移民政策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口超过了南部非洲移民数量的总和。直至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巨大发现,这一优势才被涌入南非的白人移民所赶超。对此,阿尔及利亚史专家埃斯凯曾这样置评,称军事移民政策“在阿尔及利亚开创了欧洲居民安家落户的道路”。<sup>②</sup>毕诺把军事和移民活动结合在一起,加强了殖民者的安全感,促进了欧洲移民数量的增加,这对于加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直接统治,无疑是有利的。

## 二、移民势头不减的原因分析

然而也应看到,欧洲在进入近代后,由于人口猛增,可耕地有限,人口外流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农业生产商品化造成农村传统结构解体,在客观上为农民外流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欧洲传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是欧洲人口迁徙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法国殖民当局采取以大批移民来巩固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的策略,为此而出台的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政策,尤其是优惠的土地政策,对于失去土地的欧洲农民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据记载,1831年有大约40万名德国人和瑞士人要离开欧洲去美洲,法国当局获悉这一消息后,极力动员他们移居阿尔及利亚,并允诺为他们提供牲畜、种子和良田。为了安置从法国迁来的家庭,法国政府还在气候条件较好的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建造了许多庄园。为了鼓励更多的欧洲移民定居阿尔及利亚,1841年法国议会通过的殖

① A. J. Christopher: *Colonial Africa* (《殖民非洲》), New Jersey, p. 130.

②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页。

民法案规定,殖民者将无偿得到土地;由政府向他们提供牲畜、粮食、农具和贷款。结果,欧洲人纷至沓来。到1849年,移民人数达146 000人,仅1848年这一年,阿尔及利亚各港口就接待了2 500个欧洲移民。<sup>①</sup>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上升。随着法国在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势力的不断增强,移民逐渐转向突尼斯和摩洛哥定居。法国移入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数量在90年代开始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规模已十分有限的移民活动仍未停止,摩洛哥更多地成为移民的接纳国。据记载,到1959年,摩洛哥已有60万欧洲定居者。<sup>②</sup>

迁居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多数经营以出口为主导的各式种植园经济。在欧洲入的移民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大农场广泛使用当地的雇佣劳动,这种对当地劳动力的直接控制是除殖民以外,殖民主义统治的又一典型特征。

直到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农本经济国家,工业发展十分有限。在阿尔及利亚的农业经济收入中,葡萄制品(包括酿酒)占了农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一比例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农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极为明显。据记载,葡萄种植早在腓尼基人时代,就已传入北非,到罗马帝国时期,种植葡萄已相当普遍。7世纪以后,由于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sup>③</sup>葡萄生产渐渐缩减,只作为供应鲜果和制备葡萄干之用。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之后,极力扩大葡萄种植面积。1875年后,殖民者纷纷把葡萄园迁至阿尔及利亚。1888年阿尔及利亚的葡萄种植面积增加到

---

① [阿尔及利亚]卡迪尔·阿里:《阿尔及利亚地理:自然、人文、经济》,商务印书馆,第68页。

② A. J. Christopher: Colonial Africa(《殖民非洲》), New Jersey, p. 131.

③ 根据《古兰经》,酒、赌博、偶像、抽签是秽物,是魔鬼的行为,穆斯林要避开它们。

了 10 万公顷。

阿尔及利亚的葡萄酒远销欧美国家,其中主要是销往法国。尽管法国的葡萄酒产量在世界占据第二位,但阿尔及利亚生产的葡萄酒质佳醇和,深受法国人欢迎。因而,法国宁愿将自己生产的葡萄酒销售到非洲其他国家,而从阿尔及利亚进口葡萄酒。

阿尔及利亚的葡萄种植园经济是殖民主义“双重使命”体现的典型事例。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在世界酿酒业中的地位,体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作用。但是,阿尔及利亚葡萄酒会对法国的酿酒业构成挑战和威胁,这一点可能是殖民主义者起先在阿尔及利亚扩大葡萄种植面积时,所始料不及的。这种殖民经济的单一性也为“外围—中心论”者及世界体系论者在阿尔及利亚找到了明证。

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马格里布大量的土地被侵占和兼并。失去土地的当地农牧民被挤往气候和土壤皆很不利的南方;由于只能使用原始工具耕种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很低,难以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欧洲人农场庄园相抗衡,不少人被迫流落到城市,成为无产者;或到矿山为欧洲人做苦力。还有一部分人则跨海去法国打工,在法国经常有 30 万阿尔及利亚人,<sup>①</sup>形成了宗主国法国在本土大肆掠夺殖民地劳动力的奇特现象。这些 20—40 岁之间的阿尔及利亚青壮年男子多数在建筑、采矿、化工等部门出卖劳力。1948 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取消入境护照之后,移民法国的人数逐年增加,1962 年达 40 万人,1966 年则超过了 50 万人。法国的殖民统治政策所造成的失业,特别是庞大的殖民军所带来的破坏,是阿尔及利亚在取得独立后人口仍大批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

<sup>①</sup> 拉·马·阿瓦科夫:《法国垄断资本在北非》,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第 67 页。



### 三、掠夺性和“个体化”的土地政策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殖民政策中，尤以殖民土地政策最为关键。它是以“掠夺性”和“个体化倾向”为其主要特征的。在法国资产阶级心目中，建立土地私有制是“实现殖民地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殖民当局视当地人的土地公社所有制为“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趋向的形式”，把这一形式保留下来，无论对于殖民地或对于宗主国都是危险的。因而，法国极力通过法律形式使土地所有制个体化。议员居姆贝尔在1873年6月30日在法国议会讨论新殖民法案时，就公然指出：“提交你们讨论的方案只是要把一座建筑予以完善，这座建筑的基础已由一系列指示、命令、法律和参议院决议所奠定，它们全都是，而且每一种都是追求同一目的——在阿拉伯人中建立土地私有制”。<sup>①</sup>

法国鼓励或强制推行土地私有化，有两个方面的意图。第一，它是土地财产从土著居民手中进一步转移到殖民者手中的惟一途径。自1830年中占领时起，法国虽然实行各种彼此更替的制度，却一直在推行这一政策，方法虽时有改变，但目的始终是同样的：消灭土著居民的集体所有制财产，并将其转变为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土地最终转移到法国殖民者手中。第二，使之成为削弱经常处于暴动边缘的被征服部落的一种手段。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农牧民在外族入侵情况下，团结一致，共同对外。1832年马希丁领导的圣战和卡德尔领导的西部抗法斗争，使法国殖民政府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力量。

法国殖民土地制度的实施，其直接后果是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土地为欧洲移民所占有。大土地

---

<sup>①</sup> 科瓦列夫斯基所著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第97页。

所有者通过大量兼并土地,所有权不断扩大。(详见下表)

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所有权发展表 \*

年份	面积(公顷)	年份	面积(公顷)
1850	150 000	1920	2 581 000
1870	765 000	1940	3 045 000
1880	1 245 000	1954	3 028 000
1890	1 635 000	1963	0
1900	1 912 000		

\*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卡迪尔·阿里著:《阿尔及利亚地理:自然、人文、经济》,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9页。

到1935年,约15万名欧洲人占据着250万公顷的土地;而到1954年,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大约在2万4千名欧洲人手里控制着302.8万公顷的土地。在阿尔及利亚700万公顷的可耕地中,有50%归属法国,其中部分人的土地超过100公顷;除5%的土地为村庄和城市占用地外,其余45%属人口占90%以上的阿拉伯人所有,其中60%以上的农户土地不足10公顷。<sup>①</sup>

### 第三节 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

#### 一、殖民占领下社会结构的变动

直至19世纪初,欧洲通过劫掠或贸易与北非马格里布国家有着时而对抗、时而和平相处的关系。由于马格里布各国情况各异,欧洲扩张所造成的局而也是不一样的。阿尔及利亚最早成为法国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地化对阿尔及利亚社会制度、土地制度,以

<sup>①</sup> 卡迪尔·阿里:《阿尔及利亚地理:自然、人文、经济》,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4页。

及政治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已相应形成了特莱姆森、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等在非洲颇有名气的城市。城市生活因与货币、经济和基于书面文字的文化紧密相连,而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财富而言,城市也是阿尔及利亚社会最富有的地区。有些地区的贸易及手工业的发展已接近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然而,马格里布地区的城市也受到欧洲商业资本家的激烈竞争,后者垄断着该地区的制海权。著名学者 M. 切里弗在分析阿尔及尔等城市中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阿尔及利亚的城市生产力仍是传统型的,质量和效益较为低下,中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其商业利润增加到一定水平时,还要受到统治者的更大盘剥,他们通常只得与一些高级官员结成商业伙伴。由于中产阶级难以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极大地制约了其沟通海外贸易与乡间之间联系作用的发挥。殖民入侵前,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发展情况大体如此。

如同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村社制度<sup>①</sup>在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结构中,曾长期占据了支配地位。与城市相比,阿尔及利亚的乡村社会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技术手段,都保持着落后、自给自足的特点。乡村民众固守着以血缘关系为准则的父系家族结构。在血缘关系上,他们奉行“同胞兄弟”和“堂(表)兄弟”相互平等的原则。部落首领(谢赫)由各级酋长推选产生。人们共同拥有土地,在劳动中互帮互助。任何事情都从血缘和家谱世系的角度加以定夺,这种血缘关系的“神秘性大于真实性”——有时只认定某个始祖,自称是其“子孙”。

在文化的传承上,乡村仍沿用口头传说,以保持其世代相传的

---

<sup>①</sup> 关于非洲村社制度研究,可参阅徐济民的《试论黑非洲的村社制度》一文,(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该文对黑非洲村社制度的特征及其长期稳定原因所作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比较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与黑非洲国家村社制度的异同。

文化；在宗教方面，由伊斯兰教首领(马拉布琦)宣讲教义。

对于游牧部落来说，流动性使各“群体”时而联合，时而对抗。这些“群体”与其说是受血缘关系支配，还不如说受自然环境制约；抑或是出于维持整体平衡的需要。这种“群体”特征在城镇或集市影响所及的乡村地区，往往变得模糊不清或完全消失。

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城市在有形资产流通、土地租佃等方面，通过经济活动，而对乡村产生着影响。这表明带有从属性和剥削性等特点的社会关系已初步形成。在这些地区，“二八”分成制佃农已普遍出现。这种小农经济对部落群体或偏僻的山区来说，仍还是陌生的事情。

在19世纪初的马格里布地区，人们称国家为马赫曾(Makhzen)，执掌政权的高层官员称作马木路克。由于马木路克多数受过专门训练，且早年在宫廷和军队中服务，因而有着较为丰富的统治经验。他们从尚武的氏族中招募军队。这种集政治和军事于一身的政府形式，通过宗教与城乡的经济往来，行使着有限的统治权力。

在城市，政权依赖城市贵族的效忠，由他们提出地方总督人选，指定征税人、管事等；在乡村，则主要依靠乡村地区显贵家族的合作，并从这些家族中产生谢赫与地方村社首领。马赫曾政权通过宗教界的兄弟会向城乡百姓灌输服从政府的思想，从而有助于其权力合法化。在穆斯林统治地区，伊斯兰法提供了区域的面不是部族的一致性，它能左右人们对权威的服从；“这有利于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发展”。<sup>①</sup>可见，地方上贵胄士绅所给予的支持程度，不但决定着马赫曾政权的性质，实际上还决定它的生存机会。

与欧洲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相比，马赫曾这种封建

---

<sup>①</sup> 参阅 K·同萨雷·奥波库：《殖民地时代非洲的宗教》一文，载 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第420页。

性的统治手段,虽然很不完善,但在马格里布地区却行之有效。它是介于欧洲式与当地社会“传统方式”之间的一种调和。由于马赫曾政权力量集中于城市,对乡村影响比较薄弱,难以对村社制度形成结构性破坏。因而它也是内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的主要根源。

## 二、非洲大陆最系统的殖民统治制度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推出了一系列殖民政策,它们超过南非白人在19世纪制定的政策(见第10章),构成了列强在非洲大陆最系统、实施最早的殖民统治制度。这种统治制度以殖民土地制度为主导,对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统治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破坏作用。在经济上,以排斥和牺牲土著经济利益为前提,培植殖民性经济,从而使阿尔及利亚很快进入殖民地经济轨道。在政治上,通过构造新的权力结构,使阿尔及利亚社会形成了殖民地化的社会阶级结构,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变迁,法国的殖民总督取代了德伊政权。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解体及新的权力结构的产生,使得历来阶级泾渭不甚分明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加剧分化,并迅速形成了殖民地社会阶级结构。以法国殖民官员和移民地主集团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高踞社会顶层,构成了阿尔及利亚统治阶级的主要成份。

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初期,殖民统治大权完全掌握在法国军事统帅部手里。直属陆军大臣的殖民总督拥有军事指挥权和最高行政管理权。1844年2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各占领区设立阿拉伯局,负责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关的问题,其职能是征收捐税、办理案件,并负责监督酋长的活动。1848年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设置阿尔及尔、瓦赫兰和君士坦丁三个行省。各省分别设置由文官管辖的欧洲人居住区和由军人管理的阿拉伯人区。各省虽设有省长、议员等职位,并可选举产生出

席法国议会的议员,但是只有法国移民才能够享有公民权利,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正如1848年4月君士坦丁的一家法国报纸所承认的,殖民政府“对法国人是法国法律,对外国人是国际法,对土著人则是军事法律”。<sup>①</sup>1870年9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撤销了阿拉伯局,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所谓民政体制,表面上结束了军事统治,可是总督仍由军人充任,南部地区的军事管制直到1947年才宣告结束。

如前所述,在法国的殖民统治制度中,土地私有化制度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殖民前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生活中,以氏族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是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由于任何事情均要从血缘和家谱世系的角度加以定夺,这使得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决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决定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土地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氏族共有和不可转让等特性。

1873年土地私有制的建立,打破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土地共有制;土地私有化引发了土地的大量转让与兼并;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因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降低,而难以为继。土地私有制建立后,阿尔及利亚农村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农民,特别是分成制佃农(又称胡姆西亚制的种植者,<sup>②</sup>主要是“二八”分成制佃农)绝大部分变成了无产者,这构成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与此同时,包括短工和季节工在内的雇佣劳动者人数超过了200万。这支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大军栖身于阴暗潮湿的茅屋中,起早贪黑地劳动,在法国官吏和农场

---

① 翟象乾:《法国侵略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② 20世纪30年代初,分成制佃农总数是71.3万人;到50年代初,只剩下13—15万人。自己拥有土地的阿尔及利亚人在这一时期也减少了一半以上。可参阅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918—1967年》(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4—126页。

主的奴役下,受尽煎熬和屈辱,它们构成了阿尔及利亚逐渐成熟的民族革命的群众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失去土地的农牧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克拉尼暴动,以及持续7年半之久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在土地私有制及其所诱发的民族和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暴发的。

## 第四节 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殖民渗透

### 一、对突尼斯的殖民占领

法国一直试图以阿尔及利亚为出发点,建立一个东到突尼斯甚至利比亚,西到摩洛哥,南穿撒哈拉沙漠,连接中非和西非的殖民大帝国。随着1870年阿尔及利亚正式成为法国的“海外行省”,法国加快了实现帝国梦想的步伐。

19世纪60、70年代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深入发展时期,同时,它又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尖锐化联系着的”。<sup>①</sup>在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为了协调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列强于1884年在柏林召开了分赃会议,确立了“殖民地先占原则”。围绕掠夺奥斯曼帝国殖民地问题,俾斯麦极力讨好法国,以使法国在卷入殖民事业的浪潮中,忘记对德国复仇。他给法国外长沃汀顿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即趁土耳其衰弱时,夺取突尼斯。英国也在利用突尼斯与法国进行分赃交易。英国表示同意法国夺取突尼斯,以换取法国对当时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承认。<sup>②</sup>英、德的默许大大鼓励了法国对突尼斯的侵占。

---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8页。

② 关于突尼斯的国际地位,英法观点各异。对英国来说,突尼斯问题,主要是地中海中的一个政治问题;对法国来说,这首先要保证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安全问题。

法国把突尼斯看作是一个属于法国利益范围并接受法国统治的国家。茹尔·费里公开声称,突尼斯“在未来建立新秩序之前,应当被看作是法国资本的殖民地”。<sup>①</sup>到1880年为止,法国人在突尼斯已占有10多万公顷的土地,在突尼斯1.25亿法郎外债中,法国拥有1亿法郎的债权。但法国势力在突尼斯的加强,遭到了意大利的反对。意大利也早将突尼斯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在那里投入大量资本修筑铁路。当时,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已有1万多人,而法国居民仅几百人,意大利在移民的数量上颇具优势。

为了防止意大利捷足先登,法国于1881年4月派兵3.5万人侵入突尼斯,<sup>②</sup>进攻毫无准备的突尼斯人民。在比塞大登陆的法军包围了巴尔杜王宫,迫使突尼斯统治者签署了《巴尔杜条约》。根据条约规定,突尼斯由法军占领,并由法国代行一切外交事务。1883年6月,第二届费里政府又胁迫贝伊签订《马尔萨协定》,强迫突尼斯接受保护国条约,规定突尼斯统治者要进行法国认为必要的行政、财政和司法改革,并由法国人主持内阁。突尼斯在保护制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突尼斯施行的保护制,是由茹尔·费里设计的。其特点是在形式上有两个最高权力,即法国在突尼斯常驻使节所代表的宗主国权力和被保留下来的贝伊所代表的被保护国权力,但是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常驻使节”手中。费里认为,保护制既可以“不必在那里建立法国的行政机构”,从而节省大量财力、人力,又可避免“由两种不同文明的接触所带来的许多麻烦”,因此,这种间接统

---

① 茹尔·费里:《演说词与政见》第5卷,第133页。另请参阅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1861—18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85页。

② 即“赫鲁米尔人事件”。1881年2月16日,300名武装的赫鲁米尔人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为他们的一个族人报仇,该族人因偷盗牲口遭到阿尔及利亚人杀害。详见让·加尼阿热,上引书第585页及第167页的注解。



治的保护制优于直接兼并。<sup>①</sup>

法国在西非和东北非的殖民扩张,都是在另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在列强瓜分非洲的紧锣密鼓声中,法国政府“责成其驻非军队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因此,尽管议会没有通过多少关于扩张的议案,政府也很少就此发布命令,殖民扩张却一直在悄悄而又迅猛地进行着。在西非,尽管法国海军部一再反对进行新的军事征服,但是在负责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事务的副国务秘书艾蒂安的怂恿下,军官们“公然违抗命令”,于1889年2月率兵攻打了图库勒尔帝国的孔迪恩要塞。次年4月,阿尔希纳尔少校指挥法军攻占了帝国首都塞古,灭亡了位于塞内加尔河和尼日河上游的图库勒尔帝国。在东北非,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扩张势头也推动着法军在控制北部索马里的基础上,于1888年占领吉布提港,并将总督府由奥博克迁到那里。1896年,法国把以上在索马里的殖民地合并为“法属索马里”。

## 二、在摩洛哥角逐中法国占了上风

法国占领突尼斯后,便向摩洛哥步步进逼。然而,摩洛哥的情势远较突尼斯复杂。英、意、德、西班牙等殖民帝国均欲染指摩洛哥。摩洛哥改革受挫后,英国控制了其大部分的对外贸易。为了确保直布罗陀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防止法德相互勾结,英国提出由它占领丹吉尔,由德国在大西洋占领一处和几处港口的建议,以便联德制法。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虽微不足道,却一直在觊觎摩洛哥丰富的矿产和沿海港口,因而竭力怂恿法国扩张以防止英国和法国结盟,同时又在适当时机采取讹诈的方针。在列强的这场角逐中,法国最终占了上风。1900年春,法国占领了摩洛哥通

---

<sup>①</sup> M. 肖朗热:《历史文选:1871—1914年》,第一卷,第146—147页,另请参阅: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往尼日尔河的图瓦特绿洲。法国历史学家德里奥曾这样揭示殖民地瓜分与列强力量对比的对应关系：“在这场疯狂追逐地球上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强大的殖民势力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应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sup>①</sup>这正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问题上，依据力量折冲樽俎的真实写照。

通过两次换文，法国和意大利划分了各自在北非的势力范围，双方可以自由扩大在摩洛哥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的影响。<sup>②</sup> 1904年，英法签署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英国承认法国“为维持摩洛哥的秩序并提供为进行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的改革而可能需要的援助，英国将不阻挠法国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sup>③</sup> 同年10月，法国还同西班牙签署了在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德国对法国上述外交活动大为不满，声称法国旨在通过摩洛哥问题孤立德国。法德矛盾遂凸现出来。围绕瓜分摩洛哥所引发的法德争斗，是两国在欧洲矛盾的继续。两次摩洛哥危机是法德矛盾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的深刻反映。

1905年，法国向摩洛哥提出由法国组织摩洛哥沿海港口警察部队；由法国银行团组建摩洛哥银行，并要求摩洛哥苏丹把铁路和矿山租让给法国。德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作出反击，触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同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访问丹吉尔，宣

---

① J. 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1907, Paris, p. 299.

②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212—219页。

③ 同上书，第237—238页。

称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德国宰相比洛建议把摩洛哥问题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经过双方的外交努力,英、法、俄、西班牙、德国等国家,于1906年1月16日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国际会议。与会列强多数站在法国一边,德国陷于孤立。会议通过的总议定书承认摩洛哥名义上仍为“独立国家”,各国在摩洛哥享有经济上完全平等待遇;法国获得控制警察和边界海关的权利。

自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承认法国在摩洛哥享有“特殊利益”后,法国就加紧了对摩洛哥的侵略步伐。1907年3月,法国借口法国医生被暗杀事件,占领了摩洛哥东部的乌季达州;8月又借口卡萨布兰卡居民杀死法国建筑工人,强行在卡萨布兰卡登陆。1911年春,摩洛哥人民发动起义,反对法国入侵和素丹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同年5月21日,法国借口保护侨民利益,派兵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及其它城市,摩洛哥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

德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法国在摩洛哥的举动。法军占领摩洛哥全境后,德国报刊和殖民集团立即要求政府采取行动。7月1日,德国借口保护商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命令炮舰“豹”号开往摩洛哥大西洋沿岸海港阿加迪尔。这既是直接挑衅,也是以发动战争相要挟,“豹的跳跃”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就在法德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英国介入其中。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军舰停泊在阿加迪尔是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威胁,它不能容忍德国在直布罗陀附近建立一个海上基地。英国海军奉命进入战备状态。英德、法德矛盾空前紧张。

在英国满含杀机的强硬态度面前,德国退让了。1911年11月,法德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法国则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刚果领土(27万平方公里),以使德国能够进入刚果河流域。同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一样,阿加迪尔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英法关系,这是德国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最终还是发生了。

1912年3月,法国正式宣布对摩洛哥实行保护。但是,摩洛

哥人民的反抗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息过。从 1914 至 1918 年,法国的将军们称摩洛哥为“第二防线”,可以想见摩洛哥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激烈程度。

至此,除利比亚和摩洛哥北部一小块地区为意大利和西班牙侵占以外,马格里布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 第八章 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力量对埃及“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和埃及殖民化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 18—19 世纪之交英法殖民扩张争夺的焦点。如何理解拿破仑法国对埃及的三年占领所起的 *regenerating* (重建、再生) 的作用 (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 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剑桥非洲史》第 5 卷主编弗林特认为拿破仑对埃及的三年占领“启动了北非的现代化运动”。<sup>①</sup>其后一百多年的埃及历史进程表明: 1838 年的《英土商约》以及列强对中东地区的殖民争夺如何促成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败和埃及殖民化的开始。埃及的例子说明, 19 世纪“外围”国家现代化努力失败和殖民化的必然性, 尽管由于殖民列强争夺的激烈和复杂性, 使埃及殖民化带有迥异于非洲大陆其它国家的特点, 甚至在殖民化过程中还被戴上“共管苏丹”的“桂冠”。

---

<sup>①</sup> J. Flin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London, 1976, vol. 5, p. 1.

## 第一节 拿破仑入侵埃及

### 一、法、英争夺中东殖民霸权

从1517年以来,埃及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18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雅内萨里兵团(近卫军)与城市手工业者的同盟被破坏,以阿里贝伊为首的马木路克集团东山再起,奥斯曼土耳其任命的埃及总督大权旁落。马木路克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包税人。他们主要以农业税收为主。由于他们抽取过高土地税,导致农业凋弊,而他们对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百般压榨,也使手工业和商业日益衰退。埃及进出口逆差不断扩大。到1783年,进口为834 451 205皮亚斯,而出口为774 809 459皮亚斯,亏空十分明显。<sup>①</sup>而逆差又主要发生在对欧洲及红海的贸易方面。18世纪后半期,从欧洲进口的货物日渐增多。其中法国等国的纺织品已对埃及国内的纺织业构成了严重冲击。马木路克集团的政治统治也十分腐败,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内战不休。18世纪末整个埃及呈现出一片悲惨景象。游历过埃及的法国人异口同声地说:“埃及正在走向死亡,埃及正处于垂死之中。”<sup>②</sup>拿破仑入侵埃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与英国争夺霸权。埃及位于亚非两大洲的交界处。东临红海,由此可以南出阿拉伯海进入

---

① Afaf Luft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

② Jean and Simonne Lacouture, *Egypt in Transition* (《转变中的埃及》), Methan & Co. Ltd. 1958, p. 41

印度洋,北临地中海,向西可通大西洋。拿破仑曾指出,埃及“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sup>①</sup>虽然自从15世纪末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开辟以来,它的地位大大降低,但仍十分重要。法国早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时代就曾覬覦这块宝地。18世纪英、法在全球(包括埃及)的商业争夺日趋激烈。1775年马木路克与英国签订了通商和航运协议,巴黎认为这损害了法国的利益。1798年督政府时代的法国决定对反法联盟中惟一没受重大挫折的英国进行一次沉重打击。法国曾计划直接登陆英国,鉴于海军力量薄弱,拿破仑力劝督政府改取入侵埃及。他要惩罚只愿意同英国贸易的马木路克。更重要的是意图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堵塞它肮脏的财富的来源。”<sup>②</sup>拿破仑还设想下一步率军“用四十天时间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英国压迫的锡克族教徒、马拉塔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sup>③</sup>他在入侵埃及之后的1799年1月25日还曾写信给印度迈索尔王公铁普素丹,以谋求联合对付英国。而骨子里他在想:“在法国统治埃及的同时,也将统治着印度斯坦。”<sup>④</sup>

除了直接打击英国这个最主要的政治动因外,入侵埃及也有很强的经济动因。拿破仑期望埃及和中东各地为法国提供谷、砂糖、棉花、靛蓝等农作物和工业原料,同时为法国商品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他还期望开凿苏伊士运河,打通到东方的道路。

英国作为争霸的另一方,对埃及形势也一直十分敏感。其实,早在1795年为夺取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英国已经制订出和法国相似的计划。法国舰队在地中海的动向把纳尔逊的英国舰队

---

① 《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第22页。

② 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97页。

③ 《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第40—41页。

④ 同上书,第40页。

引入了地中海,最终于1798年8月1日在阿布基尔湾摧毁了远征埃及的法国舰队。而在法国占领红海北部的同时,英国于1790年占领了红海南端,在丕林岛上建立了军事基地,1802年又把它迁到亚丁。<sup>①</sup>英国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在印度的殖民帝国利益。由此可见,拿破仑入侵埃及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反映了世纪之交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激烈的殖民争夺。

拿破仑的远征军“共计步兵二万四千三百人,骑兵四千人,炮兵三千人,非战斗人员一千人。远征军总共有三万二千三百人。”<sup>②</sup> 远征军主力于1798年5月19日自土伦港启航,7月2日法军已经冲上了亚历山大的滩头。法军很快攻占了亚历山大并急速向开罗挺进。7月21日在开罗对岸的因巴巴的决定性战役中击溃了马木路克骑兵主力(这一仗通称为“金字塔战役”)。当时领兵前来的实力派人物之一穆拉德贝伊败退上埃及。另一个躲在开罗观望的易卜拉欣贝伊则逃奔叙利亚。法军于7月24日占领开罗。这是1415年葡萄牙第一次占领摩洛哥休达城后,西欧殖民国家对北部非洲的第二次较长期的占领。此后,拿破仑又派德塞将军远征上埃及,追歼马木路克。而他自己于1799年2月亲率军队越过西奈攻入叙利亚。自3月2日起围攻地中海沿岸战略要塞阿克城,在英国支持下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阻止了法军的东进扩张势头。1799年6月24日拿破仑率军撤回开罗。不久,法国国内动荡不安的消息传到埃及,急于回国一试身手的拿破仑便秘密启程回国,临行前指定克莱贝尔统帅全军。克莱贝尔于1800年6月被刺后,远征军的指挥权就转到梅努将军的手中。

拿破仑及其部将在埃及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法国的

---

①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 27.

② 前引《拿破仑文选》(下卷),第22页。



殖民统治。他十分注意宗教问题,以讨好伊斯兰教的姿态来拉拢北非、西亚的穆斯林。1798年7月2日占领亚历山大当天发布的文告《我们是真正的穆斯林的朋友——告埃及人民书》中宣称“我是来恢复你们的权利和惩罚那些篡夺者的。我比马木路克更尊敬真主,尊敬他的先知和《古兰经》。”<sup>①</sup>拿破仑在开罗还装模作样皈依了伊斯兰教,身着穆斯林服装到清真寺做礼拜。他还培植宗教团体“乌莱玛”,拉拢宗教势力为他的殖民统治服务。他还设立咨议机关——迪万,并于1798年10月初在开罗召开了由驻守各地的法国指挥官指派的代表参加的全埃及国务会议(大迪万),想以此作为联络、沟通法国占领军与埃及民众的一个渠道。除此之外,他还鼓励法国军人与埃及妇女通婚。第三任远征军司令梅努就娶了一位埃及姑娘,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没收逃亡的马木路克的土地财产之后,拿破仑废除了原来的包税制。但为了养活庞大的远征军,拿破仑横征暴敛。1798年7月28日,拿破仑召开国务会议,命令各大城市商人缴纳巨款:开罗摊65万多银币,亚历山大港30万法郎,杜姆亚特15万法郎,腊席德10万法郎。<sup>②</sup>同时还向各行业的商人摊派。除此而外,拿破仑还强迫埃及人民供给全部军粮,缴纳各项实物税。而法军打砸商店、肆意抢劫的暴行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人侵都激起了埃及民众的强烈愤慨。奥斯曼素丹发出对法国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号召(奥斯曼帝国于1798年9月正式对法宣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98年10月20日法国当局颁布新的税收法令如火上浇油,直接引发了开罗人民第一次大起义。但在残酷镇压下这次起义很快宣告失败。起义中心艾资哈尔清真寺,这座阿拉伯—伊斯兰的文明瑰宝几乎被法军的炮火轰毁。拿破仑露出狰狞面目,下令处

<sup>①</sup> 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7页。

<sup>②</sup>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19页。

死反抗者，开罗人民被杀害达四千多人。处境日益艰难的法国远征军在别有用心的英国的调停下，于1800年1月24日与奥斯曼土耳其达成了“阿里什和约”，规定法军限期撤出埃及。但双方纠纷不断，最终法军突袭了土耳其军营。这激起了开罗人民第二次大起义。这次武装起义持续了52天，是法军占领时期埃及人民最英勇、最壮阔的一次反侵略斗争。<sup>①</sup>在埃及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法国远征军已无力抵抗英土联军在1801年3月的进攻。8月梅努投降。10月按协议法军乘英国军舰离开埃及。法军对埃及三年多的军事占领宣告终结。这是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对非洲大规模军事占领的预演，实际上开始了盛行于其后一百多年的殖民主义地缘政治的实践。

## 二、殖民使命的扭曲

拿破仑入侵是资本主义时代殖民主义性质的侵略，它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也要看到，这次带有大批法国科学家的异乎寻常的人侵结束了埃及几百年来的封闭状态，给埃及带来了新的气息。

拿破仑远征军有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由四名法国科学院院士和上百名各学科的著名学者组成。拿破仑为他们在开罗成立了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罗塞塔石碑等重大考古发现为埃及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没有创造一个新埃及，然而却打开了古代埃及的大门。”<sup>②</sup>法国学者的科学研究与创办印刷所、报纸，兴建图书馆，开办医院等工作给埃及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影响，也为埃及与法国之间搭上了

---

①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第51页。

② 晏如：《拿破仑与〈埃及方志〉》，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史》，1994年第6期。

一条精神和文化的联系纽带。

为了满足海外孤军的供应需要,法国人在埃及兴办了一批工厂,炼铁,制造火药、衣服,引入了水力机械和欧式的风磨(后被称为“波拿巴磨坊”)。拿破仑军队使马木路克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加速了它的衰落,客观上为穆罕默德·阿里上台准备了一定条件。法国当局关于政权建设、发行货币的想法,土地改革的方案以及科技文化措施都为后来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提供了借鉴。拿破仑制定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与实际勘测,对半个世纪后的运河工程也有重要影响。

“拿破仑 1798 年对埃及的入侵是 19 世纪早期殖民战争中的第一次,并且从许多方面上讲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sup>①</sup>拿破仑这个法国资产阶级的先行者曾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颇有历史感地表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是极端重要的。它将对商业和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伟大的革命将以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指入侵埃及——引者注)作为它的发端。”<sup>②</sup>拿破仑入侵埃及时间虽短,但却是埃及历史进程的一次断裂。它把埃及卷入了国际政治舞台,而且使“这个国家获得中东战略和外交中心的现代地位”。<sup>③</sup>埃及问题由此也成为整个“东方问题”的一个新热点。英、法直接争夺的局面成为影响埃及近现代历程的重要因素。埃及殖民地化的阴霾也日益浓厚。

但拿破仑入侵埃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在近代殖民主义的炮声中,这个沉睡的古国苏醒过来了。它所诱发的民族觉醒的潮流

---

①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 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 77.

② Jean & Simonne, *Egypt in Transition* (《转变中的埃及》), Methan & Co. Ltd. 1958, p. 39.

③ J.E. Flin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University ed. Press, 1985, vol.5, p.19.

和现代化的潮流也在日益成长壮大。殖民地化与民族独立、现代化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两条岔道,前一个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人间惨剧,后一条则孕育着新生。此后半个世纪埃及就在这个岔口上踟蹰。

## 第二节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列强 预下的失败

### 一、在殖民渗透下的改革

法国远征军撤出后,英军一度驻留埃及。由于法国的极力反对,在签订了《亚眠和约》后才于1803年3月撤出。此后埃及处于土耳其军队、马木路克势力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部队的争夺之下。穆罕默德·阿里在权力角逐中纵横捭阖,脱颖而出,最终迫使土耳其素丹承认他为埃及总督,并赠与帕夏称号。埃及在他的统治下实际上取得了独立地位。此后,埃及军民粉碎了1807年英军的再次进犯,取得了两次腊希德大捷。穆罕默德·阿里又消除了伊斯兰长老的威胁,1811年3月于萨拉丁城堡斩尽杀绝了开罗的马木路克,并进一步清剿了盘踞上埃及的残余势力。穆罕默德·阿里逐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开始了气势恢宏的改革。

在政治上,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行政制度,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在经济改革中,他先是抓了农业,没收了马木路克的土地和大部分宗教地产。除了王室大量占有及分封给少数民族军官、官吏(包括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和土耳其族)和地方权贵外,他也把近一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同时兴修水利,改良作物品种,统一赋税,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在工业上,他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发展纺织业、军事工业和其它民用工业。据统计,到1838年穆罕默德·阿里用于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至少达1200万

英镑。共创办数十个工厂,仅纺织厂就有近 30 家。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埃及人已有 3—4 万,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 1%,<sup>①</sup> 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穆罕默德·阿里还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改革货币制度,发展国家垄断贸易,使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在军事方面,从 1820 年起,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创建一支西式新军,并致力于建立强大的海军。在教育上,他第一次把学校教育与世俗教育分开。除开办中小学校之外,他还建立许多专科学校,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在 1826 到 1847 年间,200 多名学生以“教育使团”的名义被派往国外。<sup>②</sup>他还创办印刷厂、报纸,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统治下的埃及综合国力大增,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惟一有生命力的部分”。<sup>③</sup> 随国力、军力的增长,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先后于 1810—1818 年对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1820 年后对苏丹、1825 年对爆发起义中的希腊、1831 年后两次对奥斯曼土耳其本土进行战争。穷兵黩武的政策严重损耗了埃及的国力,动摇了改革的根基。

总的来说,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地主贵族集团进行的改革,它的目标是在中东建立起强大的封建王朝。即使在最富于时代特色的工厂制度中也还采用农奴式的工人劳动。其它各项措施也都印有鲜明的封建主义的烙印。但难能可贵的在于穆罕默德·阿里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潮流。他承接拿破仑在埃及三年所兴办的一些现代化措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企业。在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显示出效仿西方、虚心进取的长远眼光。因此

---

① C.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1966, p. 362. 转引自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47 页。

② J.E. Flin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p. 2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第 222 页。

马克思赞誉他是“惟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sup>①</sup>他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改革和重新统一埃及、建立高度集权国家的过程相伴随,是在埃及民族历史进程被打断后猝然发生的,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于是不彻底性也就有着历史必然性。他的工商业独占政策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考虑,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在19世纪上半叶的北非西亚地区,崛起这样一个具有近代雏形的国家,即使仅作为防御殖民主义飓风南下非洲大陆的挡风墙,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二、殖民干预导致改革失败

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年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也还不断进行着。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只需纳3%的关税;本国商人反而要缴更高的关税,按规定,穆斯林要缴4%,非穆斯林要缴5%。<sup>②</sup>1840年,在亚历山大仅有6家大型的埃及商业公司,而外国则有44家。同时期在开罗只有63个土耳其和埃及小商人。<sup>③</sup>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开始沦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市场的外围部分。埃及的农业由自给自足型开始逐渐转变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出口型。穆罕默德·阿里从希腊引入了1500名农业技工,建立或扩大了亚麻、鸦片、橄榄和蔬菜的种植园。<sup>④</sup>在欧洲棉纺织业对优质原料巨大需求的刺激下,埃及的长绒棉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迅速成为埃及的主导农作物。早先一年产量大约7000吨左右,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第222页。

② 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凯里等,《穆罕默德·阿里国家的建立》,开罗,1948年,第280页;转引自杨颖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③ 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埃及:寻找政治共同体》),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31.

④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p.111—112.

1813年已比过去高4倍,到1839年,已达50 000吨。<sup>①</sup>桑树的种植,蚕丝的产量也在扩大,1839年埃及大约出产了600 000千克蚕丝。<sup>②</sup>

纵然在改革年代,西方对埃及的渗透已有很大的进展,但英国远不满足。穆罕默德·阿里的贸易垄断政策使欧洲商人不能直接收购工业原料。而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也使欧洲商品无法打开埃及市场。拿破仑时代之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迫使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努力开拓海外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被迫要靠“黑人、棕色人以及穆斯林世界所需求的衬衫”才能过活。<sup>③</sup>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政治和商业结合得更加紧密的英国政府已准备为保护和扩大商业而战。<sup>④</sup>1837年调查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政策的约翰·鲍林爵士曾露骨地说:“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一个由于其统治者的无事生非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的。”<sup>⑤</sup>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告诉俄国沙皇,英国在将来瓜分土耳其时,愿意得到的正是埃及,“英国不能容许在那里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府,它足以阻塞英国贸易的道路,拒绝让英国运输船只通过。”英国国务大臣帕麦斯顿承认对穆罕默德·阿里有偏见,不公平,但又辩解道:“欧洲的巨大利益要求我们应当那样做。”<sup>⑥</sup>

---

①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112.

② *Ibid.*

③ Araf Luft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36.

④ Araf Lufti al-Sayyid Marsot, *op.cit.*, p.235.

⑤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0页。

⑥ Araf Lufti al-Sayyid Marsot, *op.cit.*, p.240.

埃及的强大是西方不愿看到的,而她的独立和扩张更是西方列强所不允许的。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毁了前去镇压希腊起义的埃及联合舰队。“埃及的统治者被提醒:东方问题本质上是个欧洲问题。”<sup>①</sup>第一次土埃战争(1831—1833)中,英法曾强迫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向伊斯坦布尔的进军。当这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1834年出现彻底独立的迹象时,穆罕默德·阿里受到警告:此举将会给他带来毁灭性后果,列强不会容忍那样做。<sup>②</sup>1838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决定宣布埃及和叙利亚独立,英法又一次坚决反对。英国决定摧毁埃及的垄断体制来挖掉穆罕默德·阿里的财政基础。英国于1838年劝诱土耳其挑起了第二次土埃战争,结果1838年6月又重演埃军大获全胜后直逼伊斯坦布尔的一幕。为防止埃及控制两条通向印度的商道(一条经红海,一条经叙利亚、波斯湾),阻止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建立起垄断制度,并遏制一个与法国有密切关系的强大埃及崛起于东地中海,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土耳其,英国于1839年7月27日联合俄、普、奥、法要求土耳其停止与埃及的谈判。1840年7月15日,英、普、奥、俄、土五国签定“伦敦条约”,发出最后通牒,对穆罕默德·阿里作出极其苛刻的限制。在法国中途妥协与英国兵临城下的武力压迫下,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屈服。根据1840年“伦敦条约”和1841年素丹敕令,他只保留了对埃及的世袭权和对苏丹的终身管辖权。他还不得不接受了《巴尔塔里曼条约》,取消了垄断政策和保护措施,军队也由20万被迫削减到1.8万。结果使失去保护和财政支持的工厂在外来商品冲击下一蹶不振,而工业原料被恣意掠夺。改革最终失败,丧失完整独立主权的埃及在经济

---

① Magali Morsy, *Norrb Africa 1800—1900*(《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 109.

② Araf Lufri al-Sayyid Marsot, *op. cit.*, p. 237.



上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第三世界历史上力求避免西方侵入、控制,争取民族政治、经济独立,进行初步现代化的最早尝试,它的失败是民族独立自强运动的重大挫折,也是19世纪东方地区在殖民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压迫下难以迈上现代化道路的明证。埃及的殖民地化从此迅速加深,埃及争取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目标要经过更艰难、更曲折的道路。

### 第三节 阿巴斯和赛义德时期 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 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的阿巴斯(1848—1854)和赛义德(1854—1863)统治风格不同:前者思想保守,拒绝学习西方,想息事宁人,却缺乏抵制西方的对策和实力;后者自幼受西方文化熏陶,鼓吹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他们的政策和方针不同,但结果却都是让西方的渗透和控制不断加强。阿巴斯时代,棉花出口量由1849年的257 510坎他尔增加到1852年的670 129坎他尔。<sup>①</sup>赛义德当政时期,棉花产量由1854年的477905坎他尔增至1863年的1181888坎他尔,增加了1.5倍。<sup>②</sup>同阿巴斯时期一样,这些棉花也几乎全部出口,主要输往英国。美国内战期间是埃及棉花生产的黄金时代,埃及日益走上单一种植制的发展道路。

1851年7月阿巴斯与英国签订了修建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

---

① 穆罕默德·法赫米·卢海泰:《埃及近现代经济史》,开罗,1944,第213页。转引自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115页。

② 拉西德·阿里·巴拉维·穆罕默德·哈因查·马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三联书店,1957,第104页。

的协议。这是西方列强在埃及也是在非洲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赛义德时代,埃及的主要银行机构和商业机构都被外国资本家攫夺,其中主要有1856年英国在埃及开办的“埃及银行”以及尼罗河轮船公司、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埃及磨面公司、马吉德海运公司、莱姆勒电车公司以及影响最大的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

赛义德去世前一年向外国举借了第一笔借款。他去世时留下了700万英镑的债务,其中300万英镑应归咎于他的第一笔欧洲大借款。<sup>①</sup>在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巴斯统治时期,他们都曾暗中极力维护独占体制,而到赛义德时期则被彻底放弃了。

欧洲人在经济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治外法权也在扩大。到了赛义德时代竟有多达17种领事法庭。欧洲人开始大批涌入埃及,1857—1861年间,亚历山大港登记的自欧洲入境者平均每年达30000人。<sup>②</sup>他们现在可以乘火车到达开罗和苏伊士。在开罗,欧洲人感觉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自由舒服。

## 二、苏伊士运河与殖民羁轭

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但却给埃及带来了新的、更深重的民族灾难。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想法古已有之。在法老时期就已经开凿运河,通过尼罗河连通了两个海洋。1798年拿破仑人侵埃及后,亲自领导进行了对法老运河遗址的勘察。19世纪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的日益繁荣,以及跨洲际的贸易网的形成,这些组合成了一种强大的动力,要求发展尽可能方便快捷的运输方式,探求新的交通途径,尤其是在历史上通道稀缺的东西方之间。英国军官弗格霍思曾于1829—1835年由亚历山大

---

<sup>①</sup>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p. 169.

<sup>②</sup> Magali Morsy, *op. cit.*, p. 168.

港经苏伊士出红海抵达孟买。这一跨大陆干线的方便和速度由于1856年亚历山大—开罗和1857年开罗—苏伊士铁路的完成而大有提高。

跨大陆干线由于铁路运价的昂贵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发展的商业贸易的要求,解决办法在于凿通运河实现完全的海运。在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巴斯时代,开凿运河的申请均遭拒绝。然而法国一直对运河计划怀有极大兴趣。1854年赛义德成为埃及统治者后,曾当过赛义德骑射教练的法国人莱塞普斯当即奔赴埃及游说。赛义德没有让法国人失望。10月23日,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附属建筑物的租让合同正式签订。

在运河合同公布后,英国明确表示反对素丹批准运河协定。法国政府则不公开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莱塞普斯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对运河工程进行技术评估。英国政府拒绝参加这一委员会。1856年1月,经过实地考察的委员会发表了评估意见,认为开通运河没有不可克服的技术困难,整项工程造价不会超过6百万英镑。这一评估意见的发表使得运河工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引起了广泛兴趣。在英国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者。莱塞普斯则加快了埃及方面的工作。他利用土耳其素丹对修建运河的阻挠和赛义德对阻挠行动反感,急于寻求独立的心理,得到了修建的权利。他又利用英国的不直接反对,采取行动使工程成为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1月5日,他与赛义德签订了一项新的运河租让合同,扩大了原有的协定: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获得运河自通航之日起99年的占有权;公司可以挖掘一条连接开罗和运河区,引入尼罗河水的淡水渠,占有运河和水渠两侧两公里宽的土地,无需缴纳地价和地稅;埃及政府每年可获公司15%的纯利,75%的纯利归持有普通股票者,10%纳入基本股。修建运河需要的劳工由埃及政府提供。

1857年,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正式成立。1858年10月

公布了股份分配安排：公司资金总计 2 亿法郎（约合 8 百万英镑），分为 40 万股（每股 500 法郎）。法国购去 207 110 股，约占 52%，埃及政府购买 96 517 股，另有 85 506 股预计售给土、英、奥、美、俄等国。但由于英国鼓动拒购未能售出。在认购日期截止以前，莱塞普斯擅自宣布未能售出的股份已由赛义德买下。<sup>①</sup>自从股票分售以后，法国政府及拿破仑三世本人对运河工程的热情都有显著提高。自 1858 年 10 月以后，法国政府充当莱塞普斯有力的支持者，不断向素丹施压，逼他批准修建运河，并支持莱塞普斯敢于不等土耳其素丹批准，不顾英国反对，于 1859 年 4 月 25 日在塞得港破土动工开始修建运河。

开工修建后最初一段时间内工程所需的劳工由公司招募，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861 年 8 月，法国政府对赛义德施加压力，警告他如要维护自己的威望和财政信用，就必须加快工程进展速度，提供劳工。并利用当时埃及政府正向法国商议借款之机加以要挟。英国政府仍坚持反对。土耳其素丹疲于应付英法双方的压力，已不再对运河工程发表意见，事实上表示默许。赛义德于 8 月起颁行劳工法令，强征劳工。此后每月征调的劳工平均在 20 000 人左右。繁重的劳役、恶劣的劳动条件对于埃及人来说无异于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两岸荒地上埃及劳工白骨累累。

1863 年赛义德逝世，他的 32 岁侄子伊斯梅尔继位。伊斯梅尔野心勃勃，力图创建自己的霸权。

1865 年 4 月土耳其素丹最终签署了批准修建运河的敕令。此时英国政府看到运河工程接近完成，已考虑采取新的政策，因而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介入公司与埃及政府的谈判。谈判双方于 1866 年 1 月 30 日达成协议，埃及赔款仍为 8400 万法郎，另外还要拿出 4000 万法郎收回其它一些权利。土耳其素丹于 3 月 19 日

---

<sup>①</sup> Goldschmidt, *Modern Egypt* (《现代埃及》)。

批准新协议。直到这时开凿运河才完成了法律程序。西方殖民国家利用封建宗主权谋取殖民主义利益在埃及表现得极为典型。奥斯曼苏丹对北部非洲的宗主权,英法或表示漠视(大多在进行军事占领时),或加以强调而予以充分利用(大多在属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殖民利益时),无论何种,都表现出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权的践踏。1869年11月17日,全长166公里的运河正式通航。伊斯梅尔为通航举行了奢华的典礼,耗资140万英镑,占埃及岁入的1/4。埃及为运河总共耗费为1680万英镑,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为448万英镑,两项合计大大超过了当初600万英镑的预算。

运河的建成是埃及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它是一条连接东西方交通的捷径,对埃及来说则是引狼入室的孔道。埃及因为修建运河而债台高筑,从此不断举债,到1876年共欠外债约94 000 000镑。而在1864—1875年,埃及总收入为94 281 401镑,总支出不过97 240 966镑。同一时期(1863—1876),为了还债,土地税率上涨了50%。<sup>①</sup>埃及因而走上了破产之路。运河和国债对埃及的殖民地化进程无疑起了加速器作用。由于埃及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英法为此展开了更激烈的争夺。法国一度占了上风。而英国则开始改变以往通过奥斯曼土耳其间接控制埃及的传统政策。1875年,英国政府利用埃及财政危机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政府的软弱,抢购了埃及拥有的176 602股运河股票,从此日益对埃及进行赤裸裸的直接干涉。

---

<sup>①</sup> V. Milner, *England in Egypt* (《英国在埃及》), London, 1909, p. 177.

## 第四节 伊斯梅尔和杜菲克时期 埃及的殖民地化

### 一、欧洲金融资本的控制

1875年下半年,埃及财政持续恶化,赫迪夫伊斯梅尔竟然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来偿还债务,但仍是拆东墙补西墙,来年的偿债款项仍无着落。埃及国债券价格一降再降,政府已丧失信用,无法再争取到贷款。伊斯梅尔求助于英国。英政府派出了以凯夫为首的专家调查团,要求建立以英国为首的财政监督机构来批准贷款,对债务偿还的安排建议也倾向于照顾英国。然而,凯夫报告由于英国的阻挠迟迟不发,造成证券市场对埃及的信任危机,埃及债券价格再次下跌,财政情况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伊斯梅尔被迫于1876年4月6日宣布暂停支付当年四五月份的债务,实际上也就是宣布财政破产。5月2日和7日,他发布两道敕令,设立“国债委员会”(亦称国债局),由英、法、奥、意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负责收取用于还债的政府收入,有权批准或否决政府向外借款;埃及债务合并为“统一债务”,重新作了偿还安排;设立财政会议,成员为欧洲人和埃及人各5名,负责管理埃及国债及政府的收支和账目,参与预算制订。埃及的财政主权从此丧失。

法、奥、意三国都派出了代表参加国债委员会。但英、法认为埃及的现有机构无法保证这些安排的实施,要求实行财政监督。埃及被迫同意由英、法各派一人来实行“双重监督”,另设立一个委员会管理铁路和亚历山大港,收取偿还债务的收入。英国派出罗曼任财政总监,负责监督收入,有权任免各级税吏。法国派德·马拉雷子爵任财政总监,负责监督支出和债务安排的执行,清点政府账目,有权拒绝预算外支出。英国还派出金融资本家巴林参加国

债委员会。

1876年是埃及遭受殖民奴役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英、法直接派人参与埃及政府，而且其权势凌驾于赫迪夫之上，英法直接按自己意愿来统治。对英国来说，这是对传统的“无形帝国”背离的开始。正如后来的外长索尔兹伯里所称：“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有重要利害关系，而你又有一个忠诚盟友企图插足于彼，那么你有三种方针可选：放弃、独占或分享。放弃意味着让法国横亘于我们通往印度的要道上，独占则濒于战争边缘，所以我们决定分享。”<sup>①</sup>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英国已经无法以“无形帝国”形式维持它在非洲利益的至上权(Paramountcy)。索尔兹伯里所说的“分享”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从19世纪末起，英国在非洲大陆追求的是建立从开罗到开普的巨大的“有形帝国”。

欧洲债主们很快发现，埃及经济资源已挖掘殆尽，只有赫迪夫和大地主拥有巨额的资产。因而它们要求赫迪夫放弃部分资产。伊斯梅尔被迫于4月4日发布敕令，成立一个“拥有最大调查权利”的委员会。8月23日，伊斯梅尔接见威尔逊，宣称将完全接受委员会对他提出的所有协议和建议。“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我将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是任命努巴尔组阁。”<sup>②</sup>8月28日，他任命努巴尔组阁。10月29日宣布让出手中所有431 000费丹土地。至此王室所有的916 000费丹土地已全部抵押出去，即埃及1/5的土地已为外国债主掌握。年底，努巴尔组成内阁，由威尔逊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布里尼叶任公共工程部长，两人掌握内阁的实际控制权，这届内阁也因而被称为“欧洲内阁”。比起“双重监督”，英、法从此更深地干涉埃及的内部事务，直

---

① Robinson and Gallagher, *The Victorians and Imperialism* (《维多利亚时代人和帝国主义》)。

②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接掌握埃及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支配。殖民主义者把自己置身于埃及全民族的反对之中。尤其是埃及军官,他们直接受到殖民主义者紧缩财政措施的冲击。殖民主义者代表之一的米尔纳承认:“对公共项目尤其对军队开支的裁减过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发生。”<sup>①</sup>

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埃及军官,因为长期被欠饷以及努巴尔“欧洲内阁”的裁军措施,于1879年2月18日围攻了努巴尔和威尔逊。对欧洲殖民者也心怀不满的伊斯梅尔借此要求努巴尔下台。英法看到努巴尔已成为众矢之的,同意换人,由伊斯梅尔的长子杜菲克组阁,而他则是更为驯服的工具。两位欧洲大臣续任,其权力进一步扩大,从此“欧洲大臣有权影响……反对多数人的意见”,从而凌驾于整个内阁之上。

经过这一番波折后,调查委员会对债务问题采取几项措施:首先宣布自1786年4月6日,即暂停还债之日起,埃及政府处于破产状态。其次,限制赫迪夫年薪不得超过三十万英镑。第三,取消两种地产海拉吉地和乌西叶(Ousiye)地的税率差别,增加后者的税额,取消1871年补偿法和有关部门特权。(补偿法是伊斯梅尔为寅吃卯粮而制定的一种法律,规定地主如能提前付清6年的地稅,可永远减免一半地稅,土地即归他们所有,不再向他们征收新稅,亦不再向他们借款。)取消补偿法无异于让地主们白交了钱。第四,规定1874年5百万英镑的国债折合为賦稅,不予偿还。

这些只有利于欧洲債主的安排,是对埃及人的直接剥夺,从而引起了埃及人,尤其是土地所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咨议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伊斯梅尔利用这股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随即于1879年4月7日解散了第二届“欧洲内阁”,辞退了兩名欧洲大臣。次日,调查委员会立即反击,宣布埃及財政破产,全体委员辞

---

<sup>①</sup> V. Milner, *England in Egypt* (《英国在埃及》), London, 1909, p.183.



职,在埃及政府任职的外国官吏也纷纷离职。英法决定将伊斯梅尔赶下台。法国建议出兵,英国坚持以奥斯曼素丹名义出面罢黜。其它欧洲列强也企图利用这次机会插手埃及,打破英法的联合垄断。德国于5月18日对伊斯梅尔提出抗议。奥斯曼素丹遂按英法旨意于5月26日发布敕令废黜伊斯梅尔,立其子杜菲克为赫迪夫。对英法来说,杜菲克是随叫随应的可靠工具,英法通过他和里亚兹内阁继续控制埃及财政。成立了“清算委员会”,提出了“清算法”,由杜菲克于1880年7月17日签署。它限定了埃及政府的每年最高开支,剩余的收入必须完全用于偿还债务。债务成了套在埃及人民脖子上的绞索。

## 二、英国的军事占领

伊斯梅尔下台后,杜菲克作为列强和“异教徒”的傀儡,根本压不住台。埃及民族主义力量勃兴,企图推翻赫迪夫体制,维护国家独立。同所有当时东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它并不成熟,内部分歧颇多。走在最前面,最有影响和最具号召力的是军队,他们于1881年2月1日和9月9日两次集会,要求里亚兹下台,实行议会民主等。走在军队后面的是以谢里夫(他继里亚兹后组阁)为代表的,包括咨议会大部分成员的较为温和保守的一派。在英法看来,不管是军内或军外,这样的民族运动都会危及到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由英法苦心经营而构成的对埃及财政的控制,进而危及列强的一系列特权。12月26日,埃及咨议会开幕,企图争取更多的权力。英法则于1882年1月7日向杜菲克递交一份备忘录,声称杜菲克继续执政“足以在现在和将来保证与英法利害相关的良好秩序和埃及公共财富的发展。两国政府决心齐心协力以反对所有可能威胁到埃及现存秩序的内外危险因素,并相信这一正式公开保证之决心能使赫迪夫内阁摆脱可能的危险。英法当然会联合

反对这种危险。”<sup>①</sup>这一声明，“如同投下了一颗炸弹”，<sup>②</sup>大大激化了埃及内部矛盾。杜菲克对英法对其的关怀表示“诚挚谢意”，并因此备受激励而更坚定了反对咨议会的决心。而埃及人民却由此更进一步认识到赫迪夫是英法死心塌地的傀儡，埃及迟早将遭受与刚刚亡国(1881年)的突尼斯一样的命运，因而联合起来反对英法计划，并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英法。结果是亲西方的谢里夫内阁垮台，原陆军大臣巴鲁迪组阁，民族主义领袖阿拉比任陆军大臣，实际领导内阁。在英法看来，联合声明后埃及局势将直接影响到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因而提高了威胁恐吓的调门。巴鲁迪内阁成立后，英法各派出了6艘战舰开赴亚历山大港。5月25日，两国又联合提出备忘录，要求巴鲁迪内阁辞职，惩处军队领导等。双方对峙形势促使殖民者决定以武力来解决，尤其是利害关系最大的英国，已经匆忙从印度调兵了。

法国由于一贯推行强硬政策的甘必大政府的垮台，以及考虑德国的威胁，不得不把战略重点开始转向欧洲大陆，最终决定不卷入军事干涉。而英国由于受制于德国政府影响以及法国的反对，已很难再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埃及施加效果甚慢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内阁中以鹰派人物辉格党人哈丁顿为代表的强硬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占了上风，曾鼓吹和平主义的格莱斯顿首相决定在埃及问题上不惜采取单独出兵的政策。7月20日，在向议会要求批准出兵的说明中，格莱斯顿把埃及内政的“杂乱无政府状态”说成是运河不安定的根源，并指出这危及大英帝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随后在9月13日，英军在特勒-凯比尔战役击败埃军，于14日占领了开罗。从此开始了英国对埃及长达74年的军事占领和驻军。

---

① Lord Cromer, *Modern Egypt* (《现代埃及》), MacMillan and Co. Ltd., London, 1908, pp. 214 - 236.

② Ibid.

英国占领埃及后,首先要确保对它的有效控制。它拒绝了法国要“恢复在埃及之行动自由”的要求。早在这之前(1882年7月底),英海军就以赫迪夫授权名义,不顾法国反对占领了运河。然后又废止了双重监督制,不惜牺牲同法国的友好关系。如同英国官员所说,这是“确保英国的长久影响”,“中止法国同等权力”的最佳选择。这些表白可视为英国在非洲大陆建立“有形帝国”的恰当注解。

1882年10月30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达弗林被派到埃及考察。他的报告提出由英国控制埃及政府,坚决拒绝以自由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思想,坚持推行所谓“忠告政策”,即对埃及官员和各级政府运作给予强制性的“必要的忠告”。但迫于国际压力,在实际采取的政策中,又以其在印度采取的政策为蓝本,加入了一个赫迪夫政权为幌子。而赫迪夫离开了英国的支持就完全无法存在。在埃及总顾问和领事巴林的统治下(1883—1907年),所谓“英国人的头,埃及人的手”之体制使得埃及完全被英国所奴役。经济畸形增长,走上单一经济作物制之路,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在整个占领时期(以各种形式一直存在到1956年),技术、农业和工业的增长都很缓慢,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sup>①</sup>外国投资进一步全面渗透。埃及成为外围殖民地国家,完全依附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占领埃及后的英国急于改善埃及的财政状况,摆脱先前由它自己给埃及套上的“清算法”枷锁。1884—1885年召开了伦敦会议,英、法、德、奥、意、俄、土就修改《清算法》达成协议。1904年,英法就进一步修改《清算法》达成协议。结果是以英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英国完全独占了财政权。深受其害

---

<sup>①</sup> S.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埃及从独立到革命》), p. 18.

的埃及人民,又背上 900 万英镑的债息。英国坚持不确定撤军期限。

以巴林为代表的殖民官吏对埃及民族主义的成长实行严厉镇压。1906 年丹沙威惨案后巴林去职,戈斯特和基斯纳先后接任。一战爆发后,英国利用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之机,于 1914 年 12 月 18 日宣布结束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置埃及于自己保护之下,立侯赛因·卡米勒为新的赫迪夫,英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亦易名为高级代表,并代理埃及外交部的职权。埃及成为了英国在中近东最重要的军事后勤供应基地和政治活动中心,为英国在战争中取胜作出了大量贡献。英国征用埃及人 150 多万,其中有 117 万人是为战争服务的“劳动军”和“运输队”。2/3 的牲畜和大量运输工具也被征集。同时,英国又将埃及经济拖入了战时轨道,大肆搜刮粮食和棉花。结果造成埃及自身粮食奇缺,物价飞涨,100 万农民破产。埃及民族工商业也被英国以“支持战争”名义勒索了大量金钱和财物。这些都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

## 第五节 一战后埃及对殖民化的 反抗与英国的政策

### 一、埃及人民反抗“殖民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埃及政治形势的新转折。在此之前,埃及在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及统治者仍拥有奥斯曼帝国给他的封建称号“赫迪夫”。19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政府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为由,声明“埃及今后处于英王陛下的保护之下”,从而取消了奥斯曼对埃及的宗主权,使埃及成为英国地地道道的殖民地。

英国在埃及实行的“保护制度”是在战争状态下的殖民制度,

主要包括：控制了埃及“赫迪夫”的继承权；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控制了埃及的外交、立法权和司法权；在经济上使埃及进一步殖民地化。1918年，英国发布了关于垄断全部棉花收购的法令。同年由布兰尼特起草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埃及商人和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低于外国资本家。300名英国官员占据埃及政府的高级职位，1919年在高级职员中，英国人占3/4。所有这些都加上经济上的盘剥，使英埃敌对情绪不断加深。埃及要求无条件自治，英国则完全拒绝，声称为保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必须把埃及置于帝国体系中。埃及人越来越抵制英国人的存在，占领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东西。

在战争期间，英国为拉拢埃及，曾四次许诺战后给予埃及独立。加上十月革命的胜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包括给予各殖民地民族独立在内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及一些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埃及人民对独立充满了希望。然而，英国又一次违背了诺言，在战后颁布的宪法草案中，丝毫未提及埃及的独立，没有根本改变被保护国的地位。这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以阿萨德·扎格卢勒为领袖的华夫脱党领导了民族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要求或是局限于奥斯曼帝国隶属下的自治，或是满足于在英国保护下的自治。战后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和立宪的要求，运动的广泛性因而大大增加。

1918年11月13日，在停战的第三天，扎格卢勒就以埃及人民代表的名义向英国高级专员温盖特提出：撤销对埃及的保护，结束战时紧急状态，实现埃及的独立。但英国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也拒绝承认他们能代表埃及人民。23日，扎格卢勒把立法议会的代表和各爱国阶层的代表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了“埃及代表团”要求废除殖民保护制度，英军撤出埃及和成立立宪的独立的埃

及政府。为使华夫脱党成为埃及的全权代表，他以立法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号召各选区在《委托书》上签名，签名人数很快超过了200万，发展为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从而迫使亲英的埃及首相辞职。

1919年2月，扎格卢勒发表讲话，强烈要求终止殖民保护制度，指出这一制度是英国为了自己的“战争需要”而“擅自”决定的，“违背了埃及民族的意志”，“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同时要求英国允许华夫脱党参加巴黎和会。华夫脱党组织了群众集会和示威。3月8日，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扎格卢勒等4位华夫脱党领袖，并把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岛。

在埃及人民群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英国殖民占领者不得不允许扎格卢勒从流放地直接去巴黎参加和会。这时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仍抱有幻想。威尔逊却于4月22日正式承认了英国在埃及的殖民保护制度。凡尔赛和约第147条规定埃及仍为英国的保护国。扎格卢勒也最终未能参加和会。此时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来埃及，调查“三月事件”，并制定了“在英国保护下的埃及自治方案”。5月扎格卢勒应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邀请，参加了伦敦会议。他拒绝了8月英国提出的《英埃条约》。12月，英国占领军对扎格卢勒和华夫脱党领袖下了驱逐令，后来又逮捕了他们，先后流放到亚丁、塞舌尔和直布罗陀。这种政治迫害使得埃及群情激愤，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占领者进行了血腥镇压。1922年1月23日，华夫脱党开罗委员会号召抵制英国货和英国银行。殖民地人民强烈的、持续的反抗终于迫使英国占领当局不得不改变其殖民统治的方式，这在非洲殖民主义史上是一突出事件。

1922年3月16日，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4月4日公布了《埃及宪法》，保证了英国在埃及的特权，允许英军留在埃及，聘请英国人为埃及政府财政及司法顾问；保留了外国因条

约和习惯而得到的利益。埃及在苏丹的权利不变,但宪法只适用于埃及。尽管有如此保留,但它毕竟标志着非洲殖民地中第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1924年1月28日,埃及国王富阿德任命大选获胜的华夫脱党领袖扎格卢勒组阁。

在新宪法颁布后组成的第一届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英国与埃及的关系。9月,扎格卢勒赴伦敦同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谈判,提出5项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撤回在埃及的财政和司法顾问;英国停止对埃及外交方面的监督权;英国放弃在埃及的领事裁判权;英国放弃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权;埃及不再承担英军驻埃及的费用。这些要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谈判宣告破裂。但扎格卢勒态度强硬。他通过议会要求英国政府交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同时又以政府首脑身份照会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撤走驻埃及的高级专员,建议两国互派使节。他还不顾英国反对,声明埃及将履行独立主权国家权利,排除外国干涉。英国大为恼火,通过埃及国王要求扎格卢勒内阁下台。但扎格卢勒得到了埃及人民的支持。1924年11月,驻埃及英军总司令李·斯塔克在开罗遇刺身亡,英国政府以此为由,提出了扎格卢勒无法接受的处理要求,又以遭到拒绝为由而出动军队占领议会和政府大厦,迫使扎格卢勒辞去首相职务。扎格卢勒虽然只当政了十个月,他在埃及民族运动中起到的作用是深远的。

## 二、英国的干涉主义政策

英国由此炮制了一种新的适应埃及名义上独立的殖民形式:干涉主义。只要埃及国内出现完全独立的强烈要求或其它不利于英国的倾向,它就毫不犹豫地对埃及内政横加干涉,迫使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政府垮台,扶植更为听话的工具。而华夫脱党总是企图既利用人民的力量,又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目标之下,没有真正地促进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因而埃及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每当

进行大选时,华夫脱党总能获得压倒性胜利,但与英国或王室的冲突则往往导致华夫脱政府辞职或被解散,甚至议会也被解散,宪法被中止执行或被修改。华夫脱党一次又一次处于反对派地位。与统治印度殖民地完全不同,英国在统治埃及的半个世纪中练就了一套极其虚伪做作的手腕:它以维持“大英帝国生命线”为托辞,促使国内反对党议员和纳税人支持它的花样翻新的殖民控制新形式。

华夫脱党在1923年之后仍一直活跃在埃及政坛,在议会中占有优势。也曾一度组阁。在它当政期间,埃及和英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都无果而终。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埃及政局出现了华夫脱党、国王和英国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局面。但基本上是英国利用国王的权力压制华夫脱党的民族主义要求。1928年7月19日,埃及国王福阿德下诏解散了议会,宣布宪法失效三年,在三年内由国王和内阁掌握行政和司法大权,实际上是由英国高级专员操纵指挥。1928年6月,英国由麦克唐纳第二次组阁,对埃及的政策由高压转为怀柔。1929年8月,英国提出英埃条约16条,保留了英国对埃及的外交监督权、驻兵权、交通保护权和战时无限的军援与领土使用权。华夫脱党反对这一方案,并动员了舆论和群众起而抗争。1936年纳哈斯组阁。8月同英国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英军继续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享有豁免权和其它特权,并由埃及政府提供土地和基建费用;英军还可在亚历山大港附近地区驻扎八年;战时埃及政府须提供一切方便;英埃共管苏丹,但英国驻埃及总督掌管大权。实际上英国仍然保持了特权,埃及的处境没有根本变化。华夫脱党的声望由此大跌,失去了民族运动领袖的地位。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呼唤新的领导力量。



## 第六节 非殖民化和争取完全 独立的斗争

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实际上只是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英埃双方的互相妥协,而并没有彻底解决英埃之间的矛盾,并未给予埃及人所希望的完全独立。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仍然是埃及人民向往的目标。

二战爆发后,埃及一度处于观望状态下,以国王法鲁克为首的宫廷集团以及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对德意志轴心国抱有幻想,想借助其力量打击英国,争取民族的独立。“在民主名义进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名义进行的压迫之间没有可选择的余地。”<sup>①</sup>这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在卷入二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并不罕见。

英国努力对埃及进行控制。特别是1942年2月4日发生了英国大使以坦克为先导闯宫,逼迫法鲁克国王任命纳哈斯组建亲英政府的“二月事件”。这一事件说明,英国殖民主义对“间接统治”形式下的当地政府,尽管它们一直充当了英国统治的支柱,只要一旦产生离心或不顺从的倾向,英国政府便会毫不留情地施加压力,乃至动用武力,迫其就范,或将其推翻。此举大大伤害了自认为已获得独立的埃及人民的自尊心。但亲英政府在二战期间保证了埃及成为英军在北非可靠的桥头堡和后勤基地。50多万各国军民经埃及开赴各方前线。1842年11月,英军在埃及西部发动了阿拉曼战役,取得了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埃及人民贡献了人力、物力,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sup>①</sup>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90页。

二战胜利后,英国并未按条约撤回“运河区”,而是继续占领开罗等城市。1946年10月26日英埃双方签订的“西德基—贝文秘密协定”,英国企图以新形式重新巩固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但在埃及人民的声讨下被否决。此后埃及政府多次提出修改1936年条约以及驻埃英军立即撤出苏伊士运河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全埃及人民的坚决支持,到1951年底前后已形成了全民反帝斗争的规模。英国以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以1952年1月“开罗纵火案”为借口进行了血腥镇压。

在新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埃及军队开始又一次崭露头角。早在1939年进步军官就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1942年的“二月事件”、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以及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都激发了以纳赛尔为首的进步军官的爱国热忱,他们于1952年7月23日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卖国的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

1952年埃及政府与英国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达成了《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的协定》,规定英军20个月内全部撤出埃及。纳赛尔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了积极中立的政策。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为回击西方的压制,他于1956年7月26日断然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引发了英、法勾结以色列的悍然入侵。在埃及军民的英勇奋战下,也由于美苏大国的牵制和威胁,加上世界人民的舆论谴责,英法被迫撤军。埃及反帝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埃及终于彻底摆脱了西方势力的控制,取得了完全独立,完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埃及人不懈奋斗的辉煌伟业!

## 第九章 柏林会议和帝国主义 瓜分非洲

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无论是对非洲、还是对欧洲的历史而言,均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它是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被载入史册的,但它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中的实际作用不可忽视。19世纪最后25年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大陆的迅速瓜分更使举世震惊,这构成非洲殖民主义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对非洲未来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非洲领土被瓜分完毕,以海外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整个近代殖民主义也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思想感情和道德价值等各个领域,但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解释或已经解释了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吞并属地、建立殖民统治的历史现象。由于当时的海外扩张最突出地表现在瓜分非洲的历史进程中,故帝国主义起因论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原因,这两者并不完全重合,但却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事件至少在19世纪最后2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密不可分的,所有试图解释瓜分非洲这一历史事件的史学家都无法回避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定义问题;同样,所有分析这一阶段帝国主义论者也避不开瓜分非洲的事实。当然,帝国主义本身如果作为一种完整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瓜分非洲大陆的历史表现仅仅是它的一部分。而作为非洲殖民主义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帝国主义必须予以特定的含义。在此作为一种历史学的范畴,我

们把它定义为 1876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列强对非洲进行争夺和瓜分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在非洲建立殖民统治、实行强权政治的制度。因此,我们把这个阶段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称为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 第一节 柏林会议的召开及其作用

### 一、柏林会议召开的背景

关于柏林会议的研究,自 1942 年 S. E. 克劳发表第一部专著《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以来,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到柏林会议一百周年之际,已召开过 17 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 90 部专著和论文。最新研究成果荟萃于纪念柏林会议一百周年文集,题为《俾斯麦、非洲和欧洲:1884—1885 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非洲的开始》,它标志着对该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高度是建立在除土耳其政府外,已对所有其他与会国公开该会议全部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基础上的。<sup>①</sup>

柏林会议,又称柏林西非会议、刚果会议、西非会议和柏林非洲会议,它究竟对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为什么要召开柏林会议,即柏林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及其背景。

1884 年 11 月 15 日—1885 年 2 月 26 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由英、法、德、比利时等 15 国参加的会议,如同国际关系史上所有的会议,是为了解决一些国际争端。由于这次争端发生在非洲的

---

<sup>①</sup>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俾斯麦,欧洲和非洲:1884—1885 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的开始》),The German History Institu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刚果河口,又称刚果会议。毫无疑问,刚果问题是促使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而会议之所以在柏林召开,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变动的结果。

刚果河口的争端是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一手造成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很难想像今天扎伊尔的边界会出现在非洲地图上。1876年,他在布鲁塞尔主持召开有关非洲的旅行家、外交家、国际法专家和经济学家等参加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旨在对中非一些尚不了解的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在该地区传播欧洲的文明和扩大贸易,停止奴隶贸易。该协会的经费由私人捐助,利奥波德国王当即拿出一大笔个人资金作为协会的基金,由此揭开了瓜分中非的序幕。1878年“国际非洲协会”比利时委员会改组成立“上刚果研究会”,着重刚果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工作。1879—1884年,斯坦利和他的同事们以国际非洲协会名义,在刚果河流域建立了22个工作站,这些成为比利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据点。他们还同部落首领签订了将近450个关于建立保护的条约,由此同法国发生了冲突。

法国早在1875年就对她原先占领的加蓬地区加紧向刚果河口以北扩张,法国海军部长饶雷吉伯里于1879年给布拉柴出资路费,同时派出16名塞内加尔士兵陪同他前往刚果进行新的探险。布拉柴比斯坦利早到刚果河口地区几个月,通过与马科科首领签约得到刚果河下游的特权。法国议会于1882年11月颁布法令承认其所占领地属法国,并同法属赤道非洲的全部领土合成一个殖民地,称法属刚果。1883年4月,31岁的布拉柴受政府委派,出任刚果殖民地高级专员。他同时得到议会127.5万法郎的拨款,这相当于他探险费用的十倍,去进一步扩大法国在刚果河地区的主权。

与此同时,葡萄牙也宣布她在刚果河口的历史权利,并得到英国的支持,双方于1884年2月签署英葡条约,英国承认葡享有北至南纬5度12分包括刚果河口和罗安达的权利,以换取在这一地

区的自由贸易。此时,英国在刚果河地区的贸易已达 200 万英镑,是 1879 年贸易额的 4 倍。但这一条约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法国拒绝接受英葡条约;比利时刚果协会显然不想让葡拥有河口;正在向全球扩张商业的美国宁愿刚果区域控制在力量较弱的比利时“国际非洲协会”手中,而不愿由英国控制该地区,为此主张承认它所签条约的法律效力。葡对此感到条约获准的前景暗淡,转向法、德,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正式放弃该约。俾斯麦抓住此机,倡议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非洲的争端问题。他是出于欧洲政治平衡的考虑,为避免德国在欧洲大陆遭两面夹击的危险,表现出同法国接近的姿态。因为只有 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德有并行不悖的利益。同时,削弱英国的地位,也符合法国的想法。所以,柏林会议的召开就欧洲国际关系而言,一方面德国是想联合法国、乘机给英国一个教训,让她明白大不列颠如果没有有效占领非洲和其他地区就不能宣布控制这些地区;另一方面,他又借此以非洲的领土同法国做交易,支持法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政策,尽可能地缓和法国的复仇主义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说柏林会议的召开是由刚果问题和欧洲国际关系变动直接促成的。

## 二、柏林会议实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会议原定议程是要解决刚果河口的争端问题,但从它签署的《柏林会议总议定书》来看远远不止这一内容。《总议定书》宣称其宗旨是“为了本着相互友好协商的精神确定发展非洲某些地区的贸易和文明的最惠国条件,并保障各国人民在两条流入大西洋的非洲最大河流(尼日尔河和刚果河)上自由通航的利益;希望避免在占据新的非洲沿海领土时可能发生的不和与纠纷;关切开发土著居民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方法。”<sup>①</sup> 内容共 7 章 38 条,主要涉及

---

<sup>①</sup> 《国际条约集 1872—1961》,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第 81 页。

六个方面：

一是关于在刚果河流域及其河口和周围国家自由贸易的共同声明及其相关的决议(1—8条)。主要是划定各国享有贸易、传教、旅行等自由和保护权益的地区,并对这些地区的土著、邮政实施保护,责成刚果河国际航行委员会实行监督。

二是关于奴隶贸易的共同声明(第9条)。禁止把刚果河流域各地区作为奴隶贸易的市场和过境通道。

三是关于列入商定的刚果河流域地区之领土保持中立的共同声明(第10—12条)。宣称为了对贸易和工业的安全重新作出保证,并在第一条涉及的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地区帮助发展文明,各国有责任保证该地区的中立,使之不再变成军事行动的地区。

四是关于刚果河航行的议定书,共13条。规定在刚果河及其河汊和支流上的航行对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应该是完全自由的,要求采取统一的、平等的税率。授予国际委员会执行本航行议定书的职责,该委员会将独立于地方政权。但在处于主权国家统治下的河段,它应与沿岸政权机关进行协商。

五是关于尼日尔河的航行议定书,规定基本上与刚果河相同。不同的只是由英法保障实施这些规定,而不是由国际委员会保障。其他签字国一旦今后得以享有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河汊和源流某一部分的管辖权和保护权时,也要承担同样的义务。

六是著名的“有效占领”原则,具体有两条。要求今后占据非洲大陆沿岸地区某领土的国家或即将获得这种领土的国家、以及将要承担保护权的国家,应向《总议定书》的签署各国递交相关的文件和声明,以便使后者在必要时申述自己的要求。并有义务在他们占领的非洲大陆沿岸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政权,该政权既能保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又能在必要时保护贸易和过境运输的自由。<sup>①</sup>

<sup>①</sup> 《国际条约集1872—196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3—97页。

上述议定和共同声明实际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刚果自由贸易区的划定及其保持中立的共同声明；二是刚果河流域和尼日尔河流域的自由航行议定书；三是有效占领原则。这三个问题均由列强在非洲的争夺造成的，实际围绕一个主题——自由贸易，这是与会国的一个共同愿望，而且这纯粹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愿望。但由于自由贸易与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和排他性相矛盾，各国都拒绝在自己已占领的地区实行开放，加上国际委员会没有行使切实有效的监督。所以，柏林会议的实际经济利益只能被一些空泛的原则及会议本身的特色所取代，它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

### 三、柏林会议对瓜分非洲起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也就是柏林会议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关系问题要确定这两者的关系，必须先区分柏林会议上多边协定和双边协定两者的差别。因为限制在多边举行的正式会议上，列强并没有瓜分非洲，但正式会议外的双边协定却划分了西非边界。此外，还必须澄清瓜分的两层含义：一是指瓜分“原殖民地”(Proto-Colony)，即瓜分列强原来已经占有的领地；二是指瓜分“非殖民地”(Anti-Colony)，即瓜分原来的自由贸易区。<sup>①</sup>因为早在会议之前，欧洲列强已经在非洲开始争夺殖民地、保护领和势力范围的进程，这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柏林会议并没有限止这一进程，但它就此结束了列强在非洲领地的所有模棱两可的形式，由此使非洲殖民地的版图变得更加清晰。

柏林会议是西方列强第一次在远离非洲、无一位非洲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凭借各自的实力，达成了在非洲争端中的谅解。“尽

---

<sup>①</sup> R. Robinson, Introduction. In: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管柏林达成的殖民地规定和原则被证明未发生多大作用,但柏林会议标志着欧洲在非洲的扩张从此有了国际法。”<sup>①</sup>所以,柏林会议即便不是瓜分非洲的实际开始,也是欧洲列强获得瓜分非洲的一次机会,至少是瓜分“非殖民地”的机会。同时,它还是一次调整西方列强之间经济利益的外交会议。因为《总议定书》字里行间充满了贸易自由、关税平等、航行自由等经济原则,这些原则发展成国际法准则,连同“有效占领”原则一起成为列强统治非洲大陆的原则。会议本身对国际关系做出了贡献,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首次出席一个讨论西半球以外事务的会议,并显示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预示着新一轮的竞争将出现欧美联合制衡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参与刚果河的纷争,她在非洲的利益也不大。但美国同刚果的正式贸易始于1878年,美国政府也鼓励同非洲的贸易,并促使其成为自由贸易区。<sup>②</sup>所以,刚果问题实际在美国外交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借此卷入了欧洲的平衡体系。尽管她真正控制这种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二是非洲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被搁置到任人宰割的国际砧板上。尽管这些与会的欧洲政治家尚未真正认识非洲大陆,但他们开始在地图上了解他们正在角逐的大陆。柏林会议没有制止列强在非洲沿岸地区已经开始的角逐,反面使他们从非洲的中心地区—刚果盆地开始角逐,并进一步在整个非洲、尤其是内陆展开角逐。作为整体的非洲殖民主义史应当由此开篇。

三是国际社会对非洲事务的解决方法开始采用多边协商的形

---

① J. D. Hargreaves, *The Berlin Conference, West Africa, and the Eventual Partition*(《柏林会议、西非和最后的瓜分》). In: *op. cit.*

② G. Shepperson, *Aspects of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Berlin Conference*(《柏林会议中美国方面的利益》). In: *op. cit.*

式,并延续至今。

总之,柏林会议是一次帝国主义会议,它本身虽然没有瓜分非洲,但它确实为列强进一步瓜分非洲制定了原则。据此原则,欧洲列强在后来的三十年中把非洲瓜分殆尽,建立起殖民国的体系,成为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何看待柏林会议在非洲殖民主义史上的地位?非洲96.7%的领土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保护领并不是由柏林会议决定的,但柏林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殖民主义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首先使非洲有了一个整体概念;其次,它汇聚了所有在非洲大陆争夺利益的国家来商讨该大陆的问题,这是自1415年非洲殖民主义史开启以来的第一次;再次,柏林会议所制定的原则使列强得以在后来的瓜分中避免冲突,从而加速了瓜分的进程。所以,柏林会议可以作为列强大规模瓜分非洲或迅速瓜分非洲的一种象征。更确切地说,它在非洲大陆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起到了协调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加速非洲殖民地化进程的作用。

## 第二节 围绕帝国主义瓜分 非洲问题的争论

为什么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始于1876年左右,而在此之前很长时期内它们对非洲并不很感兴趣,在此之后却加快了瓜分的步伐,发展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殖民争夺,这种殖民地争夺成为“新帝国主义”区别于古代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罗宾逊、加拉赫和费尔得豪斯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帝国史学派实力人物,他们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着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力图解答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为什么会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

问题,即探索隐藏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背后的动机。他们强调外交和战略方面的考虑是促使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重要原因,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们著书立说,在肯定非洲的瓜分是“被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分割运动,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总动因”的前提下,在对许多英帝国时期的第一手政治、经济、外交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及其瓜分非洲原因的理论体系,极力强调外交和战略这两个方面。为区别于强调经济因素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将他们的理论概括为“外交战略论”和“地区危机论”。

“外交战略论”认为欧洲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解释瓜分的原因,而应当从政治、外交和战略等角度来阐释:从政治上来说,由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打破了欧洲原来的政治平衡,使欧洲国家又卷入了政治平衡的斗争中。在这种背景下,争夺非洲殖民地就成为增加国家力量和取得强国地位的重要筹码。例如,德国占领多哥、喀麦隆和西南非洲是为了增加其在欧洲外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德国在1884年后建立的是“政治帝国主义”;<sup>①</sup>从战略上看,他们认为英国工业的领先地位使她能通过自由贸易在全世界取得经济优势,无须花大代价去征服殖民地,只是为了取得海上霸权和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才促使她有必要占领埃及、亚丁、桑给巴尔和开普这样的战略要地;从外交上来看,他们认为19世纪欧洲列强被迫占领了他们在80年代标在非洲地图上要去占领的土地,由此造成的引人注目的扩张就是帝国主义。

持外交战略论者著述颇丰,而且均以史学家身份来审视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原因。他们立论鲜明,又辅以史实佐证,具有一定的信服力。但仍有几点不合理:第一,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过程

---

①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帝国主义’: 一个历史著述上的修正》),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No. 2 (1961), pp. 187-209.

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外交手段的运作必须有一个背景——争夺非洲殖民地进程的开始,也就是说欧洲政治家运用外交手段或军事手段是与列强瓜分非洲的过程相始终的。实际是列强对非洲的争夺需要欧洲外交家从中调节和斡旋,以协调瓜分的步骤,而不是外交家发动了这场空前的瓜分运动。因为每一次国际会议的召开,或每一项外交协议的达成,均由殖民争夺过程中出现的具体事件促成的。如柏林会议的召开及其协议的达成,是由于列强在刚果河口的纷争促成的。所以,单纯的外交企图很难成为促使欧洲如此迅速瓜分非洲大陆的内在动因。外交手段固然有不少能动性,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他们提出德国是“政治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完全正确。德国占领了一些非洲的沙漠地区,确实有些出于俾斯麦对欧洲战略平衡方面的考虑。但德国之所以会占领这些沙漠地带,全仰赖于德国商人在西非沿海及西南非洲取得的贸易进展。何况早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发行的许多报刊、书和小册子就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发现殖民地,以此保护和促进德国的贸易。<sup>①</sup>当德国占领殖民地后,特别是南非丰富的矿产被发现和开采后,德国政府对殖民地态度之积极绝不比英国逊色。可见,即使是对非洲抱有很大政治野心的德国,也始终没有忘却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和经济在现代社会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往往成为政治的驱动力和终极目的,这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期开始显露。

第三,欧洲列强争夺战略要地的意图在瓜分非洲中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还是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自

---

① K. J. Bade, *Imperial Germany and West Africa: Colonial Movement, Business Interests, and Bismarck Colonial Policies* (《德意志帝国和西非:殖民运动、商业利益和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In: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俾斯麦,欧洲和非洲:1884—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的开始》).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海外殖民事业的发展与沿途物资供应站、加煤站及军事基地的蓬勃兴起密不可分。特别是全球性贸易网络的形成使世界连成一体,争夺海外有利的战略要地也成为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外交战略论”无法解释对非洲的占领为什么会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与这一时间有关,那么,已经占领开普这一个战略要地的英国为什么还要深入北部的“荒漠”?当然,战略本身是一个涵义丰富的名词,它不应当局限于军事方面的意义。

与“外交战略论”如出一辙、出自相同史学家之笔的“地区危机论”,在解释帝国主义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非洲问题上似乎更贴近主题。该理论集中反映在罗宾逊和加拉赫合著的《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书和《新编剑桥近代史》“非洲的瓜分”一章中。他们认为欧洲中心地区的政策是连续的。英国在整个19世纪奉行“贸易而非统治”的政策,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实行“如果贸易可能的话,就非正式统治;如果贸易必要的话,就正式统治。”<sup>①</sup>所以,欧洲列强对非洲的领土兼并不可能是由于中心地区的政策变化造成的,“……推动一切因素起作用的决定性变化发生在非洲内部。把非洲拖进现代历史的是非洲北部一个旧政权的衰亡和非洲南部一个新政权的崛起。”<sup>②</sup>他们还具体指出非洲的瓜分是同埃及事件相始终的,并强调该书观点均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思想。

毫无疑问,“地区危机论”扩大了对帝国主义及其瓜分非洲动因分析的视野,他们不停留在对欧洲政策和行为的就事论事上,而

---

① 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自由贸易帝国》),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经济史评论》) VI(1953)1—15.

② R. 罗宾逊和 J. 加拉赫:《新编剑桥近代史》第 11 卷第 22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817 页。

是将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指出了中心与外围地区的互动关系,认识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欧洲与多数不发达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平衡,由此在相互接触中产生一种特殊的合作机制。<sup>①</sup>但“地区危机论”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立场和态度是我们无法赞同的。第一,帝国主义是在欧洲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它具体表现为欧洲列强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扩张与统治。其他地区的形势无论如何变化,它们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寻找帝国主义发生的原因绝对不能偏袒主动一方,而去找被动方的原因。否则,岂不成了侵略国之所以侵略其他国家是由于被侵略国引起的侵略。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逻辑,我们应当予以摒弃。诚然,英国出兵埃及、南下苏丹、深入西非内陆、吞并布尔人共和国与当地的危机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十分明显,面积如此广袤的“刚果自由邦”并不是由非洲内部的哪一场危机促成的。

第二,所谓“中心地区的连续性和周围地区的不连续性”与事实不符。虽然中心地区在总体上扩张政策不变,但自1870年后欧洲政策还是有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1884年4月6日,俾斯麦在帝国议会说:“我重复我反对殖民地,反对殖民地作为一个基地,然后吸引移民、任命官吏、建立卫戍部队。”<sup>②</sup>但在柏林会议期间(1884—1885年),他向德国驻英公使蒙斯特表

---

① R. Robinson, 1972. chapt. VI: Non-European foundation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 eds. by R. Owen & B. Sutcliffe. London, Longman 1972.

② K.J. Bade: Imperial Germany and West Africa: Colonial Movement, Business Interests, and Bismarck Colonial Policies (《德意志帝国和西非:殖民运动、商业利益和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In: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俾斯麦,欧洲和非洲:1884—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的开始》), p. 137.

示：“单就国内政策的理由，殖民地问题是一件关系到我们生死的问题……”<sup>①</sup>对此变化，“地区危机论”者实际上自己也有所意识。罗宾逊和加拉赫意识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出于强大的国力而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后继者至少是出于害怕失去这笔巨大遗产而去建立非洲帝国。由此可见，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政策和后期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费尔德豪斯也明确指出普法战争导致欧洲政治平衡的破坏，促使欧洲国家又卷入政治平衡的斗争中，在此情况下争夺非洲变得更加重要。

第三，非洲的被瓜分也并非同埃及事件相始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出兵埃及就成了列强瓜分非洲的肇始者，问题也就成了“谁第一个瓜分非洲？”<sup>②</sup>而不是为什么要瓜分非洲，这恰好与作者要寻找动机的意图背道而驰。何况早在英国占领埃及之前，法国就吞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所以，埃及事件与其说是瓜分非洲的原因，不如说是欧洲瓜分非洲的一个典型实例。（关于这个典型实例，我们在后面还要作具体分析。）

此外，罗宾逊还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第二版中重申这些观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观点。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有《新编剑桥近代史》中“非洲的瓜分”论断。因为这些篇章前后观点的一致性，使人难以辨认作者的观点与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有何不同。

综上所述的“外交战略论”和“地区危机论”实际都是修正“经

---

① K. J. Bade: *Imperial Germany and West Africa: Colonial Movement, Business Interests, and Bismarck Colonial Policies* (《德意志帝国和西非:殖民运动、商业利益和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In: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俾斯麦,欧洲和非洲:1884—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的开始》), p. 139.

② Robin Law, *Imperialism and Partition* (《帝国主义和瓜分》),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非洲历史杂志》), JAH24(1983) pp. 101—104.

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它们无法全面解释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为什么会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我们应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虽然“经济帝国主义”的创始者霍布森已被费尔得豪斯的“修正”批驳得似乎难以立足这块阵地,但他作为一名英帝国时期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通过对英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以及在南非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之后所著的《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今天仍然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甚有价值的著作之一。他的理论对学术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对经济学家、甚至对政治学家都是如此。

“经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霍布森和列宁。他们两人观点不完全相同,但存在一个本质上的共性,即他们都着力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以此阐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问题。他们都没有直接回答帝国主义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瓜分非洲,可他们的理论却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因为他们更靠近那个时代,他们对时代的敏感度远远超过了后来的学者。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19 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帝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它不同于“在霸权之下把国家联合起来”的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根本概念,“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是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政治吞并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接着,他阐明了新帝国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目的是为国内剩余资本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实行贸易保护是为了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确保各占领市场贸易的增加;帝国主义财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贸易。其理论核心就是要从贸易、投资、财政等方面探讨帝国主义的起源。除此之外,他还揭示了“最新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即金融资本家在背后操纵着商业资本家的海外扩张,操纵着政治家、军人、博爱主义者等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由此可见,资本过剩构成帝国主



义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霍布森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互相竞争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欧洲资本的过剩,需要到海外寻找利润大于国内投资的市场,金融家为此操纵政治家去占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中有90%是在非洲大陆。但遗憾的是霍布森在将经济学理论本身同海外扩张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譬如,他并未证明“海外投资与同期内占领的土地间有任何关系”,而武断地假设新殖民地在国外投资中占有较高比例,这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输出资本投在了“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南非。<sup>②</sup>而不是新占领的非洲殖民地。这一偏差实际上就完全推翻了“为剩余资本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去瓜分非洲,从而出现“新帝国主义”的立论。除了南非地区与过剩资本的投资和金融家有关外,非洲其他地区的瓜分似乎都不能以此为由。可见,霍布森的理论在解释瓜分非洲问题上同样有失偏颇。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他一方面肯定了霍布森提出的“近代最大的经济变化是日益增长的资本的世界主义,”肯定了金融资本对政权的控制,以及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期的典型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他又“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并“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由此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他还通过分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和列强间存在的经济关系,得出“帝国主义是垄

---

①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②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帝国主义’:一个历史著述上的修正》),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No. 2 (1961), pp. 187-209.

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一结论。<sup>①</sup>

尽管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小册子并不是为了探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原因，而是为了揭示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从而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sup>②</sup>但他从经济上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为本国产品和资本提供充足的市场，这就势必要奴役更大的非资本主义地区。为此，列宁把欧洲列强瓜分非洲解释为资本家同盟争夺“经济”领土的一个表现。

列宁的成熟理论激励着后来的一大批学者，促使他们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探索帝国主义的起因，去解释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动因。如沃尔夫的《帝国与非洲商业》(1920)和摩恩的《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1926)均对此作了肯定的分析。虽然我们无法用今天的非洲经济尺度去衡量当时欧洲对非洲经济需求的程度，也不想用事实论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结论，但我们却可以用他的理论来回答帝国主义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非洲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输出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必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的原料产地，……因此总想不择手段地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块土地好坏如何，也不管它在什么地方。”黑非洲因此成为潜在的原料产地，或一块可能获利的经济领土被列强瓜分。但仍有疑问：如德国托拉斯占支配地位是在20世纪初，而德国瓜分非洲殖民地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由此可见，瓜分非洲的操纵者不

---

① 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2—80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2—813页。

全然是金融家。

霍布森—列宁的经济帝国主义论直至本世纪 50 年代尚未遇到学术界的有力挑战,即便是社会帝国主义论代表熊彼特、汉娜·阿兰等人。前者的《论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虽写成于 1919 年,但直到 1951 年才发表;后者的《帝国主义》一书明显地受到霍布森的影响。尽管如此,“经济帝国主义”在解释欧洲列强瓜分非洲问题上的欠缺还是使许多反对者可以有的放矢:如资本输出、国际托拉斯等在瓜分非洲过程中表现并不突出。“经济帝国主义论”并没有像“外交战略论”和“地区危机论”那样为我们提供详尽的瓜分非洲史实,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时代背景,而这个背景恰恰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欧洲列强的真实写照。他们是真正透过瓜分非洲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深入到背后去寻找推动这一事件的研究者。当然,费尔得豪斯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关注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运动,认为是它造成了列强在非洲的扩张。我们对此应当积极借鉴。

应当指出,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业成长即是一种周转不息的运作实体”,<sup>①</sup>它的发展是靠席卷广大非工业化地区,既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本的来源,也需要不断开辟自己的商品销售和金融投资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所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原因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密切相关。因为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都需要市场。但没有一个工业国愿意成为别国的市场,于是各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市场的竞争变得空前激烈,自由主义因此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平衡也被打破,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各国政治家积极运用外交手段,谋求占领有利的经济和军事领土,以摆脱经济不景气状态、保持或彰显

---

<sup>①</sup> 汉娜·阿兰:《帝国主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5页。

大国的政治地位。但这种政治上的需求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后者的获得要求不断进行生产和积累,当国内的生产和积累相对过剩时,它必然要去寻求利润更丰的国外商品和投资场所,这样就驱使了一大批人投身于海外的殖民事业。而非洲此时的战略地位和黄金、金刚石等矿床和棕榈油、橡胶、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现实利益,又吸引了欧洲的投资者和商人。他们不仅为金融资本攫取了经济上的利益,也为国家赢得了大国声誉。除此之外,欧洲大陆的科技进步,欧洲在非洲大陆活动的探险家、科学家、商人和传教士等取得了各项工作的巨大进展,欧洲的移民等团体、商业及航运等公司在开发非洲土地资源和南非矿藏方面的成功,为列强 19 世纪末瓜分非洲创造了物质条件。尽管在具体瓜分过程中表现出种种偶然性因素,但实际上“19 世纪 80 年代的瓜分是大约开始于 300 年前的对非洲进行蚕食的必然结果。”<sup>①</sup> 所以,瓜分非洲并不是由偶然性始发事件引发的,也不是由任何单纯的动因促成的,而是以经济为主的、包括政治、外交、战略、科技等各种因素的“合力”构成的历史必然性运动(参见第一章)。

### 第三节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 瓜分和“绥靖”

#### 一、瓜分的三种形式

殖民国家在 19 世纪前 75 年中,平均每年扩张领土为 21 万平方公里,从 1876 年至 1914 年达到 62 万平方公里,这其中就包括对非洲大陆的瓜分。

1876 年并不是正式瓜分的年代,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年代。

---

<sup>①</sup> 阿杜·博亨主编:《UNESCO(非洲通史)》Vol. V II,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年,第 21 页。

因为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终结、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同年“国际非洲协会”的创立至少意味着列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关注非洲了。此时的非洲大陆,除了北部突尼斯、的黎波里、埃及和整个尼罗河流域大片领土属奥斯曼主权之外,只有10.8%的领土为欧洲列强所占领,其余均在当地非洲人政权的控制之下。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疯狂瓜分令非洲人感到震惊,并震撼了整个非洲。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从1895年斯各特·凯尔蒂编著出版《瓜分非洲》一书至1991年托马斯·帕金罕发表《争夺非洲》,仅伦敦出版的专著就不下200部,<sup>①</sup>既有全面论述瓜分非洲的综合性著作,也有地区性的研究成果。新史料层出不穷,涉及瓜分时期各国报纸杂志的报道、国会记录、政治家言论及私人信件等等。这一切既给我们全面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增加了我们认清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实际上的瓜分完全是以一种政治性的外交手段和军事征服来进行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实际瓜分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表现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任何单一的因素来定论。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如比利时占有刚果自由邦,德国占领喀麦隆、西南非洲等;二是将原来的无形帝国即自由贸易区改为有形帝国并加以扩展,建立正式的殖民统治机构,宣布殖民地领土和居民归属宗主国,并筑起关税壁垒,如法属西非、英属东非等;三是正式吞并原来已经占领的部分地区,如莫桑比克在柏林会议后正式成为葡属殖民地。以上三种形式均遵循了柏林会议规定的“有效占领”原则,即要求占领非洲沿海新地区的国家通知《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的签

---

<sup>①</sup>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876—1912* (《争夺非洲:1876—1912年》),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 根据该书所附文献所做的估算。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最全面、最切合本文主题的参考书目。

署各国,同时建立足以保护该地区现有各项权利(如确保航运和贸易自由等)统治机构。尽管该原则只限于非洲沿海地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扩大到整个非洲内陆。

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具体过程基本上分为两大步骤:先是口头上的争议和纸面上划分界限的协定,其中包括殖民者同非洲当地政权的协定和列强之间的协议。这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欧洲开始只有少量的军队介入非洲,它们对于非洲居民必先以协商者、而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是地域上的征服和占领。因为当非洲人认清了入侵者的真实面目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殖民者最终以先进的武器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开始整饬非洲的混乱局面,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制度。其结果不仅使非洲领土及其人民臣服于殖民者,而且破坏了他们固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习俗,从而使非洲各地区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割断了同它过去的联系,而转向与欧洲殖民者的活动紧密相连,成为欧洲大陆历史主流的分支——海外殖民史的重要补充。

以下我们依次看一下非洲的北部、东部、南部、西部和中部是如何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领的。

## 二、北部非洲:埃及、苏丹和马格里布

埃及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又成为英印帝国“生命线”的战略通道。但它被法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其结果是法国对伊斯梅尔赫迪夫(奥斯曼总督)及其政府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后者不惜以国家主权换取西方的贷款,以致债台高筑。1875年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趁埃及财政困难之际,从赫迪夫手里购得44%的苏伊士运河股票,进而控制苏伊士运河。1876年,埃及财政濒临破产,英法联合控制埃及财政,实际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进而又控制了埃及政府,赫迪夫只是埃及表面上的统治者,由此引起埃及社会的政治动荡(详见第7章)。1882年

6月埃及亚历山大城爆发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50名欧洲人被杀。英借口苏伊士运河处于危急境地,以“保护者”姿态进驻埃及。法国则保留了他们在埃及的行动自由。苏丹马赫迪起义爆发后,又促使英国进一步向南扩张。因她考虑到苏丹是从开罗到开普修筑“2C”铁路的必经之地,再加上此时法、意在非洲之角的频繁活动已威胁到英国在苏丹的未来地位。为此,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1895年公开宣布消灭马赫迪运动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任务,并派出以基钦纳将军为总司令的英埃军队于1896年3月开始了全面征服苏丹的军事行动,至1900年最终以英埃共管形式确立了英在苏丹的统治地位。

1898年9月,基钦纳率军攻占恩图曼后,继续南下推进到法索达,与法国的马尔尚上尉一行相遇,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半年的“法索达危机”。英国坚持任何对尼罗河流域的侵犯都是对英国的不友好举动,因为尼罗河对苏丹和埃及都有供应饮水和灌溉之作用,埃及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尼罗河流域。而法国一方面实力不如英国,另一方面她的外交战略并不是与英国为敌。法国外相德尔卡塞说:“对俄国和法国来说,英国是竞争对手,她的行为总是令人不愉快。但她不是敌人,……只有俄、英和法能达成联盟,才能抵抗德国!”<sup>①</sup>为此,法国做出了让步。双方于1899年3月签订协议,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分水岭,作为英法在苏丹和乍得湖地区的殖民边界。从而避免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为后来的“三国协约”奠定了基础。

当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立足方稳之时,法国已控制了马格里布各国。法国视后者为其从地中海通向非洲的大门,其殖民战略计划是要囊括整个马格里布地区。

---

<sup>①</sup> Robin Brooke-Smith: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Documents and Debates* (《争夺非洲:文献与争论》),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7. pp. 96 - 97.

突尼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矿产不断吸引着法国的移民和资本。1868年突尼斯财政破产后,法国在国际债务委员会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进而在突尼斯享有各种优势。但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意大利移民超过了法国人,到1901年为法国移民的4倍。法国为此提醒意大利:“突尼斯是一个属于法国利益范围并应接受法国影响的国家。”<sup>①</sup>1881年,法国借口突尼斯山区部落对阿尔及利亚边界的入侵,出兵占领了比塞大城,突尼斯的贝伊政府被迫签约,允许法国占领突尼斯并代管其财政和外交事务。1885年,在突尼斯境内发现磷酸盐矿脉,法国公司负责开采,到1908年产量已高达52万吨。法国还将突尼斯建成葡萄种植园和橄榄树种植园基地,后者在1881年种植数为800万棵,1913年增至1200万棵,由此成为其最可靠的财源之一。

摩洛哥的独立一直保持到1912年,是北非地区惟一不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非洲最后一个沦为欧洲保护领的国家。法国历来视摩洛哥为其天然的势力范围,但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地中海国家、英国这一竞争对手及宿敌德国均不容法国轻易地吞并她。法国便借助外交手段,首先通过1900年和1902年两次同意大利达成的秘密协议,允许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换取意大利的认可。接着又在1904年同英国签署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得到英国的认可。同年,法国又和西班牙签署了在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这些引起德国的不满,因她正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开辟自己的市场。德皇威廉二世于1905年到丹吉尔港,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强调摩洛哥的独立意义,由此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翌年伊始,列强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城召开了关于摩洛哥未来的会议,最后签署的《阿尔黑西拉斯议定书》保证了摩洛哥的独立,但规定法国和西班牙享

---

<sup>①</sup> 马塞尔·佩鲁东:《马格里布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1页。



有特殊权利。1911年5月,摩洛哥苏丹为平息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请求法国的帮助,法国抓住这个机会派兵占领了非斯。德国借此声称法国已破坏了阿尔黑西拉斯协议,派出炮舰“豹子”号到达阿加迪尔港以保护德国商业的利益,法德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后法国以27.5平方公里的法属赤道非洲领土(在今喀麦隆)换取德国的“谅解”。次年,法西订约,摩洛哥北部沿海一小片地区归西班牙,其余均沦为法国的保护领。

意大利则乘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时,发动了入侵的黎波里的战争。1912年土耳其和意大利签订《洛桑和约》,土耳其政府承认意大利对黎波里的所有权。同年,法国为确保其北非殖民地的安全,吞并了今天的毛里塔尼亚。至此,整个北部非洲被瓜分完毕。

### 三、东部非洲:东赤道非洲、非洲之角 和马达加斯加岛

在19世纪以前,该地区受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影响较深,他们的商业活动从沿海深入到内地,欧洲在东非的主要活动是基督教士传教。自19世纪开始至1876年,从北部苏伊士运河到南部纳塔尔的整个东非沿岸,英国都享有无形的至上权。葡萄牙当时在莫桑比克管理几个沿海城市,她还不足以对英国构成威胁。埃及和桑给巴尔作为非洲政权,都是亲英国家,英国殖民大臣卡纳文勋爵对此评价道:“它们按我们的指示做得很好!”<sup>①</sup>英国传教士的影响使英国在马达加斯加岛也居于优势地位。但从19世纪70

---

① G. N. Sanderson,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mperial Ambition, Defensive Strategies, and the Anglo-Portuguese Congo Treaty of February 1884*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帝国的雄心、防御战略和1884年2月英葡刚果条约》), In: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俾斯麦,欧洲和非洲:1884—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和瓜分的开始》)。

年代后期开始,德国在东非表现活跃。由私人股份公司“德国殖民协会”操纵,彼得斯以此为名同东非酋长签订了 12 个条约,获得了乌萨加拉领土。等柏林会议一结束,1885 年俾斯麦就根据《总议定书》第六章通知签字各国:德国有效占领了东非乌萨加拉地区。德舰于同年 11 月驶入东非海域,由此引起英德东非之争。由于英俄阿富汗危机迫在眉睫和刚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起义,英国不得不采取妥协策略,双方以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界为线,在东非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此后,它们的扩张活动均未停止,争夺还在加剧。德国考虑到法俄两国在欧洲联手的可能性,同英国签订了《赫耳果兰—桑给巴尔条约》(1890 年),最终划定了两国在东非殖民地的范围,英国在东非无可置疑的霸权就此告终。

到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马达加斯加也很活跃。虽然大部分基督教徒都皈依了伦敦教会,英国同默里纳也保持了密切的外交联系,但岛上的大宗对外贸易却掌握在法国人手里。后者为保护其商业利益,在 1885 年第一次法马战争后,以签约方式取得对该岛外部事务的控制,并因此确立了对该岛的保护关系。马达加斯加作为印度洋航线上的重要加煤站,以及非洲种植园经济的基地,促使法国政府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于 1894 年 11 月征服并占领了马达加斯加。

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的渗透从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活跃,时值苏伊士运河竣工,从而使非洲之角顿成战略要地。1877 年英国在同埃及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索马里海岸……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让给任何一个外国。”<sup>①</sup> 1887 年,英国依据柏林会议的原则,把 1884—1885 年同当地签订的保护条约中获得的领地通知欧洲其他列强,并正式在吉布提至齐阿达港的索马里北部沿海建立英属索马里保护领。法国在 1885 年占领吉布提

---

①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年,第 85 页。

港。1888年同英国缔约,双方以泽拉和吉布提为界瓜分了非洲之角。1896年,法国将其在北部索马里的占领区合并为法属索马里,吉布提为其首府。

在英法入侵东非的同时,意大利也向东北非扩张。1869年,意“鲁巴蒂诺热耶航运公司”购得阿萨布湾一小块领土及红海岛屿,以此作为海上加煤站。1879年意政府买下该公司的辖地,阿萨布由此成为意属殖民地,1882年意出兵占领了该湾。此后,意以此为基地开始向内陆推进,通过1889年签订的《乌查里条约》,意割占了埃塞俄比亚北部领土,并宣布其为“保护领”。1890年2月,意宣布建立厄里特里亚殖民地。与此同时,意又对南部的索马里提出领土要求。英国采取扶持弱邻政策,使意大利以年租金16万卢比租到贝纳迪尔沿岸港口。1908年,意将南北领地合并为意属索马里。然而,意大利擅自宣布的《乌查里条约》中的“保护国”却没有得到埃塞俄比亚新皇帝曼涅里克的同意。后者在1891年致列强的信中写道:“如果远方的列强有意瓜分非洲的话,我无意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因为在异教徒的海洋中,埃塞俄比亚成为一座基督教的孤岛已经超过14年了。”<sup>①</sup>结果双方关于条约不同文本的争执导致了1895年意侵埃战争,但意军遭到失败。翌年6月双方签订和约,意承认“埃塞俄比亚帝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绝对独立”,但意大利仍保留了厄里特里亚殖民地。至此,整个东非地区除埃塞俄比亚仍保持独立外,其他地区均被置于列强的保护领或殖民地统治范围内。

#### 四、南部非洲:南纬10度以南的非洲大陆

南非包括两块英属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两个布尔人共和

---

<sup>①</sup>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876—1912* (《争夺非洲:1876—1912年》),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 p. 470.

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以及许多独立的非洲人王国和酋长国,其中最大的是巴苏陀王国和祖鲁王国;西南沿海的安哥拉和东南沿海的莫桑比克及赞比西河流域的部分地区由葡萄牙占领;西南非洲还是一片未被染指的荒漠。

开普曾是英国殖民地中最穷的一块,英国船只往往是经好望角而不上岸,直驶其东方殖民地。但开普却是英国通向印度洋和东方殖民地的战略保护地和商业通道。自1870年开始,开普境内最大的管状金刚石矿脉的发现,使后来命名为“金伯利”的荒芜之地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产地。它不仅增加了开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改变了当地的出口结构。1870—1875年,开普殖民地年均出口金刚石价值达130万英镑。到1882年增至400万英镑,超过羊毛成为最大的出口货物。这就宣告了南非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为此,英国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对南非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由60年代的“和平”或“举棋不定”改为进攻土著民族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政策。

1877年英国趁德兰士瓦政府无法处理财政和其他一些国内问题之机,吞并了德兰士瓦。1879年1月,英军借口祖鲁人首领开芝瓦约扩充军备而向北进犯祖鲁兰,经过6个月的战争,英军赢得了胜利。祖鲁兰被划分为13个“独立国”。1897年,祖鲁兰被英国正式划入纳塔尔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又因黑人武装问题同早在1871年就被并入开普殖民地的巴苏陀族进行了一场战争(1880—1881年)。1884年,巴苏陀兰改为英直属殖民地。

1880年,布尔人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爆发了1880—1881年第一次英布战争,德兰士瓦恢复了自主权,成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又称南非共和国。1884年《伦敦公约》确定了两国关系:英承认德兰士瓦独立,但若无英国的同意,德兰士瓦仍无权和各大国签约。同时禁止布尔人向西或向东进行领土扩张(详见第十章)。

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开始同德兰士瓦发展贸易关系。

不来梅商人吕德里兹已在安哥拉—皮肯纳建立贸易站,并要求政府的保护。1884年,德国政府将该海岸视为一个贸易通道,或至今尚未开发但价值可能非常大的矿产财富而兼并了西南非洲。就在德国占领西南非洲的同一周,俾斯麦邀请正在伦敦签署协议的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访问德国。后者奉行反英外交政策,致使德国在南非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增大。1885年,作为对德国兼并西南非洲沿海的反应,并防止德、布联盟阻挡其北进势头,英国政府正式占领了贝专纳兰,由此打开了从开普殖民地向北扩张的道路。罗德斯称该地区是他“通向北方的苏伊士运河”。<sup>①</sup>

1886年德兰士瓦境内兰德金矿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南非整个政治、经济发展的进程。这条世界最富的黄金矿脉绵延430公里,矿深3000—4000米,不仅吸引了淘金者和冒险家,也吸引了投资者和技术人才。1890年兰德各金矿投资总额为2200万英镑,1895年增至8250万英镑,其中英国资本占总投资的60%—80%。随着投资的增加,南非黄金产量也不断增加,由1878年的3.9万盎司增至1896年的200万盎司,到19世纪末已近2500万盎司,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27.55%,居世界第一位。黄金生产价值也由1886年的34710英镑增至1896年的850万英镑。这一经济的巨变,不仅给新生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带来了生机,而且打破了南部非洲的政治平衡。

布尔人不断向东扩张,其目的是将自己的领土伸向海洋。1885年她占领了祖鲁兰600万英亩土地中的300万英亩。斯威士兰实际已成为德兰士瓦的经济附庸和非正式保护国,后在1894年正式沦为其保护领。克鲁格政府的亲德政策使德国在德兰士瓦采矿业等领域的投资将近5亿马克,商品输出也由1886年的30

---

<sup>①</sup> 罗兰·奥利佛和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年以来的非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7页。

万英镑增至1898年的1200万英镑。移民1.5万人。<sup>①</sup>布尔人的扩张,德国势力在南非地区的渗透,德布友好关系的加强等等,这一切均引起英国的严重不安。在世界范围内,英德矛盾由此取代传统的法德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为摆脱开普政府控制铁路运输的压力,克鲁格利用德国与荷兰资本,同葡萄牙联合修建比洛(比勒陀利亚—洛伦索·马贵斯)铁路,该铁路后来几乎控制了德兰士瓦的全部对外贸易。克鲁格政府由此利用手中的兰德金矿和比—洛铁路这两张王牌,通过征收金矿开采税同英国金矿垄断资本家分享巨额利润,又通过恣意提高从开普殖民地向德兰士瓦进口或转口的商品关税,再次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摧毁布尔共和国。1899—1902年爆发的英布战争,实际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战争。最后以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告终。

英国吞并贝专纳兰后,开始向绍纳人和马塔贝莱人生活的广阔土地推进,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因为德国地质学家毛赫与英国人类学协会副会长基恩都考证说该地区可能就是所罗门王神话般的金矿所在地。葡萄牙人、布尔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垂涎这片广阔的领地。但英国利用其传教士莫法特与马塔贝莱人首领洛本古拉的私人关系,于1888年同他签订友好条约,由此将洛本古拉所管辖的领地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年9月,罗得斯派出以拉德为首的三名南非公司代表同洛本古拉签订了著名的“拉德租让书”,<sup>②</sup>南非公司借此获得在绍纳人和马塔贝莱人土地上开矿的权力。1893年10月,南非公司的军队进占马塔贝莱首府布拉瓦约。从1895年起,罗得斯的南非公司开始在公

---

① D. M. Schreuder,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1877—1895* (《争夺南部非洲: 1877—1895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94.

② Robin Brooke-Smith: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Documents and Debates* (《争夺非洲: 文献与争论》),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7, pp. 81—82.

文上写罗得西亚新国名,就此瓜分南部非洲基本上完成。

正在英国北上的同时,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势力也有所增强。1889年,她夺取了洛伦索·马贵斯与德兰士瓦边界间已修成的铁路。次年,葡又派出远征军去驻守沿线并扩大领地,想将葡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连成一片。但此时英国已经占领了罗得西亚,双方军队于同年9月在马西凯西发生武装冲突。1891年6月英葡签订和约,葡被迫放弃连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殖民计划。但莫桑比克仍属葡萄牙殖民地,其中大部分地方为莫桑比克股份公司所有。1893年,英国宣布整个尼亚萨湖地区为“英属中非保护国”,即今天的马拉维。

通过上述行动,英国在南部非洲的争夺中,瓜分到了面积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殖民地。

## 五、西部非洲

西部非洲包括西、南界为大西洋,北至撒哈拉沙漠,东部从乍得湖、沿喀麦隆边界至今日的赤道几内亚。1875年前后,英法在西非的争夺开始加剧。法国议会鉴于英国以一种不完全的保护主义形式—托管制度(Trust System)继续在西非地区享有商业上的优势,致使法商在西非的进展很不顺利,先于1873年提出所有到达法国殖民地的外国船只均须征税,在法属西非殖民地实行统一关税体制的要求。1877年法国正式宣布在塞内加尔境内实行差额关税:对到达该地的法国船只征税5%—7%,对外国船只征税15%—40%。1880年,法属西非殖民地的河流航运业务以差额关税制进一步向英国商船关闭。1889年又在象牙海岸推行该政策。与此同时,法国相继建立了“法属赤道非洲公司”和“塞内加尔和非洲西海岸公司”,到80年代初在尼日尔河流域约有55个商站、20家工厂,从事棕榈油、花生、可可和咖啡等作物的加工和贸易。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法国也进一步蚕食西非。她欲建立一个从阿

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法属索马里包括整个苏丹的帝国，即史家称为“2S”计划。在狂热的仇英分子、海军大臣饶雷吉伯里的支持下，法军主要从两个方向开始积极向内陆推进：一是从塞内加尔河中下游的法属领地向西苏丹腹地扩张；二是从几内亚湾沿海地区(象牙海岸和达荷美)的殖民据点向北推进。1883年法国在尼日尔河上游建立起第一个立足点—巴马科城，法借此据点南攻萨摩利，北取阿赫马杜素丹国，并沿尼日尔河顺流向前推进。1890年，法国占领了阿赫马杜国首府塞古城，1898年打败萨摩利。达荷美、尼日尔和上沃尔特分别在1904、1908和1910年并入法属西非殖民地。由此法国在西非地区站稳了脚跟。

英国在西非地区的殖民扩张基本上是以黄金海岸、拉各斯城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又称油河地区)为基点。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同西非的贸易发展很快，由1865年的25万英镑增到1879年的153万英镑。乔治·戈尔迪组建的“尼日尔河三角洲贸易联合非洲公司”(1881年并入“国家非洲公司”)，统一了英国在该地区经营的私人公司，拥有25万英镑的资产。他不仅在尼日尔三角洲建立起新贸易站，而且也深入各国的腹地进行勘察，同索科托素丹签订条约，在豪萨兰的大部分地区获得了友谊。到80年代法国政府在西非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戈尔迪却用自己雄厚的资产购买了法国在西非经营的一切商务，由此使英国单独控制了尼日尔河三角洲。柏林会议后，英正式宣布尼日尔河下游地区为保护领。

与此同时，英国以拉各斯港为突破口，向当时正在进行伊斯兰教圣战的约鲁巴地区推进。因当地的内部纷争已经破坏了生产的供应和制成品的分配渠道，中间商却从中渔利。1895年英军攻克奥约，至此英军完全征服了约鲁巴各城邦。在黄金海岸，她对正在内战的阿散蒂各部先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离间各派，接着于1890年出兵占领了阿散蒂首都库马西城。1902年，英国正式吞并了阿散



蒂国。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接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保护”。

正当英法争夺西非加剧之时，德国也加入了竞争行列。自19世纪50年代起，德国的不来梅商人和传教士就在多哥沿海积极活动。到80年代，德国的贸易开始增长：1871—1883年汉堡从西非的进口增加了183%，出口增加了56%。仅1882年就有96艘商船由汉堡驶向西非海岸。随着贸易利益的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流行，德国商人也请求政府的保护。1884年，德国连下三城，使喀麦隆、多哥和西南非洲沦为其殖民地。由于法德在西非殖民地问题上并无冲突，故法国先于1885年承认德国在多哥的权利。1886年，英国也承认了德国在多哥的特权，当时仍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以满意、同情和愉快的心情注视着德国在这些沙漠地区的扩张。”<sup>①</sup>1888年，德国在喀麦隆建立了今天的雅温得，作为其开发内地象牙贸易的中心。同时还控制了喀麦隆东南部的橡胶产地。德属喀麦隆向北一直延伸到乍得湖。

至此，西非还留下一独立国——利比里亚。它先是美国于1822年在非洲建立的一块移民地，以当时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为蒙罗维亚，主要居民是从美国返回的黑人。1847年宣布成立利比里亚共和国，1892年划定了边界。<sup>②</sup>由于她实际处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故在这一时期未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

总之，欧洲列强在尼日尔河及几内亚湾沿海地区的争夺导致19世纪90年代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最终确定了列强在西非领地的边界：法国成为占地面积最大的殖民者；英国在西非的领地面积不如法国，但冈比亚、尼日利亚等地的经济价值大大超过法属西非的大片沙漠地区；德国则满足于多哥和喀麦隆沼泽；葡萄牙通过

①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876—1912* (《争夺非洲: 1876—1912年》),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 p. 201.

② 1885年《英—利比里亚协定》确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西北边界。

1886年与法国签订的关于几内亚边界协定,仍在此领有一小片土地;比奥科岛和木尼河区早在1778年就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 六、中部非洲

中部非洲包括西起加蓬,东至尼罗河发源地,北起撒哈拉沙漠,南至罗得西亚北疆。柏林会议闭幕几个月后,比利时在“国际非洲协会”的幌子下攫取的中非领土改为刚果自由邦,由利奥波德二世担任国王。他买下了所有比利时人的产业,又将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他将开发天然橡胶的特许权授给贸易公司,从中既获得特许公司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获得他们成功经营所赚得的红利。刚果实际成了他的私人领地,直至1908年作为殖民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

法国为实现“2S”计划,由加蓬和法属刚果地区向乌班吉河、沙里河、乍得湖地区扩张。1900年,法军向乍得湖盆地发动了全面攻势,将该地区纳入法属西非殖民地。与此同时,刚果自由邦也开始向东北方即向乌班吉河地区扩张,进而向加扎尔河和尼罗河盆地扩张,在那儿遇到英法两强;她向南扩张又与罗得斯的南非公司相遇。1894年,刚果同英法订立条约,<sup>①</sup>确定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非殖民地的最后边界。比利时刚果自由邦在中非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领地,法国把加蓬、法属刚果及其他领地组成“法兰西赤道非洲联邦”,由此使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合而一体。德国根据1894年和1911年法德协定,喀麦隆的边界向东得到充分伸展。

继列强瓜分非洲之后,欧洲殖民当局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如何整顿占领地区的混乱局面,如何处理殖民者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以

---

<sup>①</sup> 《英刚条约》(1894年5月):英从比利时租得从爱德华湖南岸至坦噶尼喀湖北端一块宽25公里的狭长地带,作为“2C”铁路的通道。《法比协定》(1894年8月)比利时放弃占领尼罗河左岸的要求。

及如何对待他们的文化等等。所谓的“绥靖”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因为从非洲人的角度看,面对殖民者的入侵,他们必须作出选择—顺应或抵抗殖民者的入侵。虽然当时存在欢迎欧洲统治的非洲人,但这些“亲西方的非洲人”多数形成于殖民入侵结束之后,如德属东非的斯瓦希里人,后者因此受到德国殖民者的优待;信仰伊斯兰教的布干达人也充当了英国人和乌干达保护地其它部落的中间人。当欧洲人开始入侵非洲之时,绝大多数非洲人认为应当进行自卫。所以,非洲的抵抗运动在殖民统治时期风起云涌,有的甚至非常激烈,如西非的萨摩利抗法斗争、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反德运动。欧洲人对这些抵抗运动的平定和镇压,均被视为“绥靖”措施。所以,“绥靖”可视为殖民统治非洲的第一阶段。非洲人的合作或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殖民者今后的统治方式:直接或间接、统治。

从欧洲人的角度看,凡是不存在经济利益、又无需严密统治的地区均可推行间接统治方式。这种方式起源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非洲则是英国征服富拉尼族穆斯林酋长国(后来被称为北尼日利亚)之后双方政府相互妥协的产物。因为欧洲人投入非洲的行政官员和兵力并不多,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如此广袤的黑非洲。所以,他们开始只能通过参与非洲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帮助一些友好的集团与其宿敌进行斗争,以便在新的属民中争取同盟者,于是“分面治之”、“同化人”和土著人政策等应运而生。如果有必要采取行动的话,小规模的殖民军会在其土著盟友的帮助下,烧毁抵抗者的村庄,掳掠他们的牲畜,直到殖民政府的权威得到承认,他们才会停止这种镇压。如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刚成立不久,就组建了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424名豪萨和约鲁巴人组成的军队,它开始由卢加德指挥,后扩编并入西非边防军,就是这支部队征服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欧洲人在非洲进行的无数次“平叛”都被作为“治安行动”或“行政措

施”载入史册,使人形成一种非洲人主动接受绥靖政策的假象,从而抹杀了非洲人进行抵抗、以及欧洲人采取武力征服的事实。

那么,如何看待两者的合作问题?确有不少非洲人做出了与欧洲人合作的姿态,如东非的布干达人和斯瓦希里人、南非的巴罗策人和西非的富拉尼人、约鲁巴人、伊格博人等等。但多数合作是被动的。欧洲人在非洲当地招募士兵绝非现代意义上依据法律行使的职权,而是兼采收买与暴力两种手段。在征服非洲人的过程中,欧洲人的“绥靖”和武力镇压是并行不悖的。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以便于他们的统治。欧洲列强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保证自己不被排斥在有潜在价值的地区之外而占领非洲,殖民政府的主要职责自然应当是在不增加欧洲纳税人交税的情况下治理所辖地区。他们因此将教育和经济发展交给基督教会和商业公司等私人企事业,甚至将殖民政府的部分工作也委托给特许公司,使后者有招募官员和警察、执行税收和司法权。除此之外,他们还离不开非洲人的“合作”。正如法国殖民官员德拉涅特亲自所言:“任何殖民化都少不了土著人政策,任何土著人政策都少不了领土的控制,任何领土的控制都少不了殖民政权同居民之间起着联系作用的本地酋长。”<sup>①</sup>这便是合作的关键所在。所以,纯粹意义上的直接统治在非洲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向来被视为直接统治典范的法属西非殖民地,它到本世纪30年代末只有118名法国行政官员。但他们却通过32名省长或大区区长、2206名区长或部落首领及48049名非洲人村长统治这片地区。<sup>②</sup>

由此可见,绥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洲人的合作。

---

① 阿杜·博亨主编:前引书,第121页。

②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欧洲的工业主义文明带给非洲人,也不是为了取得殖民化的成功,而仅仅是殖民当局无法全面统治非洲的权宜之计。它因此促使了非洲社会内部的分化和重组,非洲开始孕育自己新的历史发展进程。

## 第十章 南部非洲的殖民化和种族主义统治

南非是非洲大陆白人移民及其后裔人数最多的聚居区(总数最高达 500 多万人)。这个地区的殖民化过程始终交织着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移民的归化问题。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及大规模开采,欧洲移民涌入南非愈来愈多,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色彩愈趋浓厚,进而将种族主义“立法化”,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占居民入口绝大多数的当地黑人(77%)实行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耻辱。1910 年南非联邦成立,1961 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虽然从国际法上看,它已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而且此后它的殖民主义转为以种族主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但是,对于被统治的、占居民绝大多数的黑人和混血种人来说(占 85%),南非仍然是一个白人殖民者统治的国家。从经济上看,南非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北美特点时所一再指出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殖民地。<sup>①</sup> 然而,让读者感到扑朔迷离的是,尽管南非本身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完全失掉”,<sup>②</sup> 但是,这个“白人至上”的国家却一直梦想在南部非洲建立以南非白人为中心的新殖民主义势力圈(所谓“星座计划”)和 10 个“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内部殖民地”。这项庞大的新殖民主义计划和它的强行实施,是完全违反二战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95、833 页。

② 同上书,第 495 页。

解放的不可抗拒的国际潮流，并且与南非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抵牾。因此，它最终不能不以彻底的破产而告终，从而敲响了新老殖民主义的丧钟。

## 第一节 现实和潜在的原料资源在 殖民扩张中的作用

### 一、奇迹的发生——金刚石矿的发现

世界资本主义愈发展，对原料的需求愈扩大。地球重要的矿产原料资源在地下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领土范围内蕴藏着的矿产在数量和品种上能够满足其工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的需求。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的初期，垄断原料资源产地不仅能提供额外的超额利润，而且能使垄断本身巩固无比，这引起了各国垄断集团的注意。19世纪最后30年，非洲各地尤其是南部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迭有发现，在资本主义列强中引起轰动。波斯德在《非洲矿产资源》一书中写道“非洲在同欧洲，尤其是同大不列颠、法国以及同世界其他各国的相互关系中，主要起殖民地原料生产者的作用……。非洲在矿产采掘中作用的统计表，有助于解释欧洲列强长期继续不断的注视非洲的原因”。<sup>①</sup>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形成的中心—外围格局中“技术不发达的国家成为工业中心的合成部分”，“履行着矿物原料供应者的职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近二百年时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手段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履行这种原料供应者的职能”。

南部非洲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不仅改写了南非的经济发展

---

① Postel, A.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Africa (《非洲矿产资源》), Philadelphia, 1948, p.8, 转引 M. C. 罗津:《非洲矿产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第4页。

史,而且改写了欧洲列强在南部非洲的殖民扩张史。19世纪70年代以前,瓦尔河南北岸(今金伯利城附近)是一片少数格里夸牧人<sup>①</sup>居住的荒芜之地,自从1870年前后发现金刚石矿后,金伯利矿区的产权和领土主权成为英国人、布尔人激烈争夺的虏获物。来自各方的“淘金者”近5万人麇集在狭小地段挖矿。英国人凭借其殖民实力,通过强取豪夺手段,最终使这块宝地成为英国的西格里夸殖民地。此后,英国将它命名为金伯利。到1882年历年开采的金刚石总值已达2600万英镑,当年出口值达400万英镑,为开普殖民地传统畜产品和其他产品出口总值的5倍,由此根本改变了开普地区的出口构成。

## 二、兰德金矿改写了南非的历史

德兰士瓦的威斯沃德斯兰德(简称兰德)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则在规模更大、更加烜赫的程度上重复了这一过程。金矿于1884年发现。1886年从碾碎的砾岩中洗出第一批黄金,肇始了世界最大、持久不衰的金矿的开采。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资本迅速大量地涌入德兰士瓦。1887年,甫在金刚石矿经营中发了大财的罗得斯,与拜特、拉德合伙,成立南非统一公司。次年,垄断性的矿业同业公司成立,迅速地完全垄断了南非的黄金生产。1890年兰德各金矿投资总额已达到2200万英镑。1887—1895年间兰德金矿产量从1.2吨增至62.7吨,8年中增长51倍,到1898年南非金产量已占当年世界产金总量的27.55%。<sup>②</sup>兰德金矿的开采完全改变了30万平方公里的德兰士瓦的经济价值。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自1852年成立后,在1886年前一直挣扎于财政破产边缘。1884年欠款达39.6万英镑,无力偿还。1886年布尔人政

① 科伊人与白人的混血人种。

② Warwick,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南非战争》), London, 1980, p.19.



府财政收入翻了三番,到 1897 年已达 448 万英镑,金矿税款收入已超过一向被视为南非地区最大收入的开普关税收入。几年之内,德兰士瓦从默默无闻的荒凉贫穷小国一跃而成为令人称羨的富国。英资在金矿总投资中占 60%—80%,金矿生产的黄金源源不断流进英格兰银行地下金库。世纪之交,正是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扶摇直上时期,各国大都实行多种形式的金本位制,拥有最雄厚黄金储备的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不发达国家作为贵金属资源供应者的作用在垄断资本控制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南非两大富矿的接连发现打开了欧美列强政府和投资者的眼界:潜在的(可能发现的)原料来源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非洲就是这样充满希望的大陆。南非两矿的例子说明,现时看来无用之地,若是在勘探、加工、利用、运输等方面发明了新技术,投入巨大资本,便可变成极其有用之地。攫取这些经济领土,将来有“可能获得”极高的利润。欧洲列强政府面临选择:如果不想在争夺全球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非洲是其中最大的一块,尚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未被瓜分)的激烈斗争中,落后于他国,便要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而不管这是热带丛林的土地或是沙漠地带,不管是位于酷热的非洲赤道地区或是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带。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 19 世纪末迈入垄断阶段,已不可能从容不迫地从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或简单改善一下生产条件以增加原料的供应,只有实行殖民扩张,抢先占领所有重要的原料来源地,才能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于是,从 80 年代起,便揭开了占据非洲殖民地白热化斗争的序幕。

## 第二节 争夺南非殖民权益的 英布战争

### 一、布尔人的殖民者身份

荷裔布尔人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的地位是颇为特殊的,尤其是他们同当地非洲人的关系的演变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布尔人在南非的四百四十多年历史中,其社会地位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显著变化。判断英布战争的性质,除了依据一般的原则标准外,离不开对布尔人在南非社会地位及其经济制度性质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布尔人在南非的地位就如同 1776 年前北美十三州欧洲移民的地位,因而断定两次英布战争尤其是第二次英布战争(1899—1902 年)的性质是布尔人保卫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sup>①</sup>如果我们具体分析布尔人和美利坚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包括人口比例、本身的主体或非主体地位、文化的互化关系等),不难看出二者有很大差别。首先,北美移民多数是劳动者,不少是清教徒,到新大陆披荆斩棘,另辟天地(除了后来在南部形成的种植园奴隶主外),在开拓北美土地特别是西部土地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由于印第安人居民人数的不断减少,在一些地区甚至灭绝(对此,北美的部分移民负有历史责任),欧洲移民在人口比例上早已成为北美的主体,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其次,从北美移民的作用看,一般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载体。他们引进的欧洲先进生产力对开拓北美土地并使整个北美洲大陆经济后来居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南非的欧洲移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却没有起同样的作用(原因已在第 5 章中分析)。

<sup>①</sup> 西克:《黑非洲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下册,第 802 页。

南非欧洲移民(所谓南非白人,主体部分是阿非利卡人)的阶级结构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在南非的经济、政治地位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近二百年时间,南非白人基本上是铁板一块,没有或较少发生分化。如前所述,头几批移民几乎从一踏上南非土地就使用黑人奴隶、马来奴隶和科伊牧奴,本身脱离劳动,没有身体力行地参与艰辛的开拓殖民地的劳动。因为南非内地有大量土地可供占领,又有大批土著劳动力可供剥削,在一百年时间中进入内地的布尔人几乎都成为剥削非白人劳动力的农场主。1820年开始移民南非的英国人,情况有所不同,初期他们大部分成为农场主,但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后来受种族主义的影响,在南非所起的资本主义载体的作用也远不如北美移民。这一时期充满了掠夺当地非洲人的拓疆扩土的殖民战争,由于“边区”还有许多土地可供占领,两个压迫民族——生活在两个布尔共和国的阿非利卡人<sup>①</sup>和拥有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的英国人作为“主权的独立拥有者”在争夺土地和资源中尚有游刃的余地,未达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在大迁徙后的四五十年时间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布尔共和国的落后生产力和很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限制了布尔人的贪欲,也缓和了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殖民利益的冲突。1852年和1854年英国承认两个布尔共和国的独立。布尔地主靠非洲人的劳役和实物地租及出售部分牲畜产品,过着简陋的乡居生活,布尔政府财政收入微薄,主要靠非洲人的牲畜税和布尔农场主的地税,财政一向拮据,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在各国殖民者心目中是极不起眼的穷地方。

第二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英国人和布尔人两个压迫民族的矛盾急遽尖锐化,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1)南非土地的扩展在北部和西部都已进抵天然的界限——林波波河

---

<sup>①</sup> 布尔人作为一个民族称阿非利卡人(Afrikaner)。

和卡拉哈里沙漠,已无多少空间可以互不妨碍地扩展;(2)地下丰富资源(金刚石矿和金矿)的突然发现和英布全力抢夺;(3)对土著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争夺;(4)对当地非洲人(土著)政策策略的不同;(5)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德国)的介入。这五方面因素使两个殖民者民族及其所依靠的政权势力之间争夺矛盾白热化,终于导致了英布战争。

自19世纪50年代美利奴良种羊引进布尔两共和国,羊毛业迅速发展,羊毛生产使部分布尔农场主的收入增加一倍以上,由此进一步推动商品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的急速减少,和两大矿区的建立,地价不断上涨,出现了土地市场,土地变成紧俏商品,1摩尔根土地售价从8先令涨到32先令,兰德矿区附近的土地身价百倍,原值350—750英镑的一块农场土地竟上涨到70000镑。<sup>①</sup>促使地价上涨和地产集中的因素还有政治机构方面原因<sup>②</sup>:以土地作为官僚薪俸的支给,发行纸币的基金;申请贷款的抵押;允许土地投机公司从事地产业务。在德兰士瓦共和国,一二十年内通过“薪金”、“基金”、“抵押”等形式,大片地产迅速集中到各级政府官僚和民团指挥官为核心的大地主和地产投资公司手中。连任四届总统的克鲁格在任职期间攫得大片地产,成为家财万贯的大地主;民团总司令朱伯特攫得12个大农场,继任总司令博塔也拥有6个农场,16000英亩土地。这些“土地主”对地产情有独钟,在20世纪结束前,他们拥有的巨资大部分用来购买土地,极少投资金矿和其他工业。土地资财不断增加,到朱伯特坠马而死后,他一入就拥有29个农场,8万英亩土地。<sup>③</sup>

---

① Fisher, *The Transvaal and the Boer* (《德兰士瓦和布尔人》), London, 1900, p. 261.

② 详见郑家馨:《英布战争性质剖析》,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③ S. Marks and Atmor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工业化前的南非经济和社会》), Longman, 1980, p. 352.

随着地产日趋集中和布尔人口猛增,阿非利卡人内部阶级分化逐渐加剧,布尔人中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无地的“拜旺纳”(by-wonners)——贫穷白人(white poor)。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布尔地主自营商品性农业,“拜旺纳”欲依附大地主使用其土地变得越来越困难。游离出土地的“拜旺纳”数目日增。19世纪末仅在约翰内斯堡就聚集了6205名无地布尔人,初以牛车运输为主,不久便被迅速通车的铁路所淘汰,成了无业的贫穷白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原来的拜旺纳。无地“拜旺纳”的日益增多影响布尔人社会内部的稳定、民团的士气和战斗力,布尔统治集团对此颇感焦虑。在19世纪最后25年,为减轻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利益冲突,满足地主阶层对土地和货币财富的需求,布尔政府一项基本政策是:在边界以内和以外加紧殖民扩张,夺取仍然独立的非洲酋长国的土地,在资源配置上争取最大的份额。然而,19世纪末,布尔人向外扩张已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868年英国兼并巴苏陀兰后,布尔共和国的东、西、北三面边界落入英国领地包围之中。其后,向西南方向“钻石宝地”的扩张也被堵住了。在东南地区,1884年位于印度洋岸的布尔人梦寐以求的卢西亚湾被英国人抢先占领,布尔人仅与英国人大致平分了祖鲁兰土地。在西部地区,布尔人企图封锁英国人北上道路(“传教士道路”),但最终被沃伦爵士指挥下的5000英国兵击败,布尔人被赶出了贝专纳兰。在林波波河以北地区,自兰德金矿开采后,布尔政府急忙向北扩张,以便抢先占领传说中的“第二个兰德”,但它向马绍纳兰扩张计划被抢先下手的罗得斯所挫败,1890年英国先遣队占领马绍纳兰。只有在东北地区仍保持独立的斯威士兰王国,布尔人靠它几十年扩张的基础,并以放弃林波波河以北扩张计划为代价,换取英国承认德兰士瓦共和国“拥有保护、治理和管辖斯威士兰的一切权利”。斯威士兰作为布尔人保护国,其国内土地73%归白人占有,部分

满足了布尔地主对土地的需求。<sup>①</sup>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边界”内,19世纪90年代布尔人扩张比较顺利,1898年兼并了文达王国,使德兰士瓦共和国疆土扩大到30万平方公里。在疯狂兼并土地高潮中,布尔人政府于1881年开始划定土著保留地,仅给非洲人留下3%土地,而白人地主和土地投机公司占有德兰士瓦全部土地的97%,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其后又出现“拜旺纳”问题,使整个社会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矛盾益趋尖锐、复杂。显然,到19世纪末,按照以往办法仅靠无限扩大布尔共和国疆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土地问题已无可能。布尔人统治集团一方面故伎重演,在扩大领土攫取土地上,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如兼并斯威士兰;另一方面开始更加重视在占有资源权益上,对英国采取寸利必争政策,以扩大布尔集团的经济权益。

90年代,布尔政府把兰德金矿当作“下金蛋的鹅”,开始征收苛重的直接税和利润税,如从1898年11月起对金矿征收5%利润税,分享金矿的巨大利润。<sup>②</sup>从授予各种特许权中收取额外收入,如仅从矿用炸药特许权中就额外获得每年30万英镑收入。断然提高从英属开普地区向德兰士瓦进口或转口商品的关税税率,1897年仅进口关税收入127万英镑,英国等国金矿主为此付出了巨额关税。此外,提高从开普和纳塔尔通往兰德金矿的英资铁路在德兰士瓦境内路段的运费,以吸引进口货物搭载布、荷合资经营的德拉戈阿—兰德铁路线,这种差别价格使英资开普铁路货运受严重影响,货运量从占南非铁路货运量85%降到28.4%,而荷资德

---

① Fair, Murdoch & Jones, *Development in Swaziland, a Regional Analysis* (《斯威士兰发展的区域分析》),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4—25.

② Leonard,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 1885—1895*, (《1885—1895年南非政治形势文件》) London, 1903, p. 358. 以下简称《南非文件》。

拉戈阿线的货运量上升到占 34.54%。<sup>①</sup>英国铁路资本家、矿主、商人不断向英国政府抱怨这些“不公平措施”使他们的经济权益受到极严重损失。

布尔统治集团基本上是大地主集团，金矿的税收和地产的收益使他们骤富起来，但他们还不懂得对工矿业进行有利的投资。这些大地主认为他们要在南非永远立足并掌握优势，根本利益在于维护阿非利卡人对占居民人数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主要是黑人）的稳固统治。而这种种族统治的稳固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阿非利卡人面对黑人和英国人，需要更紧密地抱成团。这种心态滋长了阿非利卡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使之极端化。然而，可占土地的逐渐减少不可避免地造成布尔人内部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拜旺纳”人数明显增多，使布尔人的团结气氛和民团战斗力及士气均明显下降，形成内部危机，给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从 1897—1899 年的财政支出的分配，可以窥见布尔统治集团是如何重视和解决危机：(1) 国家财政（1897 年达 448 万英镑）主要用在布尔官员的高薪制，仅 1899 年就开支 121 万英镑，<sup>②</sup>俸禄和地产使高级官员均成富人，以此维持布尔上层的团结。(2) 让多数布尔人亦分享一杯羹，特设财政开支的特殊项目，如以 34 万英镑用作布尔农场主（包括“拜旺纳”）旱灾食品补助，45 万英镑用于进口毛驴（跑运输用的）的价格补助，以补充布尔人因畜瘟遭损的 30 万头牲口，以 15 万英镑作“贫穷白人”的救济款。(3) 降低地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减免布尔人税收，100 摩尔根<sup>③</sup>土地仅征收 2 先令的象征性地税。13 万布尔人通过这种财政开支分享了金矿的巨额收益，一定程度上缓

---

① Muller, edited, 500 Years,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南非 500 年史》)1988, pp. 318—322.

② 《南非文件》中德兰士瓦政府 1894—1895 年财政收入和支出列有详表，见 pp. 358—359.

③ 1 荷兰摩尔根土地等于 2.116 英亩。

和了因内部阶级分化而引起的不满。(4)大笔财政开支用作兵团军费,给服役布尔人各种优惠补助。应该说,财政上实行的这种一定程度的“利益均沾”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无论是在战前、战时或战后时期都增强了布尔人的内部凝聚力和民族主义精神,使他们在黑人、英国人面前抱成一团。这是南非阿非利卡人实行的殖民制度的一个重大特点,也是它颇具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二、维持一支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布尔兵团。战前几年仅购买欧洲新式武器就花费300万英镑,弹药52万英镑。布尔人使用的德造步枪和克虏伯大炮比英军更先进。

## 二、英国对南非政策的嬗变

19世纪,英国在南非一直奉行 Supremacy(霸权,至上权)政策。英国历来对布尔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允许予以考虑:(1)其土地经济上对英国无益,而且成为沉重财政负担,(2)英国在商业和政治上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对布尔共和国施行有效的控制。1852年和1884年两次允许德兰士瓦共和国独立,<sup>①</sup>都是在这两个前提下实现的。然而,1884年伦敦条约刚刚签订,南非经济形势骤变,1886年发现的兰德大金矿成为南部非洲的聚宝盆,随着德国国旗插上鲸湾(今纳米比亚),德国东进势力又逼进布尔共和国的西界,两个布尔共和国外交上成为明显亲德的“条顿兄弟”。英国近一百年来在南非的霸权(至上权)势力,面临着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英国保守党政府力图通过英帝国联邦形式,实现兼并控制的政策,来消除“布尔—德意志联盟”对英国至上霸权所形成的威胁。然而,殖民大臣卡纳房制定的这一政策一开始就受到布尔人的坚决抵制,不断碰壁,终于在1895

---

<sup>①</sup> 1877年4月至1881年8月,英国曾兼并德兰士瓦共和国4年。



年以“詹森袭击”事件而宣告彻底破产。英国对布尔共和国政策开始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

“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 1899—1902 年英布战争是世界殖民主义史上一场罕见的战争。它的性质，各国学者聚讼纷纭，至今尚未有统一认识，<sup>①</sup> 这场世纪之交的战争影响远远超过地区战争，对世界现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英布战争(亦称南非战争)不具有 1776—1783 年北美战争所含有的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性质，也不同于 1756—1763 年英法两个殖民国家在印度的战争，或 1905 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战争。交战一方的布尔人，不具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垄断资本性质和布尔共和国属于已走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sup>②</sup> 我们认为，布尔人仍然属于尚未完全归化于南非的殖民者，与 18 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美利坚民族不同。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同英国殖民者争夺他们掠夺南非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最大份额的战争。南非的主体民族是占总人口 75% 以上的讲班图语的黑人，他们与已在北美大陆降为少数民族而仅占总人口 1% 的印第安人是不同的。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一方——阿非利卡人(布尔人)<sup>③</sup> 属于已定居于南非、人口已达二十几万的殖民者民族，但他们又不是主体民族，而且由于在其统治地区执行践踏人类文明的种族主义政策，而与主体民族处于完全敌对状态。其本身主要经营农业和牧业，大部分是正经受着市场经济猛烈冲击的农场主，虽然占有兰德金矿等矿区，但既非经营者亦非投资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阿

---

① 参见郑家馨：《英布战争性质剖析》，载《世界历史》，1984 年第 6 期。

② 丁建弘、周南京：《英布战争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78 年第 11 期。

③ 南非荷裔白人在史学著作上称谓经历几次变化：17 世纪的自由公民(burgher)，18—19 世纪的布尔人(Boer)，20 世纪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

非利卡人的扩张,性质上仍然是殖民土地扩张。在矿业经济的影响下,他们所经营的农牧业的商品经济成分有较显著的增长,但仍属半封建经济。

英国殖民者(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较阿非利卡人为少,主要由以下移民成分构成:(1)从事资本主义方式的农、牧业经营的农场主;(2)工矿小企业主和矿业技术人员包括大批 Uitlanders(外来人);(3)投资资本家,代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如罗得斯、拜特(Beit)、拜尔纳托(Barnato)、维尔纳(Wernher)、鲁宾逊(Robinson)、奈曼(Neumann)等。

其中第三部分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他们对英国政府制定南非政策影响颇大,尤其是罗得斯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家财团。他们与伦敦金融中心的金融家和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的工业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70年代起,欧洲向南非的投资经历了几次高潮。第一个高潮是金刚石(钻石)的发现引起的,主要特点是,当时欧洲资本措手不及,蜂涌而至的开采者有些人发了财,用这些资金去搞投机,又靠投机而积资。罗得斯、拉德、巴尔纳托和拜特靠金伯利地产投机挣得几百万镑,用这些资财来收购破产企业,短期内成了巨富。1882年南非一年开采的金刚石产值达到2600万镑,超过开普殖民地1826—1861年出口总值,南非殖民地身价倍增。1880年罗得斯创办“德比尔矿业公司”,得到伦敦路特希尔德财团的支持,1888年吞并了巴尔纳托创立的“金伯利中央矿业公司”,成立“德比尔统一矿业公司”,从而垄断了世界金刚石生产的90%。1884年兰德大金矿发现。南非矿业三巨头—罗得斯、巴尔纳托和拜特将金刚石矿赚来的巨额利润投资金矿,引起南非第二次更大的投资高潮。这次投资高潮有新的特点,欧洲最大财团直接打进南非。欧洲大小资本家闻风而至,如蝇逐血,纷纷进入南非,在兰德短时间内成立几百家公司,除英资外有不少德国资本家,如奈曼、莫岑塔尔、阿德勒等,他们投资金矿和铁路煤矿等基础

设施。充当领头雁的仍然是最具优势的罗得斯、拜特等大资本家。1887年成立“南非统一金矿公司”，1889年成立了埃克斯泰因为为首的“矿业同业公会”。1890年各方对兰德金矿投资总额达2200万英镑。资本积聚过程进一步加速。几家大公司迅速将兰德数百家小公司兼并。投资得到丰厚回报。仅1890年罗得斯从金刚石矿和黄金矿获得利润达500万美元。南非股票在伦敦交易所成为抢手货。

金融资本家在南非的渗透程度超过工业资本家。1879年英资“帝国银行”在南非成立了“非洲银行”和“非洲联合银行”。1887年“南非标准银行”与“伦敦—南非银行”合并。这三家帝国银行迅速取代了开普殖民地原有的29家地方银行。到1890年标准银行已发展71家分行，存款额10年内(1870—1880)从50万增至500万英镑，增加10倍。阿非利卡人的奥兰治议会对英资猛烈扩张深感恐惧，担心奥兰治“全国人民都将依附于它”，企图封闭英资分行。

欧洲资本全面渗入南非各个经济部门。1889年英资公司增至642家。南非成为英国在非洲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1850—1890年间英国向南非商品输出额增长了11—12倍。英国厂家生产的铁路用品、电报设备、棉纺织品等潮水般涌入南非。

英国资本家在南非的投资和商业利益全面上升，英国朝野各界对南非表现出日益增加的兴趣。担任开普殖民地内阁总理的罗得斯，为扩大英国在南非扩张的拥护者基础，别有用心地把英国下层人民吃饱肚子问题同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扩张联系起来，对英国人进行煽动性宣传：“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内战，我们这些殖民地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

国主义。”<sup>①</sup> 英国商会的南非代表团 1889 年 1 月赴伦敦会见殖民大臣克努特福德(Knutsford)勋爵,请求英国“确保”开普殖民地以北地区并修筑进入南部非洲大陆腹地的铁路。在此之前数年,罗得斯集团已将扩张矛头指向林波波河以北的广大腹地,派人进入马塔贝莱兰(马绍纳兰)进行可行性研究。

在英国人向林波波河以北的赞比西流域挺进的同时,布尔人也觊觎北边这块沃土。1887 年德兰士瓦共和国派遣两名官员进入马绍纳兰,同马塔贝莱国王洛本古拉签订条约,并派驻领事。布尔农场主积极筹组“迁徙队伍”准备北上。布尔人北上目的比较有限:主要是抢先占领“第二个兰德”的土地。英国的目的则比这广泛得多,不仅要追求“埃尔多拉多”(El Dorado),<sup>②</sup> 而且(至少在罗得斯计划中)要以此为中心,囊括赞比西河流域,与尼罗河和大湖区域的扩张活动相呼应,建立从开普(Cape)到开罗(Cairo)的“二 C”铁路为中心的纵贯非洲大陆的殖民帝国。

英国保守党索尔兹伯里政府一向支持罗得斯计划,殖民大臣张伯伦同罗得斯配合默契。英国既想未雨绸缪,得到一个由它控制的“第二兰德”,又想在洛本古拉王国土地上(今津巴布韦境内)建立一个坚强的英国殖民地以策应南北,从北边遏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崛起。1889 年英国政府以优惠条件,批准给予罗得斯的南非公司特许状。以罗得斯为代表的一批金融家则揣摩英国政府的矛盾心理:既不愿在南部非洲的行政费用上花更多钱;<sup>③</sup> 又怕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桀骜不驯,难以用“联邦”的辮头套住它;还担心一向忠诚的开普地区的阿非利卡人心怀二心成为“特洛耶”木

① 1895 年罗得斯同其密友斯特德(Stead)的谈话,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71 页。

② 南美传说中的“镀金人”,引起寻找“黄金国”热潮。

③ 1885 年 9 月建立的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皇家殖民地,十分贫瘠,英国收不到钱,反倒花费了行政费用和军费。

马, 罗得斯集团要让白厅牢牢地依靠他们, 在非洲实现既定的帝国蓝图。

然而, 如上所述 1895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南非形势骤变, 各方矛盾尖锐化。金矿形势千变万化: 马塔贝莱人土地上并未出现“第二兰德”的奇迹, 黄金国企盼渐成泡影; 倒是德兰士瓦的兰德金矿深层矿脉的开采, 因采金技术改进而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投资, 兰德股票飞涨。许多涌往北方的“探宝客”又回师约翰内斯堡, 加入 Uitlanders(外来人) 的队伍。克鲁格总统为首的布尔地主集团精明地抓住“两大法宝”——兰德金矿的所有权和德拉戈阿铁路运营权与英国争斗, 似乎已稳操南非贸易和投资的优势地位。克鲁格轻藐地将英国拟议的“联邦”政治方案的“警头”抛在一旁。1895 年底, 罗得斯发动的、得到索尔兹伯里内阁首肯的“詹森袭击事件”, 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堡垒不但未在内部被攻破, 却因粉碎了罗得斯组织的“外来人”叛乱, 并获得德国的公开支持而更显牢不可破, 俨然成为屹立于兰德矿脉上的富国。开普地区的阿非利卡人麋集到布尔人民族主义旗帜之下。罗得斯从开普殖民地总理的位置上跌了下来, 阿非利卡人协会推出的人物取代其总理位置。英国政府深感它在南非面临大祸临头的局势。罗得斯为首的金融家和英裔殖民者组成的政党都主张要对布尔人共和国实行武器批判。英国政府向来对殖民地实行两手政策, 软的不行, 武力解决便提到日程上。1899 年 9 月, 英布战争爆发了。

### 第三节 殖民主义开始以种族主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

#### 一、种族主义政策成为英、布妥协的基础

1899—1902 年的英布战争, 英国以巨大代价取得胜利。英布

战争的严酷性使英国统治集团认识到它在南非的利益需要建立在白人联盟基础上,早在战争尚处于游击相持阶段,英国就寻求同阿非利卡人(布尔人)建立新的同盟基础。“梦里寻它千百次”,这个基础便定位于南非种族主义的法制化。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必然产物。殖民主义史证明,任何殖民主义者都实行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同样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在南非,英国自1806年长期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同样对非洲人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如1809年的《霍屯督条例》),但英国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与阿非利卡人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的最大不同地方,在于阿非利卡人宣布种族主义为其正式信条,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宪法中赫然载明非洲人不能享有平等权利,而英国人则总是以伪善的辞句对种族主义加以掩饰,既要从种族主义中获取实利,又要为自己立“反种族主义”的牌坊。出于对阿非利卡人斗争的需要,英国往往以保护非洲人和纳塔尔的印度人的权益为幌子,大肆宣传它的“反种族主义态度”。例如,在非洲黑人和有色人的选举权上。布尔两共和国曾明确宣布,非白人绝对不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英国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则表面上规定不分肤色一律享有选举权,而在财产条件上规定了极高限制,使绝大部分非洲人不可能拥有投票权,正如罗得斯蛊惑人心地宣布“一切文明人均有平等权利”,由于绝大多数非洲人没有机会受到欧式教育因而永远成不了英国标准的“文明人”。1892年英国又把财产限制条件提高二倍;在此之前,1882年英国剥夺了纳塔尔所有黑人的选举权。英国此举的动机,正如开普殖民地内阁总理斯普里格(J. G. Sprigg)在解释提高开普黑人享有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条件时曾承认,若不采取此项措施,总有一天欧洲选民的人数将“被大批野蛮人所超过”。<sup>①</sup>在结束英布战争的弗里尼欣和约中,英国人向布尔

---

<sup>①</sup> W. Dilke, *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 (《大不列颠问题》), London, 1890, p. 290.

人允诺,在布尔两共和国地区未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前不给黑人选举权,即使将来授予他们选举权亦应加以限制,以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sup>①</sup>1906年,在英国统治下,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殖民地分别进行没有任何非白人参加的选举,阿非利卡人获胜。在建立了阿非利卡人掌权的代议制政府后,英国仍然未授予这两地黑人任何选举权。英国在选举权上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进一步向布尔人靠拢。

1909年通过的《南非法》是拟议中的南非联邦的第一部宪法,也是英国人同阿非利卡人建立新的联盟的妥协产物。1910年,在英国主持下成立南非联邦,并组成由阿非利卡人领袖博塔任总理的内阁,从此长达50年(直至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南非联邦的中央政府均由阿非利卡人掌握,英国人担任英王任命的总督。在英国人取得对阿非利卡人的军事胜利的第二次英布战争之后,出现如此权力分配的结构似乎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实际上,这一殖民主义史上的特异现象,在两派白人殖民者经过近三年血战后,出现在南非这块特殊的白人殖民地上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权力的分配结构明白表示,两派白人殖民者在“黑人海洋的威胁”面前,为了维持白人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双方相互作出了妥协和让步。一方面阿非利卡白人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的让步,不再坚持关税、铁路运费的差别收费和兰德金矿的特许权转让等权利,而让英国资本长驱直入。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和英裔白人在政治上也作出重大让步,不再打“黑人选举权”这张牌,而让阿非利卡人凭借其在白人居民中的多数,通过选举不仅赢得德兰士瓦、奥兰治和开普三个殖民地中的地方政权,而且攫得中央政府的组阁权力以及中央议会的多数席位。

从分析英布战争结束后南非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形势和力

---

<sup>①</sup> T. R. H. Davenport, *South Africa-Modern History*(《南非现代史》), Toronto, p. 202.

量对比状况,可以看到当时两派白人殖民者双方都有可能和必要作出妥协和让步,而不损害对方的根本利益。南非真正的主人——黑人的力量尚不足以阻止两派白人结成同盟的行动。维持和巩固南非的白人殖民统治,扩大殖民经济利益,保持白人的民族特性及其文化,是当时英裔白人殖民者和阿非利卡殖民者基本的利益。然而,在历史进入 20 世纪,南非攫取和巩固这些利益已经不能仅仅用一般的殖民压迫、剥削的手段,而需要使用特殊的殖民暴力——种族主义。

在白人统治集团看来,南非的特殊人口构成已在英布战争中和战后初期突现出,对白人统治的稳固性构成潜在的威胁。几百万黑人静静地观望两派白人殖民者的厮杀,战争初期布尔兵团有 44% 至 35% 兵力未投入对英作战战场而驻屯后方要地,“监视”非洲人。交战双方达成默契都不许带枪的黑人上前线。三年血战使阿非利卡人口减少了数万人,仅儿童死于英军设置的集中营就达 22 072 人,<sup>①</sup> 布尔军队从 5 万多人减少到 2.2 万多人;英军伤亡 2.1 万人。1901 年,南非白人总数为 94 万(英人 36.8 万人,阿非利卡人包括开普在内为 49.6 万人,其他国籍白人 7.6 万人);1904 年讲班图语黑人为 349 万人(不包括混血人)。黑人和白人的比例降为 4:1。随着黑人人口增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sup>②</sup> 黑人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有特色的文化,以极富的生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国在白入移民占多数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可以“宽宏地”给予非白人选举权,在开普殖民地亦以极高的财产限制让占少数的有色人种拥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并不担心此举会危及白人政权的稳固。而阿非利卡人认为他们早已与欧洲母国(荷兰)脱离了政治联系,已无退路,心理上已没有依

① 一说阿非利卡人妇孺死于集中营达 25 000 人,见《牛津南非史》第 2 卷, p. 328。

② 20 世纪末南非白人人口仅占 1/7。



托。而在实际上,南非阿非利卡人的人口比黑人少得多;250年的牧农生活已证明他们在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的就业竞争方面比黑人都具优势,因而在心理上潜藏着极端的“恐黑病”,只有凭借鼓吹极端超经济力量,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完全剥夺黑人的选举权,才能确保其在南非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南非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中,阿非利卡人表示宁可在经济方面(如关税等)对英国作出些让步,而在非白人选举权问题上丝毫不松动。几经讨论,在阿非利卡人坚持下,最后通过了开普总理梅里曼的议案:现行四个殖民地的选举法继续存在。《南非宪法》虽然“保留”了开普殖民地非白人的选举权(如前所述附有极高的财产限制),但明确规定“任何议员均须是欧裔英国臣民”,<sup>①</sup>剥夺了所有非白人当选议员的权利。阿非利卡人掌权的政府对少数开普富裕的非白人的选举权仍不放心,1836年通过《土著人代表法》取消了开普所有非白人选举权。

## 二、以种族主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

《南非法》刚刚通过不久,南非议会就开始匆忙制定《土著土地法》。19世纪英布殖民者先后实施“土著保留制”,通过法制形式对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和布尔人两共和国内的黑人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剥夺。随着保留地内黑人人口的增加,狭窄的保留地已无法养活众多人口。饥荒和贫困迫使愈来愈多黑人离开保留地外出谋生。一些黑人用各种方法主要是到矿场做工积蓄工资购买土地,特别是在德拉肯斯山麓和德兰士瓦西部地带,黑人纷纷购买布尔人在英布战争中丢弃的地产。南非土著事务委员会1903年提出报告:“土著开始购买约翰内斯堡附近土地以生产供应兰德矿区的食物”。1913年前,非洲人部落或个人先后在保留地以外购置土地(包括“王室土地”)共100多万摩尔根(约100万公顷)。

---

<sup>①</sup> Muller, 500 Years,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南非500年史》),1988, p.381.

1912年黑人拥有私人土地约1 125 000英亩,<sup>①</sup>约有12万3千名黑人住在私有土地上。<sup>②</sup>这些为数甚多的黑人小地产分布在欧洲人大片土地上,形成洒在所谓“欧洲人土地”上的“黑点”(Black spots),仅纳塔尔就有144个“黑点”。非洲人小农场独立经营,使用人工灌溉、犁耕,生产商品农作物,饲养细毛羊,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勤劳的非洲小农在经营水平上很快就超过那些没有劳动习惯的穷途潦倒的白人。于是,一个不依赖白人农场和矿山而能独立生存的、比较稳定的非洲自耕农阶层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南非“欧洲人土地”上。

实际上,从数量上看更多的黑人离开保留地后是到“欧洲土地”上租佃土地,成为白人地主的对分制佃农(bywoner 拜旺纳)。另外,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还有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农民移居白人地产上成为“垦户”。20世纪初,黑人住在未被欧洲人实际占有的“欧洲人土地”上约有32万人。<sup>③</sup>前两类黑人向白人地主租地,交纳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一般是收成或牲畜的一半)。尽管佃租苛重,黑人从对分制中获得的收入仍超过白人农场中黑人帮工的工资收入,比工役佃农的生活也要好得多。此外,独立经营一块土地比进入矿山做工比较“自由”。所以黑人宁可去当对分制佃农和“垦户”而不愿当“工役佃农”或下矿井做工。20世纪头10年,对分租佃制在“欧洲人土地”上日益盛行。居住在白人农场土地上的黑人(包括工役佃农、帮工)人数达1 286 316人。<sup>④</sup>

一方面愈来愈多的非洲人在“欧洲人土地”上经营独立小农

---

① Source Material on the African Economy: 1860—1970(《南非经济史料》), Capetown, 1972, vol. II, pp. 127—129.

②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种族隔离史》), London, 1962, p. 39.

③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vol. I, p. 75.

④ Ibid.

场,另一方面愈来愈多“贫穷白人”卖掉土地拥入城市;城市白人人口从1891年317 322人增至1911年658 286人,20年中增加2倍。<sup>①</sup>这一社会现象在白人殖民者集团中引起一片喧嚣。实行工役租佃制的白人地主严厉抨击“对分制”,谴责这种“罪恶的合伙制度”侵犯了殖民时代早期所建立的白人和黑人的“主仆关系”。白人自营农场主认为“对分制”的盛行提高了农场雇工(农业工人)的工资也十分不满。这两类白人农场主都强烈要求禁止在白人土地上实行“对分制”。此外,德兰士瓦金矿劳工缺乏问题在战后愈发严重,布尔人对输入6万华工反对尤烈,<sup>②</sup>要求通过新的土地立法把黑人赶进矿场。于是,当庆祝南非联邦成立的钟声还在回响的时候,南非白人社会掀起一股要求消灭“欧洲人土地”上黑人拜旺纳,赶走黑人垦户,消灭黑人自耕农的叫嚷。其中最刺激白人殖民者神经的是传媒充斥这类警告:“白人从征服中得来的土地将通过市场而逐渐消失”,<sup>③</sup>如果让黑人因购买白人土地而分布全国各地,整个南非终将被黑人占据而成为黑人统治的国家。布尔农场主向议会发出呼吁:必须立即制止继续出现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交错混杂的局面。

1912年,以仇恨黑人而闻名的布尔前将军赫佐格被任命为土著事务部长,负责起草一部《土著土地法》。赫佐格主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阻止南非国土成为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互相交错的“棋盘”。他们认为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土地”购买土地的惟一办法是采取隔离政策。他说,隔离意味着土著要在划定的地区内建立

---

① Source Material on the African Economy:1860—1970(《南非经济史料》),Capetown, 1972, vol. II, p. 203.

② 张芝联:《1904—1910年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3期。

③ Wilson & Tho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牛津南非史》),1969, vol. 2, p. 127.

其家园,许多土著人必须外出替白人做工,而留在保留地内的土著人也能发展其能力,<sup>①</sup>南非议会辩论《土著土地法案》时,白人议员的发言鲜明地反映该法案的本质。索尔议员强调,土地法案应“规定欧洲人和土著两个种族基本上应分别居住在各自地区”,<sup>②</sup>南非政府决策人物史末资提出“在土地所有制度和管理形式中,我们的政策包括种族隔离”,“在土地所有权、管理形式和许多方面,我们正试图使之分开”。<sup>③</sup>

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著土地法》。该法明确规定: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采用分成制地租和货币地租;非洲人使用欧洲人农场土地只准采用工役地租,佃户每年须为地主服工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sup>④</sup>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这是一部对当地人民(土著)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作出了最严酷、最无理规定的土地法。这一法令后来在不同程度上被非洲其他殖民地的白人殖民者所仿效。

《土著土地法》一经公布,白人农场主立即掀起大规模驱赶黑人农户的浪潮。普拉彻写道:“1913年6月20日南非土著人在星期五早晨醒来以后,发现他们自己已经变成土地上的贱民了”。<sup>⑤</sup>成千上万黑人农民失去了世代家园土地和财产,到处漂泊流浪,寻求生路。许多人在流浪中悲惨地死去,更多的黑人被迫到白人农

---

①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种族隔离史》), London, 1962, p. 39. pp. 41 - 42.

② Ibid.

③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种族隔离史》), London, 1962, p. 40; J. H. Wellington, *South West Africa and Its Human Issues*, (《西南非洲及其人文问题》), London, 1967, p. 344.

④ S. T. Platje,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南非土著生活》), Longman, 1987, pp. 35 - 43.

⑤ Ibid., pp. 34 - 48.

场充当雇工。

在世界殖民史上(包括热带非洲殖民史上),欧洲殖民者施行掠夺当地人土地的政策,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当地人进入欧洲人的矿山和农场做工,以保证白人雇主获得廉价劳动力。在南非土地政策的另一更深远的目的是:消灭黑人自耕农和扼杀黑人资产阶级的成长;并为从空间上对黑人实行隔离的政策奠定地域的基础。英国的圈地运动在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概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时间才消灭了一个自耕农阶层。南非联邦的《土著土地法》则以历史上罕见的种族特权和阶级特权的双重力量,仅在约30年时间内便在90%国土上消灭了黑人农民中一个刚开始富裕的阶层。这个阶层本来可能成为南非最有希望茁壮成长的首批黑人民族资本,然而却被白人的超经济的国家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

《土著土地法》为20世纪中叶出笼的黑人家园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它从土地的法权上将南非国土分成两部分,而且表现在从财产权(不动产权)上根本剥夺了非洲人的选举权。黑人人口在南非居民中比例不断地上升—黑人民族充沛的生命力一直成为白人统治集团的梦魇。彻底剥夺非白人选举权的举措成了他们维持少数白人统治权的杀手锏。本来土地所有权是开普省黑人可能获得选民资格的一个条件。他们之中少数人曾是南非惟一有选举权的黑人。《土著土地法》在开普省付诸实施将剥夺所有土著获得选举权的手段。作为此项无耻剥夺少数黑人选举权的“补偿”,白人统治集团拟增拨一些土地来扩大土著保留地面积,但在增拨多少土地的问题上争吵不休延宕数十年之久。博蒙特委员会调查后建议,应在原有957万公顷土地以外,再增拨729万公顷土地。即使这个数目全部兑现,600多万非洲人所占有的保留地面积也仅8.8万平方公里,仅占南非国土面积7.2%,而180万白人

却占有 114 万平方公里,为全国面积的 92.8%。<sup>①</sup>几经争吵,1936 年决定增拨 418 万公顷(1936 年至 1976 年延宕 40 年仍有 120 万公顷土地尚未购买)。1936 年,白人议会通过第二个土地法《土著委托和土地法》,规定土著保留地面积将扩大至占南非国土的 12.3%,但这一规定却以执行同年制定的更加严峻的《土著代表法》为条件,该法把开普省所有黑人从选民册中一笔勾销。南非白人政府通过 1913 年和 1936 年两个《土地法》,从经济和政治双管齐下,以限制和取消黑人在“欧洲人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为主要手段,终于剥夺了所有南非黑人的选举权,创造了世界殖民史上最恶劣的一种做法。

《土著土地法》确定了此后南非联邦对土著居民的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此项法令的通过使阿非利卡白人深受鼓舞,视为南非白人至上主义的伟大胜利,因为英布战争后在行政系统上已消失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却将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传统和思想灌输到南非 122 万平方公里的所有土地上,特别是阿非利卡人视为白人殖民者特权的基石的根本原则——白人与黑人的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在法权上得到了贯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兰德大罢工,使阿非利卡人组成的内阁认识到,《土著土地法》的实行虽然基本上解决了土著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问题,但并没解决由于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土著劳动力同白人劳动力争夺熟练工种的问题。外资矿主为了提高利润率宁愿雇用低工资的黑人当熟练工,而不愿雇用高工资的白人工人。赫佐格内阁上台后力图以法律彻底解决这个曾引起白人流血的兰德罢工中的棘手问题。1924 年颁布“文明劳工政策”,规定在国家机关和私营公司须以白人代替非白人来担

---

<sup>①</sup>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殖民主义 1870—1945》), London, 1981, p. 75.

任所有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1926年修订《矿区和工厂法》，禁止把火车司机和矿业技师的许可证发给非洲人。该法实施后，几乎将所有非洲人从熟练工种的职业中排除出去。1923年的《土著人（城镇地区）管理法》对非洲人采取强制性的居住地区隔离。此外，在白人和非白人中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工资制。到1935年白人矿工的工资上升为非洲人矿工的11倍。<sup>①</sup>

这些在世界各殖民地均属罕见的、极端的歧视性规定，是以超经济手段达到维持白人社会稳定的目的：(1)保证白人居民获得高就业率和比非洲任何殖民地都高的工资，制造一个“白人工人贵族”，加强白人殖民政权的社会基础；(2)以种族特权来掩盖阶级特权，缓和白人劳资间的阶级斗争，避免再次发生“兰德罢工模式”的白人居民间的阶级冲突，以维护白人在南非的至上权；(3)尽可能压低占工人总数89%的非白人工人的工资，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利润率，加强南非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指出，这些殖民史上罕见的歧视性措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持了南非“风平浪静”的二十年，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暂时性的局面是由于，(1)在南非社会的力量对比上白人种族主义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2)由于黑人低工资造成生产成本低、利润率高，加上南非突出的资源和基本设施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使南非经济在1880—1939年间获得了巨大发展。到1937年南非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2亿英镑。这些发展是以黑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他们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工资微薄，倍受种族歧视折磨的极端痛苦，南非矿业完全靠仅付给黑人工人极低微工资才兴旺起来。但是，另一方面采矿、制造、建筑和铁路运输的发展使这些部门的雇工人数达到55.5万人。非洲人、混血种人、印度人得到了较多就业机会。南非黑人工

---

<sup>①</sup> Curtin, Fierman, Thompson,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非洲史》), London, 1978, p. 502.

资虽比白人低得多,但由于南非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仍然高于非洲大陆其他殖民地工人的工资。这种横向比较使缺乏正确工会领导的南非黑人工人容易受白人政府的蛊惑性宣传,而暂时容忍种族歧视性的待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5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几十个非洲国家陆续取得了独立,非洲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非洲大陆各方面力量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殖民主义力量。在林波波河以北,殖民主义政权逐步从非洲大陆撤退。然而,在南非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的紧急需求,非白人的就业人数以每年74%速度增长,<sup>①</sup>许多非洲黑人进入了产业部门担任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作,其人数达到数十万人。<sup>②</sup>黑人居民城市化发展迅速。许多开普省东区的黑人也被招工进入开普省西区。黑人与白人混合居住,这些现象是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必然趋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地加强各民族、民族集团之间的联系,冲决人为的、立法的种族界限。大战结束后,1948年上台的国民党政权(马兰任总理)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右翼种族主义势力。他们上台不久就将主张应放宽种族界限政策的白人“开明派”力量完全压抑下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施政纲领中提出,必须采取更加有效措施,从法律上建立一套更为严格的种族隔离体制,以防止肤色壁垒被种族的混合居所冲溃。1948—1960年国民党历届政府制定或修改了53项种族隔离立法,1960—1971年又通过了98项种族法律。1952年实行新《通行证法》竟规定黑人外出须随身带厚达100

---

① 杨立华、葛洁等:《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② 大战中有18.6万白人参加与战争有关的活动,留下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作均由非洲人来填补。



页的身份证明书。每年因通行证“违法”而被拘捕的黑人多达 50 万人。在这样严刑峻法下,南非三千多万黑人、有色人受到比世界任何殖民地都更为严酷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平均每年有 10% 即 100 万以上的黑人因触犯多如牛毛的种族主义法律而遭到监禁。<sup>①</sup> 非洲人举行各种有组织的、维护人身权利的和平活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沙佩维尔、索维托等地发生了黑人惨遭白人军警血腥屠杀的、震动世界的惨案。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封禁,被迫转入地下,领导人或被监禁于罗本岛监狱,或被迫流亡国外。

20 世纪 50—70 年代,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执行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法律,给世界文明史留下极其可耻的记录。联合国大会几次通过了给予南非政府制裁的决议,以迫使它停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然而,在 80 年代以前,美、英等大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求,阳奉阴违,拒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制裁的决议。由于南非非洲人劳动力极其低廉,资源丰富,南非白人政府用暴力完全控制住了局势,西方国家资本特别是美、英、德等国资本仍源源不断流入南非,为白人政权输血,使南非经济在 50—70 年代处于长达 30 多年的繁荣时期。南非主要产品黄金最高年产量超过 900 吨,价格上升到历史上最高水平。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给南非白人政府增添了力量,使它对种族主义力量充满信心。不仅在南非境内对黑人权利寸步不让,而且企图控制和称霸于从好望角至刚果河流域的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

---

<sup>①</sup> 如坐了公园中专供白人坐的座椅或进入只供白人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等。

## 第四节 逆历史潮流的新殖民主义计划

### 一、“黑人家园计划”

在南非白人政权对南非国内外力量的对比作出错误估计的背景下,它逆历史的潮流,抛出了两项新殖民主义计划:一项是在南非建立 10 个“班图斯坦”(后改称“黑人家园”)的“内部殖民地”计划,另一项是企图把北部几个黑人邻国变成白人南非的新殖民地的“星座计划”。<sup>①</sup>

黑人家园计划是白人政府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把黑人同白人在地域上实行彻底隔离的计划,即所谓 Apartheid 计划。这是一项以种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殖民主义计划。按照这项逐步实行的计划,(1)南非 122 万平方公里领土中的 87% 土地将划为“白人领土”,而 13% 土地将划为占人口约 85% 的非洲人(非白人)的领土,而在这割裂成几十块的土地上将成立 10 个“班图斯坦”,它们最后将成为“独立国家”。(2)所有非洲人将丧失南非国籍,而取得“所属的”黑人家园的“国籍”,这样,黑人将永远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不可能取得南非的公民权,而被白人统治集团视为“梦魇”的黑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一劳永逸地”一笔勾销。(3)将从“白人领土”上遣返“多余的”黑人劳工及其家属到各黑人家园安家,1960—1970 年 10 年间已从白人地区“遣返”到饱受饥饿折磨的“家园”的黑人多达 160 万人。(4)白人厂、矿、农场等所需廉价劳动力将不受任何阻碍从“家园”中征雇;白人资本将在家园与白人领土的交界地带设厂,以便黑人劳工前往边界地带的工厂做工,而返回“家园”居住。“家园”将成为黑人劳动力“储存库”。

<sup>①</sup>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 年,第 421—422 页。

1970年约有700多万黑人生活在仅占国土面积13%的狭窄保留地(将先后被加上“家园”称号)内,而在“白人土地”上生活着的800多万黑人既没有选举权和公民权,甚至将不再拥有南非国籍,他们将只拥有某个“黑人家园”的“国籍”,而这块“家园”土地他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1976年南非政府炮制的第一个“班图斯坦”国家——特兰士凯宣布成立。其后,博普塔茨瓦纳(1977年)、文达(1979年)、西斯凯(1981年)也先后宣布成立“独立国家”。

在实施“班图斯坦”过程中,白人政权加紧对黑人的掠夺,提出所谓“归并方案”,掠夺分散在“白人地区”的黑人土地。1960—1970年有65.5万垦户(Squatter)即所谓“擅自占地者”和10万个“黑点”上的黑人,土地被兼并,并被赶出“白人地区”。1973年又有100多万非洲人土地被兼并。70年代初,莱博瓦和博普塔茨瓦纳等班图斯坦新发现矿产的开采权均被白人政府攫取。1975年从克瓦祖鲁割走了一块富铁矿地带。1978年割走文达600平方公里土地。在所谓“边境地带”建立了上百家工厂、公司,付给黑人工资比白人地区的已经很低的黑人工资又低了64%。可见,“班图斯坦”作为白人南非的“内部殖民地”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

然而,二大战后汹涌澎湃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已使非洲5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近50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国际联合斗争已取得愈来愈多成果;特别是南非非洲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斗争已经从和平的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投入这一斗争并已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在非洲已发生如此巨变的时代,“班图斯坦”的新殖民主义计划必然要遭到破产的命运。“班图斯坦计划”内部存在着的经济、政治矛盾愈趋尖锐化,进入80年代已达到白热化程度。1978年,白人南非沃斯特政府要将它所不需要的黑人,包括失业者、“政治激进分子”等全部遣返到“家园”去,并宣布此后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这一计划涉及到居住在特兰士凯“家园”以外的300多万科萨

人,意味着南非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将任何数量的科萨人推回到拥挤不堪的特兰斯凯。特兰斯凯家园当局同南非政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1978年断绝其同南非的一切关系。国际舆论强烈谴责南非当局践踏黑人人权(生存权)的非法行径。1981年以后,所有“黑人家园”计划全部搁浅。

## 二、“星座计划”

南非联邦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了英国殖民者和布尔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双重基因。1915年它从德国手中占领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1920年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委托南非联邦统治西南非洲。此后南非就蓄谋将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量白人移入纳米比亚,占领大批纳马人土地,沿袭德国对黑人的铁血政策,将非洲人赶进狭小贫瘠的“保留地”。1961年南非退出英联邦时,实际上白人南非已成为既拥有外部殖民地又拥有“内部殖民地”的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国家。早在1909年起草和讨论《南非法案》(后来成为宪法)时,南非白人就在英国默许下,策划将来一旦可能可考虑将巴苏陀兰(今莱索脱)、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划入南非联邦版图之内。而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可由当地白人投票赞成加入南非联邦。这项策划实行上是以实现阿非利卡白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着手绘制的“大布尔非洲”的殖民计划为蓝图的。只是由于后来阿非利卡白人在奴役和控制黑人国家的利益上同英国政府的矛盾愈趋尖锐,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宁愿让这四块殖民地继续留在大英帝国疆域内由英国直接控制,南非的政治兼并计划才未曾得逞。但是南非通过投资、铁路港口布局、动力来源和内外贸易等方面,从经济上完全控制了这四个地区。当四国获得政治独立后,南非又企图在政治上控制他们(除津巴布韦外)。于是,博茨瓦纳的进口货物中85%来自南非,出口货物中94%输往南非,它的惟一铁路出口随时可被南非关闭。莱索托全

部需求的 97% 从南非进口, 15 万人在南非当劳工, 其汇回的工资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斯威士兰的投资、通讯、援助完全依赖南非, 进口的 85% 来自南非, 出口的 30% 输往南非。就是政治上摆脱了南非控制的津巴布韦, 2/3 出口货物也要通过南非成交。<sup>①</sup>

1979 年 4 月南非彼得·博塔政府宣布南非将为组成一个“南部非洲国家星座”而努力。南非制定这项“星座计划”主要目的有二: (1) 通过建立“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将南部非洲诸国变成经济实力强大的南非的卫星国而实现其在南非北方建立“新殖民地”的计划; (2) 政治上企图造成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与南部非洲其他邻国“友好相处”的假象, 使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永久化。然而, 这个计划一出笼就受到南部非洲国家和联合国大会的谴责和反对。针对“星座计划”, 1980 年 4 月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安哥拉等九国举行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在《南部非洲, 走向经济解放》的宣言中, 它们明确地表达了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坚强决心。九国的联合行动给予南非的殖民扩张性质的“星座计划”以有力的回击, 终使其夭折于难产中。

## 第五节 白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南非 经济地位的变化

### 一、南非白人移民的特殊性质

如上所述, 南非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它既不同于印度等由“土著居住的殖民地”, 也不同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由白人居住的“真正的殖民地”。<sup>②</sup> 到二大战后殖民地独

<sup>①</sup> 1986 年 7 月 29 日路透社自哈拉雷通讯。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第 353 页。

立运动高涨时期,南非的非洲人已拥有两千万以上人口,而白人移民后裔也繁殖到数百万人口。白人移民的后裔已经在南非经济深深扎下根,他们已经在南非联邦掌握统治权半个世纪以上。他们认为南非就是祖国,荷兰、英国已不是他们的祖国。随着南非经济一体化发展,白人和黑人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中两个不同肤色居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1652年就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百多个殖民地不同<sup>①</sup>,它的解决办法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将白人移民赶下海”,而是让黑人、白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平等地共同生活在1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主要的问题是白人居民要真正归化于这块他们已定居三百多年的土地,摒弃种族主义,给予非洲人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经济上的资源共享。南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国际潮流的倾向和非洲人不屈不挠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将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白人统治集团最终接受一人一票的普选权要求。

## 二、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变化

南非联邦成立后,阿非利卡白人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经济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sup>②</sup>一是保证南非白人企业主和农场主能够稳定地获得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二是使贫穷白人能获得职业选择和工资收入上的优势,以防止或延缓白人居民集团的两极分化,造成白人社会的不稳定。

英布战争后,阿非利卡人中的“贫穷白人”(White Poor)数目猛增,这本来是已被大大推迟的布尔人内部阶级分化的必然趋势。贫穷农场主纷纷破产,由以前的小土地占有者沦为赤贫户,到

---

① 最高数额在1921年曾达到168块殖民地,见A. Bergesen,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 New York, 1980, p. 275。

② 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原因此处暂不申论。

1910年联邦成立时,这一阶层人数已增至20—30万人。按一般的经济发展的需求,他们只能流入劳动力市场,获得自由雇佣的机会,然而作为南非种族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这批穷途潦倒的白人背着“白人优越”十字架,拒绝从事任何“卡弗尔(黑人)粗活”。他们在陆续被大地主从地产上挤出去后大批拥入城市,流落街头,以肤色皙白自傲,而在熟练技能和吃苦耐劳方面却没有任何比黑人优越的地方。外资白人雇主和英裔白人雇主宁愿雇用黑人做工可以少付工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然而这批人数众多的贫穷白人对社会的心怀不满,显然构成对现政权的极大威胁。南非白人(布尔)统治集团已无法像19世纪以前那样如法炮制,靠军事征服取得新的领地进行无偿分配来调和他们与贫穷白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于是便以牺牲多数黑人的生存权和基本利益,以所谓“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危害白人经济生活”为借口,制定了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

在种族歧视制度下,依靠黑人的极其廉价劳动力及其吸引来大量外资,南非经济开始取得迅速发展。在1939年以前,阿非利卡人经济的重点仍在农村。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中小农场大批破产,原阿非利卡人农场主中43%成为农业资本家,8%成为自耕农,49%成为农业工人、佃农和穷苦白人。在二战前已有愈来愈多的穷白人进入城市补充了矿山和工厂劳动力,由于种族歧视法的保护,他们大部分充当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阿非利卡人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也迅速成长起来了。阿非利卡人经济上的迅速发展,非经济(或超经济)的力量起了显著作用,在世界殖民史上亦属罕见。在国民党的两次掌权期间,尤其是1948年国民党再次掌权后,集中国家财力、物力并制定优惠政策,加强阿非利卡人经济实力,提高其经济地位。

国民党政权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地位:  
(1)如上所述,制定一系列种族歧视制度,特别是职业工种上的肤色

限制,让阿非利卡人中的穷白人直接受益,显著改善社会处境,摆脱贫困,就业和从事技术工种的人数激增。此外,国家大力发展邮电交通等第三产业,吸收大批穷白人就业。通过黑人家园制度确保白人农场主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得以长期保持。(2)充分发挥阿非利卡人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作用,进行国家干预,为阿非利卡人谋利。在农业方面,扶植阿非利卡农场主,提供大批财政补贴。对农场基本设施建设提供资助,提高机械化程度。成立农产品物价“管制局”,以国家垄断手段阻止出口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其稳定在高于世界市场价格水平上。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期间,帮助阿非利卡农场主渡过难关。1946年通过的《水土保持法》,把国家支持的重点放在帮助阿非利卡农场主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制造业方面,政府制定进口替代政策,发展南非制造业,重点放在扶植阿非利卡人的资本从农业转入制造业。一位名叫安东·鲁珀特的阿非利卡人投资烟草工业,建立罗思曼烟草公司,分布世界各国,其产量一度占世界香烟产量的1/15,成为亿万富翁。<sup>①</sup> 金融业曾是英裔白人独占的领域。阿非利卡人分散的游资曾像散落在地上的水银不能成为南非市场起作用的力量。然而在政府支持下,游资一经组织成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便异军突起,到1939年阿非利卡人资本已在南非商业股份中占有8%份额,工业股份中占3%份额。(3)建立强大的国有企业同南非英语集团的资本争夺经济阵地。1950年成立的国有南非煤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磷酸盐发展公司拥有巨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分割了英裔的经济实权。1959年和1963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公司和有色人发展公司,运用国家力量让阿非利卡人挤入黑人地区和有色人居住区进行投资,利用最廉价劳动力分享英资极高的利润率。1964年成

---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经济》(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立的南非军备公司(原名军火生产部)是国有资本的重工业,拥有出口军火权,完全控制在阿非利卡人手中。到1985年,南非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值占了37.4%,每年新增加的资本有1/4是国家资本。在所有国有企业中,阿非利卡人均占主导地位,掌握决策权。这就使得历史上一直蜗居于农业部门蛮荒之地的阿非利卡人也开始在工业领域崭露头角,并在某些工业部门,利用国家力量开始处于举足轻重地位。

当然,在阿非利卡人资本发展的同时,拥有深厚基础的英裔白人资本获得更大的发展。英裔白人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得天独厚,与英国资本互相配合,并得到后者的支持,除农业部门,几乎在所有工业部门独占鳌头。英裔白人资本从金刚石矿和金矿大发现年代便扎根于南非,首先在经济上“归化”南非。虽然在种族制度上曾同阿非利卡人沆瀣一气,毕竟有所不同。为了使南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摆脱种族主义制度的干扰,克服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巨大起伏,增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英裔白人审时度势,首先在种族关系上表现出明智的态度,要求淡化种族隔离制度,为最终结束这一已严重影响南非经济发展的过时制度创造可行的条件。

## 第六节 国内外形势迫使南非白人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南非种族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主义以种族主义作为其活动形式的种种运作,既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更受到非洲大陆几十个独立国家的抨击和抵制,经济运动本身发展也证明种族主义制度已成为南非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一体化的严重障碍。

从1652年起,南非就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虽然它没有如同

北美一样成为真正移民的殖民地,但它同北美一样,殖民地性质长时期没有完全失掉。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910年的南非联邦成立和1961年宣布为共和国,都没有改变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殖民地的性质。<sup>①</sup>所以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德国等都把这块政治经济学意义的殖民地看作理想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稀有金属原料的来源地。<sup>②</sup>半个世纪来,获得了巨大超额利润的国际资本势力对南非政府的支持,是南非种族主义制度能够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外资向来在南非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从60年代开始,南非社会的稳定问题成为外国资本向南非投资的晴雨表。1960年白人政权制造屠杀黑人的沙佩维尔惨案,引起部分外资逃离南非。1976年震动世界的索维托事件发生后,连续4年外资从南非抽走,加上其他因素,南非为此每年付出了近20亿美元的代价。80年代情况更趋严重,1985—1988年资本外逃达91亿美元,1988年底南非外汇储备只剩19亿美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南非经济的健全发展离不开外资,南非总投资至少5%—10%要靠外资输入,外资的不断抽走,成为80年代以来南非经济严重衰退的一个重大原因。随着南非经济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方向发展,特别是以种族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主要活动形式,引起频繁的社会动乱,遭到非洲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国际资本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要求以制裁为武器改变南非非洲人社会的殖民地状况。各国资本在南非投资设厂的企业需要大批专业人员,而白人专业人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专业技术工种的肤色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外资在南非的发展。对外资来说,种族隔离制度已经从提供超额利润逐渐变成影响在南非扩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495页。

② 南非矿产资源得天独厚:铬、金、锰、钒、铝、硅酸盐和铂族金属的藏量均占世界第一位;锆、锆石占第二位;铀、磷酸盐岩占第三位;金钢石、锌、石棉、萤石占第四位。

投资和获取稳定利润的严重障碍。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南非社会的严重动荡,使国际资本望而却步。从 80 年代起,由南非抽走的资本远远超过投入的资本。80 年代后半期,有 550 家外国公司撤出南非,带走的资金近 100 亿美元。国际资本财团开始对南非实行具有实质性的制裁,制裁措施益趋严厉。例如:(1)在信贷方面,1985 年英联邦 48 个国家停止向南非提供新贷款并催讨到期债款,使当年南非外流资本达 46 亿美元;美国银行给南非的贷款在 1984—1986 年间从 50 亿回落到 30 亿美元,迫使南非大举借债用以偿还旧债和利息,金融陷入严重混乱。至 80 年代末,用于还债和支付进口逆差的款项高达 110 亿美元。(2)外贸制裁:80 年代中期以后,有 1/3 与南非贸易的国家断绝或剧减同南非的贸易。至 1988 年中期,南非为此损失外汇收入达 50 亿美元。不仅使南非急需的外汇收入剧减,而且使先进机器设备、尖端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进口遭到极大的困难(只剩以色列来源)。这就使已经呈现负增长的南非经济雪上加霜。

造成 80 年代以来南非经济衰退以致负增长的更为重大原因,来自南非国内。以 10 个“黑人家园”作为南非联邦“内部殖民地”的新殖民制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地步。首先,南非经济一体化发展使南非经济对非洲人劳动力和提供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南非数以万计的厂矿、企业、农场的正常生产绝对离不开非洲人劳动力,如果黑人劳动完全撤出南非联邦工矿企业,南非经济将在几天内全部垮台。至 80 年代劳动力的现代化训练成为更加迫切的问题,现代化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向南非各产业部门提供专业人员至少 370 万人,其中 200 万人需要由非白人提供。技术劳动力的短缺使得肤色壁垒若不迅速打破,技术工人严重缺乏问题就无法解决,南非经济亦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现行制度已使技术培训陷入困境。其次,几十年来极度压低非洲工入工资和农业雇工报酬的歧视性做法,造成数千万非洲人的极端贫穷,购买力极低。黑人家

的居民人均收入不足 100 兰特, 城镇黑人 67% 处于最低贫困线以下。占人口 75% 的黑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对南非制造业的产品市场和商业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sup>①</sup> 47 国内市场的狭小严重影响了南非经济的稳定发展, 国外市场稍有波动, 国内经济便受严重影响。第三, 种族隔离制度造成黑人居民同白人民居的极端对立。黑人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 由非国大等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南非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威胁。南非社会动荡不安, 处于很不稳定状态。国际资本大批抽走, 国内资金外逃, 黑人工人罢工、怠工事件层出不穷, 南非经济直线下降, 持续几年衰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到 80 年代已降到 1.2%, 低于人口增长率 2%。1980 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均为负值。1982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1%, 1983 年为 -3%。

在南非经济、政治形势全面恶化情况下, 南非白人政权受到国内黑人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不得不表示愿意放弃以种族主义作为在南非实行殖民主义主要形式的政策, 放弃建立 10 个“黑人家园”的“内部殖民地”的新殖民主义做法。从 1989 年释放被囚禁 22 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开始, 通过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四年谈判, 执政的国民党终于接受了“一人一票制”, 允诺将实行“多数统治”原则。1994 年 4 月举行了有黑人参加的第一次普选, 成立了以曼德拉为首的联合政府。非洲大陆最后一个以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为其形式, 实质上是 3000 多万黑人陷于毫无政治权利的殖民状态结束了。南非这块 122 万平方公里土地从 1652 年开始沦为殖民地, 历经 342 年, 终于以 400 多万白人移民后裔开始真正归化于他们已扎根数百年的土地上, 并与 3000 多万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一起, 共同生活于同一块土地而终结其漫长的殖民时代的历史。

---

<sup>①</sup> South Africa Yearbok (《南非官方年鉴》) 1978 年卷, 1989/1990 年卷。

## 第十一章 间接统治制度的演变 和英属殖民地经济的 殖民化

间接统治制度是英属殖民官员卢加德总结英国在印度等地的统治经验而制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在20年代以后的英属殖民地获得普遍推广。这种制度加上英语教育极有利于培养一批亲英的上层和“知识精英”,成为英国统治的社会基础。

欧洲殖民主义者希望通过“西语教育”培养出一批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非洲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欧洲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殖民主义的控制,但大部分人逐渐不受控制了,他们成为民族自治和独立运动的先锋。殖民主义统治对英属殖民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范畴的积极影响应实事求是地提及并恰当评价。

### 第一节 间接统治制度的建立和推广

#### 一、间接统治制度实施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20世纪前后,英国在尼日利亚通过对当地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和阴谋手段,确立了全面的殖民统治。随后,英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始了对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结构的强制改造。间接统治制度的产生及推广则是英国殖民政策的必然结果。为掠夺黑非洲经济资源,面对众多人口,广阔领土,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英国必须在政

治上寻找一种新型的统治进行“治理”，代替原先在西非采用的直接统治制度。本世纪初，英国首先在北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制度。其直接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是：

英国殖民当局难以在北尼日利亚推行直接统治。北尼日利亚是当时英国侵占地域最广，面积达3.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700万之上的殖民地。当地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殖民当局，英国认识到单靠少数侵略军的血腥镇压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和当地统治者妥协，利用其传统土著首领进行治理。极富殖民统治经验的卢加德曾表明：“从印度的叛乱到乌干达和塞拉里昂的造反，大英帝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仅仅有少数英国官员，而没有一个能在危机中和英国站在一起，其自身利益和英国完全一致的阶级，将会导致发生危险”。<sup>①</sup>

同时，当时北尼日利亚存在着有一套完整的土著政权系统。索科托帝国虽衰落下去，但其仍是一个由各埃米尔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各埃米尔国仍承认索科托的哈理发为最高政治、宗教领袖。北尼日利亚还存在着健全的税收制度和伊斯兰司法制度。这套完善的统治机构，英国殖民当局可以现成地加以改造利用。英国在挫折中认识到：非洲的土王、酋长有威信和号召力。如果加以利用，使其为殖民政权服务，既可减少行政费用，又可蒙骗舆论，其效果是直接统治难以达到的。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此时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内容的资本正常国际积累，占据主导地位。中心地区资本重心从商业转向工业领域。作为外围的黑非洲功能也随之转为提供中心地区所使用的原料和农产品。19世纪以前，中心地区还只能依靠黑非洲当地社会形态的能力加以调整，以适应中心地区

---

<sup>①</sup> N. Geary, *Nigeria Under British Rule*(《英国统治下的尼日利亚》)New York, 1965, p.149.

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中心资本有能力在外围黑非洲地区直接组织适合它的生产,以满足垄断资本的需要。此时英帝国主义掠夺西非的具体办法由建立特许公司残暴的掠夺和压榨转为新的殖民经济政策,即将原有土著的自然经济制度加以改造,推动土著依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实行间接统治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 二、间接统治内容和体系

间接统治制度由起初的一种统治手段,发展成为一套具有完整内涵的殖民统治制度,其内容与体系如下:

1. 英国的宗主权。英帝国的宗主权是土著政权存在的前提,土著统治者只有接受和承认英国的宗主权,他们的权势与地位才得以保存和维持。间接统治制度的核心是保存并利用北尼日利亚被征服前业已存在的机构和土著统治者来统治土著居民。但“保存”是有前提的,“利用”是有条件的。在各种前提和条件之中,首先强调的是宗主权。这不仅体现在颁布的公告、法令中,而且反映在按照间接统治的原则所建立的殖民统治机构之上,英国掌握着北尼日利亚的立法权、土地所有权、军队和其他国家重要权力,下层虽以“自治”的形式直接统治土著居民,实际上是受制于上层的地方政权。

2. 土著政权。整个间接统治的土著政权是基础。1907年英国驻尼日利亚总督吉罗阿德颁布《土著政权公告》,1916年卢加德宣布废止,又颁布了更为完善的《土著政权法》,法令肯定了土王、酋长的合法性,尊重他们在本族中的神圣地位,维持原有的各级官员和政权机构,保留贵族会议选举产生的王位继承人的传统程序和仪式。同时也削弱了其原有实权,加强其对殖民当局的依赖性、使之变成殖民统治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令规定原土著政权只能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殖民当局允许高级土著政权颁布有关市

场贸易、市镇建设、酒类生产、婚丧事宜、公共卫生和森林保护方面的法令,不过需经总督的批准方能生效。

3. 土著税收。土著税收是间接统治制度的经济支柱。北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国家在英国人入侵前已有税收制度。捐税项目繁多:什一税,牲畜税,某些待业的特别税,烟草等作物税以及马路捐、市场捐。此外,当地统治者还有依靠掠夺和役使奴隶,出售土地和收受臣民的贡赋而获得的收入。英国建立殖民统治后,于1903年和1904年先后颁布的《土著收入公告》和《土地收入公告》,授权各省的驻扎官在北尼日利亚征收年度直接税,由英国官员协助土著首领确定每个村或镇应纳税额,土著官员负责实际征收。土著政权可留取所征税款的较大部分,用来支付土著官员的薪水和公共建设事业费用,其余部分则上交殖民当局。1906年重新公布的《土著收入公告》,对土著政权所留税款的使用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奠定了土著金库制度的基础。到1911年,北尼日利亚已有众多的土著金库,它们成为土著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所有的殖民统治方法中,税收制度最早明显地促进了殖民统治官僚政权的发展。税收制度给行政官员和非洲酋长规定了一项共同职能。在审估税额和征收税款的过程中,酋长经常联合当地长老会议或名流会议,提醒人们记住新体制拥有制订规章制度的权力,此外,在这类税收官员之后,很快出现了一些行政代理人,他们成了新型殖民地上层人士的一部分。

4. 土著法院。它是间接统治制度的又一根支柱。1906年颁布的《土著法院公告》把所有土著法院按权力大小分成A、B、C、D四级。1914年又颁布《土著法院法》,明文规定土著法院作为初等法院在全国普遍设立。除此面外还有高等法院,这是由英国人组成,执行英国法律专门审理外国人或外国人和土著居民之间诉讼的法院。土著法院与高等法院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土著法院受英国专员、驻扎官的监督和控制在。



各地土著法院的组成不尽相同。北部豪萨——富拉尼人的土著法院又分为四级,低级的由职业法官组成,高级的是埃米尔领导下的司法会议。在南方地区,由于殖民主义者入侵前尚未形成分级的司法机构,土著法院由土王、酋长及部落上层人物组成。法院的负责官员必须经过殖民当局任命,殖民当局严格监督土著法院的活动。土著法院仅有权审理地方土著居民的诉讼案,大多数法院只能判处有期徒刑和各种罚金,死刑判决要经总督批准。

### 三、间接统治制度的推广和调整

从20年代起,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在英属非洲推广间接统治制度。由于英属非洲各地区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因此间接统治制度的推广过程繁杂,根据有关研究,大体有如下几种做法<sup>①</sup>:

其一,将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恢复传统。属于这类地区的有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黄金海岸的阿散蒂。曾任坦噶尼喀总督的英国官员卡海伦认为:间接统治制度之所以称心如意,是因为当时采用直接统治的官员们劳累过度,终日碌碌,而间接统治制度开辟了逐步实现国际联盟关于委托托管承诺的道路。他将坦噶尼喀分为省(11个)、地区(48个),设有专员、地区专员管辖,地区以下取消“阿基达制度”,改建土著当局,(参见第15章)在北罗得西亚,1927年英国殖民当局改变直接统治方法,推行间接统治,1929年颁布了建立土著当局和土著法院的法令,次年生效,从而恢复了当地非洲传统首领的地位,但北罗得西亚没有建立土著金库,没有财权。在黄金海岸,英国殖民当局1926年放回了阿散蒂王普兰佩,成为库马西的大酋长。1935年又恢复已经解散了的阿散蒂邦联。

---

<sup>①</sup> 参见高晋元:《论英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西亚,非洲》1985年第3期。

30年代前半期使用同样的办法,英国在尼亚萨兰也恢复了土著间接统治。尼亚萨兰在保护国时代的早期,曾采用了由地区专员“直接统治”的原则。1921年,各个地区合并成三个省,每个省置于一个专员的管辖之下,“直接统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为了在尼亚萨兰达到间接统治,在1929年实行了第一步:把某些司法权力交还给了酋长们;授权酋长开庭审判民事和刑事案件,条件是当事人尚可向高一級法院上诉。接着,根据1933年法令,把酋长们纳入行政管理体制。由一个酋长和他的幕僚们组成的土著当局,在每一个地区建立了起来,被赋予各种不同的行政职责。殖民政府允许土著当局征收地方税——经其批准的附加税,酋长及其幕僚每隔一段时期在酋长会议上聚首,借以协调各个不同的地方当局的活动。

其二,调整体制,即在原来采取某些间接统治方法的地方根据北尼日利亚模式进行调整改革,完善间接统治制度。如黄金海岸除阿散蒂和北方领地以外的其它地区,贝专纳兰等地区。

其三,划定政治实体,指派土著首领。在一些社会发展落后还未形成国家组织地区,英国殖民当局划立行政区域,组织土著会议,委任酋长。这种政策,主要实施于尼日利亚东南部、乌干达北部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以尼日利亚东南部最为典型。

其四,通过协定方式,确认本地统治者的权力。英国对乌干达境内的4个部族王国即是如此。1900年英国与布干达协定:英国享有对布干达的宗主权,布干达获得乌干达境内省级自治行政地位。托罗、安科累和布尼奥罗等王国只获得地区级行政地位,“自治”程度更少。虽然布干达的土著政府保持着独立的外衣,但是乌干达保护国掌握着它的命脉,统治着这个“王国”,统治的方式和统治其他行省毫无区别。

#### 四、间接统治制度实施的后果和影响

1. 间接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殖民当局和非洲人民的矛盾,减轻了军政人员缺乏和行政开支不足问题,稳固了殖民统治。如在尼日利亚东部伊博人阿巴暴动之后,英国调整了殖民政策,缓和了激烈的冲突,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在坦噶尼喀,英国的间接统治制度打着维护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重视“委任统治地”人民的福利和发展,帮助当地人民“自治”的旗号,掩盖了英国殖民统治和掠夺本性。这点如卡梅伦所指出的:“推行间接统治事实上,不需要破坏非洲的气氛、非洲的精神和非洲的种族的全部基础而恰恰是在它的基础上‘移植’我们比较高级的文明”。他还供认:间接统治制度“不仅仅是使土著分享这个国家的统治权,而是我们同时建立起一个反对政治煽动的堡垒。”<sup>①</sup>另一位殖民官员佩勒娜也认为:这种制度的最大功绩是使土著机构“稳定化”,并且有英国“法律所给予的权力”。

2. 导致非洲传统社会权力机构原有性质的改变,土著统治成为大英帝国的附庸。尼日利亚南部的约鲁巴人居住地区,原有国的权力本已衰落,但在英国的保护和扶植下却复兴起来,得到发展。英国在实施间接统治过程中扶植和拉拢一大批土著统治阶级人物。冈比亚则形成了一支绝对忠于英国的土著酋长队伍。英国在乌干达专门扶植布干达的封建统治者,通过他们来统治全境。土著统治阶级也成为英国殖民当局实施殖民经济政策的工具。征收税收,派遣“公差”劳动,发展种植经济作物,征购农副产品都由土著统治者代替督促完成。英国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在经济上也促使了英属殖民地经济结构的转型。

---

<sup>①</sup>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28, pp. 451 - 452.

3. 间接统治保留了黑非洲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结构,加之英国殖民当局的“分而治之”政策限制了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各部族之间的隔阂、助长了部落主义、地区主义,阻碍了现代民主思想、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尼日利亚有大小族体 250 多个,被英国殖民当局分割成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英国的统治下,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宗教文化政策,在北方对当地伊斯兰教信仰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在南方却支持传播基督教。这些埋下了后来民族分离主义的祸根。尼日利亚三大政党均有部族背景,尼日利亚独立后历次军事政变以及因“比夫拉共和国”独立而引发的尼日利亚内战,均可从间接统治制度带来的恶劣影响中找到根源。

## 第二节 英属西非殖民经济政策

英国 19 世纪末全部占领西非所属殖民地后,根据西非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点,改造和培植小农经济将其引入垄断公司的经济罗网之中。这种小农经济类型主要存在于非洲原来农业经济就比较发达的西非和东非部分地区。它的形成是中心国家改造非洲原有经济结构,将其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与影响,尼日利亚、加纳堪称典型。19 世纪末,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加纳随后实施一系列殖民政策与措施,对尼日利亚、加纳经济结构进行改造。

### 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参见第 1、6 章)

早在 1807 年英国就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行为。后来,英国政府一再重复它的主张。1886 年,英国政府在给尼日尔公司的特许状中指示说:“公司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鼓励并参加逐渐废除现在土著居民中的奴役制度”。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后,先后采取一些废除

奴隶制度的措施。1897年,英国宣布先于主人回到贝宁城的奴隶可获得自由。还宣布国王的许多奴隶获得自由,废止贝宁城内的奴隶贸易市场。1901年,英国殖民当局分别在拉各斯殖民地、南尼日利亚保护国和北尼日利亚保护国宣布奴隶贸易非法,禁止买卖、交换和转让奴隶。

在加纳,英国殖民当局在几经犹豫之后,1894年11月3日,在海岸角举行了加纳中、南部酋长会议,向他们宣布准备采取释放奴隶的措施。酋长们反对没有赔偿就解放奴隶,最后达成了妥协,宣布凡在1874年11月5日以后出生的婴儿都是自由人;不强迫奴隶离开其主人,如债务人质愿意离开,主人可以通过法院收回债款;除奴隶制外,其他的习惯法和惯例必须继续依循。这个法令虽不彻底,但对废除强迫奴隶劳动,为破坏奴隶制公社土地所有制打开了一个缺口。

## 二、保留原有土地制度

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殖民统治后,不同于在非洲其他地区采取的土地政策,而是大体上保留了原来的土著土地制度。由于英国征服尼日利亚全境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因而在各地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也颇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1. 宣布所有土地为皇家或公共土地,土地转卖均需由政府进行。这种政策实施于贝宁地区。

2. 承认土地在土著习惯法的保护下作为私人财富存在,仅宣布英国皇家有余产权,即皇家有权占有无主土地。在服从政府的控制之下,土著有权将其土地卖给他人,政府有权转让无主土地或皇家土地。这项政策实施于拉各斯地区。

3. 承认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社,土著可以将土地出售给欧洲人,政府只有支付偿金之后,才可以征用用于公共目的的土地。这种政策主要在南尼日利亚地区推行。

4. 承认土地为“土著土地”，土著按照法律可以继续占有土地，但土地所有权归总督，具有土地国有化特点。英国政府可以把少量的土地租让给外国公司用来开采矿山等，凡涉及土著的土地纠纷问题，一概由土著当局和土著法庭习惯和传统处理。这种政策由1900年的《土地公告》、1910年和1916年的《土著和土著权力公告》等几个法令所肯定下来，实施于北尼日利亚地区。<sup>①</sup>

在加纳，殖民当局为垄断黄金的开采和建立种植园，曾在1894年提出一项条例，准备把一切荒地、森林和矿藏转归英国皇室所有，后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1897年，又提出公共土地管理条例，企图把村与村之间尚未开垦的土地和丛林，列为公共土地，由殖民政府管理，鼓励土著居民在已耕土地上长期定居，并“保证给予他们以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但又因上层的反对而作罢。因此，英国殖民者转而承认非洲人的土地所有权，用经济杠杆，最终还是破坏了旧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使加纳变成了英国资本家所需要的单一作物产区。

总之，从以上情形可知，英国基本上保留了当地原有的土地制度。与英属东非、南非殖民地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土地制度保留下来了，避免了土地被白人所占有。

### 三、推广单一种植制

殖民当局对土地等征收高额货币税收，为了缴纳税收，土著人民不得不种植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农作物。殖民当局在占领尼日利亚北部后不久，就在原封建税收的基础上继续加重农民的负担，开始时，土著金库上缴给殖民当局的税收只有1/4，以后上升到1/2。各省之间的税额不一。如以人头税为例，在卡诺缴6先令，扎

---

<sup>①</sup> W. Rober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北尼日利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London, 1986, p. 43.

里亚则为4先令。尼日利亚南方过去没有税收体系存在,有的地区甚至没有贡赋。在20年代中期前,殖民当局利用“委任酋长”征收人头税和茅屋税,或对非洲人进行强迫劳动。从1924年起,殖民当局实行直接征税制,在东部各省推行北部和西部已实行的地方收入法令,规定税额为农民收入的2.5%。上述这些规定是随时变化的。<sup>①</sup>

30年代后,英国进行税收改革,扩大税收来源,用个人所得税,取代早期人头税。至40年代,殖民政府在尼日利亚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税收体系,英国殖民当局的税收直线上升。仅以直接税为例,1934年征收80万英镑,1939年为90万英镑,1944年高达240万英镑,1951年竟为530万英镑。

税收制度是英国改造尼日利亚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实施的结果是:“使每家每户最终都要转向出卖劳动力和种植经济作物,尽管赋税和税收制度的实施在全国有早有迟、税额有轻有重,它是政府发展经济作物最有效的工具”。<sup>②</sup>英国在尼日利亚实施的税收制度在迫使非洲人外出做工,破坏传统自给自足农业和村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殖民政府加强交通运输建设,修筑铁路、公路,“开发”农业区。殖民时代前,尼日利亚的运输主要是依靠天然河流。在不通航地区靠人头顶货物进行搬运。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是与内地交通的要道。北部地区运输工具是驮兽。19世纪末,英国瓜分殖民地告一段落,进入经济上的全面掠夺阶段,“开发”殖民地被视为这一时期英国殖民官员的主要任务。

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尼日利亚农业发展影响较大。经济作物

---

① W. Robert,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北尼日利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London, 1986, pp. 51 - 52.

② 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46页。

大都是沿着铁路和公路线的延伸扩展开来的。尼日利亚北部花生的种植就是1911年铁路通车后开始大规模推广的,后来花生的种植沿着铁路线扩展到恩古努,又从扎里亚扩展到比绍。在贝宁,绝大部分的经济作物种植园都位于公路两旁。西部地区的可可种植也是沿着拉各斯——阿贝奥库塔——伊巴丹——伊费——奥约公路轴线扩展的。此外,交通沿线的土地因此涨价而成为商品。

引进金融货币关系。在殖民时代前,尼日利亚经济交换大部分是以物易物。货币关系薄弱,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发展缓慢。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后,为了发展商品农业,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关系,使尼日利亚经济适应世界市场。这一过程贯穿于整个殖民时代。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停止使用原来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货币。1912年英国殖民政府建立西非货币局,发行大量英国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创办大批银行,进行资本输出,这些银行如一张金融网,笼罩着尼日利亚,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贷款;税收一律采取现金交纳;以现金支付劳动力报酬等。

货币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原有农业结构的解体,因为“金属货币的采用和传播总是与以前和分配中的或快或慢的变革相联系的”,传统农业结构的解体因此大大加快。

在出口需求情况下,殖民当局采取一些手段诱导和扶植小农发展商品生产,这些措施包括:提供贷款,预付资金;供给种籽,开辟苗圃,搞示范农场;调整农产品价格,实行倾斜关税政策;建立农产品推销局等等。

英国实施的这些殖民经济政策,使尼日利亚成为英国在非洲的一块极为重要的殖民地。奴隶制的废除,使大批奴隶成为小农生产者和雇佣劳动者;土著土地制度的保留,既为间接统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又使尼日利亚成为热带农业原料的产地;加之税收、金融、交通等体系的建立,至二次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大体完成了对尼日利亚农业结构的改造。尼日利亚农业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成为依附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经济。

### 第三节 英属西非依附经济结构的 形成与影响

#### 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英国的殖民经济政策给尼日利亚的农业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生产结构方面,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单纯的食物生产转向面向世界市场的经济作物生产。在尼日利亚这一历史过程和特点大致如下: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为其发展初期阶段,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棕榈产品,肆虐数百年的奴隶贸易逐渐停止下来。19世纪初,棕榈树的种植还刚刚开始,产品主要输往英国。1805年输入英国的棕榈油数量仅为150吨,至19世纪末,产量剧增。20世纪初至1929年为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单一生产棕榈产品过渡到生产可可、花生、棉花几种主要经济作物,这几种经济作物获得迅速发展。据1929年的统计,在这一时期出口价值提高了7倍,出口规模翻了5番,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7%和5.5%。棕榈油、棕榈仁仍为占首要地位的大宗产品。可可仅为仅次于棕榈产品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出口量由1899年的70吨增到1925—1929年的4.5483万吨。棉花为占第三位的出口作物。<sup>①</sup>

在加纳,1891年首次出口可可80磅,到1913年出口即达

---

<sup>①</sup> Onimode Bade,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Nigeria*, (《尼日利亚的不发达与帝国主义》), London, 1982, p. 45.

5.06万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sup>①</sup>黄金海岸仅用20年左右时期,就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以种植出口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到1926年,黄金海岸出口可可23.1万吨,占当年世界产量50万吨的将近一半,占该殖民地当年出口总值的80%。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形成的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一直延续到加纳独立之后。购销可可豆的英国公司一本万利。可可也因此获得“绿色金子”的称号。

在冈比亚,由于欧洲对油料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西非的花生种植业。花生在奴隶贸易初期由葡萄牙人引进西非,但一直没有推广开来。直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发现用花生榨油,作制造肥皂的原料优于棕榈油,作食用可代替高价的橄榄油,从此,花生种植业才在冈比亚发展起来。冈比亚的花生仁在1894年第一次作商业性输出。花生种植和出口量的迅速增长,是19世纪冈比亚经济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到1913年,花生占冈比亚出口总值的95%。

第二,用子国内交换的农产品的商品率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愈益提高。这些农产品主要是柯拉果、烟草、薯芋、干鱼、牛肉和奶制品。以大宗交易产品牲畜和柯拉果为例,1906年前后,每年仅有8000头牛羊从北方运入南方,至30年代,每年平均已达20万头。<sup>②</sup>

第三,在30年代前后,尼日利亚已形成明显的专业农业地理区。根据有关经济地理学家的著作和尼日利亚农业部门的调查报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农业区:

---

① P. Duignan and H. Gan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年》),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p. 349.

② Hopkins, A. 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 248.

1. 可可区, 位于西部约鲁巴地区, 主要由伊巴丹、沃约、昂多和阿贝奥库塔四省组成。2. 棕榈区, 位于东部地区, 特别集中东南部地区。90%以上的产品产自宅院、村庄四周沿海沿河和沿路地带, 约6%—7%产于种植园。3. 花生区, 位于北部诸省, 卡诺为其中心。自1912年铁路通到卡诺后, 花生种植迅速扩展开来, 二次大战时期稳步增长, 至独立前夕产量平均每年为30万吨。4. 棉花区, 最初位于西部的伊洛林省和卡巴及森林地带边缘, 但由于可可种植的影响及其它因素, 棉花业在北方迅速兴起, 主要产区位于沿着考腊纳莫达向东南经过扎里亚向卓斯高原的这条轴线上。其产量逐年稳定上升, 1951—1956年每年平均产量为1000吨。

在生产关系结构方面, 走向多元化, 开始向资本主义落后农业国过渡。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一些地区的村社土地制度开始瓦解, 土地私有化。

尽管英国殖民当局主观愿望是要保留原有土地制度, 但由于尼日利亚的经济卷入了商品经济, 土地不可避免地开始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是由以下这些因素造成的: 种植多年生长的经济作物如可可、油棕、香蕉等使土地难以重新分配; 酋长和头人利用特权侵占公社土地; 铁路、公路的修建使沿线土地价值提高, 进而商品化私有化; 矿山周围和一些沿海地区土地为外国垄断资本租用也促成了这一过程; 此外, 人口的增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土地私有化现象最早出现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拉各斯地区, 这些地区欧洲人入侵早, 影响大, 土地私有权19世纪末已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早在20年代, 卢加德在著作中就曾说: “土地的买卖、抵押、租让和馈赠的私有权在沿海大城市得到了充分承认, 在内地则越来越盛行”。<sup>①</sup>

---

<sup>①</sup> F. D.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统治》), London, 1929, p. 286.

随后是南部地区。土地买卖和出租已成为经常的事情。有人指出：“伊博族地区，土地因抵押或租赁而暂时转手的现象相当突出，在尼日利亚南部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城市中，土地买卖是常见的事”。<sup>①</sup>

贝宁的橡胶种植业在本世纪初已有相当发展，据1906年不完整的统计，数目达284个，这些种植园的开辟也逐步伴随着出现土地的私有化。30年代，许多棕榈种植园也私有化了。当时一位农业部殖民官员说：“相当多的贝宁人热衷于开辟棕榈种植园”。<sup>②</sup>

在西部的约鲁巴地区土地私有化也有极大发展。40年代在该地区实地考察的英国学者指出：“虽然传统的制度仍然存在，但是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城郊和适合种植可可的地区，对土地需求增大了，传统的获得和租让土地的制度已经不适合商品农业的发展了，人们逐步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土地可以赚钱获利，土地租让者可以收取现金收入”。<sup>③</sup>

北部地区土地私有化较为缓慢，20年代卡诺城附近稠密居住区已有土地买卖现象。纳德尔指出努佩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但这种情况仅限于城市周围地区。广大乡村地区，传统的土地关系仍占统治地位。

## 第二，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

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的渗透，土地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尼日利亚的资本主义农业在英国殖民主义经济掠夺的夹缝中得到萌芽和发展。这里说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① 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32页。

② P. A. Igbafa, *Benin 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 (《英国统治下的贝宁》), London, 1979, p. 346, 349.

③ P. Freoda, *The Economics of a Tropical Dependency* (《热带属国经济—尼日利亚土著经济》), London, 1946, p. 89.

的原始状态。尼日利亚已具备了它产生的历史前提：(1)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样能生产或进口更多的粮食。一部分土地改种经济作物，导致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阶级的分化，萌芽状态的自由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从而产生。(2)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部分资本投向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现象在西部地区开始出现。(3)货币地租的发展，封建依附劳动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过渡，广大村社农民贫困化，形成大批季节性劳动力。(4)外国资本强烈影响和推动，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尼日利亚农业资本主义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起来的：

1. 一些酋长、头人及其后代从对农民实行封建性剥削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建立种植园，逐步转为雇佣劳动进行生产。

在约鲁巴人居住的埃叶夏地区，20世纪初，“许多酋长已创办可可种植园”。奥格登巴区的头人戈哈叶·汤巴逊为该地区可可种植的开拓者，死于1901年。他的儿子A.汤巴逊继承遗产，20年代开始使用外地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至30年代末，种植可可的面积达200多英亩。该地区另一名酋长的儿子大卫·伊比达波，他在1906年就开始创办商业性的种植园。<sup>①</sup>在贝宁地区，酋长投资创办商业性种植园的人数，据殖民官员统计如下：在沙坡巴路有36人，在埃格巴有38人，埃维阿9人，阿沙区路17人，埃赛路9人，在埃格巴得马路36人。其中种植园面积大的达937英亩，甚至1500英亩。<sup>②</sup>在北方地区卡齐纳等地也有一些酋长投资创办种植园。

2. 商人、官员等投资创办面向各市场的种植园。

---

① Peel. D. Y. *Ishas and Nigerial* (《埃叶夏和尼日利亚》),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3, p.128.

② Igbafa. P. A. *Benin 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 (《英国统治下的贝宁》), London, 1979, p.346.

英国民族学家 F. 纳德尔根据 40 年代在努佩地区一些商业城市郊区,如卡齐纳、杰巴、比达等地的调查,提供了一份商人、官员举办种植园的名单,其人数不少。<sup>①</sup>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还是西部的可可种植区,约鲁巴地区不少商人当商业不景气的时候,他们把更多的资本转向农业经营,兴建种植园。种植园主 B. 阿巴发,原为商人,投资转向农业经营,1917 年在农场使用雇佣劳动力,这是该地区最早见于记载使用雇佣劳动的种植园。根据 1921 年记载埃叶夏城的不少商人雇佣外地劳工经营农场,让这些劳工从事清除杂草等农活。在约鲁巴的奥立夏,不少商人既在城里有相当的资产,搞贸易,又在乡下投资兴建种植园,他们在村庄里修建水泥的建筑物。这些商人兼种植园主中,有的人拥有的资本十分可观,少数人早在 20 年代年收入就达 500—1000 英镑,最高者达 2000 英镑,比当地酋长更富有。他们的地产也很广大,商人 F. 兰奇甚至需要开汽车巡视他的庄园。<sup>②</sup>

3. 农民小生产者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上升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场主。

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的日益分化。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小农规模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全部

本质,就正如家长集团内财产不平等的造成与加强。其次,就在简单的不平等变为资本主义关系”。尼日利亚的这一过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开始,二次大战后更为明显。这种分化一般表现在生产数量高低、土地占有的多少和放债、负债三个方面。

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萌芽,

---

① 纳德尔:《一个黑人拜占庭国家—尼日利亚的鲁佩王国》,牛津出版社,1951 年版,第 251 页。

② Peel D. Y., *Ishas and Nigeria* (《埃叶夏和尼日利亚》),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3, p. 122, 134.

因为它们都共同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从事的是面向市场的商品农业；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其次，部分土地所有权已经私有化。土地可以买卖、继承、转让和租让，成为了商品，从封建土地国有制或村社土地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再次，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

必须指出：尼日利亚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在早期阶段，直到独立前夕大部分地区仍表现为萌芽状态，因为它受到氏族残余和封建势力以及殖民主义的压制很难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也仅在个别的生产部门中产生。另外，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平衡的，沿海地区和经济作物发达地区如约鲁巴地区，农业资本主义较为发展，北部地区一般仅限于城市郊区，广大乡村地区，仍处在封建生产关系的统治之中。

在农业流通结构方面，尼日利亚农产品流通的网络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外国资本所控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地理重心移向原来落后的沿海地区，沿海兴起的大批城市日益繁荣起来，农产品流动方向从国内的南北流向变为流向海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为一体。

第二，随着商人阶层力量的发展，流通网络大为扩大。英国学者怀特作过深入研究，指出：“从 1885 年以后，西非的贸易和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结为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就是交换经济破坏单纯的自给自足经济而发展起来）贸易形式日益复杂以及专业贸易人员的作用逐渐增加。另外，还有跟着发生的一些变化，传统上没有市场的社会，现在至少在城镇中有了市场”。尼日利亚和加纳商人阶层人数大为增加。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流通结构为外国公司控制，形成了农民——中间商人——外国垄断公司的流通渠道。这一历史过程发展如下：在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

主要是掠夺棕榈油,但内地的贸易权还是掌握在酋长或一些非洲商人手中,只是非洲中间商人为外国公司所控制。从40年代起,外国垄断公司与尼日利亚殖民政权进一步结合起来,尼日利亚农民的生产和农产品流通完全被其控制。英国殖民当局在1940年建立西非可可管理局,1942年建立西非生产管理局,1946年后分别建立可可、棉花、花生和棕榈产品销售局,以后又将这种制度在各州加以推广。这些销售局如一层层网,控制了英属西非农产品的流通,掠夺广大农民。

英国殖民主义掠夺英属西非正是通过控制流通领域,左右生产领域来实现的。这些销售局表面看来是起着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实际上是英国掠夺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工具。它们付给农民的只是世界市场价格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些农产品销售之间的巨大差额被英国垄断资本攫取。控制农产品的流通领域是英国榨取英属西非农民的实质和主要手段。

## 二、依附性的加强

从英属西非上述殖民经济和结构的演化来看,对其依附性殖民经济的演变及影响,我们可做以下结论:

1. 从英属西非的内部的发展来看,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殖民统治时期英属西非农业结构是朝着外围资本主义方向演进的。从其生产结构看,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生产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农业与封建农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为货币经济,而后者为自然经济”。因此,英属西非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增高,表明其农业中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增长;从生产关系结构来看,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流通结构看,英属西非农业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被国际资本主义所支配。但英属西非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并未完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仍处在过渡之中,而且形成了一种畸形



的农业结构。

2. 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来看,英属西非 19 世纪中叶以后,日益成为依附于欧洲这个中心的外围。如果说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是在英属西非掠夺奴隶进行贩卖,实行重商主义的话,那么 19 世纪末期以后,英国则以一系列殖民主义措施,强行改造英属西非原有农业结构,使之日益外围化,形成以棕榈产品、可可、棉花和花生等为支柱的原料出口型结构。英属西非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机制已经形成。

3. 英属西非农业结构外围化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是美国式道路,也不是普鲁士道路,它走的是一条变异的落后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一个以农业为核心,辅之加工工业,近代交通运输、近代金融制度、近代贸易制度为特征的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这一时期正在形成之中。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改造下进行的,不是自生农业结构萌发出来的结果;它是帝国主义重重障碍下,本国资产阶级力量、资本主义成分都较为薄弱,带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成分下发展的;它的生产力仍处在比较低下的水平;它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农业结构,而是单一畸形化,沦为中心国家的外围。

4. 英属西非殖民依附经济结构的形成,对后来西非数国的现代化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单一经济结构的形成。少数几种仅供出口的农矿初级产品畸形发展,不仅使原英属黑非洲国家加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经济脆弱程度极高,而且热带单一农业产品对工业化也没有大的扩展效应。由于初级农矿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外围地区的“经济剩余”从而流向中心地区,这些黑非洲国家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快速形成民族资本积累。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交换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进行的。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发达国家和以出口农矿产品为主的黑非洲

国家之间的贸易,始终存在着不平等交换的现象。由于国家从属于“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从属于世界经济体系。而不脱离这一体系便不能阻止经济剩余的外流。

(2)非洲国家内部经济相互脱节,未形成一个比较合理有机联系的经济结构。由于殖民时代单一经济类型未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导致二元结构的形成,关于这点阿明很正确地指出,这种分工使外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分裂。通过和中心的直接联系更为集中以及许多不同地区之间的从属性联系更为分散,外围之间失去联系的情况增多。这种脱节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发达经济社会是由各部门、各公司组成的,它们互相并列而不高度结合,它们各自结成一些实体,其重心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在这里看不到经济意义上的具有完整国内市场的国家。根据其他地域大小和出口品种,不发达经济社会可能看起来是由这种类型的、相互独立的若干“部分”所组成或者一个单一“部分”所组成。

(3)后来导致了这些黑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两难状况,即所谓“悖论”。其结果是改变单一畸形,结果导致其更加难以改变,因为只有单一农矿产品出口创汇才有资金来源;又如,推进工业化造成工业化更难进展,因为推进工业化,非洲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工业领域,这又导致了对农业的忽视,加速了农业的衰落,从而又影响了工业化的进展。

(4)民族工业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关于这点依附论学者们对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和一些逼近历史真实结论。在先发达的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是排他的,而外围形态根本不同于中心形态。这些外围形态所采取的形态一方面决定于那里以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被结合进世界体系的形式和时代。中心资本对当地经济、政治生活影响较大,且能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从属外资的商业界(供应商、代理商、承包商、进出口贸易商)形成势力强大的买办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成长。

## 第四节 英属殖民地的白人移民经济

### 一、殖民政策与白人种植园经济的形成

“白人至上”的殖民政策及其实施是白人种植园经济形成与成长的历史前提与条件。本世纪初前后,英国殖民当局为促进其殖民地白人种植园经济的形成,采取了如下殖民政策:

#### (一)掠夺土地

西方殖民列强侵占非洲后,宣布将大批所谓“无主土地”、“荒地”归“政府所有”,“王室所有”,然后把一些气候宜人的肥沃土地转让给大公司和白人移民。大批白人移民在这些占领的土地上发展种植园,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中非的比属刚果,南部非洲的尼亚萨兰、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这些白人种植园经济在当地国家所占比重相当大。白人移民借助殖民当局,掠夺当地廉价劳动力,获得种种优惠政策与丰厚利润。特别严重的是,这些白人移民掠夺了大片肥沃土地,剥夺了当地非洲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权。

以肯尼亚为例:英国殖民者的第一道皇家土地法令于1902年颁布,法令规定:“凡由英王陛下保护地控制的一切公共土地,……或即将为陛下占有的一切土地,‘均属’英王的土地”,有处置的全权。英国殖民当局把掠夺的土地,廉价卖给白人移民和公司,或者出租给移民,租期先是99年,1915年又改为999年。非洲人的土地遭到了任意的掠夺,给非洲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903年,内罗毕和基安巴两地,吉库犹族39520英亩土地被掠夺,分给欧洲移民。1904年,埃耳格约族被迫迁出埃斯卡尔普门特地区,157.6万英亩土地被剥夺。1907年,殖民者又夺走了坎巴族和基皮斯吉

族的土地。“从 1905 年到 1914 年,肯尼亚的非洲人被剥夺去将近 440 万英亩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当局为安置复员军人,又掠夺了 86 450 英亩土地,其中 79 040 英亩土地,是从南迪族那里夺取的。白人移民也迅速增长,1926 年达到 12 500 人。到 1934 年白人占有土地 1100 万英亩,超过了肯尼亚全国最好土地一半以上。1939 年,英国殖民当局又颁布法令,将肯尼亚山下总面积为 16 700 平方英里的肥沃高原“租让”给白人移民。<sup>①</sup>

津巴布韦的情况也是如此。自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后,津巴布韦的土地占有状况就极不合理。

20 年代初时白人移民占领当地居民土地面积达 32%,1930 年增至 49.1%。津巴布韦非洲人和白人平均占有土地的比例大致如下:20 世纪初年,平均每个白人占有土地相当于黑人的 30 倍;20 年代:白人平均占地数相当于黑人的 38 倍;30 年代:40 倍;40 年代:37 倍;50 年代:30 倍;60 年代:19 倍;70 年代:近 19 倍。即使在欧洲人大量迁入之后,白人居民最多不过占人口总数的 5%,但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同占人口总数的 95% 的非洲人占地数大致相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津巴布韦独立之时。

在北罗得西亚,转让给欧洲人的土地相对少些。统治该地直到 1924 年的英国南非公司,通过 19 世纪 90 年代与当地酋长达成条约,获得了除巴罗兹兰之外全部领地的土地占有权。这家公司成功地动员白人大批移居进来,而被剥夺了土地的非洲人则被迫迁移他地,有时得到一些补偿。到 1921 年,在全部 3634 名欧洲人中,从事农业的有 714 人。在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北罗得西亚的土地被大体划分为三类:专为非洲人保留的土地面积总计为 2874 万公顷,包括巴罗兹兰(1497 万公顷)和土著人保留地(1374 万公

---

<sup>①</sup> 转引唐同明:《英属东非的土地问题》,见《西亚·非洲》,1985 年,第 3 期。

顷)。已经分配给欧洲人的土地在 343 万公顷以上,其中,222.5 万公顷为两家公司所占有;120 万公顷为农庄。除此之外,剩余的 6070 万公顷土地为森林和动物保护区。<sup>①</sup>

这些掠夺的土地只有极少部分为白人所实际利用,北罗得西亚 30 年代“在土著居民全部被驱走的广大地区,几乎无人居住……例如 1/3 的恩多拉地区,2/5 的姆库希地区以及其它像布罗肯山这类地区的大片土地,实际上都是无人区。铁路线两侧作为皇家土地留下来的 2300 万英亩中,转让出去只有 200 万英亩,这还包括用于采矿目的 6.7 万英亩在内。欧洲人耕种的土地大约为 7 万英亩,从事农业的人数只有 260 多人。在亚伯康恩地区,有 550 万英亩土地辟为欧洲人的居留地,实际上转让出去的只有 10 万英亩,而其中由欧洲人耕种的仅 500 英亩。在南部非洲英国的保护国尼亚萨兰白人移民的土地 95% 是任意荒废的。”<sup>②</sup>

大规模掠夺土地的目的是:让非洲人到欧洲人农场种植园去做工,另一目的防止非洲农民成为白人种植园的竞争者。

## (二)征收赋税

与大规模掠夺土地,破坏非洲自给自足农业相联系的殖民政策是向非洲人征税。对非洲人不论其收入情况如何,一律征收人头税,照人头税制度规定,凡是年过 18 岁(有时候是 16 岁)的非洲男子均得纳税。这是一种公然为欧洲雇主提供非洲工资劳工队伍的蓄谋措施。人头税从来没有像一般税收制度那样主要被看成是国家税收的一个来源,而是被当作一种迫使非洲人进入货币经济的措施。对非洲人强制征税一般开始于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特别是在南非联邦发现金刚石和黄金矿以及在非洲其他地区发现各种矿藏以后。

①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非洲通史》第 7 卷,第 315 页。

② 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年,第 7—8 页。

在英属殖民地，向非洲人征收人头税始于 20 世纪初，南罗得西亚 1904 年开始征收人头税，北罗得西亚 1905 年开始征收人头税和茅屋税，肯尼亚则始于 1901 年。英国殖民当局征收人头税的目的在于迫使非洲人去欧洲白人种植园出卖劳动力。曾任肯尼亚总督的佩西·吉鲁阿德供认说：“人头税制度正是为了驱使非洲农民出外工作而设想出来的。我们认为赋税是惟一能够迫使土著居民离开‘保留地’寻找工作的手段。”<sup>①</sup>

英国殖民当局治理下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三块领地，1926 年仅茅屋税和人头税的总收入竟达到 160 多万英镑。肯尼亚非洲人在 1924 年一年里出卖农产品总收入总共 54.6 万英镑，而必须上缴的人头税、茅屋税和出口税等总共却达 87.6 万英镑。赋税已达到非洲人难以承受的地步。

### (三) 强迫劳动

英国殖民当局遵循白人种植园主和欧洲公司的要求，采用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支持土地荒和人头税等经济上的强制手段。

在乌干达实行所谓“卡桑式”制度，土著当局条例规定强征居民从事最长可达 30 天的劳役。英国殖民当局在“为公”的名义下，征调非洲人替白人种植园做工，而不给任何报酬。英国先后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和南罗得西亚等地颁布“流浪法”采取暴力迫使逃亡的非洲人就范。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 1919 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土著管理条例”允许在“紧急状态”下对全体非洲人实行强迫劳动。

### (四) 扶植白人种植园农场主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sup>②</sup> 首先，殖民当局严格地确立了对国内外贸易的控制权，在商品销售、市场统一分配、商品价格的制度、

---

① 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年，第 48 页。

② 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90—193 页。

运输安排等方面对白人农场主或种植园主实行优厚的待遇。这在白人移民势力强大的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肯尼亚非常突出。如在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成立了国家商品管理局,鼓励和支持白人农场和种植园放弃种植滞销的烟草、咖啡和其它出口物资,而种植国内市场较有销路的谷物,生产畜产品和奶制品等。为了防止非洲农民从事相同的生产,造成对白人经济的“威胁”,商品管理局通过制定产品出售的限额和规定输往特殊的遥远市场等办法,对他们的生产实行控制。

在肯尼亚,成立了两个白人移民协会,获得了谷物和奶制品销售的垄断权。非洲人的生产被纳入计划之内,在产量定额和价格方面受到种种歧视。当地生产的优质茶叶只有白人种植园才能种植,满足出口的需求,而非洲人则绝对不许种植。

其次,对白人种植园的产品,实行固定收购价格的政策,使其不因市场价格波动而遭受损失。

再次,对白人经济实行财政补助,是殖民统治当局普遍采取的一种办法。英国殖民当局利用比过去大大减少了的财政收入,向欧洲人种植园和农场主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他们度过经济危机。在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殖民当局除了向白人移民提供农作物的优良品种、肥料外,还给以名为“贷款”,实为无偿提供的财政援助。在1932年的一年时间里,前者提供了8.5万英镑,后者供给了12万英镑。

此外,在铁路运输方面也优惠白人,歧视非洲人。如果已经修建铁路,欧洲人便煞费苦心地使那些和铁路线毗邻的地区包括在他们占有的土地之内;如果要修建新铁路,也以同样方式为欧洲人的利益着想。就接近主要公路和市场这方面而论,情况也是如此。总之,欧洲籍农户得到了一切有利条件。

#### (五)压制非洲本地农业

根据1935年的北罗得西亚玉蜀黍管制条例,1936年向欧洲

种植者收购的每袋玉米定价为 7 先令 9 便士,而非洲农民仅能得到 5 至 6 先令。同一项玉蜀黍管制条例还规定非洲人在玉蜀黍国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限制为 1/4,而让其余的 3/4 都由几百个欧洲人农场掌握。而非洲农民收购的农产品的价格被大幅度压低。在南罗得西亚,粮食收购价格在 1908 年至 1911 年下跌的尤为厉害。

非洲人还被禁止种植某些作物。殖民当局规定只有欧洲人才能种植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出口作物,如茶叶、高级烟草、优质咖啡、桐油等而不准非洲人栽培。英国在南罗得西亚颁布法令,禁止当地非洲人种植茶树,加工茶叶需要“精细的技术”、“高超的操作能力”,而“非洲人显然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坦噶尼喀是盛产优质咖啡的地方。英国殖民当局采取行政手段限制非洲人的种植数量。到 30 年代,有些地方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违者以“破坏者”论罪。<sup>①</sup>

在肯尼亚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的情形,其办法部分是提高执照费、部分是限制种植面积;而当这种限制于 1939 年被取消以后,又采取了只准非洲人在一定地区内种植咖啡的办法,特别是种植名贵的阿拉伯咖啡。他们指出,欧洲人害怕“非洲人的生产增加不仅会威胁他们的市场,而且会减少自‘保留地’流人的劳动力。”这是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使用超经济强制的又一典型例子。

## 二、英属殖民地白人种植园经济概貌

关于英属白人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状况的历史,分述如下:

南罗得西亚:在 1923 年时,已拥有白人移民 35 000 多人,1935 年至 1936 年时激增到 55 400 多人。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和行政官吏绝大多数来自南非。他们带来了在南非已经对非洲人

<sup>①</sup> 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152页。



实行了 200 多年的种族主义政策。白人政府颁布了土地分配法(1930 年)和工业调解法(1934 年),这成为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统治的两根支柱。人数只有 50 000 人的“欧洲人区”却占据全部土地的 50%,那里却又都是土壤肥沃、矿藏丰富、交通发达的地区。非洲人的土地土质低劣,且又干旱偏僻,不适于农牧业。

本世纪初,菜牛和玉米迅速地成为欧洲人经营的农场上的最重要的产品。1911 年玉米第一次适量出口。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乌姆塔利和索尔兹伯里两个地区种植了烟草。欧洲人早期试种的大都是烟斗用烟草,1910 年,在索尔兹伯里第一次公开拍卖烟叶,并且成立了烟草种植园主协会,这一年成为烟草行业草创时期的一个里程碑。烟草向南非出口也在这一年,当时南非是主要的市场,贸易额达到 20 万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牛肉运到了南非和东非,出口增加 5 倍。英国南非公司也开始为它自己经营起农业,它还开始试种柑桔和落叶果树。国内最突出的经济作物要算烟草,特别是不同品种的烤烟。这个行业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立的,因此在 1939 年以后,罗得西亚就能够利用烟草在世界市场上的高价获得好处。在经济不景气之后,政府根据 1936 年的烟草销售法令,实行烟草强制拍卖。这一法令也规定建立烟草销售局(代表政府和烟草业),负责管理拍卖事宜。<sup>①</sup>

北罗得西亚:两次大战之间的 20 年时间里,随着英国在非洲殖民地掠夺农业和矿业原料的加剧,北罗得西亚成为它重要的殖民地。其南部境内铜矿产地的继续发现,铜矿开采业的大规模发展,城市相继兴起,通向印度洋海岸港口的铁路也都建筑起来,这些都吸引着欧洲人移民的到来,在铁路沿线的肥沃地区,出现了一个个白人移民的村落。在北罗得西亚,欧洲人数量不断增加。

---

<sup>①</sup> P. E. N. 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71—372 页。

1935年至1936年，北罗得西亚的欧洲居民达9900多人。

尼亚萨兰：一战以后，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欧洲移民也开始居住在气候条件比较好的一些地区。他们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总的来说，在尼亚萨兰欧洲人移民数量比北罗得西亚少得多。据统计，1935—1936年时，尼亚萨兰的欧洲移民1780多人，其中不少是经营农业的种植园主。尼亚萨兰的欧洲籍殖民，虽然相形之下为数不多，他们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却对经济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养了为数不多的几群纯种牛，为城镇供应肉和奶品；他们还种植了值钱的经济作物，为出口供应了大宗产品。约翰·布坎南在19世纪80年代引进的咖啡，是最早的移民所种植的第一批经济作物。虽然开头在布兰太尔—乔洛地区的欧洲人农场上咖啡种植得十分成功，但后来咖啡树丛得了病虫害，产品的价值在20世纪初叶便下降了；其重要性即为烟草和茶叶所取代。

肯尼亚：情况与坦噶尼喀一样，非洲人拥有一点土地，但土质肥沃的可耕地中的大部分却被白人移民所占。英国人对本世纪初的肯尼亚经济活动的看法导致他们在肯尼亚以外的地区寻找代理人。与处于中央集权政治机构统治下的乌干达（尤其是布干达）的发达的农业相反，肯尼亚的大多数社区的经济甚为落后，以致不能靠它作为经济发展的跳板。英国人由此下结论，白人被选中来组成属地经济生活的基础。除其他因素外，肯尼亚高地温和的天气，是一个吸引白人移民的重要因素。移民所占的土地绝大部分位于海拔1400米以下。这些地方降雨量最多而且最可靠。而肯尼亚的沿海地区气候炎热，雨量不稳，这些地区未被白人移民看中，因而未被殖民化。总之，被剥夺的土地总是位于条件最佳的农业产区。

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以及殖民当局为推广白人移民农业而进行的宣传，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其中有冒险家，也有真正的移民。1903年，在肯尼亚的欧洲人，仅596人。两年之后人数增到954

人,其中700人是南非人。截至1914年3月底,欧洲人增至5438人,1929年12月底肯尼亚的欧洲人共有16663人之多。早期移民中的许多人,尤其在1910年以前,得到土地只花了很少钱或根本没花钱。其中有德拉米尔勋爵,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地主,一度拥有4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sup>①</sup>

乌干达: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变化成为专门种植棉花、咖啡、橡胶、可可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巨大种植园。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英国殖民当局依靠当地非洲人的酋长或村长进行统治和掠夺。欧洲人移民陆续到达乌干达,定居下来,其人数增加很快。1935—1936年,欧洲人居民近2000人,绝大多数是经营种植园。<sup>②</sup>

### 三、白人种植园经济的历史影响

白人种植园经济在黑非洲的确立与发展,对当地社会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sup>③</sup>

首先,此种经济类型导致了一些黑非洲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化,表现在白人掌握经济命脉和本地非洲人民族资本极其薄弱。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商业为外国垄断公司和少数欧洲移民所垄断,经济作物和商品粮食为白人种植并受其操纵。在商业、矿业、农业和运输业部门中,存在着非洲人经营的小农场或小企业。但是,由于外国垄断公司的竞争,加上受到白人资产阶级采取超经济手段的排挤,非洲人民族资本难以发展。殖民主义措施导致的主要后果是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南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

---

① 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7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第312页。

② 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③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阶级化的规模极为广泛。欧洲人以不足果腹的工资水平雇佣非洲劳力,为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经济作物。

如在肯尼亚,1927年为白人从事商品农业生产的非洲人在8.37万至11.7万人之间,占全部工资劳动者的50%以上。生产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咖啡、小麦和西沙尔麻。1905年玉米种植面积仅为325公顷,到1920年猛增至近1.25万公顷,9年之后又增至9万公顷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白人移民已把非洲农民逐出这一重要的大宗作物的生产和贸易领域。咖啡种植面积也增长很快,1905年为32公顷,1920年超过11250公顷,10年之后猛增到近3.9万公顷。1913年咖啡和玉米出口为本地赚得64991英镑;1920年这两种作物和西沙尔麻的出口值为566556英镑;1930年时他们的出口值达2429655英镑,其中咖啡占一半以上。这些发展导致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1913年国内出口总额中,纯非洲人生产部门提供了24%,纯欧洲人生产部门仅占5%。显而易见,直到此时欧洲劳力对商品农业影响还很小。但在1932年,非洲人地区提供的出口份额降至9%,而欧洲人地区的份额增至76%。

其次,经济结构的畸形表现在现代化的农业同落后的非洲人农业的双重结构,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消费类型和两种生活方式。在基本上由白人掌握的现代化部分,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及各种基础设施,而非洲人的公社地区仍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经济极为落后,农业内卷,即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向大自然榨取越来越不够的粮食。

曾在南罗得西亚担任土地开发局官员的肯·布朗写道:“大部分土著住区都是贫瘠的土地,通常比较贫瘠的花岗岩沙地,这类土地用专门术语来说称为‘三类地’;而欧洲人住区几乎囊括了这一殖民地全部土壤肥沃的区域。”他接着说,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当一个欧洲人驱车从欧洲人住区进入“土著住区”的时候,他常常

会为突然变化的景象所困惑：

“土壤类型的变化几乎完全和边界线的划分相一致，而且是如此惊人地明显。”就连允许“土著购买土地的地区”，即被认为是在南罗得西亚为发展一个非洲“农民中产阶级”所提供的适当地区，据布朗说，也常常是位于“贫瘠的花岗岩沙地或者甚至更为贫瘠的细沙石地区。其他的土地……则位于疾病流行的炎热地区，那里的居民深为疾病所苦（特别是因为附近没有医院或诊疗所）。另外则……尽是一些崎岖不平和多岩石的土地，以致在大部分地都不可能从事农业”。

肯尼亚的土壤也同样遭到破坏：“为了弥补低产量，陡坡和丘陵侧面也被用于耕种，其结果只是使更多的土壤被冲洗成沟，把灾害扩大到山下地区。”“土地缺乏意味着牲畜的牧场减少，结果，牧场过度使用也加重了灾害。牧草没有生长机会，于是逐渐干枯，使失去保护的土壤不能抵御雨水的侵蚀，结果土壤受到冲洗……。土地缺乏引起的这些后果相当严重。由于农业事务部强迫种植玉蜀黍和阿拉伯树胶这类经济作物，这些后果就变得更为严重。”<sup>①</sup>

最后，导致了某些国家单一种植经济结构形成。在殖民时代，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粮食供应一直处在紧张状态。那些地方由于大量种植烟草、棉花等出口作物，挤掉了粮食的种植面积。再加上矿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对商品粮（主要是玉米和谷物）的需求非常严重，据估计，20年代末农民的平均口粮只及一次大战前的2/3。30年代中期他们的粮食还只有20年代末的一半。许多在外谋生的非洲人不得不通过邮局和铁路运输向农村老家寄送钱物。其中的现金是为了缴纳当地的税收，而物品主要是食物，像玉米粉、高粱等。非洲主要生产粮食的农村，粮食却不能自给，而要依靠外界运进粮食来维持农民的生活，这是非洲经济

---

<sup>①</sup> 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9—20页。

畸形发展产生的一种怪现象。

白人经营的是现代化的种植园,对后来非洲单一经济作物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种植作物构成大致如下:津巴布韦:烟草;肯尼亚:茶、咖啡、除虫菊;马拉维:烟草、茶叶;乌干达:棉花、茶;坦桑尼亚:西沙尔麻;桑给巴尔:丁香。

## 第五节 “宪政改革”和民族 自治运动的兴起

20 世纪的初叶,随着殖民经济的形成,作为经济殖民化的社会后果:黑非洲传统社会阶级开始分化,产生和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英国殖民主义希望通过西化教育培植一批忠于英国当局的知识分子,但后者后来却成为民族独立和自治的先锋。在二战前这些知识分子是以“宪政改革”和民族自治作为争取目标的。上述过程演变如下:

20 世纪前后,在英属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非洲本地知识分子阶层,英属殖民地知识分子倡导一些启蒙活动,如实行一夫一妻制,唤醒人民的民族意识。至 1900 年时,塞拉里昂出现 34 家报纸,黄金海岸 19 家,尼日利亚 9 家,除少数几家外,都由非洲人所有,由非洲人创办和担任编辑。托马斯·霍雷肖在《拉各斯每周纪事》上谴责殖民当局:“我们一直生活在军事独裁禁锢的环境中,因为法律落入无恶不作的官员手中之后,已经从一种保护手段变成了犯罪和镇压的工具……上届(卢加德)政府已经逼得土著人一提起白人便深恶痛绝。”<sup>①</sup> 他们的纲领和充满激情的社论都鼓吹必须在非洲建立新型的社会,即一个以欧美为楷模取代旧的传统社会的

<sup>①</sup> 巴兹尔·戴维逊:《非洲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民族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殖民制度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基础的改造,而流于高谈阔论。他们对殖民当局抱有幻想,相信黑人与白人的合作,最终能导致白人承认黑人平等地位,反对人民的暴力反抗斗争。在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属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上述启蒙活动,仍只是处于零星萌芽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属殖民地以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为主角的“宪政改革”和民族自治运动开始兴起,其历史背景如下:

1.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城市,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明显增加,殖民经济的运转,培养并形成了一个教员、文书、下级行政官员、律师和牧师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接触了世界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

2. 一战后英属殖民地间接统治制度的推广,调整和实施,排斥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对立。卢加德曾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尼日利亚民族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厌恶,他声称:从一开始他就不对他们抱有好感,他反对“从属于受过教育的土著”参政。<sup>①</sup>1926年卡梅伦在坦噶尼喀拒绝非洲人参加坦噶尼喀立法会议。英国人既不愿意在全领地的立法会议中让非洲知识分子享受其他权力,又在地方政府中强调土著当局和传统酋长的权威,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知识分子立宪改革和民族自治运动的兴起。

3. 一战后威尔逊鼓吹的自由民主和自决原则的影响,以及泛非主义思潮和非洲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复苏。20年代数次泛非代表大会都有西非代表参加,西非的民族主义活动和反殖民主义走向国际化,促使了西非人民初步觉醒。例如,尼日利亚民族主义明显受到了20年代至30年代泛非主义和马库斯·加维尔思想的影响。主张非洲民族自治与解放的泛非主义,以及主张在非洲

---

① F. D.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统治》), 1929, p. 195.

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和“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加维尔思想在尼日利亚的传播,对唤起非洲人民民族觉醒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4. 对英国殖民当局经济上的掠夺和垄断性政策的反响。一战后,英国加紧新的开发与掠夺,其施行的殖民经济,土地掠夺等许多政策,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但非洲本地人的经济利益,完全不能得到反映。如在黄金海岸对可可、棕榈产品征收出口税问题上立法会议投票时,非官方委员投票反对,只是因官方委员占多数而获通过。类似问题对非洲人刺激很大,深感自己无权,促使他们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利。代表新兴阶层的思想和利益必然会通过立宪要求和自治运动反映出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属殖民地“宪政改革”和民族自治运动概况如下:

英属西非:建立了一大批部族的、福利的、文化的、同学会的各类社团。这类社团的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医生、记者和商人。在尼日利亚,许多城市都成立伊博人同盟。1923年,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建立,这是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该党的主要活动是支持立法会议中该党在拉各斯市当选的三名议员工作,该党纲领是:

“保障作为英帝国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高举‘权利、真理、自由和正义’的旗帜迈向民主的最高峰,直到实现其‘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同时保持对英王陛下的君权和本人毫不动摇的忠诚态度,采用的方法和一般程序严格遵守宪政原则。”

这个党的纲领包括:提名和选举立法委员会的拉各斯成员,使拉各斯取得市的地位和完全实现地方自治;发展高等教育并在尼日利亚全境实行义务教育;使文职人员非洲人化;在尼日利亚实行自由公正的贸易和平等待待尼日利亚的商人和生产者;最后,在受



控制的私人企业制度下,对尼日利亚的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开发。<sup>①</sup>

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使用通常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参加拉各斯的选举。并在1923、1928和1933年取胜。在1938年之前,该党是拉各斯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1925年尼日利亚留学生在伦敦成立“西非大学生联合会”,不久,在国内主要城市都建立其分支机构。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文化团体,它的宗旨是鼓励和培养民族意识和自尊精神。1936年,“尼日利亚青年运动”建立,阿齐克韦成为该运动领导人,其宪章宣布要“统一尼日利亚各部族和发扬民族意识”,在政治上要争取“在英国范围内的完全自治……在英联邦国家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由本地人完全独立地管理自己的地方事务。”该运动在全国20个省份建立了分支机构,拥有一万多名会员。1944年尼日利亚成立“尼日利亚国民会议”,它的最初目标是争取在英帝国范围内实现自治而团结奋斗。其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黄金海岸,1920年,在凯斯利·海福特的倡议下,阿克拉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该会的纲领要求扩大非洲人的政治权力,如增加非洲人立法委员以及参与财政管理,实行文官制度非洲化。1930年黄金海岸青年会议成立。会议的宗旨是: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提出政府机关非洲化和立法会议非洲人应占多数等要求。该会议领导人是丹凯,成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

英属东非:本世纪20年代后,肯尼亚第一民族主义组织“东非人协会”建立,这个组织的成员以小资产阶级和商人为主。1921年,由于欧洲白人雇主企图削减非洲工人工资和拒绝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非洲一些工人在内罗毕举行罢工,通过决议,反对削减工资。“吉库尤青年协会”在这次会上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谴责强迫劳动制度和吉库尤土地的掠夺,以及

---

<sup>①</sup> A.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7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第512页。

不断加重的赋税。吉库尤青年协会人数虽然不多,但成员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

1922年初,吉库尤青年协会被英帝国主义取缔,但1924年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又建立了吉库尤中央协会。它的纲领包括:停止对土著居民的土地掠夺,给非洲人政治权利,土著非洲人有权参加立法会议。1927年,协会任命肯雅塔为吉库尤中央协会总书记。协会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请愿和办报,希望以此能获得某些改革,这种斗争的矛头当时只指向殖民制度的某些方面,而没有指向整个殖民制度。1928年,土地问题再次成为肯尼亚政治中心问题。当时英国殖民部派米尔顿·杨格委员会来肯尼亚视察,肯雅塔作为中央吉库尤协会的代表,向米尔顿·杨格委员会提交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殖民当局尊重吉库尤人的土地权利。1928年,吉库尤中央协会创办报纸《穆伊格威塔威亚》(报名意思是:“能使整个团体彼此互相了解的人”)。报纸的目的是团结所有非洲人中的先进分子,重新滋长民族意识,“团结群众,告诉他们怎样帮助自己”。报纸的基调恰如它首刊扉页上的口号“祈祷和工作”是一样,是改良性质的。内容有全日新闻、政治论文和讽刺说教等。

在坦噶尼喀,许多部落自愿地组织了各种协会。这些协会似乎是一种救济或互助性质的团体。但是从广义的基础上来看,它们带有政治性,因而它们成了早期武力反对殖民主义阶段和最近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时期之间的桥梁。

在坦噶尼喀的部落联盟和各种协会中,最激进的组织是1924年成立的布料巴哈亚人联盟和1925年成立的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它们之所以反对酋长们,主要并不是因为这些酋长是传统的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为殖民地政权的雇员,他们更多地代表殖民政权的愿望而不代表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人民的愿望。这些运动同时标志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由得到群众拥护的新人进行努力,试图从酋长们和殖民当局的手里夺

取行政管理权。毫无疑问,这些运动,尽管只局限于部落范围,它们却是政治性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从殖民当局统治下取得独立。(参见第16章)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坦桑尼亚成立了三个全领地范围的组织。即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和坦噶尼喀非洲工人中央协会。在殖民地当局的袭击下,只有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生存下来。以城市为主要根基和发展方向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在30年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福利目标和宗旨,而在于它的超部落性质。正是由于它把这种非部落和非宗教的性质传给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从而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并且成为一个成功的群众运动。<sup>①</sup>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属殖民地的立宪改革和自治运动,可作如下的简明结论和评价:

(一)这是不同于王公酋长起义,农民抗捐抗税,以及盲目排外的宗教运动等带有旧式民族主义特征的新型民族主义运动。斗争的目标是要扩大非洲人的政治权力和改善经济状况。它构成了英属殖民地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最终由此走向独立的一个历史阶段,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主义政治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和1945年以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成长时期。

(二)此时期运动的宗旨及目的,仅局限于立宪改革,主要目标只是要建立代议制机构,保护非洲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增加他们在殖民地社会中的机会。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局限于城市或某一地区,基本没有形成群众广泛参加的政治团体和统一战线,也没有和农村群众的反抗殖民主义活动结合起来。

(三)运动采取的是非暴力的改良方式,即以抗议和请愿形式,

---

<sup>①</sup> 伊·基曼博·阿·特穆主编,《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76—279页。

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一些政策。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这些运动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殖民地体制范围内从事的政治活动。其斗争形式对战后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道路的特色有重大影响,这条道路特色是:以争取民族自治为目标,以实行宪制改革为主要手段,在群众政治经济斗争的压力基础上,迫使英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和平地获得本国独立(见第 18 章)。

## 第十二章 法属殖民地的政治 统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的演变

1894—1895年柏林会议后,欧洲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在19世纪剩下的15年时间内,基本上将非洲瓜分完毕。法国是行动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她在全球的殖民地版图虽然小于英国,但在非洲却捞到了最大份额,分布遍及北非、西非、东北非和东南岛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获得了对法属中非的委任统治权。“象奥地利皇帝查尔斯五世一样,法国在其领土上从未看到过日落”。<sup>①</sup>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地中海滨到热带丛林,从热带丛林到印度洋西岸的最大海岛,法国主要是通过军事征服手段和签订欺骗性的政治、经济协定,逐步实现了殖民征服。

带着1870年在欧洲遭到的耻辱,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找到了宣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的出路。与老奸巨滑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相比,法国的征服过程更多地充满了血与火。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早已成为囊中之物,它被视为法兰西帝国在地中海南岸的自然延伸;1911和1912年,法国分别宣布突尼斯和摩洛哥为自己的保护国。在西非,法国的殖民活动从沿海向内陆辐射。一是从几内亚湾的殖民据点向北推进,二是溯塞内加尔河向西苏丹腹地扩张。卡约尔王国、图库勒王国手持弓箭长矛的黑色勇士们

---

<sup>①</sup>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29.

抵挡不住后膛枪的射击，被誉为“非洲拿破仑”的乌阿苏鲁国王萨摩利历经 16 年的艰苦抗战，也终于成为法兰西军队的俘虏。1895 年，法国将塞内加尔、法属苏丹、法属几内亚、象牙海岸合并为法属西非联邦。1904、1908、1910 和 1920 年，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毛里塔尼亚也分别并入了法属西非。从大西洋岸到乍得湖畔，一块地跨 2000 多英里连成一片的殖民地出现在非洲地图上。法国殖民者的贪婪之手并没有限于西非，从加蓬海岸到非洲的心脏地带，法国又占据了 967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今天的加蓬、刚果人民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sup>①</sup> 在东非，法国人从英国和意大利人的夹缝中抢走了索马里的一块土地，在那儿建造了吉布提港。法国殖民者的前进步伐最后在马达加斯加停了下来，将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据为己有。

非洲不同的文化和自然障碍，打破了法国试图在殖民地创造的行政管理结构的一致，但这并没有改变法国的基本原则，即权力集中在巴黎，宗主国的利益凌驾于殖民地之上，以及将法国及其海外属地联为一体。阿尔及利亚由于被视为法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因而它由法国内政部管辖。突尼斯和摩洛哥由于是保护国，它们的事务由外交部处理。其他广大地区则交由殖民部统一掌握。到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最终在非洲各块属地确立了殖民统治制度。

由于非洲地域的辽阔和被征服地区原有的传统的政治结构、民族习俗、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影响，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策略也因时因地而异。具体说来，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策略主要有三种：直接统治、间接统治和有限自治（直接领地）。当然，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策略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程度

---

<sup>①</sup> James S. Olson,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欧洲帝国主义历史辞典》),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91, p. 228.

上而不是在性质上,只是在方式上而不是在本质上”。<sup>①</sup> 它们都为同一个共同的目的服务:尽可能地掠夺和压榨殖民地人民,以便为宗主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利益服务。

马克思指出,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法国虽有野心勃勃的殖民理想和极其强烈的贪欲,但其殖民掠夺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不得不受到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还受到复杂多样的非洲地理环境以及非洲人民的反抗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正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激烈碰撞的结果,形成了法国式的殖民掠夺体系。法国的掠夺方式大概可分为三种:一、通过大量移民来掠夺非洲当地人的土地。这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政府宣布将王室和教会拥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将敌对和反抗者的土地予以没收。在比较肥沃的北非土地上,鸠占鹊巢的欧洲人将获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而当地农民被掠夺一空,濒于破产的境地。二、在法属西非,殖民者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强迫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制,将农民推向市场。三、在赤道非洲,法国特许公司一度垄断了该地区所有的贸易,并投资于农、林、矿业。权力无限的几十家公司以租让的形式侵占了大片的土地并由当地人进行垦殖开拓。总而言之,无论用哪种方式,殖民掠夺都为法国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毫无疑问,法国的殖民统治使非洲人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却迟迟未能真正进入一个新世界。殖民统治虽然只是非洲悠久文明中的一段插曲,但它给非洲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持久而深远。

---

<sup>①</su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页。

## 第一节 法国的“治理圈”和 直接统治制度

### 一、对传统酋长的处理

法国在非洲设置的殖民地最多,而其中最大的连成一片的是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在这两块地方,法国人实行直接统治,其核心内容即摧毁旧的权力结构,建立一套新的殖民政治体制。一般说来,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主要区别体现在殖民当局实行的土著人政策上,特别是在对处于白人统治者和广大臣民之间、起着联系作用的本地酋长的态度和实际使用程度上。因为正如法国殖民行政官员罗贝尔·德拉维涅所认识到的那样:“任何殖民化都少不了土著人政策;任何土著人政策都少不了领土的控制;任何领土的控制都少不了在殖民政权同居民之间起着联系作用的本地酋长”。<sup>①</sup>而所有殖民统制框架中最关键的是地区或省一级的单位,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被称为 *cercle*,即“治理圈”。<sup>②</sup>

法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其最大部分的非洲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政策?当初,法国在疯狂地与其他欧洲列强抢占非洲土地的同时,并没有任何系统的殖民化的预先计划,<sup>③</sup>更没有成套的对非洲的殖民政策。<sup>④</sup>因为在不少地区,法国人“首先到达那儿只是为了防止别人进入”。<sup>⑤</sup>但随着大规模剧烈的军事征服的接近完成,殖民统治政策的制订必然提上议事日程。原来殖民地的一切事务都由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59页。

② 同上。

③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op. cit.*, vol. 2, p. 228.

④ *Ibid.*, vol. 1, 1969, p. 162.

⑤ *Ibid.*, vol. 2, p. 228.



海军部负责,1894年3月14日,法国正式创建了殖民部,<sup>①</sup>接管了殖民地除军事之外的一切事务。在此前后,1893—1894年,殖民学校开始向黑非洲输送了一批官员。这标志着法国在非洲向着正式的殖民统治过渡。1898年,法绍达问题的解决、尼日利亚边界的确定和对萨摩利征服战争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大规模领土扩张行动,此后军事征服逐步过渡到文官统治。在殖民统治的初期,法国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这是因为西非和赤道非洲幅员辽阔,而法国的扩张速度很快,法国一时难以派出足够的人员来管理占领的土地,如布拉柴在刚果地区,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依靠同地理协会的关系和报纸上的广告栏来招募工作人员。<sup>②</sup>在窘迫处境下,法国殖民者不得不与土著领袖们打交道,和他们签订保护条约,尽量依靠传统酋长来弥补其行政力量的不足。征服达荷美的阿尔弗雷德·道兹将军曾声称:“这个国家的习惯和制度将不会改变。那些立即表示服从并且身体健康的酋长将留任原职”。<sup>③</sup>只要那些土著领袖承认法国的宗主权,法国将保证其传统的政治制度、法律秩序、宗教习俗不受触动。但这仅仅是法国的权宜之计。几年之后,殖民统治稳定下来,法国便撕毁原来的条约,宣布所有的土地为法国所有,拆散并重新划分传统的行政区,废除原有的国家和部落组织,将部分酋长贬黜和流放。到20世纪初,除了在极少数内地区域如莫西、锡内、亚登加等仍采取间接统治外,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大部分地区都速立了直接统治。即便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那些国王或酋长与法国直接统治下的酋长一样,沦为殖民政府机构中的一名办事员。

---

① L. H. Cann and Pe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67.

② Ibid, p. 168.

③ D. 罗内恩:《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达荷美》,科内尔大学,1975年,第43页。转引自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

从形式上看,到1895年,法国直接统治的层次结构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西非,宗主国设立了一个大总督,初由驻蹕圣路易的塞内加尔总督兼任,有权管辖其他几个法属西非领地的总督。后来,在1902年,大总督府移驻达喀尔,大总督之职由专人担任,包括圣路易的塞内加尔总督和其他法属西非领地的总督一起受其节制。这样,与宗主国的权力框架搭连在一起,在法属西非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殖民统治体系。在金字塔的顶端自然是法国总统和殖民部长,其下便是西非大总督,代表母国在殖民地颁布法令,接着便是各领地的总督们,对属下法国官员和地方酋长的任免负有全权,第四层是各领地的省和郡两级法国行政人员,各自指挥一批土著官员,最下面的一层即法国殖民者委派任命的众多的土著官员,他们一般担任各领地的郡和村两级官员及地方酋长,成为殖民走卒。在1920年前,根据其业绩和服役期限,酋长们又被分成二十种不同的等级,20年代后分为十级。<sup>①</sup>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整个法属西非,共有118名法国行政长官,他们通过48 049个非洲人村长、32名省长或大区区长,以及2206个区长或部落首领组成的庞然大物,治理这片面积9倍于法国本土的地区。<sup>②</sup>法属赤道非洲的权力机构基本上与西非相似。

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直接统治的金字塔结构不曾发生过松动。但法国直接统治的策略,即对待传统酋长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法国直接统治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其明显的特点是不太稳定。<sup>③</sup>但总的来说,殖民政府对待传统酋长的基本态度是敌视和利用。法国对传统酋长的具体处理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

① Journal Officiel du Sénégal (《塞内加尔公报》),1921, p. 684.

②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③ 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

(一)直接的消灭、废黜或流放。这多发生在直接统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法国人一方面由于野蛮军事征服的惯性作用,滥用武力,因而对有些本可以作为谈判对象的首长们予以扫地出门;另一方面,法国人并未认识到非洲首长制的本质。他们只表面地看到首长们拥有众多妻室,甚至拥有奴隶,但他们并不明白酋长并没有多少特权,有些酋长与部落成员基本上是平等的。<sup>①</sup>因而,带着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思想冲动,一些早期殖民官员,如塞内加尔殖民地的创建者费德尔布总督,想当然地认为凡酋长均是一个压迫阶级,代表的是一股保守的反动势力,“酋长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放荡的盗贼”,<sup>②</sup>而法国人的征服实际上是将非洲农民们从不幸中解救出来。这些殖民者很少意识到酋长们即使已上升为压迫阶级,但在传统社会中也是个稳定的政治阶层,经过历史考验,总的来说已被人们所接受。清除结果:“在1900—1910年间,大部分本地统治者被消灭了,不管他们是以前的朋友还是敌人,有些还是法国殖民者扶植起来的”。<sup>③</sup>“他们胡乱地或任意地废黜酋长,然后将他们囚禁起来”。仅在尼日尔一地,从1911年到1920年,共有52名酋长被废黜。<sup>④</sup>特别是对一些权重的酋长,殖民者必欲除之而后快。以阿拉发·亚亚为典型事例,他曾协助法国人打败了富达贾隆的其他酋长,并获得了“拉贝国王”的称号。但在1905年,在一次与总督会谈后,他却被逮捕流放。5年后,为防止他重返故地制造麻烦,总督卡米耶·该巫告他秘密召集伊斯兰酋长们准备谋

---

① 冯建伟:《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9—33页。

② L. H. Gann and Per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6.

③ J. 叙雷—卡纳莱:《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热带非洲(1900—1940)》,伦敦,1971年,第73—74页。

④ F. 福格利斯塔德:《尼日尔史(1850—1960)》,剑桥,1983年,第85页。

反,再度将他流放,后来阿拉发·亚亚客死于毛里塔尼亚。<sup>①</sup>只是后来人头税的实施,才使殖民政府发现他们仍然必须依赖这些酋长。

(二)剥夺酋长对传统统治区的控制权,重新划分行政区。1904年殖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案宣称西非所有的空地和无主地均归法兰西国家所有,这无疑从根本上摧毁了酋长制的权力基础。随之进行的行政区的重新划分,则进一步缩小了酋长的权力范围。许多王国的首都被毁或被迁。1908—1912年,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殖民者对象牙海岸进行了重新划分。1913年后又出于经济考虑而再次划分。1926年,赤道非洲有36个区,138个分区,随后又改为49个区,后来又从经济角度减为20个省,但很快又因行政管理上的困难而改为30个区。<sup>②</sup>

这种行政区的划分根其武断,只是从统治者的目的出发,完全不考虑非洲人的利益。例如1907年达荷美的一个分区尼基就被划分成25个县。法国人实际上是试图将本国的省县制度照搬到非洲,以便于统治。例如锡内就被划成隶属清晰的省和县。殖民者向省、区或分区派有驻扎官,县和村一般由政府委派的非洲人担任酋长。这些酋长实际上是些领取薪金的官僚,正如他们在法国农村中的同事,只不过没有议会监督而已。

(三)重新任命酋长。在消灭、流放或废黜了原有酋长后,殖民政府任命了一批不同级别的大小酋长,但他们的地位和职能与传统酋长相比已完全不同。第一,他们不再是按传统习惯继承或选举而来,而是由驻扎官推荐,副总督任命,因而他们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神圣性。作为政府的办事员,“作为外来命

---

① J.叙雷—卡纳莱:《富达贾隆的酋长制》,载M.克劳德和O.伊金米:《西非酋长制》,伊费大学,1970年,第85—88页。

② J.叙雷—卡纳莱:《法国殖民主义》,第311页。

令的传声筒”，<sup>①</sup> 他们的权力只能靠政府的武力来维持。这样，他们也不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殖民政府负责。他们甚至被迫违反某些传统的禁忌，以适应法国的行为模式，如参加攻占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仪式，以表明自己对殖民政府的忠诚。尽管他们极尽全力讨好殖民当局，但非本地的酋长往往不被本地人接受。有些法国官员不明白为何一个酋长在自己本地干得很好，而在另一个地方则招致不断的抱怨甚至对抗。第二，传统的酋长是自己的主人，拥有自己的财富，包括奴隶、武士（往往超过 500 人）、实物税、关卡礼物等，如今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权力在原则上都被废除了，新任命的酋长们不再具有独立的政治权力，而仅仅是负责收税、征兵或招募劳工等工作。因而在人民眼里，大部分被任命的酋长不再是他们的代表和保护人，而变成了仇敌和法国人的帮凶。税收改变了酋长和殖民政府的关系。以前赋税交给非洲国家，现在它交给法国，成为臣服于外国主权的最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税收既迫使法国更多地依赖传统势力和传统方法，因而加强了酋长，同时又使殖民政府获得资金以向其所宣布的官僚化和控制酋长的目标方向发展。但归根到底，通过加强酋长，法国人也为酋长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因为税收加强了殖民政府，而大大削弱了酋长的权威和力量。随着资金的增加，治理圈内监督酋长的人员的数量稳步而快速地增长。1892 年诺依洛特只有 1 名办事员和翻译，1897 年共有 14 名，1902 年增加到 29 名。<sup>②</sup> 征税、征兵和征工实际上就是酋长的主要任务。欧洲一位历史学者曾到锡内—萨鲁姆实地考察，当他问到几个退休县级酋长的工作主要由什么组成时，所有人都提到首先是税收和征兵（I.T.）。后

①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659 页。

② Gann and Pe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60》），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7.

来他又到英属冈比亚向两个酋长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则首先提到他们的司法责任。因此他评论说,法国人更多地把酋长看作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人員,而英国人则将之视为一个法官。大部分酋长忠实地执行了税收这项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为此他们往往不得不借助暴力,这时殖民政府则往往躲在一边。塞内加尔总督曾作出指示:“让国王进行任何他认为是必要的镇压……但你不能陪伴这位国王到迪奥希内,当他到那儿惩罚他的臣民时。”<sup>①</sup>只有很少的酋长才会斗胆辞职而不愿冒着敌对自己人民的风险。

(四)加强对酋长子女们的“培训”,以满足统治需要。第一代殖民官员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的地位实际上很脆弱。在治理圈内,他没有军队,他不懂当地语言,对所指挥的社会只有有限的了解,因此他至少需要一名翻译和办事员,出于必要,他只好通过传统酋长来开展工作。第二代殖民官员就不用事必躬亲了,甚至也不必比其前辈拥有更多的非洲知识。他们不是从马鞍上看当地社会,而是从办公桌后面,因为他有许多会说法语的走卒。从长远着眼,法国人早就注意对一些主要的酋长们软硬兼施,要他们把孩子送到法国学校接受培训。这样做既可以人质方式迫使老酋长们屈从,又可使将来的酋长们成为法国殖民者的得力助手。这些年轻人更容易理解法国人的旨意,他们多肄业于在圣路易专为酋长之子和译员设立的贵胄学校,毕业后便被安置于次要的官僚位置,作为办事员或专职译员。军队也是培养驯服的统治力量的学校,在法国军队服役常常成为酋长之子们的学徒期。著名的塞内加尔步兵就是这样培训出来的。

通过牢牢控制住酋长,法国的直接统治在西非达到了顶峰。西非总督若斯特旺·沃朗奥旺在1917年写道:酋长并无自己的权力,因为在一个“治理圈”内不可能有两个掌握实权的人,只能有一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3, p. 56

个！只有治理圈的长官统帅一切，只有他才是真正负责的。土著人酋长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辅助物。<sup>①</sup>这位总督注意到，“土著人酋长，无论是我们精心保留下来的昨天的酋长，还是我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今天的酋长，都抱怨蒙受了耻辱。行政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译员，即多种辅助人员，也抱怨自己只是工具，并没有得到作为合作者应有的地位。这些收入菲薄、境遇十分悲惨的精英，由于被赶出了自己土生土长的社会，同时又不被欧洲社会所接纳，在两方面都遭到冷遇。所有这些都充满着失望、不满和痛苦的情绪，事实将会证明，不注意到这种情况是危险的”。<sup>②</sup>

## 二、法国统治策略的微调

法国人注意到这种危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 20 年代起，一些殖民官员逐步认识到殖民统治的效力取决于殖民当局与非洲传统权力的契合。于是一部分人开始检讨以往政策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这一方面是由于过于僵硬的直接统治在许多地区的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非洲人包括一小部分酋长进行了强韧的抵制，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有关委任统治地的民族应逐渐自决或自治的思想传入西非，以及一批人类学家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成果开始受到重视，使殖民者更多地了解到非洲当地的实际情况，这一切终于酿成了部分法属殖民地统治策略的变化。1921 年法属赤道非洲大总督墨林认为：“在西非及其他地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全部摧毁了土著社会结构而不是改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7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年，第 262 页。又见 L. H. Gann and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60》），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73.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7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年，第 459 页。

进它以便为我们的统治服务。”<sup>①</sup>从1920年起,法属西非的政府议事会已开始包括地方酋长,一个殖民地一个名额,1925年增至二名。同年,行政议事会开始吸收一些非洲人参加,而贵族议事会的设立则是为非洲人提供参议机会的另一措施。<sup>②</sup>1929年的一项部颁公告说:“一项政策的基础倾向于允许在我们控制下的集团根据他们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演化。”<sup>③</sup>

必须指出,这些变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实际上,法国的土著政策仍一直在摇摆中寻求平衡。罗贝尔·德拉维盖特在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对非洲的酋长政策时写道:“我们陷入了某种必需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强烈地感到,让县级酋长(Chef de Canton)权威的传统特征保持不变,充分利用其固有的封建精神,这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受同样的殖民化力量的驱使,我们又要让它们屈从于我们的管理精神。”<sup>④</sup>

虽然土著上层的政治待遇有了些微改变,而一般民众的境况并不见多少好转。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在法国殖民者的眼里,土著居民“是个增长过大的孩子,闲逛而捣乱,他们需要被征服和用法纪束缚。”<sup>⑤</sup>既然原有的酋长被消灭、流放或废黜,新任命的酋长往往成为殖民者的附庸,这些法国的非洲子民便失去了任何保护,毫无人权可言。治理圈内的法国长官被授予了绝对的权力,负责治理圈内的一切事情;行政、警察、司法、税收、筑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法国的代表,他高居非洲人之上,他把“他的”区搞成什

---

①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卡斯公司, 1965年, 第1卷, 第998页。

② D. 罗内恩:《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达荷美》, 科内尔大学, 1975年, 第43页。转引自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 《西亚非洲》, 1991年第1期。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2, p. 237.

④ *Ibid.*, vol. 3, p. 49.

⑤ *Ibid.*, vol. 1, p. 172.



么样子主要取决于他的良心,他的兴趣,他对该地区 and 人民的知识以及他的实际行为。事实上他倾向于把辖区变成一种个人采邑或封建领地,由此产生的拥有感和狂妄感通常以某种目空一切的语调表达出来:“我的治理圈”,“我的土著人”,“我的路”,等等。他把自己等同于他脚下的土地,大总督只能松弛地控制他,因为大总督需要依赖他们进行统治,大总督本人只是在罕见和匆匆的巡视中才露面。虽然存在着一种轮转任命的体制,但六个月休假之后,这些“丛林之王”往往又回到他原来的治理圈。这种体制本身便会产生专断、滥用权力和虐待现象。<sup>①</sup>除了殖民政权控制下的土著法院可以根据伊斯兰法律或土著法审理一般土著诉讼案外,法国殖民当局根据 1887 年的总统法令,在治理圈内实行速决裁判制,即不经过法院审批就可逮捕非洲人,随意处以各种监禁和罚金。<sup>②</sup>《土著人法》原来于 19 世纪 70 年代首先使用于阿尔及利亚,80 年代又被引入法属西非。1924 年的一项法令授权法国官员对“违法”行为,从不按时纳税到对法国殖民官员“怠慢无礼”,均可给予严厉处罚,最高为 15 天监禁。<sup>③</sup>1903 年发生在刚果的几例丑闻将这种虐待行为推到了极致:士兵未经审判就射杀二名逃跑的非洲人;让一名被控偷了子弹的非洲人淹死;让一名“男孩”喝下骷髅汤;以及用炸药将一囚犯炸死,作为庆祝攻占巴士底狱节日的方式。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例,直到 20 年代末仍时有发生。<sup>④</sup>

总的来看,法国的殖民统治策略与英国的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这种差异对各自殖民地的变革进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

---

①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1, p. 174.

②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第 777 页。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七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 第 265 页。

④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1, p. 174.

行政管理方面是强调“一致性”还是强调“区别性”，是强调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这在后来非殖民化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后来最激烈的变革为何发生在法属殖民地，这同法国殖民者长期坚持的殖民统治策略不无关系。

## 第二节 “联合”政策的演变：突尼斯、摩洛哥保护国制

### 一、突尼斯的保护国制

法国殖民者在大部分非洲属地实行直接统治的同时，还在部分地区宣扬和实施“联合”政策。实际上这是法国式的“间接统治”方式。“联合”的办法最初试用于印度支那，后来推广到非洲。法国殖民主义理论家解释说：“联合就是间接治理，就是保存经过改良的被征服人民的机构体制的治理方法，并尊重他们的历史。”然而作为一种殖民实践，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和保护国制度分不开的，直到1923年殖民部长萨罗《开发法属殖民地》一书发表，它才在黑非洲产生一点影响。

与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高压政策相比，法国在马格里布的另外两块殖民地实行迥然不同的殖民政策，尽管它们在实质上并无区别。在军事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法国人即在觊觎它的两个邻国突尼斯和摩洛哥。在19世纪80年代前，法国所以未能侵占这两个北非国家，只是因为受到其他殖民列强的反对。谁都想在“奥斯曼帝国的樱桃上咬一口”，法国在突尼斯尤其遇到意大利人的强有力竞争；而在摩洛哥，法国更遇到自15世纪上半叶以来即对该国不断渗透的西班牙人的反对，以致于最后不得不让西班牙人“分得一杯羹”，并把丹吉尔市及其周围地区划归“国际共管”。

法国对突尼斯的控制先是从经济上着手，即通过贷款逐步控

制贝伊(Bey)政府的财政。1863和1865年,突尼斯在两次接受法国的贷款后,宣告财政破产。1869年,法国和欧洲银行巨头们成立了“国际债务整理委员会”,对突尼斯进行财政监督。在突尼斯1.25亿金法郎的外债总额中,有1亿是属于法国人的。法国资本还获得了在突尼斯修建铁路、开发矿产、经营电讯、建立造船厂和兵工厂等特权。

在经济渗透得手后,法国又在外交上为吞并突尼斯做好准备。1878年,在俾斯麦主持召开的解决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法国获得了德国默许,同时以同意英国占领塞浦路斯为筹码,换取了英国及其他国家承认法国在突尼斯有行动的“自由”。

1881年4月24日,法国借口突尼斯边境的克鲁米尔部落袭击了阿尔及利亚领土,派遣24000人从阿尔及利亚进入突尼斯,4月30日,从土伦出发的800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比塞大港登陆。5月12日,在法国将军布列阿尔的威逼下,突尼斯贝伊在巴尔杜宫签署了“保护条约”。条约规定法国有权在国际上代表突尼斯的“利益”,在国内则有权维持突尼斯的“秩序”。1883年6月8日,法国又迫使贝伊在拉马尔萨签订协定,以剥夺突尼斯在内政方面的自主权。

形式上,侯赛因王朝的贝伊及其政权被保存下来了,贝伊仍是国家元首,通过首相和大臣组成的内阁的辅佐治理整个国家。地方政权结构也基本上未受触动,全国分为若干个州,由卡伊德(Caid)统辖,负责征收赋税,并有自己的法庭和宪兵部队,州以下设区,由谢赫管理。

在这种“间接统治”制度下,各种立法和行政命令都以贝伊名义颁布。但立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贝伊的法令只有经总督签署后方能生效,贝伊的作用只是在法国人的决议上签字盖章,而不参与决策。保护国建立初期,突尼斯内阁只有三名本国人担任的部长,负责有关伊斯兰教的财产、教育、审判和王

室等事宜。法国总督身兼外交大臣和武装部队司令,其下设立六个总署:财政、公务、经济、邮电、公安和文教。在地方事务方面,根据1884年10月4日的法兰西总统法令,法国派驻“民政督察”统治着突尼斯北方19个专区,每区最多包括4个卡伊德辖区。在南方,由于各部落不易驯服,法国人实行军事管制。在各大城市,1887年设立了市政府,市长由突尼斯人担任,副市长由法国人担任,还设有参议会,由贝伊任命的法国人和本地人混合组成。在整个市政府官员中,法国人总是占多数。1907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市民的压力下,准许突尼斯人参加由欧洲移民代表组成的咨询会议。1922年,法国总督吕西安在巴黎的同意下,将咨询会议改为大议会,在地方上设立区议会和州议会。大议会的决议须经法国外交部长的批准才能生效。<sup>①</sup>1936年,在人民阵线执政后,在突尼斯废除了限制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法律,1937年,突尼斯矿工争得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1945年,经过长期顽强斗争,突尼斯市获得了民选市政府的权利,这大概可视为间接统治的顶峰。

总的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对突尼斯的统治相对稳定。1942年11月德军占领突尼斯后,一度成立了以穆罕默德·谢尼克为首的新政府,宣布取消法国的保护制度,对内进行政治改革,对外奉行中立政策。但1943年5月英美联军进入突尼斯,谢尼克政府被解散,法国的保护制度卷土重来。

## 二、总督对摩洛哥素丹的控制

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相对较晚,但情形与突尼斯大体相似,只是由于摩洛哥境内的穆斯林和柏柏尔人更不易驯服,法国的保护制度一直不稳固,在利奥泰元帅进行了13年的绥靖后才初见成

---

<sup>①</sup> M. Camill, *Représentatif des Possessions Africaines* (《非洲属地的代议制》), Bordeaux, 1929, p.31.

效。根据 1912 年 3 月 30 日在非斯签订的保护制条约的规定，“该制度将维护素丹在宗教上的地位，他的尊严和威信，保护穆斯林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素丹自签约之日起允许法国政府为了维持秩序和贸易安全的需要，在通知马赫曾 (Maghzen, 即摩洛哥政府) 之后，可对摩领土实行军事占领，并允许法国人在摩洛哥陆上和水上进行任何警察活动。法国向摩洛哥派驻一位总督，代表法国政府发号施令，素丹只负责签署并公布总督提出的敕令或法案。素丹在“未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同意之前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条约”，“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借贷任何国债或私债，不得以任何形式出让任何权益”。

在保护国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法国人尽管在地方事务，尤其是宗教和司法事务上保留了当地人的大部分权力，1930 年甚至颁布“柏柏尔人法敕令”，将柏柏尔部落的刑事审判权由穆斯林法官转到柏柏尔酋长手里，并设立“习惯法法院”以受理民事诉讼（这一敕令实际起到了在摩洛哥制造分裂的效果），但在中央级别机构上，法国人不断对权力机构进行改组，旨在加强对素丹的控制。到 1937 年，法籍官员人数已达到 18 000 人之多，57% 的预算用来支付他们的薪金。在总督诺盖将军任期内，专门创立了一个“保护国总管”的职位，作为总督的耳目，同时负责协调各机关的行政工作。1940 年法国沦陷后，殖民地由维希政府控制，摩洛哥表面上虽然风平浪静，实际上却在经受战争的磨难。1942 年盟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摩洛哥素丹主动加强同美国的联系，试图摆脱法国势力的影响。到战争结束时，在摩洛哥举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呼声面前，法国的保护国制度已经摇摇欲坠了。

在马达加斯加，法国人本来也想在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上建立保护国制度，因为他们为此目标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努力，但由于该岛与非洲大陆相比，在许多方面迥然相异，法国最终还是直接占领了这个岛国。

### 第三节 法属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变化

#### 一、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经济活动

无论在政治上实行直接或间接统治,对法国人来说,殖民地一直是国家垄断的“母国经济和社会的延伸部分”。<sup>①</sup>殖民者在实现征服和确立统治后,通过种种手段,逐步把非洲属地引上殖民地经济的轨道。根据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转变土地制度。对当地人土地的大肆掠夺,这主要发生在北非。通过鼓励白人移民,法国殖民者抢占了大片的土地。1870年普法战争后,拉维热里红衣大主教在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基督教徒布道时怂恿道:“阿尔及利亚和法属非洲向你们敞开大门,伸出双臂欢迎你们。你们在那里能够为自己、孩子和家庭找到比你们在(德国)侵略者和失去的土地上更加广阔、更加肥沃的土地。”<sup>②</sup>在“官方殖民化”政策的刺激下非洲殖民地上的白人移民庄园一批批地建立起来,从土著居民手中夺得的土地,由当局划块分给欧洲移民(其中除法国人外,意大利人最多),并为这些移民的定居、建业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如贷款、提供工具、住宅等。政府出钱为他们营造殖民中心。商店、学校、医院等也随之建立起来。(详见第7章)

在突尼斯,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从1881年保护国的建立就开始了,只是顺序与阿尔及利亚不同,先是私人大资本公司,如巴蒂诺莱公司、马赛信贷公司、突尼斯土地公司等,控制了近43万公顷

<sup>①</sup>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9页。

的土地,接着才是“官方殖民”,以增加在突尼斯的法国人口,为此拨出了相当数目的专款。1898年11月3日的贝伊法令要求信奉宗教的基金会每年向国家交纳不少于2000公顷的土地,1903年7月22日的贝伊法令则把山区划归国有。1931年,在突尼斯的欧洲移民庄园占地达70万公顷左右,座落在该国土肥水足的地区,其中80%的法国移民庄园面积超过500公顷。<sup>①</sup>

在摩洛哥,这种殖民化要比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晚,但速度进展很快。从1922年到1932年,欧洲私人移民占据了35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而仅在1932年一年,官方殖民就剥夺了当地人20.2万公顷的土地。这些土地绝大部分归法国人所有,其余的由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移民耕种。

法国努力在每块北非殖民地创造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移民团体,以使该地与宗主国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但法国移民再多,也改变不了当地大部分居民为穆斯林的事实。不过由于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场生产,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非的经济性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葡萄酒、谷类和橄榄油(在突尼斯)成为三国的主要产品,但不是在本地消费,完全是为欧洲市场生产的。

在法属西非,土著土地制度的演变也是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当初,殖民当局也曾试图直接掠夺土地,但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因为在传统上西非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只有酋长才有定期分配权。这种根深蒂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令殖民当局很难打破。于是不得不先从“无主土地”入手,屡次宣布无主地属于国家。1887年,殖民政府在塞内加尔首次宣布土地为殖民地财产,可以出租给欧洲人。1900年,法国总统再次敕令法兰西国家是一切未经占用土地的所有者。1904年,法属西非殖民当

---

<sup>①</sup> UNESCO:《非洲通史》第7卷,第343页。

局把全部土地分为不可出租的公地和可以出租的私产两类,1906年颁布《土地注册法》,规定土著居民可以通过登记领取地契,三个月后如无争执,土地便归耕者所有。<sup>①</sup>但依法申请的非洲人并不多,到1915年为止,殖民政府仅发出地契1267件,仅涉及12000公顷土地。<sup>②</sup>1925和1935年,殖民政府的法令再次肯定了国家对“空地”的所有权,并简化了注册程序和费用,但仍没有多少人去登记,因为在非洲人看来,这些“法令”令人沮丧,它等于将非洲人的财产置于法国人的民法约束之下,实际上是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全部西非,只有约29000公顷土地被注册归1742位非洲人所有。<sup>③</sup>因此,在西非几乎没有很大的白人种植园存在,小的种植园也不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在西非占据的土地只有约75000公顷,主要在象牙海岸和几内亚。<sup>④</sup>这种状况与欧洲人在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占有大量土地和种植园,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法国人未能在西非直接掠夺大片土地,还由于西非的气候和历史条件与北非不同。西非炎热潮湿的气候令欧洲白人畏葸不前,19世纪早期在塞内加尔种植园农业的失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主要依靠当地小农从事农业。再者,西非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已同西方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贸易,先前是奴隶,后过渡到棕榈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转为经济作物,因而在这一带商品货币关系比较发达。法国人不用占据大片土地开办种植园,仅靠征税和不等价交换即可从当地居民身上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

虽然法国在西非未能直接掠夺大片土地,但土地制度仍在悄

---

① 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8页。

②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Harvard, 1928, vol. 1 p. 131。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140.

④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60》), vol. 1, p. 140.



然发生变化。经济作物的大片种植和人口的增长迫使土著居民作出反应,并使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村社制下,农民虽有土地使用权,但由于时间有限和土地的变换,从而消除了任何改良土壤或生产超出自己直接需要的物品的动因。动物饲养业同农业中的牵引力方式和施肥没有任何联系。自然和人工的肥料的使用很少。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了小农对土地价值的认识,维系土地公有关系基础的休耕制和定期分配制不得不缩短或改变,小农需要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并最终演化为所有权。事实上,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出租、转让和买卖的现象日渐增多,侵占公地和开辟荒地据为己有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私有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农村出现了富农、自耕农、分成制佃农、雇农和长短工。商品经济的洪流最终冲垮了部分地区的村社的根基。

在法属赤道非洲,1899年法国也宣布了对“空地和无主地”的所有权。但在这里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1899年,赤道非洲被40余家公司所瓜分,面积达整个地区的70%。最大的公司租界有1.4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也有1200平方公里。<sup>①</sup>在租让公司的高峰时期,它们共拥有7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有35000平方公里。<sup>②</sup>

## 第二,推广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制。

法国殖民者在热带非洲虽然未能建立起大规模种植园经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热带非洲变成自己的农业原料产地。当初他们主要是掠夺当地人采集的野生资源,如天然橡胶、油棕等,但随着东南亚橡胶的竞争和价格的下跌,法国转而以一系列的经济或超经济的手段诱导农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最初,殖民当局吸收

---

①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128页。

②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60》), vol. 4, p. 140.

了 19 世纪中叶在塞内加尔推广种植花生的经验教训,为了推广种植市场所需的经济作物,往往采用各种扶持和鼓励措施,如建立试验站,提供优良品种和苗木,指导栽培技术,实行优惠贷款和提高收购价格等。再往后,随着种植面积的大规模扩大,种植经济作物却越来越带有强制性,经常采用行政手段。地区长官们在开播之际,将酋长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讲这种或那种庄稼的优点,然后命令他们去种植。酋长们便分配种籽,命令卫兵监督执行。官员们经常更换,种植的作物也随之面变,消极作用不小。只是后来才形成惯例,固定种植某种作物。<sup>①</sup>如从 1908 年起,象牙海岸农民就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可可树,否则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还有一种方法迫使农民为殖民者工作,即以实物或货币征收直接税。1891 年的一项法令在塞内加尔确立了一项人头税制度和地区财政预算制度,<sup>②</sup>起初税额不定,后来法属西非殖民当局确定为 1—3 法郎。<sup>③</sup>如在象牙海岸,1901 年 5 月 4 日的一项法令宣布“向每个当地居民,男人、女人和年满 10 岁或 10 岁以下的孩子征收的贡物”每年 2.5 法郎。<sup>④</sup>在赤道非洲,让迪勒总督于 1903 年 3 月 19 日向其部属发布了臭名昭著的通告:“我对你们并不隐瞒,我对你们表现如何的看法将主要依据你们征收有关土著税(每人 3 法郎)的结果,这应是你们永远注意的目标。”(1905 年提高到 5 法郎,1908 年停止。)<sup>⑤</sup>实物税包括橡胶、象牙、黄金或任何其他可以折价的产品。从 1890 年起,野生橡胶就是非洲人偿付税款和进口商品的主要手段。在殖民初期,非洲人挣来的几乎所有的金钱都不得不用

---

①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p. 184.

② Ibid, vol. 3, p. 56.

③ 苏波勒丁:《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1880—190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99页。

④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3, p. 171.

⑤ Ibid.

来交税。在税款以实物征收的地方,纳税者的处境更惨,因为殖民者甚至拿走了他备为已用的货物。结果形成一种循环:昔日习惯物物交换、只为自己生产的非洲小农,现在不得不为获得足够多的货币以交清税款而种植或扩大种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经济作物。在法属热带非洲广大地区,殖民当局仍然长期使用超经济手段来推行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到20世纪初,西非各地已初步形成以种植和出口单一经济作物为特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在法属西非总面积二十分之一的地区,生产了黑非洲80%—90%的出口作物。<sup>①</sup>这说明真正卷入商品经济的法属殖民地的面积仍是十分有限的。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在法属热带非洲完成的程度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无论如何,商品经济的影响是在逐渐地扩大,尽管速度比一般所认为的要慢。乍得、乌班吉—沙里河地区和喀麦隆主要种植和出口棉花;几内亚主要种植和出口香蕉;达荷美主要出口油棕产品;象牙海岸主要种植和出口可可、咖啡和木材;加蓬则主要出口奥库梅木(Okoumé);<sup>②</sup>花生的种植由塞内加尔沿着铁路线向内地延伸,产量从1897年的5 000公吨上升到1920年的30 000公吨。<sup>③</sup>

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制也并非完全由法国殖民者强迫开始,殖民者所做的只是推广和扩大了它的种植面积,并使之与世界市场更紧密地联为一体。粮食作物的种植减少了许多,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如塞内加尔每年就从印度支那输入1 500—2 000吨大米。殖民地人民对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制充满怨恨,但又不得被迫这么做。

---

①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142.

② Ibid, p. 142.

③ Ibid, vol. 1, p. 183.

### 第三, 贸易垄断制。

巴兹尔·戴维逊指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殖民制度在贸易领域的主要特征就是将非洲人在大陆上的贸易垄断权转到欧洲人手中。因此, 某种非洲资本主义的因素虽在 19 世纪 80 年代前即已出现, 但进一步取得重大进展却至少被推迟了 75 年。<sup>①</sup> 显然, 这是以扼杀非洲商业资本为代价的。

在北非, 马格里布的商贾们在古代长途贸易中曾领先于世界, 然而现在他们却遇到了地中海北岸的敌手: 在阿尔及利亚, 他们输给了法国定居移民, 在突尼斯, 他们竞争不过一群外来的包括意大利的企业主, 在摩洛哥则抵挡不住入侵的法国金融和矿业集团的攻势。

在西非, 由于殖民者未能圈占大片土地, 出口的经济作物主要是由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耕种。正是由于西非海岸已有三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历史, 资本家只要垄断收购权, 就可以将这块地方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这样, 通过控制流通领域, 法国贸易公司操纵了殖民地经济。1887 年法属西非公司宣告成立, 其资产达 3 000 万法郎。1906 年成立了西非商业公司, 1913 年又组成了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尼日尔公司。这便是法属西非三大公司。这样一来, 巨大的资本集中就具备了消灭当地贸易团体的条件。1900 年, 法国最早占领的塞内加尔存在着 500 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团体, 300 来个主要由当地法国人组成的贸易商行。萨米尔·阿明指出, 此前法国的政策一直允许当地商业资产阶级发展, 认为这是法兰西民族在这一部分的“自然发展趋势”。但到世纪之交, 新帝国主义已经出现, 法国的政策便来了个大转弯。非洲刚刚出现的中产阶级被宗主国的中产阶级取而代之, 其代表就是“三大公司”。这些专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就象吸附在人体上的巨大水蛭一样,

---

<sup>①</sup>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 第 133 页。

汲取着西非人民创造的财富。正如后来《世界报》所评论的那样：“非洲的各大公司是在相当于奴隶制经济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们输出一切可以购买得到的东西，输入一切在当地可以出售的东西，一切随他们心之所欲。如果不计算办事处的设备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它们在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开支。”<sup>①</sup>

大贸易公司对组织生产不感兴趣，一般不直接与非洲小农打交道，而是通过当地的非洲人（如迪尤拉人）或利凡特（叙利亚、黎巴嫩）人作中间商，将收购到的经济作物汇集到沿海商站集中输出。非洲人生产他们自己不消费的东西，消费他们自己不生产的东西，他们成了最大的出口商品生产者，但价格却是由法国人根据世界市场规定的，后者“冒着可能毁掉贸易的危险尽可能地压低价格”。<sup>②</sup>例如在 19 世纪末，在欧洲，棕榈油每吨售价为 520 法郎，在达荷美的收购价却只有 240 法郎。而在印度支那以每吨 160 法郎收购的大米在这儿却以 350 法郎出售。法国资本家在新的条件下，继续遵循着 17 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有意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经济循环。依靠这种“贩运经济”（*économie de traite*），资本家从西非攫取了超额利润，每年获纯利达 230 亿法郎。<sup>③</sup>

在赤道非洲，“这片黑非洲最黑暗的土地上”，<sup>④</sup>则实行着殖民史上最黑暗的掠夺制度——租让公司的统治。赤道非洲是法属殖民地中的“穷亲戚”，这片 967 000 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虽然结成了一个联邦，但“更像一座临时拼凑起来的不平衡的大厦”，<sup>⑤</sup>覆盖

① Le Monde, Paris, 1951. 9. 1.

②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p. 185.

③ 格·叶·斯科罗夫：《法帝国主义在西非》，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第 34 页。

④ Stewart C. Eas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Colonialism（《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衰》），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5, p. 76.

⑤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p. 228.

着森林、沼泽、沙漠等地理区域，各族发展程度不一，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从原始的氏族制到过渡中的封建制同时并存。经济活动仍以锄耕的粗放农业和采猎为主。法国人获得了这片殖民地，却完全不知所措。法国传媒议论纷纷：很难看出这个“殖民地的灰姑娘”怎样才能获得一份嫁妆。<sup>①</sup>最后，法国政府于1899年将赤道非洲70%的领土交由42家公司瓜分，租期30年，最大的公司租地有1.4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也有1200平方公里。这些公司相当于重商主义时期的特许公司，在租界内被授予广泛的财产所有权和活动自由，在某些方面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利。作为回报，这些公司每年要将500—500000法郎的地租和15%的利润交给国家。实际上，“公司除了从事商业，其他什么也没有做”。<sup>②</sup>1920年，赤道非洲的贸易总额估计只有146000000法郎，而西非为12亿，印度支那为22亿。收益这么少并不主要是由于资源贫乏，而是其经济开拓制度。租让公司严重地阻碍它们自身的贸易活动。它们自认为是产品的业主，为收购和运送产品只付给生产者微不足道的价钱。它们喜欢以实物偿付产品，甚至只在自己的店铺里私下使用货币。如用1公斤盐（在法国成本价为25生丁，运到乌班吉为1.25法郎）交换5法郎的商品，商站的头头根据距离，又加价40%—60%，此外还要加价25%作为私利，而商贩自然要从中扣除自己的一份。因此，1公斤橡胶只能交换1公斤盐或2根针就不足为奇了。<sup>③</sup>这种贸易垄断制极其残酷无情，只求眼前利益，毫不考虑长远后果。法属赤道非洲“永远是个流产的试验场”，<sup>④</sup>42家公司组成的采集企业，完全毫无规章，胡作非为，因榨取本地非

---

①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p. 228.

② Ibid, vol. 1, p. 189.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1, pp. 190 - 191.

④ Ibid, p. 193

洲人而臭名昭著。<sup>①</sup>到 1930 年,租让公司只剩下了 30 家。大部分租让公司期满后没有再续约。巴兹尔·戴维逊评论说,法国在赤道非洲的特许公司的活动“和赤裸裸的海盗抢劫相差无几”。<sup>②</sup>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非洲殖民统治确立以后,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典型的联系已不再是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殖民统治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它对非洲商人的冲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和阿拉伯商人阶级相对重要性的下降已是既成事实。<sup>③</sup>

#### 第四,控制财政,挤垮非洲工矿业。

在法国殖民者的眼里,殖民地应该达到在财政上自治和自给自足。这一原则确立于 1900 年 4 月 13 日的法律。<sup>④</sup>要增加殖民地财政收入,除了动荡不定的外贸盈余外,主要靠间接税和关税,个别殖民地还依靠直接税来用作自己的政府开支。最基本的直接税是人头税,交纳者为 14 岁(法属西非)或 18 岁(赤道非洲)的非洲人。<sup>⑤</sup>人头税率也有变化,不仅年度不同,在不同的殖民地和不同的人口种类之间也有差别。但由于法属热带非洲实在太贫穷尽管极力榨取,人头税的数额颇有限度。总的来看,直接税在各个殖民地预算中的所占比例大大少于间接税在联邦预算中的所占比例。

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用作官僚的薪水,几乎半数的开支用于不到人口 1% 的各级官僚身上。实际上这是用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豢养众多的法国官僚家庭,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掠夺方式。二是用作平衡各块殖民地的预算。大总督每年将联邦税收的剩余部分拨给有预算赤字的殖民地,这种做法被委

---

①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p. 229.

② 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80 页。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1970, p. 402.

④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4, p. 133.

⑤ Ibid, p. 135.

婉地称为“联邦团结”，它不仅使各殖民地更依附于西非和赤道非洲联邦政府，而且在海岸人民中引起不满，因为他们的出口收入不是被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被用来补助贫困的内地。三是部分地直接用于军事设施和港口建设，以及尼日尔河灌溉工程。

## 二、对殖民地工业的严酷扼制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母国政府才开始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的国家干预，为殖民地提供财政援助。然而长期以来，殖民政府的大部分努力不是去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使农村超越生存经济的水平，更不是为在殖民地兴办近代企业，而是致力于商业部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商品匮乏，殖民地进口减少，这才给了当地工业发展一个契机。但唯一存在的工业只是加工当地农产品的企业，特别是榨油、轧棉和加工木材。即使如此，初级的原料加工作坊或工厂的兴建，许多还要归因于战时船运的紧张。但到 1920 年，法国制造品再次泛滥非洲市场，战时工业要么消失，要么产量剧减。幸存的西非企业主要是塞内加尔的油厂和象牙海岸的一家纺织厂，它们都用当地的原料为内地市场生产。在法属赤道非洲支撑下来的仅是几家制革厂和肥皂厂，而且只有初步的机器生产。战后大批廉价的欧洲日用品涌入西非和赤道非洲市场，给原有的手工业以致命打击，如昔日著名的塞内加尔土布便日趋衰落。二次大战以来，西非和赤道非洲各国被法国人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矿产原料产地。欧洲租让企业挤垮了非洲人惨淡经营的采金业。矿物开采权掌握在欧洲公司手中，土著居民往往被迫成为白人矿场的契约劳工。与比利时人不同，法国人只是把矿产原料运出非洲，并不打算在当地发展冶金工业、金属加工业和化学工业，尽管法属非洲具备建立和发展这些部门的有利条件，因为法国资本家担心这样做就会削弱殖民地对宗主国经济上的依赖。让殖民地获得独立发展自己经济的可能性，是不符合法国资本家利益的。罗



伯干的话很有代表性：“人们早就谈论什么法国海外属地工业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有那么大一部分棉织品、机器装备、金属制品和汽车输往殖民地，那么难道不应该认为它们的工业化对我们自己的工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吗？”<sup>①</sup>

纵观法国殖民者的经济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前，他们创建了有些人称做的“发展的岛屿”（依附论者甚至认为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使得非洲沿海和内地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紧密联系，但应当看到，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在黑非洲，85%的财富仍出自5%的地理区域。可以说，法属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被隔绝于现代工业文明之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察一下法国对殖民地的投资。

茹·费里曾宣扬说：“法国总嫌资本太多，所以大量向国外输出，事实上这个伟大国家输出的资本是以亿万法郎计算的；我说，法国是如此富裕，有理由从这方面来考虑殖民地问题。……对于由工业性质本身所决定必须大量输出产品的国家来说，是个市场问题，在欧洲各项工业遭到危机的时候，开辟一个殖民地就是开辟一个市场。”<sup>②</sup> 其实在茹·费里说这段话的时候，殖民地对法国商品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殖民地人民既无这种需要也无实际购买力，热带非洲殖民地更多地是作为宗主国的原料市场而存在。但资本的最终目的仍是要把殖民地变成一个完全的商品市场，这样资本家才能有利可图，尤其是在宗主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年代。从非洲方面来看，当地经济落后，交通困难，风险较大，要创建一个市场，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实际情况是，法国殖民者不在这里建设一批全新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赢利，如铁

---

① C. Robequain, *Les Richesses de la France d'Outre-Mer* (《法国的海外财富》), Paris, 1949, p. 197.

② 让·叙雷-卡纳尔：《黑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79页。

路、公路、航运港口等。殖民者的“建设性使命”就是在营造最必要的投资环境中逐步地担当起来的。

正如后来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法国殖民者未能很好地完成其“建设性使命”。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的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主要输往俄国等国谋取高息，而输往殖民地作为工商业投资甚至借贷资本输出，则相对较少，所以他们是利用不充足的资本投资来发展非洲的潜力。<sup>①</sup>这是由法国资本的特性决定的，也充分体现了高利贷帝国主义的特点。

因此，法国在非洲的投资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由于独占和排斥外国投资者，在法属殖民地，所有投资几乎全部来自法国；法国的公共投资小于任何其他在非洲的殖民强国，尽管它几乎两倍于私人资本的总数；公共基金集中在殖民地的基本建设，而私人投资集中在商业和联合企业。<sup>②</sup>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约 1/4 的法国私人海外资本投在殖民地。20 年代，投在法帝国的私人资本开始增加，但总量没有太大变化，并且依然集中在黑非洲商业上。在法属赤道非洲，即使在受法、比、荷、英资本财政补助的大租让公司消失后，法国私人投资者也没有试图去发展农村经济，他们只是简单地尽可能代替其他欧洲商人。到二次大战前，法国私人资本在热带非洲的投资总计不超过 350 亿法郎。其中约 30% 直接投在商业公司，9.5% 在银行、房地产公司，30.8% 在农村部门，投在工业的只有 17.1%，运输业 3.6%。<sup>③</sup>而在法属西非的总产量中，95.7% 来自农业，2.6% 来自林业，1.6% 来自畜牧业、狩猎和渔业，0.1% 来自采矿

---

①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675.

② Ibid, pp. 133 - 134.

③ Ibid, vol. 4, pp. 136 - 137.

业。<sup>①</sup>这反映了法国资本家长期以来的投资偏好,即冒最小的风险,让投资尽快带来收益。尽管经常有破产,特别是那些小商号,但法国公司总的来说是繁荣的,特别是那些资本较多、长期立足于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加蓬的公司。它们宁愿将利润送回国内,在法郎区可以自由兑换,而不愿将利润再投资于当地。

甚至直到二次大战后,当法国国库承担了在非洲改善基础设施和进行地质勘探的负担时,法国资本家仍保持这种倾向,不愿投资于任何除了矿业以外长期的工业项目,因为他们从维持现状中即可获得一切。

法国的公共投资来源于政府贷款。如法属刚果,1909年借款2100万法郎,1914年借款17100万法郎,<sup>②</sup>以用于建设公路、铁路和公共设施等。从联邦的形成到二次大战爆发,法国共批准了六笔贷款给法属西非,三笔给法属赤道非洲。<sup>③</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1年殖民部长阿尔贝·萨罗为殖民地引入了国家计划的概念,殖民地看来可以作为与法国财政相关的单位得到发展。但由于国库空虚,德国赔款未付,《萨罗计划》在1922年即在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就后被搁置一旁。20年代惟一值得一提的工程是达喀尔港的改造和在尼日河中部三角洲兴建一项大规模的灌溉工程。1929年的大危机使法国财政捉襟见肘。1931年《萨罗计划》再次抛出,1934年得到执行,但不久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

### 三、法属殖民地的社会变化

非殖民化结束了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建设性使命”。无论怎

---

① 《法帝国主义在西非》,第18页。

② Peter 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非洲经济史,1880—1980》), Oxford, 1986, p. 100.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134.

样评价殖民主义,作为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法国殖民者确实也给非洲留下了一些经济遗产。虽然非洲的经济进步并非始自殖民者,但法国的殖民化加快了经济变化的速度。在一些原始落后的地区,殖民者以超经济强制手段迫使非洲人进入世界经济市场,一方面使贫穷的非洲人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煎熬,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化提供了启动的引擎。应该说,如果没有殖民者提供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这些地区的发展将会更加缓慢。促进经济发生变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殖民时期。甘恩(Gann)等人在《殖民主义在非洲》一书中曾提到,仅在一个普通非洲人寿命长短的时间中,非洲就被拖出早期铁器时代,进入蒸汽和内燃机时代,<sup>①</sup>这样简单化的过高的评价遭到非洲学者和部分西方学者的严厉批评。

具体来看,进步是明显的。千百年来因循守旧的村社制度受到了强烈冲击,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同时,出口作物的生产带来了农业革命,如引进新的作物品种。使用化肥和灌溉等。贸易的扩展增加了非洲人消费的数量和种类。矿业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景观。“黑暗的大陆”在矿产、木材和热带作物生产方面成了世界市场的佼佼者。交通运输网将沿海与内地连在一起,到第一次大战前,法属西非的铁路里程达到1545公里。<sup>②</sup> 在一些铁路和公路沿线及港口、矿区、贸易中心,兴起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城市,如象牙海岸的布瓦凯和阿比让,分别在1896和1903年建立起来。在一些经济较先进的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农场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当然,这一切都是用极沉重的代价换来的。非洲的开发首先是为满足法国殖民者的需要,为法国提供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4, p. 690.

<sup>②</sup> J.D.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3页。

经济的各方面均受到宗主国的操纵和世界市场的影响。殖民官员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法律制定者和教师爷,而不是经济计划人。虽然人口增加了几倍多,但非洲人的生活质量却很低,以致有位法国官员也说:“土著人能够生活下去可真是个奇迹。”<sup>①</sup>如果说殖民者在经济上改变了一代非洲人的命运,那也就是说,主要是把他们及其后代置于强制性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秩序中。

#### 第四节 法属殖民地的同化政策 与民族运动

##### 一、法兰西的同化政策

法国殖民者在非洲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即法国一直鼓吹的“壮大法兰西民族”的同化理论。法国人认为“高卢雄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宪法和文明是最优越的和全球适用的,将它们移植进殖民地将会使当地人受益。<sup>②</sup>殖民地应在政治、经济上与法国完全保持一致,非洲土著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法兰西文化,并最终自然同化为法国公民。<sup>③</sup>

从表面上看,同化理论似乎是种族平等观的表述,而从其深层意义上看,则为种族主义思想更深刻的流露。

为了给同化理论披上漂亮的外衣,法国殖民者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爱尔维修、伏尔泰和卢梭等人主张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但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是针对封建专制压迫,与殖民者所宣扬的同

---

① UEESCO:《非洲通史》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91页。

②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127.

③ M. Crowder, Senegal, A Study of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塞内加尔,法国同化政策研究》), London, 1967, p. 2.

化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实上,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治本身就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信念上。不能否认,1789年大革命的遗产也在殖民统治中留下了痕迹。一批早期殖民官员的确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对国内的特权贵族痛恨有加,而对非洲的传统酋长或宗教首领也抱着怀疑和敌视态度,认为后者代表的是一股保守的反动势力。如塞内加尔殖民地的创建者费德尔布总督就是一位“坚定的种族平等的信仰者”。但这些左翼共和派或右派保皇分子,虽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著称,面对黑色人种,油然而生的种族优越感却使他们很难摆脱对后者的歧视。

弗吉尼亚·汤普逊和里查德·安德罗夫精辟地指出:“文明使命”(Mission of civilisation)是用来掩饰法国人的物质利益和人文目标之间不一致的委婉术语,也用来掩饰法国自己内在的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遗产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专制集权 and 同化政策密不可分。为了推行同化政策,法国坚持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一部分,除了北非的突尼斯、摩洛哥和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岛以外,还对非洲大陆撒哈拉以南的领土进行任意宰割。与英国凭经验和才干提拔殖民官吏的做法不同,法国的大部分殖民官员都来自殖民学校。作为帝国统一的象征,学校致力于训练出可以调任和多面手的官员,能够在整个帝国发挥多种功能,如行政、司法等等。早在1907年,法属黑非洲就有70多名行政管理人员是“科班出身”,毕业于殖民学校。事实上,1945年前,法国殖民官员主要把自己看作是法官和教师,而不是经济计划人。

同化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使得它在实践中不可能取得多大效果。当初法国人作为征服者,一方而自诩法兰西民族为所有人类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p. 127.

美德的保障者,是一切真正文化的根基,是一切正当抱负的本源,<sup>①</sup>因而要同化除了瑞士之外一切说法语的民族;同时又手拿利剑,将他们视同森林中的动物,置之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法兰西人从所遭到的抵抗中毕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使要把被征服者当作兽类看待,你也不得不先把他视为一个人(萨特语)。<sup>②</sup>这就是同化论者面临的悖论。渐渐地,法国殖民者自己也失去了这方面的热情,当然这并不说明他们已认识到同化的概念已经过时和过于简单(尽管社会科学已经揭示了人类及其文明的多样性,试图把他们整合在一起是愚蠢的),而是由于受到的现实的利益威胁:无论如何,殖民者在殖民地只是少数,如果他们真的同化了所有的受压迫民族,那么他们自身的优势和特权将荡然无存。事实上,殖民者同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之间的冲突已愈来愈明显。可以说,“同化只是一种幻想”。<sup>③</sup>

幻想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因为要顺利地进行统治,又不得不同化一些异教臣民。于是,在1912年,法国殖民当局制定了《入籍法》,规定凡出生在法属西非、担任公职不少于10年、拥有一定财产、具备良好品质并受过法语教育或在服兵役期间获得奖赏者,可以获得法国公民权。1937年,这5条资格增加到了11条,还有7条附加条件。但在领土9倍于法国、人口约1200万的法属西非,只有部分土著上层和极少数知识分子能够达到这些条件,在其他法属领地也是如此。只是在达喀尔、圣路易、吕菲克斯和戈雷岛这“四个选区”,归化民才稍微多些。这四个市镇是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的老据点,191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在这些地方实行法国的

---

① 《现代非洲史》,第211页。

② Jean-Paul Sartre, Introduction. See Albert Memmi,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 Beacon Press, 1967, p. XXIII.

③ 《现代非洲史》,第100页。

市政法律,全体居民及其后裔为法国公民,各市镇可派一名代表进入法国众议院。一位混血儿布莱斯·迪亚涅当选为法国下院议员,一时成为被法国同化的非洲政治明星。但到1918年,在法属西非获得公民权者仅有24 997人,其中22 711名居住在塞内加尔。<sup>①</sup>在整个法属殖民地近4 000万人口中,获得法国公民权的连千分之一也不到。他们担负着法国公民的义务,却无法享受法国公民的权利。即使在被同化人口较多的塞内加尔,到1926年,在135.8万人口中,也仅有4.8973万名非洲人享有法国公民权。而在整个法属西非,1926年人口已达1349.9万,其中只有9.7707万名非洲人成为法国公民。在马达加斯加,法国也侈谈“同化”,但直到1939年,在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上享有法国公民权的当地人还不到8 000人,各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归化民的人数更少。<sup>②</sup>

法国为推行同化政策所做的最大努力是在文化教育上。但这种文化教育一般也只发生在小学水平。战前法属西非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而远在16世纪,在今法属苏丹境内(古时马里帝国境内),学校教育就已相当发达,甚至北非都有人来这里求学。在真纳(苏丹)的伊斯兰高等学府里就有成千的大学生研习法律、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法国人举办的大部分初级学校都属于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在传授“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都德语)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法语宣讲的,殖民者根本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甚至连身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都不能接受除《古兰经》之外的任何阿拉伯语教育(这甚至给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官员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场合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尴尬)。当然,殖民者不会为非洲臣民开设人文科学课程,因为这会启发他们的心智和觉悟。殖民者担心欧

---

① 奥尔德罗格、波铁辛主编:《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第395页。

② 《现代非洲史》,第100页。



洲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对作为一种相关体系的殖民主义具有破坏作用。正是为了防止正在隐隐出现的这种危机,法国人才宁愿多设立农村学校、职业学校和技术培训专科学校,而不是创建综合性大学。殖民地教育的目的由一位法属西非大总督简洁地确定为:“教育大众,培养精英。”<sup>①</sup> 初级教育由区立学校兴办,到1937年,整个法属西非大约有80所这样的学校。在法属赤道非洲,为数更少。到30年代末,学龄儿童上小学的还不到5%,只有极少数的土著子弟可望上中学。<sup>②</sup> 中等教育只是为了补充政府职员而设立的,这项任务几乎完全交给了设在达喀尔的三所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1904年专为酋长子女开办的威廉·蓬第师范学校。在1918—1945年间,该校培养了近2000名毕业生,其中约1/3是医疗辅助人员,其他人被充作殖民当局的低级文职人员。能到欧洲宗主国读大学的非洲人更是凤毛麟角,据1932年的官方统计,法国各所大学里只有21名黑非洲学生,另有19名马达加斯加和695名印度支那籍学生。<sup>③</sup>

## 二、同化政策、精英阶层与民族运动

法国殖民者为推行同化政策而实行的奴化教育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化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一个狭小的“精英”阶层,即所谓“黑色法国人”的社会阶层,他们享有某些特权,其中有些人成为法国殖民者的得力助手。从原则上讲,按照法国人制订的《入籍法》,受过法国生活方式教育的非洲人可以在政府部门得到更高的地位和社会尊敬,但他们要和法国文化保持一致,就不得不割断与他们的非洲同胞的大部分天然联系。非洲人

---

① 《1800年以后的非洲》,第179页。

② 《现代非洲史》,第211页。

③ 同上书,第213页。

为成为法国公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一方面推行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惧怕真正实行同化的后果。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非洲臣民当时还没有觉悟到要争取民族独立,他们的确是要争得法国公民权,希望被“同化”,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民族主义者中就产生了继续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地区实行该政策的倾向,<sup>①</sup>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失望而又不甘心受奴役的人们也曾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斗争都带有自发性,并伴有宗教色彩,很少超出血缘和种族联合的范围。运动的参加者并没有显然自觉的政治目的,指导他们行动的仅仅是对殖民者的强烈仇恨。

与英属殖民地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属殖民地的政治活动如同一潭死水,基本上未受到风暴的冲击。民族觉醒的苗头稍一露出便遭到扼杀。

到1945年为止,所有法属殖民地民族斗争的共同特点是运动的零散性、缺乏明显自觉的目标、组织力量薄弱,只是与殖民制度的个别的丑恶现象作斗争,而不是与整个殖民制度作斗争。根本原因在于法属殖民地的经济比较落后,妨碍了社会力量的成长,加上民族(部族)成份复杂,难以形成一个领导阶级。罗兰·奥利弗和安东尼·阿特莫尔评论说,法属西非某些最有才智的人被束缚在文化事业上,这部分说明了在50年代初这些领地上的人们何以在政治觉悟上赶不上说英语的邻国的原因。<sup>②</sup>说法语的西非人和说英语的西非人对民族主义的成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法属西非人与殖民主义的关系,首先是在文化方面,其次才是在政治方面。有人说,说英语的民族主义者制定了宪法,而他们说法语的同代人

---

① UNESCO:《非洲通史》第7卷,第461页。

② 《1800年以后的非洲》,第248,247页。

则创作了诗歌。<sup>①</sup> 巴兹尔·戴维逊也指出,英属精英人物强烈要求从修宪改革向自治领地过渡,法属非洲精英人物却只得争取在“大法兰西”前提下的公民权利,要求真正实施取消一切种族歧视的共和制最高原则。这就导致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自我表达风格,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城的社会名流往往坚持立足于本地实际的态度,而在法属殖民地,这类人物却常常高谈阔论哲学问题。<sup>②</sup>

法国同化政策对民族运动的另一个影响也许是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转移。非洲的民族主义最初是以欧洲民族主义,或以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基督民族主义为模式。<sup>③</sup> 非洲人渐渐通过教育发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价值,随之便产生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多种非洲模式,他们最终也取得了成功。<sup>④</sup>

总之,同化虽是个幻想,并且由于主客观原因遭到了破产,但由于这一政策和殖民政治、经济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法国人始终没有抛弃它,甚至还有日益加强的趋势。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得法国人想在法兰西之外壮大法兰西民族,同化政策由此肇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臣民为母国流了血。接下来的大萧条令法国人真正开始把殖民地当作商品市场,1935年帝国会议的目标,不是使殖民地自给自足,而是使它们更紧密地与法国经济连为一体。而1940年“法兰西被逐出了法国”,<sup>⑤</sup>法国对“海外法国”更加重视,即便为了“感谢”,法国人也要加速“同化”在战争中拯救了自己的殖民地人民。1944年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的官员们在布拉柴维尔开会,殖民部长勒内·普利文代表宗主国表明了态度:“我们时时听到这种说法:这场战争必定会以称之为殖民地民族解放

---

① 《1800年以后的非洲》,第248、247页。

② 《现代非洲史》,第211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⑤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p. 232.

战争而告终。在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更大的法国内部,没有待解放的民族,只有自认为是法国人的居民,他们期望更广泛地参加法国的社会生活和民主机构。”<sup>①</sup>可见法国人从不曾想让殖民地获得脱离法国而独立的地位。可以再拿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作个对比。英国人在文化上把殖民地各民族仅仅视为利用和试验的对象,他们绝不能成为大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其护照上是如何登记的,也绝不能鼓励他们去争取这种地位。因此,英国人基本上对他们使用本地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甚至行政管理的工作语言采取宽松态度。出于同样原因,英国统治阶级在早些时候在殖民地独立问题上也不像法国那么僵硬。法国统治集团则顽固不化,在全世界都在谴责“同化政策”的时候,却煞费苦心力图让这个古典人文主义概念变成现实。

## 第五节 法属非洲的土著兵制度

### 一、土著兵制度发展的三阶段

土著兵制度更能体现法国对殖民地人力的掠夺。作为法国特色的殖民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土著兵制度形成于1857年费德尔布总督在西非创立的塞内加尔步兵团(Tirailleurs Sénégalais),但建立土著部队的尝试则可追溯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最初是由于在西非活动的法国军人死亡率极高,无法满足保卫法国据点和向内地渗透的要求,如1815年,法国在六个月内派了75名军官到塞内加尔,结果有57人死于当地。死亡原因一是早期士兵的素质不高——来到非洲殖民地的官兵在国内时大都未经严格训练,许多是骄奢淫逸之徒,无法适应热带的水土和气候

<sup>①</sup> 《1800年以后的非洲》,第225—226页。

候；二是疾病，特别是疟疾，成为法国士兵的主要敌人。对非洲士兵需求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出于在日益扩张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其他角落进行征服战争和军事占领的需要。1819年海军部下令在殖民地征募“有色人小分队”，方法是购买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最多不超过300法郎，这笔钱大都落到了原主人的手里。以这种方式购买来的“士兵”人数极少，只有几十人，开始时实际上是“军事劳工”，主要从事日杂工作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随着人数增多，才被分配给和军事有关的任务。1827年大约200名沃洛夫(Wolof)士兵被派往马达加斯加服役，1831年220人被派往圭亚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可看到非洲士兵的身影。

1857年7月21日，在费德尔布总督的建议下，拿破仑三世签发了创立塞内加尔步兵团的敕令。土著兵首次实现了由军队劳工到战斗人员的转变。他们自成独立的单位，有自己色彩鲜艳的军服，服役期限与欧洲人相同，但军饷不同于正规的法国海军部队，而由塞内加尔总督府发给，薪水比以前的军队劳工有所提高。土著兵不再是军内艰苦劳动的承受者，而向志愿化和职业化过渡。

此后，在一百年时间里，非洲土著兵从当初使用前装枪的步兵小分队，到形成包括伞兵在内的现代化部队，无论在规模和性质上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于塞内加尔土著兵忠诚、勇敢，善于作战，法国人通常把所有的非洲部队都称作塞内加尔部队，实际上殖民地的非洲士兵来自各个地区，并有各自的单位、名称和特色，如马尔加什步兵团、北非土著兵部队(Gourms)，包括摩洛哥士兵(Mokhaznis and Partisans)和阿尔及利亚轻步兵(Zouaves)等。当然，塞内加尔土著兵始终是法属殖民地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20世纪后，摩洛哥部队也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体说来，非洲土著兵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7到1905年，土著兵基本上是一支雇佣兵部队，兵源主要来自奴隶和其他社会底层的穷人，只有一小部分家境较好的

非洲人充当法国指挥官和土著兵之间的中介。这一时期土著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法国殖民征服的工具,包括向西非和赤道非洲内地以及法兰西帝国的其他海外地区渗透,甚至首次介入宗主国在欧洲的战争——有的法国人竟将1870年被普鲁士打败归咎于土著兵。<sup>①</sup>无论如何,借助塞内加尔步兵,法国建成了—一个也许单靠欧洲士兵不能建立的大帝国。

第二阶段,从1905到1919年。当法国在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实现军事征服后,土著兵作为占领部队,实际上起到了警察的作用;同时,随着控制区的扩大,以及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法国对非洲属地兵源的需求激增,雇佣兵已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法国开始实行普遍征募制,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并持续到和平时期。

在治理圈内,塞内加尔土著兵忠实地执行法国指挥官的各种命令。当法国主子盛赞土著兵的英勇时,同一肤色的殖民地人民则把他们称作法兰西“帝国的黑色看门狗”。<sup>②</sup>弗朗兹·法农把他在马达加斯加看到的黑非洲士兵描述为拷打者、妖魔和法国强迫体制的总代理人。<sup>③</sup>

尽管土著兵为当地非洲人所厌恶,法国人仍担心他们会与民众发生密切联系,甚至担心会发生类似1857年印度的士兵起义,因而在殖民地军队的部署方面,法国极力学习英国在1859年以后的做法:使每块殖民地所驻扎的都不是本地的士兵。“结果就得创

- 
- ①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非洲土著问题》), Harvard, 1928, vol. 2, p. 14.
- ②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Prose and Poetry*(《散文与诗》), trans. and ed., by J. Reed and C. W., London: Heinemann, 1976, p. 136.
- ③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黑皮肤,白面具》),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p. 104 - 105, note 32.

立一支这样的非洲军队，其营地阿尔及利亚，而其来源则是西非”。<sup>①</sup>由于大批塞内加尔部队进驻北非，法国得以将 32 000 名驻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调回国内监视德国边界。

1905 年法国将本国军人的服役期限减为二年，这进一步增加了殖民地军队的重要性。1907 年，法国政府指定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在非洲实行征兵制的可能性。1912 年，委员会得出结论：“为了国防的共同利益，为了绥靖我们的殖民地和非洲属地的统一，应该快速而不断地扩大我们的黑人部队”。<sup>②</sup>于是政府颁布法令，在法属西非，20—28 岁的土著应服役 4 年。威廉·蓬第大总督认为，“西非的慷慨贡献实现了母国的政治设计……标志着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了平息国内进步人士的反对和“避免伤害当地人的感情”，1912 年的法令规定征募应“依照土著习俗”进行。于是征兵的责任落实到了酋长们的肩上。这一招颇为有效，到 1914 年初，塞内加尔部队大增，已包括 6 个分队，近 18 000 人。<sup>③</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政府在西非发起了强大的征兵运动，1915 年招到了 3 万人，1916 年 8 月征到了 51 000 多人，几乎半数来自塞内加尔和苏丹。1917 年，在索姆河前线，有 31 个塞内加尔营队。1918 年 1 月，政府将征兵范围扩大到 18—35 岁之间。作为这种普遍征兵制的赔偿，政府同时颁布了六条法令，规定给予土著兵某些特权，如豁免赋税，为其家庭提供津贴，在每个殖民地建立伤残士兵卫生院，为前线士兵在政府机关中保留某些雇员职位，直至给予他们“公民权”。结果一次大战期间，仅在西非就

---

① Mangin, *La Force Noire* (《黑人部队》), Paris, 1910, p. 101.

②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Harvard, 1928, vol. 2, p. 6.

③ Myron Echenberg, *Colonial Conscripts: The Tirailleurs Sénégalais in French West Africa, 1857—1960* (《应征的殖民地士兵：法属西非的塞内加尔部队》),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91, p. 8.

征募了 181 000 名士兵。1918 年,黑人士兵作为占领军进驻莱茵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著兵帮助法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阶段为 1919—1945 年。1919 年 7 月法国颁布了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法令,规定土著居民须服三年兵役。<sup>①</sup>为何进入和平时代后,法国反而把殖民地的征兵制度固定下来?这主要是由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人认识到非洲军队已不仅仅是维护殖民地治安的土著兵,而且具有国际意义。芒干(Mangin)上校早就宣称,黑人部队将在欧洲战争中成为重要因素,“如果战争延长,我们的非洲部队将成为几乎是无尽的后备力量,大大超过敌手所能达到的水平,使对方不能继续战争,直到我们取得最后胜利。”<sup>②</sup>法国人口只有 3900 万,而德国则有 6300 万,而且法国的人口出生率低,而德国每年新增人口 30 万。这一对比使法国转向非洲寻求人力资源,以抵销德国的优势。法国人称这种做法为“现代战争艺术”,而德国人则不无嘲讽地指出这是对法国高卢雄鸡纯粹血统的“污染”,或“黑人替代”,有些德国军官甚至认为与“劣等”民族作战是一种侮辱。<sup>③</sup>无论如何,根据 1919 年的法令,法国每年可从西非获得 1 万人的兵力。西非法属殖民地每年约有 125 000 或 130 000 人达到服兵役年龄,兵员就从这些刚过花季的黑皮肤年青人中招募。殖民官员根据税单和其他文件制订了一份表格,在各块殖民地之间进行兵员分配:上沃尔特 2 500 人,苏丹 2 000 人,塞内加尔 1 700 人,几内亚 1 850 人,象牙海岸 1 500 人,达荷美 800 人,尼日尔 700 人,毛里塔尼亚 100 人。一旦入伍,土著兵每日军饷 75 生丁,或者约每月 1 美元。他们首先被送往圣路易或其他军事中心,进行初步集训后被派往法国,在宗主

①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第 2 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549 页。

② Mangin, *La Force Noire*(《黑人部队》), Paris, 1910, p. 343.

③ David Irving, *The Trail of the Fox*(《狐狸的足迹》), New York: Avon, 1977, p. 72.



国集训三个月后,再被分配到所需的地方,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叙利亚。<sup>①</sup>到20年代中期,西非有40 000名以上土著兵,其中35 000名被派往海外,15 000名驻在当地。1926年有7个团驻守在法国的土著兵团被派往摩洛哥与克里姆领导的里夫共和国作战。随着土著兵日趋“正规化”,法国国库负担了殖民地军费的大部分。

和平时期的普遍征兵制遭到了非洲人民的反对和抵抗。许多人找借口不去应征。在苏丹等地,“征兵布告发布后,大量年轻人离开家跑到了黄金海岸”,<sup>②</sup>出现了大规模的意在躲避征兵的“军事移民运动”。<sup>③</sup>达喀尔的报纸曾披露:“这种令人厌恶的征兵制引起了逃跑和全体迁徙,使整个地区人口减少,有利于外国殖民地”。<sup>④</sup>征兵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被征募,减少了潜在的劳动力供应,而这种劳动力供应本来就不充足。法国商人就曾抱怨,政府在收获季节征募导致庄稼歉收。有些官员证实,在2—3个月的征兵期间往往导致殖民地经济活动进入低潮时期。西非一位总督加米埃·居伊承认:“每次征兵从殖民地剥夺了壮劳力和潜在的家长,人口趋于锐减,……要么我们把西非帝国变成一个原料和市场的蓄水池,要么希望把它变成人力的储备所。但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发现原料几乎是无限的,而人力是非常有限的”。<sup>⑤</sup>

---

①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Harvard, 1928, vol. 2, p. 12-13.

② *Ibid.*, vol. 2, p. 16.

③ Myron Echenberg, *Colonial Conscripts: The Traillieurs Sénégalais in French West Africa, 1857—1960* (《应征的殖民地土兵:法属西非的塞内加尔部队》),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91, p. 5.

④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Harvard, 1928, vol. 2, p. 16.

⑤ *Ibid.*, vol. 2, pp. 20-21.

## 二、土著兵制度对法兰西帝国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法国的土著兵制度是个真正的考验。北非成为反法西斯战场之一,许多非洲人志愿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兰西”的部队,而非靠强制征募。一向被视为贫穷落后的赤道非洲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摇篮”,<sup>①</sup>挽救了法兰西命运。1944年,在参与解放巴黎的40万法军中,有约30万是黑人。一位法国将军感叹:“幸亏非洲部队,法国不仅找到了通往胜利之路,恢复了对军队的信心,而且首要的是恢复了荣誉和自由。”<sup>②</sup>

毫无疑问,在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经验中,法国的上著兵制度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其他殖民列强也曾使用土著部队保护其殖民地免受外部攻击,但使法国与其他列强区别开来的特点是,它在法帝国的每个角落广泛地使用非洲土著兵作为机动部队的决心,无论其目的是征服、占领或镇压起义,直至保卫母国。只有法国使其非洲殖民地高度军事化;只有法国在和平时期,如同在战时一样,实行普遍征兵制。“简言之,法国人做了其他殖民列强不敢做的事情:武装和训练大量有可能反叛的殖民地臣民”,<sup>③</sup>为本国的利益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法国的策略是娴熟而成功的。由于土著兵常被派往文化和部族上都是陌生的地区服役,他们实际上已从自己的社会中分化出来。驻在宗主国的时候,他们更受到主人的严密控制。军官一直是法国人担任,土著兵所要做的就是服

① Virginia Thompson and Richard Adolf, *The Emerging States of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形成中的法属赤道非洲国家》),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1.

② General R. Huré ed., *L'Armée d'Afrique, 1830—1962*(《非洲军队, 1830—1962》), Paris, Lavauzelle, 1977, Preface, p. 1.

③ Myron Echenberg, *Colonial Conscripts: The Tirailleurs Sénégalais in French West Africa, 1857—1960*(《应征的殖民地士兵:法属西非的塞内加尔部队》),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91, p. 5.

从命令。这一切使得非洲军队从未像亚洲和近东的类似军队那样，在独立运动中发挥政治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法国组织和利用土著部队为宗主国谋取利益，是比英国更胜一筹的。

## 第十三章 建立于强迫劳动制之上的 葡属非洲殖民地

1885年柏林会议后,葡萄牙一方面用武力抢占殖民地,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外交斗争中,通过与英、德、比、法和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最终确立葡属非洲的范围,包括安哥拉(含卡奔达飞地)、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葡属几内亚、圣多美—普林西比岛等,其面积约为葡萄牙本土的22倍。葡萄牙是仅次于英、法的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

但是葡萄牙又是所有殖民宗主国中最落后的国家。20世纪初,葡萄牙仍是农业国,且农业经济长期停滞,粮食不能自给;国家没有重工业,加工工业尚停留在作坊阶段;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中央政府靠举借外债维持财政开支。政治上长期动荡不安,党派纷争激烈,军事政变时有发生。1928年后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逐步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并维持独裁30多年,政局虽相对稳定,但经济发展速度仍然缓慢。宗主国的落后,反映到殖民政策上,是不遗余力地榨取殖民地的财富。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从未放松过。特别是萨拉查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严密控制和压榨达到顶点。此外,葡萄牙还长期依靠英国保护其本土和殖民地的安全,允许外国资本进入殖民地,以弥补自身国力之不足。

以上诸因素在其殖民政策上都具体表现出来,因而使葡萄牙殖民统治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具有其他欧洲宗主国所少见的独特之处,葡属非洲出现了其他非洲殖民地所罕有的现象。

## 第一节 殖民地基本经济政策及特点

### 一、殖民地基本经济政策：强迫劳动制

葡萄牙在非洲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一直以直接掠夺殖民地为主要形式，葡属非洲的人民遭到剥削的严酷程度超过任何别的殖民地。

强迫劳动制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在非洲实行的基本经济政策，是掠夺殖民地的最主要方式，强迫劳动构成了殖民地经济基础。

近代历史上，葡萄牙长期在海外有组织地进行奴隶贸易，以此作为获得主要收入的途径之一。19世纪初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废除了奴隶贸易，葡萄牙迫于英国的压力也中止了奴隶贸易，由此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急于寻求其它方法予以补偿；但葡属非洲尚不存在实行雇佣劳动制的条件。直到一战以前，葡属非洲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原始而粗放，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绝大部分在非洲人村社手中，非洲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社会组织方面，仍以氏族和部落组织为主，每个非洲人都从属于一个原型的组织——村社，他们在短时间里不可能分化出来成为雇佣劳动者。葡萄牙在殖民地历来采用最落后的制度，典型事例之一是16—19世纪在莫桑比克赞比西河流域一带实行的“普腊佐制”。这种制度以土著酋长统治与封建等级制相结合为特征。普腊佐(领地)的领主、家务总管是葡萄牙人，其下是忠于领主的非洲头人，最低层管理者是原非洲人村社的首领或酋长。在普腊佐领地上劳动的非洲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可和土地一起买卖，每年要为领主无偿劳动一长段时间，还须交人头税，违者罚为奴隶。领地上的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或在领地自有的军队里服

役。普腊佐制对农民和奴隶的剥削具有超经济强制劳动的特征，实际上成为后来强迫劳动制的样板。“掠夺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sup>①</sup>葡属非洲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殖民统治制度决定了强迫劳动制势必成为葡萄牙掠夺殖民地的新方式。

1875年葡萄牙颁布了最早的强迫劳动法令《土著劳动法》；1899年颁布在全帝国内实行土著劳动的法令，规定所有“土著居民均须履行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即以劳动来维持生存及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若有拒不履行该义务者，公共权力机关可予以强迫，劳动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sup>②</sup>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葡萄牙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内陆“绥靖”的完成，强迫劳动制在整个殖民地推行，1928年土著劳动法、1930年殖民地法令等法律中，授予各级殖民官吏推行强迫劳动制的权力，葡属非洲人民被推入痛苦的深渊。

葡属非洲推行强迫劳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义务劳动，主要用在公共工程中，由政府指令性指派的强制性劳动；二、契约劳动，劳工用于种植园、矿山和原料加工厂，与雇主签有契约，规定劳动年限和报酬，但报酬除供应粗劣伙食外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三、输出劳工，分两类：一类是殖民帝国内部的劳工输送，主要是从安哥拉输往圣多美—普林西比的种植园，另一类是输出到南部非洲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为南非兰德金矿等地区。这种劳工也有契约，由殖民当局与输入地当局或劳工协会签订，劳动期限一般是12—18个月，期满遣返。四、强迫种植制，根据宗主国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殖民当局与特权公司强迫非洲人种植经济作物，然后以低价垄断收购。

劳工的征召是殖民地当局的主要工作。殖民当局把征召任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0页。

② Jams Duffy, *A Portuguese Africa* (《葡属非洲》), Cambridge 1959, 第155页。

层层下达,由处于基层的官吏、非洲人首领、头人来完成,并把劳工交给地方殖民长官安排使用。税收是获得强迫劳工的主要手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葡属非洲的税收开始使用现金方式,税额对于收入极低的非洲人来说十分沉重,特别是人头税。非洲人无法以现金缴纳,被迫以劳动来抵偿,服从征召沦为强迫劳工。如果非洲人拒不服从,殖民当局则动用军队。

二战后,强迫劳动制的发展有所变化,主要是义务劳工减少,契约劳工、对外输出劳工增加,强迫种植制加强。强迫劳动成为殖民地商品生产的重要特征。劳工的工资有所增加,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种植园,1936年矿山每个劳工的月均工资为20—35埃斯库多、1950年为55—60埃斯库多。<sup>①</sup>此后还稍有增加,劳工的人身束缚有所放松,有固定的休息日。这些变化表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对强迫劳动制的影响有所加强:强迫劳动制从早期落后、野蛮的“变相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过渡。但是这个过渡一直没有完成。劳工仍源于强制征募,劳动契约的签订依旧处于官方干涉之下,劳动报酬不反映劳动力价值,强迫劳动制仍未发生质变。

强迫劳动制的实行给葡萄牙带来丰厚利益,其中以输出劳工为最。输出劳工直接为葡提供财政收入和外汇,这些收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向南非、罗得西亚提供劳工的直接收入。根据1928年莫桑比克协定,殖民当局每年提供40万莫桑比克劳工,每个劳工的价格为5.25美元,仅此一项,殖民当局就可得5000多万埃斯库多。<sup>②</sup>1963年签订类似条约,莫桑比克当局从提供劳工中获得2—3亿埃斯库多,这项巨额收入弥补了葡外贸赤字1/6—1/5。<sup>③</sup>

① Pattee Richard, *Portugal em Africa* (《葡萄牙人在非洲》), Lisboa, 1959, p. 28.

② 军兵等编译《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93页。

③ 《海外统计年鉴》里斯本,1963年第1辑,第161页。

二是以输出劳工为条件换取过境运输收费。1928年协定授权南非在葡属区域征募劳工，葡境洛伦索—马奎斯铁路得以保留南非进出口运输量的47.5%，莫桑比克当局可收取巨额货物过境税、铁路税，此项收入占1928—1929年间莫桑比克财政预算的28%。<sup>①</sup>在两次大战之间，运输费及税额每年高达8万英镑，且以黄金支付。三是延期支付和克扣劳工工资所得。南非金矿给劳工付一半工资，另一半工资以黄金形式支付给莫桑比克当局，劳工期满归来时殖民当局付以埃斯库多，工资中相当部分以税的名义扣掉，这种作法直接增加葡萄牙的黄金储备。此外，葡萄牙和殖民地当局还从劳工的无偿劳动和低工资中获利。葡属非洲劳工的工资水平在整个非洲属最低水平，殖民地公路的修建、保养多由无偿劳工承担，契约劳工一般工资只能维持劳工个人基本生存，劳动力价值降到“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sup>②</sup>即使二战后劳工工资有所增加，也没从根本上改变低工资状况。殖民地矿山、种植园和工厂以极低的成本运行，可获极高利润。实行强迫种植制，葡萄牙在殖民地低价收购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出售。60年代这种差价高达1200万至1.2亿埃斯库多。<sup>③</sup>

强迫劳动制带给葡属非洲的结果、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对此应辩证分析。

首先，强迫劳动制极大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无休止的征召劳工，劳动强度大、条件艰苦，劳工待遇很差，造成大量青壮年劳力的体质衰退和死亡，“劳工死亡率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版《非洲通史》第7卷，第294—29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196页。

③ Pattee Richard, *Portugal em Africa*（《葡萄牙人在非洲》），Lisboa, 1959, p. 107.



高达40%是常见的”，<sup>①</sup>还有大量劳工年青时就成为伤残，丧失劳动能力，殖民地从而失去大量劳动力。强迫种植制的推行，在殖民地形成了单一种植制，安哥拉主要生产咖啡，莫桑比克种植棉花、甘蔗，葡属几内亚种油料作物，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因而大减，不足以维持当地居民需要，加上自然灾害，大批非洲人死于饥馑。非洲人被迫低价出售全部收获物，却用高价买进粮食，承受葡萄牙商人的双重盘剥。单一经济作物结构导致殖民地经济发展迟缓和极不稳定，以致殖民地独立以后长时期面临发展的极大困难，直到1996年莫桑比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美元，居世界排名表最末位。殖民地在不平等状态下被拖入葡萄牙宗主国的经济轨道和世界市场，形成“外围”对“中心”的严重依附。

其次，强迫劳动制延缓了葡属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比例的流动劳工阻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黑人都成为强迫劳工，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数量极少；征召劳工往往以村庄、部落为单位，在雇主、工头的严格监视下与外界隔绝，不利于克服浓厚的部落观念；到境外劳动的劳工返乡后，在观念、行为方式上与未外出的本地人有严重差别，这种现象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外出劳工所形成的隔阂却不利于形成共同的反殖民统治的斗争意识和组织。此外，广大非洲人处于强迫劳动剥削之下，99%的人不能接受教育，识字的人极少，黑人知识分子阶层队伍难以形成，影响了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

从另一角度看，强迫劳动制的实行给葡属非洲也带来一些新变化，主要是：

1. 强迫劳动制的实施不同程度地瓦解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开始深入农村。强迫种植制使从事商品生产的农业生产者增加，其生产目的发生变化；部分农村出现了地方市场，按殖民当局规定

---

① B.戴维逊：《非洲的觉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13页。

的价格进行农产品贸易,以现金支付,这便把农业生产初步引入市场经济;相当一部分非洲人作为强迫劳工或到国外,或在境内,年复一年为世界市场和宗主国进行商品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包括口粮、衣服)也渐渐变得脱离不了市场。

2. 强迫劳动制促使人口大批流动,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部落生活。20世纪40年代中安哥拉、莫桑比克完全脱离部落的人口只有5%,流动人口约20%,到60年代则达到20%和60%,<sup>①</sup>这导致城市(镇)的发展,原来的城市如罗安达、罗比托等人口明显增加,规模扩大。在一些贸易中心,经济作物产区等出现了新城市(镇),如卡布腊尔、新曼博内等,葡属殖民地城乡面貌有所改变。

但是,强迫劳动制这些客观上的作用毕竟不能与雇佣劳动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作用相提并论,因为强迫劳动制本身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野蛮和保守的特点,它的消极作用仍远大于它的客观历史作用。

## 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征及状况

葡萄牙是“西欧病夫”,本身经济十分落后,缺乏资金用于开发殖民地,因此,在殖民地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葡属殖民地经济对英国资本强烈依赖是葡属殖民地经济的又一特征。列宁称之为“财政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典型例子。<sup>②</sup>

从14世纪以来,葡萄牙就与英国保持着传统的同盟关系,19世纪末,日渐衰弱的葡萄牙在财政和外交上日益依附英国,葡属殖民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瓜分世界的斗争结果。一战初期,葡萄牙担心德国夺取其殖民地,请求英国保护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英国则以此“换取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

<sup>①</sup> Jams Duffy, *A Portuguese Africa* (《葡属非洲》), Cambridge, 1959, p. 339.

<sup>②</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7页。

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取了利用葡萄牙的港湾、岛屿、海底电缆等等的便利”。<sup>①</sup>

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资本投入葡属非洲并享有许多特权。1892年后在莫桑比克的英资公司享有征收居民人头税、征发无偿劳工等方面的垄断权。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坦噶尼喀特权公司拥有对本格拉铁路沿线矿场、种植园投资的优先权。进入20世纪后,英资更大量进入葡属非洲。从1870年到1936年,投入安哥拉的英资累计达1600万英镑,投入莫桑比克的英资共计达2000万英镑。<sup>②</sup>英资广泛分布于铁路运输业、采矿业、种植业、银行业等。二战以后英资在葡属殖民地投资比例略有下降,英资多以与其它国家资本联合投资的形式投入葡属殖民地。

二战后,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美、西德、法、比等国加紧向葡属非洲渗透,并逐步垄断葡属殖民地的各行各业。美、英、比合资的安哥拉钻石公司垄断安哥拉全部金刚石的开采,法国托拉斯佩希奈垄断铝工业,西德克虏伯开采安哥拉铁矿,美国石油公司在莫桑比克从事勘探和开采,在殖民地全部投资额中,有2/3直接或间接为外国垄断集团所控制。<sup>③</sup>

对于外国资本的涌入,葡萄牙通过法令规定:凡外资在其殖民地建立企业,葡应参予投资和管理。这样葡萄牙只需投入少量资金,就可坐享其成,从对非洲人的“集体剥削”中获利,因而它给外国公司提供各种优惠和特权。葡属非洲推行强迫劳动制,为外资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以致各投资国认为向葡属非洲投资是最有利可图的。

葡属非洲对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依赖这一现象说明,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8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版《非洲通史》第7卷,第286页。

③ 《葡萄牙现代史概要》,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49—250页。

在世界殖民史上,一个弱国为保持其殖民地,不仅要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往往要在经济上依靠大国资本,这也反映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金融资本活动的特点。葡萄牙本身资本主义经济的羸弱使其殖民地走上“依附中生存”的道路,并陷入对宗主国和英国的双重依赖状态;外国资本在葡属非洲的掠夺性开发,使殖民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并形成难以根治的、畸形的单一种植制,对葡属非洲的发展产生十分恶劣影响。葡属非洲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显得更为贫穷落后,葡属殖民地人民在以强迫劳动制为中心“集体剥削”体制下已达到赤贫地步。

在葡萄牙长期统治下,殖民地经济发展微乎其微。极有限的成果主要是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殖民地的公路网和港口设备。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濒临印度洋和大西洋,拥有漫长海岸线,是南部非洲一些内陆殖民地的必经出海口。早在19世纪末因金矿开发而暴富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就修筑了从比勒陀里亚通往莫桑比克德拉戈阿湾的铁路,以与洛伦索—马奎斯(今马普托)港口相连接。本格拉铁路和从莫桑比克的贝拉通往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加丹加的铁路形成了基本干线。一些天然良港也陆续修建了。二战后还修建几座水电站。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目的固然是便于掠夺殖民地资源,但对殖民地的基础设施有所建树,因而在二战后吸引了多国投资,从而稍稍改变了葡属非洲的落后面貌。

总之,葡萄牙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长时期建立在强迫劳动制和对外资特别是英资的严重依赖上,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它说明:1. 全球化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需要各种类型的殖民地为其服务。葡属殖民地充当的一种角色是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金矿——南非兰德金矿提供充足的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以保证世界黄金储备的稳定。2. 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发展使资本在各国、各地区间的流动逐渐普遍化。英资在葡属殖民地的自由投放标志着资本在各殖民地自由流动的曙光。3. 葡萄牙作为近代殖民

主义的始作俑者,自有其传统的、老到的殖民统治手法。在国际上它善于利用殖民主义强国的错综复杂矛盾,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空间。在殖民地内部,它善于利用超经济手段补充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不足,不惜以保持落后的代价来维持殖民政权。在利用历史的惯性力量和小国、弱国能维持庞大的殖民地上都表现出老殖民主义者的熟练的老到手段。当然,这种本身经济力量极弱的殖民主义在实现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上是黯然无光的。而葡属殖民地人民为此所承受的灾难尤为深重。这在葡萄牙对非洲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方面同样明显。

## 第二节 殖民政治统治及特点

### 一、控制严密、统治强化

随着对殖民地内陆征服的完成,葡萄牙逐步建立起一套直接统治的行政管理体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萨拉查宣扬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实行殖民地与葡萄牙“政治一体化”,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严密,统治日趋强化。

各殖民地由葡萄牙殖民事务部总管,殖民事务部部长由总理任命,只对总理负责,殖民部部长指派各殖民地的总督,并直接领导。总督有权决定和设计,把殖民地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设省、州、区三级地方政府。有些区又分为白人区和土著人区,一个土著人区下辖若干哨所,每个哨所负责直接控制若干个非洲人村庄。各级行政长官,甚至一些哨所所长均由总督亲自任命,由白人担任。每一层官员都对其上级负责,最终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绝对权威。这种管理体系犹如一巨大的金字塔,从里斯本的中央政府到遍布殖民地的几百个哨所,上下贯通,深深地把根扎进了非洲人社会。

管理方式具有浓厚的独裁色彩。无论是葡萄牙的国民议会，还是殖民地的立法会议(30年代一度被取消)对殖民地事务的决策、法令的制定都没有决定权。萨拉查对殖民地的控制是宏观的、绝对的，殖民地基层官员则是他所辖区域的“土皇帝”，有相对的独裁权。地方行政官也是当地的最高法官、警察总领，他控制商品交换的价格和规模、监督银行，决定土地的使用和农作物的种植，执行强迫劳动制。哨所所长在他的辖区内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就是法律，支配着非洲人的一切：自由、土地、劳动、刑罚和迁移”。<sup>①</sup>独裁的统治方式保证了统治的直接、有效。

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是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后盾的。虽然到40年代中期，葡属非洲实现了文官管理，但军队的作用仍十分重要而且广泛。军队遍布城市、乡村，随时听候调遣，不仅是征服和镇压的力量，还参与行政管理，在征税、征召劳工、强占非洲人土地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必须指明的是，这些军队主要由黑人组成，被称为“黑色武器”，具有雇佣军的特点：冷酷、无情，能“出色”地完成任。庞大军队的存在及行动，造成葡属殖民地恐怖、压抑的气氛。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则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传统手法。

在独裁和军事高压下，非洲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不能进入行政管理机构，那里是葡萄牙人的天下，连基层哨所所长也多由白人担任；在殖民地立法会议里，除了一、两个对殖民当局死心踏地效忠的土著酋长作点缀外，没有黑人的席位。土著居民长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到1961年后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土著人才逐步获得选举权，但殖民当局加以文化上限制，使绝大多数黑人仍被排斥在选举站之外。1965年安哥拉有选

---

<sup>①</sup> Enmark Anders and Westbery, *Angola and Mozambique: the case against Portugal*(《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反抗葡萄牙的实例》), London, 1963, p. 39.

举权的人只有3%，1969年莫桑比克有选举权的人只有1%。<sup>①</sup>葡萄牙的直接统治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和对土著上层人物的利用，作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它有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善于利用非洲传统社会组织和土著领袖为殖民统治服务。

## 二、拉拢土著上层人物

在征服安哥拉、莫桑比克的过程中，由于遭到非洲人强烈的抵抗，葡萄牙殖民者一度在部分地区打散传统社会组织，剥夺了绝大多数土著酋长原来的权力和地位，施行纯粹的军事控制。非洲人因失去了传统的组织和生活，陷入一片散沙的状态，这对管理和经济掠夺都不利。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开始重视土著上层人物的作用，采取以下措施：

1. 在殖民地设立“土著保护委员会”以保护土著权力，并设有专门的土著法庭，由葡萄牙殖民官吏负责，有两个非洲人助理法官辅助，这两人必须是酋长或谙熟习惯法的人，帮助殖民长官审理案件，把非洲人习惯法和葡萄牙的《民事及刑事犯罪法》结合起来，作出判决。这种作法注意到习惯法的传统作用，注重土著上层人物在司法中的地位，有利于殖民地稳定。

2. 恢复世袭酋长的地位和设置新酋长。在传统社会组织尚存的地方，根据当地习惯，恢复世袭酋长，由他管理非洲人村庄，但前提是必须表示臣服，服从地方殖民长官的指挥；在传统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土著酋长不复存在的地区，则把非洲人按传统模式重新组织起来，设置酋长，人选由殖民当局决定，多由退伍军士、地方低级职员（混血人）充任，他们受到殖民当局的培植，为当局所了解，对殖民当局是完全服从和忠诚的。这种作法明显受到一战后英国

---

<sup>①</sup> Eduardo do Sousa Ferreire,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end of an era (《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一个时代的结束》), London, 1978, p. 39.

大力推行“间接统治”的影响,给殖民统治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减少了殖民当局管理人员薪俸和行政费用的支出,而且使土著社会迅速出现殖民者所希望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非洲人与殖民者之间的直接对抗。土著酋长的地位及享有的有别于普通非洲人的特权(免交土著年税、免除强迫劳动、有少量酬金)使非洲人和混血人中有政治野心的人有了追求的方向,“使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哪怕是一点点的伟大”。<sup>①</sup>因此,葡属非洲的广大乡村长久保持了“平静”,竟成为一片“政治绿洲”。

但是酋长的实际身份已发生了变化,变成殖民当局的代理人,而非受人尊敬的“土著人当局”,他们既无主权也没独立的权力。如果他们未能很好地履行殖民当局规定的职责和布置的任务,就会受到处罚或被撤换。酋长的主要职能是为殖民当局收缴税款和征募强迫劳工。殖民当局利用他们维持特别是基层的殖民统治,而不是为未来非洲人“自治”培养领导阶层,因此直接统治仍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基本特征。

葡、法两国的直接统治貌似相同实有很大差别。葡萄牙直接统治的最突出特点是其宗旨为强迫劳动制服务的。执行强迫劳动制是殖民地上至总督,下至酋长的主要工作,无论是强迫劳工的征召、输送、签订合同契约、发放工资,还是强迫种植作物的种子供应、生产检查、收购等,都由殖民当局一手组织进行,殖民当局动辄出动警察、军队,以武力保证强迫劳动制的实施。这充分说明强迫劳动制的超经济剥削性质,也鲜明地体现“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sup>②</sup>葡萄牙殖民政治因强迫劳动制而涂上了血雨腥风的色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 第三节 “有选择的”同化政策

#### 一、荒谬的“文明人”与“非文明人”的划分

葡萄牙为殖民统治的需要和所谓的“传播现代文明”的白人“使命”，在葡属非洲有选择地推行同化政策，并持续到殖民统治结束。

早期葡萄牙政府一再宣称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均为帝国臣民，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同化土著人。在葡萄牙人与黑人的接触中，首先在安哥拉出现了一批讲葡语、模仿葡人生活方式的黑人，但他们一般都成为殖民扩张的帮凶。例如黑奴贸易中，作为葡萄牙的代理人庞贝罗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见第3章），很多就是这种同化人。

萨拉查上台后，力图建立一个“新国家”，殖民地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宗主国“一体化”，“新国家”里只有“一个民族、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因此要把所有非洲人同化为葡萄牙人。同时，萨拉查政府知道在短时间内同化所有非洲人不可能，只能逐步有选择地进行。于是，所谓“有选择同化”从30年代开始实行。

1929年《殖民地法规》修正案第一次把殖民地居民分为“文明人”和“非文明人”两类，确定对待“非文明人”实行强迫劳动，同时实行文化同化。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法令、法规，说明了同化的途径是通过葡萄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习俗和基督教的影响来达到目的。同化人的标准是年龄在18岁以上，能说葡语，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家庭，纳税，品行良好，无犯罪记录，信仰基督，放弃原来的习俗，采用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等。凡条件具备者，本人提出申请，经检查，殖民当局批准后，发给“同化人”身份证，成为葡籍公民，才可进入“文明人”行列。

“有选择的同化”一直实施到60年代初，实际成果甚微，非洲

人由“非文明人”成为“文明人”的寥寥无几。1950年统计表明,安哥拉400多万非洲人中只有30 089个同化人,570万莫桑比克非洲人中有4 349个同化人,葡属几内亚50万非洲人中只有1 500人。<sup>①</sup>之所以“同化”者寥寥,主要原因在于:

1. 无论是宗主国中央政府还是殖民地当局、白人殖民者,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从殖民地获得经济收益,其注意力放在推行强迫劳动制,掠夺非洲人土地以及防备非洲人反抗等方面。对同化非洲人并无兴趣。白人殖民者普遍认为:非洲人拥有的知识越多,对葡萄牙的统治、掠夺就越不利。多一个同化人,就会少一个强迫劳工,多一个“挑剔的人”。因而殖民当局有意对文化教育投入人甚少,即使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也得不到官方起码的资助。

2. 在实行强迫劳动制的情况下,15岁—60岁的非洲人成年男子每年都面临着被征召,成为各种形式的劳工,根本没有时间接受教育。妇女、儿童除了参加义务劳工以外,还得代替出外当契约劳工的男人在田间从事繁重的劳动,她们也没有可能走进教室。文盲率最高在非洲名列榜首。

3. 由于长期把掠夺的非洲财富以各种方式大量运回葡萄牙,殖民地没有多少经费用于教育,教育水平低下,学校极少,多为初级教育,且只有教会学校和部分官办学校对非洲儿童开放(其余专为白人儿童所设),有机会接受初级教育的人很少。如1936年约有59 949名非洲儿童就读于初级小学,仅占葡属非洲适龄儿童的9%。到50年代末,安哥拉居民中只有8%的适龄儿童入学,莫桑比克为24%,葡属几内亚为7.33%。<sup>②</sup>其中非洲儿童只占少数。能进中学的

---

<sup>①</sup> Eduardo do Sousa Ferrreira,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end of an era* (《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一个时代的结束》), London, 1978, p. 39, p. 115。

<sup>②</sup> Newit Malyn, *Portugal in Africa: the last hundred year* (《葡萄牙在非洲:最后百年》), London, 1978, p. 140。

非洲学生更少,可顺利毕业的廖若晨星。如在安哥拉,1950—1952年间有67个非洲人进入初级中学,没有一个进入高中。<sup>①</sup>1952年安哥拉居民中总共只有37个高中毕业生,全是白人。<sup>②</sup>殖民地没有大学,非洲儿童、青年很少接受教育,绝大多数不会讲葡语,书写葡文,在成为“同化人”这条路上首先过不了语言关。

1961年萨拉查政府迫于非洲大陆形势,进行改革,废除“文明人”与“非文明人”的区别,宣布所有非洲土著都是葡籍公民,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此后同化仅仅表现为对公民权的承认,放弃了文化条件的要求。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对付联合国对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行为的指责,同时也用来对付葡属非洲内部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同化政策的极端虚伪性暴露无遗。

萨拉查政府在宗主国本身衰弱、落后的状况下,侈谈以所谓的“先进文明”去改造非洲,既反映殖民主义者狂妄自大的心理,更是为了制造一种赖在非洲不走的“合法”理论。其实,葡萄牙为维护殖民统治和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极力维持非洲传统社会。它基本上承担不起作为资本主义载体的任务,更没有能力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打破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却一心想在保存落后的生产方式、原始部落、村社组织的同时,高唱要改变非洲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仅从方式、方法而论也不啻缘木求鱼。

## 二、同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应该指出,同化政策还是起到了葡萄牙政府所希望的蒙骗作用:1.它向世界表明葡萄牙力图在非洲建立种族融合、平等的社

---

① B.戴维逊,《非洲的觉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30页。

② *Bender Angola under the Portugese: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葡萄牙统治下的安哥拉:神话与现实》),London, 1978, p. 151.

会,努力改善非洲人生活和地位。这在一段时间里欺骗了国际舆论,以为葡萄牙人在非洲殖民地不施行种族歧视政策,约翰·根室在脍炙人口的《非洲内幕》一书中也根据表面观察得出葡属非洲殖民地只有独裁而无种族歧视的结论。<sup>①</sup>直到60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组织才在国际论坛上揭露真相;2.它造成部分非洲人以为通过学习葡文就可以与白人平等,成为葡籍公民的错觉,麻痹非洲人,客观上起到缓和、转移非洲人不满的作用;3.从长远看,同化政策阻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少数非洲人接受的教育是天主教教义,葡萄牙历史及对非洲统治的合理性,萨拉查的理论,其中部分人逐渐淡薄了非洲人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在他们和广大群众之间出现一道鸿沟。同时,由于同化人的权利与土著入有很大差别,如不必参加强迫劳动,有机会到政府机关、企业工作,有选举权等等。受教育的黑人大多努力使自己成为“同化人”,其追求方向符合殖民统治的需要,在成为“同化人”后,他们顺从殖民当局的安排,不敢在言行上有所背离,在长时间里,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充当殖民当局与非洲人之间的中介。这样,为数很少的同化人很难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中坚力量,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态度温和,反对殖民统治的目标偏低,不能感受到群众反殖民主义的要求,因而不能及时发动,联合广大下层黑人群众。葡属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长时间落后于非洲其他国家,主观条件很不成熟,与同化人的状况有极大关系。

然而,“当殖民地政权允许非洲受教育阶层人数增长时,他们为自己挖下了坟墓,文化意味着反叛和新的希望”,<sup>②</sup>事实并不真如恩马克·安德斯和怀斯特伯雷所说只是由于受教育人数增长,而主要

---

①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下册,第673—674页。

② Enmark Anders and Westbery, *Angola and Mozambique: the case against Portugal*(《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反抗葡萄牙的实例》), London, 1963, p. 140.

是由于在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形势高涨下,葡属非洲的部分同化人大大增加了与外界接触,了解了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受到非洲大陆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启发、鼓励和帮助,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地位、权利受到殖民当局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无法与白人平等,个人出路受阻,这些促使他们重新认识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现实,唤起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追求,从而作出了新的决定,终于举起了反殖民统治的旗帜,开始进入下层联系广大黑人群众,与葡萄牙殖民当局公开决裂,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崛起说明殖民政策在客观上往往会产生殖民主义者意想不到的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的结果。

从葡属非洲整体看,葡萄牙本土的“卢济塔尼亚文化”对非洲传统文化的冲击,影响很小,尤其在广大农村,非洲人对葡语了解极少,更不使用,对葡萄牙历史、地理位置、当前领导者往往一无所知,甚至“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理概念是指什么也不知道,非洲人的意识中部落、氏族观念、村社观念仍占主导地位;在宗教方面,尽管葡萄牙自踏上非洲大陆起就大力传播天主教,伴随英国资本的输入,新教也来到葡属非洲,但非洲人完全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有限。有部分非洲人虽信仰基督,仍保留了对传统神灵的信仰,并把天主教等非洲化,葡属殖民地宗教一直保持着多元化特点。

但是,殖民统治的野蛮落后,殖民掠夺的残酷性已经大大改变了非洲文化的某些思想内容。非洲人喜欢采用传统的文化形式表达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愤懑、痛苦和希望。如安哥拉的宽哈马地区流行这样的歌:我将不把水给白人/我也不把我的葫芦给他们/因为他们杀害我的国王/他们肢解了我的国王/……。<sup>①</sup>在南非金矿的莫桑比克劳工超负荷地劳动,只得到微薄工资,他们唱道:这点

---

① Eduardo do Sousa Ferreira,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end of an era* (《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一个时代的结束》), London, 1978, p. 116.

钱不够我去看妈妈/我们不能团聚/这钱不够/这钱可以用来干什么?<sup>①</sup>类似作品不胜枚举,非洲人还用寓言、口头传说、雕刻等民族形式来表现反殖民主义情绪。

可见在葡属非洲,文化方面出现两种现象:一是葡萄牙推行同化政策,少数黑人放弃传统文化,认同葡萄牙文化;二是与此相对,广大非洲人坚持传统文化,对殖民统治进行“文化抵抗”,这是殖民地文化的主流。

#### 第四节 对殖民地民族独立 风暴的防范措施

##### 一、葡萄牙延续殖民统治寿命的伎俩

20世纪初,在葡属殖民地曾出现一批以同化人、混血人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组织,如“殖民地联盟”“保护非洲权利委员会”“非洲人同盟”等等,这些组织内部不团结,斗争目标仅限于争取同化人权利、稍微改变葡萄牙对殖民地的政策,这些组织未取得广大黑人群众的支持,很快就被殖民当局破坏掉。30、40年代萨拉查个人独裁政权建立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采取高压政策,葡属非洲一度出现“风平浪静”的局面。二战后葡属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意识增强,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活动。从60年代初开始,受整个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形势的影响,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新阶段。

面对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葡萄牙政府采取了各种软硬措施,显示了葡萄牙作为老牌殖民国家的阴鸷狡猾,手段变化多端。

<sup>①</sup> Shubils Ishemo, Cultural Response to Forced Labour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强迫劳动的文化反应和商品生产》), *Social Identities*, Volume 1, Number 1, 1995, 39.

首先,葡萄牙极力打扮自己的“历史悠久大帝国”形象,对于联合国推行的“非殖民化”行动及对葡萄牙提出的要求,采用“不接受、不承认”的抗拒态度。1950年宣布葡属殖民地是“海外省”,不再向联合国的托管理事会递交报告,并且无耻地声明:“我国并没有实行任何类型的什么殖民主义……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民族……我们的国土和人民分布好几个洲……但只组成一个单位……,一个具有同样强烈的民族情感的国家。”<sup>①</sup> 在国际论坛上,葡萄牙大肆宣传不同种族的人“和睦相处”以及葡萄牙带给非洲的“文明与进步”,对国际组织和新闻界完全封锁殖民地的一切真实情况。

其次,为缓和矛盾,迷惑非洲民众,葡萄牙在殖民地进行一系列障人耳目的改革。1951年修改宪法,把海外殖民地改为“海外省”,如上所述,1961年废除土著法,取消非洲人的“非文明人”身份,给予葡籍公民地位和权利;1962年废除土著劳动法,取消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并计划成立帝国内共同市场,在海外省和葡本土间废除歧视性关税限制等等。这些改革只是在形式上作出一些让步,殖民地实际状况没有多大改观。改头换面的强迫劳动制仍使广大黑人不能从事自由的雇佣劳动;通行证继续约束着黑人的行动自由;黑人选举权因文化上限制形同虚设;殖民地财政、金融状况更加恶化,“海外省”在帝国内地位一如以往,仍是地地道道的殖民地。

第三,葡萄牙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是加快向殖民地移民,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经济开发的需要(因为葡属殖民地有的是劳动力)。殖民政府除了鼓励葡兵服役期满后留在非洲外,还用金钱和土地刺激葡农民向非洲移民,宣布每个移民可无偿得到100公顷土地和2000埃斯库多的安家资本,<sup>②</sup> 各“海外省”成立移民局,

---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90页。

② 贺·科普勒《葡属非洲动乱在增长》转引自《今日新闻》1961.3.29。

专门负责安置移民。这样出现了移民高潮。1964年安哥拉约有葡萄牙白人30万,到1974年初已增至60万。<sup>①</sup>白人在殖民地的整体实力大大加强,许多移民加入了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武装队伍。

此外,葡萄牙还竭力利用非洲人内部种种矛盾,破坏民族独立运动。葡采取送年金、津贴的方式促使民族独立运动内部组织、政党的分裂,并授意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组成新政党。安哥拉到1967年时竟出现58个民族主义组织,其中不乏殖民当局扶植和授意成立的“别动队”。莫桑比克在独立前也出现50多个政治组织,各据山头,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民族独立运动的统一斗争和取得胜利的进程。葡萄牙还运用了非洲人打非洲人的一贯伎俩。如在安哥拉,利用部族矛盾,把奥维姆崩杜人武装起来,组成所谓“志愿军”和民防组织,进攻安哥拉北部主要由巴刚果人、姆崩杜人组成的游击队。“到战争结束时,与民族主义者作战的军队中,大约有60%是黑人。”<sup>②</sup>这种作法造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严重困难,对部族间的对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恶劣影响几十年难以消除。

## 二、最后撤退的“最早殖民者”

葡萄牙政府顽固地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打赢殖民地战争”,投入经费和人力已达到它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62年用于殖民地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28.7%,1970年上升到44.4%。<sup>③</sup>1961年葡驻非军队只有几千陆军,到1972年陆军达17.9万,海军1.8万人,还有一支装备有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的空军,驻非军队占葡总兵力的

---

① [英]《观察家报》1974.5.19。

② Newitt Malyn, Portugal in Africa: the last hundred year(《葡萄牙在非洲:最后百年》), London, 1978, p. 230.

③ Edvar do Sousa Ferreira.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end of an era(《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一个时代的结束》), London, 1978, 第42页。



3/4。<sup>①</sup>但是仅靠葡自身力量,承担不了三个战场的长期消耗战,为此,葡积极谋求外界支持,一是打出“冷战”“反共”的旗号,寻求北大西洋公约的军援,二是创造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西方大国在葡属殖民地投资,使其短期内便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以此为饵促使西方大国支持葡保持在非洲的统治权。西方大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和投资利益的考虑,执意支持葡赢得殖民地战争。如美国在1951年与葡签订军援协议,到1968年军援总额达3 179万美元,1969年和1970年每年平均援助100万美元,还帮助训练军官。<sup>②</sup>法国为葡制造直升机50架,其他类型军用机200架,全部用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比利时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sup>③</sup>葡还与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白人政权勾结,获得它们在军事上的支持和配合。

由此可见,葡萄牙善于把政治的、军事的和外交的手段结合起来,镇压殖民地独立运动,致使葡属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的道路变得异常漫长而坎坷。殖民地战争长达14年之久,“这在非殖民化的历史中是个例外,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才有一系列事件可与此相比”。但是,在世界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面前,葡萄牙的各种手法只能使其殖民帝国多苟延残喘几年,长期的殖民地战争激化了葡萄牙国内各种矛盾,1974年4月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萨拉查—卡埃塔诺的独裁政权垮台了,1975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同意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独立,葡属非洲殖民帝国至此寿终正寝。在世界殖民史上出现了最弱的殖民主义国家殖民统治寿命却延续最长的异常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

①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p. 782.

② Mintz William, Portuguese Africa and the west(《葡属非洲和西方》), Manchester, 1972, p. 103-104.

③ 《参考资料》1971.2.26。

## 第十四章 比属殖民地的演变

比属殖民地包括今天的扎伊尔、卢旺达和布隆迪三国,其中历时最长的是扎伊尔(1885—1960),无论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还是比利时政府对殖民地的态度及统治方式的变化,均深刻地反映在这一国家的历史之中。卢旺达和布隆迪原同属德国东非殖民地,1920年转由比利时在国际联盟的委任下进行统治,1946年又由联合国托管,直至1962年独立。考察比属殖民地在几十年中经历的急遽变化,既有助于我们认识殖民主义史上的又一特殊类型,又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独立后仍无法摆脱贫困、战乱与独裁等困扰的原因。

### 第一节 刚果自由邦和“利奥波德制度”

#### 一、殖民主义史上别具一格的“刚果自由邦”

刚果自由邦,又称刚果独立国,于1885年8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她本应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因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被国会授权成为刚果自由邦的君主,由此使刚果实际沦为他的私人殖民地。国王的名字也就成了该时期殖民统治制度的代名词,“利奥波德制度”由此作为一种殖民统治制度的典型被载入史册。

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自由邦君主权的确立在殖民主义史上具有独特性。这一方面是出自1884年以来列强间达成的口头或书

面协定及条约等,这些协议主要规定了刚果自由邦的大致边界和君主权的适用范围,而不是君主权本身;另一方面是通过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参看柏林会议章节),使国际刚果协会这样一种协商性的国际会议组织,最终演变成刚果自由邦这样一个现代国家。而她的主权却落入一名私人君主手中。利奥波德二世称自己是刚果的“业主”,<sup>①</sup>刚果就如同他的私有财产,从而使刚果自由邦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柏林会议的精神。因为按法律而言,比利时和刚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应当没有共同的机构,各自拥有同样的主权。柏林会议的自由贸易精神则被利奥波德国王的专断完全破坏,当国际社会再次呼吁恢复这一精神时,刚果自由邦已是饱经沧桑的殖民地了。

刚果自由邦的中央政府设在布卢塞尔,由国王负责,包括一个由办公厅主任协助工作的国务秘书,一个总司库和三个秘书长,分别主管外交、财政和内政事务。<sup>②</sup>国王在刚果派驻总督,负责统领行政官员和军警。<sup>③</sup>刚果自由邦划分成15个区,每个区设一名专员负责地方事务。由于这种区划往往漠视当地种族的分布,从而减少或削弱了当地酋长享有的传统权威。1886年组建的刚果军队,实际是一支黑人雇佣军,士兵大多来自其它西非国家,由雷昂·诺热上尉任总司令。这支军队是利奥波德制度的忠诚维护者和主要执行者,其担负的责任包括讨伐有叛乱迹象或发生暴动的村庄、抓人质充作壮丁、驻守哨所等等。

1886年设立的咨询委员会旨在协助地方政府,并对送呈布卢塞尔中央政府的措施提出建议。1889年,国王还设立了刚果自由

---

① L.H. Gann & Peter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 Univ. Pr., 1977. p. 262.

②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37—239页。

③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00页。

邦最高顾问委员会,专事咨询和司法职能。国王的许多命令就是由上述在比利时和在非洲的行政机构精心策划、并由在现场的代理人负责执行的。

刚果自由邦的经济制度带有明显的利奥波德色彩。在他看来,给予一个新国家自己的文明,就有权要求得到补偿,即国家应当在其领地内榨取最大的利润。刚果是他的产业,他希望比利时通过他的努力能够从中获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颁布的刚果自由邦宪法(1885年7月1日)确立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规定一切尚未被非洲部落有效占领或开发的土地均属自由邦,<sup>①</sup>由此使中央政府获得对未开垦地的直接开发权。同时也给了其它殖民者一个合法的机会,即可以通过与国王签订租让合同来获得这些土地。1886年利奥波德二世同刚果工商业公司签订了第一个租让合同。后者是由比利时大企业家蒂斯创立的,该公司同意修建从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交换条件是每修建1公里铁路,公司可索取1500公顷土地。为此,该公司获得了10万公顷的土地。这即是租让制的起源。

在1885年宪法颁布之前,刚果的土地属于刚果各村社成员共同拥有的财产,每个村社均有权对土地进行开垦和圈占,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每个村社的成员,可以由年长者根据传统习俗从中调整村社或村民间的土地分配。但1885年的法令实际剥夺了非洲人对土地占有和开垦的传统权利。在此基础上,国家又于1891—1892年接连颁布了三道法令,开始实施“国有制”(Regime Domnial),实际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它宣布国家是一切空地(也称无主土地或荒地)的所有者,“空地包括一切既未被占领、又未被土著开

---

① L. H. Gann & Peter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4. Cambridge Univ. Pr., 1975. p. 169.

发的土地”。<sup>①</sup>国有土地上的产品均属国家所有，禁止非洲人采集橡胶和象牙，除非他们将这些产品出售给国家。此外，国家还借口保护公共秩序，关闭了许多私人贸易站，以达到避开竞争、垄断市场的目的。其结果是只有国家有权采集遍布各地的橡胶和象牙，因为这两种最有利可图的产品均被视作来自国家领地——空地上的产品。实际上，“国有制”进一步剥夺了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自主从事一切生产活动的权利，今后他们只能在属于国家、国王或属于私人公司的领地上劳动，这就为利奥波德制的两大经济支柱——直接榨取制和租让制提供了劳动力的保证。

## 二、直接榨取制和租让制

直接榨取制旨在用一切可行性手段最大限度地搜刮非洲的物产。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让非洲人交纳实物税的办法，即强迫他们向政府和公司交纳实物，主要是橡胶、象牙和棕榈油等，实物税额因地而异，由地方行政官员确定。国家对后者的奖惩办法与其上交的实物税挂钩，税吏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他所收集橡胶中提取的2%佣金。<sup>②</sup>这就使地方行政官员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和财富取决于税收的多寡，他们因此可以任意提高税额。为了达到难以完成的税额，他们常常动用军警和酷刑对非洲人施压，甚至屠杀整个未完成税收任务的村落居民。非洲人有时因交纳的橡胶质量不好，就被迫吞吃那些橡胶。除榨取实物以外，非洲劳动力也是直接榨取的对象，殖民当局强迫非洲人为国家、国王或私人公司采集实物、运送货物和修筑公共工程，并承担各种名目的徭役。当时由于自行车、摩托车等轮胎工业的飞速发展，造成对橡胶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1. p.265.

<sup>②</sup>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02页。

的大量需求。公司为了牟取暴利,往往不是雇佣、而是强迫刚果人去森林收割橡胶。利奥波德受利润的驱使,也将自己的采地租让给私人公司经营。1895—1905年是强迫非洲劳动力为租让公司干活的最盛时期。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环境,加上严厉的酷刑,使刚果的橡胶浸染了非洲人的鲜血,“血橡胶”夺走了许多刚果人的生命。1903年法令规定土著居民每月必须为国家劳动40小时,名为劳动税(又称人头税),实际上非洲人往往要劳动20—25天才能完成定量。<sup>①</sup>直接榨取制的残暴行为遭致非洲人的抵抗,据统计1892—1903年在刚果出现的暴力事件远远超过了占领时期(1885—1891年)。

租让制始于1886年国王同刚果工商业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即国家把空地租给商业公司,后者获得一定的特许权,并代理国家征收国有土地上的物产和劳动税或等量的实物税。作为交易,国家拥有公司一半的股票,因此可以分享一半的红利。此外,租让公司通常应向国家上交25%左右的利润。至1906年,刚果自由邦已有85家特许的租让公司,总资本为1.83亿法郎。<sup>②</sup>利奥波德之所以推行租让制,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开发刚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作为君主,他个人独木难支。而比利时政府因刚果的“独立”性质无需承担开发的责任。国王只好通过推行租让制来获取财源,并破例要求增收10%的进口税,致使柏林会议禁止关税的原则难以维持。

### 三、“利奥波德制度”的曝光

随着利奥波德制度的残暴和血腥手段陆续被揭露,国际社会

---

①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02页。

② Zaire: A Country Stud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1979, p. 30.

发起了一场讨伐这种制度的论战。先是英国保护土著协会要求国会讨论已经发表的有关刚果形势的文章，由此推动了刚果改革协会的成立，它的使命是进一步搜集资料，以便控诉和揭露掠夺刚果“血橡胶”所使用的方法。1903年，英国政府责成其在利奥波德维尔的领事 R. 凯斯门特报道刚果的实情。后者在致刚果副总督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责说：“这种对全体人民剥削的制度，只有通过劳动力及其非法的劳动才能获得成功。人民被假设成处于自由的境地，并受到良好的法律保护。但实际上到处不存在这些法律，只有强迫劳动的情形无所不在。当一个村社无法满足当局所需要的印第安橡胶、食品或其它东西时，它就可能被冠以‘反叛国家’的罪名受到处罚，全体人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所遭受的待遇比我所知道的最坏的国家还要坏”。<sup>①</sup>

凯斯门特的报告受到公众的关注，国际社会的批评对利奥波德二世的压力增大。作为回音，1904年利奥波德国王指定一调查委员会考察刚果实情。后者于1905年公布的报告，一方面提到了刚果自由邦在交通、通讯和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重新制订土地法、禁止卫戍部队的冒险行动、撤销来自公司的强制性权力等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刚果自由邦颁布了1906年新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凡属因长管辖、由土著居民耕种或按照当地的习俗以某种方式经营的土地，一律作为土著土地。

皮埃尔·米尔撰写的“利奥波德的刚果”，以及掌握丰富材料的莫雷尔等人，对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他们对刚果自由邦的控告均附有详细的国家和特许公司的代理人在雇佣黑人采集橡胶和象牙时所施行的残暴手段。加上刚果经济继1895—1900年橡胶和象牙等产量达到高峰后开始走下坡路，致使国王处于道义和财政两难境地，这为比利时取代利奥波德二世接管刚果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1. pp. 269—270.

提供了前提。

早在 1890 年,利奥波德为换取政府 2500 万法郎的贷款,已授权比利时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可以吞并刚果。1892 年,国王又违背协定,擅自将 16 万平方公里的刚果抵押给了银行家。1895 年,他因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签署了租让刚果给比利时的条约,政府为此又追加了 700 万法郎的贷款。结果该条约因公众舆论的反对而被政府撤销,反映出当时比利时公众不愿承担殖民地重负的态度。

然而,刚果自 1890 年以来的“橡胶奇迹”,特别是在 1894—1996 年橡胶出口翻了四番,总产值达 1 800 万法郎,这不仅克服了刚果自由邦的财政危机,而且大大改变了公众的态度。比利时商业部率先提出了吞并的要求。1907 年,国王又与比利时政府签署了新的租让条约。1908 年 9 月 9 日,上院接受了吞并的最后约定。同年 10 月 18 日,国会通过法令,即著名的《殖民地宪章》,提出治理新殖民地的原则。1908 年 11 月 14 日,刚果自由邦终止存在。翌日,刚果盆地大片领土成为比属殖民地。

## 第二节 比属刚果的改革和比利时对 卢旺达—乌隆迪的统治<sup>①</sup>

### 一、《殖民地宪章》

刚果自由邦演变成比属殖民地,并非出于利奥波德国王的自愿,而是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比利时政府之所以接管利奥波德对刚果的统治权,主要是来自殖民地的利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sup>①</sup> 在德国、比利时统治时期称卢旺达—乌隆迪(Territoire du Ruanda—Urundi)。1962 年独立后,分别称卢旺达(Rwanda)、布隆迪(Burundi),为行文方便,以下乌隆迪均称布隆迪。



《殖民地宪章》的基本原则是阻止在殖民地出现类似刚果自由邦的国王专制统治，“保障刚果人的权利和自由”。为此，比利时政府对利奥波德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做了一些改革：政治上，宪法仍保留了国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作为国家的元首，他有权任命殖民地官吏，可以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但他的全部任命和法律效力均须获得殖民地委员会的审批方能奏效。殖民地委员会是根据宪章第 24 条成立的，由殖民大臣负责，包括 14 名资历深厚、偏于保守的成员组成，他们大多在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播等领域颇有经验。国王的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委托给总督代行，总督在刚果代表国王，拥有对整个殖民地的行政和军事领导权。整个比属刚果先后共有 10 名总督，总督由副总督、督察官、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协助工作。此外，宪章第 6 条规定设立不归总督领导的保护土著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土著事务。<sup>①</sup>

经济上，比利时政府本着在刚果努力恢复自由贸易和独立劳动者的原则，在 1910—1912 年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坚持土地“国有制”的同时，废除了禁止非洲人在其所居住地区采集和出售天然物产的法律，也废除了为上交国家利润非洲人所必须承担的收割和种植规定作物的义务。《殖民地宪章》声称在比属刚果将没有一个人因为其它私人的或公司的利润而被迫劳动。1910 年政府还废除了劳动税和其它徭役，并将实物税改成货币税。通过这些法令，比属刚果到 1912 年基本停止了强制性交纳橡胶和其它天然物产的现象，自由贸易的体制逐渐得到恢复。但这种自由贸易主要施行于外国公司和私人企业而不是施行于非洲人的。因为后者既没有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产品，而他们在“国有地”上的强制性劳动实际上并没有伴随那些禁令的颁布而终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利奥波德国王统治时期的租让制并没有被

---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339—340 页。

禁止。相反,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看,它在比属殖民地时期均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26—1929年比属刚果公司的企业总数由4500家增至6000家,投资额在1919—1930年期间增加了10亿金马克。<sup>①</sup>这说明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同比利时的刚果殖民地之间并未出现断层,它们在许多方面仍一脉相承。如税收制的改革并非出于纯粹的财政需要,而是充作迫使非洲人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手段。1917年2月20日颁布的强迫种植令要求非洲人种植可供出口的作物,类似刚果自由邦时期的直接榨取制,农民并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劳动者。然而,两者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最终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命运和方向。

比利时的政策理论上是尊重非洲人酋长以及非洲当地领导人的权威,允许非洲人按自己的习惯法来治理国家,除非某些习惯法被视作破坏公共秩序或不利社会发展时才受到禁止。他们期望酋长能够起到联系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作用。鉴于此种理论,1910年5月10日比利时殖民当局颁布了将土著居住地划分成酋长区的命令,其地界由地区专员根据传统习惯确定。酋长也根据当地习俗任命,并由殖民政府正式授权。他们领取国家的薪金,负责维持公共秩序,执行收税和人口普查,征募劳工用于公司经营的矿山和种植园,以及修筑道路、桥梁、河道等。许多被任命的非洲人酋长已有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倾向”,他们易于同殖民当局合作,充当其代理人,而不是以“土著人当局”的身份出现。他们的传统权力受到削弱、甚至被剥夺,因而他们在土著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相对较弱。许多充当殖民当局魁儡的酋长遭到当地人民的拒绝,导致其在执行必要的职能方面效率非常低。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几乎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刚果人传统行政机构的职能早已今非昔比,受

---

① A.阿杜·博亨主编:UNESCO《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1935年》vol. 7,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303页。

到严重削弱,这也是导致比利时采取“家长主义”统治的原因之一。

## 二、路易·弗朗克的改革

1920年,比利时殖民大臣路易·弗朗克(1918年11月21日—1924年5月11日)在考察殖民地后,提出了关于土著政策的基本轮廓,关于组织酋长区、建立土著法庭的初步指示,进一步改革比属刚果的行政体制。他把一战后因行政人员匮乏而数目激增的酋长区合并成几个防区(sector),选出一名酋长担任防区首领,其余酋长服务于防区议会,以保持他们的特权。防区首领通常是富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但并不是非洲人想要的或需要的人。路易·弗朗克的改革旨在让非洲人管理本国事务,因此强调在行政管理机构及各部门中广泛使用非洲人。但又要求选出的非洲人应当是欧洲化的或“非非洲化的”(de-Africanized),<sup>①</sup>即应当同传统的非洲政治相脱离的殖民地行政官员,他们执行的是比利时殖民当局的行政命令。比属刚果史学家罗杰·昂斯泰指出:不管出于什么意图,自本世纪20年代起针对非洲人的政策是趋向同传统社会接近规则,但这不是建立令非洲人满意的地方政府体制。<sup>②</sup>这种发展趋势到3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经过路易·弗朗克的改革,比属刚果的酋长人数从1917年的6095人减至1938年的1212人。<sup>③</sup>与此相应的防区数量却在稳步增长,自1922年他在比属刚果东部省建立第一个防区后,政府于1935年12月5日又颁布了在整个殖民地普遍推行防区的法令。1935年在比属刚果境内出现了57个

---

① F.Scott Bobb,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Zaire*,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Metuchen, N.J. & London, 1988, p.88.

② *Zaire: A Country Study*, pp.34-35.

③ A.阿杜·博亨:UNESCO《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 vol. 7,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64页。

防区,1940年增至383个,1945年498个,1950年多达517个。<sup>①</sup>路易·弗朗克的改革基本奠定了包括比属刚果和卢旺达—布隆迪在内的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

随着殖民地政治统治制度的建立,殖民地经济体系也在欧洲资本与非洲劳动力的结合过程中形成,其中强制手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强迫种植制和定额征工制的实施,促进了比属殖民地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比属刚果在20年代进入了经济繁荣期,其中采矿业处于繁荣经济的首位。出口增加,铜矿产量增加:1919年2.3万吨,1925年8.9万吨,1936年9.75万吨。<sup>②</sup>农产品出口在1920—1950年仅次于矿产品出口,主要出口作物是棉花。此外,铁路建设在发展和开发殖民地的财富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但30年代的大萧条使这种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特别是初级产品出口市场的殖民地经济难以自持,大批失业劳工流向城市造成的贫困化,严重威胁到农业社会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

1934年颁布的土著土地法,是在1906年土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关于“无主土地”的法律。为了防止非洲人或外国公司的肆意侵占,法令明确规定对无主土地的调查需经专员决定,并由当地的行政官员在有关土著的陪同下先进行调查,然后由地区专员和检察官予以核实。土地经过调查确认为无主后,即可归入国有土地的范畴。国有土地的一部分用作修路,另一部分则租让给私人公司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果的经济又有了迅速发展。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量均有很大增长,但这首先是增强了欧洲工业社会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而已。非洲农民的命运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

---

① Brausch, Georges, *Belgium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go*, London, Oxford Univ. Pr., 1961, p. 42.

②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土著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比属刚果、甚至整个比属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看,是政治上趋向自治或独立、经济上受制于宗主国。因为殖民地的政治体制逐渐培养出一批能够或有意识管理自己国家的非洲领导人,而非洲人民不断卷入为市场生产的工矿企业或农业产品体系之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造成殖民地的贫困使它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这种趋势不同于刚果自由邦的根因在于利奥波德制在经济上对黑人的过度压榨,以及在政治上对黑人的极端忽视。

### 三、比利时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统治

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的历史与刚果不同,她们不是在欧洲的柏林会议上绘制的,而是一直幸存到19世纪后期的两个独立国家。先是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接着是德国殖民者的入侵,才使卢旺达—布隆迪变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且于1899年正式归属德国东非殖民地。同年,德国在此设立了军事防区,殖民统治制度基本同于德国在坦噶尼喀的统治,只不过是注意到了利用欧洲传教士对当地人进行“教化”,并为殖民当局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卢旺达—布隆迪。战后,德国于1919年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声明放弃德属殖民地。1921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根据盟约第22条决定由比利时委任统治卢旺达—布隆迪,1922年正式任命。1924年比利时正式接管卢旺达—布隆迪,其行政机构同比属刚果联合。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托管事务委员会又于1946年决定将卢旺达—布隆迪交给比利时托管,直至1962年两国宣布独立时终止。比利时对卢旺达—布隆迪将近50年的统治,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上,比利时接管卢旺达—布隆迪后,继续沿用德国利用传

教士的统治方式,同时将一战后颁布的刚果殖民地法令全部运用于卢旺达—布隆迪,包括强迫种植制、征募劳工制等。由于卢旺达—布隆迪存在着尖锐的种族矛盾,所以,传教士和殖民政府的偏倚态度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在布隆迪,由14%的图西族人统治着85%的胡图族人。在卢旺达,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数比例与布隆迪相同。比利时殖民当局为加强控制,曾打算以胡图族酋长来取代当权的图西族人,但教会担心局势动乱会威胁其自身的利益,因而极力反对这种做法。1930年克拉斯主教宣称“教会反对任何企图排除图西族人的意图”,并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比图西族人酋长更适宜、更主动”。<sup>①</sup>殖民当局接受了教会的意见,取消原先的打算。二战后,胡图族人的斗争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西方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团转而同情胡图族人。1955年,卢旺达的代理主教斐罗就职时,公开宣布“教会支持胡图族人的愿望”。此后,天主教各教会同比利时当局密切配合,最终使胡图族人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但新教则采取了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支持图西族人,从舆论和物质上给予图西族人支持。教会的意见分歧,导致卢旺达独立后不久即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残杀,据估计1963年的冲突有2万人丧生。<sup>②</sup>

经济上,1925年比利时当局在卢旺达—布隆迪境内实施试验性的“咖啡方案”,要求每个酋长必须种植半公顷咖啡。当二十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刚出现之际,该方案就以制度方式固定了下来,出笼了强迫种植制。卢旺达的咖啡出口量在此期间得到稳步增长:1929年50吨,1932年100吨,1935年375吨,1936年1150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各国宗教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5页。

②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1996,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p.752.

吨,1937年达2 000吨。<sup>①</sup>

1926年,比利时殖民政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把在卢旺达—布隆迪的征工垄断权授予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1930年已有7 300名卢旺达—布隆迪的成年男子在刚果,其中在加丹加矿区工作的就有4 000多名。另外,由于1928—1929年出现大饥荒,约有2.5万卢旺达人移居乌干达。劳工大批外出的结果是,卢旺达—布隆迪经济极端落后,对外贸易微不足道,1930年仅700万比利时法郎(约36万英镑)。<sup>②</sup>

接连不断的种族矛盾,缺乏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再加上卢旺达—布隆迪本身资源的匮乏,使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这不仅影响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滞后,而且造成两国独立后的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可见,比利时半个世纪的委任统治和托管,除了将行政体制转变成现代国家体制之外,并没有对这两个国家做出什么建设性的作用。

### 第三节 比属刚果的经济“开发” 和“殖民福利制度”

#### 一、在国家、公司、教会三结合政权下的“开发”

比利时在19世纪后半叶已完成工业革命,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参与非洲殖民化的进程,因此在刚果殖民地的所有领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利奥波德国王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开发刚果殖民地所体现的热忱带有资本家所具备的贪婪心态,即“寻求廉价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市场,以克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

---

<sup>①</sup> A. 阿杜·博亨:UNESCO《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vol. 7,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9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4页。

所带来的利润率普遍下降的状况”。<sup>①</sup>刚果的辽阔地域、丰富矿藏及天然的农林资源，正迎合了利奥波德开发刚果的勃勃雄心。从表面上看，他的个人野心似乎与国家资本主义无关。实际上，他集国家元首和大资本家于一身，在 1885—1908 年统治刚果自由邦时期就已经开创了国家与垄断资本家结合经营殖民地的先例，即通过血腥的利奥波德制度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刚果经济的“开发”结合在一起。

1908 年后，比利时政府肩负发展宗主国经济和边缘地区经济的重任。在殖民地，它一方面继承了利奥波德的遗产——租让制，继续同垄断资本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为了在殖民地获取稳定的利润同样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比利时在刚果建立起国家、公司和教会三方结合的政权，即国家的“家长式统治”、垄断资本家的“温情主义”和传教士的“文明使命”，联手经营大于比利时 80 倍的刚果殖民地。三方利益虽然各有侧重，但沆瀣一气，相辅相成。

首先是国家采用“家长式”态度来对待其殖民地，并制订出与此相应的殖民统治政策，包括殖民福利制度。所谓“家长主义”就是特指比利时统治其非洲殖民地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宗主国把非洲人视作“儿童”，认为他们善良而又胆怯，没有节制，不能承担过多的权利和责任等等，故应对其进行道德观和基督教价值观的教育，需要他们勇敢地承担本地区的责任，使他们“文明开化”，掌握基本的识字本领，并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让他们中间比较聪明的人获得诸如办公室职员、助教、助理护上等职位，但绝不是将非洲人培养成政治独立的领导人或决策者，因此，他们需要接受比利

---

<sup>①</sup>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4, pp. 166 - 267.



时“家长”的帮助或佑护，而不是要求成为自由人。<sup>①</sup>为此，殖民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法规，包括土著土地法（1933年）、尊重酋长制（1910年）及后来的保护工人法（1942年）、规定老年保险金制度（1942年）、工伤事故抚恤办法（1945年）、家庭补助金办法（1948年）等，<sup>②</sup>在50年代付诸实施，由此建立起一套殖民福利制度，体现了殖民当局的家长主义观念。

垄断资本家的“温情主义”源于20年代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雇佣劳动力政策。人力资源的匮乏一直是困扰比属刚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战后在比属刚果的矿区和铁路修筑工程中更加突出。因为战后的投资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经济的恢复也依赖于矿业和交通运输的率先发展。但政府已废除了刚果自由邦时期的劳动税和其它徭役，各大公司为此只能自谋良策。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决定从1926年开始对劳工居住区进行整修，在一年之内该公司用于劳工的费用就增长了40%。改善劳工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包括可以带家属居住在矿区，这在当时中非地区已属最佳的生活条件了，因此吸引了许多工人与公司签订了至少是3年的合同。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到1928年后雇工就开始趋向正规化，并向工人提供包括工余活动、宗教和教育等在内的经费，从而获得了稳定的劳动后备军。1930年该公司居住区的人口出生率首次超过了死亡率。<sup>③</sup>其它公司也纷纷效仿，从中发现为其工人及其家属“提供食品、衣服、医疗保健和舒适的环境，满足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渴望，向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经费等，并不需要法

---

① Cf.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Zaire, p. 170. Ruth, Slade, The Belgium Congo: Some Recent Change, 1960. pp. 1-7.

②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90—391页。

③ A. 阿杜·博亨：UNESCO《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30—1935年》，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95页。

律的强制”，就可以达到征工的目的。<sup>①</sup>一些大公司也仿效政府的做法，向工人支付子女津贴，疾病和工伤救济金，以及退休养老金等，将工人视作他们的私人财产。这也反映出一种“家长式”的态度。

基督教的“文明使命”在刚果自由邦时期就开始进行，当时主要是天主教会，他们基本还处于拓荒者的阶段。1906年，刚果自由邦同梵蒂冈天主教廷订立盟约：在刚果宣教的传教士可以得到教皇的一些资助，为刚果人开办学校，同时由国家无偿拨给他们土地。每个罗马天主教传教站有资格获得200公顷的赠地。<sup>②</sup>由此，天主教开始在刚果同时履行布教和开办学校的义务。在整个自由邦时期(1885—1908)，天主教会共获得14 425.44公顷赠地，而新教教会所得为零。<sup>③</sup>比利时政府接管刚果后，天主教会的作用和影响均有所增大。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20年中，天主教会得到比利时政府和刚果行政机构的双重支持，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活动领域，尤其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5—1926年，比利时政府计划通过建立教会学校来训练非洲人，以便为那些欧洲企业输送技术人才。与此同时，新教也开始在刚果立足，尽管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如天主教。据统计，至1937年，天主教会已获得赠地33 716.46公顷，新教教会只有3 700.47公顷。<sup>④</sup>

促使上述三者结合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不足，这是他们在开发刚果殖民地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殖民国家而言，要统治90多万平方英里(约235万平方公里)的刚果殖民地，存在严重的行政人员短缺问题，当时在刚果的每个行政部门不得不看顾两倍于比利时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的合作就

---

① The Belgium in Congo: Some Recent Change, p. 4.

② Markowitz, Marvin D., *Cross and Sword*,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1973. p. 49.

③ Markowitz, *op. cit.*, p. 44.

④ *Ibid.*

变得相当重要。因为有许多传教士生活在丛林地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与刚果人发生联系。1935年在刚果的天主教士和修女共2 326人，是当时在殖民地服役的比利时行政官员的4倍。<sup>①</sup>国家完全可以任用他们照看一些殖民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此外，主要由天主教党执政的比利时殖民大臣和刚果总督，在整个比属刚果时期总是有意同天主教会合作(利庞总督除外)。

就垄断资本家而言，许多原先是靠利奥波德的直接榨取制获得劳动力的。到比属刚果时期，他们主要依赖国家的税收制和强征劳动力等法令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后来还有些是通过“温情主义”来解决的。他们知道国家能对利润起保护作用，也知道天主教会同布鲁塞尔和利奥波德维尔殖民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教会对殖民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参看上一节卢旺达部分)。所以，他们常常迎合教会的喜欢。政府也默认天主教会同大公司的这种合作，特别是同比利时总公司的合作。在新教徒眼里，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宗教垄断整个刚果的局面，致使殖民政府处于谦卑的从属地位，而不是作为一名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仲裁者站在远处旁观”。<sup>②</sup>尽管这是出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新教徒之口，但也多少反映了公司和教会在当时结合的情形。而政府之所以默认，是因为它本身需要这样的结合体制，既能支撑其殖民地的财政开支，又能保障其行政命令的施行。反之，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税收等行政手段，保障“开发工作”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正常运行。

经过国家、公司和教会半个世纪在开发比属刚果中的合作与努力，这块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从利奥波德国王的君主制到比属刚果时期殖民官僚制度的引进，同当地的首长制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殖民地国家的

---

<sup>①</sup> Markowitz, *op. cit.*, p. 26.

<sup>②</sup> Markowitz, *Marvind*, *op. cit.*, p. 42.

政治体制,基本奠定了独立后的行政体系;经济上,殖民地受到了外来的货币经济的冲击,作为边缘地区被卷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其经济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又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文化上,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结合,培养出一批既不同于欧洲人、又与非洲传统文化相脱离的“开化人”(évolués),他们引导了刚果殖民地其后的发展方向。

## 二、三结合“开发”的成果

至于开发的成果应该说既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又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首先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破坏。刚果自由邦时期的无主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农民对公共土地的使用和占有权。1917年开始推行的强迫种植制,使农民卷入了既不稳定、又不平等的世界市场。比属殖民地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以及征募劳工制,一方面打破了村落之间的隔阂与孤立的状态,形成了流动劳工队伍;另一方面因大批青壮年被征用于厂矿和种植园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使农村人口减少,土著土地荒芜。与农村人口萎缩的状况相反,城镇人口开始急速膨胀,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在垄断公司的“温情主义”诱惑下,在国家的“家长主义”庇护下,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强制性的法律和经济手段压力下,直接依靠工资生活的刚果人数增加。据1958年统计,有农业工人31.2万人,矿工8.7万人,建筑工人10.4万人,运输工人7.7万人,其它工业部门的工人10.1万人,商业职工6.8万人,办公室职员4.5万人,杂工30.3万人,累计109.7万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sup>①</sup>

其次是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由于土地贫瘠,耕地不足,刚果人经常面临种植的作物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困境。比利时为此在1933年设立了刚果农艺研究所,旨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

---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24页。

术,加强作物的精耕细作,保护肥沃的土壤。农民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土著农民机构。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一些作物产量增加。如罗伯斯咖啡产量由每公顷 478 公斤提高到 1 100 公斤,玉米由 1 000 公斤增至 2 000 公斤,棉花由 200 公斤增至 500 公斤。<sup>①</sup> 1950—1955 年期间,国民收入当中非洲人经营的农产品产值增加了 39%,由 20 亿法郎增至 30 亿法郎,同期非洲人的农业收入由 81 亿法郎增至 120 亿法郎。<sup>②</sup>

比属刚果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国际资本和非洲劳动力的合力经营下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开发。到 1950 年在刚果的总投资额为 340—380 亿法郎,其中 250 亿法郎被控制在与国家联合的四大财团手中,即比利时总公司、昂潘、康米尼埃和布鲁芬纳公司,而它们最大的投资领域就是交通运输和矿业两大部门。如表所示:<sup>③</sup>

**部门和财团之间的资本分布(单位:10 亿法郎)**

	比利时 总公司	昂潘	康米尼 埃	布鲁芬 纳	财团总 额	刚果总 数
交通运 输	2.8	0.40	0.21	—	3.41	3.9
矿业	1.6	1.10	—	—	1.70	2.0
工业	0.5	—	0.03	0.05	0.62	1.2
农业	0.1	1.04	—	0.02	0.16	0.5
商业	0.2	—	0.03	—	0.29	0.3
不动产	—	—	—	—	—	0.1
金融业	0.05	0.04	—	0.10	0.20	0.3
总数	5.35	0.58	0.27	0.17	6.38	8.3

资料来源:比利时上议院殖民地委员会关于 1934 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上议院会议公报 1933—1934 年,国家档案第 85 期,布鲁塞尔 1934 年。

①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369 页。

② 同上书,第 369—370 页。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4, p. 183.

由此可见,交通运输的投资居于首位。刚果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于1898年建成,以后又修建了从刚果河上游到坦噶尼喀湖以及从开赛河通航终点到加丹加中心的铁路,两线在卡米纳连接,全长3500公里。<sup>①</sup>公路网是一战后发展起来的,至独立时全长约14万公里。1936年,比利时同刚果之间的国际航班开通,国内有航线网全长3.5万公里。

再次,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会的作用。初期所建的学校通常坐落在传教站的旁边,有的平时用作学校,星期天就用作教堂。1908年后,比属刚果开设了官办学校,是为培训政府的辅助人员和应其它欧洲人的教育需要而设的,教师均为基督教士,他们用法语授课。据1920年的统计,官办学校有1861名学生,天主教会学校有10万名学生,新教教会学校有8.5万名学生。于是,比利时政府在1924年设置了一套课程,凡遵行该课程者均可得到政府的拨款。在当时所设课程中法语并没有普及。1925年,比利时鲁汶大学在刚果设立一项医学基金和一个农业中心。到50年代,比利时政府才开始考虑建立高等教育机构。1954年正式成立了洛瓦宁大学,1956年又在伊利沙伯维尔创办了国立大学。1959年7月14日,比利时法律承认刚果各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与比利时各大学的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sup>②</sup>

比属刚果的卫生保健工作较其它国家突出,该项经费占到刚果全部预算的12%。早在1889年,总督府所在地——博马就设立了第一所医院。同年在利奥波德维尔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室。1906年又在布鲁塞尔开办了热带医学校,开始给刚果护理人员授课。此外,还有一些私人企业也设立了医疗机构。1930年由王后

① 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年以后的非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3页。

②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99—405页。

捐款、政府每年补贴的伊利沙伯王后土著医疗救济基金会成立,旨在加强某些病情严重地区的工作。总之,由于教会、政府、企业和个人多方努力,刚果的文教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从1931—1933年间,死亡率降低14%,出生率提高10%,人口增长率随之从6.5%升至12.8%。<sup>①</sup>

上述比利时开发刚果殖民地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均是建立在非洲人付出痛苦代价的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给予的殖民福利,实际难以补偿刚果人所付出的劳动、血汗甚至生命。一切进步都凝聚着刚果人的奉献,譬如铁路的修建、农矿产品的开发等等,都离不开非洲劳动力。在殖民化的进程中,非洲人与殖民者共创了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文明,这才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最深刻的影响。

#### 第四节 “绿洲”中滞后了的民族运动

##### 一、“开化人”和良民证

二战对欧洲主要殖民帝国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欧洲,比利时、法国与荷兰本土被德国占领,比、荷政府流亡到英国,法国的维希政府同德、意法西斯妥协,以致在法国海外的一部分领土掀起了反投降运动,即自由法国运动。英、美因此认为有义务接管法国的其它一部分海外领地。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所以,除了英帝国,其它殖民帝国均处于崩溃的边缘;在非洲,殖民地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黑人士兵在战争中获得经验,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就刚果形势而言,二战即将结束之时,刚果开始摆脱与非洲其它地区的隔阂,但并未触动殖民政府的“家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98页。

长制”。“独立”、“自治”这些词在当时毫无意义，刚果人迫切需要的是社会改革，要求提高土著的生活水平，在比利时和刚果人之间实现和平与和睦共处。<sup>①</sup>当时有许多观察刚果形势的明智人士已经注意到了“开化人”的社会地位将成为该殖民地的主要问题之一。所谓的“开化人”可以大致定义为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刚果人，能够成功地融入殖民者所创造的新世界，诸如商业界、知识界的非洲人士，其代表有牧师、男护士和教师等。但“主观的自我意识必须包含客观的成就”，<sup>②</sup>即“开化人”不是非洲人自封的，而是殖民地社会存在的一个标准。

二战后，刚果“开化人”大量出现，逐渐形成一个阶层。他们生活 在城市，与在农村的同胞截然不同，与传统分离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他们创办了《刚果人之声》月刊，表达自己不同于广大刚果民众、希望更靠近欧洲人的心声。<sup>③</sup>这种态度不同于其它非洲民族要求独立的心声。究其原因，这与比属刚果有限的教育制和长期的“家长主义”统治有关。

在教育方面，比利时主要资助罗马天主教会建立国家机构，但主要是创办初等教育。他们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刚果居民的教育程度能够齐头并进，以防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据皮埃尔·里科曼斯(1934—1937年任刚果总督，二战后出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比利时代表)亲口说，1955年法属西非有一千名青年人在法国学习，而比属刚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比利时学习，但他们上小学的孩子比法属西非多十倍。<sup>④</sup>这种有限的初等教育造成的结果是这个国

---

① Lumumba, Patrice. Congo: My Country, Tr. by Graham Heath. London Mall, 1962. p. 156.

②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2, 1970. pp. 194-195.

③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5, p. 197.

④ 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年以后的非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3页。



家在独立时缺少干练的领导人，这也是其民族运动比赤道非洲其它国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利时殖民当局已经注意到了“开化人”地位问题，它以“家长式”的态度事先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1948年，殖民当局开始实行的“良民证”制度规定：年满21岁的刚果人都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和习惯来表明自己真诚希望接受进一步教化”，即归化于比利时文化和接受殖民价值观念，<sup>①</sup>凡达到要求者均可获得良民证。而实际颁发的数量并不多。至1955年底，一共颁发了884张。<sup>②</sup>许多非洲人为了得到良民证他们不得不忍受带有屈辱性的严格审查。<sup>③</sup>他们拒绝当局颁发良民证时的专断做法。

1952年，比利时殖民当局又颁布了“注册”(immatriculation)新法令。凡接受注册者都是受过教育的、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非洲人，他们已习惯欧洲的劳动制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已同传统社会结构相脱离，从而归属“开化人”的阶层。<sup>④</sup>但这种注册并不能消除其所受的社会歧视，因为不管法律地位如何，他们仍是非洲人。他们自二战结束以来就要求政治上参与政府、经济上同工同酬的权利。在整个50年代，比利时政府响应了他们的要求，试图在殖民地减少非洲中产阶级和欧洲白人在法律和教育方面的差别。但许多欧洲人反对同化政策，如刚果总督佩蒂隆明确宣布“比利时刚果的政策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同化，而是协作”。<sup>⑤</sup>

1953年，比属刚果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歧视政策，实际上仍处处存在。“开化人”经常感到自己的地位不如欧洲人，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渴望掌握欧洲人的技术，接受高

---

① 巴兹尔·戴维逊：《非洲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5—316页。

② 同上。

③ Zaire: A Country Study, p.38.

④ Ibid, p.38.

⑤ The Belgium Congo: Some Recent Change, p.20.

等教育,吸收西方的文化,从而能被欧洲人接受。但后者常常是怠慢甚至嘲笑他们的努力。

1957年,殖民政府为便于行政管理,先后颁布了关于组织刚果城市和土著管理区的法令。<sup>①</sup>前者引进了若干城镇组成城市的概念,后者赋予土著管理区一个扩大了的新概念,从而使该行政实体除了有传统习俗的纽带之外,还存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

比利时殖民政府上述这些渐进的殖民化和家长主义政策是刚果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比属刚果内部存在的部族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也是刚果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缓慢的原因。

比利时当局要求非洲人按所属的族性填表,这便于非洲人滋长同一族性的概念。此外,城市化进程也是促使非洲人增强族性意识的重要因素。许多移居城市寻找工作的刚果人往往聚集在离其家乡不远的城镇。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城镇同其它村落的非洲人接触,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从而打破传统社会的隔阂;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本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开始感受到本族与他族存在的差异,从而促使他们形成以族性为基础的联盟。如卡萨武布领导的“刚果人协会”就是代表巴刚果族的单一的种族集团。许多以种族联盟的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组织,在加强非洲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成广泛联盟的同时,也助长了不同族性集团之间的矛盾。譬如,当一个族性集团的成员拥有该联盟领导权时,常常会引起其它族性集团的嫉恨。因此,为了维护或提高自己族群的利益,他们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统治精英,由此妨碍了刚果全民族意识的形成。即使是当时卢蒙巴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刚果民族解放运动”也因此分裂。刚果这种脆弱的民族主义易受比利时“家长式”统治的麻痹,后者用“比利时——刚果共同体”意识取而代之,

---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56—358页。

造成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滞后。

## 二、“家长式”统治的崩溃

随着“开化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他们开始憎恨欧洲人这种“家长式”态度及实际存在的种族歧视,尽管他们中间仍有许多人关注自己的收入和地位。作为刚果的优秀人士,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领导刚果人民走向独立的道路。这主要由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首先是毗邻的英、法殖民地揭开了黑非洲独立运动的序幕。其次是1958年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有几百名刚果人前往参观,第一次同外部的世界直接发生联系,不仅见到了具有各种信仰和政治色彩的欧洲人,还见到了非洲其它地区的人士,从中了解到“这些地区的政治结构如果不是走向独立,也正在朝着自治的方向发展”。<sup>①</sup>再次是第一届泛非会议于1958年11月在加纳的阿克拉举行。卢蒙巴、迪奥米和恩加卢拉应邀出席。他们开始对非洲人团结和独立的概念形成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2月28日,卢蒙巴向刚果人民传播了独立的思想:“独立不是比利时恩赐的礼物,而是刚果人民的基本权利。”<sup>②</sup>从国内形势来看,刚果民族主义运动和比利时殖民政府的态度都有了新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最终促成了刚果的迅速独立。

1957年11月至1959年1月,由于比利时殖民当局拒绝了多数开化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加上比属刚果经济衰退、失业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刚果内外发生的许多事情要求形成刚果人的政治领袖。应1957年政府改革的要求,刚果第一次多数选举给了黑人民族主义组织真正参与政府的机会。

---

①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47页。

② 同上书,第451页。

1958年比利时国内大选结束后,比政府提出了渐进的非殖民化政策,并成立一研究小组前往刚果,开始同一些非洲领导人协商。第二年初,政府根据研究小组提供的方案,宣布了一项新的促进政治改革的计划。该计划以国王文告的形式在比利时和刚果同时发表,第一次正式承认非洲人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并要求于1959年下半年开始选举地方议会。国王宣称:“我们现在有坚定的决心,一定引导刚果各族居民走向繁荣与和平的独立,既不一味拖延,也不仓促行事”。<sup>①</sup>许多比利时人,尤其是在刚果的比利时人认为该项声明过于激进,似乎刚果独立在即,导致比利时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不信任变得十分突出。

实际上,刚果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并不顺利。初期的民族主义组织带有明显的部族特征,他们更多地关注开化人的权力问题,而不是国家独立。

1956年6月30日,非洲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全面规划宣言,由约瑟夫·伊里奥倡导的《非洲的觉醒》杂志编辑出版。该宣言拒绝比利时——刚果共同体的主张,因为这“仅仅是奴役和剥削我们的手段的徒有其表的政治独立……”。<sup>②</sup>这份宣言标志着刚果开始有了非洲人要求独立的政治觉悟。同年8月23日的阿巴科大会,卡萨武布提出了一份反宣言,又补充了几点意见,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和各项自由,并反对宣言提出的响应范比特森教授提出的30年独立计划。

非洲人政治组织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人民应当尽快地组织起来,没有太多的时间通过政治哲学或思想的讨论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最自然的道路就是通过已经存在的各种组织把他们发动起来。其结果是,涌现出大批主要是建立在对本族效忠基础上的

---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5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36页。

政党,这就为少数试图克服族性或地区主义而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政治家造成了许多困难。当时刚果只有卢蒙巴领导的一个政党即1958年10月正式建立的刚果民族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族的涵义,旨在组织一个没有种族倾向的政党,领导刚果人民走向独立。

1959年1月4日,就在卢蒙巴在加拉木区广场讲话后的第六天,由于政府在最后一分钟禁止了阿巴科的一次群众集会,造成比利时军警和非洲人的激烈冲突。这场冲突持续了7天,刚果人砸毁了所有他们认为属于欧洲人的财产,如汽车、商店、学校和教堂等。据官方人士报道,有42名刚果人被杀害,政府认为刚果人协会应对这起突发的事件负责,因此监禁了该组织的上层领导人卡萨武布和迪奥米。<sup>①</sup>同年7月,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发生分裂。接着,卢卢阿和卢巴部族冲突爆发,造成许多非洲人丧生。

1959年12月,按政府计划举行的选举反映出以部族为基础的选举特色。估计在187万选民中,有130万人把票投给了与全国性政党无关的本地候选人。比属殖民当局对此感到满意。

1960年1月2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圆桌会议,这次会议是由非洲团结党和分离出来的刚果民族运动组成的联盟,于1959年11月23日做出的决定,共有45名非洲人代表出席,开始商定刚果独立的日期。比利时政府做了让步,确定1960年6月30日为独立日。第一轮圆桌会议的主要决议反映在独立后的《基本法》中。同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主要解决了比利时和刚果之间的财政和经济问题,刚果总债务超过9亿美元。

1960年5月按计划选举国会和地方议会代表,估计有一百多个政党参加,但没有一个占有明显的多数。同年6月25日,卡萨武布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卢蒙巴任政府总理,成立了由23人组成

---

① Zaire: A Country Study, p. 38.

的内阁。

1960年6月30日,比属刚果如期宣告独立,改名扎伊尔共和国。独立时,全国有250个部族、100多个政党,这暗示着“滞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给独立国家潜藏的不稳定性。独立的扎伊尔将按非洲人自己的愿望发展,但又无法回避其不幸的殖民地历史。卢旺达、布隆迪的历史和现实亦是如此。

## 第十五章 仿效“罗马帝国”的 意属非洲殖民体系

意大利是后起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高潮前夕,意大利刚在亚平宁半岛上完成了其统一事业,就急匆匆地投入瓜分非洲的角逐之中,把刚挣断的异族奴役枷锁套向别国头上。

### 第一节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活动

意大利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在非洲展开的,<sup>①</sup>集中于北非和东北非。在北非,1881年与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后,意大利于1911—1912年发动意土战争,从土耳其夺取利比亚。在东北非地区,意大利于1890年在红海南岸建立了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此后又占据非洲之角南部,建立了意属索马里殖民地。但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却因1896年阿杜瓦的失败而受阻达40年之久。1935年意大利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建立意属东非帝国。至此,意大利殖民活动到达顶峰,在非洲共占领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奴役上千万的非洲人。殖民战争的胜利使意大利忘乎所以,与法西斯德国结盟,投入更大的国际纷争之中。为争夺英法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战略要地,建立意大利的“非洲大帝国”,意大利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举攻占英属索马里,进军埃及。然而好景

---

<sup>①</sup> 意大利的殖民活动除在非洲以外,在东南欧、东亚也都有活动。

不长。1941年不堪一击的意军在东北非被击溃，1942年利比亚被英军占领。意属非洲殖民帝国土崩瓦解。

与英法等殖民帝国相比，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活动时间短、占领地区土地贫瘠。在许多研究殖民主义的重要著作中，往往对意属殖民地略而不提。其实，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活动颇有特点，有力地说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起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疯狂追求，对于研究世界殖民主义发展史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第一，相对于欧美列强，意大利国力贫弱，被人称为“穷人的帝国主义”。这使它有强烈的对外殖民掠夺的欲望，却不能为其殖民扩张提供强大的实力后盾。俾斯麦嘲笑意大利人是带着满嘴蛀牙而又有一付极好的胃口来到正在被瓜分的非洲大陆。意大利的殖民欲望往往因与其它殖民强国发生冲突而得不到满足，其殖民野心也多次因殖民战争的失利而受挫。由于受国力限制，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各种殖民举措也多烟大火小，无法实现其“宏伟蓝图”。

第二，意大利在非洲殖民活动的全面展开是在法西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充分体现了法西斯主义的特色：在殖民地建立了法西斯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法西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抗都实行最残酷的军事镇压；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是赤裸裸的；推行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政策。意大利野蛮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使意属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意大利的殖民活动是以国家为主体展开的。特别是法西斯上台后，从殖民地的经济建设到一般社会生活，法西斯国家无不插手干预。按墨索里尼的理论：“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一切均应服从于法西斯国家利益。法西斯国家在殖民地主持兴修工程、组织移民、开拓资源、控制教育，甚至野蛮干预土著



的氏族部落生活。

第四,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投入资金规模之大为殖民主义史上所罕见。出于政治军事及掠夺资源的目的,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投入巨资兴修大批基础工程,其中许多工程如利比亚的沿海公路、厄立特里亚的高架索道、埃塞俄比亚的公路交通网等为当时世界所瞩目。意大利还不惜耗费巨资组织规模巨大的官方移民。由于意大利的殖民地大多非常贫瘠,殖民开支的绝大部分由宗主国财政补助。仅1938年度拨给利比亚的财政资助就达400万英镑(约合4亿里拉),相当于此前九年内英国对某非洲殖民地财政资助额的总和。意大利侵略和“开发”埃塞俄比亚的花费动辄以成亿里拉计。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没有从非洲捞到预期的好处。1939年,非洲殖民地仅提供意大利的原料进口总额的2%。经过多年努力,到1940年,非洲殖民地吸收的意大利移民尚不足20万人。意大利计划通过大规模开发(掠夺)非洲殖民地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和加速经济发展,结果大批资金却投进了殖民地的无底洞。意大利外贸部长惊呼“殖民地正在把意大利本身吞下去”。殖民活动的巨大消耗严重影响了意大利国内建设和二战前的备战工作。二战中,意大利军队装备和训练极差,一败涂地。

从殖民主义发展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从方式到手段,从理想到目标,都显得“古典”,有些方式已为其它殖民大国所抛弃。意大利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全面展开已是20世纪20年代,而这时英法美等国都在调整殖民统治的政策,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意大利企图建立高度集权的法西斯统治,对殖民人民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和掠夺,并于30年代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侵略非洲仅剩下的两个独立的国家之一,这与历史潮流相违背,具有疯狂的历史反动性。1935—1941年的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从这一角度看,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

在这之前的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三省,这两件发生在亚非大陆的帝国主义侵略事件,折射出世界殖民主义武力侵略的回光反照。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活动是在几个地区展开的,其殖民活动的特色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 第二节 意大利殖民政策演变史的 标本——意属索马里

### 一、“大国形象”与殖民占领

在 19 世纪末殖民列强争夺非洲之角的斗争中,意大利在英国支持下,迅速在这一地区发展势力。1889 年,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文琴佐·菲洛纳迪积极活动,给予奥比亚素丹和阿卢拉的米朱提因素丹少量年金,诱使其签订了保护条约。经过 7 年谈判,1892 年意大利从桑给巴尔获得了贝纳迪尔沿海港口及内地 6—10 英里租借权。1897 年和 1908 年两次初步划分了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从而把卢格同朱巴河、谢贝利之间的地区划入意属索马里。<sup>①</sup> 1924 年意大利又从英国获得了朱巴河口地区。

在索马里的一系列殖民活动,充分体现了半个世纪中意大利殖民政策的演变。19 世纪末,中世纪曾繁荣一时的贝纳迪尔沿海港口城市早已衰落,广大内陆为游牧的索马里部落占有,经济价值有限。意大利向这一地区扩张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争取“大国”形象和以此向埃塞俄比亚渗透。它并不想承担过多的财政和军事责任。意大利把该地区先后交由菲洛纳迪公司(1893—1896)和贝纳迪尔公司(1899—1905)管理。特权公司每年仅能从国家得到三

---

<sup>①</sup> 这两个条约只大概确定了双方统治范围,划界工作一直未能进行。意大利以此来自向埃塞俄比亚渗透。边界的长期悬而未决影响到后来东北非的国际关系,造成地区冲突。

四十万里拉的财政补贴,力量有限,在当地采取最简单、最廉价的统治方式,仍沿用桑给巴尔的统治机构,雇佣阿拉伯人为其服务。其统治范围仅限于几个设立据点的沿海港口城市。除 1895 年远征时占据的卢格据点和 1897 年实施保护的格勒迪素丹国以外,意大利人对广大内陆没有什么影响。

1905 年,意大利以 360 万里拉的价格从桑给巴尔买下贝纳迪尔地区,由政府直接管理。表面上,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特权公司没有解决当地的奴隶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指责。实际上,此时意大利殖民政策发生变化。它不再满足于追求“大国”的虚名,而要获得实际的殖民利益,开发当地的农业和商业资源。为此,它必须在索马里建立牢固的统治。<sup>①</sup>意大利政府从公司手中接管殖民地后,宣布废除奴隶制。由此引起内陆蓄奴部落纷纷反叛。殖民当局一举两得,借平叛之机向内陆大举扩张,到 1914 年已控制了卢格—拜多瓦—布络布尔提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

意大利对北部的两个素丹国建立保护制以后,仅要求他们效忠意大利,很少干涉其内政。20 世纪初,哈桑起义的影响扩大到这一地区,动摇了其殖民地位,意大利才加强干预。1909 年和 1914 年,意大利以强迫手段向奥比亚和阿卢拉两地派遣了驻扎官。驻扎官逐步掌握了保护国的重要权力,积极协同英国镇压哈桑起义。

## 二、“务实的”殖民政策

1923 年,法西斯头目德韦基出任索马里总督,殖民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时期。殖民当局极度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南部,通过收缴部落手中的武器等手段,把酋长变成殖民统治驯服的工

---

<sup>①</sup> Hess Robert, *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a* 《意大利在索马里的殖民统治》, Chicago, 1966, p. 89.

具。在北方,1925—1927年先后消灭两个保护国,实行直接统治。殖民政府通过征收茅屋税等手段,把殖民统治伸展到索马里社会底层。殖民者开始在索马里进行基础建设和经济开发。为此,法西斯宗主国给予巨额财政支持。1926—1927年度,德韦斯得到各种补助达6700万里拉,这与特权公司时期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1908年制定的意属索马里殖民地根本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摩加迪沙设总督,统辖殖民地事务。各地最初设4个专员辖区,20年代合并了朱巴河口地区并消灭了北部的保护国后,又增设3个。专员辖区下设驻扎官和副驻扎官辖区,全殖民地共设有33个。<sup>①</sup>驻扎官们通过领取薪金的地方头人来控制地方,任命专门的穆斯林法官依据伊斯兰法律来处理索马里人的一般案件。各个专区设有土著军政法庭,由专员、驻扎官组成,审理索马里人危害殖民统治的案件。殖民政权组建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组成的土著军队,由十几名意大利军官统帅,作为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

意大利比较注重索马里的农业开发,鼓励意大利人移居经营农场,梦想把谢贝利河变为意大利的“尼罗河”。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初期的垦殖活动收效不佳。索马里人不愿到农场做工,劳动力无法保证。为此,殖民当局实行强迫劳工制度。直到1920年,阿布鲁齐公爵在索马里开办意索农业公司(SAIS),情况才有所改观。公司在政府资助下,投入巨资购置机械、平整土地、开掘沟渠,引谢贝利河水灌溉。在大量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引种了适宜当地的农作物。1924年,意索农业公司采取“合作”劳动制度:公司与当地班图部落签订协议,由公司提供生产工具和土地给班图人家庭,班图人必须在一半土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按公司规定价格售

---

<sup>①</sup> [英]刘易斯:《索马里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94页。

给公司。通过这种用工制度,公司基本解决了劳工问题。公司最多时共雇佣了 2400 个班图家庭为其工作,甚至二战期间,公司也能保证一定的劳动力,正常运转。意索农业公司取得了很大成功,1924 年底,获得利润 226.8 万里拉。殖民当局把意索农业公司经验加以推广,在格内勒地区也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是在殖民当局大力支持下才取得的。仅修建专供意索农业公司农产品外运的自阿布鲁齐公爵村到摩加迪沙的 100 公里铁路,殖民政府就耗资 750 万里拉。相比之下,谢贝利下游的一些私人农场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成效不大。到 1933 年,意属索马里已垦殖土地 30 000 公顷,为此投入官私资本达 9 650 万里拉。为筹措资金,意大利政府实行“香蕉垄断”,以高出拉美生产的香蕉两位的价格在意大利市场上销售索马里殖民农场的香蕉,把殖民开发的费用转嫁到意大利老百姓身上。在殖民当局大力扶植下,农业生产进步很快。1932 年,意属索马里的棉花和香蕉的出口值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皮革。

宗主国禁止殖民地经营任何可能与本土竞争的经济部门,意属索马里的工业极端落后。1920 年投资 4 300 万里拉在哈丰角修建的盐厂是惟一的一家大型工厂,1933 年产盐 26 万吨。随经济发展,殖民地财政收入上升。旧日负责行政管理的菲洛纳迪公司的年度财政收入仅为 11.3 万里拉,而 1934—1935 年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已达 3 500 万里拉。尽管如此,索马里仍是意属非洲殖民地最贫穷的一个。它在意大利非洲殖民计划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它的投资比起对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投资要少得多。

经意大利五十年殖民统治,索马里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现代工程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小规模的现代教育,对处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索马里都是新事物,这些都促进了索马里社会的发展。意大利在索马里的投资建设是为其战略目的和殖民掠夺服务,现代教育和技术的引进只影响到部分地区的少数

人。大部分索马里人仍延续着几个世纪来传统的生活方式。广大内陆地区,由于殖民当局利用部族组织进行统治,旧的部族关系不但未打破,反而有所加强。在索马里出现了一种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日后索马里政治经济的曲折发展和社会动摇都与此有关。

### 第三节 在埃塞俄比亚营建意属 非洲殖民帝国

#### 一、殖民活动一波三折

意大利一直把埃塞俄比亚<sup>①</sup>视为它在东北非殖民侵略的中心。1896年意大利大举进攻埃塞俄比亚。3月与孟纳利克统率的埃塞俄比亚军队会战于阿杜瓦,意军惨败,一万多名意军几乎全军覆灭。根据1896年亚的斯亚贝巴条约,意大利被迫承认埃塞俄比亚主权利领土完整。1923年埃塞俄比亚加入国联,领土和主权表面上受到国际社会保证。意大利暂时无机可乘,于1928年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借机大肆经济渗透,先把埃塞俄比亚变成其经济依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法西斯分子叫嚣洗刷阿杜瓦的奇耻大辱。海尔·塞拉西执政以来的励精图治也使墨索里尼害怕夜长梦多。3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动荡使国际安全保障机制受到了严重威胁。墨索里尼认为武装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机已经成熟,大肆渲染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殖民地受到严重威胁,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民族情绪,掀起备战狂潮。1935年10月3日,几十万意军从东、北两个方面向埃塞俄比亚发起进攻。

面临战争危机,埃塞俄比亚呼吁国联干预调解。但操纵国联

---

<sup>①</sup> 在20世纪40年代前亦称阿比西尼亚。

的英法却企图靠牺牲埃塞俄比亚的利益来换取意大利在对德政策上的合作。战争爆发后,它们一方面反对对意大利进行全面禁运的制裁,另一方面秘密制定了霍尔—赖伐尔协定,企图出卖埃塞俄比亚大片领土,换取意大利的罢兵。这些阴谋由于国际舆论的揭露而破产。

埃塞俄比亚因过分寄希望于国联而贻误了备战时机。埃塞俄比亚军队大多是临时组建的封建民团,装备羸劣,但顽强抵抗,意军进展缓慢,速战速决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破产。1935年11月,巴多里奥取代德·波诺出任东非意军总司令。为取得军事进展,他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甚至违反国际公约,施放毒气。埃军伤亡惨重,坦皮恩战役和梅丘战役后,主力损失殆尽。意军逼近首都。1936年5月2日,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国外。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失陷。9日墨索里尼宣布兼并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军队转入游击战。

占领埃塞俄比亚后,意大利宣布将东北非的殖民地合并为意属东非(AOI),首都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由大总督代表国王统治。巴多里奥担任首任大总督。意属东非下辖六个总督辖区:厄立特里亚、阿姆哈拉、哈拉尔、奥罗莫—锡达姆、索马里和亚的斯亚贝巴。总督区下设专员辖区。基层为驻扎官辖区。这个金字塔式的行政机构中,全部官员由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和现役军官担任。部分屈膝投降的埃塞俄比亚大贵族只保留荣誉称号,依靠殖民政权的地方中小贵族则成为驻扎官们向民众传达命令的中介。整个殖民行政机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上至大总督,下至一般官吏,无不在埃塞俄比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官方也不得不承

认,官员中有50%不称职,25%有贪污盗窃行为。<sup>①</sup>基层官吏

---

① Alberto Sh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 London, 1985, p. 83.

缺额很大,官僚主义严重,许多政策无法贯彻执行。

意大利殖民当局为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巩固殖民统治,实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格拉齐亚尼任大总督期间,宣布战争已结束,所有抵抗者将以土匪对待,一经抓获,立即枪决,私藏武器者处死。甚至野蛮地规定,凡有一个意大利人被杀,就以十个土著人抵命。<sup>①</sup>墨索里尼甚至命令用毒气作为集体屠杀的工具。残酷镇压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937年2月19日,两名厄立特里亚青年刺伤继巴多里奥之后任大总督的格拉齐亚尼。意大利军队和黑衫队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报复,烧杀抢掠,持续三天。亚的斯亚贝巴血流成河,变成人间地狱,共有30 000人被杀。<sup>②</sup>同时在全国各地搜捕嫌疑犯,有几千人被杀或投入集中营。法西斯殖民者认为杀光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有利于殖民统治。有75%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知识分子在占领期间被有组织地屠杀。<sup>③</sup>屠杀并未能稳定局势。1937年底,阿奥斯塔公爵取代格拉齐亚尼,政策稍有改变,关闭了集中营,对游击队剿抚并用,开始重用投降的埃塞俄比亚大贵族,以求安定局势。

意大利法西斯殖民者强调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和纯洁性,推行严厉的种族主义政策,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意大利颁布法律,严禁欧洲人与当地人通婚或非婚同居,违者予以严厉的刑事处罚。混血儿也将无法取得合法身份。<sup>④</sup>殖民当局从欧洲招募妓女,在殖民地组织专用妓院以满足单身意大利男人的性欲。殖民地实行种族隔离。非洲人不得与意大利人同住一个地区,不得享用同一文

---

① Smith Denis Mack, *Mussolini, s Roman Empire* (《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 Penguin Books, 1976, p. 78.

② Angel Del Boca, *The Ethiopia War* (《埃塞俄比亚战争》), Chicago, 1969, p. 239.

③ Sylvia Pankhwrst, *Ethiopia: A Cultural History* (《埃塞俄比亚文化史》), Essex Lalibela House, 1955, p. 548.

④ Smith Denis Mack, *Ibid.* p. 96.



化、交通和服务设施。但由于执行上的困难和普通意大利移民的抵制,法西斯主义种族政策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埃塞俄比亚大贵族照常受到殖民政权优待,普通移民与土著人相处得也比较融洽。<sup>①</sup>

## 二、耗资大收益小的殖民地

意大利要把埃塞俄比亚建成原料和谷物来源地和战略基地。为此,意大利首先需要投入巨资,改善埃塞俄比亚恶劣的交通状况。五年内共建成 7 000 公里公路,其中 3 450 公里为柏油路面。为此耗资 20 亿里拉,雇佣了 6 万意大利工人并征用了几十万土著劳工。沿公路线设置了若干战略据点。意大利还计划修建一条连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的大铁路。意属东非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交通中心枢纽,修建了飞机场,航线并入“罗马大帝国”的空中交通网。

意大利计划由国家组织一项空前庞大的移民计划:向埃塞俄比亚移民 1 000 万,以缓和亚平宁半岛的人口压力,开发殖民地资源并改变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结构和种族构成。但在执行过程中,花费巨大,移居一个意大利人家庭需要花费 5 万里拉。因侵略战争和干涉西班牙内战已耗竭财力的意大利无力支持这一庞大计划,被迫压缩计划指标,由殖民公司实施有限的移民垦殖。由于面临游击队的极大威胁,殖民活动进展十分缓慢。到 1940 年,在埃塞俄比亚仅有几百个意大利农业家庭约 3200 人。<sup>②</sup>为弥补移民计划的不足,殖民当局实施军屯制,由官方资助复员军人留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屯垦。这既可减少移民费用,又可对付游击队侵扰。但

---

① 埃塞俄比亚人痛恨意大利法西斯,并不仇恨普通意大利人。解放后,滞留的意大利人受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善待和帮助。

② Smith Denis Mack, *op. cit.*, p. 96.

军垦人员往往被高收入的工商业投机所吸引,很快就放弃农业,迁入城市,军屯计划大部分落空。20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官方移民(殖民)计划的失败,证明缺乏经济吸引力的移民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也预示着一切旧殖民主义传统方式即将全面崩溃。

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商业投资可观。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工商业政策不同于意属索马里。殖民当局鼓励工商业发展,计划把埃塞俄比亚建成其工业原料和重工业生产基地。私人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可观。到1939年7月,公私资本共投入40亿里拉,建立大小工厂4007家,商店数以千计。殖民政府实行外贸垄断,把法国、日本等国资本统统逐出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殖民战争和殖民活动中耗费了几百亿里拉巨资,实际收益很小。埃塞俄比亚被占领后的进口猛增30倍,出口却迅速下降。耗资巨大的殖民农场每年仅生产8000吨小麦。原本粮食自给的埃塞俄比亚却不得不依赖进口。为进口殖民者所需的各种物资,意大利每年支付10亿里拉的外汇。意大利所拟建的各个项目,军事、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考虑,加上计划不合理,贪污舞弊和严重浪费,同样工程在埃塞俄比亚的造价竟高过意大利本土20倍。

为弥补经费不足,殖民当局向埃塞俄比亚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1937—1938年度税收为1200万里拉,1939—1940年猛增至7000万里拉。<sup>①</sup>为减少驻军费用和增加殖民地自身的军事力量,殖民当局在埃塞俄比亚组建土著军队。<sup>②</sup>然而土著军队并不忠于殖民政权,士兵成批倒戈,加入游击队,对意大利占领军

---

① Smith Denis Mack, *op. cit.*, p. 76.

② 墨索里尼计划建土著军队100万人。但1940年的数字是23个旅,共25万人。根据各方材料估计,实际人数远未达到这么多。土著军队大多是由投降的大贵族们招募和统帅的民团,建制并不严格,装备极差,战斗力很低。

作战,反而加速了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崩溃。

意大利占领期间,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游击战争非常活跃,使殖民统治无法扩展到城市和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殖民掠夺计划也无法顺利执行。特别是1939年以后,在英法等国援助下,游击队不断给占领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意军大部分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东北非的反攻。1941年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光复,去国五年的海尔·塞拉西重回埃塞俄比亚。

短短五年殖民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一场浩劫。意大利侵略者烧杀抢掠,巧夺豪夺,给埃塞俄比亚造成巨大破坏:共有76万人死于战争或饥饿、损失牲畜1400多万头、损毁房屋50余万间。殖民侵略打断了海尔·塞拉西苦心经营的艰难起步的现代化改革,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杀,使埃塞俄比亚出现了社会断层。另一方面,战后埃塞俄比亚社会变革步伐显著加快。战争激发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发展。这些都对战后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第四节 意大利的殖民样板——利比亚

### 一、瓜分留下的残羹

利比亚与意大利隔地中海相望,曾是罗马帝国治下的一部分。它对于妄想重温古罗马伟大光荣的意大利殖民主义者充满诱惑。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活动和统治政策与意属东非有一些不同。

在北非,意大利把贪婪的目光转向土耳其统治下的另一块“阳光下的地盘”——利比亚,把它当作意大利在地中海对岸的“喘息空间”,极力渗透。经过外交上讨价还价,意大利争得了英、法、德等国对它在利比亚的特殊利益的认可,放手行动。1911年9月29

日,意大利以它在利比亚的利益受到侵害为借口,向土耳其宣战,声称它要完成一项“历史的命运”。<sup>①</sup> 1912年土耳其战败,被迫把利比亚的统治权拱手交出。但意军遭到利比亚人,特别是内地游牧部落的顽强抵抗,在南部沙漠地带战斗中一再受挫。1915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在利比亚收缩兵力,仅控制了黎波里塔尼亚的四个沿海城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力空虚、政局动摇,意大利被迫在保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承认黎波里塔尼亚共和国和昔兰尼加赛努西埃米尔国的存在,作为缓兵之计。随着国力恢复和政局日益稳定,1922年1月22日,意大利再次出动军队,实施武力征服。殖民侵略迫使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由赛努西教团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为利比亚全国的埃米尔。在西部,意大利进展顺利,到1924年6月,已占领了黎波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但在东部的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的游击战术很成功,意军进展缓慢。1930年1月,意大利调格拉齐亚尼到昔兰尼加指挥军事行动。为消灭游击队,格拉齐亚尼下令用水泥填堵水井,向水源中投毒,以缩小游击队活动范围。为切断外界穆斯林的援助,在利比亚与埃及边界架设了近300公里的铁丝网。他还把数万平民关入集中营,严惩暗中支持游击队者。这些手段使利比亚抗战力量陷入孤立无援境地。1931年9月,游击队司令奥马尔·穆赫塔尔被俘牺牲。抵抗运动基本结束。

意大利对利比亚的殖民统治是以法西斯理论为指导的。它在利比亚建立高度集权的法西斯统治。在中央,任命总督统辖176万平方公里的利比亚全境。利比亚的北部地区设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西和德尔纳4个省。1939年这4个省作为意大利王国第19个地区并入意大利。在南部建立南方军区,以胡恩为首府,

---

<sup>①</sup> 约翰·赖特:《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5页。

下辖 5 个行政区。殖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瓦解土著人的部落体制,废除部落长老会议,按每 12 个人委派一名头领,均置于殖民政府的区长直接管辖之下。在思想控制方面,削弱部族意识,灌输服从中央的观念,在青年中宣传法西斯主义,建立法西斯组织。殖民当局禁止赛努西教团活动,但对利比亚人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不加干预,墨索里尼自称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sup>①</sup> 宗教法庭仍然审理民事和宗教纠纷,但其余案件要归殖民法庭审理。

## 二、“第四海岸”的开发

意大利把利比亚称为它的“第四海岸”,以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业绩”为榜样,投入巨资进行开发,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立民用航空、电话、电报等公用事业。令世界瞩目的沿海公路,西起突尼斯,东至阿姆亚特,全长 1822 公里,其中有 675 公里通过锡尔提加沙漠无人区,工程浩大。1937 年全路修通,大大改善了东西部之间的交通,也为几年后北非战场的鏖战提供了交通条件。

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平原,农业资源丰富,曾是古代罗马帝国的“谷仓”,意大利积极移民垦殖。为大批兼并土地,1921 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沃耳皮悍然宣布所有未耕土地为国家所有,没收抵抗者土地。沃耳皮认为国家组织移民垦殖花费巨大,主张由国家给予优惠条件,吸引私人资本开发。30 年代初,意大利政府认为这种开发模式不符合国家殖民开发的长远利益,决定改由国家控制的殖民公司负责,直接把意大利农户安置到殖民地,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

在昔兰尼加,殖民政府在征服战争中共兼并了 120 790 公顷

① Smith Denis Mack, *Ibid.*, p. 119. 墨索里尼此举是为争取英法统治下的中东、北非穆斯林的好感,为将来夺取英法殖民地做准备。

土地。但由于这里气候干旱,不利于农耕,游击队活动又构成莫大的威胁,移民垦殖进展缓慢。随着反抗的平息,意大利把移民垦殖的重点放在昔兰尼加。为垦殖需要,开始修建宏大的引水灌溉工程。1932年,利比亚殖民公司受命组织意大利南部150户农民到昔兰尼加,建立了4个模范殖民村,不久又组织几千农民移居垦殖。

为加快移民进程,1934年殖民总督伊塔洛·巴尔波提出“人口移植计划”,1938年由墨索里尼批准实施。当年10月,首批经严格审查(包括政审)的20000名意大利移民在利比亚登陆。利比亚殖民协会、法西斯社会保险公司等机构提前为他们准备了所有生产和生活设施,包括8个殖民村,5个农业中心和1800个农场以及每户一所住房。费用由国家支付30%,余额由移民不定期还清。1939年第二批移民12000人到达。按计划,1960年移民总数将达50万人。但这一庞大计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

1940年利比亚共有意大利人11万,其中农民4万人,共占用土地347670.61公顷,其中开垦了227977.39公顷。<sup>①</sup>殖民农场年产麦类66000吨。殖民者在利比亚栽种了几千万棵各种树木,甚至在沙漠地带,殖民者也竖起钢制风车,打出深达百米的自流井,开辟大片的葡萄园。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榨油、纺织、食品等工业也有所发展。的黎波里、班加西等沿海城市高楼林立,现代化市政公用设施齐全。意大利为在地中海南岸建立“殖民乐园”,启动“水的工程”,把古罗马时代开凿的水井一一修复。号称“墨索里尼拯救土地”的固沙工程,把的黎波里郊外的沙漠向南推回了30多公里。荒凉千余年的利比亚似乎又重现出罗马古典时代的幻影,然而,这一切仅仅是殖民主义的夕阳余晖。

---

<sup>①</sup> E. G. H. Joffé and K. S. Maclanchl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利比亚的社会经济发展》), Paris, 1983, p. 83.

意大利在欧洲大肆宣扬它在利比亚建立的殖民模范标本。总督巴尔波修复利比亚名胜古迹，举办博览会和汽车拉力赛，吸引欧洲游客来参观游览。1937年墨索里尼第二次巡视利比亚，<sup>①</sup>主持沿海公路的开通典礼，发表重要演说，使这一殖民样板名噪一时。

意大利所描绘的“壮丽的殖民图景”对利比亚人却意味着深重苦难和悲惨的经历。利比亚人饱受战争之苦，伤亡惨重。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利比亚人口损失过半。尤其是昔兰尼加，经受了近10年殖民征服战争的蹂躏，刚有喘息，又成为二战中北非逐鹿的战场，千疮百孔，残破不堪。贝都因牧民肥沃的牧场被征用，赖以生存的畜群损失殆尽，一部分牧民被殖民政权强制弃牧从耕，其余人则被驱逐到沙漠地区苟延残喘。数以万计的利比亚人被迫充当劳工，兴修各种工程，建造殖民村落，或受雇于意大利人农场。几万利比亚青年被强征入伍，充当其侵略战争的炮灰。大多数利比亚人暂时仍栖居在贫瘠的土地上从事原始的农牧业生产，朝不保夕，随时有可能从自己祖居的土地上被赶走。意大利虽然声称对它的“第四海岸”实行“同化”政策，但利比亚人仍备受种族歧视。他们没有公民权。1939年殖民当局开始授予“特种公民权”，但条件苛刻，能获得者极少。法律规定利比亚人不得成为意大利人的上司，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除非为意大利人服务，不得进出于意大利人生活区。

殖民统治给利比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意大利人也带来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修建了现代化基础工程和农场。殖民政权中央集权的统一行政管理和连接东西部的交通网，使自古分割成联系很少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利比亚真正连成一个整体。利比亚人在反抗殖民奴役的斗争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锻炼。这些都有助于二战后独立统一的利比亚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

<sup>①</sup> 墨索里尼第一次到利比亚是1926年。

## 第十六章 德国和英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

19世纪80年代末期,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正式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从此以后,坦噶尼喀先后遭受了德国、英国两个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直到1961年摆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其中,从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统治了坦噶尼喀约30年。1919年以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接管”了部分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开始以“国联”的名义对坦噶尼喀进行“委任统治”。在长达3/4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和英国在坦噶尼喀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殖民统治。这两个欧洲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的经验、历史传统和国内、国际背景各不相同,所采取的殖民统治手段、制度也各不相同,因而各自对坦噶尼喀殖民地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德国在用军事征服手段建立起殖民统治之后,德属东非殖民地(含坦噶尼喀、卢旺达和布隆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当地非洲人社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英国对坦噶尼喀实行“委任统治”后,依据“间接统治”的殖民理论,在坦噶尼喀建立起了同其它英属非洲殖民地相类似的殖民统治。就坦噶尼喀自身而言,在德国统治时期和英国统治时期其社会发展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对坦桑尼亚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也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本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各学派的历史学家和非洲历史学家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殖民统治在非洲大陆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但专门论述坦噶尼喀的著作和文章并不多,深入分析德国和英



国在坦噶尼喀不同殖民统治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在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综合研究十分薄弱,尚无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本章仅对自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英两国在坦噶尼喀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作一粗浅的分析,并试图探究几十年的殖民主义统治对坦噶尼喀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 第一节 德国对坦噶尼喀的军事征服

### 一、德英在东非的殖民争夺

德国对坦噶尼喀实行有效的殖民统治时间很短。以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起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只有30多年的时间,这在欧洲各国殖民史中是比较短暂的。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大的阶段。前期从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1905年马及一马及大起义爆发。<sup>①</sup>德国殖民政权用军事征服手段建立起不稳定的殖民统治,用更残暴的军事镇压扑灭坦噶尼喀各族人民的反抗。殖民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构成了坦噶尼喀这段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非洲人民进行抵抗的激烈程度和德国殖民者进行镇压的严酷程度,不仅为后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所罕见,就是在同期的非洲大陆亦不多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德国人用剑与火建立了殖民统治,而铁腕政策则贯彻于坦噶尼喀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众所周知,同老牌殖民国家英国相比,德国几乎没有殖民历史。直到1866年普奥战争以前,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无法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向海外展开大规模的

---

<sup>①</sup> J. D. Fage and Roland Oliv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6, vol. 7. p. 654.

殖民活动。普法战争结束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其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国内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基本形成。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喊出了“争取阳光下的地盘”的口号。而到了此时,德国资产阶级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帝国主义舞台上的迟到者”。关于这一点,并非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德国在统一之前“无意犯险”,自愿选择了“自由贸易和间接商业扩张”的政策。<sup>①</sup>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以前德国国内条件不成熟,在客观上限制了德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进入80年代后,德国国内诸多条件渐趋成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尤其在这个时期,英、法、比等传统的欧洲殖民强国都加快了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步伐,而在德国国内,要求俾斯麦政府支持、保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海外进行商业扩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sup>②</sup>这些因素都促使德国在非洲迅速采取行动,跻身于殖民强国的行列。1884年,德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在非洲占据了三块殖民地<sup>③</sup>——西南非洲、喀麦隆和多哥。柏林会议刚结束,德国又马上在东非地区加紧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这都充分表现了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迫切渴望。另一方面,德国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发展进程,又时时受到国内因素和欧洲形势的影响,其政策也时常摇摆不定。这些,从“柏林会议”前后俾斯麦对在东非进行殖民活动的殖民冒险家卡尔·彼得斯的态度变化上,即可窥见一斑。<sup>④</sup>1884年至1885年,德国为了利用欧洲国家在非洲

---

① L. H. Gann & P. Duignan, *The Ruler of German Africa, 1884—1914* (《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1884—1914年》) 1977, p. 9.

② Peter Duignan and L. H. Gan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年》), Cambridge, 1975, vol. 4, p. 76.

③ L. H. Gann & P. Duignan, *The Ruler of German Africa, 1884—1914*, p. 9.

④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p. 89—90.

的矛盾,从中渔利,提高自己的国际声望,主持召开了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刚刚结束,德国便把殖民主义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东非地区。

德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建立,分别由殖民主义冒险家和公司的活动,德军的军事征服、外交部与英国进行谈判共同瓜分以及殖民官员的绥靖行动等共同完成的。同其它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活动相类似,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活动也是以殖民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活动为先导的。在这些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卡尔·彼得斯。这个野心勃勃的殖民冒险家从小深受英国殖民主义传统熏陶,一心想把自己的名字嵌刻在德国的海外扩张史上。<sup>①</sup>1884年,他和一些同他沆瀣一气的伙伴组成了“德国殖民协会”,开始在东非地区进行殖民活动。<sup>②</sup>尽管这个组织一开始并未取得德国政府公开的官方支持,但其活动也没有遇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彼得斯以殖民协会的名义,用屠杀、威胁、欺骗、结拜兄弟等方式,同乞力马扎罗地区的非洲人酋长签订多项条约,把这些酋长属下的土地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到“柏林会议”结束前,彼得斯已签订了12个内容相同的条约,攫取了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sup>③</sup>“柏林会议”一结束,俾斯麦一反其过去的犹豫态度,马上宣布德国政府承认并支持彼得斯的活动,并着手组建德国东非公司,授予特许权,由该公司直接统治被占领的东非土地。从此,在“柏林会议”之后的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德国扮演了极疯狂的角色。从1884年到1886年,德国东非公司发动了18次攫取土地的远征,到1888年4月,在坦噶尼喀境内共建立

---

①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90.

② Ibid.

③ Ibid.

18 个贸易商站和殖民据点。<sup>①</sup>随着这些活动,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从沿海地区向坦噶尼喀内地急速扩展。

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扩张活动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关注。有着长期殖民史的英国在非洲不仅有现实的和潜在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而且它认为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存在和发展关系到整个大英殖民帝国的安全,因为英国政府把非洲的港口和航道视为它通往东方各殖民地的重要通道,是帝国的生命线。<sup>②</sup>从殖民战略上考虑,它不能对德国在印度洋之滨的坦噶尼喀的扩张无动于衷。然而,德、英双方在非洲的扩张争霸往往受到欧洲力量的牵制和各自对外战略的制约。19 世纪 80 年代后,原桑给巴尔的巴加希索丹已经成为英国手中的傀儡,而英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也愿意同德国在东非地区达成妥协。基于这种情况,德国和英国经过折冲樽俎,讨价还价,在 1886 年和 1890 年先后签订了两个条约。规定:英国承认德国在坦噶尼喀的势力范围,德国不再企图染指英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桑给巴尔岛,同时德国还得到了位于北海上的重要出海口赫尔果兰岛。<sup>③</sup>在同英国达成妥协之后,德国在东非内陆开始了更肆无忌惮的大规模殖民扩张。

## 二、普鲁士精神在殖民征服中的体现

与肯尼亚和桑给巴尔的英国殖民者相比,德国殖民者既缺乏对非洲当地社会的了解,也缺乏殖民管理经验。从 19 世纪 80 年

---

①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91.

② 参见 Ronald Robinson &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人》), London, 1983, p. 464. 这本书的观点曾引起激烈争论,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③ M. H. Y.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p. 81 - 82.

代中期到 1907 年,德国几乎用了近 20 年时间,才彻底扑灭了坦噶尼喀人民的武装反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统治。僵硬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手段、彻头彻尾的武装征讨,同英国人勾结、利用当地社会上层,杀机暗藏,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德国在对坦噶尼喀的殖民征服中,打头阵的急先锋是德国东非公司(DOAG)。该公司的前身是“德国殖民协会”,主要管理彼得斯等殖民者在东非掠夺来的土地。1885 年 2 月,帝国政府开始直接管理德国东非公司的内部事务。1886 年,英德协定划分了两个殖民国家在东非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后,德国东非公司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坦噶尼喀推进其殖民扩张。1887 年 5 月,德国东非公司调重兵扑灭了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各族人民的反抗,相继占领了庞达尼、庞戈尼、巴戈莫约、基尔瓦、林迪等港口城市,在坦噶尼喀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初步建立起德国的殖民统治。

在对坦噶尼喀的早期军事征服中,德国殖民者把对殖民地的渴望和贪婪表演得淋漓尽致。在国内,俾斯麦政府打着“镇压奴隶贸易,保护德国在东非利益”的幌子,应付舆论,内阁不惜拨款 10 万英镑充作军费。在非洲,殖民主义者使用先进武器,疯狂镇压坦噶尼喀人民的反抗。德国东非公司的头目卡尔·彼得斯被坦噶尼喀人民称为“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而东非德国殖民军的司令官冯·魏兹曼则极端仇视非洲人民,污蔑斯瓦希里人是“人类的死敌”。<sup>①</sup>动不动就用炮火夷平城镇、屠杀当地人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因而招致了非洲人民特别激烈的反抗,德国殖民侵略军向内地推进的速度也就特别缓慢。1891 年,德国在坦噶尼喀沿海地区的殖民统治基本确立,沿南、北、中三条路线向内陆地区推进,遭到了非洲人部落社会更为激烈的武装抵抗。德国政府意识到,仅靠彼得斯和

---

<sup>①</sup> H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95.

德国东非公司的有限力量,根本不能完全征服坦噶尼喀。况且,该公司耗费了巨额资金,管理混乱,已经无力充当殖民侵略的有效率的工具。德国政府于1891年取代德国东非公司,在坦噶尼喀实行直接统治,并派出了第一任殖民总督冯·索登,开始对坦噶尼喀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征服。<sup>①</sup>

从1891年至1898年,德国用军事手段征服了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并在各地建立起殖民政权。无论是冯·索登还是其继任者,基本都沿袭旧政策,把武力征服看成是致胜的法宝。而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所面对的,除了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各族人民,还有酷爱自由,能征惯战的坦噶尼喀非洲人部落社会,后者武装抵抗尤为激烈。1891年爆发的由姆克瓦瓦领导的赫赫人起义,一度击溃装备精良的德国殖民军队,击毙殖民军官泽列文斯基,沉重打击了德国殖民统治。<sup>②</sup>1898年以后,坦噶尼喀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短暂时期,德国开始在各地建立殖民政权。然而,好景不长,1905年,坦噶尼喀南部山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马及一马及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坦噶尼喀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一次总爆发,几乎摧毁了南部地区德国全部殖民政权和种植园,德属东非殖民地陷入全面危机。<sup>③</sup>殖民当局用了两年时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此,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才稳定下来。

德国用了20年的时间,依靠大炮和刺刀,才在坦噶尼喀站稳脚跟。而同期英国在桑给巴尔和肯尼亚,却早已建立稳固的殖民

---

① Kaniki, M. H.,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 100.

②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108.

③ T. O. Ranger, *African Reactions to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中/东非地区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载于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Cambridge, 1969, p. 313.

政权。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之所以耗时耗资，飘摇不定，根基不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第一，在殖民征服中一味使用武力手段，迷信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对坦噶尼喀人民反抗一律残酷镇压，不像英国殖民者那样怀柔与压制并重，尤其是德国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社会的上层集团（非洲部落酋长），从而导致了非洲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显见德国比英国缺乏殖民统治经验。

第二，在缺乏对坦噶尼喀非洲人社会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立足未稳便开始经济掠夺，推行强迫劳动制和茅屋税，为建立德国殖民统治而匆忙设置的殖民机构根本无法让广大非洲人民接受，致使德国殖民当局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维持统治上。

第三，无论是卡尔·彼得斯，还是以后的几位德国总督，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非洲人的作用和力量，而只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视为可以随意征服的奴仆，任意驱使的工具。这就使得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殖民政策 20 余年基本无大变化，只把征服和镇压放在首位。直到 1907 年之后，德国殖民政策制订者头脑中的这种观念才开始有所变化。<sup>①</sup>

德国对坦噶尼喀 20 余年的殖民征服和统治，给坦噶尼喀社会带来了深重的影响。首先，战争和掠夺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更多的非洲人失去了生命。<sup>②</sup>仅在马及一马及大起义之后，南部山区的人口就减少了 1/3，这是殖民统治最直接的后果之一。<sup>③</sup>其次，德国用武力破坏了坦噶尼喀原有的社会结构，几乎摧毁了当地的非洲人部落社会组织，使之在

---

① L. H. 甘恩和 P. 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1884—1914 年》，p. 180.

②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London, 1980, p. 93.

③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坦噶尼喀现代史》），Cambridge, 1979, p. 200.

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其原有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德国的殖民统治也失去了社会基础的依托,很难稳定立足。最根本的是,殖民征服使 760 万坦噶尼喀人民失去了原有的独立与主权,使整个坦噶尼喀成为殖民统治的附庸,经济上作为外围依附于德国。

## 第二节 德国殖民统治的政权 建设和经济发展

### 一、阿基达制和莱瓦利制

德属东非殖民地的殖民政权建设是伴随着对非洲人反抗的镇压不断发展起来的。1891 年,德国政府接管坦噶尼喀殖民地后,派出总督作为整个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掌握殖民地的行政、军事、经济大权。由于缺乏殖民地的管理经验,德属东非殖民当局驾轻就熟地套用了德意志帝国中央集权体制,在统治方式上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较多地采用军事征服和超经济强制手段,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死板、僵硬,缺乏应变能力。总督大权独揽,使殖民统治带上较多的个人色彩。从 1891 年到 1914 年,德国共派出了 7 位东非总督。在这 7 人中,除去一人是平民出身外,其余 6 位都是贵族出身。<sup>①</sup>其中,1906 年以前的 5 人皆有在军队服役的背景。这些人事资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德国殖民统治中的某些特征:“殖民讨伐军”马不离鞍,殖民机构充满着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气息,武人出身的总督的个人专权,基层官吏的军曹习气,使得德属东非殖民政权带有极强烈的军事色彩。

德国在坦噶尼喀殖民统治的浓厚军事色彩不仅表现在频频调动军队,武力镇压非洲人反抗上,仅从坦噶尼喀的行政区划上也能

---

<sup>①</sup> L. H. Gann and P. Duignan, *The Ruler of German, 1884—1914*, p. 139.



略见一斑。德国对坦噶尼喀殖民地境内的部落酋长一般采取不信任态度,殖民政权几乎不发挥部落酋长的作用。除西北边远的卢安达、乌隆迪、布科巴三个地区,被认为比较稳定,可保留部落酋长之外,其它地区都由德国人自己直接统治。<sup>①</sup>即使上述三个地区的非洲人部落酋长,也必须在德国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行使其行政权力。1901年,德属东非殖民地共划分为10个行政区,24个军事辖区,13个警备区,<sup>②</sup>只是到德国统治后期,局势逐渐平稳,非洲人的反抗不像前期那样激烈,军事辖区和警备区的数目才逐渐减少。但一直激烈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卡伦加地区和马亨戈地区,进到1914年,仍由殖民军和警察直接控制,<sup>③</sup>德国人在每个行政区实行直接统治,殖民当局派驻一名行政长官和少数白人官吏,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和税收工作。每个行政区又分为若干个乡,每个乡约有2—3万非洲人。乡长由殖民局挑选的代理人担任。

德国统治时期,坦噶尼喀殖民地的白人数量并不多。1913年,坦噶尼喀的白人总共只有5356人,包括白人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sup>④</sup>白人殖民官吏的人数甚少,实际上根本无法管理地域广阔的殖民地。因此,德国殖民者在坦噶尼喀实行了任用当地人(主要是沿海的斯瓦希里人)做代理人的制度,这就是“阿基达”制度和“莱瓦利”制度。<sup>⑤</sup>这一制度构成德国在坦噶尼喀殖民统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通过“阿基达”制度和“莱瓦利”制度,殖民当局在

---

① Raymond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p. 448.

② Gann & Duignan, *ibid.*, p. 71.

③ Fage & Oliv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7, p. 654.

④ Gann & Duignan, *ibid.*, p. 151.

⑤ “莱瓦利”是指在沿海地区城镇中的统治代理人,“阿基达”是指在内陆偏远乡村中的统治代理人。在德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桑给巴尔苏丹国就用这种方式统治坦噶尼喀沿海地区。

坦噶尼喀推行强迫劳动制,强征人头税、茅屋税,维持殖民统治。正是依靠这种制度,德国东非殖民地的行政体系才能运作起来。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德国殖民当局可以把当地非洲人传统政治领袖和非洲人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完全抛在一边,在施行统治时忽视非洲人社会原有的部落组织。这种做法和谙熟殖民统治技巧,经验丰富的英国人完全不同,也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德国殖民者早在刚入侵坦噶尼喀沿海地区时,就从桑给巴尔苏丹国移植了运用当地“代理人”统治非洲人社会的办法,以弥补殖民官员自身力量不足的弱点,这就是著名的“阿基达”制度和“莱瓦利”制度。<sup>①</sup>在德国统治前期任用的“阿基达”多是沿海地区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深的斯瓦希里人,他们并不熟悉坦噶尼喀内地非洲土著人的文化习俗,<sup>②</sup>有着不同于内陆非洲人的文化传统。德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斯瓦希里人的农业和商业发展水平较高。他们同桑给巴尔和阿拉伯半岛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而同内陆地区的非洲人社会则缺乏较多的共同利益。如果仅依靠少量白人殖民者,德国根本无法统治广袤的坦噶尼喀。因而在向内陆推进的过程中,德国殖民当局保留了原有的“阿基达”和“莱瓦利”,同时大量招募新的代理人。这些“阿基达”从德国殖民政府那里领取薪金,监督非洲人进行强迫劳动,还要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收取人头税、茅屋税,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实权。为了巩固统治,殖民政府对“阿基达”和“莱瓦利”的行为并不施加多少约束。“阿基达”和“莱瓦利”也就得以殖民当局的名义狐假虎威,横征暴敛,引起非洲人强烈的不满和痛恨,这成为后来马及一马及大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

① Fage, J. D. and Oliver, 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6, vol. 7, p. 654.

② Kenneth 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东非史》), London, 1962, p. 203.

早期的“阿基达”多是德国殖民者在军事征服过程中从沿海地区随意招募的,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当德国人的势力深入内地后,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需要更多的、更有管理经验的“阿基达”。在德国统治后期,除了继续直接招募当地少量的非洲人充当“阿基达”之外,更多的“阿基达”渐由沿海地区殖民政府和教会兴办的学校培养出来,后者能更好地胜任“殖民代理人”的工作。<sup>①</sup>除去斯瓦希里人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坦噶尼喀黑人被任命为“阿基达”。尽管后期的“阿基达”随着德国殖民政策的调整,其暴虐行为有所收敛,但“阿基达”制度基本上仍然是非洲人反抗殖民统治的主要目标。有的学者认为,“阿基达”制度的症结在于它减少了欧洲殖民者同当地人民建立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且使当地政权丧失了欧洲人指导下发展的机会。<sup>②</sup>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英国比较,德国在坦噶尼喀维持殖民统治的稳定之所以不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殖民行政体制中的“阿基达”制度和“莱瓦利”制度完全忽视了坦噶尼喀原有非洲人传统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认识到当地非洲人部落社会组织对于殖民统治的重要意义。德国殖民者在殖民征服中给非洲人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建立殖民政权时又把部落结构及传统领袖抛在一边,代之以僵硬的德国殖民统治模式,用异地征募来的“阿基达”来统治非洲人,这就必然要侵犯非洲人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坦噶尼喀非洲人部落社会而言,不管是德国人早期招募的“阿基达”,还是后期经过培训的“阿基达”,都是外来者,同德国殖民者一样,并不属于当地部落社会,既无根基,更少威望。这就使德国殖民者在坦噶尼喀很难建立起有效而稳固的殖民统治,并不断遭到非洲人的激

---

<sup>①</sup>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210.

<sup>②</sup> Ingbatn, *op. cit.*, p. 203.

烈反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德国这个“殖民宴席上的新手”缺乏殖民统治的经验。

另外,德国人在军事征服中效法老殖民主义者“非洲人打非洲人”的伎俩,大量使用非洲雇佣兵,充当镇压非洲人武装反抗的工具,这就是所谓“阿斯科利”制度。1889年,东非的德军司令魏兹曼在镇压沿海地区的抵抗时,招募了祖鲁族和苏丹的非洲士兵。<sup>①</sup>这种做法后来被沿用下来,这些非洲士兵构成德国东非殖民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多来自那些同德国殖民者保持友好关系的部落,但德国人同样要求被征服的部落提供军事人员。在每次军事征讨中,一般是由少数欧洲白人军官率领人数众多的非洲士兵,镇压各地各部族非洲人的反抗。对此,有人尖锐地指出:“对非洲殖民地的军事征服是由欧洲人统领的非欧洲人组成的军队完成的”。<sup>②</sup>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时指出的,英国人是“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sup>③</sup>一样,是殖民主义史上屡见不鲜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 二、德国人的大规模开拓

在德国统治坦噶尼喀期间,大规模的经济开拓主要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德国资产阶级投入殖民地的资金很有限。<sup>④</sup>1906年,雷欣伯格出任东非殖民地总督。1907年5月,德国正式成立独立的殖民部,负责处理殖民地事务,由公认的财政专家德恩堡担任首任殖民大臣。他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大力推行所谓“科学殖民”。在镇压马及一马及起义后,德属东非殖民

---

①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 114.

② *Ibid.*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卷,第246页。

④ L. H. 甘恩和 p. 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1884—1914年》, 第45页。

地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个时期,所有非洲殖民地的贸易额在整个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总额中仍是微不足道的。1910年,德属非洲殖民地的进口额只占德国进口总额的0.13%,出口总额占1.1%。<sup>①</sup> 尽管如此,德国确实把东非殖民地视为海外殖民地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德国统治时期,尤其是后期,坦噶尼喀局势平稳,非洲人反抗暂时进入低潮时期,坦噶尼喀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同期的英属东非殖民地。据统计,德国1913年在东非殖民地投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是1905年的2.5倍,占其海外殖民地投资的21%,而东非殖民地的贸易额在一战前已经达到德国同殖民地贸易总额的1/3。<sup>②</sup> 坦噶尼喀殖民地自然资源尚未完全探明,无法在短时期内满足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出于长远战略的考虑,精明的德国人想在东非殖民地“大干一场”,因而在经济发展上更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修筑铁路,开发农业和矿产资源,铺设电报、电话电缆,兴建医院、学校等。特别是在雷欣伯格任总督后,对白人移民、白人种植园的发展及强制招募非洲劳工,都采取了限制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殖民者与当地非洲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明显不同于同一时期英国白人移民在肯尼亚高地大肆掠夺土地的做法。

德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坦噶尼喀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各族人民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大米、蔗糖、椰干等产品自足有余,能供应附近的印度洋地区,<sup>③</sup> 是当时印度洋经济贸易区的积极因素。德国殖民者到来后,出于自身需要,鼓励商品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原有农业项目的扩展,还引进了棉花、橡胶、西沙尔麻等经济作物。德国的意图是极力摆脱它在国际热带原料市场上受

---

① L.H.甘恩和P.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1884—1914年》,第259页。

②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9页。

③ 伊·基曼博和阿·特穆主编《坦桑尼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59页。

制于人的窘境,并以出口来减轻殖民地在财政上对宗主国的依赖。<sup>①</sup>因此,到德国殖民统治后期,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商品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超过了同期的英属肯尼亚殖民地。坦噶尼喀殖民地 1913 年主要的商品出口额同 8 年前的 1905 年相比,有相当大的增长。其中花生增长了 1.3 倍,橡胶增长了 4.2 倍,咖啡增长了 1.7 倍,西沙尔麻和棉花增长了 18 倍和 12 倍,后两种产品坦噶尼喀的产量几乎等于德属非洲殖民地的全部产量。<sup>②</sup>

这一时期,坦噶尼喀商品农业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棉花的种植。1902 年,德国人首先在南部鲁菲季河谷地区强行推广种植棉花,并向农民提供种子和工具。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原因,未获成功。不仅如此,由于德国强迫坦噶尼喀南方农民种植棉花,引起非洲人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上述南部山区马及—马及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③</sup>此后,殖民政府改弦更张,更多采取引导和鼓励政策,在姆佩加亚设立棉花栽培学校,在苏库马兰地区推广棉花种植。殖民政府不但提供种子、工具、技术咨询,还规定了最低收购价。1907 年以后,坦噶尼喀的棉花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12 年,仅东非殖民地棉花的出口量达 188 万吨。<sup>④</sup>

在流入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资本中,铁路建设投资占相当大的份额。19 世纪末德国人入侵坦噶尼喀之初,出于军事目的开始修筑坦噶尼喀铁路,但进展缓慢,1902 年才修到蒙博,全长 129 公里。进入 20 世纪后,英国在毗邻地区修建了到达维多利亚湖的乌于达铁路,英属东非殖民地的铁路建设领先于坦噶尼喀,刺激了后

---

① Page and Oliv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6, vol. 7, pp. 656 - 657.

② 材料来源: L. H. 甘恩和 P. 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1884—1914 年》, 第 121 页。

③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p. 168 - 169.

④ L. H. 甘恩和 P. 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1884—1914 年》, 第 201 页。

者。随着坦噶尼喀局势逐渐稳定,殖民地经济呈增长势头,德国殖民当局的经济重心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坦噶尼喀铁路建设迅速发展。1905年,德国开始修建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坦噶尼喀湖的中央铁路。1912年,铁路修至塔波拉,1914年到达坦噶尼喀湖畔基戈马,全长1250公里。这条横贯坦噶尼喀东西全境的铁路的修通,使德国殖民当局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大大加强了对中西部的控制,而且在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掠夺。此外,德国人还拓展了北部干线。1902年,北部铁路由蒙博延至莫希。已开始动工的西北走向的塔波拉—卢安达铁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完成。1914年,德属东非殖民地财政收入为82.3万英镑,仅用于铁路建设的支出就占32%。<sup>①</sup>德国在坦噶尼喀的铁路都是由当地的非洲劳工修建的,由私人投资者的公共贷款提供资金,归德国东非殖民地政府所有,其固定利率由帝国政府提供担保。<sup>②</sup>铁路的建设无疑刺激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主义“建设性使命”<sup>③</sup>在这里表现得比较明显。然而坦噶尼喀的经济并没有因为殖民者修建了铁路而得到根本上的改观。德国殖民者只在经济、军事要地修建了铁路,而坦噶尼喀多数偏远地区的交通依然十分落后。直至现在,坦噶尼喀境内的铁路干线除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外,仍是以德国统治时期修建的铁路为基础。

坦噶尼喀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类学校的兴办。这一点在同期的非洲各殖民地中是较为突出的。早期的殖民地学校主要在沿海地区,多由教会兴办,用斯瓦希里语授课,主

---

① Fage and Oliv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6, vol. 7, p. 657.

②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13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要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各类办事人员,训练为德国人工作的“阿基达”。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坦噶尼喀各地非洲人反抗逐渐平息,殖民地政府开始大规模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量也迅速增加。除教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外,还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讲授专门的技术知识。1911 年,坦噶尼喀接受过各式殖民地学校教育的非洲人达 12 万人之多,是德属非洲殖民地中最多的。<sup>①</sup>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当局培养工具,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但是,随着对现代科学文化的了解,民族主义的萌芽也在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中产生,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在新兴的非洲知识分子队伍中,产生了一大批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 第三节 英国“间接统治”在 坦噶尼喀的建立

#### 一、卢加德衣钵在东非的体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属东非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战场。英军、比军同德军展开激战。德军以坦噶尼喀为补给基地,坚持长期作战。直到 1918 年大战停战后,东非战事才告结束。1919 年,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坦噶尼喀。从此,坦噶尼喀殖民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国际联盟 1919 年的规定,德国的非洲殖民地以国联的名义委托给英、法、比等战胜国,由它们进行“委任统治”。英属南非接管了西南非洲,比利时接管了卢安达、布隆迪,英法分管多哥和喀麦隆。这样,英国不费力气地得到了坦噶尼喀。<sup>②</sup>从统治一开始,英国在坦噶尼喀就处于比德国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不用像

<sup>①</sup> L. H. Gann & P. Duignan, *The Ruler of German, 1884—1914*, p. 212.

<sup>②</sup>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vol. 1, p. 430.



德国那样直接面对非洲人强大的武装反抗。“委任统治”这种新的统治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殖民统治形式。在理论上,那些接受委托的国家不能“成为它们所占有的德国殖民地的完全占有者”。关于“委任统治”制度,国联有如下规定:一、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要保证居住在殖民地及其领地内的“人民之福利及发展”,以履行“文明之神圣任务”;二、受委任的“先进国”以国联名义承担‘管理’之权,即是担负一项任务,受法律的制约;三、“受任国”每年应将委任统治地的情况写成书面汇报,送交国联行政院下属的九国委任统治委员会审查。<sup>①</sup>撇开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不谈,可见这种新的统治方式确实具有巧妙性和隐蔽性。它不仅能欺骗国际舆论,还能麻痹殖民地人民。而且,“受任国”以国联的名义进行统治,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委任统治”是面对着战前和战争期间非洲殖民地人民民族主义意识日益觉醒的新形势下制定出来的。对于一直争取自由独立的非洲人民来说,这多少是向前进了一步。就连殖民统治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一个英属殖民地的总督都不得不面对殖民地将被取消这一事实”。<sup>②</sup>“委任统治”这一极其特殊的殖民统治形式间接地宣告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统治不再是天长地久,这一点是我们以往在研究中所忽视了的。

受国联的“委托”,英国开始对坦噶尼喀进行“委任统治”。1919年1月,英国派出了首任坦噶尼喀总督:霍勒斯·拜厄特爵士。从1919年到1925年的任职期间内,拜厄特主要从事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工作。到20年代中期,坦噶尼喀的主要经济作物的

---

①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vol. 1, p. 430.

② 罗兰·奥利弗和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年以后的非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7页。

出口额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英国在坦噶尼喀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在基本建设上大量投资,而是更多地鼓励商品农业的发展,使坦噶尼喀经济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在政权建设方面,拜厄特为后来英国在坦噶尼喀实行“间接统治”打下了基础。

根据 1920 年国联的《坦噶尼喀法》规定,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在坦噶尼喀拥有最高权力,总督下设行政委员会,负责协助总督工作,成员由英国官员担任。1926 年 3 月,坦噶尼喀成立立法会议,包括 13 名官方成员和不超过 10 名的民间人士,均由总督任命,监督总督行使职权。<sup>①</sup>行政区划基本沿袭了德国人的行政区,后发展为省,但取消了军事辖区和警备区。

英国殖民统治同德国殖民统治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社会基层广泛地推行“间接统治”,即最大限度地利用非洲人部落酋长为殖民统治服务。

“间接统治”是由英国老牌殖民者卢加德在尼日利亚北部试行并推广的(见第 11 章)。卢加德早年在印度、缅甸的英国殖民军队中服役,后来到东非乌干达和西非的尼日利亚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和扩张活动,曾任香港总督。1914 年至 1919 年任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总督。因为他为英国的殖民侵略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加封为爵士,获得巴斯勋章和金十字勋章。卢加德在长期的殖民生活中深深地体会到:面对地域广阔的殖民地,完全陌生的非洲人社会,殖民当局根本不可能完全使用欧洲官员取代当地的酋长,而必须依靠当地传统的政治领袖和受过殖民教育的当地雇员。<sup>②</sup>经过长期的殖民实践,他总结了一套关于“间接统治”制度的

---

①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vol. 1, p. 429.

②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p. 718.

理论。在一份年度报告中,他这样写道:“(殖民)政府利用本地的酋长,借助于他们的地位和统治的权力,通过他们进行工作,但要求酋长们遵守人道和正义的基本原则。……一个‘埃米尔’,如果事实证明他不听劝告,不可救药,那就撤换其职务,由一个人民所承认的继承者来取代他”。<sup>①</sup>

为了全面阐明“间接统治”理论,卢加德于1922年出版了《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一书。在书中,卢加德详细阐明了“间接统治”理论,对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和瓜分大加赞美和宣扬。他认为,白人统治非洲,对白人和非洲人都有好处,而白人殖民者则肩负着对殖民地非洲人民和非洲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双重使命。对非洲人民,白人殖民者负有“文明开化”的责任,要推动其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最后使其达到自治。对外部世界,要开发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寻求使其进入世界市场的出路。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欧洲人在非洲,是为了相互的利益,既为了欧洲自己的工业阶级,也是为了非洲本地各民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彼此得益,相得益彰是完全可行的,为了完成双重委任统治所进行的文<sub>得</sub>管理的目的和愿望也就在于此”。<sup>②</sup>

在“间接统治”的理论及实施过程中,卢加德非常重视当地非洲人部落酋长的作用,利用部落酋长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这一点,同德国殖民者在非洲各殖民地的做法有较大的不同。他指出:“土著酋长是(殖民)行政当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个单一的政府中,土著酋长同英国官员一样,有着职权明确的责任和一致公认的身份;他们的责任不但绝对不能互相冲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避免重合。英国官员和部落酋长应该互为补充,而部落

① 转引自佐依·马什《东非史简编》,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05页。

② F.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 London, 1929, p. 617.

酋长也应该清楚,如果不为国家称职地工作,就会失去地位和权力”。<sup>①</sup>依据这种理论,一战以后非洲各英属殖民地广泛推行“间接统治”制度。本世纪20—40年代,“间接统治”成为英国管理非洲殖民地的官方理论指南。<sup>②</sup>

在“间接统治”下,非洲人参与的政权主要包括三个机构:1.土著(行政)当局:由部落酋长、立法会议和其它一些附属机构组成,有行政权和有限的立法权,负责地方事务、维持安全。2.土著法庭:负责审理地方上非洲人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民事、刑事案件。3.土著财政机构:负责税收工作,税额除一部分上交给各级殖民政府外,余额支付地方公共工程的开支。在整个政权体系中,“间接统治”理论规定欧洲人的作用应在于“督导”非洲人政权的运作,较少于预地方事务,但必要时可以发号施令。

拜厄特就任总督后,开始着手在坦噶尼喀建立“间接统治”。1921年和1923年,坦噶尼喀政府先后两次颁布了《土著当局法》,授权地方当局和部落酋长维持地方秩序。到拜厄特任职后期,英国加快了在非洲各殖民地建立“间接统治”的步伐,并着手恢复被德国殖民统治摧毁的部落组织。1924年3月,拜厄特建议由殖民政府给部落酋长发薪金,这被英国殖民部认为是“朝实行‘间接统治’迈出了一大步”。<sup>③</sup>

## 二、卡梅伦对卢加德理论的发展

然而,英国全面地搬用卢加德所制定的那一套制度和政策,在坦噶尼喀大力推行“间接统治”,却是从1925年卡梅伦爵士担任总

---

① Lugard, *Ibid.*, p.203.

② J.D. 费奇, J.D. Fage, *A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史》), London, 1988, p. 415.

③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319.

督之后开始的。在赴坦噶尼喀就任之前，他曾在尼日利亚殖民政府中担任要职，长达 17 年。此人不仅有着颇为丰富的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也是卢加德“间接统治”殖民理论的忠实执行者。卡梅伦曾这样阐述自己的殖民主义理论：“……我们的职责就是尽我们全力使土著居民沿着自己的树干发展，而不是使之西方化，成为一个拙劣的欧洲人翻板——我们全部的教化政策就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如果我们毁掉一切风俗、传统及人民生活习惯，把我们自认为较好的管理方式、准则强加于他们，毁掉使我们的管理真正深入到人民习惯和思想中的东西，那就无法使土著居民成为一个优秀的非洲人。事实上，我们不应破坏非洲的气氛、非洲精神和非洲种族的全部基础，而如果我们破坏了土著人的所有部落组织，扯断把非洲人同自己人民维系在一起的根，就会出现这样的结局”。<sup>①</sup>除对上述两次《土著当局法》进行补充之外，卡梅伦任期内还把坦噶尼喀全境重新划分为 11 个省，在各省实施“间接统治”，建立各级土著政权。同样根据该法案，立法会议正式成立，成员包括 13 名官方代表和 10 名指定的非官方代表。1926 年，立法会议中的非官方代表只有 5 名欧洲人和 2 名亚洲人，由一名指定的欧洲人代表非洲人的利益。<sup>②</sup>1939 年，立法会议吸收了两名印度人成员。迟至 1945 年，才有 1 名非洲人第一次进入立法会议。1929 年，在卡梅伦的主持下，坦噶尼喀仿效尼日利亚模式，通过了《土著法庭法》，开始土著法庭的建设工作。<sup>③</sup>这样，到 1931 年卡梅伦离任时，英国在坦噶尼喀的“间接统治”已基本建成。<sup>④</sup>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的“间

---

①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vol. 1, pp. 451 - 452.

②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非洲概览》) Oxford University, 1957, p. 302.

③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p. 475.

④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320.

接统治”制度,殖民当局控制整个坦噶尼喀非洲人社会,达到了稳固统治的目的。例如,坦噶尼喀最大的部落苏库马人有100万人,他们居住的苏库马兰地区被划为5个行政区,设置了51个土著当局,<sup>①</sup>由他们直接控制非洲人。这样,英国殖民者只需用人数极少的英国官吏和军官,就控制了整个坦噶尼喀。

在实行“间接统治”的殖民政治中,非洲部落酋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名非洲酋长的所作所为,能否使英国殖民当局感到满意,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加上对英国的忠诚是殖民当局挑选部落酋长作为坦噶尼喀基层社会管理者的标准。过去,传统的部落酋长由其部落人民选举产生,他向其部落员收取贡赋,其权力只对自己的部落负责。在德国人统治时期则由“阿基达”征税。在“间接统治”下,英国殖民当局逐渐改变了这种权力授予的传统。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奥德利·艾·理查兹在分析坦噶尼喀境内最大的部落苏库马人时指出:“一个苏库马人能否担任酋长,酋长的权力范围如何,传统领袖的统治形式是继续下去还是让位于其它形式的统治,都须由坦噶尼喀总督决定”。<sup>②</sup>从酋长候选人的挑选、产生到权力的使用,都要受到殖民当局的干预。在酋长选举中,地方殖民官员可以提出候选人,而酋长的罢免则完全是由殖民当局操纵的。英国统治下的坦噶尼喀,部落酋长个人收入不能再像以往(包括德国人统治时期)那样靠收取贡赋,而是由殖民当局从中央和地方的土著财政中支付薪金。因而,“间接统治”下的部落酋长,主要不是对自己的部落负责,而是对各级殖民当局负责。殖民当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期存在,培养更多的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非洲人,专门在塔波拉开设一所6年制学校,招收8—9岁的非洲酋长子弟。学校不单进行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向这些未来的统治者灌输对

---

①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非洲概览》), Oxford University, 1957, p. 473.

② 奥德利·艾·理查兹《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0页。

殖民当局的义务和忠诚。<sup>①</sup>

可以看出,英国在坦噶尼喀推行的“间接统治”并不完全同于尼日利亚北部的“间接统治”;与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土邦政策也不尽相同。在尼、印地区,当地社会的传统政治领袖(如埃米尔)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自己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系统,英国殖民官员对他们的控制也相对小些。而在坦噶尼喀的非洲人部落社会中,被重新扶植起来的部落酋长权力较小,英国人的影响相对却更大些。英国殖民当局除了在一些无法重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地区留用了极少数名声较好的“阿基达”之外,<sup>②</sup>在绝大多数地区任用了一大批经过培训的、对殖民当局忠诚的部落酋长。如上所述,德国的殖民统治是以强大的武力破坏了坦噶尼喀的非洲人部落社会组织,而在进行殖民统治时则将当地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领袖搁置于一边,不加利用。英国殖民者反其道而行之,把已被德国人破坏的部落社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并以“英国方式”重建非洲人部落社会,使之为己所用,建立起有效而稳定的殖民统治体系。英国殖民当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一整套的体制和措施发展非洲人部落社会,美其名曰,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坦噶尼喀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sup>③</sup>而德国殖民统治则采用了相反的做法,把坦噶尼喀的非洲人部落社会从殖民地的政治中完全排除出去。在利用非洲人部落酋长上,德国人失败了,而英国却获得了成功,这也正是英国百年来积累的殖民统治经验的一个成果。

英国在坦噶尼喀推行的“间接统治”制度,同在非洲其它殖民地一样,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殖民利益。首先,对坦噶尼喀传统社会结构加以改造、利用,既减少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行政开支、军队

---

①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非洲概览》), Oxford University, 1957, p. 463.

② *Ibid.*

③ 卡梅伦语,见 Hailey, 同上书, p. 454.

的开支,也达到了稳定殖民统治和加倍掠夺的目的。其次,这种殖民统治是在坦噶尼喀原有的部落社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英国对它的改造和利用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进的,这就平息了坦噶尼喀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激烈的武装反抗,并起到了麻痹非洲人的作用。英国在坦噶尼喀 43 年殖民统治期间,未像德国人那样遭到大规模的激烈的武装反抗,比较有利于坦噶尼喀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英国的“间接统治”在客观上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时代潮流。坦噶尼喀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新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多为酋长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子弟)的出现,均同英国“间接统治”的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当然,英国推行“间接统治”,多少也有助于英国国际形象的自我标榜。

#### 第四节 殖民统治对坦噶尼喀 社会的影响

##### 一、德、英殖民统治的不同影响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和英国对坦噶尼喀进行了 40 余年的殖民统治。尽管德、英殖民统治在制度和手法上各不相同、风格迥异,但从本质上来讲是相同的,都是在政治上剥夺坦噶尼喀人民的主权与独立,在经济上掠夺坦噶尼喀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这短暂的 40 余年中,坦噶尼喀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到 30 年代初期,随着英国“间接统治”的初步建成,曾一度被德国殖民者用武力破坏的坦噶尼喀非洲人部落社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部落酋长的权力得以重新确立,进而逐渐为殖民统治打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德国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经过一段短暂的恢复,医治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创伤,进一步扩展了坦噶尼喀原有的种植园——小农的双元经济,<sup>①</sup>把坦噶尼喀完全拖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之成为各个方面都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典型的殖民地。在社会结构上,坦噶尼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间接统治”的确立,经济的发展,非洲流动劳工人数和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知识分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出现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如果把德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分开来研究,可以看出由于它们各自的特点,对坦噶尼喀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它们对坦噶尼喀未来的发展又产生了某些相同的作用。对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殖民地的发展特色及殖民主义后期的某些特点。

在卡梅伦的主持下,坦噶尼喀在 20 年代末期基本建立起“间接统治”。在此制度下,英国殖民当局控制中央政府,对地方只须向省、县派出少量殖民官员,依靠各级上著当局控制各级部落酋长,就能达到牢固统治的目的。上文中提到的对苏库马兰地区的统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每个省、县的面积、人口不等,因此各地的土著当局数目也不等,每个土著当局管辖的部落数目悬殊甚大。总之,英国殖民当局用较少的殖民官员人数,最小的开支,便做到了德国统治者未能做到的事情。表面上,英国的“间接统治”是“恢复”了被德国人用武力摧毁了的非洲人部落社会组织,但实际上,“间接统治”下的坦噶尼喀非洲人部落,同殖民者到来以前的部落社会已有很大的不同。坦噶尼喀传统的非洲人各部落的村寨组织,彼此之间没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在部落内部酋长是最高领袖,掌握着部落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而“间接统治”下的非洲人部落,酋长要从殖民当局领取薪金,要对上级土著当局负责,酋

---

① 沃尔特·罗德尼语,见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 247.

长权力更要受到殖民当局的监督和制约。各部落已不再是相互间毫无联系的社会基层单位，它们已被殖民统治这根绳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1928年，卡梅伦在视察苏库马兰之后，曾经这样写道：“尽管间接统治取代了直接统治，但是现在统治机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从前。偏远的埃亚西湖畔的梅图农民，同自己的头人有了密切的联系，头人同副酋长，副酋长同酋长，酋长同县公署，也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省督可以了解他辖境内发生的一切，而在从前，他根本无法做到这点”。<sup>①</sup>英国殖民当局由此有效而稳固地进行殖民统治。另一方面，“间接统治”下部落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传统社会中社会单位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隔绝状态的冲破，对于坦噶尼喀未来社会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壮大，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坦噶尼喀的现代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sup>②</sup>

德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坦噶尼喀境内并未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国家，桑给巴尔素丹国的势力实际上只能影响沿海狭长地带。在南部地区，恩戈尼人的部落联盟主要是军事结盟，其内部各部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十分松散。经济发展水平以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各族最高，其贸易范围也很广，不仅扩展到周边地区，而且已有长途贸易和海洋贸易。斯瓦希里商人和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人们以沿海港口城市基尔瓦、林迪为基地，向西一直延伸到湖滨内陆地区，从事象牙、黄金、奴隶贩运，在固定的商路上还驻有士兵守卫。<sup>③</sup>而西部湖区和南部山区的非洲人部落社会，则停留在较低的

---

①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325

② 约翰·艾利夫博士认为这种民族主义的萌芽最初表现为 30 年代以前为殖民政府工作的非洲公务员的“全领地意识”。德国统治后期，经过培训受过教育的“阿基达”就可能具有这种意识。

③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45.

发展阶段上,有的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著名的东非抵抗运动史专家兰杰教授认为,打败未形成国家的非洲人社会容易,而要进行统治则困难得多。<sup>①</sup>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殖民统治经验的德国人只做到了前一点,而他们的殖民统治则很难说是成功的。直到德国失去坦噶尼喀殖民地之前,德国殖民政府也没有找到巩固其统治的良策。德国所实行的“阿基达”制度,完全忽视了非洲人部落社会固有的政治结构和传统政治领袖的地位,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黑人完全排除在殖民地政治生活之外,使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大厦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德国殖民当局利用“阿基达”制度,在经济上使用茅屋税、人头税、强迫劳动制度等一系列超经济手段,对坦噶尼喀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和掠夺。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迫使坦噶尼喀人民揭竿而起,用最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反抗殖民统治。德国殖民者对武装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又引起了非洲人连续不断的反抗。这些都为后来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反抗的传统。

和德国相比,英国继承了德国人的殖民统治,打着“国联”旗号,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坦噶尼喀非洲人的武装抵抗。英国殖民当局在德国人血腥镇压坦噶尼喀人民反抗的基础上,在坦噶尼喀实行了“间接统治”。英国的“间接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同它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灵活的殖民政策以及对非洲殖民地社会比较深入的了解分不开的。如果说德国的殖民统治无视坦噶尼喀非洲人传统社会中部落组织的存在,英国殖民当局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在“间接统治”下,英国殖民重视非洲部落和部落酋长的作用,在坦噶尼喀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殖民统治,而坦噶尼喀非洲人部落社会中的传统政治领袖,饱尝了德国人

---

① T.O. 兰杰语,见 L.H. Gann &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p. 307.

的冷落之后,靠拢英国,成了殖民当局得心应手的工具。德国殖民者用武力破坏了坦噶尼喀的非洲人部落社会,却并没有根除产生这种社会结构的土壤。英国人在恢复部落社会的同时,对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逐步进行改造,使之为自己的殖民统治服务。事实上,对传统的非洲人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不是德意志军人的军刀和皮鞭,而是英国人佩在各级酋长身上的勋章和绶带。卡梅伦把卢加德的殖民理论同坦噶尼喀的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为英国在坦噶尼喀的稳固统治,打下了比较浓厚的基础。老练的英国殖民者既巧妙地利用坦噶尼喀当地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统治,同时,又把“间接统治”同“委任统治”堂而皇之地结合在一起。说到底,卢加德的双重委任统治理论在本质上正是“白人的负担”观念在 20 世纪的变种,<sup>①</sup>只不过经过了英国殖民者薄施脂粉,乔装打扮,得到了新旧殖民主义者的一致喝彩。

由于有“委任统治”的牌子,在英国的“间接统治”下,本世纪 20 年代的坦噶尼喀社会比沉闷的德国统治时期更为活跃,出现了各种松动的迹象。在卡梅伦总督时期,非洲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社会发展,这对于坦噶尼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壮大,是比较有利的。在一个客观上政策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加上德国人留下的经济基础设施,坦噶尼喀早期黑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从这一阶层中,成长起来了新一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当然,在主观上,“没有一个殖民统治者愿意创造并培养非洲民族主义”,<sup>②</sup>英国殖民当局也不例外。但是,随着政策上的松动,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受教

---

① C. L. 英瓦特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第 1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37 页。

② A.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 年》第 7 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1 年,第 637 页。

育的非洲人数量的增加,非洲民族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有些非洲学者认为,坦噶尼喀的民族主义从德国人殖民侵略开始的时候就已存在了,<sup>①</sup>但严格地讲,坦噶尼喀早期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基本上是部落范围的抵抗,而不是全社会范围内对殖民主义的反应。坦噶尼喀现代民族主义的真正成长与发展,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它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宗教组织到劳工组织,知识分子团体及民族主义政党雏形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11年,坦噶尼喀早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马丁·卡扬巴在坦噶尼喀成立了“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这是坦噶尼喀全国范围内第一个非洲人组织,虽然最初的成员只有40人,其初衷也仅仅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保护会员利益,但它却举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样鼓舞人心的民族主义旗帜,<sup>②</sup>可以说是民族组织的雏形。随后,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又相继成立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和“坦噶尼喀非洲工人中央协会”两个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sup>③</sup>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相继出现,为坦噶尼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组织领导力量的保证。英国统治时期,殖民地教育较德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力量大大增加了。在遭受文化侵略的同时,非洲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现代科技知识和进步思想。例如,塔波拉殖民学校培养的“精英”被视为殖民统治机构文职人员的后备军,但后来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切,不能不说同英国的殖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接管遭受战争破坏的坦噶尼喀殖

---

① 伊·基曼博和阿·特穆:《坦桑尼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66页。

② I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267.

③ 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简称非洲人协会(TAA),大约于1929年下半年成立于达累斯萨拉姆,坦噶尼喀非洲工人中央协会(Tanganyika African Welfare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 TAWCA),成立于1936年1月。

民地。殖民当局在经济上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赶上原有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建设方面,英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像德国人那样,把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英国殖民当局更注重在德国人遗留的基础之上,发展商品性农业经济,促进坦噶尼喀的对外贸易。英国经济政策初见成效。到20年代中后期,坦噶尼喀的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例如,1926年,坦噶尼喀西沙尔麻和棉花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927年到1930年期间,乌鲁左鲁斯的云母矿,姆索马、姆万扎的金矿都重新开采,从塔波拉到姆万扎的铁路也在1928年通车。<sup>①</sup>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当地非洲人作出了贡献。1927年至1928年,坦噶尼喀出口总额的51%是由非洲人创造的。<sup>②</sup>而在白人种植园和矿山中,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也是当地的非洲人。

## 二、深刻的社会变化

随着殖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坦噶尼喀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德国统治时期,殖民当局兴办了大批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在同期的非洲各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儿童接受教育的比例是比较高的,20年代后,这种趋势仍在发展。在坦噶尼喀儿童中,1925年的入学率达12.15%,<sup>③</sup>这在经济落后的非洲地区是相当高的。另一突出现象是,在坦噶尼喀的经济生活中,随着部落经济的逐渐解体,非洲流动劳工的人数迅速增加,1913年,在整个德属东非(主要是坦噶尼喀),受雇佣的非洲流动劳工总数达到17.2万

---

①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p. 145-147.

②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New York, 1978, vol. 1, p. 477.

③ *Ibid*, p. 486.

人,其中为白人殖民者工作的非洲劳工近 14 万人。<sup>①</sup> 20 年代至 30 年代,人数仍在增加,桑基、基戈马、恩约姆双等地区成为坦噶尼喀非洲流动劳工的主要来源地,<sup>②</sup>这在以往坦噶尼喀传统社会中是从未有过的。农村人口的外出、受教育人口和流动劳工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部落社会的封闭与隔绝状态,有助于全国性民族主义组织的成长和壮大,可见,经济发展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畴,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30 年代前的经济增长,为坦噶尼喀未来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培植了合适的沃土。可见正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从根基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在坦噶尼喀从事了“基础性工作”,但他们却来不及品尝结果,而英国殖民者通过推行“间接统治”,却收获了殖民硕果。坦噶尼喀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在殖民统治时期就这样奠定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殖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消极的负面作用,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殖民者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像他们所标榜的“为了造福于非洲人民”。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英国统治坦噶尼喀十多年以后,坦噶尼喀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获益最大的是英国殖民者而不是非洲人民。而且这种经济发展是以牺牲非洲人的利益为前提的。例如,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加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也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在坦噶尼喀,为殖民地经济服务的非洲流动劳工多数是没有熟练技术的粗工,工资极低,绝大多数是季节工人,处于半工半农状态,这对于

---

① L. H. 甘恩和 P. 杜伊格南《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1884—1914 年》第 203 页。

②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 147.

现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工人运动的发展极为不利。而正是这种工资极低的流动劳工,为殖民者提供的利润最高。其次,流动劳工数量的增加虽使坦噶尼喀的种植园经济和其它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以向劳动力输出地区转嫁灾难为前提的,<sup>①</sup>它进一步加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坦噶尼喀未来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埋下了后来独立时期出现的种种困难因素。

英国所扶植的殖民经济发展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使坦噶尼喀经济彻底脱离了农业与本地区商业相结合的传统模式,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作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成为十足的附庸。二三十年代,棉花和西沙尔麻已成为坦噶尼喀的主要出口商品。<sup>②</sup>此时正值世界原料市场价格猛降,这给坦噶尼喀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损害。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坦噶尼喀经济欠发达的状态有加无已。“生产自己不消费的产品,消费自己不生产的商品”,成为坦噶尼喀依附性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坦噶尼喀传统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后,单一种植园的殖民地经济并没有使坦噶尼喀社会得到真正的进步,充其量只有增长而无发展。到60年代坦噶尼喀获得独立时,它连最简单的工业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全靠进口。可见,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欧洲殖民者,而非洲人只是宗主国发展祭坛上的供品。

毋庸讳言,德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坦噶尼喀社会还产生了另一方面而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以后,在德恩堡的推动下,德国开始在其殖民地大力推行“科学殖民”政策。在德国统治后期,德国人在东非大力兴办学校,修建医院,建立各种科研机构,

---

① Kaniki,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 London, 1980, p. 138.

②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坦噶尼喀现代史》), Cambridge, 1979, p. 301.



使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在接受近代技术方面有所受益,我们也不应无视这些客观事实。英国统治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非洲人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也都有所提高。作为殖民统治的副产品,这些变化多少有益于非洲人民。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殖民主义的掘墓人——现代非洲民族主义,则是不以德、英殖民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坦噶尼喀未来三十年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已经在殖民统治体制中显出端倪了。

综上所述,殖民主义经济对坦噶尼喀的影响是双重的,这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直存在。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强迫劳动制对当地传统社会结构的猛烈冲击,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依附地位的形成等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正如阿杜·博亨所说:“不管殖民阶段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使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sup>①</sup> 这又让我们记起马克思的名言,殖民地的进步“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sup>②</sup> 我们看看坦桑尼亚独立已三十多年,经济发展依然处于依附状态,就会同意这样的结论并不过分。

---

①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6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集,第252页。

##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及战后初期非洲 殖民地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世界性战争，是世界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决定性较量，它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被动卷入战争的非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非洲殖民历史的一个分水岭”。<sup>①</sup>由于战争初期欧洲宗主国在欧洲战场的接连失败，非洲作为“侧翼”的战略地位日显突出。出于对非洲战略地位的争夺与重视，对非洲人力、物力资源的迫切需要，欧洲宗主国被迫放宽对殖民地的控制，调整殖民政策并作出不同程度的许诺。同时，广大的非洲人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行列，他们从战争中得到锤炼，民族意识觉醒。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非洲大陆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得到较迅速发展；民主、自由及自治、自决观念广泛传播；新的阶级、政党产生，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重重地冲击欧洲宗主国几百年来在非洲建立的殖民体系，预示着殖民统治末日的来临。

---

<sup>①</sup> L. H. Gann, Peter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I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 (《殖民主义的历史与政策》), Cambridge, 1970, p. 512.

## 第一节 非洲在战争中的作用

### 一、在北非战场的作用

二战开始后不久,非洲便以其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盟国与轴心国争夺的一个主要战场。

1940年5月,英军惶惶从敦克尔克撤退,退守英伦三岛。1940年6月,巴黎沦陷,法国投降。墨索里尼认为由意大利夺取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实现其“新罗马帝国”的计划已经成熟,便于1940年6月10日向英、法宣战。意军从阿尔卑斯山向法国背部猛插一刀,驻扎在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两集团军向英国在北非的属地埃及猛攻,开始了英、意在东非和北非的激战。非洲成为二战的一个主要战场。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进一步加剧交战双方争夺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

此时,无论对英、美、法(自由法国)盟国还是德、意轴心国,非洲的战略地位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重要。特别是靠近地中海的北非,由于这里拥有海空军基地,控制住它,就意味着获得了向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土耳其实施海陆空军联合军事行动的决胜基地。同时,北非沿海地带又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交战双方均可依靠海陆军支援,夺取通往近东的通道和非洲腹地。对战争初期处于劣势的英国及盟国来说,非洲更是性命攸关的地区。能否守住北非,是盟军能否反攻欧洲大陆的关键,而非洲丰富的战略资源,更是盟军克敌致胜的重要物质保障。从英国方面考虑,保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的大英帝国生命线尤为至关重要,英国战时内阁在兵力和舰船极度紧张情况下,仍不惜一切不断增兵埃及——利比亚战线以至最后策划盟军登陆北非,显然含有保住帝国的殖民战略考虑在内。轴心国战略考虑也有在大英帝国生命线

上予以狠狠一击之意图。因而,从1940年6月到1943年4月近3年的时间里,北非战场鏖战激烈。

战争初期,英军与意军交战两个多月,于1940年8月一举击败意军,并占领意大利在东北非殖民地,从而粉碎了意军进攻苏伊士运河的企图。希特勒闻讯气急败坏,即派骁将隆美尔增援。隆美尔现代化坦克兵团的到达,很快改变了北非战场的态势。1941年3月到4月仅一个月时间,就使英军的反击成果丧失殆尽。1942年6月20日英军要塞托卜鲁克失陷,盟军始终未能扭转整个北非战场的被动局面。1942年11月,英美联军为重新夺回北非,控制整个战局的主动权,联合发起代号“火炬”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在北非开辟了新战场。盟军于11月底占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扭转了整个战局。对轴心国而言,北非战场的结局,既意味着意大利彻底丧失其在北非和东北非的殖民帝国,又意味着“失去了在将来争夺地中海欧洲海岸的斗争中打败同盟国的一切希望,是末日的开始”。<sup>①</sup>

以上并不说明在非洲地区进行的战争仅仅只是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战争。事实上,非洲各族人民直接投入了这场战争,确实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 二、非洲兵源优势

非洲为盟国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兵源。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3年,英属西非4个殖民地招募的士兵共达16.9万人<sup>②</sup>,在坦噶尼喀等殖民地招募22.2万人编入“东非兵团”,<sup>③</sup>而法属非洲

① 汉斯—阿道夫·雅各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页,第175页。

②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③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1919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3, p. 141, p. 140.

(在法沦陷前)提供兵源 17 万余人。<sup>①</sup>1942 年 11 月,英美联军在马格里布开始“火炬”行动时,就建立了一支 30 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军队,这些兵员或参加正规部队,或参加游击队,或者活跃在前线,或者在后方担任运输以及建筑等各种军事工程的劳动,起了重大作用,是战争中重要的力量。这些非洲人,适应非洲本土气候,特别是北非沙漠干燥炎热气候,又有吃苦耐劳的习惯,所起作用欧洲士兵所不可能承担的。

在东非,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持续了 7 年,在首都亚的斯亚巴沦陷后,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在全国各地展开抵抗,虽然武器简陋,但长期有效地牵制了大量的法西斯军队。1941 年夏,埃塞俄比亚人民以牺牲 70 万人的代价,配合盟军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取得了反攻复国的胜利。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公正地评价“只有记住爱国部队长期坚持的游击战争,才能说明意大利崩溃的原因。”<sup>②</sup>(详见第 15 章《意属殖民地》)1941 年初,在英国将领肯廷汉指挥的大反攻中,有一支被编入“自由法国”军队的非洲人正规军,他们来自南非、苏丹、尼日利亚、喀麦隆、黄金海岸、比属刚果、塞内加尔、加蓬、刚果(布)、中非、乍得和南罗得西亚等,这支队伍骁勇善战,与其他部队一起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实行反攻,直至 1941 年夏把意大利军队赶出东北非。

在北非,有 10 万余名非洲士兵和民工参加了解放利比亚的战役。盟军在北非登陆后,非洲人组成的部队即参加了解放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战斗。法国维希政权在北非殖民地的士兵有 8 万人倒戈,参加盟军。

北非战役结束后,非洲人士兵还被派往欧亚战场,参加远征意

---

①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1919 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3, p. 141, p. 140.

②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政治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514 页。

大利德国本土和解放法国的战斗,甚至派往缅甸和马来西亚与日本作战。<sup>①</sup>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法国军队中 6.33 万塞内加尔土著士兵就有 2.427 万“下落不明”,在北非战场,仅在攻占突尼斯城的战役中,非洲士兵伤亡及下落不明的就有 2 万人。<sup>②</sup>而在欧洲及东南亚战场,伤亡更为惨重。解放法国时有 7 万突尼斯人牺牲,<sup>③</sup>在缅甸作战的三个非洲师共有 2570 人阵亡。<sup>④</sup>非洲人士兵的惨重代价,是盟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前提。非洲人在部队很难获得晋升,担任下级军官的也极为罕见。即使参加了正规军,装备也较为陈旧而且往往派去参加危险艰苦的战役。宗主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害怕非洲人学会现代战争手段后,会反过来反对殖民者。尽管如此,宗主国的一些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不得不承认非洲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与牺牲。1945 年 6 月英国政治家索耳兹伯里勋爵在一次演说中坦露的:正是有非洲殖民地的存在,才能使我们从这里取得最重要的物质和支援,……只是靠这个才挽救了我们免于失败。

的确,非洲大陆对交战双方的胜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还由于它是提供宝贵的人力及物力资源的基地。非洲的资源是盟国军队的宝贵血液,取胜的重要保障。二战初期,英法等国频频失败,德国占领了整个西欧,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又被日本抢占,这不仅在战略上、从而在作战物资上给反法西斯盟国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局面,此时非洲原料的供应对盟军作战尤为关键。(参见第 2 章)

---

① 派往东南亚作战的非洲人士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据巴兹尔·戴维逊统计,隶属英军的土著部队有三个师,其中两个西非师,一个东非师。见巴·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28 页。

②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27—228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非洲大陆和周边海岛为盟国提供了极重要的海空基地。战争初期,英法从欧洲主战场溃败后,尼日利亚和南非联邦的港口和航线,成为盟军海上交通要道。为了适应战场的需要,英美两国派出大批专家在非洲殖民地修建港口、船坞和机场,铺设和整治公路和各种交通要道。利比里亚迅即成为美洲军火运往近东和中东的转口站。<sup>①</sup> 1942年法属西非倒向戴高乐后,为盟军提供了更为优越的良港和机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西非和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的基地为盟军进攻西西里、意大利本土和解放希腊、克里特半岛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 第二节 战争对非洲殖民地 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原因

巴兹尔·戴维逊曾经说过:战争带来的长远后果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在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老牌帝国主义垄断统治的根基,……从经济上看则正好相反,战争环境却竟然完善和巩固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以榨取殖民地为特征的经济结构。<sup>②</sup> 的确,战争使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本土经济遭到严重打击,而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经济却在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战争的刺激,宗主国的需要。英法在欧洲大陆失败后,许多传统的供应线中断,战略物质奇缺。英国从敦克尔刻撤退后,本土的军事储备量仅够装备一个师。在美国参战前,英国通过《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1940年,戴高乐在伦敦

<sup>①</sup>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92页。

<sup>②</sup>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

宣布成立“自由法国”后,英国是唯一向“自由法国”提供一切战略物资的国家。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以速战速决之势,迅速占领了英法在东南亚盛产原料的殖民地,这对军事、经济处于困境的英国等盟军来说不啻雪上加霜。据英国殖民事务部估计,英国已丧失世界锡产量的60%和橡胶产量的90%以及钨、锰、铅和其他矿产的大部分。<sup>①</sup>此时,失败的阴云笼罩着英国。英帝国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唯有作为巨大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的殖民地是它重振战斗力的希望所在。英政府意识到危机时刻当务之急必须动员殖民帝国特别是潜力巨大的非洲殖民地的人力物力的一切潜在资源。在英内阁会议桌上殖民地生产什么,积极的发展计划可能使它们生产什么等问题,一下子变成了大臣们迫切需要优先考虑的了。<sup>②</sup>东南亚殖民地的丧失已使英国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于非洲。战争的需求无疑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战略原料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采矿业的迅猛发展。

其次是殖民宗主国经济政策的转变。殖民政府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开始加快发展殖民地经济,以满足战争需求。战时在殖民事务部任职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说:“我们必须为了战争而大规模增加殖民地的生产。我们必须发展矿产。我们必须提高肉类、牛皮、棕榈油、花生等等的生产。……我们需要来自肯尼亚的西沙尔麻,以及像麻这类更优质的作物。”1940年,英政府颁布《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以取代1929年的《殖民地发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制定了为期10年向殖民地投资500万英镑的计划。<sup>③</sup>法国维希政府也在原来

---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2),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9页。

②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2—393页。

③ C. Coguery-Vidrovitchet H. Moniot,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1800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4, p. 238, p. 420.



的基础上追加了投资。1943年,维希政权在其所控制的黑非洲殖民地的公共投资竟占整个投资的34%,其中私人投资达47亿金法郎。<sup>①</sup>在戴高乐“自由法国”控制下的法属殖民地,更为积极组织发展生产。法属赤道非洲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动员黑非洲各国人民和经济力量来支援盟国的战争”,为此他积极制定政策,组织自耕农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战争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他力主不应只招收劳动者个人,而应把他们全家迁到工厂里去。<sup>②</sup>这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明显地促进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非洲经济的发展突出体现在工业生产上,尤以采矿业为最。战争刺激了多种战略原料开采量的增加,铜、锡、锌、铝土矿、钻石等战争急需的原料开采量急剧增长。比属刚果铜矿开采1939—1946年从122 000吨增到165 000吨,<sup>③</sup>锡生产成倍增长,钻石产量1945年达到1 038.6万克拉,为历史最高产量,占盟国所需65%以上。<sup>④</sup>钴矿开采比和平时期增加了几倍。英属西非以及南北罗得西亚、南非联邦的采矿业发展更为迅猛。如尼日利亚锡产量1944年比战前提高了41%,黄金海岸锰产量在1939—1946年间增长了100%;南罗得西亚铬矿产量1942年达到34.83万吨的高峰,比1935年增长了3倍;1935年至1940年,北罗得西亚铜产量由14.35万吨增至26.24万吨,增长近55%。<sup>⑤</sup>此外,新兴能源

---

① C. Coquery-Vidrovitchet H. Moniot,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1800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4, p. 238, p. 420.

②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93—194页。

③ E. A. Ayandele,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sation* (《非洲文明化的成长》), Longman, 1971, p. 347.

④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⑤ 亚·尤·施皮尔特:《非洲原料资源(1913—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07、119页。

石油的开采量也增加了。埃及在1908—1937年30年间只开采了几十万吨,而在战争期间开采量增加六七倍。<sup>①</sup>

战争刺激了加工业的发展。英属西非、埃及、南非联邦、比属刚果等地区的加工工业有较大规模发展。包括加工各种矿石的有色冶金业,生产各种小型工具的五金业,为矿山服务的化学工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尼日利亚加工业较为典型。尼日利亚的本地资本家建立了木材加工业、制革业。还出现了第一批棉纺厂和制糖厂。在法属非洲,马格里布三国开始拥有一些重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建立了铜板厂,铜的生产量达一百万吨。<sup>②</sup>比属刚果加工业尤以食品加工业发展最快。1938年为423个,1944年增到729个,加工业的产值也有所上升。据马尔丁诺夫统计,南非联邦的加工制造业实际产值几乎增长100%,南罗得西亚的加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sup>③</sup>

## 二、子虚乌有的“战时工业化”

战时非洲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但一些西方学者因此称之为“非洲的战时工业化”,却属子虚乌有。专门研究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菲德豪斯公正地指出“直至1945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刺激各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多样化方面没有做出什么”。<sup>④</sup>人们看到战时非洲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首先,并非所有经济部门都得到了发展。增长较快的部门,主要集中在战时所需要的采矿业和一部分加工业。而农业生产则相对萎缩。大多数地区的单位面积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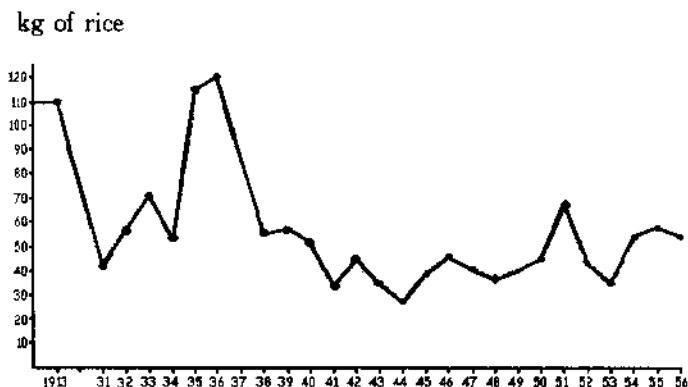
① 亚·尤·施皮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非洲经济的问题》,载《国际问题译丛》,1958年第5期。

② Henri Mausset, *France et Afrique du Nord* (《法国与北非》), Larose, 1945, p. 191.

③ 马尔丁诺夫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72页,第82页。

④ 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殖民主义(1870—1945)》), London, 1983, p102.

量及总产量都有下降,播种面积减少。从下列一张图表可以看出法属西非稻米生产在战时急剧下降的趋势。<sup>①</sup>



在作战区,农业的衰退更加明显。据亨里·莫塞(Henri Mausset)统计,战前法属北非谷物生产将近4500万公担,到1944年,仅小麦产量就减少1/3<sup>②</sup>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移民较多的地区,白人移民的农牧业发展了,而非洲人的农牧业却处于停滞和衰退之中,畜牧业也在战时衰退了,据施皮尔特统计,阿尔及利亚在1939年牛的总头数88.6万头,绵羊648.8万头,而到1947—1952年中牛的总头数降到78.4万头,绵羊399万头,<sup>③</sup>在欧洲移民较多的地区,如肯尼亚、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的农牧业却得到了发展。战争开始后,白人农场主们因政府补贴、高价收购以及其他照顾机会而获得发展机会。在肯尼亚,白人移民的玉米播种面积1939—

① Peter C. W. Gutkind and Peter Waterman, *African Social Studies*(《非洲社会研究》), London, 1977, p. 126.

② Henri Mausset, *France et Afrique du Nord*, Larose, 1945, pp. 186—187.

③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1940年为9.4万英亩,1945年增到13.2万英亩;<sup>①</sup>1941—1945年小麦播种面积从10.3万英亩增至18.45万英亩。<sup>②</sup>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殖民当局在大战期间因战争需求而采取杀鸡取卵式的压榨,对白人移民和非洲人的不同政策以及战争带来的破坏(尤其是北非、东北非和东非)。

其次,即使在加工业方面,其门类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即使像比属刚果加工门类较多的地区,许多国内市场需求的基本消费品如火柴、煤油、自行车等仍不能生产。加工业一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极小。<sup>③</sup>

战时殖民经济又一特色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比战前更高的榨取率。英国政府通过对殖民地航运、关税、银行、保险及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采取贱买贵卖,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方式,榨取非洲人的血汗。据麦克米伦透露,光是西非农产品收购与出售价之间的剪刀差,在战争结束时总数达几个亿英镑。<sup>④</sup>“自由法国”控制非洲后,凭借原有的殖民统治政策和手段,或者接管殖民地各种基金和经济机构,或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绝对控制,最大限度地搜括殖民地的财富。另外,通过在殖民地增加税收、摊派公债等获取巨额款项。<sup>⑤</sup>比利时在刚果也同出一辙。1945年,一位比属刚果传教士证实:“5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处于极度紧张和变化无常的战争状态之中。为了出口同盟国所需物资并取代进口,所有黑人都在尽可能快地从事生产。”<sup>⑥</sup>这一切都是通过降低非

---

①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03页。

④ 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2),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卷,第177页。

⑤ 参见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3页。

⑥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9—230页。

洲人的工资和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 三、战时经济的深刻变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化。首先,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增长。非洲向宗主国的输出大量增加,如英属西非,从1938年到1946年,其外贸额由4400万英镑增长到8600万英镑,增加近一倍。<sup>①</sup>非洲大陆间贸易也发展了,比属刚果向法属赤道非洲输出多种货物,安哥拉向比属刚果输出鱼干和食盐,向南非提供咖啡、木材等。其次,交通运输得到改进和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非洲各地修建和扩建了港口,开辟了新的航空干线,扩大了旧的航空运输线,连沟通西非与北非的古代撒哈拉商道也被充分利用。交通运输的发展,使非洲各地区间的联系空前加强。此外,采矿业和加工业的扩大,工人人数的增加,新的城镇开始出现。比属刚果加丹加地区,到二战结束时形成了厂矿密集的工业区,拥有多座矿山、选矿场,以及为采矿业服务的冶金和化学工厂、各种修理厂、实验室、发电厂和各种交通设施,形成一座新兴城市。此外,为稳定劳动力,刚果一些矿业公司提供更吸引人的条件,如配备适当的生活及医疗服务,以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矿山。这样,“人们到城市工作不再看成是一种强迫行为而看成是令人高兴的经历。”<sup>②</sup>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仍以比属刚果为例,1940年,拿工资的人为53.6万人,到1945年,增加到70万人。利奥波德维尔等工矿集中的城市人口增长更快,从1940年到1945年,城市人口增长近一倍。<sup>③</sup>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非洲的经济面貌,从面对整个非

---

① C. Coquery-Vidrovitch, *op. cit.* p. 237.

② Peter C. W. Gutkind and Peter Waterman, *op. cit.* p. 348.

③ *Ibid.*

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殖民当局调整殖民政策,非洲社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迫形势下,宗主国在非洲殖民地所发挥的较为突出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殖民主义史上也是颇具特色的。

### 第三节 殖民制度的调整

二战的6年进程引起了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也动摇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迫使英法在战争中和战后初期对殖民制度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总的来说,英法调整殖民制度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但其背景和内容不尽相同。

#### 一、英国对殖民政策的调整

英国在战争中面临严峻形势,军事上频频失败,为转危为安,争取战争胜利,必须制定一种新的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殖民地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为战争服务。

美国在老殖民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对英国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对非洲有其战略考虑,只是没有机会插足。二战给它涉足非洲提供了极好机会。英国明白美国的真正意图,但又无可奈何。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承认:美国的参战给英国带来了至可宝贵的安慰和胜利的保证,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忧虑和不便,其中政治方面就是罗斯福对殖民地问题的兴趣。<sup>①</sup> 1942年11月《泰晤士报》也认为,美国对英国提出了加速非帝国主义的挑战。<sup>②</sup>

此外,战争中及战后初期浓厚的反法西斯民主气氛以及殖民

<sup>①</sup> 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2),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0页。

<sup>②</sup>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9页,脚注。

地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增加了国际压力,迫使英政府修改殖民政策。

战争爆发后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改革殖民政策的紧迫性。在殖民事务方面任职的哈罗德·麦克米伦 1942 年在一次议会讨论中提出与殖民地结成似是而非的“伙伴”关系的观念。他说:“旧日的帝国已经死亡,因为它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它们是僵硬的。它们墨守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殖民帝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原则,从伙伴关系中产生谅解和友谊。”<sup>①</sup> 当时,敏感的报纸马上撰文,猜测伙伴关系似应“含有每一个殖民地都要逐渐上升到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意思。”<sup>②</sup> 工党领袖们观点总要表现得比保守党更为激进。工党领袖大声疾呼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不久,工党领袖艾德礼(1945 年任首相)声明:“工党……谴责帝国主义。我们认为各族人民,不论其种族和肤色,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和公平分享世界上一切美好东西的权利。”<sup>③</sup> 两年后,艾德礼甚至表示“期待在非洲出现日益广泛的自治。”<sup>④</sup> 尽管这些言论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宣传目的,它也多少反映了英国在政治气候朝改革殖民制度方面转变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意图。

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其中经济上最著名的措施是提出了殖民地发展计划。1940 年颁布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计划分 10 年贷款 500 万英镑,这笔资金的来源,是英国财政部按官方援助计划拨给的优息贷款。东南亚被日本占领后,橡胶、锡等资源匮乏,急需开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 年 6 月 24 日转引自《麦克米伦回忆录》(二)第 179 页。

② 《伯明翰邮报》1942 年 6 月 25 日转引自《麦克米伦回忆录》(二)第 179 页。

③ 艾德礼:《工党的和平宗旨》转引自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 3 卷第 28 页。

④ 《每日先驱报》1941 年 8 月 10 日转引自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 3 卷第 29 页。

发非洲的资源,英国设立专门委员会管理殖民地经济。如东非战时供应委员和民需供应委员会及西非会议,负责指导生产、制定价格、统一收购。英殖民事务部请马来亚的种植园主和专家在东非和西非整顿原来备受忽略的种植园,大规模采集野生橡胶,并按足以吸引最大限度生产的标准来制定价格。在西非,英殖民当局集中力量于稻谷、蔬菜及乳制品的增产。应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在指导生产方面是有成效的。

1944年,殖民大臣乔治·霍尔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开发殖民地及其一切资源,以便使其人民迅速和大幅度地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并在有实际可能时尽早实现责任自治……<sup>①</sup> 战后这一计划得到了扩充。1945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把款项追加至1200万英镑,1948年英政府又通过《海外资源发展法》,并设立了海外食品公司和殖民地发展公司。它们分别拥有向政府借贷500万英镑和1.2亿英镑的贷款权。其中海外食品公司试图在坦噶尼喀种植花生,在冈比亚饲养家禽,但都不成功。<sup>②</sup>

总的来说,殖民地发展政策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殖民地经济发展。殖民地经济作物产量及出口均有所增加。如埃及的棉花,1942—1947年间,平均年产量为30万公吨,1948年增至40万公吨。<sup>③</sup> 此外,对外贸易额也随之增长,尼日利亚1939年出口总值为890万英镑,1953年增至1.253亿英镑,<sup>④</sup>殖民地发展政策使英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战时英属非洲的主要出口货物由英政府整批收购,它作为代理人将货物销售到世界其他各地,由英国掌握货

---

① 参见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② 仅花生一项就亏损了3600万英镑。见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237页。

③ Peter L. 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OUP 1986, p185, 转引自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216页。

④ M. C. English, *Short Histor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简史》), London 1960, p162.



款,存于伦敦以保证贷款用于战争。战后,货物控制销售制度仍然维持,总数已达若干个亿,<sup>①</sup>不仅有利于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而且成为战后向非洲资本扩张的基础。

在政治上,英政府实施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强化间接统治。改革经历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两个时期,正如第11章所指出,英国殖民统治的特征是间接统治,即依靠当地酋长建立土著当局进行统治。战时,英国开始着手改组地方制度,进一步强化间接统治。在西非,英殖民当局采取了吸收非洲人参加行政会议,改组城镇议会等措施。如黄金海岸,1942年,殖民当局同意两名非官方的非洲人成员参加原先完全由指定的官方成员组成的行政会议;1944年,英同意阿散蒂封建统治者代表在立法会议中占有席位,但二者人数都加以严格限制。同年,英还颁布了“土著当局条例”和“土著法庭条例”。根据这两个条例,土著当局一旦为殖民政府认可即可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在1943年至1945年间,殖民政府就城镇议会改组颁布了四组条例,但未能实施。在尼日利亚,1942年,尼日利亚总督伯纳德·鲍迪伦在他主持的行政会议中增加了三名非官方成员,其中两名是非洲人。1942年9月,他起草新改革方案,建议除中央立法会议外,另在殖民地三个区分别设立“地方立法会议”由“土著当局”选举的代表组成。但这个计划亦未能实现,只是一纸空文。在东非,为了保持肯尼亚众多白人移民的殖民利益,英积极筹划建立东非联邦。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制定一项进一步加强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之间合作的计划。1945年,斯坦利抛出了宪法草案,工党政府上台后,这份宪法草案宣告流产。

战时英属非洲的经济、政治发展,促使战后初期工党政府改弦易辙,因为原来英国扶植的土著酋长文化水平太低,没有能力管理

---

<sup>①</sup> 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7页。以殖民地英镑资金形式出现,1955年西非为5.07亿英镑,东非(包括亚丁)为1.97亿英镑。

地方经济发展项目和设施,不适应开发殖民地政策的要求。英国继续加快对殖民地进行行政改革计划。1947年2月,新任殖民大臣给殖民总督一份通报宣布新政策,表示要把根据“间接统治”制度建立的土著当局改造成“有效率的民主的地方政府制度。”<sup>①</sup>其主要内容有二:第一,把许多分散而效率不高的土著行政单位合并为较大的行政单位,通过选举产生村、地区、县以至省的地方委员会,以逐步取代原来的土著当局。第二,通过选举吸收知识分子,新兴中产阶级和农民参加的地方政府。

英国政府在殖民政策的调整上逐渐由经济而转向政治,说明它已经意识到殖民制度的危机。从实施“改革”的动机看,在帝国经济困难情况下,英政府首先是为了最大限度调动殖民地人力物力资源。其次是通过兴办教育培养亲英人材,改组政府,扩大地方政府基础,吸收一部分受过殖民地教育、又曾在地方政府中受训练,政治上能与英国合作的非洲人进入立法会议中央政府,使殖民统治得到改善和巩固,并且逐步地在殖民地享有一定的自治。这些改革,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宪法改革打下基础。但这些措施还谈不上是什么全面启动了“非殖民化”的步子。

## 二、法国对殖民制度的改革

在大战期间,法国在非洲的地位与英国大相径庭。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反法西斯的法属非洲殖民地为基地,配合盟军抗击德意法西斯,直至最后反攻欧洲大陆,解放法国本土。因此,在此背景下,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与英国无论在背景还是具体内容上

---

<sup>①</sup> 鲁道夫·冯·阿尔伯梯尼:《非洲殖民化:殖民地的管理和未来(1919—1960年)》,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都是很不相同的。

法属非洲为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非洲殖民地,“自由法国”的存在、发展及后来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1945年5月法国参议院院长在咨询会议上承认,“若没有法兰西帝国,今天的法国只不过是一个被解放的国家而已,由于法兰西帝国的存在,法国才成了一个战胜国。”<sup>①</sup>基于这一背景,大战期间“自由法国”领导人为了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支持,作了改善殖民地人民政治、经济景况的诺言,并初步改革了殖民制度。战后初期,第四共和国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宪制改革。

就时间而言,1941年11月颁布的《埃布埃公告》可以说是法国调整殖民政策的先声。<sup>②</sup>埃布埃是竭力维护法国殖民统治的黑人,实际上是法殖民政策的代言人。法国本土沦陷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动员黑非洲各国人民和经济力量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为此必须改变“同化”政策和任意废黜传统酋长而另立当局亲信的做法,恢复和加强非洲人的传统政治机构,进行间接管理。1941年11月,埃布埃召集当地殖民官员、商会代表、天主教及新教教士等上流人士开会,颁布了《法属赤道非洲新土著政策》的公告,即《埃布埃通告》。

包括埃布埃实施的其他改革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恢复土著的一些传统权力,承认、尊重和完善的土著政治机构,实行殖民地

---

①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② 费利克斯·埃布埃(F. Eboué 1884—1944),法籍西印度群岛人。祖父是非洲黑奴。他1905年毕业于法国波尔图大学,1908年起在法国政府任职。1939年任乍得总督。1941年8月他率先投向“自由法国”并全力支持法国的抵抗运动,从而使“自由法国”在法属赤道非洲取得立足点。埃布埃因此被戴高乐任命为法属赤道非洲大总督。

权力和土著机构权力的结合,以取代原先的直接统治。此外,在法属各领地都应成立一个地方权益委员会,用以协调殖民政府同各个阶层人民的关系。(2)在经济上鼓励自耕农经济,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支援战争的工厂,对战时所需的橡胶、棉花和油料等作物,设立补贴基金用于稳定市场价格。(3)在文教方面颁布若干法令:如创办学校,赞助各种文化俱乐部和青年俱乐部,设立新法院等。

埃布埃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因没有超出英国一直施行的间接统治制度而顺利地得到了急需在非洲站稳脚跟的“自由法国”的认可,由于战争条件,其改革措施未能认真执行。但是,对调动非洲人参战、支援战争积极性、缓和非洲人同殖民政府矛盾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主要意义在于,埃布埃的改革向“自由法国”表明了修改法国一向自诩完善的殖民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实际上是埃布埃政策的延续。1944年初,德意法西斯败局基本已定。国际形势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此时的法国,实际上面临三大问题:第一,战后法国的复兴,第二,殖民地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美国对法国殖民地事务咄咄逼人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国主要领导力量的“战斗法国”(“自由法国”的改称)认为,必须体现法兰西帝国的团结一致,明确殖民地在法国未来政体的地位及提出殖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布拉柴维尔会议即在这种背景下召开。

1944年1月30日,根据“战斗法国”殖民地专家勒内·普利文的建议,戴高乐召集法属殖民地总督和官员20余人,在中央刚果首府布拉柴维尔召开会议,讨论“在何种现实基础上通过逐步建立共同体来代替法国在整个非洲领地上实施的直接管理”<sup>①</sup>问题。

会议经过10天讨论后通过了《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关于殖民

---

<sup>①</sup> 若赛夫·罗吉·德·贝诺瓦:《1944—1960年的法属西非》,达喀尔,1982年,第23页。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第253页。

政治结构的决议。宣言及决议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戴高乐对未来殖民地政策的构想。主要是,第一,殖民地是法兰西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表述得很清楚:“在本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确定开发我们的非洲,使非洲人民取得文明进步以及行使法国主权的条件,……如果有那么一个帝国,当前的事件使它能为从中吸取教训,堂堂正正地、自由地选择新时代的道路并准备领导 6 000 万人民(他们与该 4 200 万儿女同呼吸共命运)走这一条道路,这个国家便是法国。”<sup>①</sup> 第二,宗主国的责任是帮助非洲人参加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向非洲人提供取得法国公民地位的可能性。第三,允许各领地内部自治、允许殖民地代表参加制宪议会和建立海外省议会。第四,许诺战后实施宪政改革,并建议法国临时政府在未来宪法中,建立一个包括黑非洲地区在内的海外殖民地新组织。(后来,1946 年第四共和国宪法确立为法兰西联邦)。

可以说布拉柴维尔会议为未来的第四共和国构建了殖民政策的大致框架,总的思想方针未脱离法国一贯的“同化”原则,仍把法兰西与殖民地看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与过去相比,稍前进了一步。在决议公布后一个月,“战斗法国”的临时政府依此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包括政治上增加殖民地在制宪议会中的席位,取消对黑非洲的徭役法,制定大规模发展教育的规划。这就为后来进一步改革铺平道路。因此,布拉柴维尔会议得到殖民地上层人士的欢迎。

1944 年 8 月,法国解放。1946 年 10 月,由公民投票通过第四共和国宪法,成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根据第四共和国宪法,法兰西联邦取代了法兰西帝国。联邦包括法国本土、法国各个海外

---

<sup>①</sup>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33 页。

省、海外领地和原来的保护国。宪章序言宣告“法兰西及其海外领地的人民在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组成联邦。”宪法规定：法国和海外人民在权利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在联邦内居住的法国人和当地人都具有法国公民的身份，拥有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的权利；此外还规定，殖民地改为“海外领地”，每个领地成立由选举产生的领地议会，将大总督改为高级专员，总督改为专员。

根据 1946 年宪法有关条文的原则，法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如允许海外殖民地居民组织工会，承认已有工会及其活动的合法性；允许在联邦内居住的公民自由集会、结社，废除强迫劳动，许诺在殖民地实施现代化与装备计划等等。

较之布拉柴维尔宣言，该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殖民政策的新原则，但并不意味着法国准备放弃它在殖民地统治地位和权益。法国自以为法兰西文化高于其他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因而坚持奉行“同化”政策，以维持法兰西的利益。法国殖民者的“自我感觉”与殖民地的实际情况不啻有天渊之别，艾尔弗雷德·霍恩曾辛辣地评论法兰西殖民主义：“如果上帝还创造过一个比法兰西更坏的殖民者，那是他没有让我知道。”<sup>①</sup>

### 三、英法两国政策调整的比较

纵观两个主要殖民大国英法四十年代殖民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其政策既有共同性也有不同之处。

其共同点是，两个殖民大国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时期，在殖民地问题上都是遮遮掩掩，不愿触及殖民地问题实质（如主权问题），更不愿涉及殖民地自治或独立问题。1941 年 8 月《大西洋宪章》签定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对《宪章》中的“尊重各民族权利”这句话解释截然不同：丘吉尔看到《大西洋宪章》在殖民地人民中反响

---

<sup>①</sup>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下册，第 796 页。

强烈时,急忙声明其原则不适应于殖民地。戴高乐的真实思想则更清晰地表达于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宣言:“法国在其殖民地执行的文明事业的各个目标、完全排除了任何自治的思想和任何在法兰西帝国外演变的可能性。甚至在遥远的将来,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的可能性也是被排除的。”<sup>①</sup>这反映以丘吉尔、戴高乐为代表的宗主国政府决策者维护殖民帝国的思想未有丝毫动摇。丘吉尔和戴高乐本人是维护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统治的帝国派军人。这些意图在战后初期丘吉尔实行“三环外交”以及戴高乐的一些言论中昭然若揭。1944年7月,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法国是否可能改变其殖民政策时,戴高乐回答说:“我以为,每一块飘扬法国国旗的土地,都应该在采取联邦体系的形式内拥有自己的代表,各自利益都能得到维护。法国本土只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sup>②</sup>可见丘吉尔、戴高乐奉行的都是维护殖民帝国完整性的老殖民主义政策。

当然,在制定具体政策方面,英法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的,总的来说,英国在制定殖民政策方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发展殖民地经济中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到战后初期,已有区别地提出让某些非洲殖民地自治的目标。<sup>③</sup>而从法国三次调整,特别是战后初期的宪法改革看,其殖民政策的原則表现为矛盾重重和犹豫不定。埃布埃的改革主张尊重土著政权机构,重视发挥土著的作用,反对同化政策,主张引入间接统治的原则,戴高乐“自由法国”曾予以认

---

① Olivier Colombani, *Mémoire Coloniales: L'afin de L'empire Français d'Afrique Vue par les administrateurs coloniaux*(《殖民回忆录:通过殖民地官员来看法属非洲帝国的未来》),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1, p. 17.

②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③ L. H. Gann, *op. cit.* vol. 2, p. 466.

可。而布拉柴维尔会议则推翻了埃布埃先前的主张,<sup>①</sup> 强调向非洲人提供完全变成法国人的可能性,继续宣扬同化思想。第四共和国宪法则更加含糊不清,行文在“同化”还是“联盟”上矛盾百出。例如宪法一方面规定:法国和海外各民族,不论宗教信仰,组成一个建立在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基础上的联盟。另一方面,在宪法的另一段又把法国对其他民族统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再如,一方面规定法国本土和海外省、海外领地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又强调法兰西联盟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发展各自的文明”。法国本土与海外领地之间究竟是联盟还是同化,其含义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奥里维埃·科隆巴里(Oliveir Colombani)的分析不无道理:事实上,法国的殖民化在两种设想之间迟疑不决,即联合(associ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前者(即联合)认识到每个民族特性所赖以存在的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意识到一种与欧洲文明不同但又是同样客观存在的文明。这种设想必然地直接导致自治和分离。简言之,导致独立。相反,同化政策的趋势则是否认这种特性和价值观。它只看到按同一模式培养出来的人,一旦成为‘相同’的人,殖民地人民就被允许进入法国公民的行列……因此,同化势必导致要在民主机构中给旧殖民地一个与它们数量成比例的席位。的确,这些规定本身就是矛盾的,正如一位法国绅士幽默又深刻的说法,这样一来,法国将变成它以前殖民地的殖民地了。正是由于本身的矛盾,导致第四共和国在殖民政策上的混乱,最终走进死胡同。它反映欧洲资本主义本身正在发生巨变,经济和政治共同体正在形成,宗主国又企图将昔日的殖民遗产不作任何本质变化便并入新的共同体中,这就不能不产生尴尬、扭曲、排异和对抗等奇怪现象。

---

① 埃布埃因病于1944年5月17日在开罗逝世。



## 第十八章 殖民主义从非洲的撤退

近代殖民主义自 15 世纪初叶进入非洲后,在这块大陆整整活动了五个多世纪。然而,当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殖民主义却不得不从非洲——从它诞生地踉跄撤退。到 1980 年,非洲各国除纳米比亚外已全部获得独立,而这最后一块殖民地也于 1990 年挣脱了殖民枷锁,至此,英法等国近代以来精心构建的老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这一历史性巨变绝非偶然,它是战后 20 余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非洲人民长期的反殖斗争的结果。必须指出,殖民主义幽灵并未完全因此退却,它改头换面,试图继续盘踞或重新回到非洲。

### 第一节 战后 20 年国际形势和 力量对比的变化

#### 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战后 20 余年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和以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新格局的形成。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衰弱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世界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整个世界的政治潮流,使反殖民主义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猛烈地冲击着殖民主义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近三百年来,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欧洲一统天下的时代。经过大战,德、意法西斯被彻底打败,不仅丧失

了原来的殖民地,本土亦被占领,国外市场和海外投资丢失殆尽,退出了争霸舞台。英法虽然取胜,但政治、经济和军事损失惨重,实力急剧下降,用戴高乐的话说,就是“在这场赌博中没有抓到一张大国的王牌。”欧洲四个殖民大国的衰弱,标志着曾经雄踞世界几个世纪的“欧洲时代”的终结。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迅速崛起,以它们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成了战后一段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美国是二战的最大赢家,战争结束时,它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和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它还拥有强大的海陆空军,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并一度垄断了原子弹。美国依仗其在二战中急剧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在西方世界居于颐指气使的家长地位。苏联作为大战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其国际地位和声望在战后急剧上升。尽管战争使苏联2 000万人丧生,使国民经济的1/3毁于战火,但战后奇迹般迅速恢复。军事、经济势力得到很大加强,政治、军事影响超出了国界,控制了东欧等大部分地区,成为仅次于美国并能与之抗衡的世界大国。从而形成了美苏两极对立的世界政治新格局。国际格局的变化,政治力量对比的转换,对战后世界政治的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过去,“作为全球集团的中心,是在殖民势力中产生,而现在,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殖民体系的永久存在。”<sup>①</sup>不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反殖民主义的真实动机如何,其行动和态度在客观上都有利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

战后,欧洲和亚洲先后出现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

---

① H. Gann and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 2, p.45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世界人口近1/4的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40年代末,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公开宣布世界上已出现一个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扩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本质上反对殖民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且亚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都是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历经殖民灾难,驱除外侮而走向民族独立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本身对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和精神的支援直接对反殖斗争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也有助于对殖民国家施加精神压力,促使它们做出有利于殖民地人民的让步。

民族主义的勃兴是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又一特征。民族主义浪潮自40年代中期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为发端,到60年代以“非洲独立年”为标志达到高潮。殖民主义从亚洲的退却给非洲带来了民族主义必胜的信念,鼓舞了尚处于英法葡比等国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

1955年4月,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召开、讨论亚非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对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古纳尔·米哈达尔(Gunar Myrdal)称这次会议是亚非国家“伟大的觉醒”,<sup>①</sup>桑戈尔把万隆精神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

<sup>①</sup> Jean Buchman, *L' Afrique Noire indépendante* (《独立的黑非洲》), Paris, 1962, p. 114, p. 115.

来”的号召力相提并论。<sup>①</sup>的确，万隆会议对殖民主义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确认“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无疑，亚非会议的号召对多数仍处于西方殖民国家奴役之下的非洲人民来说，极具吸引力，迅即给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新的推动。会后，北非和西非掀起了民族独立斗争的新高潮。到60年代，民族独立的狂飚席卷了非洲大陆，1960年因有17个国家独立而成为辉煌的“非洲年”。此后，亚非国家之间区域性或跨区域组织陆续出现，它们之间的合作与联合给国际事务注入了新的因素，表明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正如比利时一位高级观察员所悲叹的，“反殖民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革命力量，在这些年它的刻毒已发展到无论在非自治领地的境内还是境外征服殖民势力的地步，甚至成一种潮流，一种不依靠极权手段的不可抵抗的压力。”<sup>②</sup>

在西方阵营内部，殖民主义也成落日黄昏，逐渐失去支持，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尽管与英法等殖民国家结成了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联盟，但在殖民地问题上却是坚决反对英法等国恢复殖民帝国垄断地位的。美国为本国利益和全球争霸需要，利用其自身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优势，拼命挤兑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力图打入英法在亚非的殖民地以取而代之。美国高举“民主”、“自由”大旗，扮演反殖民主义角色，鼓吹殖民地自决和独立，俨然“是

---

① Jean Buchman, *L' Afrique Noire indépendante* (《独立的黑非洲》), Paris, 1962, p. 114, p. 115.

②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op. cit. vol. 2, p. 461 - 462.

亚非反殖民主义民族的天然盟友”，这些做法颇具欺骗性。<sup>①</sup>在二战期间，美国作了不少反殖民主义宣传。罗斯福宣称1941年他与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关于“尊重各民族有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殖民地。1942年，美国国务院拟定了一个《殖民地独立宣言》，主张殖民国家应尽早为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拟定一个时间表。<sup>②</sup>1943年，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与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会晤时，也一再表示自己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sup>③</sup>战后，美国则利用联合国向英法等国施压，促其作出妥协，当矛盾尖锐时，不惜对盟友落井下石以达到插足盟友殖民地的目的。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便是典型事例。

1954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英法大为惊恐，积极筹划采取“惩罚”行动。1956年9月，英政府派财政部长麦克米伦游说美国，以图获取经济和政治的支持。麦克米伦利用其母亲出生于美印第安那州的条件，到处发表演说，“攀亲带故，表达情谊”（麦克米伦语），力争“外婆家”的支持。华盛顿一面敷衍安慰，一面却大谈美国在殖民主义问题上如何与英法的传统不同。当时，麦克米伦认为美国只是做表面文章，暗中是不会对盟友弃之不顾的，因为美国也有自己的“私处”，它在巴拿马运河区所用的方法也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sup>④</sup>已经退休的丘吉尔还试图唤起美国人对二战的回忆以寻求支持：“我坚信我们的美国朋友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为共同的利益而独自行动，这已经不是第一

---

①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op. cit. vol. 2, p. 452.

② P. 古福特和 R. 路易斯主编：《非洲的权力转移》，1982年美国出版，第34页。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③ L. H. Gann, P. Duignan, op. cit., p. 452.

④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乘风破浪》（四）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4, 141, 154页。

次了。”<sup>①</sup>事实上英国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美国自有其霸权利益。英法后来被迫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固然是埃及人民坚决抵抗和国际声援的结果,但也与美国的挤压不无关系。此外,在托管地自治和独立、葡属非洲自治等问题上,美国与老殖民主义国家意见相左。由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特别是盟主美国由于冷战战略的需求,在殖民问题上不时施加一定压力,使已降为二等国的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不能为所欲为,只得退而求其次。

## 二、新因素促进了殖民主义格局的变化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影响到殖民国家的决策阶层。一部分能审时度势,开明务实的统治集团成员如麦克米伦和戴高乐等已经意识到殖民主义制度难以维持,必须调整政策,加快实现“非殖民化”。1956年,麦克米伦任财政部长时,曾就英国的中东政策发表看法,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以反动强国的姿态回到旧日的‘殖民主义’去,而应该作为一个试图导致持久的、建设性解决办法的进步力量出现在中东”。<sup>②</sup>1960年他以首相身份遍访非洲大陆后,承认“变革之风”已吹遍非洲大陆,意识到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把这一基本形势考虑进去。戴高乐上台后,摒弃前任政策,主张以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这些都说明殖民国家的决策者们开始逐步趋于现实。

在战后,反殖民主义汇成了一股舆论潮流,“非殖民化”成为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些颇有影响的报刊在传播反殖民主义、种族平等、民族自治、自决等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比19世纪末殖民主义对非洲抢夺和瓜分时西方舆论几乎一致认为

---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乘风破浪》(四)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4,141,154页。

② 前引《麦克米伦回忆录》(四)第113页。

是合理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舆论已开始承认“白人的统治背负着非法的耻辱”。<sup>①</sup>值得一提的是,在影响世界舆论导向方面,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很多历史学家十分重视,L. H. 加勒认为值得特别加以研究。<sup>②</sup>不可否认,联合国在成立最初的 10 多年里的确被美国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操纵。尽管如此,联合国毕竟为反殖民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讲坛,对被压迫民族还是有利的。随着亚非成员国的增加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壮大,联合国日益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联合国加强了国际托管制度的监督,每 3 年向托管地派代表团进行实地调查并听取当地人的意见,托管理事会和联大还不定期听取托管地请愿者的意见。另外,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联合国大会不仅在舆论上强烈谴责英法殖民者的行径,而且通过的决议对英法具有约束力。即使在安理会内,只要一涉及殖民地问题,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处境孤立。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苏联、美国都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国民党中国的“代表”也表示谴责。西方阵营的非殖民国家也几乎一致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如战后初期联合国讨论托管地问题时,澳大利亚代表甚至建议所有依附性的殖民地全部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当时英法大为惊恐。<sup>③</sup>1960 年后,联合国讨论和通过了许多非殖民化的决议。如 196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称“非殖民化宣言”),在政治上打击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鼓舞和支持了民族解放斗争。

此外,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详见第 2 章),是促使

---

① L. H. Gann and P. Duignan, *op. cit.*, vol. 2, p. 455.

② *Ibid.*

③ L. H. Gann and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2,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 (《殖民主义的历史与政策》), Cambridge, 1970, p. 455.

美国倡导“非殖民化”以及英法等殖民大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撤出非洲的根本原因。

跨国公司的出现给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在旧殖民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市场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血腥的暴力，进行海外扩张。它们需要殖民地，并对殖民地进行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垄断来保证市场。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无需依靠殖民主义暴力或征服手段，仅通过资金和技术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由于跨国公司组织的生产、科研、销售以及金融网络，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范围实现的，因此，它要求更加自由的原料产地和市场。正如戴维逊在研究非洲殖民体制发展时所阐述的：当垄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跨国公司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这种垄断形式很难容忍西欧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垄断形式。”美国是“非殖民化”卖力的鼓吹者，说穿了，它需要非洲的“非殖民化”。<sup>①</sup>美国正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驱动下，才竭力鼓吹民族自治与独立，倡导“非殖民化”。所以戴维逊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殖民化”时期实际上是美国思想称霸的十年。<sup>②</sup>

对英法等殖民大国而言，的确是在美国的挑战下才意识到“一种新的间接统治形式——不再是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关系，而是欧洲国家对非洲女儿国的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大战期间非洲经济的发展再次表明非洲国家的生产发展有利于殖民大国摆脱困境。

从 50 年代起，进入了“援助—发展”的时代，1945 年，英国根据《殖民发展与援助法案》把援助费用提高到 1200 万英镑，<sup>③</sup>并开

---

①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240 页。

② 同上书，第 241 页，第 237 页。

③ C. Coquery-vidrovitchet H. Moniot,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 Paris, 1974, p. 238.



始在英属西非 4 个殖民地实施殖民地发展计划。英国工党政府在一项纲领中宣称：“大英帝国和所属殖民地已结成伙伴关系，以消除愚昧、贫穷和疾病。”<sup>①</sup> 法国在 1946 年设立了“经济与社会开发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于法属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投资基金 55% 由宗主国提供，其余则由殖民地提供，主要是海外省中央银行提供 (Caisse centrale de la France d'Outre-mer)。1947—1955 年，“经济与社会开发投资基金”达 3 130 亿法郎 (旧法郎)，1946—1962 年，向法属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提供了 2 200 亿旧法郎，其中公共或半公共投资占 64%，私人投资占 36%。<sup>②</sup>

投资的增加使宗主国尝到了甜头。“在欧洲，商业集团、大公司毫不犹豫地打算转移绝对权力，一些公司甚至想象同非洲人打交道将比同欧洲行政机构更容易。”<sup>③</sup>而且，正如 R·卡蒂埃 (Cartier) 在《巴黎竞赛报》上载文所说：“专门经济 (单一经济 économique spécialisé) 使它们开始更理性地考虑开发某个地区而又毋需承担政治和财政的责任。……商业集团和公众舆论汇合到一起鼓吹一种毫无民主的‘右翼的非殖民化’，……这种非殖民化由金钱支配。”<sup>④</sup>

可以说，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它要求对殖民地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必须通过非殖民主义形式来实现。如上所述，战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已使殖民主义撤退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最终使殖民体系开始崩溃并在非洲划上句号的，则是非洲大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指出的：“造成殖民大帝国的崩溃并不只是由于殖民主

---

①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41、237 页。

② C. Coguery-Vidrovitch et H. Moniot,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 Paris 1974. p. 428.

③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Paris, 1973. p. 151.

④ R. Cartier, 《La France dilapide son argent》转引自 C. Coguery-Vidrovitch p. 428.

义势力的虚弱和受到外部压力的结果,而且同样有非洲内部的压力。”<sup>①</sup>

50年代中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在北非,马格里布三国发动了反法斗争武装起义,突尼斯、摩洛哥于1956年获得独立。撒哈拉大沙漠以南,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1957年,加纳成为战后黑非洲第一个独立国,次年,法属几内亚已在法属黑非洲率先独立,这两个国家的独立,预示着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来临。从1960年到1964年,共有27个非洲国家独立,1960年成为蔚为大观的“非洲年”。在整个60年代,原来处于英、法、比、意、西各殖民国家桎梏下的非洲殖民地都获得解放(除科摩罗、圣多美等小岛国外),民族独立运动的势头一直持续到90年代。

纵观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斗争方式,而且采取非暴力方式占多数(有30多个地区),但是,给殖民统治打击最为沉重,震动最大的是几次大的武装斗争,如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肯尼亚的茅茅起义以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说这是迫使殖民宗主国修改殖民政策并最终决定从非洲撤退的直接原因。

## 第二节 “托管”的新伎俩和 “托管地”的独立

### 一、托管制是委任统治制度的翻版

托管制度是在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明确规定。该制度确定联合国把某些殖民地交付一个或几个国家或由联合国本身管理或监督。根据联合国宪

<sup>①</sup> 杰·阿·萨格伊、德·艾·威尔逊合著:《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王统译,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历史研究》1985年1—2期。

章第 77 条规定,托管地包括三种:(1)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2)负责管理责任的国家(即殖民国家)自愿交付托管的领土,(3)原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控制的某些地区。在非洲的托管地有坦噶尼喀、多哥、喀麦隆、卢旺达和布隆迪、索马里等。

托管制度是委任统治制度的翻版。委任制度确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规定由国联把某些殖民地委任给一个或几个国家管理,并由国联监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委任制度瓦解。但这种统治方式为欲继续控制殖民地的大国提供了仿效的模式。1945 年春,德、意、日法西斯败局已定,二战已接近尾声。此时,对战败国以及战败国殖民地的处理问题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在如何处理德、意、日前殖民地的问题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最先提出了“托管”(Truste)一词,并且得到苏英两大国的支持和认可。<sup>①</sup>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已就托管制及托管地范围达成了原则性框架协议。1945 年 4 月,在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托管制度正式提出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但是,在讨论国际托管问题时,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五大国各揣心事,各自提出方案。经过近两个月的激烈争论,最后于 1945 年 6 月达成协议,规定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增进托管领土之居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并以适合各领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和关系人民自由表示之愿望为准则,且按照各托管协定之条款,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sup>②</sup>总的来说,新确立的托管制度仍维持旧殖民体系,然而各大国特别是英

---

① 丘吉尔最初在会议上强烈反对托管制,但当得知美国拟议设立的托管机构无意涉及英帝国,而仅处置敌国的附属地区,丘吉尔才表示认可。苏联则是在保证苏联参与国际托管制度的前提下表示同意的。

② 《联合国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 496 页。

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承认受托管国获得自治或独立是托管制度的基本任务之一,相对委任制度而言,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根据旧金山会议精神,非洲的原国联委任殖民地分别由英、法、比托管,只在意属索马里归属问题上产生了争议。由于索马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各大国均想据为己有。英国在战争中即以统一索马里部落为借口,企图把前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都并到英属索马里,旧金山会议时英国便建议将意属索马里作为“托管地”置于英政府管辖之下,此建议遭到美国竭力反对。为便于美国控制,美建议置于联合国共管之下;法国则提议仍由战败后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托管。经三国妥协,至1949年11月,联大采纳法国建议,规定前意属索马里仍归意大利托管,但同时规定:“这个领地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国家,它的独立将在大会批准托管协定之日起满10年的一天生效。”<sup>①</sup>

这样,到1949年年底,联合国大会核准了11项托管协定,其中涉及非洲的共有4项。其中英国托管有坦噶尼喀、英法共同托管的有多哥和喀麦隆。比利时托管的有卢安达——乌隆迪。按照各自签署的托管协定,各托管国需承担给托管地自治乃至最终独立的义务。并且托管国“有义务去鼓励扩大有代表性的民主机构,并在时机成熟时进行适当的协商,以使人民能够对他们的政治制度自由地发表意见。”<sup>②</sup> 英、法、比以及意大利尽管在统治手法上各异,其实质都是尽量延长其殖民统治,避而不谈自治或独立。英国一个殖民地高级官员十分自信地断言,他可以在殖民地永久地服务下去。<sup>③</sup>

---

①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917页。

② 英法关于多哥托管协议第4条,第5条,见罗贝尔·科纳万:《多哥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7页。

③ L. H. Gann,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2, 1974, p. 451.

## 二、从托管到独立——不依殖民主义意志为转移

但是,形势发展不依殖民主义者意志为转移,时隔不到20年,非洲所有托管地均在60年代结束前获得独立。

纵观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非洲托管地人民展望前景,蓬勃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托管地民族主义政党大规模出现,1947年吕班·姆·尼奥勃创立喀麦隆人民联盟。在多哥,西凡虞·奥林匹欧组织了民族主义政党。坦噶尼喀在1956年也成立了坦噶尼喀人民联盟。这些政党已将统一和独立作为党的最终目标。如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张将法管喀麦隆和英管喀麦隆统一并争取独立,1952年,该党领导人尼奥勃向联合国大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国家立即统一,设立立法议会和非洲人占多数的管理委员会,所有成年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并确定国家独立的日期。到1955年,其盟员超过了10万。<sup>①</sup>自1956年起,该党采取以游击战形式反抗法殖民当局的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法殖民当局。与此同时,托管地非洲人纷纷成立了部族性和行业性团体,为本地区、本行业的政治及经济利益进行斗争,各种罢工斗争此起彼伏。1947年9月,坦噶尼喀码头工人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在罢工中提出了同工同酬、反对种族歧视和要求由非洲人取代印度人在政府中任职等政治性要求。殖民当局对托管地的民族独立浪潮,镇压不下去,最后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进行一些改革,直至最后承认独立。

第二,联合国在托管地的独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联合国宪章》有关托管制度的条款已明确规定了托管制度的政治目标是推进托管地的自治和独立,有的托管地还明确

<sup>①</sup>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649页。

规定了独立的期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托管国施加了政治压力,促使其在托管地进行宪政改革,推动殖民权力的移交。如喀麦隆、坦噶尼喀。进入60年代后,联合国大会连续通过了几个决议,对托管地独立产生了直接影响,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称非殖民化宣言)明确宣称,所有人民均享有自决权并宣布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宣言指出,应采取各种步骤,无条件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人民,从而使他们可能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sup>①</sup>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这些举措在舆论上和政治上都对托管国施加了压力。此外,联合国也给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提供了表达独立愿望,抨击殖民统治的讲坛。1947年,多哥埃维运动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促使托管理事会作出决定,承认埃维运动是合法的。1950年托管理事会建议英法两个托管地区统一,1954年和1955年,奥林匹欧代表多哥统一委员会出席了联合国托管理事会。1954年,坦盟成立后不久,就向到坦噶尼喀访问的联合国视察团递交了备忘录,提出了在20—25年内给予独立的要求。1955和1956年,尼雷尔两次赴联合国向托管委员会反映坦噶尼喀人民的迫切要求独立的心声。他在1956年12月的请愿书明确要求:实行成人普选,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中一半成员由非洲人担任,坦噶尼喀在10年内获得独立。由于联合国施加影响,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反映的要求赢得了普遍的支持和同情,扩大了托管地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同时也给托管国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托管国的独立进程甚至是在联合国直接干预下进行的,如法管多哥。自1957年起,联合国不断向法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履行联合国决议,尽快实行宪政改革。1958年2月,法被迫再次修改多哥法规,给予多哥以较大范围的自治,法政府只保留处理外交、财政和防务的权力。1958

<sup>①</sup> 《联合国手册》(第10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363页。

年4月,多哥的选举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奥林匹欧的多哥统一委员会在选举中获胜。1960年4月,多哥正式获得独立。比利时托管的卢安达·乌隆迪以及意托管的索马里,也是在联合国直接干预下获得独立的。

第三,托管国由被迫改革到主动撤退。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英、法、比等国不得不逐步采取宪政改革的措施,交出权力。英国在坦噶尼喀和多哥、喀麦隆均进行改革,在经济上,通过了托管地经济发展和福利计划,但并没有打算交出权力。1945年和1947年,英政府还计划组建包括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三地在内的“东非联邦”,该计划因东非人民和联合国反对而破产,1959年后,英政府同意非洲人代表多数制原则,打开了从托管地责任过渡到自治再到独立的大门。法国也是如此,法政府对托管地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武力镇压等措施并不奏效。戴高乐上台后,几内亚敢于在公民投票中说“不”,给戴高乐政府极大的冲击,首先在托管地独立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姿态,在多哥独立问题上,法国政府主动修改了法规,用多哥专员斯佩纳的话说:“当孩子长大成人时,他的父母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给他完全把大门打开,父母希望对他的钟爱会使他回家团聚。”<sup>①</sup>这段话尽管充满着“殖民主义保姆”的论调却赢得多哥领导人的好感。多哥首任总统奥林匹欧在独立仪式上特地向戴高乐致谢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应当指出,托管国在从托管地撤退时往往制造矛盾,散布各族间的仇恨,给新独立国家埋下了祸根,其中以比利时托管地卢安达—乌隆迪最为典型。卢安达—乌隆迪内部的种族矛盾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长期采用分而治之的原则,利用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挑起种族仇恨。战后,比利时在联合国的敦促下,在两地进行了“改革”。1952年7月在卢安达颁布的法令冠

---

<sup>①</sup> 罗贝尔·科纳万:《多哥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04页。

冕堂皇地宣称：“比利时政府认为使两国的政治机构民主化的时刻业已到来。”而实际上只是削弱了两个国王、各个酋长以及图西族统治集团的绝对权力。在图西族和胡图族出现流血冲突后，比利时总督又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段，使两族矛盾火上浇油，形势恶化。1962年6月27日，第16届联大通过关于卢安达—乌隆迪独立的决议。7月1日，乌隆迪和卢安达分别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布隆迪和卢旺达，但种族矛盾直到今天还是困扰两国的棘手问题。

### 第三节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宪政 改革和“政治撤退”

#### 一、英属西非的宪政改革

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科纳万在总结英法“非殖民化”的特征时曾指出：如果说英属非洲的“非殖民化”是所谓一揽子解决的话，那么英属非洲的“非殖民化”则具有“连击”（*coup par coup*）即一个接一个解决的特征。<sup>①</sup>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奇金也说，英国的政策通常是具体情况或者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一个一个制定的，<sup>②</sup>英前殖民大臣李特尔顿认为英国政策是“纯粹的机会主义”，<sup>③</sup>他们的总结有一定道理。为了帝国利益，英政府在制定对非殖民政策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循序渐进（实际上是慢慢来）原则，二是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不同方式解决的原则。英殖民政府在西非实行的宪政改革、策划东非联邦，实行多种族政策以及成立中

①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1919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3, p. 141.

② 托马斯·霍奇金：《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1956年伦敦版，第40页，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③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欧洲的非殖民化》), Macmillan, 1985, p. 208.



非联邦等政策无不体现了这两个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英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两个原则,从非洲撤退。

战后初期,随着英国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工党政府预感到整个殖民制度的危机,<sup>①</sup> 1946年,工党殖民大臣乔治·霍尔在政策声明中首次提到了帮助殖民地人民实现“责任制自治”。<sup>②</sup> 次年,工党殖民部设立专门委员会提出向非洲人转让权力的计划,并预测将在一代时间内成立充分责任制政府,比战前殖民大臣麦克唐纳设想的需“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似乎大大缩短了。1948年,继任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在起草的声明中,规划了英国的殖民目标:“英国殖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简单的,即引导殖民地在英联邦内部转向责任政府,条件是要保证人民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和不受外来压迫的自由。”<sup>③</sup>所谓“引导”即在英国的控制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合适的接班人”,<sup>④</sup> 以便英国能继续控制这些殖民地。按此计划,英国政府首先在西非实行宪政改革。1946年和1947年,殖民当局分别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颁布《伯恩斯宪法》和《里查兹宪法》,其内容大致相同,即增加非洲人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的名额,这些名额由总督提名,但行政权仍掌握在以总督为首的殖民官员手中。照英殖民当局的计划,逐步增加非洲人在立法会议和行政机构中的名额,先是增加由总督提名的名额,然后扩大到经间接或直接选举的名额,最后经过漫长时间实行普遍的直接选举,成立全部或主要由亲英的非洲人组成

---

○ 大战中及战后初期,英工党领袖发表了许多表面的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言论。

② David Goldsworthy, *Colonial Issues in British Politics 1945—1961*(《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 Oxford, 1971, p. 15.

③ L. H. Gann,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2, 1974, p. 466.

④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264页。

的政府。但是民族运动的迅速发展打乱了英政府的如意算盘。苏丹在1948年宪法改革后,建立了基本上由苏丹人组成的立法会议和由一半苏丹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一向被视为“模范殖民地”的黄金海岸在《伯恩斯宪法》颁布后。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在1951年议会选举中获绝对多数,在38个席位中占34席。<sup>①</sup>而苏丹经过1953年的大选,成立了首届议会和苏丹人任总理的政府,客观形势使英政府不得不修改其既定方针。

1951年英政府政权更迭,保守党击败工党,丘吉尔重新执政。同年10月,奥立弗·李特尔顿任殖民大臣。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关于殖民政策的声明声称:“首先,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殖民地在英联邦内获得自治,为此,我们将尽快在每个领地建立情况所需要的机构。其次,我们决心继续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之适应政治发展的步伐。”<sup>②</sup>这项声明可视为英改变政策的一个信号。从中可看出两点变化:第一,由过去的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转而强调政治发展;第二,正式提出了殖民地的政治目标是自治。这一变化是英实施既定政策的第二步,即由责任制过渡到自治。这一政策尽管如李特尔顿自称的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比起40年代末的政策,毕竟往前进了一步。李特尔顿执掌殖民部后,形势逼迫英国在西非加快了宪法改革步伐。其中尤以黄金海岸的政治发展最为典型。

1952年6月,李特尔顿访问黄金海岸期间,恩克鲁玛就宪法改革事宜与李特尔顿谈判。1953年7月,恩克鲁玛在立法议会中提出了关于宪法改革的白皮书。经过谈判,英政府被迫批准。这样,到1954年4月,黄金海岸颁布了新宪法。根据该宪法,立法机

---

①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Paris, 1973, p. 156.

② David Goldsworthy, *Colonial Issues in British Politics 1945—1961*(《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 *From 'Colonial Development' to wind of Change*, Oxford, 1971, p. 25.

构中有 104 名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当选代表任期四年,部长内阁成员(至少 8 人)根据总理的推荐由国民议会从议员中任命。部长向国民议会负责。总督仍保留职位,并控制外交防务。在 1954 年 6 月的选举中,人民大会党获 71 席,超过 2/3 多数,成立经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全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实现了在殖民总督管理下的自治。英殖民政府试图利用反对党来延续其在黄金海岸统治的期限,但黄金海岸独立潮流已势不可挡。1956 年 7 月大选揭晓,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又一次取得巨大胜利,立法议会通过了授权政府向英国提出一项在英联邦内独立要求的动议。英殖民政府不得不于 9 月同意,并宣布黄金海岸独立的具体日期。1957 年 3 月 6 日,黄金海岸宣布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改国名为加纳,成为西非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黄金海岸的宪法发展看,从责任政府制到自治再到独立,比英政府原先计划的一代人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加纳独立的影响至为深远,不仅鼓舞了尚在进行独立斗争的其他殖民地,也给英政府猛击一掌,形势发展已使它很难实现“循序渐进”的拖延战术。在黄金海岸,从 1946 年颁布战后首部宪法开始,到 1957 年加纳独立的 10 年中,英殖民当局共进行了 7 次宪法改革,说明根本无法实行“慢慢来”政策。在西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尼日利亚在战后亦多次修改宪法,到 1957 年,东、西两区首先获得自治,1959 年,成立了首次由非洲人任总理的自治政府。1958 年,塞拉利昂在宪法改革后成立了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和全部由非洲人组成的行政会议,冈比亚亦在 1959 年修订宪法,扩大普选权。可以说,英国在这些地区确是“且战且退”。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英属非洲各地宪法改革起点的不同及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差异,英殖民政府在各地宪法改革的进度及具体政策不尽相同。在欧洲移民较集中的东非、中非,英国坚决维持白人移民的殖民利益,其宪政改革就迟缓和保守得多,诚

如罗贝尔·科纳万所言：“英国在中非和东非利益的重要性使其非殖民化要比西非困难得多。”<sup>①</sup>在这些地区，英国要尽花招尽量延长殖民统治，以保证欧洲移民及国家的殖民利益。直到1959年，英政府高层人士仍在考虑要拖到1970年——1975年才给东非三个国家独立。<sup>②</sup>说明英国绝非心甘情愿拱手交出权力。此外，即使在宪法改革较快的西非，英国也总是竭力扶植和支持封建部族酋长的势力，用以抵消或对抗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和所谓“极端派”的力量。对象恩克鲁玛、阿齐克韦等坚决要求自治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英政府千方百计予以压制，恩克鲁玛就几度蹲过英殖民当局的大狱。在尼日利亚，英偏向和扶持封建传统势力强大的亲英的北区政治力量，打击率先举起独立旗帜的比较激进的南方民族主义力量。通过1946年理查兹宪法、1951年麦克弗逊宪法和1957年李特尔顿宪法，确定尼日利亚三大区的划分，从法律上肯定了北区的优势地位。在1959年的选举中，从政体上又确定为联邦总理负责制并由北区的巴勒瓦出任联邦总理，不受英国欢迎的阿齐克韦只担任没有实权的议长。英政府制造和利用分歧，无非是培植亲英势力制造机会，为今后打进干预的楔子。

## 二、在中非、东非玩弄的手法

东非之领地(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濒临印度洋，向来是英颇为重视的战略地区，尤以肯尼亚为最，不仅因其战略地位，还因为肯尼亚有约6万名拥有极大政治经济势力的白人移民。因此，英政府在东非执行政策与西非大不相同。1952年，英殖民当局在肯尼亚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对立法会议进行改组，其中官方成员减少到10名(包括总督和副总督)，由选举产生的成员有

---

①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Paris, 1973, p. 159.

② *Ibid.*

21名。非洲人(由总督任命)只有6名,而欧洲人占了14名。另一方面,英国仍念念不忘建立对其巩固统治极为有利的“东非联邦”的计划。<sup>①</sup>战后英采取了迂回的办法。1945年和1947年克里奇·琼斯先后发表两个白皮书,宣布由3个总督组成“东非高级委员会”来管理东非3个殖民地,并成立中央立法会议和中央行政机构来协助工作。1953年6月李特尔顿在肯尼亚发表讲话,提出有可能组建“东非联邦”,结果引起掀然大波。此事激起乌干达一场政治骚乱,迫使李特尔顿收回讲话,但英并未放弃该计划。直到1956年6月,东非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不利于促进联邦建立的报告后,英政府才不再提及此事。

“东非联邦”计划搁浅后,英政府从1954年起又出笼“多种族主义”政策。1954年3月李特尔顿在肯尼亚颁布李特尔顿宪法,宣布建立多种族的部长会议。由此“多种族主义”政策出笼。该政策又称“李特尔顿制度”。名义上,“其宗旨是保证每个种族共同体(移民、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黑人)参与政权的要求。”<sup>②</sup>实质上是为了加强少数白人的统治。按李特尔顿宪法,多种族部长会议的16名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欧洲人,少数是亚洲人,而非洲人只有1个名额。该宪法明显的不公正遭到了非洲人强烈反对。1957年,继任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依德又在肯尼亚颁布新宪法,同意增加非洲人在立法会议的席位(6个),但实际与李特尔顿宪法同出一辙,得到白人移民的拥护,因为“它保证了欧洲人在立法机关占多数”。<sup>③</sup>非洲人表示了极强烈的抵触情绪。直到1959年4月,英政府决定加速政治撤退,在东非颁布新宪法后,“多种族主义政策”

---

① 英国在20年代曾打算以肯尼亚为中心建立“东非联邦”,因遭多方反对而作罢。

② C. Coquery-Vidrovitch, H. Moniot,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1800年至今的黑非洲》),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 239.

③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第95页。

才宣告破产。

在欧洲移民集中的中非(包括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英政府更加积极筹划建立联邦。英政府筹划的目的有二:第一是政治上的因素。中非是欧洲移民集中的地区,尤以南、北罗得西亚最多。南罗得西亚大战结束时白人达 83 500 人。北罗得西亚也有 32 000 人。<sup>①</sup>英希望这几个地区能像南非一样,组成一个以白人为统治集团的联邦,以便能“使欧洲人永远统治这些领土”。<sup>②</sup>第二是经济上的考虑。中非矿产丰富,铜矿资源在非洲首屈一指。建立联邦将有助于经济开发,缓解英殖民政府的财政窘境。第三是一部分白人移民拼命鼓噪,大造建立联邦的舆论。这部分人以北罗得西亚移民领袖罗伊·韦伦斯基和南罗得西亚总理罗伊·韦伦斯基为代表。他们主张合并南北罗得西亚,建立永久的白人绝对统治。这个想法与英政府不谋而合。

英政府和白人移民团体的联邦计划一开始就遭到非洲人强烈反对。1951年,三个殖民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反对建立联邦的运动并草拟了致联合国的抗议书。尼亚萨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海斯廷斯在伦敦散发了抗议书,反对拟议中的联邦计划。非洲民族主义者在非洲人代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是由欧洲人主宰一切的霸权,”因此,“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联邦政府,因为我们清楚大多数欧洲人对待这个国家的非洲人的态度。”<sup>③</sup>但英政府并不考虑非洲人的意见,仍按既定方针组建联邦。

1949年,三个殖民地的白人移民代表在维多利亚城开会,审

---

① Robert Conevin, op. cit., p. 162.

②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第664页。

③ D·西韦尔:《非洲人代表会议记事录》,1951年9月12日,转引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第661页。

议关于建立联邦的建议。1951年1月,英殖民大臣在伦敦召集会议,详拟建立联邦的计划。经过两年多筹备,英殖民当局于1952年4月草拟了联邦宪法,1953年9月经女王敕令批准宪法正式生效。是年10月,根据该宪法正式成立了包括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中非联邦”。

英国政府和白人移民集团拼凑的“中非联邦”,完全是为白人利益服务的,从联邦宪法看,英国在东非实行的“多种族主义”就在联邦宪法中得到运用,宪法强调以“种族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原则,实际上,原先实施的种族主义法律和差别待遇一项也没有废除。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宪法还写进了塞西尔·罗得斯的一句名言:“一切文明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事实上,要成为英国所规定的“文明人”必须具备收入及学历等各项苛刻条件。1953年12月联邦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就足以说明这一切,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选民只有420人合格,北罗得西亚只有3人,尼亚萨兰则一个也没有。而非洲人在三地人口总数为700万。<sup>①</sup> 联邦表面上设立了非洲事务部,其职能名义上是“引起人们注意提交联邦议会的议案中任何一种族歧视的规定,以此来保护非洲人的利益。”<sup>②</sup> 而从其成员组成(由3名欧洲籍议员和3名非洲籍议员组成,后者须由欧洲籍议员来挑选),便可看出它是否能真正的“保护非洲人的利益”了。

鉴于非洲人反对呼声强烈,1957年,英政府对联邦宪法作了修改,稍稍增加了非洲入议员的的人数。但由于欧洲人选民几倍于非洲人选民,实际上意味着增选的非洲人议员也是由欧洲人占多数的选民团体中产生的。因此,即使在宪法改革后,联邦权力分配也明显歧视非洲人:政府和议会都由占人口绝对少数的白人控制,非洲人代表仅占1/6—1/5的席位。直到60年代非殖民化浪潮席

---

① 苏联科学院:《非洲史1918—196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0页。

② P. E. N. 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32、590页。

卷整个非洲时,英国政府才被迫在北罗和尼亚萨兰进行宪法改革。

“中非联邦”的成立,深刻影响了这几个地区的政治进程,致使这三个地区的独立推迟了好几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谈及英国“非殖民化”进程时曾尖锐指出:“英国也造集中营、禁锢非洲人的自由、食言毁约、拖延犹豫、撒谎欺骗,特别是在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这个逆历史潮流的“中非联邦”是注定要解体的。

### 三、英国加速“政治撤退”

受到苏伊士事件沉重打击后,1959年末到1960年初是英国殖民政策转折的关键时期。英国政府官员在此期间政策声明中接连发出了改变政策的信号。首先是1959年9月17日外交大臣劳埃德在联大发言,表示英国的政策目标是“帮助”殖民地人民走向独立,<sup>①</sup>接着,首相麦克米伦1960年2月在南非开普敦发表了著名的“变革之风”的讲话。他说:“变革之风已吹遍了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定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sup>②</sup>此后,英国的殖民政策出现了明显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中非和东非政策的变化,其宪法进程大大加快。

促使英政府迅速改变政策的原因首先是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发生在东非肯尼亚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茅茅起义使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仅军费就耗费5500万英镑)。尽管起义被镇压,但余波仍使英政府心有余悸。<sup>③</sup>以肯雅塔为首的

---

① S. R. 博公科:《1945—1963年的肯尼亚》,第228页,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第359页。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五)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90页。

③ Jean Buchman, *L' Afrique Noire independante*(《独立的黑非洲》), Paris, 1962, p. 110.



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以非暴力形式开展反对英国实行的多种族主义政策的斗争,迫使英国政府修改其宪政政策。中非地区非洲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停止反对联邦的斗争。1959年1月,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鉴于不能通过谈判达到要求,决定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进行斗争。<sup>①</sup>北罗得西亚也在此时爆发了和平示威和“消极抵抗”运动。1959年3月,肯尼亚又发生11名在押“茅茅”起义战士在霍拉兵营被看守残暴杀死的惨剧,这一切深深震撼了英国统治者的神经,担心在其他地区重演肯尼亚事件,因而不得不修改政策,迅速变革。英历史学家W·N·梅德利科特认为,正是1959年3月的“霍拉事件”以及同时在尼亚萨兰发生的骚乱和暴力行动促醒了英国政府。<sup>②</sup>

其次,整个世界的非殖民化形势使英政府产生必须加速撤退的危机感。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深刻暴露了英国殖民危机和国力削弱,国际地位下降。运河事件后,政府一小部分决策者曾一度主张采取扑灭殖民地烈火,重建不列颠国际地位的政策。<sup>③</sup>但他们很快发现世界形势已经大变,强硬政策不可取。此时,法国、比利时两大殖民帝国已开始瓦解,1958年到1960年2年内,法属17个非洲殖民地全部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比利时政府也在民族运动的冲击下被迫采取改革措施,这使英政府有一种紧迫感:与其逆历史潮流,损失必将更加惨重,不如顺应时势,和平、体面地撤退。

此外,英国执政党人事变动、一部分开明之士掌权也是殖民政策迅速改变的因素之一。麦克米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主张用

---

① Robert Corn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 Paris, 1975, p.162.

② W. N. 梅德利科斯:《英国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0,第597—598页。

③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Macmillan, 1985, p. 212.

宪法手段尽快实现非殖民化,以主动姿态博取非洲英属殖民地的好感,使之继续留在英联邦内。1958年,麦克米伦在遍访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英联邦内前殖民地后认为,“英联邦的结构经历了神秘而难以置信的发展后,不但未曾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sup>①</sup>按他的观点,如果能主动让非洲那些地区在英联邦内自治或独立的话,大英帝国还能以联邦形式继续存在,这可能是一种明智而且长远的打算。因此,1960年初他遍访非洲后发表了著名的“改革之风”的讲话,并且冲破保守派的阻力,使英国统治阶级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加快了改革进程,让殖民地在英国控制下独立,是有利于英国国家利益的惟一可行的途径。

1960年2月份,新任殖民大臣麦克劳德在中东非问题上改变腔调,他在肯尼亚第一次制宪会议上致词说:英国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肯尼亚在各种族参加社会活动和实现非洲人多数统治的条件下使肯尼亚独立。<sup>②</sup>此次讲话后,英殖民政府又多次召集制宪会议并作出了一些积极姿态。1961年8月,英释放拘禁9年之久的肯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肯雅塔。但是,由于欧洲移民的抗拒、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内争及英国的观望态度,肯尼亚的自治和独立拖到1963年才实现。尽管如此,这个时间表也比1959年初伦诺克斯·博依德等人预计的时间提前了16年。<sup>③</sup>至此,英属东非三国已全部独立。

1960年起,英政府开始在中非加快宪法改革进程。1960年初,英政府任命以蒙克顿勋爵为首的委员会调查中非联邦局势。该委员会10月份的报告结论是:应将选举权等权利扩大到非洲人,但中非联邦仍应继续存在。<sup>④</sup>该结论反映了英政府在联邦问题

---

① W. N.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97页。

②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第106页。

③ 伦诺克斯·博依德在1959年1月的会议上预计肯尼亚的独立时间是1975年。

④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Macmillan, 1985, p. 229.

上欲弃还留的矛盾心情。1960年12月,英政府召集中非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南罗得西亚总理埃德加·怀特黑德等白人移民领导人及三个领地的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海斯廷斯·班达、肯尼思·卡翁达和乔舒亚·恩科莫等人开会,讨论联邦前途问题。白人移民坚决要求保留联邦,而班达等人则表示,如果英政府不把退出联邦的权利问题列入议程,他们就要退出会议。会后,英国制定了关于中非联邦前途的指导性原则:强调只有当欧洲人和非洲人“在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合作共事,英政府才能履行对他们双方的义务。这说明英政府直到此时仍未打算放弃联邦。然而,历史的车轮已不为英殖民利益和意志而停止转动。

自1961年起,三地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相继发动了非暴力运动。尼亚萨兰的政治形势发展最快。1961年8月选举,班达的马拉维国民大会党大获全胜,成立了由非洲人占多数的立法会议。尼亚萨兰要求退出联邦的呼声更高了。班达公开表示,万一英国政府不同意尼亚萨兰退出联邦,它就要造反。<sup>①</sup>在尼亚萨兰民族主义者的坚决斗争下,英政府被迫于1962年11月在伦敦就尼亚萨兰的前途召开制宪会议。根据制宪会议协议,尼亚萨兰将于1963年2月获得自治。尼亚萨兰如期获自治后,班达宣布尼亚萨兰实际已脱离“愚蠢的联邦”。1963年3月,英国政府被迫同意不论哪一地区都可以退出联邦。这样,尽管白人移民集团竭力反对,联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1963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解散中非联邦。次年7月6日,尼亚萨兰宣布独立,成为马拉维国。北罗得西亚也在1964年1月实行普选,非洲人获得大多数议席,成立内部自治政府,同年10月24日,获得独立,改国名赞比亚。南罗得西亚组成以伊恩·史密斯为首的白人右翼政府,于1965年11月片面宣布独立。

---

<sup>①</sup>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3卷,第705页。

英国从中非、东非的“撤退”，是英国“非殖民化”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中非、东非各国（除南罗得西亚外）独立后，促使英属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的独立日期也大大提前，贝专纳于1965年实现自治，1966年独立，改名博茨瓦纳。巴苏陀兰于1966年独立，改名莱索托。斯威士兰于1968年独立。到1968年底，除南罗得西亚外，英属非洲殖民地附属国全部获得独立。

#### 第四节 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政策——从《根本法》实施 到“共同体”建立

##### 一、殖民主义思维的惯性作用

直到50年代初，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决策集团并未摆脱老殖民帝国梦想，仍坚持把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完整性当作恢复大国地位的主要王牌。<sup>①</sup>即使法兰西对殖民政策作过一些改革和调整（如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和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但并没有形成适应非殖民化的整体思想和连贯性政策。加上“高卢雄鸡”迷信武力镇压。因此陷入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泥沼而不能自拔，疲于应付由此引发的殖民地和国内政治的严重危机。<sup>②</sup>

1954年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惨败给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震动与打击。法国人发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除了耗费军费，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尤其是奠边府一役的惨败使法兰西蒙受了耻辱。法隆(Fanon)在《悲惨的土地》(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谈及该战役的影响时指出：“越南人民在奠边府的伟大胜利

---

① 戴高乐在战后曾一再强调：“同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大国，失去了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成为大国。”

② 从1946年到1953年，法国不断爆发政府危机，更换了18届政府。

已不再——严格地说——仅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自从1954年7月以来，殖民地民族都这样问他们自己：‘我们该做些什么以带来另一个奠边府的胜利？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没有一个殖民人再会怀疑另一个奠边府胜利的可能性。……它也改变了殖民者的态度——他们开始意识到有许多的奠边府，因此，一种真实的恐慌笼罩着殖民政府。……”<sup>①</sup>奠边府的惨败促使法国极不体面地从印度支那撤退，迫使法国统治者重新审视在非洲大陆的殖民政策。

1954年6月，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施政宣言中谈到北非两个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时表示：“我们曾经答应他们，要使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我们将履行这一诺言，并为此准备恢复不幸中断的对话。”<sup>②</sup>这实际上暗示法国将改变非洲政策。1954年7月31日，即结束印支战争的日内瓦协定签字后仅10天，孟戴斯—弗朗斯亲赴突尼斯，宣布允许突“内部自治”、“准备将内部行使主权的权力移交给突尼斯人上和机构。”<sup>③</sup>但这一姿态并不说明法国政府准备立即从北非撤退。当突尼斯民族主义领袖哈比布·布尔吉巴明确表示“独立是突尼斯人民的理想”时，法政府立即缄默不语，1955年6月法突签订的条约虽然承认突获得内部自治，但并未废除1881年的巴尔杜保护条约。在摩洛哥要求独立问题上，法政府也一直闪烁其辞，直到1956年2月，法国才同意与之谈判，被迫承认摩洛哥与法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至于阿尔及利亚，法政府从来就认为它不能与摩洛哥与突尼斯相提并论。

---

① I. H. Gann,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1870—1960)》), vol. 2, Cambridge, 1974, pp. 519—520.

②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③ 同上。

“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而不是一个受我们保护的外国”，<sup>①</sup> 法历届政府对这一立场几乎从未有任何迟疑。195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打响民族解放战争后，法政府立即作出了最强硬反应。孟戴斯—弗朗斯宣称：“在涉及捍卫一个民族的内部和平与共和国的完整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姑息迁就。……阿尔及利亚居民和本土分离是不可思议的。……法国不论哪一届议会，哪一届政府，永远不会在这个根本原则上让步。”<sup>②</sup>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决定了它将长期深陷殖民战争泥淖而不能自拔。

## 二、《根本法》是“同化”与 “联合”的折衷产物

1955年4月，反映殖民地要独立的不可逆转趋势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英国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殖民政策，实施非洲殖民地的宪政改革。此时，法国政府意识到如果在黑非洲“无所作为甚至不作十分缓慢和不彻底的改革，则有导致类似北非所经历的那种爆炸性局势的危险。”<sup>③</sup> 因此，1956年1月居伊·摩勒政府上台后，即加快步伐，宣布在殖民地推行政治改革。5个月后，海外部部长德费尔在法属黑非洲颁布《根本法》。

《根本法》实际上是“同化”与“联合”二者折衷的产物。该法规定：普选权扩大到包括21岁以上的所有男女；取消“公民”与“臣民”两个选举团制度，代之以单一选举团；除塞内加尔4个市外，又给予法属非洲殖民地另外35个城市以全权市的地位；取消法属西

① 孟戴斯—弗朗斯 1954 年 11 月在国民议会中的发言。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84 页。

② 同上。

③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25 页。

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领地政府,由各领地政府行使职权。领地议会将是具有议会性质的立法机关。据此,黑非洲各领地将建半自治共和国。事实上,各领地的自治权极其有限,各领地的政府委员会仍然以巴黎任命并对法国政府负责的法国总督为首,非洲籍部长只协助其工作,领地政府也不对领地机关负责。

德费尔在《根本法》颁布后声明道:“不要让人以为,法国只是在流血开始后才着手进行改革的。”<sup>①</sup>这不啻是不打自招。《根本法》实施后,的确暂时缓解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1957年3月,根据《根本法》的规定,所有黑非洲12个领地举行了大选。法属西非登记的选民有1 020万人,法属赤道非洲有250万人。两个地区的许多非洲人政党都取得了多数。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在象牙海岸、苏丹、几内亚及上沃尔特四个领地赢得多数并参加了政府;桑戈尔领导的非洲人大会党在塞内加尔获胜,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在尼日尔也赢得了多数。这些党派均倾向于在法兰西联邦内独立,认可和赞成《根本法》,认为“是非洲人民走向自由解放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步。”<sup>②</sup>

实际上,正如格鲁塞所说:刚刚生效的《根本法》马上就显得过时了。<sup>③</sup>因为它在独立问题上含混不清甚至是有意回避黑非洲独立问题。桑戈尔在1957年就指出,《根本法》不过是“哄孩子的玩具和棒棒糖”,激进的黑非洲知识分子也尖锐指出该法“是对那种想要保全其统治政体的一次有意识的修订。”并表示“用立法的方式这种闸门再也抵挡不住要求自由的风暴了。”<sup>④</sup>在法国国内,一些审时度势的明智之士也主张法国应尽快撤出其非洲殖民地以甩掉包袱。资深

①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②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478页,第467页。

③ Olivier Colombari, *Mémoires Coloniales*(《殖民回忆录》), La Découverte, 1991, p. 166

④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467页。

记者雷蒙·卡蒂埃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1956年9月1日的《巴黎竞赛报》上撰文说：“与昨天的审慎行动相比较，今天的明智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即应加速而不是限制权力的转移。必须尽快地把尽可能多的责任交给非洲人，一切风险由他们自己承担。”<sup>①</sup>

黑非洲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尚不符合法国的愿望，阿尔及利亚局势却越来越严峻。从奥雷斯山区打响第一枪到1956年短短一年里，阿尔及利亚战场形势便发生了明显转折，民族解放军在战斗中实力不断增强，作战范围逐步扩大，法军兵力日显不足。从1955年4月起，第四共和国宣布阿尔及利亚处于紧急状态并不断增援部队。从1956年1月到7月，法出动的总兵力从20万猛增到40万。<sup>②</sup>力图一举将武装起义烈火扑灭。驻阿尔及利亚总督雅克·苏斯戴尔明确表示：法国坚持合并政策。<sup>③</sup>1956年4月、6月和9月，民族解放阵线派代表同法政府进行了四次谈判，法政府拒绝停止军事行动，反而增派军队，加强军事威胁。说明法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法国在北非殖民战争泥坑中越陷越深。

正当阿尔及利亚战争如一团乱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又雪上添霜。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一起试图利用运河事件进军埃及，搞垮纳赛尔，切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供应战，促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早日结束。法、英老殖民主义者最后一次军事冒险以失败而告终。

苏伊士运河危机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更深地陷入内外交困之中。派往阿尔及利亚的总兵力1958年达到50万。据拉戈斯特估算，1956年阿尔及利亚的军费开支为2000亿旧法郎，外加因

---

①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②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918—1963年》上册，第137页。

③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前引书，第127页。



征召工人、农民入伍而给国民造成的负担 1 250 亿,这一年法国的经济损失共约 3 250 亿旧法郎。庞大的战争费用加剧了法国的财政困难,引发财政危机。到 1958 年戴高乐复出前,向美国借贷的 1 亿美元早已用罄,法郎贬值、国库空虚,政府仅在一个月内向法兰西银行提取了价值达 1 000 亿旧法郎的黄金、透支 3 500 亿旧法郎。<sup>①</sup> 由财政危机、殖民危机引发的政府危机空前激化,政府内阁如走马灯更换频繁,第四共和国寿命最长的摩勒政府只维持 16 个月,最短的政府仅存 4 个月。政局的极端混乱终于最后导致第四共和国的覆亡。

### 三、“共同体”能保住法兰西帝国吗？

1958 年,戴高乐在国内外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复出执政。他上台后制定了新宪法,成立了第五共和国,并宣布将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这是戴高乐在隐居 12 年中审时度势,冷静思考战后国际形势剧变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他已清楚意识到在新的形势下,要使法兰西继续在大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重建政治体制,结束延续 10 余年之久的殖民地危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帝国派军人,动摇了他的旧殖民主义信念。国内倡导非殖民化的政治派别对戴高乐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左翼反殖民主义政治派别以资深记者雷蒙·卡蒂埃为代表,主张法国必须从殖民地撤退。另一股势力则主张尽快地与非洲联合,建立新型的法非共同体。戴高乐选择了后者。帝国派舆论认为,非洲是法国赖以成为大国的一张王牌,作为一位帝国派军人,戴高乐无论如何不愿在一夜之间拱手让出殖民地,而“共同体”将是一种更为隐蔽、又能为非洲人所接受的方式。戴高乐复出后在

---

<sup>①</sup> 以上数据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88 页。

殖民政策上的重大抉择就是以法兰西共同体取代法兰西联邦,以确保法国的海外领地。

根据 1958 年宪法第十二编《关于共同体》的规定,共同体由享有自治权、“自行治理并民主地、自由地管理各自事务”的国家组成,各海外领地可以自行选择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海外者,或者联合地或者单独地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共同体的职权范围包括外交、防务、货币、经济与财政政策等。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是当然的共同体总统。共同体成员国必须放弃独立权,若一旦表示独立,就必须退出共同体,法国将停止所有援助。

是否加入共同体由殖民地公民投票决定。公民投票前一个月,戴高乐访问非洲,试图利用个人威望号召法属非洲人民投票赞成新宪法,加入共同体。戴高乐提出,可以在两种方案中抉择,要么同法国结成联盟,选择取得完全的独立的殖民地,将要付出与法国立即中断关系的代价。他威胁那些要求独立的领地,如果投反对票就“意味着它将孤零地走自己的路,由自己承担各种风险。”<sup>①</sup>尽管如此,几内亚明确表示要求独立,塞古·杜尔在致欢迎辞说:“对我们来说,人格的尊严比任何东西更为重要,对此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宁可自由而贫穷,也不做富裕的奴隶!”<sup>②</sup>塞古·杜尔的坚决立场,实际上已预示着戴高乐精心设计的共同体的命运。在私下里,戴高乐责成几内亚殖民官员向民族主义领导人施加压力,争取其改变主意。J·德凯克尔(J. Dequeker)记述了他当时给非洲民主联盟三名成员做工作的情况:“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求独立,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当心点!你们需要做出一个极其庄严的决定。不应该随便举手投票,而应该要求辩论。’”<sup>③</sup>

①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的演说。见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 4 卷,第 495 页。

② 西克·安德烈:同上书,第 4 卷,第 495 页。

③ Olivier Colombani, Mémoire Coloniales (《殖民回忆录》), La Découverte, 1991, pp. 175 ~ 176.

然而,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在1958年9月28日的公民投票中,几内亚以97%的绝对多数对法兰西共同体投了否决票。选择了独立。10月2日,几内亚正式独立,塞古·杜尔任总统。其他11个法属黑非洲领地在9月28日尽管都投了赞成票,有相当一部分是殖民地政府利用当地民族主义分歧软硬兼施的结果。由此可见,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法国的一厢情愿的产物,不具有生命力。

1958年9月28日公民投票后,非洲有12个国家即塞内加尔、苏丹(马里)、象牙海岸、达荷美、上沃尔特、尼日尔、毛里塔尼亚、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加蓬、乍得和马达加斯加成为共同体成员国,获得了完全自治。根据1958年宪法,这些自治国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成立议会和自治政府,并且不再向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派代表。法政府为避免这12个自治共和国步几内亚的后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它们,195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国推派一名代表担任法国政府的非洲籍“部长顾问”<sup>①</sup>以确保通过这些非洲政治领袖维持对非洲的严密控制。对敢于在公民投票中说“不”的几内亚,法国立即撤走全部行政机构人员并中止了一切财政援助,试图杀一儆百,阻止其他非洲领地效法几内亚。但这些措施都无法阻挡民族独立的滚滚洪流。几内亚在国际社会支援下坚持独立,1958年11月23日宣布同加纳组成联邦并加入了联合国;1960年1月1日和4月27日,英法托管的多哥和喀麦隆在联合国干预下获得独立,这一切都预示着“共同体”的最终命运。

---

<sup>①</sup> 根据1959年5月27日颁布的法令,戴高乐于7月底任命了乌弗埃·博瓦尼为外交部部长顾问、利塞特为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部长顾问、桑戈为文化部部长顾问、齐腊纳纳为国防部部长顾问。引自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502页。

1958年12月,塞内加尔、法属苏丹、达荷美、上沃尔特组成“马里联邦”,<sup>①</sup>次年9月,马里联邦向法兰西共同体行政委员会提出在共同体内独立的要求。按1958年宪法规定:每个法属殖民地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脱离共同体独立,但不允许在共同体内独立。这意味着任何殖民地一旦独立就必须脱离共同体。马里联邦这一要求给戴高乐出了难题。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吐露自己矛盾心情:“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sup>②</sup>戴高乐在1959年10月10日圣路易举行的法兰西共同体会议上首次表示承认马里联邦。三天后,戴在达喀尔的演说又表示由于法国的援助、许可和帮助,马里联邦将成为独立国家。这一姿态实际上表明戴高乐决定加速从法属非洲撤退。1961年4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法国加速撤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世界大战及其影响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解放运动……而且是因为我认为,使法国继续保留许多已经不符合它的威望和作用的义务和负担,是与它目前的利益和新的宏图相冲突的。”<sup>③</sup>说明戴高乐已经意识到继续原有的殖民统治方式已不符合法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1960年6月4日,第五共和国的宪法第86条作了如下修改:“一个共同体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协议途径变成独立国家而并不因此脱离共同体。”<sup>④</sup>这一年,法属西非12个共同体成员国先后宣布独立,戴高乐政府精心策划代替殖民帝国的“共同体”终于寿终正寝。

---

① 达荷美和上沃尔特1959年3月退出了马里联邦。

②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38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134页。

共同体一年半的短暂寿命历史表明,戴高乐是被迫逐步实现黑非洲国家的独立的。他原想以允许各成员国享有内部自治这种有限的让步来继续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但民族解放运动的波涛汹涌的浪潮很快冲垮了戴高乐设置的框框。他只得步步退让,最终不得不同意这些国家独立。最能体现戴高乐政府顺应历史潮流的被动性、局限性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

戴高乐上台后,曾一改好战面孔,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然而,他并非一开始就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1958年10月,法国政府宣布《君士坦丁堡计划》,该计划抛出一些诸如分配土地、提供到法国就业机会等诱人条件,同时又规定阿尔及利亚必须保留殖民制度,继续作为法国的殖民地,这一计划理所当然被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所拒绝。当14届联大在1959年9月即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戴高乐急忙在9月16日发表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的声明。原则上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但又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停火之后需经过四年方能举行公民投票,由阿尔及利亚人民就下列三种前途选择其一:(1)同法国分离,即独立;(2)同法国完全一体化,即法国化;(3)同法国保持一定的关系,即有限自治。当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意以此声明为谈判基础时,法政府又关闭了谈判大门。只是在夏尔防线和夏尔计划被粉碎、军事战略遭到惨败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才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

1960年,非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有17个国家宣告独立,至此独立国家面积已占非洲总面积2/3,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面临全面瓦解。在国际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所有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统治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戴高乐政府退却了,于1962年3月与阿尔及利亚民族政府签署埃维昂协议。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这样,除吉布提、科摩罗等小块殖

民地外,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基本崩溃。

## 第五节 比属和葡属殖民地的风暴

### 一、“安定绿洲”起风暴

50年代中期,安特卫普海外领地学院教授冯·比勒松为刚果解放提出为期30年的计划时,他受到了指责。<sup>①</sup>一个比利时的殖民主义鼓吹者甚至说,“在比利时,人们至今还不曾认为‘殖民’这个词含有贬意,我们也许是最后将它从我们词汇中换掉的人。”<sup>②</sup>这说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是最后从殖民地撤退的一批人,还不存在规定撤出时间的必要性。

1948年,比利时在刚果实行了“良民证”制度,规定年满21岁的刚果人均可“通过良好的行为和习惯来表明自己真诚希望接受进一步的教化”,<sup>③</sup>即归化于比利时文化并接受殖民价值观念。据卢蒙巴统计,直至1955年,“良民证”只发出了884张。<sup>④</sup>1952年,刚果总督任热颁布关于登记的新法令,建立“法定同化”制度,规定凡已接受“西方文明的非洲人,即可享受法定同化的待遇。”<sup>⑤</sup>据V·G·彭斯统计,1952年到1953年,在斯坦利市1894名16岁

---

① L. H. Gann,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2, Cambridge, 1970, p. 452.

②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687页。

③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316页。

④ P·卢蒙巴:《我的祖国刚果》,帕尔—马尔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引自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316页。

⑤ 登记制度由比国王利奥波德创立于1894年,规定凡在教育程度及道德修养上达到一定程度均可申请登记,即成为“进化人”(evolue)实际上是同化政策。

以上的男性非洲人中,白领阶层(即“进化人”*évolué*)只有 176 人。<sup>①</sup>从 1951 年开始,比利时当局吸收一部分非洲人进入地区议会,均由殖民当局提名在比政府看来,英国人实行宪法改革“操之过急,到了危险的程度”。<sup>②</sup>因此,直到 1958 年前,比利时政府仍坚持严格的家长制统治,完全不考虑向非洲人移交权力。殖民当局给识字的非洲人加上“进化人”的称号,却又不允许这些“进化人”出国,甚至连去比利时各大学也不允许。<sup>③</sup>1955 年前,比利时政府不允许刚果人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

然而,刚果人民的觉醒不以殖民者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戴维逊所言:“必然的白人优越主义惹起了必然的黑人优越主义。”<sup>④</sup>比利时政府把“使非洲人保持安静”的希望寄托在培养“进化人”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上,实际上,这些人越是强大“就会越加讨厌它的从属地位,它就会越加强烈地感到一种新的民族主义。”<sup>⑤</sup>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亚非新独立国家出现大大鼓舞了刚果人民。一些受过教育的“进化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唤醒刚果民族意识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1955 年,成立 5 年的阿巴科文化协会选出了新领导人卡萨武布,制定了新的政治目标,使该组织实际上具有了政党的性质。50 年代刚果陆续建立了几个政党,如莫伊兹·冲伯领导的科纳卡特党,卡隆吉领导的卡隆吉——刚果民族运动党及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尽管这些政党带有浓厚的部落主义色彩,但大都提出了政治要求。

1955 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在访问刚果后提出建立“比利时—

---

① L. H. Gann, P. Duig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 2, p. 196.

② 巴兹尔·戴维逊:《非洲的觉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63 页。

③ 同上书,第 169 页。

④ 同上书,第 163 页,第 174 页。

⑤ 同上。

刚果共同体”主张。比政府表示比利时在刚果的政策既不是隔离的、也不是同化的,而是一种联合的政策。此后,在官方文件中,“解放”一词频繁出现。如1957年10月23日,殖民大臣比塞雷在殖民地皇家科学院发表演说,称比利时殖民政策的目的在于“进行人性化、发展和联合,最后在联合的基础上进行解放。”<sup>①</sup> 这些姿态并没有阻止民族主义者活动。<sup>②</sup>1956年6月,《非洲觉醒》杂志发表宣言,明确反对“比利时——刚果共同体”主张。阿巴科党也拒绝了冯·比勒松教授提出的为期30年的独立计划,提出不能再等30年,应立即给予刚果人民独立,刚果人民“已经忍无可忍”!<sup>③</sup> 1958年8月,卢蒙巴向刚果总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刚果取得完全的独立。他在同年12月8日举行的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上,再次表达了刚果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决心。直接受法属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刚果民族解放运动掀起高潮。1959年1月4日,数千刚果人民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集会,遭到军警镇压,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殖民当局与群众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9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的惨案。事件发生后,刚果人民和国际舆论强烈谴责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迫使比利时政府匆忙作出变革的姿态。戴维逊认为,这次事件是促使比利时政府在1959年初突然改弦易辙的直接原因。<sup>④</sup>

1959年1月13日,博杜安国王发表广播文告表示:“我们的坚定目标是要领导刚果人走向繁荣与和平中的独立。”<sup>⑤</sup> 并承诺1959年底举行地方选举。但没有明确独立日期。以刚果民族运

---

①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4卷(下),第695页。

② Robert Comevin, *L'Afrique Noire de 1919 à nos jours*(《1919年至今的黑非洲》), Paris, 1973, p. 163.

③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37页。

④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316—317页。

⑤ 西克·安德烈:前引书,第713页。



动党为代表的各民族政党举行集会,强烈要求比利时政府明确宣布刚果自治及独立的具体日期。迫于刚果人民的压力和非洲整个政治形势的变化的压力,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召开由比利时政府和刚果各党派组成的圆桌会议,商讨刚果独立问题。为此,博杜安国王在1959年底再度访问刚果。与此同时,阿巴科党、刚果民族运动党、非洲团结党、非洲大众党和巴扬齐协会等刚果五大政党在利奥波德维尔附近的基桑图集会,制定未来刚果的共同纲领。根据会议通过的决议,刚果将成立中非共和国联邦,由6个自治共和国组成,各共和国拥有独立的宪法。这一决议实际上反映了各党派坚持各部族利益,带有浓厚的部族主义色彩。1960年1月20日,有关刚果独立的圆桌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1月27日就独立日期达成妥协,决定1960年6月30日为独立日期。并决定于5月份举行大选。但由于各党派在政治体制上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尽管后来达成妥协,但埋下了动乱的祸根。1960年4月26日——5月16日,双方代表专门就经济问题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刚果独立后接受比利时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首届刚果政府将与比利时签订一项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

1960年5月,刚果如期举行大选。各政党为赢得选举展开了激烈角逐,一些地区发生部族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斯坦利维尔发生了袭击白人事件,给比利时后来出兵刚果提供了借口。大选揭晓,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以微弱多数赢得胜利。但组阁遇到了阻力,卡萨武布领导的阿巴科坚决反对。比利时总管刚果事务的大臣肯肖夫转而请卡萨武布组阁,也因卢蒙巴强烈抗议而受挫。最后,卢蒙巴与卡萨武布达成妥协,卢蒙巴组阁,但条件是卡萨武布必须任总统。经过一番曲折,刚果终于在1960年6月30日宣布独立,当时简称刚果(利)。<sup>①</sup>

---

<sup>①</sup> 1971年10月改名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政变后更名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独立的过程坎坷曲折,而且独立后仍动荡不已。刚果独立后仅一个月,比利时政府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悍然出兵刚果,它不但动用了刚果军事基地上的武装,而且从本国调来大批军队,对刚果军民实施镇压。在动乱局势下,刚果部族分裂主义趁机抬头,在比利时的支持与怂恿下,制造地区分裂。1960年7月11日,科纳卡特党主席冲伯在加丹加宣布独立;8月8日卡隆吉又在南开赛省宣布分离,成立开赛矿业国。为了抗议比利时军队的入侵及其支持的分裂活动,卢蒙巴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并呼吁联合国提供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7月15日,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军开入刚果。之后,卢蒙巴转而请求苏联进行援助。这样,由于美国、苏联等大国及比利时的介入,刚果的内乱演变为一场以控制刚果为目的的国际性角逐。同年9月,刚果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政权,卢蒙巴被软禁,于次年1月遭冲伯集团杀害。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充满动荡和暴力的局面。直到90年代冷战结束,部族分离主义及大国的干预仍是刚果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比利时坚持老殖民主义,几乎未作任何撤退的准备,是促使刚果陷入几十年混乱的重要原因。

## 二、武装斗争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撤退

比利时撤退后,非洲大陆上仅存的老殖民主义国家只有葡萄牙了。直到50—60年代,当英法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枷锁走向独立时,葡萄牙殖民帝国却是一片绿洲,风平浪静。戴维逊在50年代中期访问葡属安哥拉时,当地一家铁路公司的白人总经理怡然自得地称“安哥拉这个地方是非洲天堂的一个小角落”,<sup>①</sup>吹嘘葡萄牙殖民政策比英国或者比利时要“开明”得多。<sup>②</sup>

① 巴兹尔·戴维逊:《非洲的觉醒》,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231页。

实际上,葡萄牙的殖民政策是最落后、最野蛮的,尤其是在独裁者萨拉查统治时期。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同化政策,<sup>①</sup>文化上通过天主教传教士严密控制当地教育,经济上采取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地榨取非洲人膏血。葡萄牙政策实质是不仅占有殖民地,而且毁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征服其灵魂。战后,当亚非拉掀起了一股民族独立运动浪潮,非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萨拉查政权视而不见,一如既往执行其既定殖民政策并修补其殖民理论。殖民地问题理论家马雷塞洛·卡埃诺竭力鼓吹:非洲黑人在“文化和技术领域里,无法同欧洲人甚至亚洲人相比较。非洲黑人只能作为一种生产者受白人统治或由白人加以组织、管理。”<sup>②</sup>1951年,萨拉查政权为了永久留在非洲,修改宪法,将葡属非洲殖民地划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与本土其他部分并列,这些做法以及其他措施阻碍了当地民族意识的发展,造成葡属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相对滞后。

但是,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报应规律一样,葡属非洲的民族主义作为对立物,仍然在痛苦的禁锢与磨难中产生了,最先觉醒的恰恰是葡殖民政府培养的“同化人”。其中一部分进入葡萄牙学校后,接触到外部世界并受到与葡萄牙本土民主主义者的影响,民族意识开始增长,更多的留在殖民地的同化人同葡萄牙的激进派保持联系,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认识。这两部分人的思想与下层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不满情绪汇合起来,在50年代中叶开始形成一股反殖民主义潮流,民族主义组织由此应运而生。

民族主义政党及运动的兴起引起葡萄牙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萨拉查主要手法是严密侦察,加强镇压,力图将星星之火扑灭

---

<sup>①</sup> 详见第13章有关论述。

<sup>②</sup> Michael Crowd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4, vol. 8, p. 758

于萌起之时。从1958年起,随着非洲大陆独立运动的高涨,当局镇压活动日趋严酷。1959年8月3日,几内亚比绍的皮日吉蒂造船厂工人与码头工人及内河运输船工人联合举行罢工,遭到镇压,造成50人死亡、100人受伤的惨案;同年,殖民当局在安哥拉实行大逮捕,安“人运”领导内图等被捕入狱。1960年,殖民军警在莫桑比克北部木韦达地区向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500多人。除了公开镇压,萨拉查政权把本国的秘密警察大批派遣到葡属非洲。1958年,在几内亚比绍建立了5个新的警察分队、11个特别警察哨所。<sup>①</sup> 这些秘密警察监视非洲人的活动、摧毁民族主义组织,并雇佣很多非洲人充当密探打进非洲人的各种组织,竭力制造分裂,破坏其内部团结。

葡殖民当局的残酷暴戾的镇压,激起民族主义者更猛烈的反抗。三地的民族主义政党最终都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卡布拉尔说:“赤手空拳同葡萄牙人进行斗争是不够的,也是不明智的。……对武装的葡萄牙殖民者,我们应采取的惟一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sup>②</sup> 从60年代起,葡属殖民地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到60年代中期,安哥拉三个主要政党(解阵、人运、安盟)分别在东部、南部、西北部开展斗争,民族解放武装发展到近10万人。几内亚比绍的爱国武装力量也控制了南部地区并向全境发展,莫桑比克在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葡萄牙殖民者。

60年代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非殖民化浪潮。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通过了非殖民化宣言,1962年又成立了非殖民化特

---

<sup>①</sup>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sup>②</sup> A. 伯拉盖斯和I. 沃勒斯坦:《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文献资料》第2卷,伦敦1982年,第62—65页。转引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83—384页。

别委员会,以敦促殖民国家尽快给予殖民地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此时,英法两个殖民大国已加速撤退,除少数一两块殖民地,其余均在60年代获得独立,一向进展迟缓的比利时也在60年代中期被迫改弦易辙,从其托管地和殖民地撤退。葡萄牙顽固坚持殖民统治已成了众矢之的。1960年底,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葡萄牙政府给予在非自治领地人民以自决权。国际社会纷纷指责葡萄牙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援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顽固的萨拉查政权仍拒绝变革,企图以不变应万变,永久占据非洲的殖民地。一方面继续借口葡属非洲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地而非殖民地,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另一方面对殖民地变本加厉加强镇压,扩大殖民战争范围。进入70年代后,葡萄牙在非洲的兵力投入大量增加,60年代初只有几千人驻军,而仅1972年一年,陆军增加到17.9万,海军1.8万,空军2.1万。<sup>①</sup>1971年的军费开支达153.117亿埃斯库多,占国家预算的40%。<sup>②</sup>葡政府向法国、美国、联邦德国购买军用直升机、重型炸弹等先进武器。葡当局制造了多起暗杀事件,<sup>③</sup>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

三个殖民地武装力量队伍不断壮大,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到1971年,安哥拉民族解放力量已解放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100万人口。莫桑比克9个省中除南部3省之外,都有人民武装力量在活动,几内亚比绍的武装力量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葡萄牙本土调来的部队因不熟悉非洲的丛林和山区,施展不开,到处被动挨打。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使葡国内各阶层的不满及反战情绪日甚一日,铺天盖地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继续扩大殖民

---

① Michael Crowder, *op. cit.*, vol.8, p.782

② Michael Crowd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4, p.782.

③ 1969年,被称为“莫桑比克之父”的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在达累斯萨拉姆被邮包炸弹炸死。1973年,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在科纳克里被枪杀。

地战争。在统治集团内部,对殖民地前途的不同意见也公开化了。1974年,原葡属几内亚总督、时任陆军副参谋长斯皮诺拉公开发表政见,认为葡萄牙已无法赢得这场殖民战争,主张葡属海外领地“自决”,通过公民投票同葡萄牙结成联邦。同年4月25日,斯皮诺拉得到一部分反对政府的中下层军官支持,发动政变,成立新政权。新政府表示,将采取政治而不是军事办法解决海外战争问题。次年5月,葡国内又一次发生政变。新上任的领导人哥斯塔·哥麦斯不得不公开承认对付殖民地:“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sup>①</sup>

此前,几内亚比绍东部的马迪纳——博埃解放区已于1973年9月24日正式宣布成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并通过了宪法。在葡政变前,已有联合国及70多个国家承认其独立。在既成事实面前,葡新政府不得不走上谈判道路。1974年9月,哥麦斯政权在法律上承认几内亚比绍独立,并同意于同年10月31日前撤出其在该国的全部军队。1974年5月葡政府也与莫桑比克谈判,1974年9月签订《卢萨卡协议》,承认莫桑比克人民的独立权,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正式宣布独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于1974年11月与葡达成协议,1975年7月12日独立。1975年7月5日,佛得角群岛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独立。安哥拉因三个政党内部分歧,独立迟至1975年11月11日才最后实现。<sup>②</sup>至此,除亚速尔群岛及马德拉群岛外,葡属非洲殖民地都取得了独立。葡萄牙终于以最被动的方式从殖民地撤退。最黑暗、最落后的葡萄牙殖民帝国也土崩瓦解了。

---

<sup>①</sup> Michael Crowd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Cambridge, 1984, vol. 8, p. 784.

<sup>②</sup> 尽管独立已实现,但内乱不已。直至1988年12月,三派才在非洲国家及美国调解下实现和解。

## 第六节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 纳米比亚统治的终结

### 一、委任统治掩盖下的殖民扩张

1994年前,南非是世界上惟一以立法形式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1949年,南非议会明目张胆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将国联时期委任统治的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非法吞并,从而使南非联邦成为非洲大陆上惟一拥有殖民地并实行白人种族统治的非洲国家。

西南非洲与南非交界,面积82万平方公里,在第一次大战前原是德国殖民地,战争期间由英属南非联邦军队占领,战后国联将它作为南非联邦的委任统治地。此后,由于该地不断发现丰富金刚石等矿藏,又居南大西洋要冲,因而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日显重要。铀、金刚石、铜、铅等重要矿藏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成为非洲第4大矿产国。它扼大西洋航道要冲,其沃尔维斯湾是从安哥拉南下南非海域时惟一可以停泊大型战舰的战略要地。南非蓄谋吞并西南非洲,1946年它向联合国提出将西南非洲合并于南非联邦的要求,以实现其30年来领土扩张计划。但遭到联合国坚决拒绝,在36票对零票,9票弃权的情况下,被否决了。1949年,南非悍然非法吞并西南非洲,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从此直到80年代末,它对西南非洲先后采取了直接管辖、建立班图斯坦及实行内部解决三种殖民统治形式,试图永久霸占这块宝地。

从40年代到60年代,南非当局把西南非洲作为“第5省”,在该地设立行政长官、立法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其中行政长官由南非议会代表和管理土著事务的委员兼任,立法委员会实际上只是咨询机构,议员全部由白人殖民者担任,行政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和

立法议会选出的4名委员组成。几十年来南非当局实施了一整套种族歧视政策,通过了5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不仅剥夺了西南非洲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对非洲人的教育、居住地区及日常生活实行“南非式”的种族歧视和隔离。

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吞并西南非洲为非法;1957年联合国又通过决议,要求将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1960年第15届联大决议又明确指出西南非洲人民享有独立和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由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南非当局又施展诡计,于1964年初发表《奥登达报告书》,要在西南非洲如法炮制南非所推行的班图斯坦制度(“黑人家园制”)。该报告书计划在西南非洲建立10个“黑人家园”,非洲人一律按其所属部落分别迁入各班图斯坦,并成为该家园公民。1967、1972和1973年,南非当局悍然先后在奥万博、东卡普里维、奥卡万戈建立班图斯坦,其中奥万博和奥卡万戈又先后于1973年的4到5月宣布成为“自治领”,造成西南非洲人民拥有自决权的假相以蒙骗世人和联合国组织。该制度实际上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的翻版,其目的是肢解西南非洲,将白人居住地与南非合并。因此,这一计划理所当然遭到黑人的坚决抵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对。1964年1月,联合国即通过决议对《奥登达报告书》予以谴责。1966年10月,第21届联大通过决议,宣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要求南非撤出该地。1968年又根据当地非洲人要求将西南非洲改名为纳米比亚。1969年,安理会通过264号决议,宣布南非继续霸占纳米比亚为非法。进入70年代后期,受葡属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抗进入新高潮,形势对南非白人当局更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当局又改变手法,停止实施班图斯坦计划,转而改变手法,采取“内部解决”的政策。

所谓“内部解决”,即名义上南非当局承认纳米比亚独立,撇开



联合国和纳米比亚反对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党,扶植亲南非的傀儡势力上台,企图继续控制纳米比亚。1975年9月,南非根据该方案召开有11个部族(包括白人和有色人在内)的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1977年3月通过所谓宪法草案,确定纳米比亚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体制。1978年12月,南非当局一手策划了选举,结果亲南非的特恩哈尔民主联盟<sup>①</sup>在选举中获胜,获全部50个议席中的41席,组成过渡政府。次年5月,南非当局将纳米比亚制宪会议改名国民会议。随后南非将部分立法和行政权移交给该机构。1983年初该傀儡政权终因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而垮台。1985年4月,南非当局又拼凑了第二届“内部解决”政府,设有执行内阁、国民议会和制宪委员会,拥有不完全的行政和立法权力。南非当局仍掌握纳米比亚外交、国防、安全及谈判解决独立问题的控制权。因此这届政府仍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可见,直到80年代中期,南非始终没有放弃霸占纳米比亚的意图,致使纳米比亚这一块非洲大陆上剩下的惟一的殖民地独立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 二、撤退的最后一幕

自南非吞并纳米比亚之日起,纳米比亚人民就没有停止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到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时,其斗争过程,以50年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首长、工会及知识分子领导的合法斗争为主,带有自发性与盲目性。50年代末以后,由于众多民族主义政党的出现,反殖斗争有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民族主义政党中影响最大的是奥万博人民组织(以下简称“人

---

① 该联盟成立于1977年11月,由纳米比亚白人、有色人及十几个黑人头面人物组成,因其第一次会议在特恩哈尔大厦召开而得名。该组织赞成南非当局“内部解决”的主张。

组”)。该组织成立于1958年,前身是奥万博人民大会党,初成立时只是以奥万博人为主体的地区性部族组织。1960年4月,该组织更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简称“人组”),吸收各族人民参加,萨姆·努乔马当选为主席,并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临时总部。自此,“人组”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支持下,组织逃亡国外的纳米比亚各族青年,在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接受军事训练,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1966年,“人组”建立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安哥拉南部和赞比亚设立营地。同年8月26日,“人组”在纳米比亚东北部卡普里维的翁库隆巴山谷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sup>①</sup>1973年,联合国承认“人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此后,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不断壮大,到80年代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sup>②</sup>

必须看到,纳米比亚由于其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地位,受到冷战时期国际斗争的影响,呈现复杂、曲折的局面。一方面受到美国和北约的冷战的战略考虑的支持,南非始终不愿放弃,坚持霸占纳米比亚的顽固立场,另一方面“人组”总部迁往安哥拉后,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有冷战背景的安哥拉内战漩涡。古巴在苏联支持下以南非侵略安哥拉为由重兵援安,而美国出于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考虑,也力图左右安哥拉局势及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南非当局的顽固态度,安哥拉内战,古巴的参与以及大国的插手,使得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趋于极度复杂化。70年代以来,美、英等西方大国,积极主张以谈判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1975年起,美、英、法、加拿大、联邦德国等五国大使利用南非表示要进行“变革”的机会,在联合国内外进行斡旋,劝说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1977年五国大使正式宣布成立“接触小组”,在南非与“人组”

---

① 联合国后将8月26日定为纳米比亚日。

② 一说8000余人。

之间进行调解,经磋商提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①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大选;②南非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③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合国部队和文职官员维持纳米比亚秩序以尽早实现独立;④沃尔维斯湾的归属问题由独立后的纳米比亚政府同南非政府谈判解决。1978年9月,经安理会讨论以五国建议为基础通过了《435号决议》。从此,该决议成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权威方案。南非当局迫于形势表示承认,但不久又在停火、撤军、释放政治犯等方面制造事端,阻挠该决议实施,同时积极策划“内部解决方案”,制造似乎准备撤出纳米比亚的假象。1988年5月至12月,在美国斡旋下,安哥拉、南非、古巴、美国四方举行会谈,经过艰苦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12月13日签署的《布拉柴维尔协议议定书》规定:1)从1989年4月1日起27个月内,5万古军全部撤出安哥拉;2)从1989年4月1日起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435号决议》。11月1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选举;3)由安哥拉、古巴、南非三方组成联合委员会监督协议执行并邀请美、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委员会工作。此后古巴、南非分别执行了该协议,南非于1989年2月解散了纳米比亚“临时政府”。联合国维和部队、文职人员及警察于协议执行之日起分批进驻纳米比亚执行任务。与此同时,“人组”领导人努乔马和数万名纳米比亚难民开始返回祖国。

1989年11月7—11日,纳米比亚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人组”获全部67万多张的有效选票38万多张,占57.32%,赢得议会72个席位中的41席,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获得21席,联合民主阵线获4席,“人组”承担了各党派共同协商制定独立宪法和组织政府的责任。

1989年11月21日,纳米比亚制宪会议开幕。1990年2月9日通过了纳米比亚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努乔马当选为首任总统。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正式宣告独

立。此后南非等一系列国家宣布承认。这样,非洲大陆上最后一块殖民地摆脱了殖民统治,同时也标志着老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的彻底终结。

1994年4月,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出现了历史性变化。非国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从而也结束了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南非的历史。

## 西文主要参考书目

- Ajayi, J. F. A. & Crowder, M.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gman, 1987.
- Ajayi, J. F. A.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Unesco, 1989.
- Anders, E. & Westbery, *Angola and Mozambique: The Case Against Portugal*. London, 1963.
- Ayandele, E. A.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zation*, Longman, 1971.
- Azurara, G. E. *The Chronicle of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 Bade, O.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Nigeria*, London, 1982.
- Bender, *Angla under the Portugese: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London, 1978.
-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Africa Conference 1884—1885 and the Onset of Partition*, The German History Institu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oahen, *Topic in West Africa History*.
- Boca, A. D. *The Ethiopia War*, Chicago, 1969.
- Botman, S.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 Boxer, C. R. *The Pau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1965.
- Brausch, G., *Belgium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go*,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Brooke-Smith, R.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Documents and*
- 686

- Debate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7.
- Buchman, J. L.' *Afrique noire Indépendante*, Paris, 1962.
-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New York, 1928, vol. 1—2.
- Buxt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its Remedy*, London, 1967.
- Cairncross,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 Cambridge, 1953.
-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London, 1932, vol. 4.
- Christopher, A. J. *Colonial Africa*, New Jersey.
- Cogquery-Vidrovitcher, C. & Moniot, H. L.' *Afrique Noire de 1800a nos Jours*, Paris, 1974.
- Cohen, A. *British Policy in Changing Africa*, London, 1959.
- Cornevin, R. L.' *Afrique Noire de 1919a nos Jours*, Pan's, 1973.
- Coupland, R.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Oxford, 1938.
- Crodw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1984.
- Cromer, L. *Modern Egypt*, Macmillan and Co. Ltd. London, 1908.
- Crowder, M. *West Africa Resistance: The Military Response to Colonial Occupation*, London, 1971.
- Crowder, M. *Senegal, A study of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London, 1967.
- Curtin, Fierman, Thomson, &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London, 1978.
- Curtin, P.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Wisconsin, 1975.
- Danvers, F. C.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London, 1894.
- Davenport, T. R. H. *South Africa-Modern History*, Toronto.
- Davidson, B. *Black Mother, The Year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 Boston, Toronto, 1961.
- Davidson, B. *The African Past*, Longman, 1964.
- Davidson, B.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78.
- Davies, K.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1957.
- Davis, D.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Oxford, 1984.
- Dike, W. *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 London, 1890.
- Divid, ed. *British Docu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Volume Thre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 Goldsworthy, H M S O, 1994, No. 363.
- Dona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Washington, 1930, vol. 1—3.
- Driault, J. E.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Paris, 1907.
- Duffy, J. *Portuguese Africa*, Oxford, 1959.
- Dutt, R.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 London, 1956.
- Easton, S. C.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Colonialism*,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s, New York, 1965.
- Eden, *Memoirs*, Full Circle, London, 1960.
- Elphick, R. *Kraal and Castle Khoiekhoe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 English, M. C. *Short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1960.
- Fage, J. D. & Oliver, 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8.
- Ferreire, E. S.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End of an Era*, London, 1978.
- Fieldhouse, D. K.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1973.
- Fieldhouse, D. K.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in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 IV, No. 2, 1961.
- Fieldhouse, D.K. Colonialism 1870—1945, London, 1983.
- Fieldhouse, D.K. The Colonial Empire, London, 1982.
- Fisher, The Transvaal and the Boer, London, 1900.
- Forde, D. & Kaberry, M. We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7.
- Frankel,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London, 1938.
- Freoda, P. The Economics of a Tropical Dependency, London, 1946.
- Gann, L. H. & Duignan, P. Burden of Empire, London, 1967.
- Gann, L. H. & Duignan, P.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Cambridge, 1969, vol. 1—4.
- Gann, L. H. & Duignan, P. The Ruler of German Africa, 1884—1914, 1977.
- Garrison, W. L.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 New York, 1969.
- Geary, N. Nigeria Under British Rule, New York, 1965.
- Geggus, D. Resistance to Slaver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The Modern Carribe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9.
-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Kraus, 1979.
- Haily, An African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1957.
- Hargreaves, J. D. West Africa Partitioned, London, 1974, vol. 1.
- Hargreaves, J. D. The Berlin Conference West Africa, and the Eventual Partition.
- Herskovits, M. J. Social History of Negro, Clark University, 1935.
- Holland, R. F.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Macmillan, 1985.



- Hollingdworth, T. H. *Historical Demography*, Ithaca, 1969.
- Hopkins, A. 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1973.
- Hure, G. R. ed. *L'armee d'Afrique, 1830—1962*, Paris, Lavauzelle, 1977.
- Igbafa, P. A. *Benin 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9.
- Ingham, K.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1962.
- Isaacman, *Anti-Colonial in the Zambesi Valley 1850—1921*, Berkeley, 1976.
- Ishemo, S. *Cultural Response to forced Labour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Social Identities*, vol. 1, 1995.
- Jean & Lacouture, S. *Egypt in Transition*, Methen & Co. Ltd. 1958.
- Joffe, E. G. H. & Maclanch, K. 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Paris, 1983.
- Kaniki, M. H. Y.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1980.
- Keltie, J. S.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London, 1895.
- Kennedy,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87.
- Kirkman, J. S.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 1968.
- Ki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Oxford, 1964.
- Klein, M.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74—1914*, Stanford, 1968.
- Konezack, A. J.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ropical Africa*, London, 1977, vol. 2.
- Krain, M. *La Tunisie Precolonial*, Tunis, 1973.

- Law, R. Imperialism and Partition "J. A. H." 24(1983).
- Leonard,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 1885—1895, London, 1903.
- 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London, 1975.
-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1858.
- Lliffe, J.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1979.
- Lovejoy, P. E.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1929.
- Lugard, F. D. 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 Empire, Edinburgh, 1983.
- Mack, S. D.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Penguin Books, 1976.
- Macmillan, Speech to the House of Assembly in Cape Tow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1960.
- Malyn, N. Portugal in Africa; The Last Hundred Years, London, 1978.
- Manning, P.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 Occidental, 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 Cambridge, 1990.
- Marais,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Johannesburg, 1957.
- Marks, S.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J. A. H.", 1972, No 1.
- Marks, S. & Atmore, A. Firearms in Southern: A Survey, in "J. A. H.", 1971 No 4.
- Marks, S. & Atmor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gman, 1980.
- Martins, O. The Golden Age of Henry the Navigator, London,

- 1914.
- Mason, *The Birth of a Dilemma*, Oxford, 1958.
- Mausset, H. *France et Afrique du Nord*, Larose, 1945.
- Maylan, P.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of South Africa*, New York, 1986.
-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Markets in West Africa*, Oxford, 1971.
- Metcalf, G. E.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London, 1964.
- Miege, Ahmed Bey du Tunis, Paris, 1976.
- Milner, V. *England in Egypt*, London, 1909.
- Moodie, D. ed.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 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47.
- Morsy, M. *North Africa 1800—1900*,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4.
- Mrsot, A. L. A.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Muller, ed. *500 Years,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1988.
-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London, 1962.
-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1652—1836*, Stanford, 1957.
- New bury, C. W.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est Africa Selected Documents 1786—1874*, Oxford, 1965.
- Nowell, C. E. *A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1952.
- Oliver, R. & Mathew, G. *History of East Africa*, Oxford, 1996, vol. 1.

- Olson, J. S.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Greenword Press, New York, 1991.
- Paish, 'Great British Capital Investment in other Lands', *RSSJ*, L X XI, London, 1909.
- Paish, *Great British Capital Investment in Individual Colonial and Foreign Country*, *RSSJ*, L X X IV, London, 1909—1910.
- Pakenham, T.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876—1912*,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
- Palmer, M.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s in Natal* Oxford, 1957.
- Pankhurst, S. *Ethiopia A Cultural History*, Essex Lalibela House, 1955.
- Perham, M. *The Colonial Reckoning*.
- Plaatje, S. T.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Longman, 1987.
- Postel, A.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Africa*, Philadelphia, 1948.
- Robert, W.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London, 1986.
- Robert, H. *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a*, Chicago, 1966.
- Robinson &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 1961.
- Robinson, R. & Gallagher, J.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1953).
- Rodney W.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Dares Salaam, 1972.
- Rodney W.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Oxford, 1970.
- Safran, 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Schreuder, D. M.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1877—189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hacchi A.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London, 1985.
- Shepperson, G. Aspects of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Berlin Conference.
- Sithole, African Nationalism, London, 1968.
- Slade, The Belgium Congo: Some Recent Change 1960.
- Source Material on the African Economy; 1860—1970, Capetown, 1972, vol. II.
- Strachey,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1959.
- Thompson, V. and Adolf, R. The Emerging States of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4—8.
- UNESCO, Social Implic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1956.
- Warwick, The South African War, London, 1980.
- Wellington, J. H. South West Africa and Its Human Issues, London, 1967.
- Wickine, P.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86.
- Wieschhoff, H. A. Colonial Policies in Africa, Philadelphia, 1944.
- Wilks, I.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1975.
- Willam, M. Portuguese Africa and the West, Manchester, 1972.
- Wilson, M. & Thompson, L.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1969, vol.1—2.
-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cademic Press, 1989, vol.1—3.
-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1919.